解放三部曲

渡江南进

高建国 著

卷首 远飞者当换其新羽

卷一 何日饮马长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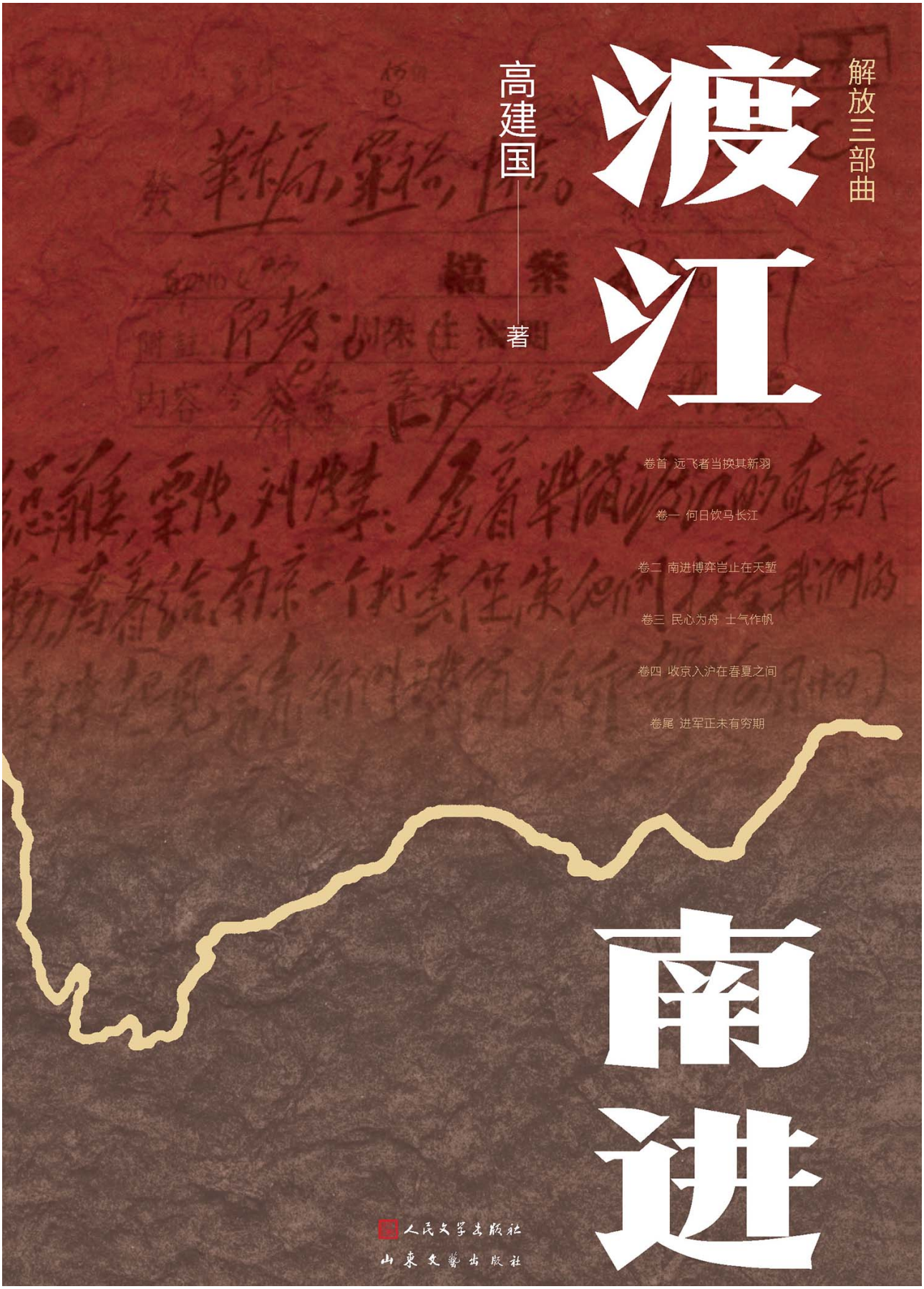
卷二 南进博弈岂止在天堑

卷三 民心为舟 士气作帆

卷四 收京入沪在春夏之间

卷尾 进军正未有穷期

人民文学出版社
山东文艺出版社


解放三部曲
渡江
南进
高建国
著
卷首 远飞者当换其新羽
卷一 何日饮马长江
卷二 南进博弈岂止在天堑
卷三 民心为舟 士气作帆
卷四 收京入沪在春夏之间
卷尾 进军正未有穷期
人民文学出版社
山东文艺出版社

版权信息

COPYRIGHT

书名：渡江南进

作者：高建国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6年04月

ISBN：9787020199525

字数：388千字

（更d书f享搜索雅 书.YabooK.org）

文前辅文

历史的前提是真相，而信史必定素面朝天。

——题记

卷首

远飞者当换其新羽

一架美国道格拉斯公司生产的DC 9军用运输机，从延安东关机场腾空而起，飞过黄土高原腹地和穿晋过陕的黄河，四小时后平稳降落在晋东南黎城县长宁村附近美军观察组专用机场。

1945年8月23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问题。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

二战即将在东亚收官，中国却面临和战两种前途命运抉择。25日，中共中央发出《对目前时局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避免内战、实现和平民主六项紧急措施。恰在这时，一架美军观察组的运输机降落延安。为以革命两手对付反革命两手，毛泽东挺膺赴渝前果断决定：协调延安

美军观察组飞机，运送七大解放区指挥员取道太行急返前线！25日上午，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陈赓等二十人，携手枪、背降落伞，在延安秘密登机。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二卷），第365—36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

正义之神开始主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势，已两年有余。1943年2月以来，苏美英等国盟军相继在苏德战场、太平洋战场、北非战场大败德意日法西斯军队，强力扭转二战格局；而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另一主战场中国，一场关于组织形态、力量构成和作战形式的转变，也在敌后各战场悄然兴起。1944年8、9月间，中共中央军委提出，作战形式要由以游击战为主转到以运动战和阵地战为主，要准备实施大兵团作战。中外观察家注意到，是年头八个月，八路军、新四军七十次主要战役战斗，运动战、攻坚战占48.5%；1945年春夏季攻势，这一比例跃升至70%。

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已开始了从游击到正规、从乡村到城市、从局地到全国的战略转变。诞生以来一向取守势并处于反“围剿”状态的中国共产党人，正以前所未有的攻势变革赢得未来。

天气晴好，三晋大地阳光普照。1945年8月25日，从陕北飞临太行的新四军军长陈毅，下机后同各方主帅匆匆告别，与冀鲁豫纵队司令员杨得志伙用一支警卫小分队，急切东返。

是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总战略，决定调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率数万主力部队开赴东北；新四军江南主力北撤，一部进入山东。26日，陈毅从太行返华中路上接中共中央电令：“取捷径直到山东”，接替罗荣桓军职。10月20日，中共中央任命陈毅兼任山东军区司令员。

伟大战略转变呼唤王者归来。10月24日，在山东军区驻地临沂，待命远征的罗荣桓，特意把一条虎皮褥子赠送给陈毅。

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第44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赴鲁履新喜获“百兽之王”战袍，陈毅笑道：“人说老虎屁股摸不得，今后我要睡在老虎身上了！”在香城，陈毅给团以上干部传达党的七大精神并作反内战动员时出言铿锵：“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谁敢来摘果，把枪缴下来！”

1946年1月7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新四军军部与山东军区合并，下辖滨海、胶东、渤海、鲁中、鲁南五个三级军区，总员额共计二十二万人。新四军入鲁部队与山东军区第八师组成山东野战军，下辖第一、二纵队和两个师，共七万余人。陈毅任司令员，战略上统一指挥山东和华中部队。

6月21日，新四军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罗炳辉在兰陵病逝。23日，陈毅参加葬礼号召学习罗炳辉，“进入自卫的准备”，“决心打了胜仗开庆功会，打了败仗开批判会，打死了开追悼会”！

兰陵励志伏虎令山左雄师摩拳擦掌，但与由红二、红四、红一方面军等部队改编的晋绥和晋北野战军（后改称西北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改称中原野战军）和东北民主联军（后改称东北野战军）相比，主要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华东“偏师”，要在空前深刻的战略转变中变身重塑，注定要经受更多锻打与磨难。

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临近尾声，陈毅却又遭新的生死劫。1937年11月中旬某日，陈毅化装成一名士绅乘轿来到九龙山，向湘赣边游击队传达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说服他们下山改编新四军。其时，原中共湘赣边省委书记陈洪时已投敌叛变，湘赣边游击队与外界完全隔绝，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也已中断。陈毅手持项英签名的“特派党代表陈毅同志来你们这里联络”的便条，游击队长和政治委员都未见过陈毅，也不熟悉项英的笔迹。更可疑的是，便条既无公章，也无私章。而穿绸缎、坐轿子上山的陈毅，还侈谈“下山改编，与国民党合作抗日”，遂怀疑他是“叛徒”，将其移送湘赣省委，捆在省委办公的竹棚旁。省委书记谭余保即开会磋商如何处置陈毅。陈毅在竹棚外听到会上动议处决自己，便放声大喊：“不能杀！杀掉我，你们要犯大错误！”

第二天，湘赣省委在竹林中对陈毅进行公审，陈毅与谭余保展开激辩。部分与会者被陈毅说服，建议谭余保缓杀陈毅，先关几天，看看山下敌人动静再说。两个月前，谭余保曾接待一自称是湘鄂赣边区党委派来的“交通员”，游击队缘此遭袭损失不小。

陈毅被关数日，敌不进反退，谭余保与陈毅多次交谈，也怀疑渐消，于是派交通员去吉安，连夜取回陈毅是党代表的公函和中共中央告全党同志书。谭余保自愧鲁莽，挥泪给陈毅松绑道歉。

陈毅活动了一下因长时间捆绑而麻木得几近失去知觉的双臂，宽厚地一笑说：“你是个坚决的老革命，是个好同志！”

> 胡石言、吴克斌、罗英才、胡松植、何晓鲁、铁竹伟等著：《陈毅传》，第183—18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第203—20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陈毅上九龙山虽命悬一线，但毕竟有惊无险。而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红十六师政治委员明安娄（楼）、鄂东南特委书记林美津、湘南游击支队支队长曹树良，上山动员游击队改编均被误杀。有的临刑前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亦未能使游击队猛醒。

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新四军起步艰难，虽在抗日烽火中凤凰涅槃、堪称铁军，但要脱出与生俱来的游击窠臼，在大兵团作战中冶铁成钢，绝非易事。陈毅未想到，战略转变重头戏竟在自身。

>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第283—28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1946年6月22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陈毅、舒同，提出南线实行外线出击、向南作战战略计划。

陈毅竭诚拥护南线作战计划，而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正盘桓苏中待机。27日，粟裕致电中央军委和陈毅：主力应留苏中作战，不宜立即西移淮南。中共中央1941年即指示，苏鲁战区“是目前华中的基本根据地”，“好像汉高祖的关中”。粟裕认为，兵多粮广的苏中，最宜内线歼敌，29日与邓子恢、谭震林再电：华中主力转至淮南后，不仅粮食须由苏中供给，即民夫运输恐难支持；如苏中失陷，淮南战局万一不能速胜，则我将处于进退两难。

陈毅接电不改初衷，30日电奏中共中央“7月间非打不可”。

陈毅、粟裕1928年同上井冈山，从新四军到解放军，两人几度搭档，谊切苔岑，但为胜战计，诤友间亦不妨各执一词。

6月28日，毛泽东复电粟裕指示，华中野战军部队继续隐蔽于待机位置，听候安排；7月4日再电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我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

7月13日，粟裕不失时机发起苏中战役。毛泽东电示：“鲁南大军仍不宜此时南下，以免陷于被动地位”；“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

7月中旬，蒋介石集结五个整编师（军）十二万人，三路进犯苏中，兵力形成“四打一”。粟裕以第七、十两个纵队各三个团监视、牵制东路和邵伯方向之敌，集中第一、六两个师十二个团兵力，歼灭中路来犯整编第八十三师两个团，决心还敌一个“六打一”！

当月13日起，华中野战军第一、六两个师在宣家堡、泰兴激战三天，全歼整编第八十三师两个团另两营三千多人，20日起再战如南，歼灭整编第四十九师一个半旅和整编第六十五师、九十九旅各一部逾万人，生俘少将旅长胡坤以下六千余人。

7月14日，陈毅致电中央军委并粟裕，要求粟部即西移淮南。

《粟裕军事文集》，第245—246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

25日，粟裕向中共中央和陈毅建议，仍调第五旅至苏中参战，并于8月1日再电中共中央：“现天长盱眙既失，五旅等部留淮南已无大作用，因此建议将淮南主力大部东移苏中参战。”

7月30日至8月3日，粟裕指挥第七纵队三千多官兵抗击五万多蒋军，在首战海安外围运动防御战中，以仅伤亡二百余人代价，毙伤来犯之敌三千余人，创造了敌我伤亡比例15：1的新纪录。

《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11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陈毅主张“西移淮南”，粟裕坚持“留在苏中”。仲裁陈粟出击方向之争，毛泽东开始改变原先急于外线出击、向南作战想法，8月2日电询粟裕：一个月内在苏中能否再歼敌两个旅？

5日，粟裕第三次致电中央军委：“五旅增到苏中”，“8月内再歼敌人两个旅是有把握的”，恳求五旅及特务团东调参战。

《从延安到北京——解放战争重大战役军事文献和研究文章专题选集》，第110—11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

6日，毛泽东致电陈毅：“似以同意粟裕意见在苏中再打一仗，然后主力西调为有利。因粟部西调过早，一则苏中人心不顺；二则敌军亦将早日西调。如西面仗打不好，怨言必多，故不如让粟部在苏中再打一仗（不论胜负）然后西调，各方皆无话说。”

7日，粟裕获悉进占海安之敌分兵东进，第一〇五旅由海安向李堡进犯，遂急电中共中央和华中局：“歼敌良机已到。”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第39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并告陈毅、宋时轮等人电：“尽可能满足粟之要求，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方向。”

谭震林奉命率第五旅和华中军区特务团出击海安，苏中战役之李堡战役仅用二十小时，即全歼换防的新七旅和第一〇五旅两个团，歼敌九千多人，生俘少将旅长金亚安、少将副旅长田从云。新七旅旅长黄伯光所率一个团，亦为打援部队所歼。

8月9日，陈毅在淮北挥师涉水进攻泗县县城形成对峙，被迫撤出战场。13日，陈毅致电粟、谭：“宜就地继续开展局面，不必忙于西调，军委有此指示，望照办。”陈粟之争就此画上句号。

不同意见的论争，在战争实践中归于统一。实行内线作战方针符合战争初期的客观规律，其正确性在苏中战役中得以凸显。

>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1945.1—1949.2，第38页，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第1版。

1945年5月24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与中国战区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兼蒋介石总参谋长魏德迈会谈时，魏德迈即说，万不能想象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将如何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因为他们大概没有接受过这些方面的训练，不可能大规模地投入在通信、指挥和供给方面掌握复杂技术的军、师部队进行作战。[注]

这位天真的美国将军或许忽视了，中共麾下众多猛将是拿破仑所云将“羊群”带成虎狼之师的“狮子”。新四军快速实现战略转变的秘诀，还在于抗战中数万青年学生和工人加盟。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彭冲，当年任有“江阴老虎”美誉的第十八旅五十二团政治委员，全团无一文盲。从上海入伍的工人不少参加过三次武装起义。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人民子弟兵，从游击战转向大规模运动战，比预想要快得多。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七战七捷，以伤亡一万六千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六个旅、五个交警大队共五万三千多人，占进犯苏中敌军总兵力的44%，为依托解放区进行内线作战积累了宝贵经验。苏中战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战法，成为我军作战基本原则。此役亦是华东我军脱翎换羽的拐点。

9月19日，山东、华中野战军在苏北会合。20日，粟裕等致电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建议华中和山东野战军集中行动以改变战局。21日，陈毅致电中共中央，同意“两个野指合成一个”。

> 《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13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2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毅、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电，同意山东、华中野战军“统一指挥，向淮海行动，打开战局”，23日电示“两军集中行动，两个指挥部亦应合一。提议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注]

10月1日，陈毅致电中共中央：“两次到分局会谈，他们战争方针很正确。但我至淮北，战局顾虑太多，决心不够，未能发挥山野力量，有负党与人民的付托。今后集结张（鼎丞）邓（子恢）粟（裕）在一起，军事上多由粟下决心，定可改变局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第52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毅、张鼎丞、邓子恢、曾山并粟裕、谭震林电：“望你们集中山野、华野全力（决不可分散）歼灭东进之敌”，“为执行此神圣任务，陈、张、邓、曾、粟、谭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你们六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商贻误戎机），战役指挥交粟负责。”[注]

如同在东北战略区以中央委员林彪为主将，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陈云、高岗居副手位置一样，在华东战略区，以中央候补委员粟裕负责战役指挥，中央委员陈毅、邓子恢、张鼎丞、张云逸等在此方面辅助。历史证明了毛泽东不拘一格用人才的高超艺术，也彰显了解放军将帅淡泊名利共赴大业的宽广胸怀。

苏中七战七捷催生了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的决策模式，成为大规模运动战实施民主集中制的范例。在这一制度创新的推动下，华东野战军成为解放战争前期全军歼敌数量最多的野战军。

历史在哪里终结，就从哪里重启。

1947年1月底，国民党军分南北两线进击山东，南线以八个整编师北犯临沂，北线以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集团三个军南下莱芜、新泰策应，同时从冀南、豫北抽调一个军、三个整编师，阻止华野西撤和晋冀鲁豫野战军东援。陈毅、粟裕指挥华野一部以决战姿态阻击并迷惑南线之敌，主力于2月22日隐蔽兼程北上莱芜，至23日一举歼灭李部五万六千余人，生俘李仙洲。

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第48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莱芜大捷后不到半个月，陈毅于3月10日欣然接受记者采访，由衷赞扬说：“这证明了我军副司令粟裕将军的战役指挥一贯保持其常胜记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妙。”[注]

胡石言、吴克斌、罗英才、胡松植、何晓鲁、铁竹伟等著：《陈毅传》，第38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是年8月6日，陈毅致电中央军委和华东局：“最近粟裕、陈赓等先后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与彭（德怀）、刘（伯承）、林（彪）并肩迈进，这是我党与人民的伟大收获。”[注]

远飞者当换其新羽。“偏师”先行，逆风起飞，战略转变为游击健儿神奇赋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已经准备好了。

卷一

何日饮马长江

（一）窑洞灵光——马背上的神来之笔

葭县1964年改称佳县。

那个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1947年3月18日晚离开延安，在陕北的沟壑梁峁间辗转迁徙六个多月，于9月23日抵达葭县神泉堡，在这个小小的驿站停了下来。

黄河自莽莽昆仑集流汇溪，一路东向遇吕梁山掉头南下，左晋右陕中分黄土高原，形成七百二十多公里的晋陕大峡谷。坐拥“明五暗二两厢六”窑洞群的神泉堡，即嵌于黄河中游晋陕峡谷西岸。

陕北转战半年，这个马背上的司令部指挥千军万马，于南北两线绝地反击，解放战争由此翻山过坳、扭转乾坤，呈现出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喜人局面。三周前，9月1日，毛泽东在葭县朱官寨，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解放战争第二年战略方针指示：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3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

当其时，中外许多观察家已经注意到，内战爆发之初处于战略防御态势的人民解放军，正全力出击外线力促攻守转圜，开始从全局上实现与国民党军的强弱易势。而扭转历史车轮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正是运筹于交战双方大本营的战略。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周恩来时问：“你对蒋介石如何评价？”面对来自大洋彼岸著名记者的提问，曾经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这样回答：“作为一个战术家，他是拙劣的外行，而作为一个战略家，则或许好一点。”

自蒋介石1927年4月12日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到波澜壮阔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国革命的每一段历史，都令人信服地印证了周恩来对他的这一评价。

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天空，有两颗并不对称的行星，于风云际会间留下高低互见的轨迹。

回首毛泽东和老对手蒋介石沙场鏖战的历史，每每发现，蒋介石虽然在战术上经常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如在辽沈和淮海战役中，把诸多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兵团填进覆灭的陷阱，但在战略上，有时也能达到与毛泽东对话的高度。

1946年6月24日，蒋介石终于撕下“和平”的假面具，公开宣称“四十八小时以后将有惊人之举”。两天后，国民党三十万大军围攻中原军区部队，打响了全面内战第一枪。

这场典型的非对称战争，国共双方的经济、军事实力均不可同日而语。1945年8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为驻日占领军司令官时，指定蒋介石唯一享有在中国受降的权力。国民党从日军手中接收火炮一万二千余门、舰艇船舶约一千四百艘、坦克装甲车五百四十三辆、机枪近三万挺、步枪六十八万余支、手枪六万余支、战马七万匹、子弹一亿八千发。这些武器足以装备八十个步兵师、十个炮兵师、六个骑兵师、七个装甲团。接收军舰的排水量，相当于抗战前国民党海军全部舰只总吨位。杜鲁门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

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内战爆发时，国民党拥有正规军八十六个整编师（军），二百四十八个旅（师），总兵力达四百三十万人，而中共军队仅一百二十七万人，武器装备和保障均相形见绌。

蒋介石挑起内战之初，曾大言不惭地宣称，只需三个月到六个月，就可取得胜利。1946年10月17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秘密军事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宣布：“五个月之内打垮中共军。”

同一天，南京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也对《中央日报》记者夸下海口：“我想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能解决”中共军队。

历史确曾让国民党狂妄了一把。是年底，解放区版图大变：苏中和豫皖解放区沦为敌后；晋冀鲁豫解放区失去四十六座县城；张家口承德失守致关内外联系阻断，中共中央驻地陕北侧后处于国民党军的严重威胁之下。西北彭德怀部，华北刘伯承和聂荣臻部，山东陈毅和华中粟裕部，东北林彪部，均被压缩在狭小区域。

不过，历史见证了中共武装力量的逆势生长。

内战爆发三个月，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的一百九十三个旅，被歼二十五个，八路军、新四军等革命武装，改称人民解放军。

内战爆发六个月，山东和华中野战军宿北反击，歼灭国民党整编第六十九师二万一千人，鲁南战役又歼整编第二十六师、整编第五十一师和快速纵队五万三千人；晋冀鲁豫野战军继巨金鱼战役歼敌二万八千人后，汾孝和豫皖边战役再歼敌二万八千人。

失地存人的解放军非但没有被“打垮”和“解决”，反而由战争初期的一百二十七万人，迅速增长为二百二十三万七千人，并在大兵团协同作战中，获得了对敌机械化部队作战的宝贵经验。

1947年3月13日，国民党军以三十四个旅二十五万余人，重点进攻陕甘宁解放区。五天后，毛泽东踏上转战陕北征程。

彼时中国，权倾东南，势蕴西北，黄河犹如战略大棋盘上的“楚河”“汉界”，国共双方的战略对弈棋布星陈、金鼓连天。

在“六朝金粉地、金陵帝王州”南京，阔居高堂华屋的蒋介石，以“黄河归故”构筑从风陵渡到济南上千公里正面上的“黄河防线”，以此代替“四十万大军”遏阻我军，在南线实施中间防御两翼进攻的哑铃形“黄河战略”，维持陕北和山东的强力攻势。

而在陕北靖边小河村，蜗居窑洞的毛泽东已熟筹破敌之策。

“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实功者，常于西北。”从东南转至西北的中共龙兴之势，印证了西汉司马迁揭示的历史轨迹。移师陕北十载，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赓续了当年在江西瑞金铸造人民共和国雏形的探索，极目大河上下，科学分析中日两国国情国力，石破天惊提出了震动中外的持久战理论，攀上了战略创新高峰。

在战争的大棋盘上，战术家弈子，战略家弈势。

> “南线三军出击津浦线”，系指南线晋冀鲁豫、山东、华中野战军主力，合力出击津浦路徐（州）蚌（埠）段及其两侧地区和蚌（埠）浦（口）段及其东侧地区，乘胜渡淮南下；“北线夺取三路四城”，系指北线晋察冀、晋绥野战军主力协同作战，逐一占领平汉、正太、同蒲三路和保定、石门（石家庄）、太原、大同四城。
>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第283—284、29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 《毛泽东年集》第三卷，第15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1946年6月，中共中央制定南线和北线战略计划，决策“南线三军出击津浦线”，“北线夺取三路四城”。[注]毛泽东驰电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等，决定由晋冀鲁豫、山东、华中三支野战军，形成南线作战的基本力量盘。[注]月21日，毛泽东提出：“过去至今已歼灭了三十八个旅”，“经过半年到一年，消灭他七八十个旅”，“达到了平衡就很容易超过。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就可以再向长江以南。”[注]

执政资源在彼，军事经济实力取弱，即使与国民党不在一个重量级的战争初期，毛泽东战争图景设计仍着眼“长江以南”。

毋庸讳言，实施“南进战略”是一次惊险跳跃。局外人很难揣度的是，国共博弈的焦点是战场摆在谁家地盘，交战双方由谁“管饭”。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把战场摆在解放区，打上个一年半载，国共双方数百万军队和民夫，单是人吃马喂就把解放区吃垮了。毛泽东对此洞若观火。还在井冈山反“围剿”时，他就针对蒋介石“以吃代兵”把戏，提出内线依托根据地大量歼敌，同时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实施反攻。陕北过招，毛泽东照旧依计而行。

194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前夕，中央军委决定，驻陕北部队和地方武装二万六千人，统归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指挥。敌我兵力悬殊以十倍计，毛泽东却誓言不打败胡宗南，决不离开陕北！3月29日，清涧县枣林沟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

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中共中央机关和警卫部队改称“昆仑纵队”，毛泽东化名李德胜，周恩来化名胡必成，纵队司令任弼时取职务谐音化名史林。4月13日，“昆仑纵队”转移至靖边县王家湾（今属安塞县），改称“三支队”。

“山东太行两主力”，系指陈、粟大军和刘、邓大军。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第134—13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7月10日，毛泽东在小河村代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高岗电，掀开了大军南渡构想盖头：“第二年我军任务：山东太行两区力求占领长江以北……在第二年计划顺利完成条件下，第三年，山东太行两主力[注]即可向长江以南发展……”[注]

这一计划，勾勒了南进战略两翼齐飞构想最初的轮廓。

转战陕北途中，一个袖珍版图书馆与马背上的司令部并辔而行。便携式木箱中，毛泽东延请的战略大师各领风骚：孙武的《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鲁登道夫的《全体性战争论》……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的毛泽东，挥师于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基本稳定了陕北战局。

6月8日晚，国民党整编第二十九军中将军长刘戡率四个半旅，根据电台测定方位，兵分两路扑向毛泽东所在的王家湾，进至附近不足十里的寺湾村我军才发现。毛泽东率仅有四个警卫连的“三支队”冒滂沱大雨转移，天色微明来到毛乌素沙漠南缘靖边县小河村。丹霞地貌岩壁夹峙的小村隐于谷底，杨柳扶疏中，两条小溪绕村东流。毛泽东一行刚想歇脚烤衣服，侦察员来报，敌已窜至十几里外的王家湾，于是再度启程西移。10日，又是一个风雨之夜，支队司令任弼时下达三条命令：不准说话；不准打火抽烟；用绳子捆住牲口的嘴不让它叫。毛泽东骑的小青马马掌磨坏，他心疼自己的坐骑，一路下马徒涉。雨夜行军中，向导迷了路，任弼时急命另寻向导。行至墩儿梁，前卫部队与刘戡部两千多人迎头相撞！隐蔽沟底的毛泽东，已听见敌军长官的叱骂声和骡马嘶鸣。“嗒嗒嗒”，突然，敌军向沟底扫射。指挥员判断敌系虚张声势，未下令部队还击，避免了一场兵力悬殊的遭遇战。毛泽东及“三支队”在天赐湾居留七日，又重返小河村。

石仲泉：《石仲泉讲党史》，东方出版社2021年11月第1版。

7月21至23日，周恩来、任弼时，与陆定一、杨尚昆、彭德怀、习仲勋、王震、贺龙及远道而来的陈赓等十四位在陕精英，于“小河会议”上一睹毛泽东擘画的宏图：“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解决。”“蒋介石搞了个黄河战略，一个拳头打山东，一个拳头打陕北，想迫使我们在华北同他决战。可他没想到，自己的两个

拳头这么一伸，他的胸膛就露出来了。所以，我们呢，给他来个针锋相对，也还他一个黄河战略：紧紧拖住他这两个拳头，然后对准他的胸膛插上一刀！”[注]

刘邓陈粟谭即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
叶陶两纵系指叶飞任司令员的华野一纵和陶勇任司令员的华野四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第147—14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蓄势反攻的战略布局开始浮出水面。“小河会议”期间，毛泽东于23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邓陈粟谭[注]和华东局电：刘邓军“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陈赓纵队“并指挥太行纵队、五师、三十八军共七万余人，8月下旬出豫西，建立鄂豫陕边区根据地，吸引胡宗南一部打运动战”；陈士榘、唐亮所部以一部钳制邱清泉、吴绍周，“放手歼击陇海线上及其以北地区分散孤立薄弱之敌”；“叶陶两纵[注]出闽浙赣，创立闽浙赣根据地”。“广东纵队受叶陶指挥随同南下，并请考虑组织东南分局，子恢、鼎丞、曾山前往主持。”[注]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第15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29日，毛泽东又电刘邓陈粟谭等人及华东、邯郸局：“两个月内山东全军仍在内线作战，两个月后准备以叶纵再加他部取道皖西或苏中，相机出闽浙赣，两个月内派干部或小支队先去。”[注]

陈、谢、彭即陈赓、谢富治、彭德怀。
《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21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同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拟制通令，嘉奖刘邓大军鲁西南战役大捷，通报全军是役“歼敌正规军九个半旅及四个师部，毙伤俘敌五万余人”的辉煌战果。当日，毛泽东又代中央军委起草三个A级电报，再电刘邓陈粟谭、华东局、晋冀鲁豫中央局并告陈谢彭[注]：“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注]此电预示着，中共中央已经做出战略决策，不等敌重点进攻被完全粉碎，也不等我军在数量上超过敌人，果断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

姚夫、李维民、伊增埙、孙志渊、孙璞方等编：《解放战争纪事》，第19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

此前，1947年4月27日，中央军委即发出指示，要求在冀鲁豫边及晋东南方向预备船只，准备南渡黄河转入战略进攻。[注]

对于战略进攻，毛泽东有着深邃认知和独特敏感。

1942年10月上旬，斯大林格勒战局悄然生变：6月28日开战后攻势如潮的德军颓势乍显，处于战略退却的苏军一部突破德军包围。这一细微变化没有逃过毛泽东的眼睛。他断定，苏德双方攻防开始转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机已在眼前。他接连给《解放日报》写了三篇社论，第一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阐述斯大林格勒战役“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果然，到1943年2月2日，此役收官时终结了德国南方集群自1941年起保持的攻势局面，成为扭转二战东部战线局势的转折点。然而，二战同盟国从防卫作战转向战略性进攻，是以苏联赢得斯大林格勒战役，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指挥第八集团军歼灭隆美尔统率的德、意联军“非洲军团”近六万人扭转北非战局，美军又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毙伤日军二万五千人，苏、英、美三大战役胜利导致与轴心国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后发起的。而直出大别山，则开创了世界正义战争非优势条件下展开战略进攻的先河。

此时，刘伯承、邓小平挥师取得鲁西南大捷征尘未消，深夜接到陕北急电，两人从附注的“阅后立即销毁”，看出陕北乃至战略全局的风云紧急。于是，一个扭转时局的决定诞生了：部队停止刚刚开始的休整，义无反顾挺进大别山！

人民解放军军史，为这一气势磅礴的进军留下如是记录：

> 司徒雷登认为，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足以入史，故称“六卅事件”。

6月30日夜，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第一、二、三、六纵共十三个旅十二万余人，从山东阳谷以东之张秋镇至菏泽以北之临濮集间一百五十余公里间，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转入外线作战，揭开了全国战略进攻序幕。面对这一震惊中外的历史性转折，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惊呼：中国发生了“六卅事件”[注]！这一惊人事件，不亚于当年法国马其诺防线被突破。

> 濮县，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置县，属濮阳地区，1952年与范县、观城、朝城三县一起划归山东省聊城地区，1956年3月濮县撤销。

那是一场极为壮阔的苦难行军。8月17日，刘邓大军过黄泛区。第六纵队十七旅旅长李德生回忆，“蒋介石为了阻止我军南下，数月以前虽然把黄河当做‘四十万大军’改回故道去了”，可黄泛区内依然“淤泥无际，浅处至膝，深则及脐”。一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军旅，靠牛拉人推炮车或将重装备化整为零肩扛徒涉，当天硬是

蹚过了近二十公里宽的黄泛区，又一鼓作气渡过沙（颍)河，把死亡和覆灭远远抛在自己身后。虽说不得不忍痛丢弃了若干重装备，但出其不意的战略转兵，毕竟吹响了转守为攻的号角。蒋介石这才察觉刘邓军系有意识南进，急忙调兵到汝河南岸布防，企图实施南北夹击。当天，国民党军掘开兰封（今兰考一部）境内贯台前鹅湾、辛庄两处黄河大堤，口门宽达百余丈，长垣、滑县、濮县[注]堤防尽皆冲毁，黄水灌入解放区。

中原进军艰难竭蹶，陕北转战亦履险蹈危。8月16日，毛泽东率已改称“九支队”的中共中央机关，冒雨从米脂县陈家岔到葭县乌龙铺（今乌镇村），夜半至曹庄风雨大作，无法前行。前有黄河，后有追兵，毛泽东和“九支队”步入了转战陕北五个月来最凶险的境地。在村头曹发家窑洞磋商行动路线，毛泽东主张迎敌西进；而沉默的“骆驼”任弼时却力主向东过河暂避，两人爆发激烈争论。毛泽东说：“要过你们过，给我留一个排就行了！”

一生喜到中流击水的毛泽东，其战略思维亦与水有缘。长征路上，毛泽东重返红军指挥岗位，即背倚河川演绎奇谋，书写四渡赤水这一终生引为骄傲的得意之笔。此刻在陕北，毛泽东却一改故辙，视黄河为不可触碰的战略底线，几度背水迎敌决不东渡，甚至不惜冒兵家之大忌侧水转兵。3月25日，青化砭战役后，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均劝毛泽东东渡黄河。他摆摆手说，我是不走的，我一走，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到其他战场，增加那里的压力。我要牵着胡宗南在陕北转，把他拖死！枣林沟会议，毛泽东复陈誓不离陕决心。有人主张增兵陕北以策安全，毛泽东说：“再调部队，群众就更负担不起了！”小河群英会，陈赓再劝毛泽东东渡，说旅长们都要求来陕北护卫，毛泽东仍不为所动。

这片割舍不下的高天厚土，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中共移师西北建党建政新的试验田。以身赴鼎镬吸敌重兵于陕北，减轻各解放区压力并鼓舞军民，何尝不是澎湃统帅胸中的一腔豪情！

党中央转战陕北与刘邓挺进大别山，虽远隔千里又声息相通。时任豫皖苏区党委书记段君毅回忆，刘邓首长十分关心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一天，司令部找我们几个同志谈问题。吃饭时邓政委高兴地对大家说：我们今天破例吃一杯酒，因为今天收到党中央的电报了。毛主席和党中央机关安然无恙，我们表示庆贺！

> “泡蘑菇”指“蘑菇战术”，毛泽东提出的一种战术思想，即在陕北战场通过灵活机动的战术与胡宗南部进行周旋，消耗敌人有生力量。

枣林沟的春天空蒙而迷离。为便于与胡宗南“泡蘑菇”[注]，毛泽东将除《辞海》《辞源》外的图书，连同中央文件资料转往绥德籍警卫战士马汉荣家“坚壁清野”，后又送往河东山西临县三交镇。

陈毅说：“毛主席和蒋介石在陕北这个棋盘上下棋，黄河为界，举手无悔。”黄河，已成关系中国革命成败的命运之河！

风雨曹庄，周恩来提出，先向北走，再出敌不意西进……贺龙接中央军委“诱敌解围”电令，即与习仲勋的西北局机关冒雨沿螅蜊峪（今螅镇）东行，由彭德怀派兵掩护，在葭县城东渡过黄河。胡宗南以为中共首脑机关渡河东去，遂命刘戡封锁黄河。与此同时，彭德怀又派许光达第三纵队在乌龙铺一带抗击刘戡援军，接应“九支队”向葭县以北转移。

刘亚莲：《毛主席在佳县》，第26页，新华出版社2022年2月第2版。

毛泽东葭县履险，调动刘戡部数万人追至黄河，将整编第三十六师中将师长钟松指挥的整编第一二三旅引向乌龙铺，为在沙家店聚歼该师主力创造了战机。8月17日，“九支队”抵达位于山腰的白龙庙。骤雨初歇，毛泽东坐在村前大青石上远眺黄河，轻松哼起京剧《空城计》唱段：“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陕北始化险为夷，中原正破釜沉舟。8月23日，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机关及六纵进抵汝河北岸。阻师在彼，追兵在兹，刘伯承发令：“狭路相逢勇者胜！”邓小平鼓动：“要有叫花子烧铺草的精神！”两句惊天动地的口号，成为凝神聚气的旗帜和灵魂。部队不顾敌机轰炸扫射架设浮桥，于24日拂晓突破敌河防阵地。

26日，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中路七个旅六万大军，疾进至淮河北岸河南息县小王湾村。此时，国民党军十九个旅正尾追而来，先头部队已向三十余里外刘邓大军后卫部队发起攻击，而负责掩护和策应中路大军的右路军第三纵队和左路军第一纵队，已从三河尖、正阳等地先期渡河。淮河横亘，追兵紧逼，怎样才能绝渡逢舟，逢凶化吉？刘伯承多次询问当地群众，均说汛期不能徒涉过河。部队只好多路找船，仅征集到十几条小船和木排，运力远远不够。

最危险时刻，刘伯承深夜携长竿登木排勘察水情，发现河中可架浮桥。蓦然，希望奇迹般降临了——刘伯承看到，上游一战士牵马徒涉到达南岸！他当即下令：争分夺秒过河！天刚蒙蒙亮，部队循昨夜预设标志多路徒涉，8月27、28日两天顺利渡过淮河。或许是天佑劲旅，中路大军甫一过河，上游陡涨的洪水便呼啸而至。刘伯承回忆，国民党整编第八十五师师长吴绍周率军赶到河边，看着安然渡河南进的刘邓大军，自己的队伍却被洪峰阻于淮河北岸，不禁望河兴叹：“共产党有命，刚刚过去水就涨了！”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第17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213—21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第22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毛泽东预计，刘邓向南跃进时，蒋介石必以重兵追堵，如尾敌南下，从“反对方向钳制敌人”，可有效掩护刘邓挺进大别山并立足生根。在令陈谢集团进入豫西，从右侧辅弼刘邓大军同时，8月4日，毛泽东致电陈粟谭并告华东局：“刘邓南下作战能否胜利，一半取决于陈唐叶陶五个纵队是否能起大作用”；6日又令陈粟即赴鲁西南，统一指挥华野六个纵队，组成华野西线兵团，直接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7日，毛泽东致电刘邓并告陈粟：“只要陈粟六个纵队集中处于内线，一切有办法；如果分散南进，则全局不利。”[注]显然，毛泽东四天三电，要求叶陶两纵缓出闽浙赣，已变两翼齐飞南进，为多路策应刘邓直出大别山。[注]但统帅部仍在考虑渡江南进的可能性。当月31日，毛泽东致电刘邓：“至必要时机，请考虑南渡长江是否可能，是否有利。”[注]

8月27日，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逆势打开战略进攻新格局。

邓小平说：“我们就好像一根扁担，一头挑着山东，一头挑着陕北，我们打出去，挑的担子愈重，对全局就愈有利。”

9月5日，陈毅粟裕抵山东郓城，于菏泽沙土集集中四倍于敌兵力，一举歼灭整编第五十七师，迫使蒋介石从大别山和山东内线抽调四个师驰援鲁西南，有力策应了刘邓在大别山展开。

胡石言、吴克斌、罗英才、胡松植、何晓鲁、铁竹伟等著：《陈毅传》，第400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17日，陈毅、粟裕发电中共中央请示：“中央最近期内”，是否“准备以一、四、六纵队向长江以南出动”？[注]

胡石言、吴克斌、罗英才、胡松植、何晓鲁、铁竹伟等著：《陈毅传》，第400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21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22日，中共中央研究、周恩来起草给陈粟复电：“半年内，不拟派一、四纵去江南。”[注]24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电告刘邓陈粟：“原定叶、陶去闽浙赣之任务，停止执行。”[注]

跃进江南按下暂停键，盖出于策应刘邓经略大别山之考虑。

刘亚莲：《毛主席在佳县》，第98页，新华出版社2022年2月第2版。

8月19日黄昏，毛泽东来到葭县梁家岔，在前东元村李玉珍家，与周恩来、彭德怀、习仲勋等一起部署沙家店战役。转战陕北以来，彭德怀时常胃痛，又无良药，痛得厉害便吃几颗炒黄豆止痛。可在当时的条件下，炒黄豆也是颇为稀罕的食品。彭德怀见到毛泽东，顺手抓了一把炒黄豆给他，毛泽东忙摊开双手接过。二人谈话间，有几粒豆子掉在地上，周恩来、习仲勋怕浪费，便俯身捡起来吃掉了。[注]这一幕，颇令毛泽东动容。自离开小河村，与刘戡的追兵周旋十九天、行程六百里，一路吃饭都是难以消化的黑豆当家。我们支队领导也同大家同甘共苦啊！

陕北眼皮子底下能藏兵的地貌，显然利于毛泽东牵着胡宗南鼻子“耍龙灯”。

整编第三十六师两个旅进入“口袋”，五个月来一直唤作“李德胜”的统帅下令轻装，备足干粮，做好出长城、进沙漠、向西突围准备。他在梁家岔窑洞中拿起电话喊道：“我是毛泽东！”春雷般的声音标志着战局转折点已到来！18日至20日，西北野战军同仇敌忾歼敌六千多人，“抓了一沟俘虏”，一举扭转西北战局。

《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22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23日，毛泽东策马再赴前东元村参加沙家店战役总结会，向旅以上干部祝贺胜利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用我们湖南话来说，打了这一仗，就过坳了。[注]

山坳指分水岭山脉高处要隘。“过坳”系指西北战局已跨过最艰难的那道坎。9月28日，在葭县神泉堡，周恩来给中央直属单位干部作时局问题报告说，黄河是蒋介石的“外壕”，陇海线是他的“铁丝网”，长江是他的“内壕”。蒋介石总想赶我们过“外壕”，可我们已经过了“铁丝网”，打到他的“内壕”了……

政治出牌、军事筑底、经济埋单，国共全方位战略博弈，毛泽东棋高一着，抢抓头筹，指挥人民解放军立足内线歼敌一百二十二万，由内线成功转向外线作战，打乱了蒋介石的阵脚。

陈晋著：《毛泽东的诗性人生》，第163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23年9月第1版。

翌日便是中秋佳节。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与战士在窑洞前席地而坐，共赏明月。就着辣椒浅酌的毛泽东吟出一首五律诗：“秋风度河上，大野入苍穹。佳令随人至，明月傍云生……”[注]

周恩来赏月后展笺挥毫，修书给在太行山的妻子邓颖超：超：

今天是八月中秋节，日近黄昏，月已东升，坐在一排石窑洞中的我，正好修写家书寄远人……对月怀人，不知滹沱河畔有无月色可览，有无人在感想？……大反攻已开始……六个月中，我们也走了不少地方，但既未到黄河边，又未见长城，心既不死，又非好汉……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二），第77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3月第2版；刘亚莲：《毛主席在佳县》，第211—213页，新华出版社2022年2月第2版。

落款是与信首昵称对应的乳名“鸾”。信由延安电影团的陈默带到河北西柏坡，秘书陈楚平将信送给邓颖超时，打趣说：“情书来了！”邓颖超阅信后笑道：“这哪是情书？分明是作形势报告！”陈楚平指着信末不无缱绻的“夜深月明，就此打住。留着余兴送我入梦”几句话，追问：“这还不算情书？”[注]

刘亚莲:《毛主席在佳县》，第242页，新华出版社2022年2月第2版。

登顶在望使毛泽东的征战之旅泛起新的亮色。警卫战士申虎成奉命东渡黄河后，袖珍版图书馆又重归“九支队”。有一天，李银桥进窑沏茶，发现毛泽东正在读《红楼梦》……[注]

战争形势的有利变化，使毛泽东萦怀于心的“向长江以南发展”愿景重新活跃起来。10月3日、4日，毛泽东在葭县神泉堡致电陈粟并刘邓，两度提及华野“渡淮南进”，兵锋直指长江北岸。

“神泉号令”，系指中共中央在葭县神泉堡发表的一系列重要文件，包括《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训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等。

10月10日，中共中央“神泉号令”[注]公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即《双十宣言》），开篇即申明“南线我军已向长江流域进击”，首次提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全称，向中外宣布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宏伟纲领，发出了进军江南的预备号令。

华野东兵团指华野东线兵团，亦即内线兵团，下辖二、七、九纵队和正在组建的十三纵队等部。华野西兵团指华野西线兵团，亦称外线兵团，下辖一、三、四、六、八、十纵队和特种兵纵队，并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十一纵队。《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第307—30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15日，毛泽东拟制关于华野东西兵团[注]指挥和建制问题电，设想两翼齐飞跃进江南：“六个月后（约在明年4月），你们须准备以一个或两个纵队出皖浙赣（不是闽浙赣）边区。那时拟由刘邓方面派一个或两个纵队出湘鄂赣边区。”[注]

11月20日，陈毅、粟裕直面问题电禀中央军委：部队南下后，脱离后方，连续作战，患南方疾病多，伤病员安置无安全保障。“有的部队风闻要南渡长江，也有不安心现地工作的。”

> 胡石言、吴克斌、罗英才、胡松植、何晓鲁、铁竹伟等著：《陈毅传》，第40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毛泽东28日复电：“在明年8月以前，不准备派主力部队渡江”，“8月以后，派一部分部队渡江南进，究派何部，临时决定”。[注]

渡江南进呼之欲出、屡启屡放，皆因全力策应刘邓。统帅在期待着新的战略转机。

1947年10月26日至27日，刘邓在蕲春高山铺设“口袋阵”，一举全歼尾追之敌整编第四十师和整编第五十二师第八十旅一万七千人，随之悬师而来直捣长江望江一线，创造性运用毛泽东“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原则开辟根据地，控制北岸三百余里，直接威胁南京和武汉。蒋介石敕令桂永清率舰到九江护航，11月下旬又命白崇禧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所，统揽豫、皖、赣、湘、鄂五省军政大权，实施军事围攻与政治利诱相结合、军事围攻与“清剿”相结合的“总力战”，企图以三十三个旅的重兵剿灭刘邓大军。12月中下旬，粟裕率华野西线兵团协同陈谢集团，在平汉、陇海进行大规模铁路破击战，歼灭国民党整编第三师。南京被迫从大别山抽调十三个旅回援平汉路。

毛泽东在神泉堡运筹帷幄五十七天。秋风大凉，粮食日紧。窑主长子高景德建议，米脂杨家沟亲戚马新民家窑洞群，宜于过冬。经汪东兴考察，11月14日，毛泽东踏上转战陕北最后一站。

> 榆林地区《毛主席转战陕北》编写组：《毛主席转战陕北》，第41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第1版。
> 《陈毅军事文选》，第46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

转瞬来到1948年。3月头三天，西北野战军在宜川一举歼灭整编第二十九军两个师、五个旅三万多人，击毙刘戡和第九十师师长严明。3月7日，毛泽东为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评论，盛赞西北战场“第一个大胜仗”，并和周恩来跳起秧歌舞，任弼时拉胡琴伴奏。[注]毛泽东豪迈地说，人民解放军最大的胜利是去年转入进攻。去年7、8、9三个月，刘邓大军走前头，转入大别山，其次陈谢转入豫西，

陈粟转入豫皖苏，这是带决定意义的步骤，改变了整个战争形势，扭转了战局。这是战略的胜利。[注]

推动历史转圜的伟大战略，必定会打开新的历史之门。

刘邓率军转战大别山半年余，歼敌十九万多人，解放上百座县城。当年曾任南京国防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汝瑰说：“我研究了一辈子军事，在世界军事历史上，最让我佩服的是‘千里跃进大别山’，它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无后方供给线的深入敌后作战。”他还说，假如没有刘邓挺进大别山，解放战争不可能打四年就结束。

战略之伟力不仅在于统帅先胜后求战的擘画，而且在于各路将领的共识与力行。着眼吃饭，弱势出击，雄师跃进，八方策应，毛泽东反弹琵琶的“窑洞战略学”，成为兵家时时回味的经典。

> 豫陕鄂前后委即豫陕鄂前方后方工作委员会的简称，办公旧址在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老城大街中段、县委大院西侧的福音堂，2013年3月5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九个月来，全国战局有了新的发展，各个区都无例外地转入反攻。”1948年4月25日，豫陕鄂前后委[注]联席会上，邓小平谈起实现毛泽东最好的估计，笑逐颜开。毛泽东对挺进大别山曾有三种估计：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付了代价站不住脚，在周围打游击；付了代价站稳了脚。而今，“我们由黄河到长江跃进了一千里”。“中国从北到南没有多少个一千里，从长江再跃进一千里就到了广东、福建的边界，剩下不到一千里了，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就要垮台了。这个跃进的事实表明战略形势起了巨大变化”，正如毛主席所说，“已经扭转了战争的车轮。我们击破了蒋介石的反革命计划，使之由进攻转为防御，由外线转到内线，而我们则由防御转为进攻，由内线转到外线，改变了战略形势”。

> 《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96—9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

邓小平紧扣将士关切发问：或许有人要问，我们的反攻是不是早了一点呢？迟一点好不好呢？事实证明，反攻是恰当其时的，迟了就要犯错误。蒋介石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是要把战争扭在解放区打。第五次反“围剿”时，要是按照毛主席的方针，由内线转到外线，将敌人拖出苏区之外去打就好了，那样苏区还是能够保持，红军也不致被迫长征，可惜“左”倾机会主义者不这样做，中了蒋介石的计。这次蒋介石又想用这个办法对付我们。但是还有更高明的毛主席。他告诉我们，开始必须在内线打，打到一定时候，也就是削弱敌人到相当程度之后，就要打到外线。[注]

四个回合的胜利，指刘邓大军直出大别山战胜敌人追击完成战略展开；战胜敌人合击突出重围并消灭追击之敌；内线坚持展开桐柏、江汉两军区和淮西地区斗争；配合友邻部队发起平汉战役消灭国民党第三师并给第二十师以歼灭性打击。

刘邓大军直出大别山，官兵颇为“人装损失多、消灭敌人少”而纠结。1948年4月17日，刘伯承给第三、六纵队和直属队干部讲话，从大别山斗争与全局关系上“解扣子”。他说，蒋介石的反革命战略就是要扭在我们解放区里打，消耗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趋于枯竭，走向失败。这一基本战略是世界战争也是蒋介石反革命战争的经验……胜利不要单看自己，要看到友邻的胜利，看到整军过后东北几个伟大胜利一直到收复四平街，西北战场上特别是打死刘戡的大胜利，也要看到陈唐、陈谢在洛阳的胜利，山东在胶济路西段的大胜利。不要以为自己一个连伤亡和掉队了几个人，好像全国革命就完了。哪个部队打仗没有钳制方面和突击方面？吃肉就好，啃骨头就吵起来，这样看问题是很不全面的。四个回合的胜利[注]很大。毛主席说到打胜仗的部队，也提到南线兵团，我们也是其中一个。南线兵团钳制了敌人九十个旅。

胡石言、吴克斌、罗英才、胡松植、何晓鲁、铁竹伟等著：《陈毅传》，第425—42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8月17日起，已赴任中原的陈毅，推光头、穿圆领衫，在宝丰皂角树村外树林给第二、六纵队团以上干部作了三天报告。陈毅说，毛主席讲，蒋介石这个人不是完全不懂战略，多少懂得一点。他的战略方针是无论如何把战争摆到解放区。假使我们不出击，当然不会有跃进大别山的损失。可敌人仍在你解放区打，解放区一定要垮。西北首先垮，逼迫西北野战军退过黄河。不是敌人厉害，而是没有饭吃。山东也一定不能坚持。关内解放区一垮，就只剩东北了。如果照去年8、9月西北和山东的情形，战争能否支持，任何人没有把握。所以去年无论如何要转入战略进攻。我们一进攻，军事上转变了战局，政治上稳定了人心，经济上安定了地方。敌人退了，老百姓都回来生产，战争形势就大变了。[注]

胡石言、吴克斌、罗英才、胡松植、何晓鲁、铁竹伟等著：《陈毅传》，第425—42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陈毅轻挥芭蕉扇说，当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经济问题。毛主席给刘邓的指示说，把战争引向蒋管区，这是战略上的胜利。如果不考虑战争消耗，不考虑几百万人的吃饭穿衣，就不是战略家。这是古今中外没人讲过的，毛主席讲了这句话。[注]

三个川音一个调，透辟解读与精彩践行正相关。当顾大局、懂韬略、知进退的南线诸将，用最生动的语言使南进战略掌握部队、灌注官兵时，怎能不在战争舞台上演出威武雄壮的活剧！

“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毛泽东和他马背上的司令部，在陕北塬梁峁沟十二个县三十七个村庄战斗生活了一年零五天，引领解放战争实现了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历史性转变。回首这段非凡战斗历程，周恩来说过一句画龙点睛的话：“毛主席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葭县父老引为骄傲的是，他们的家乡不仅是毛主席转战百日频发战斗号令处，还是颂歌《东方红》的诞生地。1942年冬的一个清晨，翻身农民李有源登上山峁，眺望东方一轮喷薄而出的红日，以陕北民歌《骑白马》曲调唱出了不朽经典《东方红》。1947年10月17日，李有源有幸在葭县县城，目睹了来此调研的人民大救星的风采。“人民歌手”和他的乡亲们，成了敬爱的领袖在葭县的守护神。

（二）盐阜投棋，凝视江阴要塞的眼睛

就在毛泽东的目光超越长江投向闽浙赣腹地时，在长江北岸盐城，中共盐阜地委（华中五地委）负责人，也在为我军未来渡江南下突破隔江相望的江阴要塞而谋篇布局。

江阴位于京沪间长江南岸，江面宽仅一千二百米，为长江下游最窄处。君山、黄山、萧山、长山临江耸立，犹如京沪天然屏障；又因江阴要塞扼控由海入江咽喉，素称“江防门户”“锁航要塞”。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我军曾有过向南夺取京沪线的设想。9月20日，中共中央同意华中局关于浙东、苏南、皖南新四军部队渡江北撤的提议。从江北靖江眺望南岸隐于大山褶皱里的江阴要塞，中共盐阜地委书记曹荻秋顿生遐思：中国革命迟早要过江。假如在国民党重兵据守的江阴要塞打入一部精干力量作内应，未来我军挺进江南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曹荻秋生于四川资阳，1929年入党，曾任中共资阳县特委、工委书记，参与领导广汉起义，任过中共皖北特委书记等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1946年春，内战的乌云开始在天边聚集。身处苏北一隅却心系全局的中共盐阜地委，悄悄在干部中摸底，探寻在江阴要塞守军中有无可利用的亲友关系。这一行动属于主动出击，并无上级领导指示。因某些干部思想上有顾虑，调查无果而终。

是年春夏之交时节，国共签订了通邮协定。盐阜地委组织部部长唐君照哥哥唐君鄂收到一封南京来信。信是在国防部三厅特种兵股任中校股长的四弟唐秉琳和同在该厅任上尉参谋的五弟唐秉煜写的。唐君鄂不敢迟疑，急忙将信交给二弟唐君照。

唐家兄弟五人，唐君照行二，再下面三个弟弟分别是唐小什、唐秉琳、唐秉煜。这封来自金陵的家书看似略述生活琐事，唐君照读来却字字惊心：“在外边搞小本经营蚀了本，现在生意很困难，希望回家。”唐君照从两位胞弟信中暗语悟出，久困敌营早生退意的老四和老五，已决意弃暗投明。

跻身南京国防部的唐氏二兄弟，原本都有革命底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唐秉琳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第十期。1938年秋，中共长江局派唐君照打入国民党战地干训三团任特支书记。是年，唐君照把五弟唐秉煜送确山彭雪枫办的军事训练班，毕业后在国民党军做地下工作。当年10月武汉撤退，唐秉煜与党组织失联，以国民党失散军官身份考取中央军校，毕业后到桂林六分校任分队长。国共摩擦日甚一日，唐秉煜处境险恶，想回来跟哥哥搞正面斗争，唐君照却说服他锚在国民党军待机以动。

1941年春，唐君照应周恩来指示赴湖北咸丰看望唐秉琳，给他讲皖南事变真相和斗争形势，给四弟闷在铁罐子里的心敞开一扇窗。唐君照回苏北后任盐阜地委组织部部长、社会部部长，唐秉琳在国民党军令部一厅任特种兵股股长。1946年5月国民党从重庆还都南京，军令部改为国防部，唐秉琳在三厅主管特种兵兼要塞业务，将当工兵连长的弟弟唐秉煜调三厅任参谋。唐君照想到地委正考虑在江阴要塞投棋布子，便把弟弟的来信报给曹荻秋。

曹荻秋从这封来自国民党大本营的密信，看到了唐氏二兄弟潜伏的价值及与江阴要塞的某种联系，指示唐君照发信让他们等待，随后派人同他们联系，并特意叮嘱唐君照说：“此事由你掌握。”

唐君照按照组织意图找到大哥唐君鄂，由他口述，大哥执笔，用暗语给唐秉琳写了回信：“家里生意也蚀本，你们在外面还好混些。二姑奶奶准备去南京探亲，顺便去看你们。”

唐君照的回信给老四、老五吃了定心丸，也给国防部一厅上校参谋吴广文带来久违的阳光。这位唐氏兄弟的姨表兄早年参加过共产党，与党失联后在国防部一厅管人事，对国民党的腐败深恶痛绝，不屑于蝇营狗苟，早已与国民党离心离德。得知唐秉琳与二哥取得联系，他表示：“如有回音，我们一起走！”

1947年3月，盐阜、淮海两区合并组建苏北区，曹荻秋任苏北区党委书记。入夏，一缕新的希望之光在盐阜共产党人眼前闪过——唐秉琳出任江阴要塞上校参谋长！建阳县委书记树海闻讯后，打算安排唐秉琳堂侄、中共上冈区副区长唐坚华做联络员，以逃亡地主身份将全家迁往江南，通过单线联系做唐秉琳的工作。

唐坚华回家与妻子仇英商量此事。仇英颇为担心：你在上冈区工作多年，谁不认识你这个副区长？上冈有不少逃亡分子在江南，一旦被他们认出，一家人就会掉脑袋。唐坚华对妻子说，派往江南是组织信任，必须坚决服从。党员为党工作，不能怕牺牲！

对于派唐坚华南渡开辟江阴要塞，树海也觉兹事体大，便向曹荻秋等汇报，建议此项工作由区党委统抓直管。经过审慎考虑，区党委决定先试试水，安排唐坚华与唐秉琳接触一次。

唐碧澄曾任盐阜区参议会副参议长。

经唐坚华父亲唐碧澄[注]联络，唐坚华与唐秉琳在上海见面。叔侄俩忆及刘少奇、陈毅、黄克诚、曹荻秋与唐坚华家的交往，谈起唐秉琳任中共射阳县委书记的三哥唐小什，倍感亲切。唐坚华向唐秉琳传达组织意图：“老二意见，老四等人要抓实力，相机慢慢发展，力所能及搞些情报，以待时机。”唐秉琳返宁给唐秉煜和吴广文也传达了组织指示，三人郁结已久的心情顿觉开朗。

唐坚华上海之行顺利通过了入门考试，成为区党委联络唐秉琳的政治交通员。曹荻秋听取汇报后决定，派其不定期潜去江阴，向唐秉琳传达区党委指示，并带回重要情报。很快，唐秉琳就接到组织最新指示：继续留在江阴要塞，重点抓军事实力扩充。

唐秉琳依令深潜之际，忽然瞥见头顶一棵“大树”：要塞中将司令官孔庆桂是他任第二十七军炮四团连长时的团长！那时部队贪腐成风，马料也未能幸免，致使军马骨瘦如柴。唐秉琳连队的马因吃得饱，体健有力，在团里赛马拔得头筹，受到孔庆桂嘉奖，从此对他青睐有加。赛马夺冠成了他与老团长重续前缘的抓手。

孔庆桂为人奸诈老辣、工于心计，常把下属搞成对立的两派，自己居间操纵以利把控。唐秉琳利用这棵“大树”作掩护，趁要塞扩编守备总队之机，做工作当上了总队长。该总队辖三个大队、九个中队和一个重兵器中队，兵力相当于一个步兵团。唐秉琳当总队长不久，通过活动“又下一城”，出任炮台总台长，下辖两个大台、六个中台、十八个分台，并配属三营制游动炮团，兵力相当于一个重炮团。唐秉煜也从南京调任要塞工兵营营长。唐氏二兄弟“会师”江阴，使苏北区党委经营江阴要塞有了可靠支点。

1947年秋，苏北区党委决定在江阴设固定联络点，决定派唐君照堂兄、参加过大革命的唐仲衡驻点。唐仲衡先去上海，通过关系携家人转去江阴，为苏北区党委与要塞内线联络构筑渠道。

11月10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共华中工作委员会、华中军事指挥部、华中行政办事处在射阳县合德镇耦耕堂成立，陈丕显任华中工委书记，管文蔚任工委常委、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司令员兼苏中军区司令员，曹荻秋任工委常委、华中行政办事处主任、苏北军区政治委员。华中工委一成立，陈丕显、管文蔚、曹荻秋即听取唐君照关于江阴要塞敌军工作情况汇报，研究了扎根深潜壮大力量的措施，明确此项工作由管文蔚主抓。

管文蔚曾任新四军挺进纵队司令，1939年10月，挺进纵队与叶飞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编为新的挺进纵队，从江阴移至苏北开辟抗日根据地。江阴要塞的战略价值，从此烙于他的心中。

当时，党的工作重心在长江以北。但陈丕显、管文蔚、曹荻秋深知，江阴要塞为敌所据是难以逾越的险隘，为我所用则为打开胜利之门的门闩。唐秉琳、唐秉煜为卧槽之马，关键时必有大用。管文蔚叮嘱唐君照：“工作要特别谨慎，目前只能做上层工作，一般不要扩散，要绝对保密。要抓实力，想尽一切办法与要塞司令孔庆桂搞好关系，利用这块招牌作我们的掩护。”

不久，华中工委公安处处长宋学武向管文蔚报告，苏北区党委曾研究同意江阴要塞唐秉琳、唐秉煜及在国防部的亲戚吴广文入党，但未及办理手续，能否批准他们入党？管文蔚详询三人思想情况和现实表现，代表华中工委批准唐氏二兄弟为中共地下特别党员，由唐坚华做介绍人，同时批准吴广文入党，但缓办手续。管文蔚给宋学武交代，让唐坚华给唐秉琳带五两黄金治疗关节炎，将一根金条断为四块，分藏于为唐坚华妻子仇英特制的棉鞋里。

1947年下半年，唐秉琳通过第二十六旅旅长，将在徐州当排长的妻兄李容有调到江阴要塞，安排其任辖警卫和通信分队的勤务队队长。李容有也调来五名军校同学任分队长，积极争取负责通信分队的王乃宜，利用唐秉琳的宗族关系掌握了负责警卫分队的唐道人，还与勤务队副队长曹振海等歃血为盟，结为金兰之交。

青年军官吴钟琪的父亲原是国民党师管区司令，与孔庆桂是保定军校同学，因参加民主党派获罪入狱并身患重病。吴钟琪忧心如焚，托唐秉琳搭救。看唐秉琳的面子，孔庆桂设法让吴父保外就医，旋又保释出狱。吴钟琪对唐秉琳感激涕零，成了他忠贞不贰的帮手。守备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傅仲山是唐秉琳同学，抗战以来思乡心切，经常哼唱思乡流行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唐秉琳帮他排遣思乡之愁，使其成为自己争取过来的第一个营级主官。

国民党有收容编余失业军官的军官总队。要塞地下党从军官总队要来了孟怀高，推荐提升他为炮兵总台大台台长；还从军官总队要来龙潜等人，分别推荐提升为工兵营副营长、中台台长。

开辟江阴要塞顺风顺水，潜伏者正欲乘势扩展战果。可天有不测风云，一场意外变故，使江阴要塞起义前期工作横遭波折。

（三）跃进江南的诗与远方

一辆通体漆黑蒙着皮篷的美式吉普车，从濮阳华野司令部驶出，像一道黑闪电掠过豫鲁平原，直奔山东成武九女集。“黑闪电”驶入战地马背大学——华野随营学校，随着迎接队列里一声悠长的“立正”口令，华野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从车上走了下来。

在此之前六个月，也就是1947年5月前，“黑闪电”还在整编第七十四师中将师长张灵甫帐下效命。1946年9月，张灵甫率军占领淮阴、淮安后，随即开了庆功会。会上，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兼淮海指挥部指挥官李延年，手拿蒋介石发来的嘉奖令吹嘘说：“国军像七十四师这样的部队不要多，只须十个，就安邦定国了！”全部美械装备的整编第七十四师，成为国民党军进占华中和重点进攻山东的领头羊，一骑绝尘的“黑闪电”一时风头无两。

粟裕：《粟裕回忆录》，第389页，人民出版社2022年7月第1版。

1947年5月，华东野战军“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于孟良崮一举歼灭蒋介石视为命根的“御林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蒋介石将辖整编第七十四师的第一兵团司令官汤恩伯撤职查办；将驰援不力的整编第八十三师中将师长李天霞判处死刑，幸因其在当局厚植人脉得以免死；第一兵团第四纵队中将司令官黄百韬也因此遭撤职处分，后由顾祝同力保侥幸逃过一劫。蒋介石哀叹，孟良崮之战“是内战以来，最痛苦、最遗憾的一场战役”。

华野在孟良崮创造历史后，“黑闪电”成为陈毅的座驾。在华野将士眼中，此乃本军战斗力强大的最好证明。

1947年11月9日，陈毅在华野随营学校作完报告，10日便直奔莘县朝城华野后方机关。战略进攻以来，华野鸟枪换炮，兵强马壮，后勤保障机构急剧膨胀，潴集各类人员七万之巨，数量堪比两个纵队。陈毅在朝城对华野后方机关严重超编问题进行专项调研后，主持召开了后方干部会议并作整顿后方报告，为后来在陕北当面向毛泽东汇报并为中央军委派员指导整编打下基础，11日便经山东阳谷、聊城、德州，直奔渤海区委驻地惠民县。

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后，黄河以南的解放区相继沦陷，黄河北岸渤海根据地成为华东红旗不倒的大后方。陈毅与北移至惠民的华东局和华东军区领导会商工作后，11月18日，“黑闪电”自鲁北西行，直驱晋冀鲁豫中央局驻地河北武安冶陶。为节省

时间，车后挂着可供睡觉的封闭拖斗，再后面还跟随着一辆载有卫士的大卡车，这个“2+1”车队，成为燕赵原野上一道移动的风景。

即将过去的1947年，华野斩获颇丰，歼敌数量居四个野战军之首。陈毅24日抵冶陶，与滕代远、薄一波协调了部队供给等问题。这时，刘少奇、朱德来电，要陈毅去西柏坡谈谈华野情况。

12月初，陈毅抵西柏坡向刘少奇、朱德汇报，得知党中央来电要他去陕北参加“十二月会议”，遂换乘中工委汽车，经五台，到代县，过雁门关出长城，越管涔山再入长城，从神池、兴县抵晋陕大峡谷黄河中段。天降大雪，道阻且长，陈毅不时弃车策马交替前行。及至不便骑马的雄关险隘，便徒涉爬山。

“持枪跃马经殊死，秉笔勤书记战程。”战略进攻风起云涌，柳暗花明的战局，雄伟壮丽的山河，令上马杀敌、下马写诗的将军诗兴大发。《平山呈朱德同志》《吟反攻形势》《大雪过雁门关》《神池岢岚道中》……鞍马劳顿，佳作迭出。陈毅再渡黄河经葭县、米脂到达中共中央驻地杨家沟，已是1948年1月7日了。

> 杨家沟位于陕西省米脂县城东南二十公里处，清同治年间始建马氏庄园。1938年，曾留学日本的窑主马醒民历时九年建成十一孔带有西洋风味的石结构拱券门楼窑洞。1947年11月起，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在此居留四个月。

1947年11月22日，为解决粮食和过冬问题，已改称“亚洲部”的中共中央机关，从神泉堡移驻杨家沟。[注]此前中央虽已通知各方，明年8月以前不拟派主力渡江，但精兵南渡营造直抵国民党“卧榻之旁”的战略态势，始终是毛泽东久蓄心中的构想。

>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第33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12月4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明年8月以后，“依当时长江以北任务完成之程度，决定派主力或派一部渡江，创造湘鄂赣边区根据地。”“为着准备执行上述计划，请考虑目前开始派少数地方工作人员或少数游击支队南渡，求得生根。”“到明年夏季，则准备派一个较大的游击支队南渡。”[注]

陈毅1945年8月从延安飞赴前线后，与毛泽东已睽违三年四个多月时间。中办通过贺龙部从河东搞来鱼为他接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贺龙作陪。毛泽东安排陈毅阅读“十二月会议”文件，汇报华野情况并参加中央会议。比邻而居又朝夕相处，陈毅与毛泽东有了自延安揖别后首次从容交流的机会。

陈毅与毛泽东在杨家沟朝夕聚首，毛泽东把贺龙自河东捎来没舍得吃的腊肉拿出来款待他。两人开怀畅谈，内容海阔天空：

自日本投降后，特别是1947年这一年发生了根本变化，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事变。敌我双方的形势都有了根本的改变。

政治方面人心动向完全改变，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对蒋介石深恶痛绝。现在，人心向我，主要是由于我们的政策适当。

军事上完全改观。二十年来我们长期防御、被“围剿”，没有进攻敌人。1947年7月，我们历史上第一次转入进攻。

经济方面，自转入进攻，主力移出，负担减轻，我们的经济问题解决了。蒋介石的经济1947年比1946年更严重，美国帮助也不能解决问题。1948年再搞一年，更大的胜利一定要来的。

《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274—27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以前只能讲“有利于我”，现在可以讲“胜利到手”。日本投降我们还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日本投降了，惧的是内战临头，成败两个可能还在斗争。现在我们的优势已经确定。注

1928年7月12日，毛泽东率井冈山红四军第三十一团赴永新作战，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支持由湘南农民组成的第二十九团去家乡宜章，朱德、陈毅力阻无效，为防该团孤军作战为敌所算，又命第二十八团同去。第二十九团一部为土匪所灭，一部在郴宜散佚，所剩不足百人并入第二十八团称新二十八团。8月，新二十八团二营营长袁崇全叛变投敌，红四军参谋长王尔琢在追回被其裹挟的部队时英勇牺牲。湘南冒进史称“八月失败”。
1942年，新四军军部根据党中央指示在驻地淮安盱眙黄花塘开展整风，新四军代政委饶漱石乘机私下以军部名义打电报到延安，罗列陈毅反对党中央、毛泽东的十大错误，并策划围攻陈毅，酿成“黄花塘事件”。

说起来，这是陈毅参加革命后，第三次长时间同毛泽东朝夕相处了。1928年4月，朱毛红军井冈山会师后，陈毅从“八月失败”注中认清毛泽东是引领红四军走上胜利道路的带头人，连夜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并参与起草中共中央给红四军的“九月来信”，使红四军七大上落选的毛泽东重新担任了前委书记。这是陈毅思想上的第一次飞跃。1944年2月，陈毅在“黄花塘事件”注后奉召到延安参加整风。经毛泽东开导，陈毅懂得了“做一个政治家，必须锻炼忍耐”的道理，开阔了心胸，积极参与起草党的七大军事报告，协助做好友军工作，在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是陈毅思想上的第二次飞跃。现在，陈毅从毛泽东纵横捭阖、充满自信的谈话中，

得出对时局和战争发展趋势的几个判断：第一，政策适当，人心在我；第二，转入进攻，优势明显；第三，乘势而上，进击江南。他的思想，正在酝酿和产生第三次新的飞跃。

毛泽东说，根据我们作战一年半的经验，如果从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时算起，我们作战五年，建设五百万解放军，歼敌七百五十万人，就可以说已经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了。

陈毅问，能说我们已接近全国胜利了吗？

毛泽东说，我们确是胜利在望了，我们肯定要在全国胜利了！

陈毅得此回答，内心喜悦无以言表。毛泽东与陈毅都具有诗人禀赋，在气质和思想上也更易沟通。精兵劲旅渡江南下，于国民党统治区心腹地带实行新的战略展开，陈毅为毛泽东描绘的壮丽战略图景陶醉了，举双手赞成把1948年的战略重点放在精兵跃进江南上，并由粟裕挂帅出征。在陈毅看来，即将取得更大胜利的新的一年，渡江南进无疑是最绚烂的一幕。

在杨家沟的憧憬如诗如画之际，一封沉甸甸的中原来电飞上毛泽东案头。1月22日，粟裕致电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邓小平：

目前江北（中原、豫鄂陕及豫皖苏），敌我是处在反复的拉锯形势中……敌人则多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法，我兵力分散时，则进犯；我集中兵力时，则后缩；敌我兵力相等，则与我纠缠，不让我安定休整。在上述情况下，我一个战略区之兵力，对当面之敌作战，则难取全胜；如待三个战略区兵力集中，则又失去战机。而敌人则利用其较我优良的运输条件和建制的临时变动，以集中或分散对付我军。但我军则因缺乏固定补给来源和足够的运输能力，又不便长期集中强大的兵团于一个地区（或方向）作战，因此，建议三军（刘邓、陈谢和我们）在今后一个时期，采取忽集忽分的作战方式，以求能较彻底地歼灭敌人一路（我们一军如不担负打援，兵力是够用的），只要邻区能及时协同打援或钳制援敌迟进，歼敌一路是很可能的。在此区歼灭战结束，敌向此区集中，则我又分散或转至邻区，总以何区便于歼敌，即向何区集中。如此能有两三次歼灭战，则形势可能变化……如认为可行，则请刘邓统一指挥。

《粟裕军事文集》，第344—346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

电报针对敌“守备技术加强”，“筑工效率提高”，“每班三小时即可完成一个地堡，四至五小时全盘工事大体可以完成”的实际，提出“部队之攻坚技术（坑道爆破）和增强攻坚炮火，实为急需”，建议军委统一计划调剂和生产炮弹，以增强反攻之效能；为“让敌背上守备大城市之包袱，我则先解放全国之广大农村及中小城

市，以缩小敌人之兵源及粮源”，“为能迅速变新区为解放区，则又须从老区抽调大批干部前往新区工作”；“建议统一全国之建军思想，使无地域与界限之分”，“打破本位主义”，“并尽可能统一编制与番号及干部训练，而增强作战效能”。[注]

当时电报均以地支代月、韵目代日，循此惯例，故名。

解放战争中，粟裕对中央关于战略全局和全军建设的建议不下十多次，但像这样对全国战局和全军建设重大问题全面建言，尚属首次。粟裕保存的抄件证明，此电1947年12月10日就已拟就，经四十多天静观默思，特别是平汉破袭战证明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可行，方郑重发出。这封著名电报，史称“子养电”。[注]

决策前深思熟虑，寻求最佳方案；看准了则坚定不移，敢对历史负责。后来的史家这样评价粟裕用兵的特点。“子养电”发出前后，从1948年1月5日到3月15日，粟裕上报中央军委和华东局、刘伯承、邓小平的四份电报，在华野直属队干部大会、政治工作会议、师以上干部会议上的三次讲话，先后七次阐述“子养电”基本观点，并在华野征求过张震、郭化若等多数将领的意见。

粟裕苦心孤诣的战略建言，正是毛泽东日夜思虑的军国大计。实施战略进攻以来，我军“三军配合，两翼牵制”，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建立根据地；陈谢大军直出豫陕鄂在豫西、陕南建立根据地；陈粟大军挺进豫皖苏边区扩大原有根据地。三路大军互为掎角，逐鹿中原，在长江、淮河、黄河、汉水间开辟新的中原解放区。1948年年初，蒋介石为实施尽力坚守东北、坚守华北、不许共军在中原生根的新战略计划，在中原部署了三十七个整编师，约六十六万人，国共双方在中原对峙中形成僵局。

为打破中原僵局，毛泽东与周恩来、陈毅商定，南线三军三个月内的作战方针是，以刘邓主力位于大别山内线，“分遣坚持，多休息打小仗”，待晋冀鲁豫南下的三万新兵充实部队后，再打中等规模之仗；2、3、4三个月内，陈粟、陈谢在中原打几个中等规模歼灭战，配合刘邓军坚持大别山斗争；以山东兵团许谭率七、九两纵南下苏北、苏中，会合原在两地活动的华野两个纵队，“形成一个重要战场，威胁京沪”，迫使蒋介石从大别山分兵向东。“三个月后南北配合行动，可能进入打大歼灭战之阶段。”

粟裕的“子养电”，正是在党中央苦寻破局之计时进入统帅部战略视野的。馆存收电译稿显示，毛泽东阅电逐句圈点；周恩来阅后批注：“请陈考虑，粟所提各项问题，是否需再议一下？”毛、周、任、陈复议后决定，维持中央既定南进战略不变，根据党中央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深远后方战略方针，在解放战争第三年适当时候，派粟裕率华野第一、四、六纵队组成第一兵团跃进江南，以此破局，吸引敌

中原地区部分主力部队回防江南，为我军在中原创造大量歼敌战机。27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电：

丑、寅、卯三月，分别是农历十二、一、二月；辰月，农历三月。

《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271—27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关于由你统率叶、王、陶三纵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问题，我们与陈毅同志研究有三个方案：（甲）就现态势再休整半月，你率叶、王、陶三纵乘敌不备从宜昌上下游渡江。陈、唐指挥三、八两纵及陈赓主力进入江汉地区……掩护你们渡江……（乙）丑、寅、卯三个月照原计划进入伏牛秦岭以南、长江以北、平汉以西地区。除作战外，你率叶、王、陶三纵在该地区争取休整一个整月，然后渡江，陈、唐指挥三、八两纵及陈赓主力在江北任掩护……（丙）丑、寅、卯三月至伏牛、长江之间作战，辰月[注]全军北发返，你率叶、王、陶择地休整两三个月，秋季渡江……以上三案各有优劣，请你熟筹见复。至于你率三纵渡江以后……可能吸引敌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你们以七八万人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应使休息时间多于行军作战时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渡江地点似以秭归、宜昌附近，宜都、江陵附近，石首、监利附近，择地渡江进入湘西为较适宜。由洪湖、沔阳地区渡至鄂南，敌似更不及料，亦可考虑。[注]

（四）粟裕“斗胆直陈”暂不过江

中央军委电令粟裕率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后，毛泽东如释重负。转眼陈毅来杨家沟已近一月。经党中央同意，陈毅拟于2月1日动身东返。毛泽东殷殷嘱托说：“你们作战是可以放心的，今后要讲究政策，整顿纪律。回去代我问候同志们，问候华东部队全体指战员好！”

陈毅东返未返，1月31日中午，粟裕给中央军委的复电到了。

> 金明，时任胶东区党委副书记、胶东军区副政委；骆耕漠，时任华中军区供给部部长。

1月27日，粟裕受命率军渡江南进，即派侦察科长南下侦察，组织部队开展水网稻田地区作战和以攻坚、巷战为重点的临战训练，委托腿有残疾的新四军老战友乔信明在后方安置病残人员和妇女儿童。党中央为华野一兵团印制了东南流通券，筹足到新区用的银圆，还调金明、骆耕漠随军南下做新区党政和财经工作。

是分兵跃进江南，还是聚力中原歼敌？粟裕备战南渡之际，也在弹斤估两、反复权衡。倏忽间，他的思绪又回到浙西北峰峦叠嶂的天目山区。

1945年2、3月间，苏浙军区司令员粟裕，根据党中央深入苏南、开辟浙西，以便战略反攻“破敌、收京、入沪、配合盟军登陆”的指示，率部在天目山两次反顽告捷。但排兵布阵时总感兵力不敷使用，致使一些围歼战打成击溃战。粟裕慨叹：“要是手中有三个纵队，一个堵截，两个突击，仗就好打了！”

鉴于日寇收缩兵力，撤出南宁、柳州、福州等地，中共中央决定，暂缓执行粟裕部南下后，再派二、三梯队南下发展东南计划。粟裕分析苏浙敌我形势，2月28日发电建议叶部“仍如期南来”，以利苏浙巩固发展。3月2日，新四军军部复电两部暂不南下。粟裕再电“坚主叶仍提早出动”，军部将粟电转呈中共中央。中共中央11日致电华中局：“叶部可即令其南渡，谭部仍留现地待机。粟、叶两部以加强苏、浙、皖交界根据地工作为主要任务。”

4月7日，新四军一师一旅旅长叶飞、十旅政治委员金明，率教导旅骨干及地方干部渡江，在孝丰吴家道与粟裕所部会师。

6月19日，粟裕指挥部队诱敌深入，先阻东打西、后阻西打东，先后击破两路顽军，歼灭顽军突击第一队少将司令胡旭旰所率六千八百多人，取得天目山第三次反顽作战胜利。

天目山三战三捷歼敌一万三千余人，扩大了苏浙皖边敌后新区，在全军率先开启了由分散游击战争向大兵团运动战战略转变的尝试。粟裕在党的七大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华中局组织部部长曾山出席七大归来说：“毛主席、周副主席在酝酿选举中央委员人选时，高度评价粟裕同志，说他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

粟裕并非军校科班出身，更无天赋异禀，他是得警卫红军中枢之利，起步即于中军帐观摩红军之父的战略运筹，在可塑性最强的年龄段喜获战略素养并经实战运用存乎一心，终成栋梁之材。

1930年末，在宁都小布镇中央苏区誓师大会的主席台上，一副对联吸引了红六十四师师长粟裕的视线：“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粟裕称赞毛泽东妙联道尽红军战略战术要旨，是“克敌制胜法宝”。在朱德、毛泽东指挥下，粟裕率部参加第一次反“围剿”，与兄弟部队全歼敌第十八师，创造了毛泽东笔下“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的骄人战绩。在实战这所最严酷、最丰富、最管用的学校里，粟裕掌握了朱毛指挥战争艺术的精髓，登堂入室成长为我军高级指挥员。

长期南征北战，粟裕立足全局、着眼实际确定作战方针的思维习惯，早已化为对党、对军队、对胜利负责的一种政治自觉。面对新的重大使命，他习惯性地回到指挥所地图前，倒骑椅子，眼前浮现出一望无尽的高山大河、平原旷野、要津通道……各种作战方案和千军万马，像电影画面一样在他眼前演示出来。

粟裕说：“不谙地图，无以为宿将。”他习于识图，长于识图，乐于识图，作战地图是最令他赏心悦目的风景。少年时，粟裕的最爱是口琴、月琴，从军后，已被运筹戎机的地图取代。图上自有百万兵。图前计算与思考，是粟裕特有的思维和决策方式。读图集数据运算、动态前瞻、有机联想于全程，融抽象与形象思维、静态与动态分析、敌情与我情研判于一体，隐含于每一条曲线中的利与钝、危与机、胜与败，无不变幻莫测、奥妙无穷。

战争年代负责为陈毅、粟裕绘制作战地图的作战参谋秦叔瑾回忆：“在我所接触到的军事指挥员中，还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精通地形图而又熟记战区地形的。粟裕司令用图有一个特点，他不仅看当面五万分之一的地图，而且要看友邻部队地区的二十万分之一图，还有更大范围的五十万分之一图和全国一百万分之一图。也就是说，他不仅是考虑当面的战役、战斗，还要从战略全局考虑问题。所以，他总是把战役的局部和战略的全局结合得很好。”

粟裕探讨制胜之道，历来注重敌情、我情、友情三个方面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四个领域情况研究。早在1940年4月他就提出，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

“各种力量的总决赛”。地图前的缜思细算，印证了数月推演的结论。通过对敌我双方兵力构成、装备特点、江南江北地理环境对作战影响，我军插敌战略纵深其可能回防的部队类型，南北两地我军可依托保障条件等因素的综合分析，粟裕对渡江南进有了更为科学、明晰的认识。

孟良崮战役后，国民党军兵力大为集中，华野一直未能得手。集中更大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成为创造新战机的当务之急。为尽快改变中原战局，华东中原我军势必要强强联手，以战略决战的姿态与敌打几个大歼灭战，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在山东战场，由于敌军坚固设防地域多，我军作战地区狭窄，暂无打大歼灭战的战机。而在中原黄淮地区，我军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却正在成熟。

中原黄淮敌重兵集结,因防守铁路干线和大中城市占用兵力多,机动兵力减少，易于创造歼敌于运动之中战机；中原黄淮地势平坦，交通发达,如破坏铁路公路，敌重装备机动受限，我军发挥徒步行军强项，可快速集中兵力歼敌；中原黄淮虽属外线，但背靠山东和晋冀鲁豫老解放区，我军作战支援和伤病员安置治疗有保障，相当于半后方作战；我三路大军逐鹿中原时逾半年，新解放区各项建设成效日显,军民关系逐渐密切,支援战争的力量正在形成。一地一域同时具备上述打大歼灭战的优势，可遇而不可求。

粟裕还想到，我三个纵队跃进敌战略纵深,无疑会给敌以相当震撼、威胁和牵制。但毋庸讳言，也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

首先，我三个纵队约十万人，渡江后转战数省,行程当以万里计，在无后方依托条件下遭敌围追堵截,兵员补充、粮弹等物资供应、伤病员安置治疗等，困难甚大。兵员日减使我军无力攻占大中城市，有时不得不坐失有利战机。就像1934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五千多里到达皖南，兵员已减一半。从中原挺进闽浙赣边,行程是当年北上抗日先遣队两倍,估计减员也不会少于一半。大兵团长途机动不便携带重装备，而无重装作战实难攻坚速决。

其次,渡江南进可调动江北部分敌军回防江南，但估计调动不了敌在中原的四个主力军（师)。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两支王牌均为半机械化部队，不适应江南水乡作战，不会调到江南与我进行游击战。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矛盾日深，不可能放虎归山，让桂系第七军和整编第四十八师回师江南，养痈遗患。不能把中原敌四个主力军（师)调到江南，就达不到南进预期目的。

《粟裕回忆录》，第418—422页，人民出版社2022年7月第1版。

粟裕笃信“打仗就是算数学”，及时准确获取情报为胜战前提。在华中，他即组建“四中队”搞情报。战略转兵在即，情报和算计成为粟裕缜密战略成本核算法

宝。打大歼灭战，突击和阻援牵制均需足够兵力。中原我军现有十个纵队，中野、华野四六占比，加两广纵队及地方武装，可与敌一较高低。一兵团迟出江南，以同样代价，可歼敌三至五个整编师。而分兵南下，不仅江南歼敌受限，中原实力也会锐减。显然,集中兵力歼敌江北更为有利。[注]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第7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善于在历史中比较鉴别，是粟裕进行战略选择的习惯。1947年5月11日，进犯沂水的国民党第七军和整编第四十八师较为暴露，华野拟首歼该敌并视情打援。命令下达后，又查明整编第七十四师正向坦埠推进，而华野主力恰好位于该师进攻正面，不需作大的调动，就可集中五倍于敌的兵力将其围歼。5月12日晨，陈毅、粟裕改变战役决心，准备在敌重兵集团密集靠拢态势下实施“猛虎掏心”，从敌战线中央割歼第七十四师。当日，毛泽东致电陈毅、粟裕：“敌五军、十一师、七十四师均已前进。你们须聚精会神选择比较好打之一路，不失时机发起歼击。究打何路最好，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施行，我们不遥制。”[注]统帅的信任，更坚定了华野打第七十四师的决心，13日发起总攻，16日即全歼该师。

当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教训，使粟裕如鲠在喉；统帅的明智和以往据实建言收到的好效果，又使他不吐不快。1948年1月31日，粟裕向中央军委发出军史上著名的“世午电”：

粟裕此电对叶王陶三纵行动时间建议有二：一、“即将叶王陶纵调至陇海线附近继续休整一个半月，至3月下旬即可出动”；二、叶王陶纵“仍随三、八纵及陈谢南下，参加一至两个战役后再行北返”，“至5月中旬即可出动”，“以上两案以第一案为最好”。

三个野战军，系指晋冀鲁豫野战军、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陈（赓）谢（富治）集团。
三个地区，系指鄂豫皖、陕豫鄂、豫皖苏地区。

粟裕电报说：“如能于最近打几个歼灭战，敌情当有变化。因此于最近时期，将三个野战军[注]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取忽集忽分（要有突然性）的战法，于三个地区[注]辗转寻机歼敌（华野除叶王陶外可以三至四个纵队参战），是可能于短期内取得较大胜利的。如是则使敌人机动兵力大为减少，而我军在机动兵力的数量上，则将逐渐走向优势……如果我军在数量上及技术上取得优势，则战局的发展可能急转直下，也将推进政治局势的迅速变化。”

《粟裕军事文集》，第350—35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

电报还提出了“由武汉以西渡江”和“从湖口、当涂之间，甚或从南京至江阴间，采取宽正面的分路与分梯队的偷渡”两个方案，并分析了两案渡江难易和转至闽浙赣地区的利弊因素。[注]

电报留人，毛泽东让陈毅推迟东返，参与研究复粟裕电。

毛泽东注意到，粟裕电所说在忽集忽散中打几个歼灭战，实则提出了一个重大建议：暂不分兵南进而“歼敌主力于江北”。

粟裕苏中七战七捷“封神”后，毛泽东对其备极赞赏，经常发电征求他对某一作战方案的意见。但这一次，毛泽东并未因粟裕建言而动摇筹划既久、思谋亦深的渡江南进战略。

>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第38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1948年2月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并刘邓等人电：“完全同意第一方案，叶王陶三纵即开陇海线附近再休整一个半月，3月下旬出动。三万新兵中，以两万补充叶王陶三纵。渡江路线，争取走湖口、当涂之间，或南京、江阴之间。”[注]

2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在杨家沟为即将东返的陈毅饯行，席间，毛泽东将自己草拟的一份文书当面交给陈毅。瘦劲清隽的行草，列有东南野战军及第一兵团领导人的名单：

东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

副司令〔员〕粟裕

副政委邓子恢

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一、四、六纵）

兼司令员及政委粟裕

副司令员叶飞

参谋长张震

政治部主任钟期光

东南野战军第二兵团（三、八、十纵）

准备一九四九年二、三月出发。人选临时决定。

党的东南分局书记粟裕

副书记叶飞、金明

《粟裕军事文集》，第35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

中共中央设想组成东南野战军并分批南下，是继晋冀鲁豫野战军直出大别山后，实施第二个战略跃进的又一重大构想。[注]

陈毅将毛泽东草拟名单带回华野交给粟裕，粟裕一直珍藏身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张震与粟裕谈及这段往事，粟裕让夫人楚青取出毛泽东手书件。这份名单虽不是中央军委正式命令，但征求过中央领导和陈毅意见，实则是南渡部队班子配备方案。

陈毅对于华野担负渡江南进任务，充满喜悦与自豪。这种心境，从他写的《失题》一诗中，小溪潺湲般欢快地流淌出来：

小住杨沟一月长，评衡左右费思量。

盘马弯弓故不发，只缘擒贼要擒王。

北国摧枯势若狂，中原逐鹿更当行。

五年胜利今可卜，稳渡长江遣粟郎。

因诗作涉核心机密未曾示人，直到陈毅1971年逝世才被发现。

陈毅的陕北之行，远超原定赴华东局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协调工作活动半径，工作内容也从协调部队供给，拓展上升到深度介入南线进攻战略筹划，收获颇丰。“小住杨沟”成为陈毅戎马岁月中继井冈山、延安后，与毛泽东空间和心灵距离最近的一个时期。

陈毅动身离陕赴豫，标志着渡江南进战略开始付诸实施。

《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27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注] 渠唐，指华野参谋长陈士渠和华野政治部主任唐亮。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第39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28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第39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1948年2月6日，毛泽东致电刘邓，同意他们“组织两个有力支队继粟裕之后渡江南下牵制敌人一部兵力，一支出川、湘、鄂，一支出湘、鄂、赣”的建议。[注]7日，毛泽东再电刘邓，要求指挥八个半纵队将敌主力吸引至淮河、汉水以北，利于粟部机动。17日，毛泽东致电邓小平、李先念：“粟裕所部为敌五军等部扰乱，不利休整，需要桀唐[注]、陈谢及你们淮北部队集中兵力打几个胜仗调动五军等部，方能安心休整。该部休整需一个多月”，“粟部出动时，则以全力配合粟之行动”。[注]19日，毛泽东致电粟裕，“如鲁西南被敌扰乱不能安心休整”，一、四、六纵“可考虑移至黄河以北，安心休整两个月”。[注]20日，毛泽东再电刘邓粟，十、十一两纵暂“在沙河、陇海、津浦之间机动作战”，“调动五军等部向南，以利粟部休整。该两纵暂时受粟裕指挥”。[注]

27日，华野命第一兵团第一纵队南越陇海线，钳制迷惑国民党军，掩护野指和第四、六纵队北渡黄河，进至濮阳地区休整。3月11日晚北渡完毕，继续开展新式整军运动和跃进江南临战训练。

陈毅离开陕北后，周恩来反复思考并与任弼时沟通，向毛泽东郑重建议，转战陕北的使命已胜利完成，为适应飞速发展的新形势，一分为三的中共中央机关应尽快合一。中国革命和解放战争战略指挥中心放在何处为宜？毛泽东征求周恩来、任弼时意见。两人的手不约而同越过作战地图上的黄河，指向太行山东麓的晋察冀。那里位置居中，环境适宜，便于指挥全国各战场。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了这一建议。

形同姊妹的黄河长江，在数千年双脉并流中孕育了中华文明并连理同枝。当国共在黄河大棋盘上的战略对弈，以刘戡毙命、胡宗南黔驴技穷而在陕北见诸分晓时，面向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战略决战，靠山、倚河、望江，已成新的战略选择。

1948年3月21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杨家沟。23日下午，毛泽东在吴堡川口村园则塔东渡黄河，为历史积淀深厚的河西高原，留下一段脍炙人口的传奇。在黄河东岸，毛泽东回望战斗生活了十三个春秋的陕北，似有千般不舍。这时，载运马匹的船遇到风浪，伴随毛泽东转战陕北的小青马受惊落水，在漩涡中打个转，又扬鬃奋蹄游向西岸。“马犹如此，人何以堪？”毛泽东默念着，对周恩来

和任弼时深情说道，“陕北是个好地方！”风涛中再度传来小青马的嘶鸣，后续过河船只将它载到了河东。毛泽东一行从九曲黄河第一古镇山西临县碛口进入晋西北。窑洞灵光，辉映三秦大地，铭记表里山河。

濮阳位于黄河下游豫鲁冀交界地带，上古时，黄帝与蚩尤大战于此；三国时，吕布在此以戟击中曹操头盔。华野一兵团屯兵濮阳，是备战南渡的磨刀期，也是对渡江南进战略的消化反刍期。

4月1日，陈毅风尘仆仆回到濮阳孙王庄华野司令部，为备战南渡且以整风为主旨的华野前委扩大会议已召开有日。

濮阳的“春脖子”很短，鹅黄尚未褪尽，绿荫已悄然笼罩四野。三个多月来，粟裕对兵出江南还是暂留中原的思考，也从新芽初绽到枝繁叶茂，日趋丰盈而绵密。4月16日，陈毅和粟裕同与会的两广纵队领导谈话。交换意见间隙，粟裕突然向陈毅提出，一兵团暂留中原歼敌，比远出江南作战略机动更为有利。

“你要改变中央军委的南线战略？”陈毅惊讶地瞪大了眼睛。粟裕所言，可是与中央军委战略意图方枘圆凿啊！陈毅何尝不知，毛泽东向东南发展的决心由来已久，1941年2月就提出将来准备出天目山，向黄山及赣东北发展。1944年粟裕率部挺进苏浙皖，党中央即要求视情况变化全面控制苏、浙、皖、闽、赣诸省。对渡江南进计划，毛泽东更是深思熟虑。作为参与这一战略方案的制订者，没有谁比他更清楚毛泽东对渡江南进挚爱之深和倾注心血之巨了！陈毅一时无言，胸中却有如波涛翻涌。

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是中共中央《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明确的基本任务，渡江南进则是1948年南线作战重中之重。如今，令发庙堂，箭在弦上，受命统军南下的主将对中央军委之命连发改弦易辙之声，再次建言被采纳的可能性有多大？粟裕能够承受由此带来的影响之重吗？

不得不说，在运筹作战、沙场点兵上，陈毅对腹中兵甲、算无遗策粟裕的了解，比其他人都要多。这个心倾胜战而不计个人得失的年轻战略家，一旦悟透戎机与胜算，必会不遗余力对上建言。从苏中到淮北，从鲁南到中原，历史兜兜转转，与以往何其相似乃尔的一幕幕尽现眼前。陈毅是懂粟裕的。1947年华野奉命“七月分兵”后，数次招致败绩，南麻临朐战役，陈粟以四个纵队八个师围攻胡琏整编第十一师，因敌广筑子母堡和逢雨弹药受潮功败垂成。八个多月未能痛歼国民党重兵集团，已成华野之痛，专司战役指挥的粟裕，郁结心中的块垒大如磐石！军中有云，下级向上级建议，事不过三；同一内容，只有三次建议权。面对粟裕与中央军委决策相左但可能蕴含巨大转机的建议，陈毅同意粟裕再次驰电中央军委建言，并准其写明此电经他看过同意发出。

4月18日，粟裕向中央军委发出第三封电报即“卯巧电”：

我大兵团进入新区，远离后方作战，不仅在群众与地方工作上，得不到较好的配合，行动上不易保守秘密，往往丧失战机，而且由于补给困难与不及时，以及伤病员之安插，亦大大影响各级指挥员决心的贯彻和下级指战员战斗勇气的发挥……

华野现有装备在无正常补给情况下，不仅不能发挥其作战能力，且在某种情况下重装备却变成了拖累。如不要这些重武器，则在敌人筑城能力较强的现状下（敌人四小时即可完成地堡群），不仅难以速决，甚至不可能攻克……如以兜圈子中付出的巨大减员，作为有后方依托打歼灭战的伤亡，则每一万人的减员，至少可歼灭敌人一个主力师，如是对战局较有利。

大兵团在新区运动，最严重的事为粮食问题……以十万之众进入江南山区，粮食补给则是长期的严重问题……双方大军往返拉锯，直接与民争食，也同样将自己弄乱……

《粟裕军事文集》，第353—356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

我们南渡后估计能调动敌人为二十五、二十八、八十三、六十三、二十师等部及留华南各地之后调旅。至于桂顽之七师、四十八师等部，蒋不至纵虎归山，仍可能留于大别山；五军及十一师则因系美械重装备，亦可能留中原，以发挥其作用。此四个整编师战力最强，为中原敌人骨干，如我军南进仍未能调动，则中原局势将成较长期僵持局面…… 注

电报对今后作战提出了以刘邓、陈谢及华野主力，依托后方（陇海路北）作战，求得雨季与夏收前在中原地区打几个较大歼灭仗；对敌人近后方，则派出数路强有力的游击兵团（每路多则一旅，少则一个团）辗转广泛游击，配合正面主力作战；对敌人深远后方，则派出多路坚强的远征游击队（每路至多三千人，少则一千人即可），配成掎角之势，采取广大范围辗转游击等建议。

电报最后说，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绝不松懈。

《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17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4月21日，毛泽东收电第三天，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东渡黄河进入晋察冀，毛泽东心情大好。一年前的 3 月 14日，毛泽东在延安王家坪对新四旅旅团干部说，存人失地，人地皆存 ；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少则一年， 多则二年， 我们就要回来， 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注

《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17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还是那个阴霾乍起的3月，中共中央准备“从他们最后的都城撤退”时，周恩来邀请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到杨家岭礼堂看戏。戏演完后，周恩来带她去见毛泽东。窑洞桌子上摆有茶水和花生，毛泽东对斯特朗说，你不便跟我们上山，但已知道了外界需要知道的关于我们所有地区的情况，你应该带着这些情况走向世界。何时再回中国？毛泽东告诉她:当我们再同外界取得联系时，你或许可以回来，这大约要两年时间。[注]

时过一年一个月，收复延安已成现实。历史兑现毛泽东预言时，斯特朗离开延安还不到两年。由于她旅居苏联和回到美国命运多舛，再度获取美国护照并踏上中国大地，已经是1958年春天了。那一年，她已经七十二岁了。

卯有，4月25日；卯世，4月30日。
《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30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1948年4月21日，毛泽东致电华野：“为商量行动问题，请陈毅、粟裕两同志于卯有至卯世[注]数日内同来平山中工委开会为盼。”[注]13］陈毅、粟裕正组织华野一兵团高干会议，22日急电中央军委，请求粟裕24日作完报告即北来，陈毅在部队主持会议不北上。

卯感，4月23日。

中央军委回电：“请你们两人提前于卯感[注]赶到中工委会晤。”

有，25日。
胡石言、吴克斌、罗英才、胡松植、何晓鲁、铁竹伟等著：《陈毅传》，第415、41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陈粟23日电复中央军委：“拟于明晚及后天白天作一天半报告，传达中央指示及政策”，“我们两人于有[注]晚即动身北来”。[注]

胡石言、吴克斌、罗英才、胡松植、何晓鲁、铁竹伟等著：《陈毅传》，第415、41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毛泽东接陈粟电即批示：“朱、刘、周与陈、粟、薄（一波）、李（先念）商复。”中共中央即告刘邓：“陈、粟二人日内可到阜平和我们会商行动问题及你们提出的中原机构组织问题。”[注]

据粟裕秘书蒯斯曛回忆，当时中原局第二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李先念经濮阳去西柏坡，陈毅、粟裕与他谈了暂不渡江南进问题，安排蒯斯曛做记录，以备李先念带上转报党中央。

25日黄昏，陈毅、粟裕分乘吉普车，风驰电掣驶向太行山。

（五）“行宪”惊魂：总统选战暗藏杀机

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在中国历史上，诸如此类的悲剧屡见不鲜。然而，像国民党“行宪国大”闭幕仅半年，总统就组织专班谋杀副总统，这样骇世惊俗的奇闻则着实令人咋舌。

1946年9月，国民党九个军攻占塞上重镇张家口。被胜利冲昏头脑的蒋介石打着“还政于民”的幌子，10月11日将中共等党派排除在外，网罗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在南京召开中华民国“国民大会”。因大会旨在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称“制宪国大”。时过一年五个月，1948年3月29日，蒋介石一手操弄中华民国国民大会再次在南京开幕。大会旨在施行宪法，选举总统，故称“行宪国大”。又因是年为“行宪”元年，故称“行宪年”。

李宗仁建言蒋介石从缓行宪，先稳定国内政局再说。蒋介石却说，解决今日问题一定要行宪。白崇禧又劝蒋介石，“戡乱”时期，政治得失全由战场胜败决定，可否等到军事行动告一段落再说？蒋介石坚持说，鉴于当前内外形势，大选决不再行延期。

1947年10月中旬，李宗仁派秘书程思远给蒋介石呈送他意欲竞选副总统的信函，并另函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请其就自己参选副总统事，在蒋介石面前善为说辞，力促其成。当日，李宗仁还将一封火漆密封函交程思远，让他亲自送给司徒雷登私人顾问傅泾波，向司徒雷登报告竞选副总统事并请求支持。

李宗仁驰函南京后仍不放心，于1948年3月25日当面谒蒋，言明参选副总统事已请吴、白禀报并承蒙俯允，现更希望有所指示。蒋介石说，选举正、副总统是民主政治的开端，党内外人士都可自由竞选，他本人将一视同仁，没有成见。

国防部长白崇禧、监察院副院长黄绍竑、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同声反对李宗仁参选，因蒋桂积怨甚久，已成不世之仇。

桂系向有新旧之分。清廷任用的提督陆荣廷，是控制广西的军阀，亦是旧桂系代表人物。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三位广西才俊，脱胎并砥砺于陆荣廷旧桂系，结缘并成就于新桂系。

1920年8月，旧桂系挑起第一次粤桂战争。禄步圩之战，营长李宗仁和连长黄绍竑、白崇禧率先冲锋陷阵，桂军突出粤军重围。首次并肩血拼，奠定了李黄白半生合作的基础。

旧桂系1921年溃散后，拥兵两千的李宗仁获委玉林警备司令，黄绍竑、白崇禧为其营长。此后旧桂系残部刘日福来袭抓获黄绍竑，白崇禧跳墙逃走摔断了腿，躺在担架上指挥部队击败刘日福部，黄绍竑逃到乡下拉起两营队伍，因衣食无着回玉林投靠李宗仁。玉林兵多粮广，李宗仁经两三年生聚发展，拥兵上万人。

黄绍竑在玉林任三支队司令后，拟伪投梧州实力派沈鸿英伺机智取。李宗仁虽不愿黄分兵而去，但想到这个不受羁縻的干才挽留不易，不如成全其宏愿，异日或可表里为用，遂允准。黄表示，日后倘能成功，还将拥李为帅，决不独树一帜；但取梧州前，一切费用仍由李照发，万一失败还望予以收容。李宗仁慨然点头。黄绍竑移师戎圩时，带走了李宗仁派去接防的两个营。李宗仁被挖墙脚后，说服主张派兵追击者，不打还是弟兄，打起来两败俱伤，避免了祸起萧墙。气量宽宏、能忍人所不能忍，是李宗仁成为新桂系首领的第一要诀，也是日后黄甘居李下的深层原因。

黄绍竑在戎圩将沈部黄炳勋旅缴械，与李济深粤军会师梧州。李设计生擒沈鸿英旧部冯葆初，黄绍竑独占梧州自任广西讨贼军总指挥，白崇禧为参谋长。1923年9月，李济深派舰运送黄、白讨贼军两面夹击卢得洋部攻取藤县，黄绍竑李宗仁联手击败陆荣廷旧部陆云高旅，梧州、藤县、平南、桂平悉归李黄白。

此间，旧桂系陆荣廷命李宗仁挂帅讨黄。李说服陆暂罢东征之议转顾桂北，与沈鸿英发生火并。黄绍竑、白崇禧乘机击破旧桂系师长陈天泰部，所部增至八千多人。李宗仁部顺势改称定桂军，伙同黄、白讨贼军与陆荣廷、沈鸿英形成三分广西天下格局。

1924年6月，定桂军与讨贼军在南宁为争指挥权架起机枪。黄绍竑赶到后力排部将武力解决定桂军独占南宁之议，并明确表示，恪守前约、推李为首。两军合并成立定桂讨贼联军总司令部，李宗仁为总指挥，黄绍竑为副总指挥，白崇禧为总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联军肃清陆荣廷残部，次年6月又与李济深粤军肃清沈鸿英残部，终结了旧桂系统治广西的历史。粤军与李黄白联军及驻粤滇军携手，将“假道通行”的唐继尧滇军逐出桂境。新桂系于1925年6月统一广西，李黄白三杰成为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

1926年，蒋介石主动提议与桂系领袖李宗仁义结金兰，换帖成了拜把子兄弟。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指挥李宗仁率军一路征战，统一两广，奠定北伐胜利基础，1927年建立了南京政府。1929年3月6日，蒋介石整编部队欲“杯酒释

兵权”，遭李宗仁等实力派抵制，遂反目。蒋介石安排李宗仁任参议院院长闲职，暗输湖南省主席鲁涤平武器装备以打击桂系。李宗仁果断将鲁涤平免职，蒋介石恼羞成怒，派人刺杀李宗仁。身陷杀手埋伏的李宗仁拼死冲上二楼，从楼梯旁窗户一跃而下死里逃生。

指白崇禧、黄绍竑和黄旭初。

有这样你死我活的过往，怎可能在一个屋檐下和平共事？为劝阻李宗仁，白崇禧请桂系军师黄绍竑北上。黄绍竑设身处地为李宗仁分析，监察院长于右任春秋已高，退休在即，不妨竞选位尊而无所事事的监察院长，必定马到成功。如违蒋意旨逆势参选，必然引发蒋桂之间新的摩擦，祸及生死同心的“一白二黄”[注]。

笃志参选的李宗仁自信抗战胜利后洁身自处，作风开明，薄负时誉，被党内外一些人士视为国民党内民主改革象征。此次挺身参选副总统，进可入府建功社稷，对国民党作起死回生之改革，挽狂澜于既倒；败则独善其身，摆脱于国于己两无建树的政治生涯，解甲归田，息影林泉。如此进退两利纾困解窘，何乐不为？

国民党内部原本派系林立，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陈家兄弟陈果夫、陈立夫是1927年9月成立于上海的中心俱乐部（Central Club）掌门人，人称CC派。

李宗仁对黄绍竑说：“国民党人心尽失，大家都希望像我这样开明的人出来辅佐蒋先生，换换空气。此次竞选，蒋先生和CC系[注]不反对便罢，他们愈反对，我自信获选的可能性便愈大。我不做监察院长。因为我不可能像于右老那样，只拍苍蝇不打老虎！我行使职权，首先要弹劾的便是蒋先生，那时你们岂不更受牵累！”

黄绍竑劝李宗仁弃选无果后，李宗仁分别致电吴忠信和白崇禧重申竞选决心，并请他们便中转报蒋先生，希望蒋先生同意自己竞选。不久，吴、白复电，称已将兄之意转报介公，介公对任何人公开竞选皆毫无成见云云。李宗仁得此保证，遂于3月11日在北平中南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竞选副总统谈话，在南京成立竞选事务委员会并设办事处，正式拉开竞选大幕。

此间，东北局势已不可收拾，华北大半已入中共之手，通货膨胀如脱缰之马。程潜、于右任和东北耆宿莫德惠，相继登报声明参选副总统，民社党也推出了徐傅霖。3月22日至24日，李宗仁现身沪宁，两地欢迎阵势均盛况空前。李宗仁俨然成为或许能使国家转运的人物。坊间舆论和媒体预测其当选可能性最大。

眼看李宗仁在竞选中坐大，蒋介石坐立不安。经与心腹密谋，拟以党提名的办法，将李宗仁的名字从候选人中剔除，遂以“为将来行宪交换意见”为名，召开了六届中央执、监委临时联席会议。会上就以党提名办法征求意见时，遭李宗仁和程潜坚决反对。

4月3日晚，蒋介石在寓所单独召见李宗仁，劝他顾全大局，急流勇退，以免党内分裂。李宗仁以事先数番向委员长请示均已获准，现作为参选人已粉墨登场实难撤销为由不肯从命。同坐一张沙发的宾主二人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一度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府邸晤面不欢而散。蒋介石当晚日记描摹约见李宗仁情形：“彼乃现丑陋之态，始尚温顺，继乃露其愚拙执拗之悖语，反党反政府之词句几乎一如李济深、冯玉祥之叛徒无异。”“后见布雷、立夫、铁城等，更知桂系为李竞选事，对党以分裂与广西代表不出席国大、推倒国大相威胁，可以说其不惟不择手段，且无廉耻。”

蒋介石逼迫李宗仁退选，消息在京城内外不胫而走。一些国大代表为此愤愤不平。蒋介石在国民大会堂出席会议时，示意左右要代表们“肃静”，代表中竟有人公然饯蒋，令其十分难堪。

蒋介石回到官邸，便召集黄埔系国大代表动员说：“李宗仁参选副总统，无异于将一把利刃插入我的胸膛。你们如果是我的学生，是我的忠贞干部，就应该替我拔掉这柄利刃！”

鉴于现有竞争人选均不足以拔掉心头“利刃”，蒋介石重新物色竞选“黑马”，力推立法院院长孙科与李宗仁一决雌雄。

孙科本无意竞选有名无实的副总统，但其系总理哲嗣，党内外势力颇丰，又是广东人，可分流李宗仁在南方的选票。宋美龄两度上门劝说，蒋介石又亲自出马，孙科只好答应参选。

4月4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中央执委临时会议上假惺惺说，不参选总统，宁做有实权的行政院长。首届总统应选学术上有成就、国际上有威望和对国家有贡献的党外人士。中常委和全会讨论，仍以蒋做总统候选人。为“劝进”，决定扩大总统权限，在宪法之外另立条款，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权。18日，国大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宪法”尚未实行，便已遭践踏。

19日，蒋介石在国大总统选举中，以两千四百三十票正式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陪选人居正得票二百六十九张，废票三十五张，有选票写的是“孙中山”。翌日，国民大会发布公告，李宗仁、孙科、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徐傅霖六人为副总统候选人。

“黑马”孙科一登场，助选团队便分头找国大代表拉票，承诺凡投孙科票者，要钱有钱，要官有官。报上时见中伤李宗仁的新闻，最骇人听闻者，说某省为支持李竞选，接济其数卡车法币。

黄绍竑本不赞成李宗仁参选，眼看大哥选战被泼污水，这位素以政治谋略见长又具文学天赋的军师，便想出一招以文助选妙计。

23日，国大开始选举副总统。因是国民党当政后首次“民主”选举，竞争激烈的副总统选举成为真正看点。当日上午进行第一轮投票，代表入场后，发现每席都放有一张当天的《救国日报》。报纸一版，一篇活色生香的时文《敝眷蓝妮》赫然入目。

蓝妮是上海滩著名交际花。抗战胜利后没收敌伪财产，她从德国进口的一批颜料被没收。蓝妮向老情人孙科求救，孙科遂致信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要求发还“敝眷”蓝妮的颜料。蓝妮是立法院孙院长“如夫人”的消息一经外泄，各报竞相爆料，成为街头巷尾谈资。李、孙对决的关键时刻，黄绍竑化名重书当年儿女风情，给了志在必得的立法院长致命一击。绘声绘色的香艳描写，唤起人们对当政大员绯闻的记忆，一时成为会场内外的热议话题。

孙科实力和声望本就不敌李宗仁，遭此打击，选情更显委顿。首轮投票李宗仁旗开得胜，以七百五十四票领先；孙科居次，得票五百五十九张；程潜第三，得票五百二十二张；于右任第四，得票四百九十三张；莫德惠第五，得票二百一十八张；徐傅霖殿后，得票二百一十四张。按竞选规则，于、莫、徐三人首先出局。

因初选无人达到法定票数，4月24日举行第二轮投票。孙科为争取国民党中组部部长陈立夫支持，当日散发自己放弃立法委员资格的声明。陈立夫垂涎立法院院长职位已久，如孙科不明确宣布放弃此位，陈立夫不会全力支持他，于是只好忍痛割肉。

蒋介石召见黄埔系干将贺衷寒、袁守谦等人，面谕他们为程潜助选，拨给可观竞选费用，企图以程潜分散李宗仁选票。

4月24日投票，李宗仁得票一千一百六十三票，增四百零九票；孙科得票九百四十五票，增三百八十六票；程潜得票六百一十六票，增九十四票。因《救国日报》披露孙科风流韵事重挫其选情，激怒挺孙的粤籍国大代表，张发奎、薛岳、香翰屏、余汉谋、李扬敬诸上将和中将，率众乡党代表拥向报馆将一楼捣毁。社长兼主笔龚德柏拔出手枪，守在二楼楼梯口与打砸者对骂，方使二楼幸免于难。张发奎等砸报馆犹不解气，又写报告给国大状告龚德柏。龚德柏也将一纸诉状递至国

大主席团。李宗仁过意不去，托程思远将四根金条转交龚德柏。此后，孙科助选团队变本加厉活动，深更半夜还到代表住处敲门送钱，代表皆不堪其扰。

眼看李宗仁胜局已定，蒋介石于24日下午召见程潜，要求下轮投票将其选票投给孙科，承诺将起用其助选人，补偿全部竞选费用。程潜对蒋介石操纵选举极为反感，当面予以拒绝，并于当晚召集支持他的六百余名国大代表宣布，“本人已受命弃选”。一众拥趸闻讯怒不可遏，声言宁可不投票，也不选孙科。

蒋介石恼羞成怒，指使陈立夫采用非常手段诋毁李宗仁。陈立夫唆使国民党党部人员，24日起在大会堂散发匿名传单，攻击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就要逼宫，三个月就要逼领袖出国”。某中央社刊物载文说：“李某竞选成功则逼宫，不成功则叛乱。”

面对蒋系流氓加无赖的缠斗，黄绍竑深感忧虑。24日晚，李宗仁和助选团队讨论应对之策。李宗仁坚信胜选无疑，提出让他们去胡闹好了。黄绍竑说，事情恐不那么简单，如不加以阻止，说不定会闹出一桩血案来。众人议至深夜，黄绍竑提出“以退为进”，由李宗仁本人声明，由于所受幕后压力太大，选举殊难有民主结果，故自愿退出竞选。选情看好的李宗仁哪舍得退选！黄绍竑给他分析：德邻兄一旦退选，孙科和程潜为自证清白，肯定也会步此后尘。三人一齐退选，选举便流产了。如此，蒋介石绝不会坐视不管，只得减轻压力恢复竞选秩序，则德邻兄必然当选。

25日上午，李宗仁致函国大主席团宣称：“唯迩来忽发觉有人以党之名义压迫统制，使各代表无法行使其自由投票之职权，以此情形竞选，已失去其意义。用特函达，正式声明放弃竞选。”

李宗仁退选，会场和坊间舆论大哗。支持李宗仁者尤其是东北代表无不义愤填膺，认为最高当局操纵选举，破坏民主，孙科当选也无脸见人。孙科只好以“没有对手来做竞选是不民主的”理由退选，程潜当日跟进。国大代表群情激愤，纷纷质问李宗仁、程潜为何退选。有人高呼“打倒CC”，还有人向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的于右任喊话：“要于老担任副总统！”人财两乏“完全以地位和声望作资本”的光杆元老于右任，在六名候选人中实力最弱，为加持选情只好使出看家本领，购得数千张宣纸彻夜挥毫写对子送代表拉票。于右任首轮惨败本已够沮丧，此刻痛睹会场乱象，禁不住老泪纵横。许多国大代表也因“国家将分裂而痛哭”。不得已，国民大会只好通过临时休会动议延期再选。

李宗仁一招“急流勇退”，令蒋介石无计可施，孙科助选团队也霎时藏锋敛锷。蒋介石只好找到白崇禧说：“北伐和抗战两个时期，因有你和德邻帮助而获最后

胜利。今天这个局面，仍需要你们支持。你去劝劝德邻，让他继续参选，我一定支持他。”

白崇禧对李宗仁说蒋信誓旦旦表示支持他参选，黄绍竑只是微笑。李宗仁沉吟有顷，答应取消弃选行动，但说：“总不能私相授受，要由主席团出来转圜才行。”至此，李宗仁已完全占据政治主动。对蒋介石不满的人，大都站到他这边来了。

4月28日决胜选战，蒋介石亲自指挥，蒋经国在南京中央饭店支摊，为孙科竞选兜底。国民大会恢复投票后，李宗仁票数依然领先，孙科得票明显落后，程潜得票居三，依法退出。29日，国民大会经四轮投票，李宗仁最终以一千四百三十八票超过孙科的一千二百九十五票，当选中华民国副总统。

>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执笔：《李宗仁回忆录》下卷，第21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1月第1版。

决胜的第四轮投票开始，蒋介石在官邸紧张地收听电台实时播报。当听到李宗仁得票超过半数，依法当选中华民国副总统时，蒋介石怒火中烧，一脚踢翻收音机，抄起手杖和披风即令备车。蒋介石上车后，侍从问：“委员长，车去哪里？”蒋介石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司机想到蒋介石烦躁时常去中山陵，乃驱车前往。刚驶上陵园道路，蒋介石便高叫：“掉转头，掉转头！”司机开车回到黄埔路官邸，蒋介石下车后复又上车，再命出车。车行至中山陵，蒋介石又喊“掉转头”，回到官邸即令开往汤山……

选举当天，蒋介石忧悔交织写下日记：“竞选副总统之各人浪费金钱，政治风气与革命道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药。尤其桂系之各种卑鄙手段，苦笑谄胁，无所不至。自副总统选出以后，固有之四维八德，扫地以尽，不胜为国家民族前途忧焉。”

5月20日为正、副总统就职日。李宗仁通过侍从室向蒋介石请示，就职典礼时如何着装？答复为穿西装大礼服。李宗仁颇为疑惑：蒋先生素喜提倡民族精神，何以决定这次穿西装呢？不过还是夤夜联系上海有名的西服店，赶制了一套高冠硬领燕尾服。就职前夕，侍从室又传蒋介石手谕，着军常服。李宗仁只得遵命。就职典礼那天，礼炮响过，赞礼官恭请正、副总统就位。蒋介石长袍马褂登台，而紧随其后的李宗仁一身戎装，活像个毕恭毕敬的卫士。在满场文武官员和各国使节眷属燕尾高冠、钗光鬓影映衬下，着装不搭调至近乎滑稽的民国当选正、副总统，成了中外来宾猜不透的谜。李宗仁知道这是蒋介石有意让他难堪，心中暗忖，总统以一国元首之尊，尚且容不下副手一次得体适度的着装，面对非常岁月的惊涛骇浪，谈何生死与共、共克时艰呢？

1946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延安为南京召开的“制宪国大”预言：“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

李宗仁不知，就在他为就职典礼着装出丑念兹在兹时，一场杀身之祸已经临头。11月下旬的一天，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按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急电要求火速抵京后，毛人凤便赶到他下榻的保密局招待所，告诉他说，这次是总统亲自点将。这项任务原拟选派保密局专门主管暗杀业务的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担任，但总统听说叶是文人出身，只会动笔而不能亲自动手杀人，连说不妥，指定要沈醉这个老手去主持完成这项任务。

毛人凤和沈醉乘车到中央军校蒋介石住处请见，蒋介石笑望着沈醉，颇为和气地问：“毛局长告诉你到南京的任务没有？”沈醉点头回答后，蒋介石又关切地问起他的家庭情况，语重心长地说：“这次叫你主持这项事关整个大局的工作，是我对你的信任和重托。共产党迟早总可以打败，而内部的捣乱比共产党更难对付。所以，只有采取这个办法，才能使内部统一起来，一致对外。”

蒋介石说：“共产党只有一个敌人，故能打胜仗。我们却有两三个敌人，几方面应对，困难就大得多。”他叮嘱沈醉，此举关系党国安危，绝不能外泄。要从速布置，只等他做出最后决定，便要坚决完成使命。他还列举史上“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专诸、要离、聂政等著名刺客，勉励沈醉为党国建立不世之功。

谈话约半个小时，蒋介石始终没点破暗杀对象是谁。沈醉知道蒋的潜规则，军统局替他暗杀了那么多人，从未见他写过一张指令。最后，他抓着沈醉的手对毛人凤说：“这是我们最忠实勇敢的好同志，如他工作、生活上有困难，你要尽力帮助解决。”

次日上午，毛人凤、沈醉等人密商成立“特别行动组”，人员分为暗杀、监视两部分。一周后，一个周密的刺杀行动计划出笼。

李宗仁官邸位于市中心鼓楼附近傅厚岗，门前路窄且有拐弯，汽车出入均须减速，故从东、西两个方向都便于下手。“特别行动组”在李府附近马路拐弯处设一旧书摊，以便监视李宗仁行踪。为防止李宗仁突然逃离南京，毛人凤组织设计了陆上、空中截击方案，在通往机场的街上开了小卖店，内有电话直通保密局，发现李宗仁去机场可直报毛人凤，毛则通知两架随时待命起飞的战机尾随李专机，一俟其飞离南京上空就行击落，对外称飞机失事。在火车站设香烟铺，在东郊汤山附近公路上设小饭馆，一旦发现李的行踪即发警报，枕戈待旦的刺杀小组可于第一时间中途截杀。

杨波：《横渡长江》，第30—32页，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3月第1版。

毛人凤向蒋介石汇报刺杀计划后，蒋连声说好：“白崇禧两次致电叫我下野，美国人还和他们勾结起来。如果让李宗仁离开南京，他一定会到武汉拥兵自重。因此，在南京以外任何地方采取行动，都无需向我请示。如果他在南京哪也不去，你们也要按兵不动，不能因小失大，不能让我蒋某人为其他人留下口实。”

此后一段时间，李宗仁一直待在南京，深居简出。沈醉等人辛勤蹲守却始终不能得手，只得沮丧地向毛人凤禀报。很快，毛人凤向他们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取消暗杀行动。

一场注定要震惊中外的暗杀为何戛然而止？原来，三大战役结束后，来日无多的蒋介石发现了李宗仁的新价值。自己下野后，李宗仁可代理总统与中共周旋，暗杀计划遂无疾而终。

1948年12月3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反省”云：“本年最大之失败为政治，而政治失败之总因即在选举副总统。”

1966年，李宗仁看到沈醉写的《蒋介石准备杀李宗仁的阴谋》，后怕不已。联想归国时台湾特务一路追杀，不由仰天长叹：与蒋介石打了大半辈子交道，其心肠之歹毒还是超出想象！

（六）历史在城南庄拐弯1948

年3月24日，毛泽东东渡黄河翌日，抵达中央后委驻地山西临县双塔村，同杨尚昆等人晤面。摆脱了胡宗南围追堵截后，毛泽东有条件从容描绘攀越解放战争大山新的战略图景：

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这六十个月又分成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个月我们是“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了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作“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

毛泽东是在解放战争“前三十个月”时逾三分之二，战争形势仍在“爬坡”，但已“过坳”，快要“到顶”时离陕入晋的。

26日，毛泽东抵晋绥解放区贺龙、李井泉驻地兴县蔡家崖，在此调研八天。之后经岢岚，至神池，抵代县，过雁门关，4月7日到繁峙，赴五台山被雪阻于伯强村。11日，毛泽东冒雪过五台山，经风疾云驰的鸿门岩，夜宿台怀镇塔院寺，翌日跨越长城岭，到达河北省阜平县西下关村，宿于一个植有千年楸树的小院。

龙泉关为长城上的一个重要关隘，在五台山东南六十里，东距阜平县七十里。

一路鞍马劳顿，古道热肠的阜平人宰了一口猪，用猪肉炖萝卜粉条和烙饼款待客人。聂荣臻回忆，初识晋察冀的毛泽东感慨说：“一过龙泉关[注]，觉得群众很热情，就好像当年在江西到了兴国一样，群众都是笑逐颜开。”当晚开会议定，毛泽东到阜平晋察冀军区驻地城南庄后暂住，做访问苏联准备，周恩来、任弼时去西柏坡与中工委会合。13日晚，毛泽东由聂荣臻陪同安抵城南庄。

晋察冀军区大院在城南庄村东菩萨岭前。早在1937年11月，聂荣臻率第一一五师一部从山西五台开赴阜平，创立了党在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他回忆，1947年秋，军区在城南庄盖了五栋简陋房，形成一个小院，并在小院的后山根挖了防空洞。聂住的那栋房子，里外两间，外间办公，里间住宿。聂把其住的两间房子腾出来给毛泽东居住，自己则搬到隔壁空着的那间房子。作战科搬出小院，安排给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胡乔木等同志居住。

此后十天，毛泽东与周恩来多次听聂荣臻等汇报，任弼时则与区县干部座谈。23日，周恩来、任弼时等前往西柏坡。

毛泽东暂留城南庄，拟率一个精干代表团，驱车经内蒙古抵外蒙，乘苏联飞机去莫斯科。1947年初，毛泽东动议访苏未果。这次，毛泽东打算就解放战争一些重大问题同斯大林商量。他对叶子龙说：“太阳出来了，我要同斯大林同志谈谈东方日出的问题。”

4月26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拟提早赴苏，如苏方同意，计划在苏考察有关军事、经济、政府及政党等问题，并顺访东欧和东南欧，以便研究他们的人民战线等工作。29日，斯大林回电同意，5月10日又电毛泽东：鉴于您行经的几个地区事态可能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傅作义部开始进攻蔚县，我们担心，您的出访是否会影响事态的发展，而且您的旅程是否有安全保障。据此，您是否应把来访往后延缓一下。当天，毛泽东致电斯大林，鉴于目前形势，把我到你们那里去的日程往后挪一小段时间是合适的。

毛泽东访苏未能成行，一个改写战争进程的拐点却不期而至。

4月18日，毛泽东到城南庄第五天，案头出现了粟裕近三千字的长电。毛泽东阅电思人，眼前闪过井冈山时期那个面容清癯、眼窝微陷的警卫连长的影子。1929年10月，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前往漳州养病，协助指导闽西地方工作，红四军三连连长粟裕带兵随卫。人生低谷的平视，使毛泽东对粟裕的忠诚、机警、细心、缜密，留下深刻印象。毛泽东曾当面问粟裕：“你是少数民族吧？是不是苗族？”

粟裕回答说：“我们家是汉族。”1986年，经粟裕家乡湖南会同县政府调查，确认粟裕祖上是侗族。二十年烽火砥砺，当年初出茅庐的警卫连长，已步入中国革命战略殿堂。

粟裕以个人名义发“中工委并请转中央军委”电，说明此电系经陈毅同意并“鼓励勇气”“斗胆直陈”。4月16日，粟裕就渡江南进专电刘伯承、邓小平，文末不无恭敬写道：“请钧座予指正。”

同为前敌掌兵人，刘伯承、邓小平与粟裕的心是相通的。4月18日，粟裕发出“卯巧电”当天，刘邓给中央军委并陈粟发电：“照现在的情况看来，我们担心的是过江很少把握。”“如果过江与自身准备尚不充分，则以迟出几个月为好（先派多支小部队去）……如果粟部迟出，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半后方作战情况下多歼灭些敌人，而后再出，亦属稳妥，亦可打开中原战局。”

刘邓从粟裕建言，看到了中原破局转机，召集陈士榘、唐亮、陈赓谋划作战，已把“粟部迟出”作为“掌握主动”最重要的变量：“敌目前在淮河以北机动作战者为九个师，而我方野战部队为二十万人，如果粟兵团加入中原作战则为二十八万人，实力可大大超过敌人。如能寻机歼敌两三个师，即可完全掌握主动。”

刘邓驰电挺粟，这枚砝码，对影响战略决策有足够分量。

李先念在城南庄也给毛泽东分析：“如果不集中兵力歼灭敌人几个正规师，想过长江也过不去，即使过去了，也难以扎根……”

此行太行，粟裕同司机轮流开车，歇人不歇马。粟裕历来要求身边人员懂指挥，掌握骑马、游泳、开车技能，并以身作则。一路上他牵挂于心的是，“卯巧电”是否会干扰中央军委决心？

粟裕为连电建言不无忐忑时，统帅部正处于重大战略抉择十字路口。3月10日，毛泽东在杨家沟致电刘少奇：“我们拟于3月20日动身东移，约于4月15日左右可到你处，届时拟约粟裕一商行动计划。”毛泽东注意到，粟裕“卯巧电”征得了陈毅的同意。刘邓来电也支持粟裕建议。中原诸将众口一词建言歼敌江北而不主张分兵南进，粟裕直言一兵团进军闽浙赣边，不会调动中原蒋军四个主力师（军）回防江南，这不能不令原指望以此吸引蒋军二三十个旅回防江南的毛泽东，重新思考南线战略进攻部署。

4月25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告知中央书记处会议第六议题是“陈粟兵团的行动问题及其他问题”，要求对拟研究的各问题先作大概的讨论，然后再到城南庄商定。

29日，陈毅、粟裕风尘仆仆抵达西柏坡。次日，两人即同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径赴城南庄，向毛泽东报到。

毛泽东待客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凡党内同志上门，概不出门相迎。卫士长李银桥回忆，毛泽东两次打破这个规矩，一次是为迎接从苏联疗伤归来的林彪，另一次是1948年4月底迎接粟裕。

粟裕来到时，毛泽东破例出门迎接，一见面就握着他的手喊道：“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欢迎你，粟裕同志！”毛泽东端详着粟裕，动情说道：“十七年了啊，我们有十七年没见面了吧？”

粟裕上次见毛泽东，还是1931年调任红四军参谋长前。他双眸闪着喜悦的光，兴奋地说：“是啊，十七年没见了！主席好吧？”

毛泽东朗声笑道：“你们打了那么多漂亮的大胜仗，我们很高兴啊！这次要好好听听你的意见。”

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粟裕，率八百勇士在江西怀玉山突围后，部队改编为红军挺进师。3月1日晨，粟裕指挥一支队在上饶石溪迎击铅山石塘街靖卫团，师里唯一一部电台被打坏，从此与上级失去联系。1936年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与中共中央恢复联系，毛泽东即电询粟裕情况。临时省委寻访无果，报告“粟裕同志可能已经牺牲”。毛泽东闻讯哀痛不已。1937年5月，陕北开会悼念烈士，毛泽东特嘱加上粟裕的名字。1938年初，闽浙边临时省委告诉项英，粟裕已回省委，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即电告党中央“粟裕还在”，毛泽东非常高兴。3月，粟裕率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加入新四军，新的传奇便竞相呈现。毛泽东十分欣赏粟裕远大的战略眼光和独特的战役运筹，亲拟电报推广苏中作战经验。朱德说：“粟裕是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楷模。他在苏中战役中消灭的敌人比他自己的兵力还多。”

粟裕到城南庄前，陈毅提醒他，毛主席是个深谋远虑的战略家，对重大问题不考虑成熟不会轻易表态，也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意见。对渡江问题能采纳我们意见更好，不采纳就按主席意见办。粟裕点头称是，但还是想让主席充分了解自己的想法。

粟裕前去拜见聂荣臻，征求他的意见。聂荣臻对粟裕是刮目相看的。他想起毛泽东曾对他说，解放战争和抗日战争不一样，抗日战争是国共合作打日本，是持久战；解放战争是打蒋介石，战争进行得越快越好，拖久了对我们不利。粟裕到来，使他体察到华野先遣兵团主帅遵命南进，势必遭敌合击伤亡大，恐难实现中

央军委战略意图，而不过江又违背统帅部战略部署，主席能否同意？聂荣臻稍加斟酌，对粟裕说：“这件事得你自己向主席讲。”

聂荣臻把粟裕送到毛泽东住处便告辞。毛泽东请粟裕坐下，点燃了一支烟。警卫员给粟裕沏茶后，毛泽东请粟裕向华野第一、四、六纵司令员叶飞、陶勇、王必成问好，笑望远道而来的爱将说：“粟裕啊，你千里迢迢从河南来太行，一定有许多话要说。”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由此声名大彰，此后人们一直习称他为陈军长。

粟裕呷口茶水，单刀直入说：“接到主席和军委预令后，陈军长召集我们反复研究，觉得主席考虑得非常深远，非常细致……”

“谈谈你们的不同意见吧！”毛泽东期待粟裕的未尽之言。

粟裕说：“主席要我们一兵团渡江南进，吸引江北敌军回师江南，这对中原、华东乃至全国各战场，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温馨、宁谧的春夜，唳空而过的布谷鸟，划破了夜太行神秘的帷幔。玻璃罩子油灯旁，毛泽东静静听粟裕陈述己见。

“但这样做，也有不确定因素。”粟裕见毛泽东眼中满是鼓励，继续说道，“第一，国民党在苏北兵力虽然不多，但在豫东、鲁西、淮北、黄河以南，实力还很强。长江以南，是蒋介石老窝，那里集中了白崇禧、汤恩伯等部七十万大军，这些在国民党来说是精锐之师。第二，若我一、四、六纵十万余人南渡，必然会遇到江北、江南之敌顽强抗击，经激战也许能过江，但损失将是很大的。而江南的天目山、茅山等地虽是老根据地，但近年来受国民党控制、破坏，革命力量已很薄弱；那里是山区，经济并不发达，十余万部队吃住一时可以，时间长了不行。第三，一兵团过江作战，一路将受国民党军和土匪武装袭扰，江北兵力减弱后，若苏北、鲁南、豫东之敌一齐南压，我华野二、三兵团恐难抵挡，必然南撤，而苏北一马平川，又有长江阻挡，我军将会受到很大损失。这样，整个华野就会处于分散挨打态势，很是不利。我们预计，东北、华北解放还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如果华野部队损失一半甚至过半，我们就很难再整合力量在中原打大的歼灭战……”

粟裕正条分缕析详陈南进可能遇到的不测，却见毛泽东从座椅上站了起来，眉头微蹙，慢慢踱到屋子北侧。

主席对一再建议缓出江南不耐烦了？粟裕心头一紧，却见毛泽东双手轻轻推开了窗户。漫天繁星下，夜太行山花的清香扑面涌来。毛泽东呼吸着窗外的新鲜空气，复又点燃香烟，在帆布躺椅前坐下，缓缓仰在椅背上，眯着眼睛吸了一口烟。

这把躺椅，与柳木棍、补丁袄被称作毛泽东转战陕北的“三件宝”，东渡黄河后依然须臾不离左右。多少风晨雨夕，戎马倥偬的毛泽东抽暇在椅上小憩，立刻反劳为逸，神清气爽。现在，这把曾为马背上的神来之笔赋能的椅子，正酝酿着新的战略调整。

在太行之春，一个鲜明的趋势在毛泽东眼前闪现。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淬炼与锻打，我军在自卫战争中已将游击战迅速转向运动战、阵地战，在逆势发展中日益成为战场主宰。毛泽东欣喜地看到，在人民解放军蜕故孳新的战略进攻中，随着大中型野战兵团组建和兵种增多，我军在广阔战场上实施机动作战，作战规模空前扩大，既有兵团、野战军规模的战役，也有两个以上野战军联合进行的战略性战役。作战样式除了常见的运动战外，还有夺取大中城市和战略要点的攻坚战，以及远距离的追歼战。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与抗战时期我军力量规模有限、遂行战役不多，主要进行以敌后游击战为主的中小型战斗，已有很大不同。显然，破解国民党军密集靠拢、连环攻防新策略，超常集中兵力，已成战略制胜的要害和关键。

“说下去，继续说下去！”毛泽东从沉思中转过神来，在烟灰缸里将烟蒂摁灭，接着又燃起一支烟，深吸一口说，“刚才你只讲了过江可能出现的情况。那么，不过江，你们又有什么考虑？”

> 中共阜平县委宣传部编著：《老区阜平红故事》，第14—1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高明乡主编：《阜平县志》，第47—48页，方志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

粟裕揩去额头细密的汗珠说：“当务之急是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几个大仗，歼灭蒋军主力于江北。”他要言不烦，扼要汇报了四点：敌在中原地区集结重兵包袱背得重、兵力易分散，利于我运动歼敌；中原铁路公路为我破坏后，重装之敌机动困难，我发挥徒步行军优势可快速集中兵力速战速决；中原黄淮虽属外线，但背靠山东和晋冀鲁豫老解放区，粮弹供给和伤员安置可保无虞；我三路大军经略中原，新解放区已初具支援战争能力。粟裕满怀信心说：“如能将中原蒋军消灭过半，就等于把蒋介石肚皮捅烂，对东北、华北、西北是个有力策应。等时机成熟，再打过长江去！”

粟裕将数月所思和盘托出后，如释重负。再次擦汗时，他瞥见了毛泽东脸上的笑容。统帅意蕴深长的回应，令粟裕为之一动。

在毛泽东的战略时空中，1948年之长江，无疑是战略博弈新的进攻出发地线。与直出大别山相呼应，精兵驰骋江南，在国民党战略纵深翻江倒海，是渡江南进魅力所在。当战略进攻使全盘皆活，中国革命翻山过坳，长江已成收京入沪可眺望的最后一道门槛时，粟裕所言在中原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时机，的确已初露端倪。较之分兵跃进江南蕴含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三军合力经营中原，寻机打大歼灭战廓清江淮、饮马长江，前景似更明朗可期。毛泽东当面听粟裕优化南线战略之道，显然完成了又一次调整。

“好你个粟裕啊，你是遵义会议后第一个敢抗我命的人！”毛泽东欣喜地看着粟裕，爽朗的笑声如春江放排，从斗室一泻而出。他走出有外廊的平房，在大榆树下与粟裕握别，目送他走出老远。

春深似海。粟裕徜徉太行山谷，漫山遍野的芳林修木新叶初绽，清香袭人；举目仰望苍穹，但见星汉灿烂，辉映人间。

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城南庄召开全体扩大会议，统称城南庄会议。这是撤离延安后，中央五大书记首次共同出席的一次中央会议。陈毅、粟裕、彭真、薄一波、聂荣臻、李先念等列席会议。毛泽东提出的“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三条方针，成为会议各项议题的总指导。

“军队向前进”，研究的是如何把战争引向国民党深远后方。4月30日，城南庄会议开始第一天，首先讨论了“陈粟兵团的行动问题”。粟裕汇报了中原战场形势变化，介绍了之前发电未谈及的鲁西南及河南地区敌兵力部署情况，着重汇报了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的方案，详细说明了提出这个方案的根据。五大书记经讨论研究，决定在既定战略方针不变的前提下，华野三个纵队暂缓渡江南进，先加入中原作战，粉碎敌在中原防御体系，尽可能在中原黄淮地区多歼灭敌人主力，然后再进军江南。后来的史家认为，粟裕的建议，“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构成了以后淮海战役的最初蓝图”。

> 《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307—30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中央书记处采纳了粟裕暂不渡江南进建议，5月3日会议深入讨论后反复强调，渡江南进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一）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地区无疑会有很大困难，打出去的主力会减弱，打不了很多胜仗，但无此一条不能战胜国民党。打出去以后，敌我都到蒋管区去吃，不能依赖后方，后方

要尽量供给前方。（二）我一方面为胜利欣喜，一方面担心人民负担不起。要使后方农业、工业长一寸。土地改革、整党、开人民代表会议，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生产。为了发展生产，人民的负担要适当减轻。（三）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缩小地方权力。[注]

对社会运行规律的深刻认知，对历史发展前景的主动营造，中国共产党人以民主集中制永葆党的先进性，开掘了生生不已的历史自觉之源。城南庄善纳群智、积优升华的科学民主决策模式，与蒋介石独断专行的“官邸作战会报”制度，形成鲜明反差。白崇禧认为，长期以来，蒋介石始终把军队紧抓自己手中，绝不假手于人，建立了一套“官邸作战会报”制度，即每天早晚在黄埔路官邸地图室举行两次“官邸作战会报”，由侍参人员根据他的指示草拟电令指挥作战，这是对共军作战屡屡失利的主要原因。

5月5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邓并华东局电：

>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第459—46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逐一解决，正如去年秋季以后将战争引向江淮河汉，使山东、苏北、豫北、晋南、陕北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解决一样，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惟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道路，即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汴徐线南北地区，以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在此期内，由该兵团派出十个营，附以地方干部，陆续先遣渡江，分布广大地区，发展游击战争。以上计划，是我们和陈、粟及一波、先念所商定者。粟裕兵团……约于本月底渡河作战。陈、唐所率三、八两纵应回至豫皖苏区，调换一纵西去，以便该兵团有一、三、四、六、八及十一等六个纵队集结打大仗……本月内请刘、邓命一纵、十一纵在汴徐以南适当地点休整，待粟裕命令，月底协同作战。当粟裕打五军等部时，许谭兵团应向津浦线行动，相机歼灭并钳制十二师、七十五师、八十四师、七十三师等部。其动作时间，应在本月下旬，请华东局令知许、谭准备。同时，令知韦陈兵团，在苏北发起歼敌战役，配合动作。粟裕兵团的供应，由华北山东两方统筹。[注]

就在蒋介石集团为权力分配生死缠斗之际，中共中央于太行腹地因时而动调整南线战略，启动了解放战争弯道超车夺取全国胜利的加速器。

那一年，毛泽东五十五岁，刘少奇五十岁，周恩来五十岁，朱德六十二岁，任弼时四十四岁，毋庸置疑，一个深谙历史与现实、年富力强并成功创造中国马克思

主义的领袖集团已炉火纯青。

那一年，陈毅四十七岁，粟裕四十一岁，刘伯承五十六岁，邓小平四十四岁，李先念三十九岁，一众骁将久经沙场百炼成钢。

中国共产党人不是一团和气的江湖同仁，他们目标一致，有着百川归海的强大凝聚力；但又和而不同，在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制度下保持着各自独立的思考。为了早日夺取革命胜利，他们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完善决策，为党和人民利益最大化不断求得新共识，并同心协力为之奋斗。这是党的宗旨和制度的优势所在。

那时候，中央书记处书记朱德等领导同志，都习惯于管中央领导核心毛泽东叫“老毛”。那时候，毛泽东在延安讲话，口渴难耐的陈赓瞥见毛泽东讲台上有一只水杯，便大步走上台去，端起毛泽东的水杯畅饮几口，擦擦嘴回到台下继续听毛泽东讲话。

暂不过江是为了日后千帆竞发大举过江。历史证明，永载史册的城南庄会议，作为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军事委员会发扬民主的典范，无可争议成为加快解放战争胜利进程的拐点。中共七大后第一个全盛期谱写的城南庄佳话，彪炳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册。在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烽火岁月，对党、对人民、对胜利负责，有时体现在对上级指示基于逆向思维的完善优化上。毛泽东和他的爱将创造的千秋佳话，令人信服地展现了中共决策领导机制的成熟。

华野一兵团暂不向江南机动，得到其他战略方向认同。

> 胡石言、吴克斌、罗英才、胡松植、何晓鲁、铁竹伟等著：《陈毅传》，第41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5月21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谈及全国各战场时说，从目前情况看，粟裕部按原计划渡江问题值得考虑。不如先不渡江，而集中五六个纵队出中原作战以求打开豫鄂皖局面。[注]

中央军委决定粟裕兵团迟出江南，并赋予其在中原地区“歼灭五军（即整编第五师）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的作战任务，歼敌数量上限为十万人，相当于先前拟南进三个纵队的兵力。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对各野战军歼敌数量实行目标管理，有时还发动野战军之间展开杀敌竞赛，压担子时对粟裕也格外青睐，制定歼敌目标力求“跳一跳，能够到”。1947年1月11日，毛泽东致电东北民主联军主帅林彪，要求他们“平均每月歼敌一个师（相当于关内一个旅），一年歼敌十二个师以上”。而此前1946年8月15日，毛泽东已要求仅指挥三万部队的华中野战军主帅粟裕，“能在今后一个月内再打二三个胜仗，继续歼敌二三个旅”了。粟裕建言实则是给中央军委立了军令状，他的肩头像是搁了一座山。

历史华章常在寻常处落笔。这个春天，太行小村城南庄的神奇杠杆，撬动历史在这里拐了弯。解放战争来到了新的转折点。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第46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31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统帅部令出计从，悉心为战略调整到位协调力量。5月7日，毛泽东电示许世友、谭震林并华东局：“粟兵团渡江目前尚有困难，决定在运河以西、淮河以北地区歼灭几批敌人再行南进。你们有协助他们作战并供给弹药及新兵之任务。”[注]11日，毛泽东再电刘伯承、邓小平：“请即令陈（士榘）、唐（亮）率三、八两纵迅速东进，直达汴徐线附近，接受粟裕指挥，协力歼击五军。”[注]

1948年5月31日，粟裕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从第一、四、六纵队各抽调千余人组成渡江先遣队，孙仲德任司令员，谭启龙任政治委员，饶守坤任副司令员，进入淮南拟先行南渡开展游击战争。

朱楹、温镜湖、熊铮彦、杜魁元著：《粟裕传》，第67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1950年，粟裕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汇报工作，周恩来要总参作战部部长李涛一起陪粟裕吃饭。谈起当年建言暂不渡江，李涛说，你那次的建议是对的。如果不是这样，派几万人到敌人后方去，要站不住脚。所以，中央同意了。粟裕说，当时有两种意见。我考虑，与其带几万人去江南，不如在中原打。[注]

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说：“粟裕同志富有战略远见，敢于和善于从实际出发，对重大问题进行独立思考，适时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战略性建议，为军委和毛主席进行正确的战略决策，推动战争全局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城南庄佳话没有休止符。在战略进攻惊涛裂岸的日日夜夜，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活的灵魂无处不在。引颈回望城南庄这所通往胜利的驿站，党和军队的许多美好回忆，都可以从这里唤起。

师哲口述，李海文著：《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265页，九州出版社2015年2月第1版。

1948年5月16日清晨，一架国民党侦察机突然飞临城南庄。聂荣臻闻声出屋察看，见敌机正在盘旋，判断敌轰炸机必接踵而至，遂报告刚服过安眠药更衣上床的毛

泽东转移隐蔽。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说：“炸弹扔下来，弹片正好打几把菜刀。”聂荣臻急得眼里冒火，命人找来担架，抬着毛泽东进入房后菩萨岭防空洞。敌机在军区大院投下四颗炸弹，一颗在毛泽东房前爆炸，削掉老榆树一根硕壮的枝干，将室内物品炸得稀烂，另一颗落在屋后未爆炸。这次意外，导致毛泽东从居留三十三天的城南庄转至花山村，在那里住了十天。在花山村，毛泽东和随员目睹了国民党飞机对晋察冀军区大院的狂轰滥炸。[注]1949年4月大同和平解放后，从敌伪档案中发现，轰炸城南庄系隐藏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烟厂的国民党特务孟宪德，伙同被收买的军区司令部司务长刘从文密报所致。经华北军区政治部临时法庭审判，孟、刘二犯伏法。

1948年5月27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前往西柏坡，与中共中央工委、后委及先期到达的周恩来、任弼时会合。

西柏坡地处太行东麓，直面华北平原，因林茂粮丰被聂荣臻誉为“晋察冀的乌克兰”。毛泽东移驻西柏坡，标志着一分为三的中共中央机关重新合为一体，成为中国革命走向全国胜利的鲜明信号。

为庆贺中央“三委”胜利会合，一个动议在悄悄酝酿。警卫排长阎长林向毛泽东报告说：“主席，为庆祝中央机关大团圆，周末晚上要组织一个舞会，大家都希望主席能参加。”

“好嘛，我也想去看看机关的同志们。”毛泽东高兴地说。

毛泽东参加首次周末舞会，消息春风般传遍中央机关。西柏坡打谷场像过节一样，周围房屋和树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旗帜。

6月5日晚，天刚擦黑，机关工作人员就相继来到汽灯高照的打谷场。乐队奏响了欢快的舞曲，可毛泽东和周恩来还没到场，大家有些焦急起来。刚好毛泽东秘书叶子龙在场，性急的年轻人纷纷催促他再去请一下主席。叶子龙笑笑说：“我先派我的‘小兵’去请主席，他们请不来，我再去。”叶子龙的“小兵”，基本阵容有毛泽东的女儿李讷，还有自己的孩子二娃和燕燕。

得令而去的“小兵”跑进毛泽东住室，连推带拖把他拉出屋。

“我去！”毛泽东笑谓三个顽童，“娃娃，等我一会儿好吗？”

“休息休息吧，主席！”叶子龙走上前来说，“朱总司令他们都等你呢，撤离延安到河东来的同志说，有一年多没见你了，大伙儿都挺想你的。今天来的人特别多，村里的老乡们也来了！”

“好吧，今天我听你们指挥！”毛泽东说着，信步走向打谷场。

在解放战争形势如河出潼关豁然开朗之际，延安气氛热烈、上下同乐的周末舞会重现西柏坡，是一个非同寻常而又寓意颇丰的标志。走过峰回路转，迎来柳暗花明，撤离延安一年多来的艰辛、压抑和担忧，在欢快热烈的舞曲中随风飘散。

胜利前夜迷人的太行风景，成为西柏坡人永久的记忆。

（七）华东陈毅走马中原1948

年4月25日晚，陈毅、粟裕奉命星夜急赴城南庄，那时陈毅尚不知道，此次毛泽东一定要他与会，与他工作调动有关。

> 胡石言、吴克斌、罗英才、胡松植、何晓鲁、铁竹伟等著：《陈毅传》，第415—41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2月间，刘伯承、邓小平鉴于中原财经问题严重，“对今后大军供应已无办法。而沙河北岸已有灾民二百余万”。解放区发行的钞票与法币比值不断下降，如不解决，“军队供应与人民生活均将产生严重危机”，“建议邓子恢同志统一主持中原各区首先是三部分野战军的财经事宜”，4月2日，刘邓再电中共中央并陈粟：“仍切望子恢同志来加强中原局领导，主持地方工作和财经工作。”注

华东局副书记邓子恢，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经济部长，是兼资文武、熟稔财经和土改的一员大将。

> 胡石言、吴克斌、罗英才、胡松植、何晓鲁、铁竹伟等著：《陈毅传》，第415—41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刘邓获悉陈毅支持粟裕向上建言，4月20日再电中共中央，坦言中原局领导力量极嫌薄弱，三部分野战军在二十万人以上，如粟裕迟出则达三十万，建议以陈毅为中原局第一副书记，组织中原军区，对陈毅到中原担任的军职，电报提出三个方案：一、以陈毅为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中原野战军司令员；二、陈毅为军区与野战军第二政委；三、陈毅作军区第二政委兼野战军政委。刘邓建议，“不管哪种形式，陈毅同志华野职务不变”。注

> 薄指薄一波，李指李先念。
> 胡石言、吴克斌、罗英才、胡松植、何晓鲁、铁竹伟等著：《陈毅传》，第415—41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毛泽东接电后批示：“朱、刘、周与陈、粟、薄、李商复。”[注]中共中央电告刘伯承、邓小平：“陈、粟二人日内可到阜平和我们会商行动问题及你们提出的中原机构组织问题。”[注]

胡石言、吴克斌、罗英才、胡松植、何晓鲁、铁竹伟等著：《陈毅传》，第415—41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5月5日，刘邓三电中共中央：中原局面太大，情况复杂。现在中原局的能力实难胜任，建议请彭真同志任第一书记，陈毅、小平分任第二、第三书记；陈毅兼军区第二司令员兼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如暂留中原，则兼军区副司令员及野战军司令员。[注]

中共中央经慎重考虑，敲定了中原局班子配备。5月7日，毛泽东对粟裕说，陈毅同志不回华野去了,今后华野就由你来搞。

粟裕愣住了。他无法想象，一旦有兄长之风的陈毅抽身而去，华野将如何？自抗战以来，陈粟在南北转战中已结成“陈不离粟、粟不离陈”的共同体。有陈毅这个后盾和靠山，粟裕才能心无旁骛专司战役指挥。华东雄师素来藏龙卧虎，每当战局扑朔迷离、战况一波三折时，偶有桀骜将领“尥蹶子”，陈毅便一声令下：“粟副司令员的指示就是我的意见，服从命令，执行！”一场风波霎时云收雨散。眼下，歼敌江北压倒一切，华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陈军长主持大局。粟裕由衷恳求：“华东离不开陈军长！”

毛泽东沉吟道,中央已经决定了，陈毅和邓子恢到中原工作。

粟裕见米已成粥，提出保留陈毅华野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职务。

粟裕二让司令的高风亮节与坦荡无私，令毛泽东感慨不已。

1945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复电华中局，“同意粟裕留任华中任司令员”。14日，粟裕看到中共中央关于自己任苏皖军区司令员、刚从延安返华中的张鼎丞任副司令员的命令，即建议华中局，请党中央任命老首长张鼎丞为司令，自己改任副职。华中局未采纳这一建议，拟向部队批转中共中央任命电。粟裕遂连夜起草电报，向中共中央恳切陈述自己的理由，15日将电报发出。

《新四军·文献（5）》，第37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

中共中央没有采纳粟裕的建议。27日，根据党中央批复，华中局再次宣布苏皖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张鼎丞为副司令”。当天深夜，粟裕再次给中共中央发出请

求改任副职的建议电。29日，中共中央经研究，决定采纳粟裕建议，“以张鼎丞为华中军区（不称苏皖军区）司令，粟裕为副司令并兼华中野战军司令”。[注]

粟裕淡泊名利全局为重的高尚品德，在组建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中产生了良好示范效应。粟裕“一让司令”被传为美谈。

此刻，毛泽东沉思有顷，说道：“那好吧,陈毅同志仍任华野司令员兼政委，但中原那边工作很需要他,现在必须马上去。”

粟裕不再坚持，渴望兑现歼敌江北诺言向党中央汇报。

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决定改变华北、中原解放区辖区范围，明确除华中解放区现辖境地外，凡陇海以南，长江以北，直到川陕边区均属中原解放区。通知确定了中原局、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组成人选：中原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邓子恢分任第二、第三书记。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陈毅、李先念分任第一、第二副司令员，陈毅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

辰弇，5月20日。
胡石言、吴克斌、罗英才、胡松植、何晓鲁、铁竹伟等著：《陈毅传》，第418—42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当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电告刘伯承、邓小平：“会议详情，托陈毅同志面告。陈毅大约于辰弇[注]开完一、四、六纵队团以上干部会后，即将偕同子恢经太岳转往豫西与你们会晤……”[注]

5月11日，朱德在陈毅、粟裕陪同下抵濮阳视察华野，先后听取了叶飞、王必成、陈锐霆汇报，与一兵团师以上干部谈话并参加团以上干部会议。陈毅在会上作了《向朱总司令员学习》的讲话。朱德报告的主题是动员“钓大鱼、打五军”。国民党整编第五军是华野一兵团最强劲对手之一，也是全面内战爆发以来中央军委必欲除之的心腹之患。朱德启发大家，要善于运用“钓鱼”战术，迂回曲折调动和摆布强敌，使其疲于奔命而后围歼之。

总司令亲莅濮阳视察，还影响了一位华野小成员的一生。据粟裕长子、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粟戎生2023年9月12日回忆，当时六岁的他提着饭盒到伙房给爸爸妈妈打饭，在街上碰到一位肤色黝黑、面如方田的爷爷，手拎一管枪，后跟一个小战士。听到树上有鸟的啁啾声，状极威武的爷爷手起枪响，一只鸟应声落地，另一只鸟扑棱一下翅膀，滑落在附近小河中。小战士立刻跑到河边，把鸟捞了起来。小戎生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急忙跑进伙房，气喘吁吁地问炊事班长：“叔叔，

街上那个拿枪的爷爷是谁呀？”“那就是大名鼎鼎的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呀！”半个多世纪以后，粟戎生在集团军和大军区领导岗位，还时常以当年亲眼所见，以及父亲带他和弟弟打枪时，首发便将五十米外的半个乒乓球击碎的事例，教育部队官兵：“他们作为高级指挥员，尚能一枪俩鸟、一弹碎球，我们作为基层战斗员，手中的家伙什不能弹无虚发、百步穿杨，你好意思吗？”

陈毅知道，朱德的濮阳之行，显然有中央高层关注南线两区班子调整的深意所在。陕北归来，中国革命胜利的前景已是晨曦初露。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即任过红军第六军政治委员、第二十二军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的陈毅，抗战国共合作时又降数职低配，任新四军旅级支队司令员。在生死已成寻常事的戎马生涯中，他早已适应了革命需要的进退去留。此次履新既可加强广大区域的领导力量，又利于两大野战军融合，便于由华东选调中原的数千名干部的融入和管理，堪称中原破局的顶层战略预置，何乐而不为！陈毅心中眷恋与期待交织，渴望转向新的战场。

5月18日，朱德结束视察华野离开濮阳前，陈毅将孟良崮战役缴获的张灵甫的一支勃朗宁手枪、一套用飞机铝合金制作的折叠小桌椅送给总司令。朱德一直保存着这套桌椅，直到1976年6月逝世前二十天，才亲笔批示将其捐赠给西柏坡纪念馆。

> 胡石言、吴克斌、罗英才、胡松植、何晓鲁、铁竹伟等著：《陈毅传》，第418—42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中央军委5月21日电示，陈毅、邓子恢要等中央军委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到来，一起研究华野后方机构精简整顿方案后，再行西去。陈毅把华野首克许昌缴获的一件美国舶来品，托杨立三代交周恩来夫妇，并挥毫给“恩来、小超”修书一封：“明日即西去，毫无企图留部队之意，并望将来能随军入川。临行清理行李，有一架很好的收音机，用交流电最好，用电池则太笨（重六十多斤），特托立三同志带上，奉赠此美国新出品，许昌战斗缴获，你们有电灯，利用其开动起来十分好，两夫妇可在屋内跳舞。”

周恩来收到陈毅捎来的信和收音机，感到信中透露的信息需中央掌握，便将信封上“烦代呈周副主席、邓委员启 外一架收音机陈缄”等字画三道斜杠勾掉，在左侧写明“陈毅来信传阅毛刘朱任退周”。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阅信并退回后，信中“毫无企图留部队之意”一句话旁，新添毛笔勾画的一条粗杠。

有了这台收音机，周恩来及时了解国内外动态和信息方便多了。平津战役前，蒋介石和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密谋偷袭石家庄。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就是根据中共北平地下党提供的情报和这台收音机，及时获取信息并采取措施有效应对的。

周恩来将这台收音机从西柏坡带到北京，1960年交养女孙维世保存。1977年4月，西柏坡纪念馆征集这台收音机，中国革命博物馆也欲收藏。邓颖超说，这台收音机是恩来同志在西柏坡用过的，还是给西柏坡吧！当年6月28日，孙维世妹妹孙新世代表邓颖超，将收音机移交西柏坡纪念馆，如今已成国家一级文物。

1948年1月中旬，跃进千里的刘邓大军已创造鄂豫、皖西、桐柏、江汉四个解放区，豫皖苏与大别山连成一片，黄河、汉水、淮河成为解放区内河。3月24日，刘邓分率野战军后指、前指，会合于皖西北临泉。29日，刘邓率主力转出大别山进入淮北，4月底迁驻豫西宝丰，与陈谢和陈唐兵团会合，揭开了统一指挥中原大兵团机动作战序幕。5月，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中原野战军。

5月30日黄昏，陈毅、邓子恢率华东支援中原新解放区的四千七百名干部，由河北馆陶渡口过卫河，经邯郸越太行山抵晋城。陈赓率警卫部队在此迎候。陈毅渡黄河入中原，中野各纵主将齐集洛阳欢迎。正是“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的孟夏，田畴满目金黄，部将热情似火，这不禁使置身中原腹地的儒将心驰神往。陈赓陪同陈毅视察了二十多天前陈谢兵团和华野三、八纵队解放洛阳交战最炽处，汇报了步炮协同攻坚作战战法。

攻克洛阳炮弹消耗甚巨，引发陈毅感慨。联想此行在馆陶渡口为人力绞渡所阻，太行山中又见华北为前线输送粮弹的交通干线崎岖狭窄，遂触发三军在中原打大歼灭战战争经济学思考。他连夜找曾留学日本的邓子恢计议，两人交流酣畅时草成《支前与生产结合经验介绍》一电，联名发给中央军委和华北局。6月14日，陈毅、邓子恢到达中原军区驻地宝丰县商酒务地区皂角树村。

中野首长对陈毅、邓子恢加盟中原盼望已久，刘伯承、邓小平在村外迎候远道而来的陈毅和邓子恢。刘、陈、邓自1945年8月25日从延安乘美国军用飞机抵山西黎城后，即各奔东西。时近两年再度重逢，又从昔日亲密协作的友军，成为一个锅里摸勺子的战友，自是喜不待言，彻夜畅谈至东方泛白。

1948年6月17日起，陈毅给中野首长机关和附近部队团以上干部，传达毛泽东1947年12月以来一系列指示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传达为期三天，是陈毅近年来所作时间最长的一次报告，内容之丰富、全面、生动，令中野广大干部耳目一新，大呼解渴。

> “六六指示”即中原局《关于执行中共中央〈1948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1948年6月6日发出。

陈毅报告中讲得最酣畅、最透彻、最有深度的，是外线作战问题。他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诱敌深入，放敌人到苏区内部来打，绝不只是布阵伏击的战役问题，

而是人民战争性质的战略问题。敌军强过我军，我军必须加上苏区群众的力量，才能压倒敌人的优势。解放战争第一年也是如此，蒋军在数量、装备、技术上优胜于我，我军采取内线作战，使蒋军陷入人民战争的大海，我军以空间换取敌军有生力量，掌握着主动，削弱了蒋军，壮大了自己。他转引毛泽东的话：“有了解放战争第二年战略进攻的伟大胜利，才敢讲夺取全国胜利。”他指出，这是对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作的高度评价。挺进大别山取得的在新区如何建设解放区的全面经验，直到中原局的“六六指示”[注]，对于下一步的战略行动和在全国各地争取作战及建设的胜利，都是无价之宝。

中野广大指挥员回首战略进攻逆转解放战争形势来之不易的局面，觉得自己部队受到的损失，其实从全局来看是“一本万利”，遂由衷感慨：“我们丢的是几门大炮，得到的将是整个中国！”

（八）山姆大叔动议“倒蒋”

要饭的跌倒捡个元宝已属天方夜谭，比这更离奇的是，北平出殡的杠房没出门仰着脖儿，嘴里就接到一个从天而降的大馅饼！

1948年10月的一天，故宫神武门前忽然热闹起来。杠房出殡的草台班子除领头的执事穿长袍、戴瓜皮帽，其余一律着清朝朝服，四个抱纸糊大象粗腿的儿童走前头，中间两个大人打横幅，后尾几个大人吹鼓手和打幡的儿童，一路吹吹打打向东绕过紫禁城角楼，过东华门、长安左门，沿长安街进南池子向北折去。老北平正琢磨这是何方神圣出大殡，又见大象肚皮两侧各挂一幅西洋男子画像，队伍举的白底黑字横幅和幡牌用中英文写着：“杜威好运！”有心人想到美国大选正紧锣密鼓进行，大象又是美国共和党党徽，于是明白这是在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助选造势。

北平助选闹剧上演之前，蒋介石派有留美背景的立法院副院长陈立夫赴美，向杜威奉上巨额美金以示支持。此前，杜威在竞选演讲中宣称，上台将全力阻止社会主义在东亚扩张，还考虑派兵干涉中国解放战争。有民调显示，杜威支持率高于杜鲁门20%，遂有此岸与彼岸的助选与献金。无奈人算不如天算，杜威落选，杜鲁门蝉联。蒋介石这个动辄就狮子大开口要美援，在军事政治上又不听美国指挥，还以美援支持自己竞选对手的昏聩之君，成了留任白宫的密苏里老农眼中的沙子。11月8日，美国大选揭晓第六天，美国《生活》杂志刊登北平为杜威助选造势的背影照片，离镜头最近的，竟是一个穿开裆裤追随队伍看热闹的孩子！极尽讽刺之能事。杜鲁门举着胜选前的《芝加哥论坛报》哈哈大笑的照片也公之于众，报上醒目的通栏标题是《杜威击败杜鲁门》！

彼岸大选押错宝，令杜鲁门本来就不待见的蒋介石雪上加霜。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引发太平洋战争，美国希望中国拖住侵华日军，频频以武器金钱给蒋介石输血打气。苏联为防止日军拊其侧背，也以大量武器装备向蒋介石示好。但利益永远是时间的婢女。后来的事情随着局势发展，果然起了变化。

> 贾可宽、贾永：《1949，牛年春节》，《解放军报》2022年1月28日第12版。

1942年2月，美国国会批准向中国贷款五亿美元。美国财政部打款后跟踪调查，发现这笔巨款竟有八千万美元直接存入了民国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等人的个人账户。丑闻曝出，举国哗然。

1945年4月12日，美国第三十三任总统杜鲁门上台，一反罗斯福对蒋介石的偏爱，对各方报告的国民党贪腐行为痛加挞伐。傅泾波告诉立法院院长孙科：“美国希望蒋介石下野，希望新阁主和。”岁末，杜鲁门派五星上将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军事冲突。不辱使命的马歇尔，1946年竟创下八上庐山晤蒋纪录，并加紧支持中国“第三种政治势力”。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司徒雷登发表《告中国人民书》，要求“曾受教育的爱国人士”组成新党，“支持政府”“谋致中国和平之努力”，并直言孙科：“南京政府惟一的出路就是与共党和谈，而蒋氏下野是和谈的前提条件。”杜鲁门政府公开或私下表示，“不予蒋庇护”，“任其自生自灭”。1947年1月，马歇尔因调停失败奉召回国，对国民党政府憎爱交织、欲拒还迎的美国人召回了马歇尔，派来了魏德迈。抗日战争时期，魏德迈曾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华美军总司令，1947年3月返美。是年7月，魏德迈受马歇尔派遣，作为美国特使访华，对国民党进行全面评估。

魏德迈当然知道自己前任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的龃龉。1942年3月，曾任美国驻华使馆武官的史迪威中将出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指挥中国入缅部队收复仰光时，这位中国通每每与蒋介石意见相左。同古保卫战阻击日军，因英军屡误战机，致中国军队侧翼暴露于日军炮火，坚守同古的国军第二〇〇师苦战十余日终陷日军包围。第五军军长杜聿明不顾史迪威反对，撤出了部队。

史迪威坚信，首次入缅作战失败，是因自己未获全部指挥权，要求辞去参谋长，或让他训练三个师的中国军队，否则美国配给中国的第十航空联队将不配合中国军队的作战行动。1942年6月26日，史迪威通知蒋介石，第十航空联队、部分A-29轻型轰炸机和运输机，调往埃及配合英军作战，蒋介石十分恼怒。此后计划重开缅甸战场打通国际交通线，史迪威要求蒋介石单独开辟缅甸战场，蒋却坚持要英美海空军支援，这被史迪威理解为不抵抗的借口。1944年豫湘桂战役，上百万国

民党军大溃败，二十多万平方公里国土尽陷敌手，令盟国对蒋介石的能力产生怀疑。罗斯福要求蒋介石将史迪威调往中国国内战场指挥作战，并拿出部分租借物资装备中共军队，触动了蒋介石逆鳞。鉴于日军已南下广西，蒋介石要求史迪威在缅发起攻势，以减轻国内压力。史迪威不但拒绝执行此令，反而要求监视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南下。蒋介石提出，如不从命，将撤回远征军，并以暂停中美商谈为要挟，坚决要求撤换史迪威。1944年10月，罗斯福被迫违心撤回了史迪威。蒋介石为掩饰自己的挟私报复行为，拟将最高级别勋章青天白日勋章授予史迪威。史迪威却毫不领情，以“美国军官不便接受外国勋章”为由，断然予以拒绝，挂冠而去。

杜鲁门接任美国总统后，1945年8月19日，史迪威就美国政府援华问题警告说：“现在我们该脱身了。”翌年夏天，罹患癌症且届晚期的史迪威拜访杜鲁门，恳求他不要为了蒋介石而干预中国事务，疾言“蒋介石是个不值得美国扶持的骗子”。当年10月史迪威辞世后，杜鲁门说，他和史迪威将军抱有同感，认为“连希腊的腐败政权也比蒋政权效率要高，不像它那么声名狼藉”。

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易人后，魏德迈毫无保留继承了美利坚合众国将军的自信与直率。他在中国调查月余后大失所望，在国民政府高层会议上尖锐指出：“国民政府是不能以武力击败解放军的，只有依托群众、发动群众、取得群众拥护才是胜利的关键，而群众能否拥护国民政府，是国民政府能否屹立的关键因素。”

1947年8月24日下午，魏德迈在南京黄埔路蒋介石官邸，发表《中国的复兴有待于富于感召力的领袖》的声明，再次表达对国民政府的不满。声明说：“我在中国期间，看到的都是国民党从上到下的腐败以及对于战争失利的麻木，单纯地依靠军事实力是无法挽回败局的，只有进行彻底的政治、经济改革，取得人民的信任，才是扭转战局的关键。”声明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国虽因连年战争和革命受到削弱和破坏，但仍拥有为其自身之复兴所需要的大部分物质资源，这种复兴，有待于令人振奋的领导。”

原以帮助蒋介石著称的美国政府代言人魏德迈，当着委员长的面讲出这样大不敬的话，令在场官员无不如坐针毡，蒋介石更是无地自容。8月25日，他问傅泾波：“魏德迈将军在声明中说，中国‘有待于令人振奋的领导’，美国是不是真想逼我下野？”

魏德迈向美国总统提交的报告说：“国民党领导权的反动本质、它的统治的高压性质和文武官员中普遍的腐败，从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而言，使政府受严重的损失。现在普遍相信，在目前情况下，除非国民政府厉行改革，它将经缓慢逐渐的过程而告瓦解。”报告建议，不急于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大笔援助，而采取“观望”政策，以期“蒋委员长实行真正改革”。这一改革包括：实行有效率的

政治；保护人民基本自由，免受专横压制；民政不受军人的控制；谋致人民福利。其中最关键的是，把国民党从政府中完全分出，使蒋委员长成为国家的领袖而非党的领袖；改组国民政府，包括改组行政院和国府委员会，使负责任的人士不分党派均可以参加，防止政府事务及政策为一人所独揽。

嗣后，司徒雷登即赴北平，物色蒋介石接棒人，与燕京、清华、国立北京大学师生频繁接触。司徒雷登曾向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供一份报告，宣称“在学生中间，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日趋式微，甚至被视为过去的人物；李宗仁上将则资望日高”。华北归来，司徒雷登已建议把李宗仁作为“富于感召力的领袖”准备接替蒋介石了。

程思远认为，美国驻华大使对华盛顿提出的这一推测，当属司徒雷登推动李宗仁出来竞选副总统的政治背景。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31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12月版。

司徒雷登不止一次劝蒋介石交出军事指挥权，不要使已很不利的军事形势继续恶化。6月24日，他给美国国务院写报告：“我曾一直希望，任命了何应钦将军为国防部长之后，军事调度的实权将交托给他，巴大维将军可以与他密切合作。我曾力劝总统这样做，他也确切表示同意……不料总统恰恰发布了一个命令：一切调度均须按照他自己的指示，通过参谋总长——不称职的顾祝同来执行。白崇禧被解除了国防部长的职务，大概是因为他在选举中帮助了李宗仁。其后他被指派担任指挥黄河长江间五省军队的重要任务，在犹豫许久之后，他接受了这个委任，但是他又获悉不准在该地区组织民团——这是他一贯强烈主张的事情——并且某些地区，如武汉周围，将不在其管辖范围之内……”

司徒雷登不断施压，蒋介石佯装认真听取，实际却不实行。7月，司徒雷登获悉中国共产党即将举行会议，组建新的联合政府，16日便紧急约见蒋介石，要他认真团结反对派，并点出了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傅作义的名字，但蒋依然不予考虑。

1948年3月8日，司徒雷登应华盛顿之命，对中国军事形势做出评估：“南京政府在东北地区只占1%，在黄河以北也不超出10%或15%。在长江以北，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已经进入大别山区，国民党军处境困难。在各个战场均被迫处于守势，民心士气败坏已极。在如此令人吃惊的情形下，需要有振奋人心的领导。情况日益紧迫，蒋委员长必须做出决定，但他却囿于己见，未能采取积极改革措施。我们认为，用和谈解决的办法，包括促使委员长退出政治舞台，似乎还不能说完全无此可能。”6月24日，司徒雷登在给马歇尔的报告中无可奈何地说：“看来，蒋委员长选拔将领有一偏向，就是任人唯亲而不是选贤任能；看人只看其是否可靠，而

不视其品质及能力。由于他的自私和偏狭，从而全不理睬各方提出的适当的军事意见，也未能充分利用各方所给予的军事上的援助，这就是今天军事形势每况愈下的原因。”

姚夫等编：《解放战争纪事1945—1950》，第257—291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

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忍无可忍，但基于自身战略利益和考量，继续奉行扶蒋反共和避免卷入中国内战的双重政策，咬牙履行前约为蒋介石集团输血。1948年2月18日，杜鲁门提请国会批准国务院建议的总额五亿七千万美元援华方案之特别咨文。当日，美国航务委员会批准卖给国民党政府十二艘舰船（一说二十二艘）。20日，马歇尔在国会报告中披露，战后援助国民党政府十四亿零九百万美元，未包括印缅和太平洋剩余物资、二百七十一艘舰只、联合国总部赠予战后经费五百万美元等四项，以及空军、防务两项秘密援助。27日，美国空军部长苏雅特·薛明顿致函国会供认，按照1946年7月美蒋秘密协定确定的“八又三分之一空军”计划，美廉价售蒋一千零七十一架飞机，为国民党空军装备重型、中型轰炸机大队和摄影侦察机中队各一个、四个单行引擎战斗机大队、两个运输机大队。另外，还供给国民党政府大量空军设备，训练五千一百三十七名飞行员、轰炸手、领航员和技师。3月4日，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于去年10月将停泊于菲律宾苏比克湾的五十艘登陆艇，以一百四十万美元价格售予国民党政府。10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声明，“估计约值五亿美元的现在太平洋诸岛上的剩余物资，已根据‘就地运取’的原则售予中国政府”。4月3日，美国国会通过“1948年援华法案”，使美国援助国民党打内战的贷款、物资、服务总值达四十三亿四千余万美元。7月3日，王世杰与司徒雷登分别代表中美两国签订《中美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规定美对国民党政府提供二亿七千五百万美元经援。注

司徒雷登8月20日上书美国务院，巴大维将军曾就当前军事指挥上的问题，向蒋委员长提出意见，即要蒋氏不要亲自指挥军队，而由他协助国防部长指挥作战，但蒋氏完全当耳旁风。目前遭到的困难，完全是因为中国统帅不采纳建议所致。巴大维给美国陆军部的报告也说：“我提出的意见，蒋介石从来都是置之不理，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失利从来没有一次是因为缺乏弹药和装备导致的，他们的失败完全可以归咎于蒋介石拙劣的领导！”

蒋介石一再罔顾美国政要建议，让美国朝野均对他失去信心，故以延迟军援和越俎代庖的派送表达抗议。8月30日，司徒雷登、顾问团巴尔将军与何应钦议定：从美国运来的装备60%送上海，30%送傅作义指挥下的天津；10%送青岛供山东半岛防务之用。这是美国第一次越过蒋介石，把军援直接交给国民党战区指挥官。

甘介侯为李宗仁私人顾问。

《司徒雷登日记》，第43页，黄山书社2009年7月第1版。

司徒雷登早已看透了“烂泥扶不上墙”的国民党，“除了蒋介石的心腹以外，已经没有多少人真正支持他了，蒋已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他向国务卿马歇尔建议：“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国民党内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华盛顿向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透露，白宫方面认为，蒋应让位于别人，只要他在一天，美国便不会为中国做什么事。美国国务院也一再放风，只要蒋在位，不可能指望美国增加援助。1948年12月20日，孙科新内阁组成，傅泾波对他说：“蒋总统下野，为进行和谈所必需。”孙科次日拜访司徒雷登，问傅泾波所言是否系他的意见。司徒雷登说：“作为美国大使，我不能发表正式的意见，但以私人资格言，确实衷诚赞助和谈运动。”1949年1月3日，司徒雷登在日记中写道：“甘介侯[注]通知说蒋氏计划归隐奉化或台湾，由李宗仁接掌一切。李氏应该停留南京，抑或往汉口呢？”[注]

10月，南京政府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出席联合国会议，与马歇尔再谈“援助”问题。马歇尔十分“关心”张群近况。王世杰将捕捉的这一信息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想入非非，以为派马歇尔感兴趣的人前往华盛顿沟通，双方易于“敦睦”并争取美援。张群随后即找司徒雷登商量。司徒雷登说，蒋介石这种单相思并无实际根据，仅凭张群带几句甜言蜜语过去，恐怕仍然无济于事。

司徒雷登的判断，无疑给蒋介石泼了一盆冷水，但他仍不死心。11月间，蒋介石又示意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蒋廷黻向马歇尔试探，可否由美国派出陆军军官，名义上还是充当顾问，实则率领国军部队与解放军作战。但蒋介石的新建议仍激不起美国兴趣。无奈之下，有了宋美龄假蒋介石之名的第二次越洋之旅。

蒋介石日记，是折射山姆大叔激流换马意图的镜子。

1948年2月21日：“接阅马歇尔复其司徒大使电意，对我接济军械之要求仍以官话搪塞，毫无同情之心，对我东北危急之战况，亦置若罔闻，观其答复议会对其援华不足之质问，乃推托于我政治军事之无能失效，议会督促其军事援华，而彼以现款购械，必欲将我所余三亿美金之残款外汇完全用罄而后乃快其心，美国外交不讲信义，无视责任、欺弱侮贫如此，其与今日俄国、往日之德日究有何分别？”“马歇尔实为其国家之反动最烈之军阀。”

蒋介石6月29日日记又写道：“政治失败，军事、经济棘手，美马敌视益深，外交陷于孤立，此虽为共匪内乱所造成，而使我今日陷于如此绝境者，实皆由马歇尔一人阴狠残忍有以致之。”

（九）柏林危机的中国机会窗口

战略可以把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拖入同一条战壕，但利益的纷争最终会让他们再度兵戎相见。

> 《铁幕笼罩——丘吉尔在威斯敏斯特大学的演讲》，《丘吉尔语言的力量》，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6月第1版。

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由美国总统杜鲁门陪同，在杜鲁门母校——密苏里州富尔顿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演说，宣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亚斯特，一道铁幕已经笼罩整个欧洲大陆”，“铁幕”以东的中、东欧国家“无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受到莫斯科日益变本加厉的高压控制”，“对基督教文明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主张英、美结成同盟，英语民族联合制止苏联“侵略”。杜鲁门精心安排的“铁幕演说”，说出了美国想说而不便公开说的话。斯大林严厉谴责丘吉尔和他的朋友非常像希特勒及同伙，演说是杜鲁门借他人之口发表的“冷战”宣言。“铁幕演说”揭开了东西方冷战的序幕，丘吉尔因此被称为“冷战之父”。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致国会咨文公然提出，以“遏制共产主义”为国家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指导思想。“杜鲁门主义”的出台，标志着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正式开始。

1948年夏，美苏第一次冷战高潮在美苏英法共同占领的德国爆发。6月18日，美英法三国颁布改革德国货币制度法令。19日，苏联向美英法提出抗议并发表声明，决定对西方国家进入柏林通道实施交通管制。21日，美英法在柏林西部占领区发行“B”记号德国马克。22日，苏联在柏林东部占领区发行新的“D”记号马克，24日关闭从汉诺威至柏林高速公路上的赫尔姆施泰特检查站，封闭所有通往柏林的公路、铁路、水路交通，停止向废墟中的西柏林供应电力和煤炭，只保留从西德往柏林三条空中走廊通道。苏联提出，可向西柏林居民及占领军供应粮食、水等生活必需品，但遭拒绝。29日起，美国派飞机向柏林大规模空运粮食及各种日用品，一年间飞行二十七万七千七百二十八架次，空运货物二百一十一万吨，同时对苏占区缺乏的钢和煤焦及电力等实行反封锁。

西柏林币改引发的苏美封锁与反制，史称第一次柏林危机。

东边日出西边雨。苏联担心中国革命导致美国出兵干涉，把自己卷进去引发新的世界大战，故持消极态度；而第一次柏林危机令美国无暇东顾，无意间开启了东

亚转危为机的窗口，也为粟兵团迟出江南加入中原作战，进而破解中原僵局提供了难得契机。

《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311—31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1948年5月21、22日，毛泽东电令陈粟和刘邓：“以歼灭五军为夏季作战之中心目标”，“各方协助粟兵团歼灭五军”。

邱清泉毕业于黄埔二期并留学德国陆军大学，曾任蒋介石侍从副官，率整编第五军进入中原战场以来，集结于黄河、运河及陇海路徐（州）开（封）段正三角形地区中心定陶、成武一带，一直寻求与华野主力兵团决战，并叫嚣“活捉粟裕”。

粟裕通观中原战场，华野、中野十三个纵队分布鄂北、皖东、豫南和豫东，一时难以攥指成拳。密息显示，河南省会开封守敌薄弱，城内仅有整编第六十六师十三旅和两个保安旅。一向不拘成法的粟裕认为，哪里好消灭敌人就在哪里打仗，什么时候好消灭敌人就在什么时候打仗，什么敌人好消灭就打什么敌人。既然开封守敌薄弱，何不由此开刀？调动整编第五军于动中寻歼的计划已成竹在胸，开封敌情变化，又催生粟裕攻汴打援方案，但未上报。

腹案虽未上报，准备并未放松。粟裕电令陈（士渠）唐（亮）兵团第三、八两纵由许昌向淮阳进发，吸引整编第五军南下；而后亲率第一、四、六纵队和两广、特种兵纵队南渡黄河，吸引第五军回头北上，第三、八、十一纵队尾敌北进。粟裕两手准备互为表里：如出现歼灭第五军良机，即南北夹击其于鲁西南；如难得手，也示假隐真致敌错觉，以便对开封之敌实施出其不意的攻击。

果然，第三、八两纵直指淮阳，整编第五军迅疾前出截击；粟裕率军渡河南下持重待机，南京又令整编第五军、整编第七十五师北返，再增调三个整编师另一个旅寻机决战。此时之鲁西南，蒋军猬集，不易分割；华野左临运河、右依黄河，地形受限，兵力不足；而第三、八两纵已进至通许、睢县、杞县地区，离开封仅一日行程。显然，歼灭五军时不与我，开封之战机不可失。6月16日午时，素知毛泽东主张在全军集中统一指挥下，给前线指挥员以临机专断之权的粟裕，果断向中央军委和中原军区上报“先打开封，后歼援敌”作战方案，同时下令部队执行。

铣午，16日午时。
《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31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17日，中央军委复电华野：“完全同意铣午[注]电部署，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要请示”。[注]

胡琏任军长的整编第十八军为兵团级，该军行动时又常统一指挥配属部队，故称胡琏兵团。

刘陈邓当日复电，同意第一步以打开封为主，第二步打谁视情再定，调五个纵队全力阻击胡琏兵团[注]北援。

陈唐兵团兵临开封城下，南京和徐州“剿总”均判断是准备与整编第五军决战，开封守敌亦视其为“声东击西”。直至17日陈唐兵团闪击开封，守敌才如梦初醒。开封城高壕深，城内外遍筑地堡，已成半永久性防御体系。第三、八两纵有洛阳攻坚经验，战前又专项训练坚固设防城市攻坚作战，可谓有备而来。

17日夜，孙继先、丁秋生指挥第三纵队从城东主攻曹门、宋门，张仁初、王一平指挥八纵主攻南门、西门。第八纵队二十三师六十九团占领开封车站，一列装甲列车由西向东冲入，小炮、机枪弹冰雹般倾泻过来。第六十九团兵分两路，破坏东西两头铁轨，装甲列车进退无路，车上之敌被迫投降。列车上满载的炮弹，转手就落到开封守军头上。第六十九团以缴获的二百发山炮弹，彻底摧毁小南门敌阵地实施突破。19日，城池外围阵地扫清后，突击营用十一包炸药炸开城门，炸毁城墙内外地堡，突破城垣主阵地。

20日夜，城区之敌基本肃清，粟裕、张震、钟期光驱车径赴一线。首长连日沙场点兵，开车的警卫员唐洪也未休息好，行不多远瞌睡虫就爬上脑门，美制吉普突然侧翻。唐洪惊出一身冷汗，慌忙爬出车问：“首长没事吧？”粟裕第一个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说：“我没事。大家检查一下，看伤了没有？”张震站起来说：“没事！”经检查，四个人除头上碰个包、身上有擦伤外，并无大碍。汽车翻过来后，粟裕抢过方向盘说：“小唐，这几天你太累了，先睡一觉，我给你开一会儿。”说罢，驾驶吉普车稳稳向前驶去。

粟裕抵达开封前指时，核心阵地龙亭仍久攻不下。龙亭坐落在宋代故宫遗址上，台基高十三米，绕有围墙，东西南三面为潘家湖、杨家湖、西北湖包围，进攻龙亭只有南面潘、杨二湖中间一条路。亭北运动场是开封守军炮阵地。粟裕说：“龙亭没有打下不是坏事，可以作为钓大鱼的钩子，钓邱清泉这条大鱼。”

陈士榘同第三纵队首长登上城内制高点教堂钟楼，详察龙亭敌情定下决心，攻城炮兵21日黄昏抵近龙亭，以缴获装甲列车炮弹，四十五分钟向第六十六师指挥所和运动场炮阵地发射炮弹千余发，守敌伤亡过半。第三纵队八师二十四团三连奋勇炸毁敌桥头堡，从围墙缺口冲进龙亭。第六十六师师长李仲辛带人向北逃跑，

被击毙在城墙上，师参谋长游凌云带指挥所人员投降。到22日，守敌三个旅被全歼，连同阻援方向战果，共歼敌三万八千二百三十五人。

朱楹、温镜湖、熊铮彦、杜魁元著：《粟裕传》，第689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粟裕在战役指挥中，历来重视战役转折点把握。他认为，在敌以强大兵力增援情况下，转折出现得越早越好，要力争在全战役预计时间的二分之一之前，最好在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时到来。豫东战役转折仅用五天，占全战役持续时间的五分之一。[注]

河南博物馆编：《开封战役资料选编》，第18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

开封失守令蒋介石颜面尽失，正在召开的“伪国大”形同一锅沸水。合众国际社报道：“21日，河南省代表团在蒋介石官邸中举行了前所未见的七小时静坐，要求蒋介石亲赴河南，指挥开封的防御。”[注]代表们哪里知道，是蒋介石越俎代庖，亲自指挥，才把国民党精锐兵团相继送上不归路。蒋介石嚷着要追责、要杀人，喝令邱清泉、刘汝明、区寿年兵团火速前往开封收复失地。

粟裕设计豫东战役的良苦用心，在于攻其必救，顺势打援。开封张罗布网请君入瓮，中野战役运筹却另有机杼。6月20日，刘陈邓致电中央军委提出，集中陈赓、谢富治、陈锡联、粟裕等部主力攻击郑州国民党第四十七军，翌日再电中央军委取消前议。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第489、49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22日，毛泽东致中野、华野电指示，“目前打很大规模的歼灭战，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故须避免”。[注]但当援敌蜂拥而至时，必欲扭转中原战局的粟裕，24日晚七时与陈士渠、张震联名发出致中央军委打援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第489、49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6月25日，毛泽东复电刘陈邓粟等“部署甚好”，翌日再电：“部署在睢杞通许之线（或此线以南）歼敌一路是很适当的。”[注]

26日，华野陈唐兵团主动撤出开封。蒋介石急令邱清泉、区寿年兵团全力追堵，同时令黄百韬、孙元良、胡琏三兵团分进合击华野主力。骄横的邱清泉急于进占

开封尾击华野抢功，而多疑的区寿年则徘徊于睢杞地区，两兵团一夜之间拉开四十公里距离。27日夜，粟裕指挥华野第一、四、六纵和中野第十一纵迅速楔入邱、区两兵团之间，全力围歼区兵团；以第三、八、十纵和两广纵队阻击邱清泉增援。豫东战役第二阶段睢杞战役声然展开。

区寿年第七兵团虽属弱旅，仅辖整编第七十二、七十五师和新二十一旅，但大炮数量不少，还装备有坦克和喷火器。粟裕令部队不停顿连续突击区兵团，不给其收缩和组织防御时间，力促战役转折点及早到来。第一纵队一师师长廖政国指挥部队向区兵团第七十二、七十五师接合部猛插，一夜占领十六个村子割裂敌人。两师敌军相向炮击廖政国第一师，打了一宿，29日拂晓才发现，因第一师阵地太窄，炮弹都落到自家兄弟阵地。天亮后敌军看清第一师阵地修正再射，第一师工事多被炸塌，战士们英勇坚持到黄昏。

位于睢县城西北的常郎屯，是区兵团部和第七十五师师部龟缩的龙王店镇南大门，守敌近五千人。29日，第一纵队司令员叶飞调一师主攻常郎屯，廖政国命第二团出击，突入村中遭敌反击伤亡很大。胜败攸关时，叶飞速派纵队警卫营驰援，廖政国动员机关和保障人员能拿枪者全部参战，7月1日拂晓，常郎屯守敌悉数就歼。

入夜，天黑如漆，华野第六纵队十八师包围了龙王店。第五十二团三营八连二排长印永鑫，带战士刚进入圩子东门附近壕沟，忽听“嗖”的一声，背上像被铁锤结结实实砸了一家伙，一颗“嗤嗤”冒烟的手榴弹落在脚下。印永鑫捡起手榴弹甩进圩子，爆炸后一条火龙又窜了过来。战士急忙用手抹拭溅到身上的炙热液体，谁知越抹火越旺，多人被火焰喷射器烧伤。印永鑫令机枪班掩护，战士搭起人梯，他和五班副许超率先爬上一丈高的圩墙横扫溃敌。晨光熹微中，四辆坦克轰鸣着冲向东门，三次冲击堆积的麻包未果，掉头向南驶来。印永鑫命战士用集束手榴弹打坦克，坦克像被激怒的公牛疯狂扑来。印永鑫一跃而下，骑在第一辆坦克滑膛炮身管上，炮塔一转将他甩在地上，接着碾压过来。印永鑫忍痛一滚，在五班大个子战士小陈帮助下爬上坦克后平板，“叭！叭！”几发子弹擦身而过。印永鑫避开坦克上的射孔高喊：“快投降，我扔手榴弹了！”此时，后三辆坦克也被连队官兵控制。坦克里的敌人磨叽片刻，提出让指导员来。“我就是指导员！”印永鑫怕敌人诈降，手拿帽子凑近射孔试探，果然被敌开枪击穿。“再不投降，我真炸了！”“别炸！别炸！我们投降！”坦克停下后，炮塔盖打开，身长如杆佩戴中将军衔的区寿年，兵团少将参谋长林曦祥，少将师长沈澄年等五人狼狈爬了出来。区寿年将金戒指和美元塞给印永鑫，被严词拒绝后又说，我跟你们粟裕司令是老朋友！粟裕接报指示予以优待。谁让区寿年是南昌起义时自己的老营长呢？

8月，已任连长的印永鑫被评为华野一级战斗英雄。

7月2日晨，整编第七十五师主力大部被歼，余部不足一旅。蒋介石“五中惨裂、不知所止”，当日下午四时飞抵杞县上空，力督邱兵团疾进增援。不料邱清泉竟不在，只得与兵团参谋长李汉萍通话，急降徐州机场给邱清泉草拟手令，令空投邱兵团后于晚七时半返回南京。交战第六天，粟裕企盼的战役转折点刚出现，邱兵团主力整编第五师强势突破阻援阵地西北角，战局瞬间生变。

粟裕未及增兵西战场，东战场又骤然告急。开封和兖州战役同时打响后，徐州“剿总”初始对驰援南北举棋不定，开封城破始调黄百韬率整编第二十五师北援兖州。由于攻兖部队过早松围南下暴露打援企图，陷入重围的区兵团又求援甚急，徐州复调整编第二十五师车运睢杞，下车就以快速纵队打头西进直扑帝丘店。阻援的中野第十一纵队原为冀鲁豫军区地方武装，未像华野部队那样在阵地前埋设地雷并挖反坦克壕，面对快速纵队无有效制敌手段，一线阵地很快被突破。收缩至铁佛寺一带的区兵团整编第七十二师，发现援军迫近拼命东靠，眼看就要打通与一庄之隔援军联系。间不容发之际，前来压缩对整编第七十二师包围圈的华野第一、三两师，未及请示便分路实施反击，堵塞了守敌和援军东西会合之路。

黄百韬斜刺里杀到豫东搅局，粟裕兵来将挡，以华野南下干部队增援阻援集团，堵住了西战场缺口。7月3日晨，粟裕从阻援集团调兵，以四个纵队组成新的突击集团，包围了立足未稳的整编第二十五师，猛攻两天，将其压缩在帝丘店为中心的狭小地域。5日晚，黄百韬反守为攻，亲率两个营以坦克为掩护发起逆袭，从华野手中夺回四五个村庄，以挂彩之躯创造了国军战史上中将司令官率部冲锋孤案。战后，黄百韬获授国民党最高荣誉勋章青天白日勋章，升任区寿年被歼后重建的第七兵团司令官。

黄百韬夜袭告捷，不甘寂寞的邱清泉亦使出坦克冲击战术撒手锏左右战局。这位1939年亲驾坦克率部迂回奇袭日军，从而成为昆仑关大捷桥段的悍将，6日故技重演，挥师绕过华野阻援集团正面，从右侧楔入一举打开缺口，直接威胁华野侧背。

帝丘店破防这天，是豫东战役最为惊心动魄的时刻。华野既要速歼区兵团残部，又要力歼驰援的黄百韬一部，还要对付来势汹汹的邱清泉、胡琏、孙元良兵团。6日下午五时，胡兵团所辖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整编第十一师，突破华野防线进抵太康，离睢杞战场仅几十华里。粟裕审时度势，果断放弃歼灭黄百韬目标，指挥部队快速撤离战场，于多路援敌虎伺狼窥中一下跳出，安然转移。

豫东战役第二阶段作战，歼灭区寿年兵团兵团部、整编第七十五师师部和六旅一个团，重创援军黄百韬部歼其三个团，共歼敌五万多人。此役的极限用兵，成为淮海战役的战术预演。

7月11日，周恩来代中央军委起草致刘、邓、陈、粟等电：“这一辉煌胜利，正给蒋介石‘肃清中原’的呓语以迎头痛击，同时也正使我军更有利地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

刘伯承后来说：“豫东战役这场仗我是不敢下决心打的。”粟裕准备打援前，刘陈邓致电中央军委并粟裕，提出再战“似嫌歼击企图太多太大”。豫东鏖兵盘活全局，邱清泉、胡琏兵团和黄百韬部被吸引到豫东，致国民党军两翼空虚。刘邓大军乘隙发起襄樊战役，韦国清率苏北兵团在陇海路东段发动攻势，许世友率山东兵团遂行兖州战役，连同豫东四个战区歼敌总量超过二十万。

粟裕回首解放战争战役指挥，感到最令他紧张的一是宿北战役，二是豫东战役，三是淮海战役。据粟戎生回忆，粟裕晚年曾对他谈及，从调动敌人等环节看，豫东战役最为成功。

> 朱楹、温镜湖、熊铮彦、杜魁元著：《粟裕传》，第69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豫东战役以国民党军丧失主动进攻能力为标志，开启了改变中原战局的历史进程。决胜豫东其意义超出战役本身。毛泽东把解放战争划分为两段。1946年7月至1948年6月为第一段，1948年7月至1950年6月为第二段。两段分界线正是扭转中原战局的豫东战役。此役不久，毛泽东在西柏坡对华野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说：“我们过山坳了！”他左手握拳，右手食指沿拳头顶端划过，比画着说：“解放战争好像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毛泽东还说：“你回去代我问粟裕同志好，告诉他，我把黄百韬、邱清泉记在他名下了。”[注]

> 侗枫：《虎啸血野——华东野战军征战录》，第795、75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 侗枫：《虎啸血野——华东野战军征战录》，第795、75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解放战争中，林彪对粟裕打的“神仙仗”十分关注，谈及豫东战役歼敌近十万改变中原战局时说：“取胜把握至多五成，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打了这么大的胜仗，不简单。”[注]刘亚楼对林彪开玩笑说：“林总，你对华野的作战情况，特别感兴趣，是不是想与粟裕同志比个高低？”林彪说：“你这个人说话欠考虑。首先，我对打了大胜仗的兄弟部队都很感兴趣；第二，我对粟裕同志的了解，比你们要全面和深刻。南昌起义之后，从南征路上开始，及至井冈山时期，就数我们两个打得好。后来，由于经历不同，而形成了不同风格。我因为长期以来，肩负保卫党中央的重任，又是毛主席直接指挥的主力，我的担子很重，打仗较为慎

重。一般情况下，有了七成把握才打。只有五六成把握，风险太大，不能打，等到有了八九成把握，又会失去战机，无仗可打！而粟裕同志呢，长期远离中央，长期孤军作战，一般情况都是在敌人包围的态势下打的仗，不冒险就无法生存，养成了他敢于冒险的特点。如豫东战役，我看最多只有五成把握……值得研究、探讨和借鉴。”[注]

《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322—32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豫东战役证明，黄淮之间确有歼灭国民党重兵集团条件，粟裕“集中兵力歼敌江北”建言的战略价值得以凸显。7月13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中原局并告粟裕等电：“粟兵团应在现地区作战至明年春季或夏季，歼灭五军、十八军等部，开辟南进道路，然后南进（不歼灭五军、十八军不走）。”[注]中共中央九月会议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

1948年4月，济南周围六百里已被华野三十二万大军控制，济南守军连同可能北援之敌仅二十八万人，我军在华东战场总兵力首次超过国民党军。巨大战略机遇和严峻战略挑战同时并存：夺取坚固设防守敌逾十万的济南，使华东解放区连片并将渡江南进通道前推至黄淮，是歼敌江北第二步行动的必然选择；但对刚刚从游击战转向大兵团运动战的华野来说，打赢过去未曾打过的大规模城市攻坚战，无疑是决战前夜一场输不起的战略比拼。

济南孤悬鲁中，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危机感日深。在国民党为数不多的能战之将中，王耀武作战凶狠凌厉，眼光犀利毒辣，对战争有着常人不及的灵敏嗅觉。1932年在抚州宜黄，他挫败了攻城的林彪；1934年在黄山谭家桥，他再败粟裕任参谋长的红十军团。抗战中万家岭战役、高安之战、常德会战，王耀武均有大败日军的不俗记录。5月15日，王耀武飞南京晋见蒋介石，建议放弃济南退守兖州及以南地区，向徐州守军靠拢。

但蒋介石毫不犹豫地否定了此议。济南地处华东、华北要冲，其得失关系党国荣辱存亡甚大。1947年2月24日，李仙洲集团覆灭莱芜翌日，蒋介石即直飞济南，下机便听取王耀武汇报，当晚开会研究济南防御方略，决定放弃胶济路，据守济南、潍县、青岛三点。次日上午又与王耀武、丁治磐等密商固守济南之计。

美国顾问团团长巴大维也告诫蒋介石：“靠单纯防御对付解放军，没有任何意义”，主张撤出济南，集中兵力固守徐州。但蒋认为，保济南可避免华东华北“匪区”连片，不使驻青岛美海军孤立影响美援。南京国防部还天真地提出，只需再增一个师，就可守住济南。巴大维反唇相讥：“这只是让你们多损失一个师而已！”

兖济，指山东兖州和济宁。
韦吉，指韦国青、吉洛（姬鹏飞）。
《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322—32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7月14日，毛泽东致电刘陈邓并告粟裕等人：“拟令许谭于攻克兖济[注]后，休息两星期，即向济南攻击，迫使邱黄两兵团分兵北援（敌非北援不可）。此时，你们则寻敌一部攻击，使敌既被迫分散，又首尾不能相顾，利于我之各个击破及尔后之大休整。”此后两天，中央军委连发七电要求十天内夺取济南，“于十月间南下配合粟陈、韦吉[注]打几个大仗，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注]

《粟裕军事文集》，第371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

粟裕深知，攻济之战攸关战略全局，一战而胜可摧毁敌心理防线形成破竹之势，必须举华野全军之力共赴此役。16日，他与谭震林等致电中央军委：“建议许谭与我们争取时间休整一个月，尔后协力攻打济南，并同时打援”，“求歼邱兵团之大部或全部”，则战局可能迅速南移，“今冬攻占徐州之计划似有极大可能”。[注]

《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32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第54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23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华野电，要求休整完毕，或配合粟陈唐张各纵在陇海南北打几仗然后攻济南，或先攻济南并打援，由粟裕等据实提出计划并统一指挥。[注]26日，中央军委再电中野、华野：“雨季已到，你们决心进入休整是正确的。”[注]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第29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8月23日，朱德在解放军总部召开的战况汇报会上指出：“自古以来谁在中原取得胜利，最后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就能解决”，要求华野中野充分做好同刘峙、白崇禧集团在中原决战的准备，提出要争取在今后十个月内“解决傅作义，拔掉济南、太原诸点”。[注]中央军委给华野发电，同意华野集全军之力攻济及打援。

济南战役是华野1947年遵中央军委之命“七月分兵”以来，东、西和苏北兵团会合后首次大兵团作战。许谭所率东兵团即山东兵团，分兵后虽仍属华野建制，但直接受中央军委和华东局指挥，华野非“授权指挥”而不能节制。粟裕筹划济南

战役，虽不需像豫东战役那样为示假隐真劳神费力，但统一高层思想、正确理解把握攻济与打援关系、理顺华野会合后内部关系，殊为不易。

三角，即徐州、汉口、西安；四边，即陇海路、兖州以南之津浦路、郑州以南之平汉路及宝鸡至成都的公路；十三点，即开封、郑州、济南、商丘、南阳、襄阳和樊城、确山、信阳、汉中、安康、钟祥、宜昌、合肥。

8月4日，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蒋介石在会上沮丧地说：“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到今天，不仅使得全国人民的心理动摇，军队将领的信心丧失，士气低落，而且中外人士对我们国军讽刺污蔑，令人实难忍受。”他提出，战略上将重点进攻转为重点防御，将小兵团归并成大兵团，收缩战线，集中兵力，依托战略要点的坚固阵地进行坚守防御，同时组成强大的兵团进行机动作战，以攻为守。在战略指导上，视中原为全战局枢纽；为了集中兵力破坏共军秋季攻势，决定坚决保持三角、四边、十三点[注]，企图东西呼应，阻止我军南下。

10日，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致电中央军委，建议雨季后集中华野全部三十余万人，或先攻济南，或先转到外线进行大规模歼灭战，并提出三个攻济作战方案，认为“攻占济南与打援同时进行，但应有重点地配备与使用兵力”之第三案为最佳。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第567、57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12日，中央军委复电，“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达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即采取你们第二方案”。[注]

8月上旬，粟裕率华野指挥机关由豫皖苏至兖州与谭震林会合，在曲阜共同主持华野前委扩大会，研究攻济打援作战部署。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第567、57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26日，毛泽东致电华野，提出必须预先估计在援敌距离尚远之时攻克济南，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攻克济南，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尚未攻克济南三种可能情况。要求首先争取第一种，其次争取第二种，在第三种情况下，即应由以攻城为主，改变为以打援为主，在打胜援敌后再攻城。电报强调，攻城和阻援打援集团“均应留出必要的预备兵力，特别是阻援打援集团应留出强大预备兵力，准备在第三种情况下，你们手里有足够力量歼灭援敌”。[注]

此前，毛泽东特召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到西柏坡，风趣地对他说，许世友打红了胶东半边天，你在鲁中鲁南也是铁打的英雄。孤掌难鸣。这次打济南，你们“山东双雄”齐出，两个巴掌都拍得响，部队就会跟着你们赴汤蹈火，同仇敌忾打下济南！

许世友与王建安都是四方面军猛将。济南战役开战在即，毛泽东要求许王二将“拍响巴掌”，王建安爽快说：请主席放心，我豁上命也要配合许世友打好这一仗！

“好！”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约法三章，你们打不下济南城，我先斩许世友，再打你四十军棍，我毛泽东主动向党中央请罪，连降三级！”翌日，毛泽东、周恩来又与王建安谈了一夜。

>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济南战役》，第114页，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

华野曲阜筹兵，许世友正在病中。毛泽东指示粟裕、谭震林：“此次攻济是一次严重作战，请考虑在许世友同志身体许可情况下请他回来担任攻城主要指挥员，王建安同志辅之。因王初到东兵团，不如许之熟悉情况。”“攻济任务完成，他仍可去休息。”

许世友、王建安携手泰安攻城集团指挥部。

刚刚协调好“山东双雄”携手攻城，宋时轮在曲阜会议上又公然顶撞粟裕，提出不补充枪弹十纵不参加攻济。“排炮不动，必是十纵。”阻击铁军十纵损枪折弹，是1947年为配合刘邓挺进中原，在无险可据的梁山绝地死守为敌两面夹击，被压缩到黄河与东平湖之间狭窄地带。为摆脱险境，宋时轮未及请示便撤军到黄河以北，遭敌攻击损失上千人。毛泽东驰电要求严肃处理宋时轮。陈毅粟裕考虑大战在即，想待宋时轮回来弄准情况再处理，只在总结会上对其作了批评。宋时轮觉得颜面扫地，在曲阜会议上抗命出任西集团攻城总指挥，甚至摔门而去，打报告要求到东北休养。

毛泽东得知宋时轮临战撂挑子，即令华野给予其撤职处分。

陈毅粟裕感到，战功卓著的宋时轮是主攻济南的不二人选，遂联名致电毛泽东解释说，临阵换将对军心士气影响大，建议宋时轮暂留任，前委抓紧做其工作继续参战，不会影响攻济战役。

宋时轮看到华野对上电报后痛责己过，全力备战攻济之役。

攻济与打援哪个是重点？兵力如何分配？在曲阜作战会议上，各路战役指挥员各抒己见，互有交锋。会场内思想碰撞火花四射，会场外上下沟通渐入佳境。28日，毛泽东复电粟裕：

>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第579—58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我们不是要求你们集中最大兵力，不顾一切硬攻济南，这样部署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要求你们的是以一部分兵力真攻济南（不是佯攻，也不是只占飞机场），而集中最大兵力于阻援与打援。济南是否攻克，决定于时间，而取得时间则决定于是否能阻援与打援……因不真攻济南，则援敌必不来。攻城使用兵力太大，则打援又无力量……同意你的意见，第一阶段以足够攻占机场及吸引援敌之力量（两至三个纵队）用于攻城，其余全部用于打援。

统一思想有了定盘星，曲阜作战会议29日确定，以攻占济南为主要目标，攻城集团兵力十四万，占总兵力44%，由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指挥，分东、西两个集团：以宋时轮指挥第三、十纵队，鲁中南、两广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六个半纵队组成西集团担任主攻；以聂凤智指挥第九、渤海纵队、渤海军区部队八个半纵队组成东集团担任助攻；以第十三纵队为总预备队，特纵炮兵和工兵配属两个攻城集团。阻援打援集团兵力十八万，占总兵力56%，由粟裕统一指挥；其中陈士渠指挥阻援集团第四、八纵队和冀鲁豫部队；粟裕指挥打援集团第一、二、六、七、十二纵队和中野十一纵队。

王耀武以泺口、马鞍山为界，将济南划分为东西两个守备区。东区由中央军五个旅守卫，西区由吴化文整编第九十六军等五个旅另两个总队守卫，兵力部署东强西弱，东部为防御重点。粟裕将攻城兵力重点使用于西线，以迅速夺占机场为第一作战目标，力求打乱敌部署，促使吴化文起义。作战部署实行钳形攻击，同时并进，多路突击，连续进击，使敌难以判明我军主攻方向。

作战部署31日上报中央军委，毛泽东9月2日复电同意。

> 《粟裕军事文集》，第382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
> 刘统：《决战华东》，第235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

9月9日，粟裕从宁阳大柏集指挥位置赴第十纵队参加西集团作战会议，宋时轮提出，济南机场敌集结兵力达五个旅之多，以三、十两纵力量，攻占机场有一定困难。8月，蒋介石令刘峙空运第八十三师援济，刘峙担心调兵致徐州空虚，便先运弹药缓运部队，此时正空运该师第十九旅部署济南西。粟裕遂致电许世友、谭震林，要求抽调总预备队第十三纵队支援攻打机场，并调鲁中部队协助。许世友、

谭震林复电，要求从西集团调一个纵队到津浦路以东，以便集中兵力。粟裕回电说，集中兵力的原则是对的，但要使用在重点上，强调“总以能迅速攻占机场为第一步作战目标”。[注]11日，许世友致电中央军委：以现在情况打下济南是有把握的，但从部署上看，我们兵力不集中，没有重点的使用，这样很容易造成对我不利……第一步就这样，但第二步我一定集中使用兵力。[注]

当日，毛泽东致电许世友，并告粟裕、谭震林、陈士榘：

>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第6—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此次作战目的，主要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一部分援敌，但在手段上即在兵力部署上，却不应以多数兵力打济南。如果以多数兵力打济南，以少数兵力打援敌，则因援敌甚多，势必阻不住，不能歼其一部，因而不能取得攻济的必要时间，则攻济必不成功……攻城部署应分两阶段，第一阶段集中优势兵力攻占西面飞机场，东面不要使用主力……第二阶段则依战况发展，将主力使用于最利发展之方向，如果东面利于发展，则应使用于东面。整个攻城指挥，由你们担负。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注]

统帅一锤定音，打援兵力多于攻城兵力部署，成为战略决战用兵模板。

15日，王耀武再飞南京面蒋，要求调自己曾任军长、由被歼重建的整编第七十四师改编而来的第七十四军援济。蒋介石允准后指示，共军战法是猛打猛冲，只要头几天稳得住，攻势就会受挫。援军到达兖州时，济南要抽两个师出击，南北夹击打败共军。

王耀武未想到，16日，他由宁返济当夜，攻济之战已打响。

济南东西南三面环山、北临黄河，东、西集团攻济外围战，围绕夺占山地要点展开。8月15日夜，渤海纵队在龙山首开西线战端，第十纵队俘获长清保安部队近千人。17日，王耀武判断解放军主攻方向在西，令第二师师长晏子风率总预备队第十九旅增援古城。

敌西线增兵时，聂凤智指挥东集团发起猛攻。战前，他向师团首长传达作战任务，故意把九纵担负的“助攻”任务说成是“主攻”，激励将士勇当攻坚先锋。16日夜，第九纵队二十五师七十四、七十五团，分别攻取“济南屏障”茂岭山（今五顶茂岭山）、砚池山。王耀武晨起得知东屏障两山皆失，不禁倒抽一口冷气。

茂岭山地形险要，是济南城东天然屏障。战前，王耀武亲命在此修筑夹壁墙与地堡相连坚固阵地，完工后又命炮兵向新修工事连发数炮，结果炮弹只在工事上留下几个浅坑，颇令守军振奋。王耀武乘车直抵第七十三师，见到师长曹振铎劈头便问：“昨晚茂岭山方向并无激烈炮声，共军是长了翅膀飞过来的？”当听说第十五旅有个营长枪一响就带兵溃逃，勃然大怒。营长被五花大绑押上，王耀武盯着他问：“你叫什么名字？”“朱国华。”“为什么开战就领兵逃跑？”“昨晚我喝酒了，醒来发现共军已上山，只好带弟兄们后撤。”“临阵退却该当何罪？”“枪毙。”“你有什么话要说吗？”朱国华哭诉：“我甘愿伏法，但别让父母和老婆孩子知道我是这样死的。我们打走了日本人，现在却自相残杀，这天下将来是谁的啊？”朱国华歇斯底里哭喊着，把心里话倾泻尽净，突然平静下来。王耀武的心像被刀子戳了一下。朱国华临刑遗言，竟触动了他心底最隐秘处！枪毙朱国华后，王耀武令第七十三师反击，师和第十九旅各伤亡团长一人。第九纵队二十五师进至燕子山、千佛山一线。

东线华野攻势犀利，王耀武又改判华野主攻方向在东，急调西线第十九、五十七旅驰援，将第二师二一一旅从机场收缩至城西商埠区。敌预备队疲于奔命驰援，因投入战斗过早乱了阵脚。

宋时轮指挥西集团分路突击，扫清外围后逼近济南机场。18日，第三纵队炮击机场。徐州第八十三师十九旅已运抵济南，第七十四军刚运了七个连即被炮击打断。蒋介石令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飞济侦察，只能眼看着满载第七十四军士兵的运输机掉头飞回徐州。

华野炮击济南机场，惊醒了去意徘徊的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吴化文从军即在西北军，1930年任韩复榘部手枪旅旅长兼济南警备司令，抗战中率部在山东打游击，1943年任日伪旗下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司令，后为国民党收编任陆军新编第五路军总司令。1945年10月，吴化文率第五、六军从徐州窜犯北上，遭陈毅部伏击，第六军被全歼。嗣后，吴对所部改编为山东保安第二纵队强烈不满，12月，蒋介石令其出击滕县，救援被围保安二师残部，有意延宕。蒋介石密令王耀武召吴入济，以违反军令罪“就地正法”。因好友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示警，吴方躲过一劫。

1946年6月，吴化文在南京密访老上司冯玉祥，渴望接触中共寻求后路。经冯玉祥安排，他与老师刘子衡以及李济深见面，获益良多。吴化文求见周恩来，周恩来考虑身边特务出没，见面恐将危及其安全，遂请李济深转告，我党欢迎吴化文先生站到人民方面来，共产党对他既往不咎，现在可保存实力，待机而动。

华东局和军区请刘子衡和吴化文的同学王道给他写信，鲁南军区政治委员傅秋涛、敌工部长胡成放积极做吴的工作。8月，华东军区联络部长刘贯一与吴签订

《兖州协议》，吴承诺约束部队不外出骚扰抢粮，与解放军建立联系并互换联络密码，待机起义。

是年夏，蒋介石路过兖州，为笼络吴化文，将吴部扩编为整编第八十四师，任命吴化文为师长，旋又擢升其为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兼八十四师师长。吴由此对蒋介石产生幻想，重新投入内战。华东局国军工作部协调孙中山大元帅府参军孙墨佛和刘子衡登门做工作，吴表示信守诺言，力避与我军发生大的战斗。

1948年初，王道安排李勇烈持信打入吴部当副官，吴化文两晤王道，决计于济南举事。4月，吴部第八十四师奉命沿胶济线解潍县之围推进缓慢，先头部队刚过淄河，潍县即告解放。此后，华东局社会部情报室一科科长王征明，受命介入策反吴化文。

济南成为孤城后，王耀武将城内豪宅张维之花园赠吴化文居住，又将保安第二旅改编为第九十六军独立旅以弥补战损。敌我拔河之际，陈毅让李勇烈给吴化文带话：上策，扣王耀武单独解决济南；中策，我军攻济时战场起义弃暗投明；下策，坚持打内战自取灭亡。吴化文表态：“愿在济南这一战略城市高举义旗，走向光明。”8月29日，吴化文向中共济南市委交出电台密码本。

9月17日晚，吴化文来到机场独立旅，示意旅长何志斌挥去传令兵，意味深长地说：“震寰，看来八路军（吴对解放军习称）这次决心要拿济南了，咱不能白白牺牲呀！”何志斌系冯玉祥旧部，与中共军队多有接触。吴化文的暗示，令他心头陡生漪澜。

何志斌曾任冯玉祥警卫营营长。1934年夏，蒋介石命韩复榘解除隐居泰山的冯玉祥武装，何志斌投奔鲁南抗日游击司令张里元部，任第十二纵队少将司令，同八路军协力抗日。1946年1月，第十二纵队改编为山东保安第六团，何志斌未接受改编，25日遵新四军之命从陶庄煤矿移驻滕县西集镇，六天后，陈毅代表中央军委委任何志斌为山东民主建国军第一师师长，还派来师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不料欢迎大会上，中共山东省政府一位专员大骂蒋介石，未肯定何部接受民主改编义举，引起官兵反感。连以上军官找何志斌摊牌：“我们不愿当新四军，司令带我们走，我们拥护你；不带我们走，队伍就拉走了。”骨干集体反水，何志斌孤掌难鸣，只好随波逐流，礼送新四军派来的师政委等三人返回，带领全部人马向临城（今枣庄薛城）开进。行至矿山头过河与新四军交火，七十多人被淹死，三百多人被俘，过河官兵仅剩千余人。

何志斌率部到临城后，因无给养接济，只得到新四军控制区征集粮饷。困厄中何志斌给陈毅写信：“西集九天，多蒙厚待，以后有机，力图厚报。”他命令部队，“今后游而不击，遇共产党军队不打硬仗”。1947年冬，何志斌已任保安第

二旅旅长，奉命赴蒙阴给新四军包围的保安第八旅解围，他以弹药不足为由按兵不动。

何志斌转隶吴化文麾下后，虽对这位倒戈将军印象不佳，却拥护他高举义旗。吴化文曾暗示何志斌，此次济南保卫战不要硬拼。何志斌心领神会。此间，王耀武两次找何志斌谈话，对其封官许愿，他都对吴化文的动向讳莫如深，并为之打掩护。

1948年9月17日晚，何志斌送吴化文上车时，对其明确表态：“军长的意思我明白，到时候我绝对服从！”

“好极了！”何志斌一力相应，吴化文紧紧握住了他的手。

9月19日，西突击集团歼灭第九十六军一个营，吴化文十分恼火，形势陡然逆转。经敌工干部协调，华野第三纵队司令员孙继先与吴化文及时通话后，吴下决心率第九十六军八十四师一五五、一六一旅及军独立旅举行战场起义。当晚军事会议结束后，吴化文给何志斌打电话：“为减少官兵和济南人民伤亡，我军决定今晚九时举行战场起义，你是否同意？”何志斌说：“我绝对同意！”吴化文说：“好！立即通知前线停止战斗！”何志斌说：“坚决执行命令！”他派参谋长高来宾严密控制王耀武派来的第一团团长、副团长和三营营长，给第二、三团团长介绍战场形势，讲清不为蒋介石殉葬的道理，宣布部队已经战场起义，众皆表示服从命令。

吴化文起义敞开了济南西大门，华野第三、十三纵队迅速突入，抵近商埠。王耀武急电蒋介石请求突围。20日中午，蒋介石与幕僚再次研判济南战局后，手拟致王耀武长电，“勖勉其死守济南，勿作突围之念，并告其必能获胜利也”。王耀武遂将西线保安部队撤至商埠、火车站，统归第二师二一一旅指挥；将第七十四军七个连调至邮电大楼和德国领事馆，封锁商埠通往内城道路；令曹振铎、晏子风等部内城守军，拆毁城墙附近民房扫清射界。蒋介石在日记中哀叹：“吴化文叛变以后，不仅影响于济南之失陷，而其关于全国之军心，尤其关于冯玉祥之旧部所残留于国军者约十五万人之不安，更为重大。从此军心之团结尤难矣，思之寒心。”

第十三纵队任总预备队早憋了一肚子气，19日参加西集团攻城犹如猛虎下山。该纵第三十七师一一〇团三营营长刘坤六次负伤，团里念及他是一等残废，让其留后。刘坤跑到团部，将残废证“啪”地往桌上一拍“退”给团里，连写几份请战书，直至获准参战。

当日午夜，刘坤带三营抵达商埠外围，一战士领一老乡来报，辛庄营房附近有敌一个军火库，守敌仅一个排。刘坤与营教导员王文一商量，由王文带七连三下五除二解决军火库守敌，缴获几十门山炮、野炮和92步兵炮，第十三纵队每师临时组建一个炮兵连。

20日上午，第三、十三纵队突入商埠，第十纵队占领飞机场。

刘坤带三营突入楼房林立、碉堡密布的商圈，即沿七大马路两侧避开地堡向外城猛插，被一高楼挡住了去路。左行是一条死巷，右行有一钢筋水泥构筑的街心巨堡。刘坤命先行九连连长秦嗣照以机枪打穿甲弹破墙，九连三挺机枪一阵猛射致墙体酥软，战士们挥镐舞锹在墙上掏洞，仅用十几分钟，部队就穿墙而过。

三营高墙打洞，矮墙搭人梯翻越，拂晓前进至外城城墙下杆石桥，生俘还在呼呼大睡的守敌一个连。天亮后，城内敌军发现城外阵地失守，向三营频频发起攻击，均被击退。上午十时，守敌以百姓为盾牌，手持火把向三营阵地涌来。刘坤意识到敌企图纵火烧房火攻夺回阵地，遂留下几名特等射手占据有利位置，其余人后撤设伏。敌人挟持群众进入伏击圈，“砰！砰！”躲在群众身后的敌人应声倒下。伏兵三面出击，一个漂亮的小穿插将敌与群众隔开，以白刃格斗救出群众。混战中，敌纵火烧房，三营一面与群众救火，一面搏杀来犯之敌，牢牢掌控着杆石桥阵地。

21日晨，第三纵队八师占领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师长王吉文指挥追歼逃向内城的青年教导总队中炮壮烈牺牲。22日，第三纵队九师攻占“绥靖区”司令部大楼，西线我军占领商埠并扫清外围。

22日黄昏，东、西集团同时攻击济南外城。东线第九纵队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以四辆美式坦克突击永固门。守敌以为是自己人，高喊：“别误会，我们是保六旅的！”坦克以连珠炮回应，直抵城下轰开永固门。第七十三团未行爆破和架梯登城，便直接突入外城。

西线第十纵队攻击外城永镇门和普利门，第二十九师八十五团爆破队兵分七路，炸毁城门外鹿砦、地堡和桥头堡，以三百斤炸药一举炸塌永镇门，后续部队攻入外城，普利门亦被友邻突破。

22日晚七时，第十三纵队三十八师一一二团七连副连长王成斌，从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中醒过来，发现由他率领的突击队爆破手张智忠第三次送的大炸药包，把杆石桥南侧的外城城墙上端炸开一道大口子，果断向三排长李天助挥手喊道：“上！”三排九班旋风般将云梯架上城墙缺口，李天助第一个冲上城头，八班长蔡萼带领全班接踵登城，张智忠趁势攻占了突破口左侧一个地堡，只身击退五六

个敌人。对面城楼和“万字会”大楼上敌军向突破口疯狂射击，王成斌登上城头，发现李天助头、肩部均受重伤，给他包扎伤口时，自己也负了伤。卫生员前来抢救，不幸中弹倒下。“我不行了！”李天助借助牙齿拉弦向冲上前来的守敌投出一颗手榴弹，头一歪牺牲在王成斌怀里。一敌兵乘王成斌不备，拽住其军衣前襟想把他甩下城头。王成斌拔出匣子枪一通连射，敌兵惨叫着坠落城下。此时，八班长蔡萼正带领战士在城门内攻克敌堡，后续部队尚未登城，突破口上只有王成斌一人。他接连投出身上携带的十六枚手榴弹，打退守敌多波次进攻。突然，敌一中尉军官冲过来拦腰抱住王成斌，两人在城头扭打起来。敌军官举枪欲射，被王成斌连手带枪咬住。敌军官拼死挣脱，手枪别掉王成斌一排牙。生死关头，王成斌扭住敌军官持枪右手拔枪怒射，打得敌军官像一坨肉摔在地上。王成斌牢牢守住突破口，为七连二梯队冲破敌火网登上城头赢得了时间，第一一二团主力从杆石桥顺利突入外城。战后，王成斌升任连长，1990年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22日晚十一时，第一〇九团突破外城西南杆石桥北永绥门，第三十七师全歼守敌第二一三旅旅部及一个团。第一一〇团三营跟进快速进至趵突泉，隐蔽于坤顺门附近。第十三纵队与第九纵队会师外城。

夜暗中，第一一〇团三营营长刘坤抓到一名前来探路的国民党兵，得知驻齐鲁大学青年教导总队正向内城逃窜，即带七连连长和一个排，加强一个重机枪班，组成四十余人的尖刀排，直趋敌龟缩大院与之激战，不到三十分钟俘敌一千多人。随后，尖刀排一鼓作气冲进齐鲁大学，扫除残敌数百人，共歼敌二千多人。

南线阻援打援战场，粟裕取“夹运（河）而阵”作战部署，置十八万部队于运河两岸。河西配置两个纵队另两个旅，阻击由鲁西南北犯之敌；河东配置六个纵队另六个旅，阻击河东或沿津浦线北进援敌。杜聿明原拟济南开战五天后，华野伤亡惨重时北上增援。济南外城迅速破防，杜聿明仓促率邱、黄兵团驰援，但始终在华野阻援打援部队阵地前徘徊不敢北上。蒋介石令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派机轰炸济南，第十三纵队三十七师政治委员徐海珊牺牲。

《九纵济南战役政治工作总结》，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藏件。

为不给敌喘息之机，许谭王决定趁热打铁攻取内城，由第九、十三纵队分别从东南和西南角城墙突破。第九纵队4月曾两打潍县：攻克潍县当天，聂凤智令“再攻一次城”，真刀实枪复盘提高部队大规模城市攻坚能力。内城东南角城墙高十四米、宽十二米，墙上有三层火力网，下有地堡；护城河宽五米、深二米，墙头气象台为全城制高点。第九纵队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担任主攻，第七十六、七十九、八十团各一个连助攻。23日下午六时，炮火猛轰东南、西南城墙两角一小时，第七十六、八十团各一个连利用云梯攻城相继失利。晚七时五十分，第七十九团七

连勇士攀上城头，敌从城墙后藏兵洞涌上城墙，七连打退敌五次进攻，因云梯被打断后续不继，孤军奋战一小时全部伤亡。第七十三团三营七连清除地堡爆破城墙，乘势把云梯架上城头，守敌从城墙扔集束手榴弹将云梯炸毁。

几支突击队迭挫刀锋，聂凤智调整作战部署。24日凌晨一时三十分，第九纵队集中全部火炮猛轰内城东南角，炮弹还在城头爆炸，第五次攻城开始，第七十三团七连指导员彭超指挥四名战士将三丈六尺高的云梯架上城墙，城头碎砖瀑布般下泻，架梯的战士被砸得头破血流仍屹立不动。“突击班，上！”七连连长肖锡谦令八、九班组成的第一突击班上梯，遭敌侧射纷纷坠落在地。“二虎，上！”肖连长话音刚落，二班长李永江把冲锋枪往脖子上一套，抓起几个手榴弹插进腰带，吼一声“二班跟我上！”率先攀上云梯顶端。抬头一看，离城头还有一人多高。二时二十五分，李永江两手抠住上方城墙，双脚奋力一蹬，跃身翻上城头。敌军迎面扑来，李永江先敌开火，用手榴弹将其炸回。一敌兵搬集束手榴弹欲炸云梯，李永江飞起一脚将其踹下城墙。扭头看时，北、西两面敌人一齐朝城头东南角冲来，李永江右手持冲锋枪扫射北面之敌，左手以牙拉火投手榴弹阻遏西面之敌。这时，战士于洪铎、滕元兴和机枪手王会上来了。“老于、小滕往西打，王会守正面！”李永江喊着，闪身进入一个空堡，打退北面反扑敌兵，向气象台下一喷着火舌的地堡喊话，迫使二十多名守敌缴械投降。于洪铎、滕元兴打死敌机枪手，压制藏兵洞涌出敌兵。肖连长攀上城头，令李永江等人占领工事，搜集弹药对付敌反扑；彭指导员组织七连后续力量登城，八、九连亦乘势而上，三营控制了气象台制高点。

九连班长王其鹏激战外城就和战友活捉保安第六旅少将旅长徐振中，登上城墙后，率两名战士打退敌一个排反扑，弹药用光捡起一把菜刀生俘三名敌人。部队冲下城墙进入巷战时，他第一个跳下十四米高的城墙从群敌中夺取一挺机枪，俘敌六十多人。

23日晚，第十三纵队司令员周志坚指挥第三十七师一〇九团攻击内城西南角坤顺门。该团七连晚七时十分登城突破向两侧扩张，守敌猛烈反击，第一〇九团除三连、九连下墙突入城内外，大部牺牲在城墙上。晚九时许，敌重占坤顺门突破口。第三十七师一一〇团一营复又攻城，苦战大半夜未果。凌晨，周志坚命该团三营接续攻城，营长刘坤指挥九连在坤顺门右侧城墙接头拐角处把云梯架上城头。守敌居高临下，以火力压制破坏架梯，九连四次攻击均告失利。第五次架梯，九连得纵队部署在齐鲁大学医院楼上的山炮支援，连长秦嗣照和指导员张福善率全连飞速登城，与守敌短兵相接展开肉搏。战士李志兴一连刺倒七八个敌人，又把四个敌人推到城墙下，厮打中抱住一个敌人翻下城头。敌两次反击失败，以十数倍兵力再度反扑，九连连长指导员相继倒下。因被敌火力所阻后援不继，城头仅剩副班长李来祥和一名战士，两人一人拧手榴弹盖并拉出引线，一人

投弹阻止敌接近云梯。正在城内巷战的第一〇九团三、九两连，分兵回击城头之敌策应攻城。身负重伤的刘坤振臂一呼，第一一〇团三营八连、七连乘势登城。24日拂晓，第三十七师控制坤顺门近百米城墙，后续部队潮水般涌入城中。

第九、十三纵队攻城部队，以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突破敌最后防线，像两把锋利的钢刀直插内城，打开了胜利之门。

24日黎明，第三、九、十、十三纵队逼近大明湖畔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王耀武北极阁指挥部通信中断。上午十一时，王耀武命绥靖区参谋长罗辛理全权指挥，自己带卫士从坑道出城逃逸。此前，济南市公安局呈请处决在押的二百多名中共党员。王耀武挥笔涂掉批件上“密裁”二字，批示连同被俘解放军伤员“全部放走”。

24日，第九纵队二十五师和第十三纵队五个团，包围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罗辛理等投降。双龙街、阁后街、南门守军缴械。守敌第二师师长晏子风被落弹震晕，醒来已成俘虏。当日，济南战役胜利结束。

济南告急后，邱清泉援军日进十几里，济南失守才到鲁西南成武、曹县，旋缩回徐州、商丘。黄百韬、李弥兵团尚在集结中。

王耀武出城藏于工事，天黑进村化装成商人，28日乘马车去青岛行至寿光县屯田村，被县公安局政卫队刘金光等人查获。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牟中珩、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庞镜塘，外逃中亦被俘。山东保安司令部中将副司令聂松溪在济投案自首。

1934年12月，刀折矢尽的皖南谭家桥之战，曾任红七军团军团长的红十九师师长寻淮洲，率部力战王耀武指挥的国民党军补充一旅牺牲，皖浙赣边新苏区主席方志敏在怀玉山被捕牺牲。十四年后，当年的红七军团参谋长粟裕，指挥大军攻克济南并活捉王耀武，以捷报告慰方志敏、寻淮洲等先烈的在天之灵。

济南战役华野伤亡二万六千九百九十一人，全歼守敌十万四千多人，生俘王耀武等高级将领二十三人。10月10日，经中央军委批准，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分别授予第九纵队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和第十三纵队三十七师一〇九团“济南第一团”“济南第二团”荣誉称号；李永江、李来祥、王其鹏、于洪铎等人获授“济南英雄”荣誉称号；刘坤被评为华东一级战斗英雄。1950年11月和1951年9月，副连长李永江和营参谋长王其鹏先后在朝鲜战场英勇牺牲。

中共中央29日致华东军区和华野电指出，济南战役“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的最严重的打击之一”。毛泽东为新华社《庆祝济南解放》社论题目加上“的伟大胜利”五字，添写“这是证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国民

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了，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已经无法逃脱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86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济南战役是战略决战先声。周恩来后来说：“三大战役的序幕是济南战役。”[注] 毛泽东原拟用二十天、一个月、二个月甚至三个月打济南。华东野战军八天首开攻取十万以上守敌大城市纪录，令统帅战略底气大增。在毛泽东督导和济南战役鼓舞下，东北野战军10月15日再取十万守敌的锦州，预示着人民解放军已获战略进攻制胜权。

济南战役使华东、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重塑南线格局，威胁长江南北。此役还为三大战役造势并提供战略战术运用示范。华东局调集冀鲁豫、鲁中、胶东、渤海根据地五十多万民工和数万辆小车，运送粮弹五千多万斤，遂行了另一场大兵团作战。

攻克济南军事上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部署，外交上加深了国民党与美国的裂痕，政治上激化了国民党内部之间的矛盾。

蒋介石日记自述，“三夜来未得安眠”，“济南失陷，对外对内关系太大，有损于政府威信莫甚”，“自觉无颜立世矣”。

陈诚无奈哀叹：“‘戡乱’时期的剿共军事，以三十七年九月下旬济南的失陷，作为一个转捩点。在此以前，可以说胜败之机，犹未大定，国军努力的机会，还有争取的可能。但在此以后，显然已成江河日下之势，狂澜既倒，无可挽回矣。”

济南战役前，美国舆论界认为：“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尚未达到夺取国民党任何一个防守较强的城市中心的程度。”华野攻占济南仅两天，美联社便发表评论说：“自今而后，共产党要到何处，就到何处，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没有什么阻挡了。”该社宣称，济南的解放是动摇蒋介石政权的根基之战。

（十）蝶变：“小淮海”成为“大淮海”

早在筹划济南战役时，粟裕的思维触角就开始前伸，认为夺取济南后，华野以兵出徐蚌线以东为宜。如寻战于徐州西南，将处于蒋军徐州与武汉两集团之间，一开始就将与优势之敌决战。

《粟裕军事文集》，第376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

1948年8月23日，粟裕在宁阳大柏集华野指挥部致电中央军委：“两个月以后，我们即可举全力沿运河及津浦南下，以一个兵团攻占两淮及高（邮）、宝（应），则苏北局势即可大大开展。”[注]粟裕建议，南下作战亦取“攻济打援”战法，攻取两淮及高宝后，主力置于运河两岸，歼灭徐海可能来援之敌。如敌不来援，则以三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他为此战冠名“淮海战役”。

《粟裕军事文集》，第393—394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

9月24日晨，粟裕判定攻济之战已稳操胜券，徐州之敌停止北援可能性很大，遂不失时机向中央军委及刘陈邓发出电报：“攻济战斗日内即可完全结束”，“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粟裕设想此役“第一阶段以苏北兵团（须加强一个纵队）攻占两淮，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如敌不援或被阻，“即进行战役第二步，以三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如即休整，“易失去适宜作战之秋凉气候和济南失守后加之于敌人之精神压力”。[注]

攻济之战伤亡可控，阻援集团兵锋正锐，系粟裕不休即战的底气。拟议中的“淮海战役”尚无战略决战内涵，史称“小淮海”。

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第1版。

毛泽东对决战淮海积极而慎重，9月25日复电粟裕：“望你们召集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及其他可能到会之干部，开一次讨论行动的会议，以最后斟酌的意见电告我们审查。”当日，刘陈邓致电中央军委：“同意乘胜进行淮海战役。”[注]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第1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中原诸将勠力求战，毛泽东再电华野，要求查明淮海地区敌情。内线情报渠道密息显示：邱清泉将退回商砀地区，黄百韬将回至新安镇、运河车站地区。25日晚，知己知彼的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研究的意见致电饶漱石、粟裕并告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刘伯承、陈毅、李达：“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注]

10月11日，毛泽东致电华野，阐明了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

国民党军1948年9月恢复常规军、师建制，黄百韬第七兵团辖第二十五、六十三、六十四军。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51—135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一）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为达到这一目的，应以两个纵队担任歼灭敌一个师的办法，共以六个至七个纵队，分割歼灭敌二十五师、六十三师、六十四师[注]以五个至六个纵队，担任阻援和打援。以一个至二个纵队，歼灭临城、韩庄地区李弥部一个旅，并力求占领临韩，从北面威胁徐州，使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不敢以全力东援。以一个纵队，加地方兵团，位于鲁西南，侧击徐州、商丘段，以牵制邱兵团一部……以一个至二个纵队，活动于宿迁、睢宁、灵璧地区，以牵制李兵团……这一部署，大体如同9月间攻济打援的部署……第一阶段，力争在战役开始后两星期至三星期内结束。（二）第二阶段，以大约五个纵队，攻歼海州、新浦、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并占领各城……而以其余兵力（主力）担任钳制邱李两兵团……此阶段亦须争取于两个至三个星期内完结。（三）第三阶段，可设想在两淮方面作战……此阶段，大约亦须有两个至三个星期。三个阶段大概共须有一个半月至两个月的时间。（四）你们以11、12两月完成淮海战役。明年1月休整。3至7月同刘邓协力作战，将敌打至江边各点固守。秋季你们主力大约可以举行渡江作战。[注]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第76—7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14日，毛泽东致电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并告中原局，调整华野六个纵队作战部署，将打援部队放在侧面，威胁徐州城和徐蚌线，使国民党军“第一个感觉是我军似乎有意夺取徐州，而不能确切断定我军并非夺取徐州，而是歼灭黄兵团。等到我军对黄兵团攻歼紧急而决定增援时，又发现如不解决南北两侧威胁，则很难赴援。这样就给我军以必要的时间歼灭黄兵团”。明确“以一、四、六、七、十一、鲁中等六个纵队再加特纵，担任歼灭黄兵团三个师，这是全战役的中心目标”。刘邓主力战役发起前就攻击郑州、威逼开封，吸引刘汝明、孙元良兵团，配合华野作战。[注]

毛泽东赞同粟裕设想并确定首歼黄百韬，以打援隐蔽歼黄企图并令中野配合华野作战，此役遂成三大战役中唯一由战役指挥员建议发起并冠名，经统帅部升华为定鼎之战的战略性进攻战役。

淮海战役精心布局之际，杜聿明正殚精竭虑思谋如何施展国军武器和机动力强项主动出击，扭转处处被动挨打局面。9月下旬，杜聿明提出放弃郑州、开封、商丘，集中机动兵团于鲁西南，寻机与华野主力决战。经刘峙同意，杜聿明10月2日径飞北平向蒋介石汇报，获准后回南京与顾祝同研究实施方案，7日即向邱清泉、

黄百韬、李弥作部署，行动时间定为15日。孰料15日清晨，杜聿明正欲赴前方指挥所，蒋介石急令他飞东北指挥会战，出击华野计划流产。这一阴差阳错，为华野、中野决胜淮海，奉上了宝贵的二十天时间，先手棋机会易主。

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淮海战役亲历记》，第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2月第1版。

10月22日，南京国防部判断解放军可能进攻徐蚌、进逼江淮，决定放弃陇海线上郑州、开封等城市，集中重兵集团于徐州外围，打造“攻势防御”：将孙元良第十六兵团调往涡阳、蒙城地区；将邱清泉第二兵团调到砀山地区；黄百韬第七兵团在运河以东新安镇；李弥第十三兵团在运河以西曹八集；冯治安第三绥靖区部队在台儿庄、贾汪；李延年第九绥靖区部队在海州；调黄维第十二兵团东进，策应徐州方面作战。杜聿明后来反思说，自徐州到蚌埠间二百多公里的铁路两侧，摆了数十万大军，既弃置徐州既设永久工事而不守，又将各兵团摆于铁路两侧毫无既设阵地的一条长形地带，形成鼠头蛇尾，到处挨打的态势。古今中外的战史中还找不到这样一种集中会战的战略先例。[注]

这个饱受诟病的蹩脚布阵，始作俑者是蒋介石。他认为，现代作战最紧要的莫过于交通，于是明确国军作战的纲领是先占领据点，掌握交通，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

蒋介石的徐蚌会战计划，美国人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白崇禧，字健生。

10月22日，美国顾问团团长巴大维邀顾祝同、郭汝瑰等讨论中原作战计划，根据中野向禹县移动情报，判断其有协同华野打中原大战可能。鉴于中原国军分由徐州、华中两“剿总”掌握，指挥不便，而徐州“剿总”刘峙不堪当此重任，故主张由白崇禧统一指挥。四个月前，主张“守江必守淮”的白崇禧，曾提出两“剿总”统一指挥，但被蒋介石一口否定。何应钦令国防部三厅连夜做案，征得白崇禧同意后，郭汝瑰23日乘专机到北平圆恩寺向蒋介石汇报。行前，顾祝同再三叮咛：“要报告总统，白健生[注]统一指挥是暂时的，会战结束后，徐州和华中‘剿总’仍分区负责。”郭汝瑰向蒋介石汇报后，遵嘱专门说明白崇禧是暂时负责统一指挥。蒋介石说:“不要暂时指挥，就叫他统一指挥下去好了。”

郭汝瑰24日回到南京，何应钦即以“酉敬阳挥电”下令白崇禧统一指挥中原军事。29日，顾祝同和何应钦召开作战会议，按白崇禧“守江必守淮”思想提出两案：一是集中优势兵力于徐州、蚌埠间津浦铁路两侧作战略防御，解放军南下时

寻机与之决战；二是放弃徐州，退守淮河进行河川防御战。会议商定采用第一案，但蒋介石却倾向于第二案，以“争取第二线战略配置的时间”。

30日，廖耀湘援锦西进兵团被全歼，廖耀湘被俘，在北平指挥会战的蒋介石气得口吐鲜血。当天下午，白崇禧飞南京参加国防部会议，满口答应以黄维第十二兵团转用于阜阳、上蔡、太和地区，还提议以张淦第三兵团随黄维兵团进出阜阳和太和地区。

31日上午，国防部再议中原作战，郭汝瑰根据蒋介石指令报告，邱清泉第二兵团集结商丘，黄百韬第七兵团集结新安，李弥第十三兵团集结宿县固镇，又北上徐州。白崇禧认为，部队“一”字形摊开在陇海线上，津浦线南面纵深配备不够，会战一旦展开，主力南移不易，而重新部署已来不及了。他料定，如将来不能撤出徐州主力保卫淮南，蒋介石一定会嫁祸于自己，遂对何应钦说：“徐州‘剿总’如此部署兵力，要想改变已经时不与我了。”他幡然变卦，断然拒绝统一指挥中原大军，说什么也不蹚蒋介石的浑水。蒋介石只得以难孚众望的徐州“剿总”刘峙指挥。

南京决胜徐淮一将难求，粟裕等10月23日签发战役预备命令，决定华野中野主力首歼黄兵团，并求歼冯治安一部或大部，而后视情进击两淮、高宝及新安镇、海州地区，或再歼徐州东援之邱李兵团一部或大部，西进津浦，南逼长江，迫敌转入防御。

粟裕：《粟裕军事文集》，第416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

27日，中野主力四个纵队由郑州东进徐蚌战场。此时，华野有十五个纵队，中野十一纵也暂归粟裕指挥。鉴于华野、中野已由战略上配合作战，发展为战役上协同作战，实行统一指挥势在必行。粟裕不循由参战部队多单位主官指挥惯例，31日致电中央军委和陈邓：“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注]因刘伯承正率军在伏牛山牵制黄维兵团，故未建议由他指挥。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第16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11月1日，中央军委复电：“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注]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淮海战役》第一册，第111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当时，陈邓一直随中野四纵行动，而四纵与华野电台无法沟通。2日，陈邓致电中央军委和华野：“本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惟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

方面多直接指挥。”

粟裕及时建言明确南线战略决战统一指挥，为“小淮海”演变为“大淮海”和嗣后总前委诞生，从政治和组织上做了准备。

蒋介石回南京后，得知白崇禧拒绝统一指挥徐蚌会战，而熟悉徐州情况的杜聿明无须再留葫芦岛指挥撤退，遂改变派宋希濂去徐州领兵的打算，11月10日指令杜聿明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救火队长”去而复归，令徐州一线国军将士为之一振。毕竟，1947年之前，国军在东北战场上打的胜仗，大部分为杜聿明和白崇禧所指挥。11月5日，顾祝同在徐州召集刘峙、邱清泉、黄百韬、李弥等开会，确定集中优势兵力于津浦铁路徐蚌段两侧作战略防御，解放军南下时寻机与之决战。

11月2日，歼敌四十七万二千人的辽沈战役结束，胜利天平历史性倾向人民一边。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东北全境解放，其主产品在全国占比，铁80%，钢材90%，煤炭49%，发电75%；大豆占世界60%以上，毛泽东眼中喜添“新关中”。解放区虽无黄金外汇作准备金，但尽揽华北中原粮棉主产区，以征收粮、棉、煤等实物为后盾发行货币，财政收入迅速超过国民政府，成为支持解放战争的重要财源。粟裕认为，辽沈大捷是继中原我军实现统一指挥之后，南线得以遂行战略决战的第二个重要条件。

11月4日，粟裕等下达淮海战役攻击命令：一、六、九纵直扑新安镇黄兵团；四、八纵经邳县抢占运河铁路桥；山东兵团七、十、十三纵从临城、枣庄直趋万年闸、台儿庄、韩庄，攻击冯治安部；三纵和两广纵队配合中野从单县挺进砀山，进逼徐州。遵毛泽东10月30日复电示，战役统于11月8日晚发起。

国民党判断华野要打徐州，遂于11月4日调整部署，将主力集中于徐州周围。黄百韬建议，以徐州为中心，集结各兵团对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备战，弃海州将第三绥靖区部队和第四十四军西调。刘峙采纳此议，将第一〇〇军和驻海州第四十四军统归黄百韬指挥，令黄率两军和李延年第九绥靖区司令部撤往徐州。淮海战场云谲波诡，非嫡系获擢升兵团司令的黄百韬，出于对蒋介石知遇之恩的感戴，处危境而不殆，在新安镇坐等三军到来。

5日晚，李延年在海州与总统府战地视察官李以劻商议撤退事。孟良崮战役后，蒋介石发现战场来电多有失真，遂派“战地钦差”直报战况。谈话间，驻地一唐姓盐商求见李延年，要求一起回徐州。李延年问：“你怎么知道我回徐州？”唐说：“刘峙总司令打来电报，不要海州了。”李延年这才明白，刘峙私下做盐生意，唐是其经纪人。他望着李以劻摇头叹息：“刘经扶（刘峙字经扶）视钱财比国家的事还大，这样泄露军事机密，不败何待！”

李延年何尝不知，“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将军和军需官做生意，师团营连长“吃空饷”，已成国军公开秘密。望着部队与官员、商人、学生犹溃堤之水一齐涌向新安镇，他只有摇头叹息。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第17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海州之敌欲西撤，何基沣、张克侠拟起义，粟裕提前两天发起战役，6日晚上报中央军委和刘陈邓并下达部队执行。毛泽东次日复电“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

李延年、李以劻6日晚抵新安镇，却见黄百韬满脸憔悴，手持教鞭指着地图一力抱怨：“华野分明是想先打七兵团，我兵团在新安镇决战则孤军无援，侧敌西进到不了徐州就会遇敌。国防部作战计划一变再变，处处被动，正是将帅无才，累死三军！”他扔掉教鞭，颤声说：“如果这次会战垮了，党国将如何？国事千钧重，头颅一掷轻，我个人生死倒无所谓。”李以劻安慰他说：“不要把局势看得太严重，毕竟手下有十数万大军，共军未必能奈你何。”

是夜，鲁中南纵队在郯城歼灭保安一旅王洪九部三千余人。

午夜十二时，黄百韬叫醒李以劻说：“今晚已获确息，华野十几个纵队均已南下，先头部队已到郯城，首先围我无疑。为安全计，你明早就走吧，回去请报告刘峙总司令，一定派兵前来援救！”他叹口气，又说：“古人说，胜则举杯相庆，败则出死力相救，我们是办不到的。请你面报总统，我黄某受总统知遇之隆，早置生死于度外，我临难是不苟免的。我的话你一定转达到呀！”

11月7日，粟裕、张震致电谭震林、王建安，并报中央军委、陈毅、邓小平，建议中野以主力直出津浦路徐蚌段截断徐州之敌退路，使李、邱兵团不能南撤。华野解决黄兵团后即加入歼灭李兵团，主力则协同中原军攻击徐蚌段，孤立徐州，以利今后渡江作战。

7日中午，保一旅旅长王洪九逃进黄兵团部，脚上只剩一只鞋。看到这个蓬头跣足的败军之将，黄百韬陡生不祥之感。

当日，华野第一、四、六、八、九纵队分路挺进运河东岸新安镇、官湖镇、运河车站。宋时轮率第十纵队向运河疾进，在韩庄附近误入国民党第七十七军三十四师一一一团三营防区。警卫员下车探查情况被俘，营长王世江即将其释放，由他带领面见宋时轮决定高举义帜，成为淮海战役首支战场起义部队。第十纵队顺利跨过运河。

同一天，华野第四纵队占领邳县，审俘获悉黄兵团正渡河西进靠拢徐州。8日晨，粟裕令第四纵队不顾一切，午夜攻占已陷“肠梗阻”的运河铁桥。黄兵团第六十三军虽已南去窑湾镇渡河，其余四个军由此西渡仍慢如蜗牛。黄百韬急令架设浮桥，但为时已晚。

辰时，上午七时至九时。

中央军委8日复电粟裕等人：“虞（7日）午电悉。估计及部署均很好。”当日辰时[注]，粟裕、张震致电中央军委和陈毅、邓小平等人：“歼灭黄兵团之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新海敌主力已西撤），而以主力转向徐蚌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

8日，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员张克侠、何基沣，率第五十九、七十七军二万三千人起义，贾汪至台儿庄防线随之敞开，华野山东兵团迅速越过韩庄运河，切断了黄兵团与徐州的联系。毛泽东闻讯与周恩来以茶代酒，举杯庆贺，并驰电淮海：“北线何、张起义是第一个大胜利。”粟裕后来说：“如果再晚四个小时，让黄百韬窜入徐州，与邱清泉、李弥会合，仗就不好打了。”

当日下午，第四纵队十二师三十六团冒寒徒涉过河，向炮车、运河车站一线猛插，黄昏在运河车站以北八家杨村与黄兵团第一〇〇军后卫部队遭遇，激战竟夜。天亮时，华野主力逼近运河铁桥。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第18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11月9日，中央军委复电粟张，并告华东局，陈邓，中原局：“齐（8日）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注]

这封电报表明，中央军委已决心将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战略决战，是“小淮海”演化为“大淮海”的标志。粟裕后来谈到中央军委11月9日复电激动地说：“这个电报虽短，但字字千钧！”

9日上午，黄兵团第二十五军在第一〇〇军掩护下通过运河，下午，第一〇〇军军长周志道令后卫第四十四师撤往河西。第二十五军工兵慑于解放军飞兵逼近，想提前炸桥。周志道吼道：“老子一个师还没过桥，哪个敢炸？”第四十四师师长刘声鹤率一个团刚过桥，桥东一辆弹药车突然起火爆炸。守桥工兵以为解放军到了，慌忙起爆炸桥，第四十四师余部滞留河东。华野占领铁桥后以木板修复桥面，第四纵队主力和第八纵队两个师迅速渡河西进。

黄兵团第六十三军南下窑湾西渡运河，不想率先步入死地。

窑湾毗邻京杭大运河，三面环水，碉楼林立，镇区建筑按奇门遁甲七星五行八卦迷宫阵布局，临陆挖有深、宽各十米的壕沟。

8日晚，第六十三军在埝头镇（今新沂草桥镇堰头村）被华野第九纵队追歼两千人，军长陈章为西渡派工兵到窑湾运河架桥，遭华野第十一纵队三十三师隔河堵击，华野第一纵队受命追击该敌至窑湾。

济南战役后，华野第一纵队司令员叶飞害黑热病留济治疗，副司令员刘飞率军南下。敌仓促布防、立足未稳，刘飞决心不予敌以喘息之机，于行进间令所属三个师三面包围压缩敌于窑湾，纵队不留预备队，肃清外围不再调整部署即转入总攻。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首场大戏围歼第六十三军之战，10日拂晓拉开大幕。

11日下午四时，第一纵队开始发起总攻。第二师六团二营五连前期战斗伤亡大，可战之兵仅余二十多人。人称“猴子的脑袋老虎的胆”的指导员周文江，将全连剩余人员编成两个班，一个班担任警戒，半个班搜索前进，他带半个班爬上屋顶，撬瓦向室内之敌扔手榴弹，边搜边打，晚十时打开通道。周文江带通信员勇闯敌第一八六师六团团部，攻心斗智俘敌上校团副以下四百多人。12日拂晓，第六十三军尚余一万三千人被全歼，军长陈章企图从运河泅水逃跑被击毙。该军是淮海战役首个被整建制歼灭的军。

王朝已是风雨飘摇，蒋介石仍沉湎于拉美国下水的春秋大梦，11月9日致函杜鲁门，要求美国直接指挥国军作战。11日，美国副参谋总长魏德迈，在华盛顿与南京政府代表蒋匀田研究中国战场形势说：“如徐州失守，唯有退保中国东南与台、澎地区。按地理形势说，自福州至昆明地带，较易防守，所以我划一条代表战略地带的红线。惟四川省的战略价值甚高，不应轻易放弃，所以我划一条虚线，以为试守之计。”蒋匀田将此案面呈蒋介石。

黄百韬兵团11月9日抵碾庄，因人困马乏欲就地休整。诸将提醒不可停留。但先行第六十四军军长刘镇湘说已修好阵地，弃之可惜，不可侧敌西进。黄百韬在新安镇坐等第四十四军两天贻误战机，又决定在此停留一天等第六十三军。10日，李弥兵团在曹八集（今八义集）接令撤往徐州，不等黄兵团到来即开拔。翌日，第十三纵队进占曹八集，华野十一个纵队完成对黄兵团合围。

黄百韬至死对李弥不掩护其西移耿耿于怀，而杜聿明对此惨败的反思则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1960年，周恩来接待英国蒙哥马利元帅，陈毅、杜聿明在座。席间，蒙哥马利问杜聿明：“杜将军，你的百万大军去哪儿了？”杜聿明笑指陈毅说：“都送给陈毅元帅了！”陈毅说：“你哪有那么大方，你的百万大军是被我

一口一口吃掉的。”周恩来接话说：“不以成败论英雄，杜聿明先生从战犯到公民，也不失壮士断腕的勇气。”事后，杜聿明对老部属杨伯涛说：“陈毅元帅的话，我只同意一半。”杨伯涛问：“何以见得？”杜聿明说：“国民党军至少一半是败在自己人手里。”

运河注定是黄百韬命中逃不过的劫。11日，在运河东岸折损过半的第四十四师，被华野第十三纵队三十八师两个团夹击于曹八集，师长刘声鹤自杀。大战尚未开始，黄兵团就先失一个军、两个师。

黄百韬提着脑袋为蒋介石卖命，蒋也不惜血本救黄，一面令其固守待援，一面命杜聿明指挥机动兵团在徐东与华野决战。

黄百韬一向推崇拿破仑的“团式集中法”布阵。被围后经蒋介石批准，以碾庄为中心，构筑了一个第六十四军在东，第一〇〇军在西，第四十四军在南，第二十五军在北的环形防御体系。

11日，国民党七个兵团八十万解围大军倾巢出动。邱清泉兵团在南路，李弥兵团在北路，空军配合轰炸东进；黄维兵团进军阜阳，而后向蒙城、宿县推进；李延年第九绥靖区改为第六兵团，辖三个军，刘汝明第四绥靖区改为第八兵团，辖两个军，李刘兵团在蚌埠集结，沿津浦路北上宿县；孙元良兵团进至符离集。蒋介石给黄百韬空投亲笔信：“此次徐淮会战，实为我革命成败、国家存亡之最大关键。务希严督所部，切实训导，同心一德，团结苦斗，期在必胜。”12日，顾祝同飞临碾庄上空给黄百韬打气，空军一通信科长抱着电台伞降碾庄。黄百韬高呼：“天助我也！”

战场之敌兵力占优，粟裕因敌措变调整部署：以山东兵团指挥七、十、十一纵在林佟山至大许家一带防御，阻挡邱李东援兵团；以苏北兵团指挥第二、十二纵队和中野第十一纵队、鲁中南纵队进至潘塘，切断邱李兵团退路，会同山东兵团围歼；以第四、六、八、九、十三纵队包围碾庄。作战部署攻守兼顾，以阻挡邱李兵团为关键。

碾庄位于运河西岸、陇海路北侧邳县境内，地势低洼，村庄皆筑几个二至三米高的台地，余为水塘和洼地，圩墙水壕外是开阔地。黄百韬利用台地和李弥修的工事，以地堡群为核心阵地，贯通堑壕和交通沟，村落之间构筑密集地堡群，形成圆周形野战防御阵地。11日晚，碾庄外围攻坚战打响后，守敌八个师依托蛛网式野战阵地分区固守，逐村逐屋逐堡顽抗，每取一堡一村均需反复争夺。“攻坚老虎”第六纵队每天也只能占领一村。作战地图上标识敌我态势的红蓝旗一日数变。野司村落攻坚战战术总结载：“此次战役俘虏较少，毙伤数字约占三分之

一，个别整连整营即被我全部同阵地一同毁灭。”这种情况，改写了部队的战史记录。国民党大肆吹嘘“碾庄圩大捷”，陈诚拍案狂叫：“黄百韬真英雄也！”

华野第十纵队以大庙车站东侧陇海线与房亭河交汇处铁桥为中心布防，令第二十八师八十二团二营依村据河防守。该营豫东战役与国民党整编第五军交过手，针对该敌善于集中炮火与兵力，采取宽大正面而有重点的进攻，战术上惯于寻其侧背或接合部实行迂回攻击的特点，在桥旁筑有桥头堡，在河岸掘有多道战壕。13日清晨，第五军开炮猛轰二营阵地，桥头堡被摧毁。敌炮延伸射击时，事先从碉堡撤至战壕的官兵，待第五军步兵进至前沿二百米时，从两侧以交叉火力织网砌墙，死伤惨重的敌人狼狈溃逃，一门由十匹骡马拉着的重炮，因牲口全被打死，颓陈阵前沦为笑柄。

第五军正面进攻受阻，又施出迂回进攻战术，下午以六辆坦克打头，集中攻击第八十二团与第八十八团接合部，迫使第十纵队守军后撤，致桥头东侧主阵地暴露。第八十二团速派预备队恢复桥东主阵地，二营接连打退敌五次进攻，像一枚钢钉牢牢楔在河滨阵地。

邱李兵团东距碾庄不足四十公里，激战三天仅前移数公里。蒋介石心急如焚，驰电邱清泉“黄兵团危险万分，本晚恐难支持”，“希倾全力东援，星夜挺进，务于今夜挺进碾庄附近解围”。顾祝同亲赴徐州督战，杜聿明也破釜沉舟准备动用总预备队。

为救黄百韬，蒋介石令白崇禧派第五绥靖区司令张轸率吴绍周、罗广文、胡琏三个军东援。张不愿送死，白亦暗中掣肘。蒋只好令黄维兵团出动。刘伯承、邓小平得悉黄维东进，急令第一纵队二十旅前往洪河庙湾阻击。旅长吴忠率部在洪河庙湾构工迎敌，两天后获悉黄维绕道确山经新蔡过洪河直奔阜阳，遂急令部队平行追赶。因走“弓背”，难以超越黄维。刘邓首长调整思路，命豫皖苏军区在界首组织船只，水运部队顺流而下至阜阳截击黄维。吴忠率部队急赴界首登船，顺风顺水抢抵阜阳。黄维兵团先头第十八军刚到阜阳渡口，便遭严阵以待的第二十旅迎头痛击。

碾庄战事胶着，粟裕到医院看望伤员，发现伤亡远超部队上报数字，摸起电话找陶勇，得知第四纵队已伤亡四千三百多人。该纵原有一万八千人，战役第一阶段即伤亡近四分之一。粟裕知道，这个逼近战斗力极限的比例意味着什么。一次战役歼敌五个军，这样规模的仗华野过去没打过。他意识到，是时候调整战术了！

14日晚，粟裕召集纵队司令员到邳县土山镇火神庙。相传三国时曹操率军偷袭徐州，关羽率残部困守土山，于此处降曹。粟裕却决意在此地创造新的历史。他说，黄兵团已由运动之敌变为驻守之敌，我军必须由运动战转为村落阵地攻坚

战，用近迫作业突破敌坚固防御阵地。要把交通壕挖到敌阵地前沿，突然发起攻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集中炮火组织好步炮协同，逐个争夺敌占村庄和火力点。

15日凌晨，蒋军阵地前沿遍布交通壕。下午，华野第六、十三纵队猛攻彭庄，第一〇〇军被分割，军长周志道负伤逃往第四十四军，副军长杨诗云等被俘，而援军依然杳如黄鹤。黄百韬哀叹，有些人看我是青天白日勋章获得者，他们是不会全力支援的。

黄百韬绝境怨天尤人，还真有点冤枉了北路援军两员大将。在蒋介石不解黄兵团之围“军法从事”严令力督下，邱李兵团五个军主力沿陇海路两侧齐头并进，强力东援，但始终不能突破华野防线。沙场宿将宋时轮，统一指挥华野阻援兵团第七、十、十一三个纵队，在无险可据、防御正面宽达二十多公里的徐东地区，构筑了三道洞穴式防御阵地，其中不乏反坦克壕和真假杂糅的反坦克雷区，各阵地以梅花或品字形火力点为核心，再以交通壕连接，打造了令邱李兵团伤亡逾万而无法逾越的死亡陷阱。徐东到碾庄直线距离不过四十公里，碾庄始终可望而不可即。

黄百韬已是瓮中之鳖，粟裕转顾血火交织的徐东战场，进至双沟一线指挥。西线果然险象环生。11月12日，第十纵队二十八师八十三团在徐州至碾庄要道寺山口（今孤山村），打退李弥兵团第八军两个团数番进攻，子弹告罄。张震电话询问战场情况，不禁吃了一惊：“司令，八十三团危急，营长以下全拼刺刀了！”

参谋处长夏光建议：“快收集机关弹药前送！”这位从阳澄湖三十六个伤病员中走出的东路抗日救国军司令，组织将三千发子弹和五百枚手榴弹送到前沿，官兵激动地高喊：“决不让敌人前进一步！”

16日凌晨，中野陈锡联第三纵队夺取津浦线上有“南徐州”之称的宿县（今宿州市），歼敌一万三千多人，生擒国民党津浦路交警护路司令部中将副司令张绩武，切断了徐州之敌南下退路及补给线。是日，四十三岁的张绩武悲情草就《生日感怀》诗：“我生正值菊花时，搜索枯肠不出诗。每日开窗三眺望，白云无力过槐枝。”

攻取宿县，标志着中野开始直接担当战役主要作战任务，也使徐东战场南端无名小镇潘塘地位凸显。潘塘扼陇海、徐淮两条陆路交通干线咽喉，中野第三纵队直趋宿县，粟裕即令预置徐州南的韦（国清）吉（洛）苏北兵团东进锁喉，夺控潘塘掌握徐州蒋军唯一交通命脉，迫使邱李兵团西顾而不敢放胆东援。几乎与此同时，另一双眼睛也盯住了潘塘。16日凌晨，苏北兵团衔枚疾走至潘塘东南张集，与奉杜聿明之命从潘塘迂回华野侧背的总预备队第七十四军不期而遇。战役指挥

官贴身肉搏，潘塘打成一块烧红的烙铁。天亮后，第二纵队司令员滕海清发现，自己与敌军只隔一条沟；第七十四军军长邱维达惊叹，当面共军竟来自数个纵队！邱清泉急令第七十军和第十二军一一二师驰援，双方杀得难解难分。

徐东阻击战与辽沈战役塔山、黑山阻击战齐名，但历时和阻击线均长于以上两役，规模在淮海战役阻击战中亦属最大。

16日，为统筹军地力量和资源，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陈邓粟等和华东局、中原局、豫皖苏分局、苏北工委、华北局电：

>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第230—23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中原华东两军必须准备在现地区作战三个月至五个月（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达八十万人左右，必须由你们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解决。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战略决战是催生跨建制指挥体制的产婆。总前委应运而生，不同隶属关系部队如期实现集中统一指挥，统筹党政军民同赴一役的体制创新，使党的政治、组织优势于叠加中惊天裂变。

17日，粟裕令苏北兵团撤出部分阵地，诱敌深入到大许家再行歼灭。邱清泉疾呼：“共军是溃退！别让他们跑了！”刘峙电奏蒋介石报喜，南京速令宣传“潘塘大捷”，以安民心。记者到“有功”部队第七十军三十二师采访，得知该师第九十五团一个营16日在崔庄被围，一通信兵冒死接通电话线，师部派兵解围。事迹见报后，国防部报请总统授予其青天白日勋章。蒋介石派宣传部部长张道藩率团赴前线慰问，到第三十二师参观时，师里却为无战利品急得抓耳挠腮。邱清泉急来抱佛脚，令其向本军第九十六师借来作战所获解放军枪械以充数。二十多天后，准备给建功潘塘的通信兵颁授青天白日勋章时，邱清泉所率第七十军已陷入陈官庄包围圈。南京派飞机将勋章空投邱兵团，可该通信兵此前因说长官坏话，被团长袁子浚以“共党罪”给活埋了。不得已只能找人冒名顶替，煞有介事接受了邱清泉代授的勋章。

11月18日，对交战双方都是胜败攸关的一天。黄兵团虽被歼灭过半仍固守碾庄，华野须补充弹药方能发起新的攻击；原拟拊邱李兵团侧背的苏北兵团，因敌势强难以切断其与徐州联系；中野同时对付黄维、李延年、刘汝明三个兵团，亦感力

不从心。当日华野力歼第一〇〇、四十四、二十五军一部，第一五〇师师长赵璧光率残部投降。李弥兵团仍被阻于三十里外，黄百韬爬上屋顶引颈西望，只闻炮声隆隆，不见援军踪影，心沉下去了。“如李弥有邱清泉的力量，解围还有希望。现在是无望了！”

在西柏坡，毛泽东住处的灯光夜夜不熄，军委机关工作人员从统帅窗口的灯火，感受到千里之外碾庄战场的胶着。炊事员、幼儿园保育员，也在焦急地等消息。人们看到，毛泽东已十多天没脱衣服上床了，周恩来每天只趴在桌上打两个盹，一次一个钟头。毛泽东依旧亲拟重要电文，注明“传阅后发”或“发后请周、朱传阅”，而周恩来起草的电文，总是呈毛泽东阅后再发。

在淮北临涣集文昌宫，邓小平再倡“烧铺草”精神：“淮海战役关系中国革命进程，必须全力以赴，不惜任何代价，为了这个目的，在淮海战场上，只要歼灭了敌人南线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各路解放军还可以取得全国胜利，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淮海战役》第一册，第175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19日，刘陈邓致电中央军委及粟裕：“歼黄百韬使用了华野六个较能攻坚的纵队，历时已十二昼夜尚未解决战斗。如再以其余部队，其中只有两三个较能攻坚纵队，加以部队必已相当疲惫，刀锋似已略形顿挫。”“我们认为徐海作战必须从三五个月着眼，必须分作三四个战役阶段，每阶段都需要有休息、整补俘兵，才能保证必胜。”在“李延年、黄维北进的条件下，最好力争迅速歼灭黄百韬，尔后即将主力集中于徐东、徐南，监视邱李孙三个兵团，争取休息十天半月，同时以尚未使用之五个纵队或三个纵队用于南线，协同我们歼击黄维、李延年，这个步骤最为稳当”。

中央军委同意总前委意见，中野牵制黄维、李延年，阻挡南线敌军北上，暂不主动进攻。19日二十二时，粟裕下令华野向黄兵团发起总攻。第六纵队由西、第九纵队由南、第四纵队由北、第八纵队由东南，四路同时攻击碾庄，并集中上百门重炮和七辆坦克参战。蒋介石当晚急电刘峙、杜聿明，要求不惜牺牲，务于20日前会师解围。

11月19日晚，第八纵队炮兵团三十分钟向敌外围阵地倾泻六千发炮弹，地表上的敌工事毁坏殆尽。炮击向纵深延伸时，突击队奋勇跃起在开阔地上冲锋，却被敌轻重机枪和火焰喷射器所阻断，一批又一批勇士接踵饮弹倒下。“炮团打的什么炮！”纵队司令员张仁初的吼声几乎掀翻工事。炮团团长武鸣亭迅速赶到前沿，找一梯队幸存者了解情况，又顺着壕沟抵近敌阵地，摘下帽子横着脑袋用一只眼

观察，隐隐看见第三道鹿砦前，有一条若隐若现的盖沟。原来炮击后冲出的敌人藏在这里！他顿生一计，向指挥员面授机宜，众人连连点头。又一轮炮击延伸后，蛰伏壕沟的突击队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呐喊，敌人闻声从盖沟里爬出，占领有利地形准备射击。然而，无情的炮弹瞬间劈头盖脑落了下来，出击之敌悉数葬身炮火，八纵勇士趁敌挫败一举突破。

碾庄圩有两道圩墙和水壕，第九纵队二十五师从南突破时，敌以二十挺机枪封锁桥头，战士们成班成排倒在桥上。聂凤智到担任主攻的“济南第一团”第七十三团，一营长董万华说，有个战士徒涉蹚过水壕，证明水不深。聂凤智随即调整部署，令战斗发起后以突然动作徒涉过壕实施突破，炮兵压制敌火力，突击部队乘炮弹硝烟冲进圩墙。再次突破时，第六纵队十六师四十七团二连变助攻为主攻，徒涉寒彻骨髓的水壕，十五分钟突破东南角第一道圩墙打开突破口。正面攻击的第七十三团一营也涉水过壕，冲进第一道圩墙。敌凭借两道圩墙间开阔地上的地堡封锁前进道路，并组织反冲锋。当此紧要关头，第八纵队一突击分队加入战斗，向第七十三团右翼展开攻击。几路突击勇士血拼四小时冲开第二道圩墙，突入碾庄圩内展开巷战。第八纵队三个团迅速跟进，扩大东南角突破口向纵深发展。黄百韬下令从东口突围，第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第一〇〇军军长周志道逃脱，黄百韬和兵团参谋长魏翱、第二十五军副军长杨廷宴等千余官兵，逃到大院上村第六十四军军部。

20日，华野第四纵队主攻第二十五军四十师残部驻守的尤家湖村，将七条交通沟挖至敌阵地前三十米处。该军是制造皖南事变的急先锋，曾任新四军纵队司令员的陶勇提出，务必全歼该敌，告慰皖南殉难烈士，并要求多抓俘虏弥补战损。陈毅得知围歼第二十五军，特嘱华野派新缴获的坦克参战，誓报皖南一箭之仇。21日十六时，第四纵队在二十九门大炮和四辆坦克配合下发起攻击，三个半小时歼敌四千六百人。陶勇令将四千一百名俘虏补入各团。

21日黄昏，九纵攻击大院上，第八纵队和第九纵队七十七团攻击小院上。22日上午十时，黄百韬和第六十四军军长刘镇湘、第二十五军副军长杨廷宴等人逃往小费庄。途中，黄百韬见追兵迫近，嘱刘镇湘等人突围，凄然说：“我年老了，并且多病，做俘虏我走不动，而且难为情。我死之后，使别人还知道有忠心耿耿的国民党人，或可使那些醉生梦死的人醒悟过来，国民党或者还有希望。”言毕，黄百韬又对杨廷宴说：“我有三不解：一、我为什么那么傻，要在新安镇等四十四军两天；二、我在新安镇等两天之久，为什么不知道在运河上架设军桥；三、李弥兵团既然以后要向东进攻来救援我，为什么当初不在曹八集附近掩护我西撤？”

刘镇湘、杨廷宴拉着黄百韬出小费庄向西突围，遇解放军追击。四十八岁的黄百韬虽属壮年，但体胖多病，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脸色发白，无奈之际举枪自杀，

倒地后尚未断气。杨廷宴不忍他再遭受痛苦，补了一枪，随后坐在黄百韬尸体旁痛哭。解放军战士追来询问，杨说自己是伙夫，死的是他哥哥。好心的战士帮杨廷宴掩埋了黄百韬。刘镇湘被俘，杨廷宴侥幸逃脱，回南京向蒋介石报告黄百韬“自杀成仁”。22日，黄百韬兵团部及第二十五、六十四军残部被全歼。华野撤离碾庄前，未能查清黄百韬下落。一个月后，南京派人找到黄百韬尸体运回安葬。

>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第182、28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授权总前委统筹南线战略决战的创新尚在精彩演绎，蛙跳和超越式战略指导又伸出新的触角。11月9日，毛泽东致电陈毅、邓小平、粟裕、陈士榘、张震，并谭震林、王建安：“粟陈张应令谭王集中七、十、十三纵及由南向北之十一纵，以全力向李弥兵团攻击，用迅速手段歼灭该兵团的全部或大部，控制并截断徐州至运河车站之间的铁路，运东主力则歼灭黄兵团。”电报说：“现在不是要敌人退至淮河以南或长江以南的问题，而是第一步（即现在举行之淮海战役）歼敌主力于淮河以北，第二步（即将来举行的江淮战役）歼敌余部于长江以北的问题。”[注]

>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第182、28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27日，毛泽东致电华野、中野和粟刘陈邓等：“请粟陈张准备当黄维兵团快要歼灭但尚未歼灭之际，对李延年正面阻击兵力后退一步，引其前进，以主力从其侧后打去，求得歼其一部。”[注]

粟裕接电后神经瞬间绷紧：如果同李延年开战，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未结束，杜聿明再跑出来，那时不仅无援兵可调打黄维，而且仅靠北线七个纵队，也难完成追击合围杜聿明集团任务。好在华野一动，李延年就向后缩，没有打上。此时获悉，宋希濂兵团已到浦口，杜聿明建议从西安、台湾、甘肃抽调几个军空运蚌埠，组成新的兵团，与李延年、刘汝明、宋希濂兵团协力北援。

烽火弥漫之淮海，犹紧弓易折，已到千钧一发关头。

（十一）淮北演绎“吃”“挟”“看”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冲刺时，南北两线战场态势骤然生变：

>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第24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邱李兵团不再积极东援败局已定的黄兵团，而依令打通徐蚌线的黄维、李延年、刘汝明兵团，正三路对进北上增援。11月19日，中央军委提出，在结束黄百韬，歼驱李刘兵团后，“即可全力歼灭黄维，如像在碾庄歼灭黄百韬那样，获得一个伟大胜利”。[注]

当日，黄维兵团进至蒙城，第十八军十一师向涡河北岸中野第一纵队发起攻击。仅有两个旅的第一纵队缺乏重武器，也无阵地防御战阶梯纵深配置经验。黄昏，第十一师在蒙城以西被第一纵队二旅四团击退，以一营兵力转至上游八里处二次强渡，占领北岸黄家。第四团多次反击未夺回阵地，团长晋士林、政治委员郑鲁相继喋血战场。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淮海战役》第一册，第175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
《粟裕军事文集》，第421—42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

同一天，刘陈邓提出，华野歼灭黄兵团后，“即将主力集中于徐东、徐南，监视邱、李、孙三个兵团，争取休息十天半月，同时以尚未使用之五个纵队或三个纵队用于南线，协同我们歼击黄维、李延年”。[注]粟裕、陈士榘、张震20日复电：“完全同意刘陈邓指示，抽出四至五个纵队，必要时还可增加三个纵队，协同中野歼击黄维、李延年。”鉴于邱清泉、李弥兵团与黄维、李延年兵团有“以宿县为中心对进，以图打通津浦线联系之极大可能”，复电提出以四个纵队加两个旅阻止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北进，以八个纵队成大弧形包围徐州，监视钳制徐州之敌阻其南援，“全力保刘陈邓歼黄（维）胜利”。[注]当晚，华野四个纵队分途南进。

亥哿，12月20日。

刘陈邓21日复电粟陈张，“完全同意亥哿[注]电部署”。

当日，黄维令第十四军猛攻中野第一纵队板桥集阵地，第一纵队顽强阻击一天，黄昏向五沟集转移。黄维兵团过涡河后休整待进。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使上下左右互动频繁起来。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第25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21日，毛泽东致电粟陈张等：华野“从目前起，即将主要注意力及兵力部署的重点放在歼灭李延年三个军的上面”。[注]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淮海战役》第一册，第189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23日，刘陈邓提出：“战役第一步由中野全力对付黄维，华野全力歼李延年、刘汝明（宿县城由华野控制）。而后视战况发展，实行调整。”当日，黄维兵团猛攻中野南坪集阵地，李刘两兵团迟迟不动。晚十时，刘陈邓致电粟陈张并报中央军委，认为“歼击黄维之时机甚好”，提出除中野十一纵外，“请粟陈张以两三个纵队对李（延年）、刘（汝明）防御，至少以四个纵队参入歼黄维作战，只要黄维全部或大部被歼，较之歼灭李、刘更属有利。”[注]

午时，十一至十三时。

24日午时[注]，粟陈张复电表示，会大力协同中野歼灭黄维兵团，对刘汝明、李延年暂采阻击与歼灭其一部之方针，以七个纵队全力阻止徐州之敌南援。除十一纵外，另令二纵阻击刘李兵团，六、七及苏十一等三个纵队兼程向宿县前进，准备加入歼灭黄维作战。

中央军委24日复电，完全同意先打黄维；望粟陈张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情况紧急时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巳时，九至十一时。
《粟裕军事文集》，第425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

粟裕等25日巳时[注]复电，决定再抽三个纵队连同中野十一纵投入歼黄作战；以三个纵队加江淮军区两个旅阻击刘李兵团西援北犯；以八个纵队阻击邱李孙兵团，使其不能向南向西增援。[注]

第一纵队在涡河虽未能挡住黄维，却赢得四天宝贵时间。中野主力转至浍河北岸阻截黄兵团，第一、二、三、四、六、九纵分别在五沟集、白沙集、孙疃集、南坪集、曹市集、蕲县集布置阵地。

碾庄形势万分危殆，蒋介石严令黄维兵团从速东进夺取宿县。黄维即令第十、十四、十八军行动，先头部队22日抵浍河南岸。侦察发现，北岸南坪集至孙疃集一线有解放军主力阻击阵地。黄维令第十八军翌晨向南坪集发起攻击。

第十八军二战中野，碰上了硬茬。据守南坪集的是第四纵队陈赓部，拥有五个建制旅，作战经验丰富，均构筑边长百米的三角形阵地，且以交通壕相连，在前沿形成交叉火力网。阵地前数十米设置爆炸燃烧物，敌军突破阵地，即组织反冲锋歼灭突入之敌。23日，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亲自指挥二十辆坦克轮番冲击，榴弹

炮把南坪集打成一片火海。缺乏重武器的第四纵队与敌展开近战，正面阵地被坦克突破后，即出动小部队迂回两侧打退步兵，用炸药包、集束手榴弹打坦克，点燃预置柴草迫敌坦克退出阵地。战至黄昏，第一一八师两个团受重创，仍无法突破南坪集。杨伯涛令第十一师在李庄强渡淝河，突破四纵翼侧，因天黑又退回南岸。当夜，杨伯涛命工兵架桥偷渡，过河后却发现，第四纵队不知何时已经撤走。

淝河两岸风声鹤唳，刘伯承再使“围三阙一”拿手好戏。刘陈邓致电粟裕等：我决心放弃南坪集，再缩到南坪集十余里处布置一个囊形阵地，吸引十八军过河展开，而以四、九纵吸住该敌，并利用淝河割断其与南岸三个军之联系。同时于明夜以一、二、三、六纵及王张纵向淝河南岸之敌出击，求得先割歼其两三个师。

战略指导是立于桅杆上的前瞻与筹划，总以预见、跳跃、不间断方式呈现，常常是一个战役还在进行，另一个战役已在准备，第三个战役也在计议中。11月23日，尽远瞭望超前布局的毛泽东，驰电中原诸将并告华东局、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华中工委：

>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第264—26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必须准备给予全战役以三个月至五个月时间，必须准备以几个作战阶段（你们已完成了第一个作战阶段）去取得全战役胜利，必须准备全军部队及民伕一百三十万人左右三个月至五个月的粮食、草料、弹药，十万至二十万伤员的医治，必须争取全军各部队在全战役所需时间中有二分之一以上时间的休息整补，务使士气旺盛，精力饱满，对于兵员必须实行随战随补、随补随战的方针……在战术方面，必须不是依靠急袭，而是依靠充分的侦察和技术准备（近迫作业、步炮协同等）去取得成功。必须对于我军及居民进行充分的政治工作，对于敌军进行猛烈的有实效的政治攻势，对于刘汝明等部则进行内部策反工作……望华野、中野全军，在刘、陈、邓、粟、谭五人总前委（邓为书记）统一领导之下，争取新的大胜利。[注]

一电连用七个“必须”，统帅的期盼之殷溢于言表。

24日，黄维兵团陆续渡过淝河向宿县攻击前进，进入中野囊形口袋。不祥的信息接踵传来：第十八军报告，宿县公路上发现共军大部队运动；第十一师报告，先头部队在淝河以北公路两侧遭共军阻击，发现共军大纵深阵地；第十军报告，共军大部队正由西向东直插其侧后，观其情形有形成包围之势；第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急电，蒙城被共军占领，兵团后路被切断……

形势如此严峻，黄维连夜召集各军长共商解围之策。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说，共军在涡河、浍河一线作战似在诱我深入，现兵团两侧均有阻师，证明我已陷入口袋阵。目前东南方还未发现情况，南坪集到固镇仅八十里，急行军一夜可赶到。兵团向西南直出固镇，靠拢李延年兵团，可化险为夷。优柔寡断的黄维却举棋不定。这位战前刚由筹建中的新制军官学校校长履新的黄埔一期生，虽说在淞沪会战“血肉磨坊”罗店战役中血战成名，但骨子里却有弃之不去的“书呆子气”。何应钦评价黄维：“书生不宜典兵。”黄维延至后半夜才下令向固镇转移，证明此言不虚。

杨伯涛接令脸都气绿了。兵团命令第十四军由南坪集东南到浍河南岸掩护第十军撤退，第八十五军到南坪集掩护第十八军撤退，两支弱旅掩护两支熊罴之师，这一昏招耽误了足有十个小时。他强抑火气将部队撤回南坪集，25日一早去兵团部，却见黄维在等凌晨给吴绍周送转移命令的一个参谋，既不进，又不退。

黄维24日晚与众军长苦筹脱身之计时，中野正迅速收紧口袋。西侧第一、二、三、六纵迂回至黄兵团背后双堆集；浍河北岸第四、九纵队和豫皖苏独立旅进逼南坪集；蕲县集的第十一纵队由西向东攻击；华野参战各纵队集结于蕲县集、桃园集地区，切断了黄兵团前往固镇的去路。25日凌晨，第二纵队俘获黄维派往第八十五军传令的参谋和吉普车，中野首长准确掌握了黄维最新动向。

黄维在南坪集苦等一天无果，25日下午四时才下令行动。兵团主力到达淮北平原双堆集，已是暮云四合时分。双堆集位于北淝河与浍河之间，周围分布着十几个小村庄，因南北有尖谷堆和平谷堆两个土堆，故名。天黑路窄，机械化兵团行动甚为困难。黄维决定就地宿营。一令不慎，第十二兵团便在双堆集自掘坟墓！

25日，黄兵团第十四军奉命到浍河南岸掩护第十军撤退，27日接管该军阵地尚未完成布防，中野第四纵队三个旅及第九纵队一部即向敌侧背猛攻，连下王庄、丁庄、罗庄等十余村，攻歼敌指挥所，生俘军长熊绶春、参谋长梁岱（后分别逃回）。追击中部队建制打乱，通信中断，与后续部队失联，遇敌有组织抵抗造成重大伤亡。

26日，黄维兵团被压缩在双堆集东西十五里、南北四五里的狭小地区，仍依仗精兵优装施行“硬核桃战术”，令四个军和一个快速纵队缩成一团，构筑环形集团工事，以坦克、火炮层层组织火力网阻止分割围歼；同时急呼南京寻求突围之计。顾祝同当日指示：“贵兵团应不顾一切，以全力向东攻击，击破当面之匪，与李（延年）兵团会师。”当日，黄维部署从四个军抽四个主力师突围，第八十五军一一〇师为突围部队右翼，配属四架飞机、两个炮营、一个坦克中队作掩护，第一一八师在第一一〇师后跟进。

第一一〇师师长廖运周是黄埔五期学员，参加过北伐和南昌起义，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命蛰伏该师长期隐蔽，后与组织失去联系。1946年5月，廖运周与中原局取得联系，直接受刘邓首长领导。决心率部起义的廖运周，劝说黄维将第一一八师及坦克中队留兵团司令部作预备队和重点使用，派张士瑞向西通过封锁线进入中野二纵阵地。因廖运周与其他中共组织无横向联系，张士瑞被扣无音信。廖运周又派中共党员、师直侦察连连长杨振海，向南出包围圈找刘邓首长。据甘肃省军区原副参谋长姚学信回忆，26日晚，他所在陕南军区第十二旅三十四团二营，抓到杨振海即送纵队，司令员王近山、政治委员杜义德报告刘邓首长后，遵嘱为第一一〇师画出行军路线图，规定联络信号并派向导接应。

第一一〇师下辖三个团，其中第三二八团被军长吴绍周调作预备队，且该团长不易争取。27日早六时，在中野第六纵队所派向导武英引导下，廖运周率师直和第三二九、三三〇团及炮兵纵队五千多人，在飞机掩护下向约定的第三十四团二营阵地开进。途中，黄维不断电询开进情况，回答都是“沿途畅行无阻”。行至二营左翼刘庄，廖运周命对空打三颗枪榴弹。第六纵队看见信号与该师取得联系，第一一〇师快速通过插满高粱秸秆通道成功起义，通道随之封闭。第十二兵团其他三个师跟进，遭火炮机枪猛烈阻击，丢下上千具尸体仓皇逃回。黄维大惑不解：廖运周是咋突出去的呢？

中野为第一一〇师起义保密三天。邓小平给第六纵队打电话说，廖师长家属已从武汉转至郑州安全地区，请转告廖师长放心。

蒋介石12月3日日记写道：“据匪广播称第一一〇师师长廖运周率部投匪，不安之至。闻前方报称，廖率两团向前出击，迨今数日消息断绝云。似此廖果投匪乎？此为黄埔军校第六期生（应为五期），如其属实，则前途更为可虑，以直系高级将领被俘者甚多，而自动投匪者则尚无其人，此实为第一罪魁也。”翌日其在日记中又云：“据报廖运周投匪已证实，此为一生最大之耻辱也。”

12月20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廖运周等第一一〇师师职军官，并转该师全体官兵，对他们起义“极为欣慰”。

黄维兵团得知第一一〇师起义后，遂上下猜忌，互不信任。黄维“照顾”军长吴绍周到兵团部居住，实为监视。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三卷，第29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

刘峙后来在《我的回忆》中忆及黄维兵团的覆灭时说：“第一一〇师师长廖运周叛变，是加速黄维兵团失败之关键。”

令人费解的是，廖运周率第一一〇师起义后，蒋介石出于对这支嫡系部队的珍视，于1949年3月将廖运周的堂兄弟廖运升指挥的暂编第一师，调整为第八十五军下属的第一一〇师，并任命廖运升为该师师长。5月4日，廖运升率第一一〇师在浙江浦江县黄宅镇起义，兄弟俩时隔四个多月将两个一一〇师带归人民。

黄维被围却依旧实力强劲，中野强悍惜无火力优势，故华野参与打黄阻李、刘并拟围杜。战役第二阶段，战场形势兔起鹘落，一夕数变。蒋介石调桂系张淦兵团救援黄维，为白崇禧坚决拒绝。

11月28日，蒋介石与杜聿明商定，放弃徐州，杜率邱李孙兵团西进，经永城转至蒙城、阜阳，依托淮河北进解救黄维。

>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第28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当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电：“黄维解决后，须估计到徐州之敌有向两淮或向武汉逃跑可能。”

粟裕分析判断，徐州之敌突围方向有三：一是沿陇海路向东，经连云港海运南逃，但一时难觅装载三个兵团的船只，遭我尾击必陷背海作战境地；二是直奔东南走两淮，虽可避开我军主力，但沿途都是河川水网地带，不便于大兵团重装备行动；三是沿津浦路西绕山区南下，地形利于机动，可与李刘兵团南北对进解黄维之围，并集中兵力防守淮河。粟裕将兵力重点部署在敌逃窜可能性最大的徐州西南，并报告中央军委、刘陈邓和华东局。

11月29日，邱清泉兵团主力猛攻两淮。粟裕判断这是敌施放的烟幕弹，令宋时轮第十纵队坚守阵地，仍按敌从青龙集南逃布防。

>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第29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30日，毛泽东复电总前委：“各项估计及意见均甚好。”

当日，毛泽东电示华野：“炮纵应全部开去打黄维，以厚火力。”

>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第30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12月1日，毛泽东根据后来被蒋介石称为“最大的共谍”的国防部三厅厅长郭汝瑰所供密息急电总前委，杜聿明“逃跑的方向以向两淮或连云港两处为最大”，

“必须马上有所准备”。

粟裕据实分析战场态势，认为徐州之敌走两淮和连云港可能性不大，仍将七个纵队部署在徐州以南津浦线两侧。如敌真走两淮和连云港，受地形限制逃跑速度必然缓慢，华野完全赶得上。

1日凌晨，华野阻击包围尚未完全就绪，徐州国民党军破坏工厂后，乘数百辆汽车开往砀山，撤退路线恰与粟裕预判重合。粟裕令华野十个纵队和渤海纵队，采取多路多层尾追、平行追击、迂回截击、超越拦击相结合战法，全面兜围杜聿明集团。

后来得知，杜聿明早就怀疑廉而不刿的郭汝瑰是共军卧底并告知蒋介石，蒋不为所动。不得已，杜只好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陈赓第四纵队啃“硬核桃”已时逾一个月。火力准备时，敌进入隐蔽部，延伸射击时又进入阵地，以机枪和火焰喷射器封锁突击路口，逆袭杀伤突击队于阵地前。十年内战期间，蒋介石曾敕令编印《剿匪手本》，明确“剿匪”秘诀是实行“革命军连坐法”，即“班长同全班退则杀班长”，“班长不退而全班退，以致班长阵亡，则杀全班兵卒”。此役敌重申，丢弃阵地逃跑者以军事连坐法惩办，迫使士兵逐沟逐堡拼死顽抗。在敌严酷军纪监督下，政治瓦解成效甚微，中野被迫提出“给敌以毁灭性打击”口号。

11月27日，中野第九纵队二十七旅三名战士，被敌火力压制在小张庄鹿砦前，为隐蔽自己就地挖坑，先将卧射掩体挖成跪射掩体，再挖成立射掩体，并以沟壕连通掩体，在前沿坚持了一天。秦基伟受此启发，令第九纵队夜间开始大规模近迫作业。连长们背着石灰口袋匍匐前行画白线，战士疏开沿白线爬行到距敌阵地几十米处分段作业。天亮时，各连都挖成了通向敌阵地的交通壕，当天攻克小张庄，歼敌一个团。邓小平及时推广了第九纵队做法。

为弥补火炮的不足，部队用空汽油桶加箍半埋地下作发射筒，点火后能将圆盘形十公斤炸药包抛出一百五十到二百米远近，可炸飞十米内工事地堡，成班成排毁伤二十米内敌军，敌惊呼其为“飞雷”“没良心炮”。邓小平在《歼灭黄维兵团作战总结》中说：“我们曾大量地使用了土造的炸药抛射筒，收效极大。”

双堆集包围圈越缩越小，中野战力已近极限，“硬核桃”就是吞不下去。敌我僵持之际，指挥员战术运用出现分歧，12月1日，陈赓执气当场离去。恰好粟裕给陈毅打来电话，陈毅劈头就问：“你们打黄百韬用的什么战术？”“近迫作业呀！”粟裕介绍了华野挖交通壕迫近敌阵地，炮火准备后突击队从前沿快速突

破、分割歼敌战法。陈毅转述华野战术，刘邓等均表认同。中野采用碾庄经验调整部署，扬威碾庄战场的华野第七、十三纵也赶来参战。

《张震回忆录》（上），第344页，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

12月3日，杜聿明部向永城开进途中，接蒋介石派飞机空投的手谕，令其转向濉溪口，取捷径解救黄维。杜深知改变行进方向凶多吉少，从其被俘后缴获的日记可见颇多不满，但又不敢抗命。[注]蒋又派战地视察官李以劻到蚌埠传令全力救黄维。刘汝明表示，尽人力以听天命。李延年说，我看，围是解不了的。随后，蒋介石亲命任装甲兵参谋长的次子蒋纬国，率战车团到前线配合作战，勉励他效法东晋谢玄等人，再创淝水之战以少胜多奇迹。

淮北战场惊险而奇妙的一幕，出现在12月4日。杜聿明集团三十万人马被华野包围在陈官庄地区，距中野、华野包围的黄维兵团六十公里；从蚌埠北上驰援的李延年兵团，离黄维兵团仅四十公里。中野作战室，刘伯承指着桌上的水杯、砚台、电报纸说：“这就像我们面临的三部分敌人，军委电令我们吃掉已围的黄维兵团，围住南下的杜聿明集团，阻住北上的李延年兵团，这就叫吃一个，挟一个，看一个。要保证挟的掉不了，看着的跑不了，就必须吃掉黄维兵团，腾出手来，再歼灭杜聿明、李延年。”

刘统：《决战华东》，第292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

恰在此日，毛泽东电示刘陈邓：“打黄百韬和打黄维两次经验均证明：对于战斗力顽强之敌，依靠急袭手段是不能歼灭的，必须采取割裂、侦察、近迫作业、集中兵力火力和步炮协同诸项手段，才能歼灭。”[注]据此，中野提出了“坚决持久围歼敌人”的方针。

5日，国民党第二十、二十八军由武汉登船东运驰援。当日十一时，刘陈邓三常委下达对黄维兵团总攻令。6日下午四时半，总攻发起，陈赓统一指挥中野第四、九纵队及第十一旅、豫皖苏独立旅、华野特纵炮兵一部组成东集团，向双堆集以东地区进攻；陈锡联统一指挥中野第一、三纵队，华野第十三纵队和特纵炮兵一部组成西集团，向双堆集以西地区进攻；王近山统一指挥中野第六纵队、华野第七纵队和陕南军区第十二旅组成南集团，向双堆集以南地区进攻。

黄维兵团出发时仅带数天物资，初战不计消耗，粮弹很快告罄，被围十天已山穷水尽。12月5日，毛泽东谓之“狡如狐，猛如虎”的兵团副司令胡琏，从南京乘小飞机飞进双堆集包围圈。

1943年春，日寇从长江进攻重庆，胡琏率第十八军十一师死守长江西陵峡右岸石牌，凭险布阵迎战日军两个师团。陈诚问胡琏：“守石牌有把握吗？”胡琏说：“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此役毙伤日军七千人，历时三小时白刃战创二战纪录。胡琏获授青天白日勋章并升任副军长。战前组建十二兵团，兵团司令按说非第十八军老军长胡琏莫属，但白崇禧素与陈诚不和，难容其亲信掌控重兵，蒋介石只得任用黄维。胡琏屈居副司令，一气之下以父亲病重为由回了老家。十二兵团被围，蒋介石急召胡琏。胡表示，做人臣当临危不惧，愿乘小飞机降落双堆集。蒋介石对胡琏危难之际的忠勇深表嘉许，命通知包围圈抢修机场。

胡琏从天而降现身包围圈，给险境危师带来意外惊喜。他向军师诸将提出“刺猬胀蛇”解围术：“刺猬”被“蛇”缠住，应先团身敛刺，待“蛇”缠紧突然鼓身竖刺，将其刺成数段……

此间，孤注一掷的蒋介石，心心念念以毒气弹作为转败为胜的杀手锏。其12月9日日记记述：“本日时刻相望化学炸弹之功效能否济急，最为系念，直至黄昏始运到，而犹未能起货试验也，此实为最后之一法，存亡成败皆在于此。”蒋10日日记又载：“到空军指挥部指示使用化学弹方法与地区……黄兵团战况仍紧张。晚课后听取化学司今日试验化学弹报告，结果良好为慰。”

黄维说，只有投下足够弹药给养并派兵接应才能突围。胡琏飞南京汇报，9日飞返双堆集跑道即被炮火封锁。10日，第八十五军二十三师师长黄子华率部投诚，双堆集东南阵地出现缺口。

当日，陈赓以六个团扫清双堆集东北第十四军军部杨围子外围。11日下午五时总攻开始，杨围子被炮火覆盖，被俘逃脱的第十四军军长熊绶春跑出掩蔽部中弹身亡，军参谋长梁岱再度被俘。

> 冯牧:《十四军的覆灭》(外一篇)，见《刘邓大军风云录》（下），杨国宇等编，第79—80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9月第1版。

新华社前线记者冯牧写有《“书记”变成了军参谋长》：11月27日，我军捉了一批俘虏。其中有个广东人，自称是八十五师师部书记梁忠，愿为我们到沈庄八十五师送劝降信。我们把他送到阵地最前沿，他说几天后一定带回信来。12月11日夜，战士从杨围子押出一批俘虏，大家一眼就发现了回去送信的“书记”。他完全变了，面貌修整，穿着崭新的高级军官服，手里提着皮包。原来他就是十四军参谋长梁岱。走进政治部的房间，他尴尬地说：“我已经是第二次进这房子了。”他从皮包里掏出十四军的花名册，恭敬地说：“请你们参考，我们全军的军官名单都在这里了！”

梁岱：《第十四军被歼纪实》，见《淮海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第46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2月第1版。

梁岱去后方，路遇一骑白马、戴眼镜的解放军首长，得知他是第十四军的，问军长熊绶春在哪里，梁说熊已阵亡。首长要梁留下熊的卫士，说：“我派人协助你去找，找到埋葬后立个牌子，好让家人查寻。”熊绶春安葬后墓前立了写有姓名的木牌。梁岱等人很受感动。后来得知，骑马者是陈赓。熊绶春是黄埔三期生，陈赓当过其连长。梁岱被俘后回来送信，就有陈赓写给熊绶春的劝降信。总攻双堆集时，陈赓又派一位国军排长给熊绶春送信，限二十四小时答复。熊绶春征求梁岱意见，还与副军长谷炳奎商量，写了接受劝降的回信，着一位排长送出，但音信全无……

第十八军“老虎团”三十三团据守的大王庄，是拱卫黄维兵团司令部的核心据点，以梅花地堡群和交通壕、铁丝网、鹿砦构成环形防御阵地。12月9日，华野第七纵队二十师五十八、六十团，依托挖至敌阵地前沿的壕沟突然发起进攻，破障拔点，协同作战，攻占大王庄后转攻尖谷堆，预备队第五十九团接防大王庄。该团一营长巴华，奉命连夜率部到双堆集前沿构工封堵敌南逃之路。月色朦胧中，忽见白花花一片移动之物，敌一加强连反穿棉衣，顺着战壕悄悄摸了过来。巴华急令部队展开，突发惊天断喝：“把枪放下！”全营哗啦一声举枪对敌，巴华酷似张飞当阳桥上一声吼，吓破了二百来号偷袭之敌的胆，乖乖放下武器当了俘虏。

第五十九团二连二排扼守大王庄与尖谷堆间突出部，激战中交通壕被切断，三面临敌的二排与营部失去联系。排长孔金胜带领全排连续打退敌三次进攻，杀敌逾三百人，自己左胸、左肩负伤。10日上午十一时，国民党军发起第四次进攻，二排弹尽援绝，战士所剩无几，孔金胜喉咙又被打穿，肠子流了出来。敌成群扑上来时，他抄起一把铁锹，接连砍倒五个国民党兵，力竭牺牲。连队派兵赶来增援时，二排仅一人幸存。孔金胜被评为特等功臣。

11日夜，中野第六纵队和华野第七纵队利用堑壕突袭几度易手的大王庄，以近战和肉搏把“老虎团”挤出大王庄。翌日，第十八军两个团疯狂反扑，第六、七纵队官兵用炸药包和集束手榴弹打坦克，双方三进三出，七个团基本打光，巴华的一营仅剩八人。响晴天，空中忽然飘起“雪花”。人们意识到，那是双方将士身上的棉絮末在飞。黄昏，第七纵队投入最后的预备队，与第六纵队力克大王庄之敌。

那场惊天动地的血战，刀砍斧凿般留在亲历和目击者记忆里。参战幸存者记得，当年战士穿行壕沟，裤腿都被沟底积血染红。血沃江淮肥嘉禾，当地百姓说，打从那一年起，地里年年收好麦子。战后，华野第七纵队二十师五十九团一营营长

巴华，每逢到此凭吊都泣不成声：“五十九团一营的弟兄们，我来看你们了！”巴华谢世前，嘱子女把自己的骨灰撒在尖谷堆上，永远与牺牲战友在一起。后人感念其情，为其竖一青石，上书“归营”两个大字。

1948年12月12日，在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黄维兵团全部阵地只剩巴掌大。士兵缺衣少食，饥寒交迫，骂娘声隔阵可闻，火并时有发生，为抢一袋空投大米动辄死伤几十人，甚至活埋伤兵。杜聿明后来忆及战地不堪时写道：“空投场成了战场。”我军攻占敌阵地发现，冻成冰坨的尸体被守军码起来构筑工事。

解放军政治攻势灵活机动，喊话，写劝降信，射箭或投石头发送宣传品。陈锡联回忆：“最有趣的是我们的战士把热腾腾的肉包子插在刺刀上，高举起来喊：‘蒋军兄弟们，要想吃饭到这儿来！’饿疯了的敌人不顾其上司的阻拦和恐吓，或单独，或三五成群，爬到我军阵地，抓起吃的就往嘴里塞，拿起喝的就往喉咙里灌。”

黄维兵团困兽犹斗，在空投弹药支持下，依然保持炮火优势。总前委决定再度从华野调兵，加强南集团攻击。10日，粟裕、谭震林给刘陈邓回电，决定抽调三纵、苏十一纵及鲁中南纵队外加一部炮兵，由陈士榘率领即晚南下，参加歼灭黄维作战。

14日，华野第三纵队人称“陈军长袖子里的小老虎”八师，雄赳赳进抵大王庄，归中野第六纵队指挥。陈士榘指挥上百门炮和炸药抛射筒突击双堆集近一小时，摧毁敌全部工事。淮海战役三阶段我军共发射六十七万九千余枚炮弹，消耗量是辽沈战役的四倍还多。杜聿明惊呼：“共军哪来这么多炮弹？”除取之于敌外，六〇迫击炮等小口径炮弹，主要来自山东；榴弹炮等大口径火炮所用二十一万余枚炮弹，则主要由大连建新公司生产。粟裕慨言：“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民工的小推车和大连生产的大炮弹。”

> 谭笑林：《打掉黄维最后一张“王牌”》，杨国宇等编：《刘邓大军风云录》（下），第96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9月第1版。

中野第六纵队十七旅四十九团“襄阳营”与华野第三纵队八师二十三团“洛阳营”并肩突击，对双堆集东北第十八军一一四师“威武团”五十四团发起总攻。该团是黄维手下最后一张王牌，团长原系黄维副官主任，包围圈断粮，黄维把空投粮食和兵团部的马杀给他们吃。该团大部被歼，“襄阳营”营长谭笑林指挥肃清残敌，忽听右侧有人哀求：“长官行行好，给上点药！”谭笑林正欲前往，通信员一把扯住他说：“营长，等等！”先自跑了过去。一声脆响传来，谭笑林心里一惊，却见通信员边往回跑边骂：“妈的，一见我就拉手榴弹，要不是我眼快，就上龟孙子的当了！”[注]

当日，华野第七纵队二十一师和中野第六纵队十六旅四十七团，在八门榴炮支援下攻占尖谷堆，歼敌一个营和一个工兵连。平谷堆下兵团司令部、炮阵地、车场及机场，完全暴露在我军炮火之下。

胡琏命第十八军残部收缩阵地，将战车、大炮转移至兵团部附近，把二百辆卡车排列起来堆上泥土，构成城墙式防御工事，调兵团部警卫营给杨伯涛指挥，并将第十四军千余零散官兵补给第十八军，对退却的团营长一律枪毙，逼迫将士背水一战死守。

黄维呼叫南京，要求空军15日配合突围。15日九时，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乘机临空据实以告，轰炸无法实施。黄维决心断然处置，命第十军军长覃道善、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破坏重武器和电台，抛弃伤员，黄昏开始突围。部队给兵团长官提供三辆坦克，胡琏安排黄维乘坐较先进的新坦克，自己和吴绍周爬上两辆旧些的坦克，由第十一师和战车营掩护向双堆集西冲去。

黄维所乘坦克开出不远发生故障，下车匍匐于麦地，被第三纵队七旅通信员桑小六、范介明俘获。吴绍周见河中尸“桥”被坦克轧坏逃生无望，索性带参谋长、师长躲进一小庙静候收容。两年多前率军追击刘邓至淮河北岸的枭将，今日不想落入刘邓手中。

胡琏乘坦克遇解放军，驾驶员欲规避，被其喝止。部队以为是我军坦克未予阻止。胡琏指挥坦克改行小路，并探身车外观察。官兵见坦克向野外逃逸，遂开炮射击。胡琏背中三十二块弹片，忍痛逃到涡河，夺船至怀远鲍集，被李延年部救起送到蚌埠。胡琏与号称“西北王”的胡宗南并称国军“二胡”。这条漏网之鱼死里逃生，终于酿成大患。1949年10月，因胡琏率军增援加持，三野三个团九千多人兵败金门。战后，胡琏获任金门防卫司令官。国军遂有“十个西北王，不如一个金门王”之说。

黄维等逃走后，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绝望跳入小河自杀，因水寒彻骨，又龇牙咧嘴爬上岸，被解放军战士架到指挥部烤火。

当晚，走投无路的第十军军长覃道善亦束手被擒。

12月11日，蒋介石在日记“反思录”中不胜痛惜哀叹：“本周督查化学炸弹不遗余力，而且甚望其能发生极大功效。惜黄维兵团迫不及待，未曾使用而擅自突围为憾。”

黄维自称文书，但脸上的黑痣符合上级通报的黄维面貌特征。第三纵队七旅让被俘的第十一师师长王元直前来辨认，王老远就惊呼：“他也来了！”但死活不肯

说破。旅里又安排攻取宿县时解放的黄维马夫，在屋里隔窗看走过的“文书”，马夫用力点点头，证实是黄维。

到16日，黄维兵团四个军、一个快速纵队十二万人全部被歼。

> 江深、陈道阔著：《淮海之战》，第309—31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

16日上午，邓小平步行至中野政治部驻地高家村，坐在张际春住处土炕旁，从衣袋里摸出一个苹果说：“这是华东人民送来的烟台苹果。”接着摸出一把小刀，把苹果一切四瓣，分给张际春等三人每人一瓣，自己也留一瓣。吃完苹果，邓小平取出一张纸条，指着上面的蝇头小字对张际春说：“这张单子列了二十几份中央来电，都同作战没有直接关系，还没作复。请你逐一起草复电。”

李延年兵团、刘汝明兵团及蒋纬国所率战车第二团，12月4日起向固镇以西何集、鲍集地区攻击。在中野第二纵队、华野第六纵队及豫皖苏军区张国华所率地方部队五个团、渤海纵队第十一师顽强阻击下，付出了伤亡一万三千人的代价，十二天只前进了几十里。16日获悉黄维兵团覆灭后，李、刘兵团连夜撤至淮河以南。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以黄维兵团被歼、杜聿明集团被围、李延年和刘汝明兵团溃退圆满告捷。七天七夜未合眼的粟裕接报后，当即晕了过去。粟裕因时发头痛，常戴一竖条集簇的银灰色金属帽，看上去颇像一顶“皇冠”，官兵和百姓颇感好奇。粟裕故作神秘地说：“我头上这东西叫镇妖器……”陈毅闻声哈哈大笑：“哪有啥子镇妖器？这是治头痛的铝质减震器，是周恩来同志托人从香港买来送给粟司令的！”据粟戎生中将回忆，1984年父亲遗体火化后，他翻检骨灰，发现了三块炮弹片。这是1930年2月，粟裕任红四军第一纵队第二支队政治委员时率部在赣南作战，被敌迫击炮击中留下的。伴随他大半生的头痛之谜，遂有了新解。

歼灭黄维兵团，是中野打的规模最大、最艰苦的战役。各纵队伤亡二万余人，均经三四次火线整编反复补俘，方能继续战斗。粟裕令华野战后不取一件重装，中野缴获甚丰组建特种兵纵队。

双堆集地区歼灭黄维兵团之战，前承碾庄圩歼灭黄百韬兵团之战，后启陈官庄歼灭杜聿明集团之战，对夺取淮海战役全胜，具有关键意义。战后，刘伯承为该役题词：“双堆集以运动战始，以阵地战终；以消耗敌人始，以围歼敌人终。我在转换关头上运用不同战法而持之以顽强，必须着重研究而发扬之！”

1949年8月1日，邓小平为双堆集大捷题词：“双堆集胜利仅仅是全国千百次重要胜利的一个。一如坚持大别山的意义一样，只能把它的宝贵经验提取出来，作为我们继续进步的基础，而不能把它变成障碍自己前进的政治包袱！”1960年2月24

日，邓小平在彭真、杨尚昆陪同下重返双堆集，缅怀淮海战役牺牲烈士，与群众座谈时深情说：“双堆集人民为淮海战役胜利做了大量工作，做出了牺牲”，要求为此战立碑纪事。1980年初，他为双堆集烈士纪念碑题写“淮海战役烈士永垂不朽”几个遒劲有力的大字。

黄维兵团解决后，粟裕挥师围歼杜聿明集团。

邱清泉兵团打了两天，才进至青龙集陈官庄一带，李弥、孙元良阵地多被突破。12月6日，杜聿明与邱清泉、孙元良、李弥碰头，孙元良说：“再战下去不容乐观，现在突围尚有可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当机立断才能拯救大军。”杜聿明说：“三天前按这句话办，尚可全师而归。今天做恐怕已经晚了。分头突围重武器丢光，既抗命，又不能全师而归，有何面目见老头子呢？”

邱清泉、孙元良仍一力坚持突围。杜聿明说：“你们认为突围可以成功，我就下命令。各兵团要侦察好突破点，重武器和车辆尽量不要丢。”下午三时，三位兵团司令各自返回准备突围。

邱清泉部署突围时，第七十四军军长邱维达吼道：“你们怕死！为什么不全力打出去？七十四军打头阵！”邱维达一闹腾，邱清泉考虑丢了重武器无法交代，于是报告杜聿明暂缓行动。

邱维达的骄横是从“御林军”娘胎里带来的。整编第七十四师虽已葬身孟良崮，但蒋介石特许该师增编的三个教导团还在，一个无法上山的榴炮营也得以幸免。重建整编第七十四师，第七十四军前任军长王耀武等全力以赴，王一手包下了整编第五十七旅重建，优先提供官兵、装备，成军后先在山东战场练手，亲自调教，战力看好后始归建。另两个旅重建也得到各方关照。新任师长邱维达原为该师整编第五十一旅旅长，因参训未上孟良崮幸存。一番捯饬，基本把老七十四师的战术优长和精气神给传下来了。1948年3月27日，刘邓集中四个纵队近六万人围攻阜阳第七十四师五十八旅一万孤军，因该敌巧借颍河有利地势构工，第一纵队二十旅付出巨大代价突入城中，一个团却被东南古塔上一加强排挡住。铲除拦路虎后，部队又为湖水所阻。守敌使出阵前反突击“撒手锏”，敢死队猛攻第一纵队二、二十旅接合部，竟然撕开中野进攻阵线。蒋介石命邱清泉第五军和整编第十、十八、二十、五十二、五十八师等部火速靠拢阜阳，邱维达亲率整编第五十一旅驰援，企图将刘邓军反包围于阜阳城下，实现孟良崮“中心开花”未竟之业。眼看战局急转直下，刘邓审时度势，只得忍痛下令部队迅速脱离战场。同样的教训亦在豫东战役重演。区兵团大部被歼，黄百韬整编第二十五师也被紧紧咬住。整编第七十四师北上救援，在宁陵与中野第十一纵队交火。久战已疲的第十一纵队先后力战区兵团和整编第二十五师，突遭死后还阳的整编第七十四师攻击吃亏不小。该师劫后重生两次与中野交战得手，气焰越发嚣张。

李弥叫来军师长商量突围事宜，众人皆说走不脱。对突围本来就信心不足的李弥，只好就坡下驴取消原议。

只有孙元良去意已定。6日下午，他对军师长谎称上峰已决定离心退却，令第四十七军一二五师掩护兵团部向西突围，停止收发报并撤收电话，晚八时打光炮弹毁坏大炮。杜聿明找不到孙元良，令邱李兵团不突围，调邱清泉预备队填补孙元良阵地空缺。

孙兵团通过邱兵团警戒线遭第二〇〇师截击，溃兵涌到华野第八纵队刘集、郭营阵前遭前后夹击大部被歼，第四十一军军长胡临聪、第四十七军军长汪匣锋等被俘。兵团副参谋长熊顺义带七千余人回窜，被编入邱兵团第七十二军。孙元良跳下吉普车混入乱军，后化装逃到信阳，被第五战区司令官张轸收容。蒋纬国主编的《国民革命军战史》言及此事云：“孙元良司令官仅以身免。”

围歼杜聿明集团尚未正式开战，孙兵团已自乱阵脚即告覆亡。

杜聿明将十几万部队收缩在陈官庄南北十余里、东西二十余里狭小范围，命李弥坚守李石林、青龙集地区，令邱清泉以一个军向南进攻，以主力一部配合二等部队三面坚守，集中主力在战车、炮兵、飞机配合下向南突击，以三五个团的绝对优势兵力攻其一点、反复猛扑，企图向南突破与黄维兵团会合。

12月10日、11日，邱清泉指挥第七十军三十二师进攻鲁楼东南窦凹被击退。12日，第七十军两个师在八辆坦克掩护下再攻窦凹，激战一天，得失八次，敌以阵亡两千多人的代价占领窦凹。当日，第十纵队主动放弃阵地孤立突出的鲁楼。第九十六师在八辆坦克配合下三路出击，反复争夺五个小时占领李楼，次日攻占徐小凹。第十纵队顽强防御六天，堵住了杜聿明集团南下道路，受到嘉奖。

12月11日，毛泽东为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华北战场，不使蒋介石速下决心将其海运南下，指示“留下杜聿明指挥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已歼约一半左右）之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16日起，华野各纵轮番休息并抓紧改造战壕和阵地。战役支前民工总量高达五百四十三万人，平均每个战士背后有九个民工保障，不仅粮弹充裕，还有猪肉、香烟、苹果等慰问品。杜聿明集团全靠空投补给。然天不佑蒋，18日起近十天雨雪交加，飞机不敢低飞，高空投放粮弹不少顺风飘落解放军阵地。国民党兵吃光牲口，烧光门窗、房梁和扒出的棺材板，为抢夺空投食品大动干戈。粟裕主持起草了致杜、邱、李劝降信。华野政治工作“三大创造”立功运动、评定伤亡、即俘即补大显神威。战地广播、发射传单、释俘劝降、送饭送烟成为攻心夺气利器。第七十四军军长邱维达，听说第五十八师阵地忽现一口宰好的大肥猪，肚子里塞满劝降信，只得听任官兵大快朵

颐时当宣传品俘虏。李弥得知士兵常偷跑到解放军阵地讨饭吃，便让第九军军长黄淑对下打招呼，只要不带武器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

被围蒋军入地无门，华野不失时机公布自动携械归来者奖励标准，整连整营投诚官兵半月达一万四千人。刘峙说，解放军的内部策反和阵地喊话等政治攻心，等于无形中增加了十万兵。粟裕代政委循名求实，主张不仅要用枪杆子消灭敌人，而且要用政治工作去消灭敌人。他说，敌人最后被解决得这样快，应该归功于政治攻势的成功。四天四夜还不到，就歼敌十多万，平均每天歼敌四五万人。如果没有政治攻势，我军的伤亡一定还要大些。

由于伤亡严重，华野中野各纵随俘随补，有的被俘当日经教育就下连参战。有的打黄百韬时补充的俘虏，打杜聿明时已当班长或正、副排长。若干部队解放战士比例高达80%，演绎了“共产党指挥的国民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的战争奇观。因大量解放战士无军装可换易被误伤，大连受命赶制了十万顶军帽，一色的狗皮帽子。有天早上，国民党军冷不丁发现解放军阵地尽是戴狗皮帽子的，瞬间崩溃：东北林彪部都参战了，别指望突出去了！

12月17日，毛泽东亲撰《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广播稿，雪上加霜的杜聿明集团四面楚歌。29日天气转晴，陈官庄开始恢复空投。当日下午，华野根据国民党投诚官兵确认的目标，集中二百余门火炮，对敌工事进行精准射击，国民党军士气愈加沮丧。

1949年1月2日，经中央军委批准，粟裕、谭震林等签署了全歼杜聿明集团命令。休整后的华野部队以近迫作业将战壕挖到敌阵地前沿仅三十米处，或楔入其后侧，对前沿阵地形成三面包围之势。因饥饿而被迫吃马皮人肉的国民党军已无力阻止。1月3日，杜聿明接蒋介石令，5日起投足三日粮弹突围。杜聿明复电：将士饥饿无法从命，请继续大量空投。蒋介石5日复电：准再投三日，务必遵照实行。杜聿明召集军师长开会部署1月9日突围。

6日下午三时许，华野发起总攻。炮火准备后，突击队一改集团冲锋战术，以班为单位实施小组突破。爆破员依托交通壕爆破敌地堡，部队占领十三个村庄，杜聿明集团整体防御被打破。

当天，杜聿明呼叫南京，要求空军9日支援突围。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答应出动上百架飞机投掷毒气弹作掩护，但9日上午投下的毒气弹爆炸者寥寥无几，效果几与催泪瓦斯相当。华野第八、九两纵协力痛击打头阵的第五军，敌突围失败。下午，华野再次强攻，邱清泉、熊笑三又催杜聿明突围。杜坚持10日上午行动，众皆认为白天突围无希望。当晚，熊笑三不辞而别撇下部队跑了。李弥请示杜聿明如何行动，杜只好同意分头突围，自找出路。

12月9日夜，华野第三、四、十纵队向陈官庄展开向心攻击。二十二时，邱清泉给军长邓军林、邱维达打电话，要他们自行突围，并对杜聿明说：“突围后谁能到南京，谁就向总统报告这次失败经过。”两人在第二〇〇师工兵营掩护下狼狈逃窜，随之在乱军中失去联络。第七十二军军长余锦源率残部向华野第十纵队投降。三天前厉声斥责别人怕死的邱维达，临危并未为党国“杀身成仁”，而是像邓军林一样当了俘虏。原七十军军长高吉人负伤后被解放军收容治疗，隐瞒身份乘隙逃跑。李弥带亲信摸到第九军三师师部，更衣后向北跑去，得获释俘虏兵帮助，次年1月16日潜入徐州，2月1日取道青岛赴上海，成为淮海战役中唯一逃脱的兵团司令官。

“春宵一刻值千金”，四面楚歌的危境，刺激包围圈内声色犬马畸形生长。淮海战役中，蒋介石明令“严禁军人在战区结婚，军人结婚必先在国防部登记批准”。徐州“剿总”中将办公室主任郭一予，却痴迷于包围圈中一貌美女学生，以供给该女生同陷包围圈家人吃食为诱饵，娶其为姨太太，公然违令在火线结婚。战地洞房花烛夜，闻讯前来贺喜的将军勒勒裤腰带，有的拿一听美国罐头，有的带几包香烟，虽羞于出手，也算尽到同僚之谊了。

唯邱清泉不知所踪。粟裕令端掉邱兵团司令部的华野第一纵队查找。该纵根据其方脸、凹眼、塌鼻，上唇有撞伤所留寸许长疤照片，筛查俘虏未能发现。国民党第二兵团参谋长李汉萍回忆，邱清泉也曾想过投降，但最终选择在放纵中醉生梦死。虽未像郭一予那样做“火线鸳鸯”，却也携罐头、香肠等美食，整天抱着第二十四野战医院女护士跳舞。女护士也乐得奉陪，每晚令其喝得酩酊大醉。第七十军军长邓军林证实，邱清泉最后现身第五军军部。据副官、卫士供述，邱于1月9日晚混战中在陈庄北村口跑失。

> 陈茂辉：《决战的尾声》，见《星火燎原》精选本（中），第424页，解放军出版社2019年第1版。

9日下午，杜聿明带随从徒步逃向东北，在战壕更衣剃掉仁丹胡子，10日天亮窜至萧县张老庄外，被村民段庆相发现。第四纵队驻村卫生处接报，通信员樊正国、崔雪云持枪将杜聿明一行抓获。纵队第十一师副政治委员陈茂辉询问杜聿明身份，回答是第十三兵团军需高文明。陈茂辉问：“十三兵团有几大处？请写出处长名字。”杜聿明傻眼了。陈茂辉给他递烟，杜聿明自己掏出了香烟。陈茂辉见他手拿派克金笔，腕戴高级手表，兜里揣着美国牛肉干和骆驼牌香烟，判断其是将官，给他念《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并讲解俘虏政策，命将其带往村头小磨坊。黄昏时分，陈茂辉得报“高文明”头破血流躺在地上，急忙赶了过去。经医生检查，伤者系用石头砸破自己头，把血抹在脸上，并无大碍。陈茂辉审问与其同行的“记者”，这位副官坦白后出示了刻有杜聿明名字的一副象牙筷子。比对敌工部门送来的照片，“高文明”除比杜聿明少了两撇仁丹胡，头上多了一圈纱

布，其他几乎无异。陈茂辉再问杜聿明：“你到底叫什么名字？”杜聿明说：“你们已经知道了，何必再问呢？”[注]杜聿明被送到第四纵队司令部，陶勇对他以礼相待，但杜情绪很坏。1月11日，粟裕、陈士榘电告中央军委：“匪首杜聿明确已被我四纵俘虏，邱、李正继续搜查中。”

奉粟裕对邱清泉“死要见尸”命令，华野第一纵队二师从陈庄到张庙堂村一线挖野坟上千座，找到一具胸腹中七弹疑似邱清泉的尸体。经卫士、副官和第二兵团被俘军师长辨认，确系邱清泉无疑。第二师用小米换来棺材，将邱清泉埋在萧县单庄村北水塘旁，《大众日报》刊登消息后，其遗骸被运回浙江永嘉老家。毛泽东记在粟裕名下、朱德亲莅华野指导钓的“大鱼”第五军，葬身徐淮战场。至此，连同刚刚被歼的第十八军，在山东团灭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在东北被吃掉的新一军、新六军，国民党军五大主力全部覆灭。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第三阶段作战胜利结束。华野经最后四昼夜激战，全歼杜聿明集团两个兵团、八个军、二十二个师，共十七万六千人。华野伤亡一万七千八百七十人，敌我伤亡比例为9.8：1，较之第一阶段敌我伤亡比例2.8：1，我军伤亡比例显著降低，成为此役“收获最大与消耗较小的一个阶段”。

1月9日，南京国防部与杜聿明电台失联当天，蒋介石含悲饮恨写下日记：“杜聿明部今晨已大半被‘匪’消灭，闻尚有三万人自陈官庄西南突围，未知能否安全脱险，忧念无已。我前之所以不能为他人强逼下野者，为此杜部待援，我责未尽耳。”

淮海战役历时六十六天，是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和唯一以少胜多的战役。我军伤亡十三万六千人，歼敌五个兵团、二十二个军、五十六个师，共五十五万五千多人，含一百一十名将官。此役以高超战略筹划和杰出协同作战及战术执行能力而铭诸青史。

> 薛庆超：《浴血奋斗: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第539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24年版。
> 朱楹、温镜湖、熊铮彦、杜魁元著：《粟裕传》，第779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 张雄文：《无冕元帅——一个真实的粟裕》，第171页,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版。

1月12日，毛泽东致电粟裕、陈士榘、张震并邓小平、张际春：“你们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吃下去了。”[注]他说：“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注]又说：“1948年，粟裕提出三个纵队暂不过江是正确的，这样就保证了淮海战役在短时间取得了彻底胜利。”[注]

1月17日，中共中央致电华野、中野将士：“淮海战役既然消灭了南线国民党军的主力，这就奠定了你们渡江南进夺取国民党匪巢南京，并解放江南各省的巩固的基础。”

淮海一战而定中原，渡江南进至此量质齐升实现伟大飞跃。

> 军事科学院编：《粟裕纪念文集》，序言第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1949年9月，刘伯承在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说：“粟裕智深勇沉，非常优秀，百战百胜，有古名将之风，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是中国的战略家。”[注]

淮海战役歼敌数量，打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军在莫斯科会战和库尔斯克会战分别歼灭德军五十万人的纪录。1951年2月，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尤金对刘伯承、陈毅说，斯大林获悉淮海战役空前胜利后，在本子上写道：“六十万战胜八十万，奇迹，真是奇迹！”要求他到中国了解研究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尤金到任后求教毛泽东，毛泽东说，这个战役是粟裕同志在济南战役快结束时提出来的，中央军委确定了方针、原则和兵力部署，战役具体指挥是总前委的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位同志。

> 张雄文：《无冕元帅——一个真实的粟裕》，第170页，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版。
> 张雄文：《无冕元帅——一个真实的粟裕》，第170页，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版。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国西点军校考察团到淮海战场实地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不可思议”。[注]美国参谋学院战斗研究所认为，在三大战役中，淮海战役是规模最大、最具决定性的一战，并“认定淮海战役是最有研究价值的一次战役”。[注]

1949年1月31日，历时六十四天的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以伤亡三万九千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一个战略集团五十二万人（含改编二十五万人），基本解放了华北全境，创造了以战斗消灭国民党军的天津方式，以和平改编解决国民党军的北平方式，以暂时维持原状、以后再改编国民党军的绥远方式。

三大战役敲响蒋家王朝丧钟，向全世界宣示，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寻路探索星火燎原，抗日战争积优成势玉汝于成，解放战争深远经略逆势崛起，中国共产党以先进理论、正确路线、卓越人才，顺应历史趋势和人民愿望浴血奋战，终创难以复制的奇迹。

史全伟：《风范 共和国开国将帅的故事》，第331页，现代出版社2022年7月第1版。

1953年2月，毛泽东乘火车经过淮海战地徐州，油然想起粟裕，对陪同的陈毅赞扬粟裕是人才、将才、帅才。后来，毛泽东还对粟裕说过：“你担的是大将衔，干的却是元帅的任务！”[注]

朱军华、傅志雄主编：《大浪淘沙——红报里的中国共产党党史》，第338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24年版。

1961年9月，毛泽东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客人谈到淮海战役不可思议，毛泽东说：“在我的战友中，有一个最会带兵打仗的人叫粟裕，淮海战役就是他指挥的，他也是我们湖南人。”[注]

陈诚“土木系”第十八军最早只有十一师，该军有个土木工程兵营，土字拆开为十一，木字拆开为十八，“土木系”缘此得名。胡琏曾任第十八军军长，辞世前叹曰：“土木不及一粟。”

1984年2月5日，粟裕在京逝世。中共中央、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军委悼词充分肯定粟裕“尤其善于组织大兵团作战，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战功”。

粟裕辞世后，家人在他笔记本中发现了《沁园春·淮海战役》：“作战方针，攻城打援，首占开封。又俘区寿年，再创敌援；战局过坳，敌转防御。兖济解放，徐海动摇，横扫江淮在今朝。十月节，我大军南挥，分割包抄。首歼碾庄百韬，看徐双瓮鳖哪里逃。笑纬国东援，损兵徒劳；双堆黄维，称蒋嫡系，覆灭于后。杜氏将军，倾巢突围也难逃。时迫矣，灭蒋家王朝，就在今宵。”

淮海战役指挥，堪称粟裕军事生涯的扛鼎之作和指挥艺术巅峰。但关于此役，他生前未著一文。这首未曾示人的词，融豫东、济南、淮海战役于一体，俨然歼敌江北的战略回眸。粟裕填好这首词后可能嫌潦草，又工工整整誊抄一遍，储之箧底。

（十二）总前委初筹渡江大计1948

年12月12日，毛泽东就今后作战方针密电总前委：

黄维歼灭后，请刘、陈、邓、粟、谭五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好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

如粟谭不能分身到总前委开会，则请伯承至粟谭指挥所，与粟谭见一面，了解华野情况，征询粟谭意见，即来中央。我们希望伯承能于亥哿（12月20日）至亥有间（12月25日）到达中央会谈。

我们对今后作战方针大致意见如下：甲、在全歼黄、邱、李诸敌后，华野中野两军休整两个月……并大致准备好渡江作战所需诸件（雨衣、货币、炮弹、治疗药品、汽船等）及初步完成政治动员……丙、然后再以相当时间，最后地完成渡江的诸项准备工作，即举行渡江作战……戊、东北我军……五月沿平汉南下……八月渡江……壬、上述计划……和我们过去与陈、邓、粟三同志所谈者有些不同，请你们于伯承动身前加以考虑。

>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第382—38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此电只发刘陈邓，请小平负责于粟、谭至你处开会时，给粟、谭二人一阅，阅后焚毁，保守机密。

此时，总前委已移驻宿县韩村镇（今属濉溪县）小李家村，距蔡洼村华野指挥部五十公里。鉴于粟裕正指挥围歼杜聿明集团，邓小平邀刘伯承、陈毅12月16日晚同赴蔡洼村，17日开会。

淮海战役11月6日打响后，粟裕指挥华野全力追堵黄百韬兵团，五天四移指挥部，由山东临沂朱陈，至江苏邳县花庄、议堂，直逼前线。11日，华野包围黄兵团，粟裕移至距碾庄仅五公里的过满山并上山观察，中央军委当天要求其后撤，以策安全。翌日，粟裕转至距碾庄十一公里的土山镇，16日又移至距阻击阵地十余公里的小娄村。22日，黄百韬兵团覆灭，粟裕再度南移，频繁转战于皖北谢家圩等十个村子，12月14日在距陈官庄不足十公里的相城孟圩子（今淮北市内）遭敌机轰炸，15日移至张庄寨。

12月14日，张震来蔡洼村选址，发现该村地势低洼，芦苇丛生，利于隐蔽。村中有一凸起的高地，俗称杨家台子，遗有清末杨家兄弟所建三排两进古建筑群，杨家大院遂为张震看中。12月16日，黄维兵团被歼翌日，粟裕率指挥部进驻杨家台子，借住杨家二进院后院。这一天，正是淮海战役第三阶段开始之日。

得知总前委领导为便利自己指挥作战来蔡洼村开会，粟裕很受感动，派人买了两筐当地特产符离集烧鸡，以尽地主之谊。张震回忆，听说总前委来蔡洼村开会，大家都很兴奋。粟裕派作战参谋袁忠仁，前出濉溪公路一岔路口引导，自己到村南迎接。

瑞雪初霁，村外的原野几成银色世界。粟裕迎风伫立村头，远远看见一辆吉普由南向北驶来。中野司令员刘伯承到了。

粟裕与刘伯承上一次见面，是在十五年前。1930年夏，刘伯承从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成归国，先后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参谋长等职，协助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处理军委日常工作。1932年1月，毛泽东、朱德请刘伯承到瑞金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则点名调粟裕到身边任军事教官兼学员连连长。那时，三十八岁的刘伯承风华正茂，挑起了为红军培塑栋梁之材重任，而二十出头的粟裕正值人生拔节黄金年华，在红军名将麾下求知成长，两人遂有师生之谊。

这段令人难忘的时光很短。1932年10月，刘伯承出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粟裕则调任红四军参谋长，此后两人一直未曾谋面。眼下，穿一件槐豆子煮的墨绿色棉袄的刘伯承刚走下车，粟裕便踩着积雪扑上前来，双手抓着刘伯承的双臂，使劲摇晃着说："刘司令员，咱们有十几年没见面了！"

"是啊！是啊！"刘伯承端详着名满中原的粟裕，不禁为他瘦削的脸上布满的胡茬而诧异。岁月不饶人啊！刘伯承摘下眼镜重又戴上，仔细看看粟裕，不胜感慨地摇摇头。

随后赶到的是灰军装加圆顶便帽的陈毅，人未下车，中气十足的川音却先到了："哎呀，粟裕！郎个搞得瘦成这个样子了？"

粟裕迎上去握住陈毅的手，陈毅端详粟裕小了一号的脸，心中百感交集。陈毅素来关注拼命三郎粟裕的健康，还在两人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副指挥时，因参谋长罗忠毅主持第二支队司令部工作，粟裕实则兼任参谋长。转年除夕，陈毅送粟裕"轻裘缓带羊叔子，食少事繁诸葛公"对联，褒扬他勤奋敬业，也提醒他注意节劳。从两人共话缓出江南发出"卯巧电"后，没有谁比陈毅更能理解粟裕为破解中原僵局用心之苦了。几个月来，陈毅感受到粟裕立军令状的压力，也为豫东、济南相继奏凯而欣喜。随着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收官，这种压力应该减轻了，怎么……

邓小平乘坐吉普第三个到达蔡洼村头。一下车，就打量着蒹葭苍苍的蔡洼村，风趣地对粟裕等人说："你们住那么大个村子，不怕国民党飞机把你们炸了？还是要'怕死'一点啰！"

> 张震：《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作战与治军》，《回忆邓小平》（上），第5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

张震说："蒋介石搬家都搬不赢，顾不上来炸我们了！"

时值隆冬，南线将领们却春满心扉，畅快的笑声回荡村野。

翌晨，谭震林也从山东兵团驻地永城陈官庄赶到蔡洼村。

12月17日上午，淮海战役总前委会议在蔡凹李春华家后院华野指挥部举行。总前委遵毛泽东之命于11月16日组成后，一个多月来，分处三地的五位领导成员主要通过电报、电话沟通协商。邓小平作为总前委常委、书记，十分注意听取朝夕相处的总前委另外两位常委刘伯承、陈毅的意见，同时又注意征求随华野部队行动的粟裕、谭震林两位委员的意见，充分发挥集体领导作用。粟裕、谭震林也十分注意向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三常委请示汇报工作，总前委成员几乎每日必电，有时一日数电。蔡洼村会议，是总前委组成后，召开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全体会议。

张震：《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作战与治军》，《回忆邓小平》（上），第5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

主持会议的邓小平首先请粟裕、谭震林阅中央军委12月2日绝密电报，听取他们意见。接着，总前委五位领导成员分别回顾总结了淮海战役第一、第二阶段取胜的基本经验，研究了战役第三阶段围歼杜聿明集团的方略。鉴于战役胜局已定，歼灭杜聿明集团只是个时间问题，战役收尾未作为会议主要议题。根据中央军委意图和敌江防部署，会议全面分析了我军实施渡江作战的有利条件和困难，讨论了部队渡江作战的兵力编成和部署，以及渡江作战的时机和协同问题，还研究了两个野战军的整编问题。[注]

《张震回忆录》（上），第345页，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

全歼黄维兵团后，粟裕、陈士榘、张震、钟期光发电建言华东局、华东军区慰劳参战部队。会议期间接中央军委电：“前线将士浴血歼敌，辛劳备至，粟陈张钟所提，亟应照准。兹由军委决定，凡我华东、中原参战部队，前线人员，一律慰劳以每人猪肉一斤，香烟五包，凡不吸烟者，得以其他等价的物品代替。此项款物由华东、中原两军区按所属范围分担。”[注]中央军委的亲切关怀，使与会五位领导同志感到如坐春风。总前委决胜间隙聚首战地，新中国走来的脚步声已清晰可闻，指挥部里不时传出轻松愉快的笑声。会议决定，由粟裕和张震负责起草渡江作战计划。

从淮海战役到渡江战役，中原两大战略军团分合裕如、步调一致，协同作战亮点频现。1989年，邓小平与老部下纵论二野战史时讲道：“用毛主席的话说，二野、三野联合作战，不只是增加了一倍两倍的力量，数量变、质量变，这是质的变化。”

蔡洼村会议休息时，总前委五位领导在洒满阳光的小院里谈笑风生。陈毅看到身挎照相机的新华社记者陆仁生，提议总前委领导成员合个影，五人在门前石榴树旁站成一排。陆仁生目睹几位叱咤风云的战将，一腔激情油然而生。他迅疾举起已设定好光圈速度的照相机，调好镜头焦距，以“天然去雕饰”的抓拍，“咔嚓”一声把五位领导各具特色的英姿收入镜头，为走向全国胜利的中国革命也为解放战争的历史，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这一张”。

后来的人们观赏这幅照片，发现五人身上的棉衣都有些臃肿甚至不太合身。但正是这些云水襟怀的布衣将军，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意图，领导军民创造了令人叹服的胜战奇迹，敲响了蒋家王朝的丧钟。记者凝神摄取的显然未经摆布但却栩栩如生的合影，画面展现的总前委领导集体富有个性的神情样貌，正是顺应历史趋势和人民意愿的中国革命，在胜利者身上的投影。

12月1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拟请伯承、陈毅二同志偕来中央一商。”

蔡洼村会议结束当晚，刘伯承、陈毅驱车径赴西柏坡。

1949年1月12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粟裕率华野指挥部离开居住了二十八天的杨家台子。临行前，他把总前委在杨家小院的合影照片，赠给在县上行医的房东杨志民医生。

卷二

南进博弈岂止在天堑

（一）第一夫人的美丽与哀愁

宋美龄踅进泊于南京明故宫机场的专机前，向送行的人们投下优雅而惆怅的一瞥，国民政府第二十一个秋天已怏怏离去，寒凛的冬天正加快脚步向古城走来。

1948年11月27日，在纷乱如麻时局催促下，中华民国第一夫人步履沉重踏上二次访美行程。南国由温入寒的季节转换未免令人不适，她的心中却早已酷比严冬。明眼人不难看出，较之1943年首次访美，五十出头的第一夫人已风华不再。当昔日的雍容、温婉与高贵一去不返时，能仅仅归咎于岁月的无情吗？

这个1897年口含“金汤匙”降生的幸运儿，是上海一个优渥的基督教牧师家庭的幺女，自幼赴美，1917年毕业于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1927年，非英雄不嫁的宋美龄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在沪完婚。追索现代史上这一钱权结合堪称完配的婚

姻，人们认为，宋美龄对蒋介石的影响远超婚姻关系。有人甚至说，蒋宋联姻改变了中国外交政策。

飞机加速滑跑跃上云端。世事无常，转眼中国在内忧外患中走过了六年。国际国内形势激变之速，绝非世人想象所及。

1942年11月17日凌晨，由美国第十四航空队战机护航，宋美龄从重庆启程，辗转非洲、南美洲十天，27日抵达纽约。

行前预备国礼，颇费一番心思。国府上下打探罗斯福喜好，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献策：“罗斯福喜爱集邮，且酷爱中国邮票，何不送些珍贵华邮呢？”战时很难找到成套邮票，交通部长张嘉璈透露，上海胶州路原邮政总局保险柜里有四册国宝级邮票，从清代第一套大龙票，到民国各个时期邮票，全都有搜集。宋美龄觉得这一邮册作为国礼，足以让罗斯福动心。可上海早已沦陷，如何才能从日本人手中取回邮票呢？最后，还是通过军统动用特务手段，将邮票从上海送到南京，其中一套随宋美龄来到美国。

1943年2月17日，宋美龄拜见罗斯福夫人，首先赠予她一枚镶嵌蓝宝石的金戒指，博得美国第一夫人好感。接着拜访罗斯福总统，宋美龄奉上精心准备的全套中国邮票。罗斯福无比惊诧：“这是罕见的国宝啊，尊敬的夫人，叫我如何感激您才好呢？”

2月18日，宋美龄由罗斯福夫人陪同，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大获成功。美国报纸报道：“议员们被她的优雅风度、妩媚和智慧完全倾倒了，在议员们长达四分钟的起立欢呼之后，她开始讲话。”“关于美国和中国的亲密关系她是这样说的：我们两个伟大民族之间有着一百六十余年的传统友谊，这种友谊从来没有被误解削弱过，它在世界历史中是从未有过的。”关于中国抗战她是这样说的：“我们决不能忘记，在遭到全面侵略的头四年半中，中国是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单独抗击日本的残暴战祸的。”19日，宋美龄由罗斯福亲自陪同，在白宫举行的有一百七十二名记者参加的招待会上，向全美主流媒体记者说明，现在中国需要更多弹药，尤其急需飞机。没有乞讨，她只是令人信服地表明中国作出了巨大牺牲，美国的援助也是为了美国自身利益。

随后开启的全美巡回演讲之旅，宋美龄在旧金山、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洛杉矶等大城市和好莱坞露天剧场，均以超逸绝尘的气质、地道流利的英语、温文尔雅的举止，征服了美国朝野。罗斯福慷慨表示：“我们会以上帝允许的最快速度来援助我们的盟友。”访问取得丰硕成果，争取到美国政府对华援助十六亿美元，美国民间对华个人捐款一千七百万美元。第一夫人访美取得巨大成功。

1943年11月，宋美龄陪同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她那优雅的谈吐、曼妙的旗袍、娴熟的外交技巧，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素以高傲自负著称的丘吉尔，不止一次说道：“宋美龄是我在世界上最欣赏的女性之一，她的骄矜和妩媚，都让人极为心动。”

飞机巡航遇气流颠簸。宋美龄皱皱眉头，骤现眼前的竟是胜利接收乱象之浮世绘。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大员便饿狼般扑进沦陷区，疯狂攫取房子、金子、车子、票子、女子，贪婪程度令人瞠目结舌，足以成就活色生香的新官场现形记。

寸土寸金富豪麇集的上海，当仁不让地成为“劫收”丑剧上演盛况空前的大舞台。蒋介石名义上安排陆军总部“指导监督并得全权处理收复区内一切党政事务”，实则参加上海接收的单位有数十家之多，出现了一条轮船六家抢着接收的笑话。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吴国桢回忆，由于无任何计划，未设立任何有效行政机关，所有政府的不同机构，都被赋予缺乏中央监督接收敌产的权力，导致你方唱罢我登台，竞相鲸吞豪取的闹剧。

据国民政府公布的显然缩小了的数字，沪上敌伪房产八千五百多幢，被接收人员占据五千多幢。汉口有敌伪房产四千多幢，其中三千多幢落入第六战区以下军警宪特手中。

被疯狂攫取的房子搬不走、藏不了，大部或可计数。那些聚散无形的金子、票子，还有水柔月媚秀色可餐的女子，以及毂轮上来去无踪的车子，有谁知道确切的数量和去处？

伪南京兴业银行经理金雄白称，光复后戴笠到上海，周佛海觍着脸找他商量，由他和另外三位商界巨子共同出血，筹集两千根金条给戴老板上供，以便“大家都获得好处”。上海市市长、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私卖敌伪资产四十二亿元。

随汤恩伯入沪的黄埔四期生贺鸿棠，因接收暴富，在南京太平路太平商场开赓源地下钱庄。发生挤兑时，其妻向姊晏锦绣乞援，晏眉头都没皱一下，便豪掷三千根金条，风潮瞬间平息。

敌伪产业处理局接手查封上海一盛姓汉奸，清册即有一百二十八页，项目达一千九百余项，价值逾五十亿。该产业此前已经三轮接收，被抢占、侵吞资产几何，只有天晓得。

1946年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交通部部长俞飞鹏答复质询接收、占用船舶车辆数量时称，部里迄今收到车子两千七百辆，可用者一千零五十三辆，完好者仅六百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国军名将胡琏私自接收无账可查的汽车，达上千辆之多。

不惟如此，国民党军还以弥补“军费开支”为由，从伪银行成箱成箱搬出尚未发行的五千元、一万元面额大钞，抢购黄金和其他物资。巨额伪币以雪崩之势泻入市场，与加速运转的法币印钞机掀起的金融狂潮相互激荡，急速推高通胀。

昔日“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沦陷区，“胜利接收”后，“妇女多在官军中”。驻节杭州的第三战区长官部，虎帐夜夜灯红酒绿，政治部主任滕杰等将领，依托霸占的秋水山庄征歌选色，致使歌姬名媛和交际花行情一时看涨。杭州警备司令竺鸣涛麾下，众将校莫不偎红倚翠，频现秦楼楚馆，甚至窃得舞女金屋藏娇。

最骇人听闻的是，堂堂国军上将汤恩伯，虽“后宫佳丽有八”，仍得陇望蜀，乘无锡丝业巨头钱凤高抗战中卖国资敌怕戴“经济汉奸”帽子之危，将其才貌双全芳龄二十二岁的女儿钱婉华收入彀中，作为排行第九的“胜利夫人”，钱凤高果然安然无恙。

“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五子登科”在胜利中埋下了导致崩溃的炸弹，人心尽失的国民党丧钟已经敲响。

1947年10月29日，国民党指示特务杀害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激起国统区学生反压迫争自由运动高涨，杭州、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昆明、厦门等城市大中学生纷纷举行罢课和示威。11月7日，北平学生举行于子三烈士追悼会，遭国民党军警和宪兵镇压。翌日华北学联号召华北国统区所有大中学校总罢课。1948年4月1日，南京高校六千余名学生为反饥饿、反迫害、反征兵举行示威游行，贴出“拥护毛泽东”“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等标语。国民党暴徒袭击学生，打死三人，打伤近百人。血案引发全国新的反蒋战线迅速形成，且一发而不可收。5月30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在靖边王家湾撰写的《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的评论，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中国事态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

10月30日，合众社来自南京的报道说，国民党立法委员刘不同已公开要求蒋介石下野“赴美休养”。刘在《大学评论》上发表文章，题目是《祝总统赴美休养一路平安》。

美联社南京电称：“一项长时间暗中谈论的蒋介石不辞去总统之职而出国一年的建议已经公开化。”

米价冲天、百货暴涨，蒋介石日记中的叹息日益沉重：

1948年6月10日：“白米每石已至七百万元，美钞闻已涨至一百五十万元。经济危险至此，比军事更足忧虑，此皆子文种其祸根与恶因，而余之疏忽过信、所用非人实应负其重责也。”

6月16日：“经济情势已至最险恶之境地”，“如不有对天父之信心与本身人格之自信，早可自杀以了一生矣。痛苦极矣。”

6月29日：“本周五六两日，上海物价飞涨，石米至二千三百万元，美钞至四百三十万元，经济已呈崩溃之象，危极矣。”

7月29日：“上海石米竟至四千三百万以上，无上之耻辱也。”

1946年后一段时间，国民党军在战场上取得优势，可国统区经济却因横征暴敛濒于破产，不到一年就反噬了国军。洪水猛兽般的通货膨胀，与其说是政府决策之误，毋宁说是政权建设之殇。

通货膨胀源于财政收支不平衡，财政赤字则因为税源枯竭而暴增。作为传统农业国，农业产值本应占国民经济大头。但国民党基层统治力量薄弱，未抓住农业税这个最大财源，主要财政收入全靠进口关税、出口特定产品统税及盐税。政府无法以实物或货币方式征收农业税，可观财富被地主劣绅蚕食鲸吞并挥霍，不仅未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其自身也未成为国民政府的统治支柱。

1947年，国统区70%的钢铁工业厂家陷于半停工状态，橡胶和制药工业均停工三成以上。棉花仅能收需求的30%，纺织业产量只及战前80%。“无粮不聚兵。”蒋介石不顾财尽粮竭，抗战刚结束就挑起内战。1946年6月内战爆发前，中央银行拥有九亿美元外汇和五百万两黄金储备及数十亿美援物资，两年内战均已消耗殆尽。1948年6月，新任财长王云五发现，国库收入仅占军费支出的5%，东北军费就占支出总额40%！入不敷出催生了海量新钞，1948年8月前已发行法币六百六十万亿元，相当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四十七万倍，上海物价较1945年上涨了一万四千倍！

经济恶化诱发金融投机狂潮，中央银行包机向各地运送现钞支付军费，长官收款即用于争购黄金美钞。央行北送钞票的专车，有时竟行至半路掉头南下。外埠黄金美钞价格总是高于上海市场，央行在沪抛售巨额黄金，依然不能抽紧银根、压低金价。

辽沈战役结束，蒋家王朝气数已尽征兆益发明显。蒋经国上海“打虎”失败，政治绝望与经济崩溃相互激荡，达官贵人惶惶不可终日。与百物腾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房地产价格狂跌。富豪权贵纷纷抛售房产迁往香港和国外，上海短期迁港者就有上万人。

就在宋美龄二次赴美乞援前九天，11月14日，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南京不胫而走：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自杀了！

陈布雷是浙江慈溪人，曾任上海《天铎报》《时事新报》主笔。1927年被蒋介石招至幕下便尊之为“先生”，因为蒋代言时有佳句，被目为“文胆”。陈布雷身居显要，不坠青云，出污泥而不染，是国民党难得一见的清流。他与部属同桌就餐，客厅摆旧沙发，所配汽车从不许家人使用，连孔祥熙塞给的“红包”也羞于接受。

《徐铸成回忆录》，第15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1月第1版。

1947年3月，胡宗南占领延安，“行宪国大”也在紧锣密鼓筹备。眼见“民主建国”蓝图徐徐展开，效命幕府的陈布雷心情也拨云现晴。6月，他召见《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信心满满地预言：“我们国民党人自己也有所不满。但国民党再腐败，二十年天下还能维持。”然而，辽沈战役后，陈布雷以史家的直觉，听到了大厦将倾地动山摇的可怕声音。看着关外潮水般涌入风餐露宿的难民，民之哀、军之痛、国之艰，交替咬噬着他滴血的心。“已有二千万百姓流离失所，再打下去真不得了！”“我一定要劝劝委员长，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跟共产党谈判，国民党或许还能坐半个江山！”1948年11月，陈布雷获悉淮海数百万民工支援解放军作战，对女儿陈琏说：“民心如斯，党国危矣！”

驰驱蒋介石帐下二十余年，陈布雷已陷“廉颇老矣”的窘境。蒋介石1948年2月17日日记载：“以新生活运动纪念节通电稿仍要余亲自修改且费时至三小时以上，无异于手拟全文……布雷未老先衰，近来对文件亦不能负责处理，其文气笔意且远不如前。”

锦州战役失利后，蒋介石气得连续吐血。陈布雷登门探望，蒋送他出门时说：“你太悲观了。谈判也保不住半壁江山，只有背水一战！”11月8日，蒋介石演讲时斥责“提出和平主张”的“投降主义者”。陈布雷自我对号，悲从中来。半生牵马坠镫追随主公，却被指斥为“投降主义者”，情何以堪？颜面何在？总统与谋臣貌合神离，“文胆”实则魂不附体，政见相左、心力交瘁的陈布雷，自觉油尽灯枯，成了毕生为之奋斗的党国的弃儿。作为民国核心决策圈最后一个特立独行的士大夫，他万念俱灰，心如止水。

11月12日，陈布雷破例请假洗理更衣，要秘书开车载他绕玄武湖观光，登高远眺中山陵，触景生情泪水潸然而下。傍晚归来，陈布雷执意不肯用餐，挥毫遗书十一封，对自己艰辛备尝的一生和追随半世的国民党作了彻底否定，吞服安眠药弃世……

“打虎”失败，“文胆”离世，蒋家王朝谢幕进入倒计时。

1948年11月9日，蒋介石在致函杜鲁门乞援的同时，希望美国发表坚定的声明支持国民政府，以达到鼓舞军队士气以及巩固国民政府地位的目的。杜鲁门12日回复时只字未提蒋介石的要求，仅在最后表示：“我对国民政府所面临的窘境深表同情。”

蒋介石对此虽极为失望和愤怒，但为获取美援又不得不继续乞求。194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援华法案》，决定十五个月内提供四亿八千三百万美元经济和军事援助，其中一亿两千万美元是可购军援的赠款。但悭吝的施舍者迟迟不肯兑现承诺。美援成了国民党唯一的指望，驻美大使顾维钧和驻联合国常任代表蒋廷黻频频出面交涉，但收效甚微。11月24日，顾维钧再谒杜鲁门，吁请美国给予“更多与更快”援助，迄无下文。11月27日，杜鲁门回信半个月后，宋美龄启程赴美展开新的斡旋……

尽管宋美龄对此行遇冷有所准备，但对开始就吃闭门羹还是始料未及。为美国总统竞选事，杜鲁门与蒋介石早生嫌隙。华盛顿认定，国民党政治上腐败，经济上破产，军事上无能，且民心尽失，故而拒绝宋美龄以“第一夫人”身份来访，只能以“马歇尔夫人的朋友”的身份作私人访问。今非昔比，蒋夫人首次访美如烈火烹油，此次访问却十分冷清，未铺红地毯，也未安排她在白宫过夜，更未邀她作演讲。按计划首晤美国国务卿马歇尔，但马歇尔却称病躲进了医院。国内形势日紧，性急的宋美龄不顾外交礼仪，屈尊前往医院看望，四十五分钟后姗姗走出病房。驻美大使顾维钧看到，第一夫人一言不发，脸上清清楚楚写满了冷漠和难堪。

12月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含悲咽恨写道：“夫人昨日已到华盛顿，马歇尔表示冷淡，其国务院竭力阻止其议会与舆论之欢迎，故一般形势已不如前数年之热烈矣……”

宋美龄二次访美行程少得可怜，除了见马歇尔，就是等待杜鲁门接见。然而，接见一拖再拖。她要求到参众两院演讲，也被婉拒。华盛顿当局认为，国民党失败已到覆水难收地步，帮助蒋介石不会给美国带来任何利益，弃蒋已成美国朝野共识。

12月10日，宋美龄抵美十多天后，杜鲁门才予接见。宋美龄旧话重提，要求美国发表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正式声明，派遣高级军事代表团来华主持反共战争，提供三十亿美元军援。杜鲁门表态令宋美龄深深失望了。“美国只能付给已经承诺的援华计划的四十亿美元，不能保证无限期支持一个无法支持的中国。”礼节性会见草草结束。讽刺的是，宋美龄拜见杜鲁门之际，纽约数百名工会会员和学生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杜鲁门停止派遣海军陆战队赴中国，不要再给国民党政府以任何帮助。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两名代表亲赴国民党纽约总领事馆，抗议国民党政府反人民政策及宋美龄在美活动。宋美龄走出白宫，有记者问，与美国总统晤面有何成果？她耸

耸肩，悻悻表示“无可奉告”。白宫新闻秘书打着官腔说：“蒋夫人陈述了中国的情况，总统同情地予以倾听。”

12月19日，天低吴楚，阴雨连绵。因黄维等人生死不明而“不胜焦虑”的蒋介石，忽闻新华广播电台广播黄维、吴绍周、杨伯涛等“腐败无能之将领”被生俘，悲惜莫名。正午，宋美龄从美国打来长途电话，蒋介石“闻其声高语重，恐其精神焦虑过甚，不胜系念之至”。宋美龄访美碰壁之际，12月14日，蒋介石用专机将奉杜鲁门之命来中国考察的美国总统特使霍夫曼从上海接到南京，当晚盛宴款待。不料，在上海对记者指斥蒋介石政府“将美国纳税人的钱打水漂”的霍夫曼，入席仅四十多分钟即借故离去。蒋介石认为“霍夫曼在沪对记者谈话，无异催逼我急倒，并使我国各反动派更形枭（嚣）张”，“其对我国侮辱亦至极点”，遂令外交部长王世杰紧急约见司徒雷登进行交涉，要求霍夫曼必须登报声明向蒋介石道歉，从而引发一场外交风波。美国国务院接报后，于15日给司徒雷登回电，告知霍夫曼的言论事先并未报告国务院，仅是个人看法和意见，美国政府无权干涉其言论自由。

宋美龄二次访美在辛酸与屈辱中黯然收场，冰冷的白宫，见证了第一夫人的美丽与哀愁。此窘境蒋介石事先已料定。他在日记中写道，其与夫人长谈，几欲阻止其飞美。然“彼终以为个人荣辱事小，国家存亡事大，无论成败如何，不能不尽人事云”，“为国家与外交计，又不能不令其行耳”，临行前夜“午夜醒时，妻又悲泣不置，彼称为何国家陷入今日之悲境”。大洋彼岸“夫人外交”尚在悲情上演，蒋介石又启动“夫人访英之研究”。无奈此异想在美英的冷漠中自生自灭。宋美龄华盛顿蒙羞后，愤而移居纽约弗代尔孔祥熙家别墅，又自觉使命未尽，组成“中国游说团”留美活动，为挽救国民党作最后努力。

（二）开元1949之北国江南

万物兴歇各循其时，而开元1949，北国江南却因一场决荡千里的进军，全然改换了模样。变局中，国共双方的心态迥然不同，但南北政治力量的聚焦点，却达到了惊人的一致。

江北迎接1949年春天的宣言，是从距长江近千公里的太行山东麓发布的。1948年12月31日，新华广播电台女播音员丁一岚，满怀豪情播出毛泽东撰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是毛泽东应新华社之约日前急就而成的。献词开篇就以胜利者的口吻宣称：“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文章回顾解放战争走过的曲折历程，向中国和世界庄严宣告：“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统帅的底气源于八方奏凯。1948年6月以来，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方兴未艾：豫东、济南、辽沈战役捷报频传，淮海战役胜局已定，东野与华北军区部队，已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历史的转折来得比预想的要快。12月15日，中野第三纵队副司令员刘昌毅，宴请淮海战役被俘的国民党军兵团司令黄维。黄维说，贵部可一路南下，打过长江去了。刘昌毅问，何以见得？黄维说，能打败我，江南国军中便再无对手了。

李宗仁在收音机前听完新华社新年献词广播，不禁黯然神伤。他对夫人郭德洁喟叹：“看来，和平之机会已经失去了。”

司徒雷登听了新年献词说，毛泽东的宣言中有浓烈的火药味。

1949年开元之际，东西方政要和观察家注意到，新年献词首次使用文约意丰的“渡江南进”一语。中共高层尽知，此说源于一年前毛泽东致粟裕电。现在，人民解放军挥戈南下已无悬念。

仿佛是赴一场历史之约，当北中国以长江为新起点，擘画将革命进行到底宏图大计时，古城金陵一次酷似最后的晚餐的大佬聚会，也在“昏惨惨似灯将尽”的气氛中悲情上演。

1948年最后一天傍晚，南京黄埔路国防部大院总统府“憩庐”张灯结彩，火树银花。“憩庐”系为蒋氏夫妇量身打造。1927年4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蒋介石暂栖城南三元巷老屋，后移居汤山别墅“陶庐”。是年底，蒋介石与宋美龄成婚，筑香巢以悦美人成为当务之急，1929年遂在此建中西合璧风格的别墅“憩庐”。

1949年新年将至，欢度圣诞的七彩剪纸和缤纷彩带犹挂在壁，四十余名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却皆表情阴郁。蒋介石示意众人入席后，总统府资政张群宣读拟于明天发表的总统新年文告。文告在提出“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等五项保持现政权基本格局先决条件后称：“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维国民的公意是从”，暗示蒋介石将下野，并愿与中共“和谈”。下野谋和文告，由总统府政务局长陈方操刀。陈布雷遽然离世后，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悉出这位江西才子之手。

蒋介石的沮丧，源于八方而来的失败。到1949年1月，国民党自内战爆发以来，损兵已达四百九十五万。虽尚有七十一个军、二百二十七个师共一百一十五万人，加上特种兵、机关、学校和地方部队总兵力计二百零四万人，但能用于作战的部队仅一百四十六万。除白崇禧、胡宗南、马步芳的部分部队尚未受到重大打击外，其余部队大都是新组建或被歼后重建和拼凑起来的，士气低落，战斗力很弱，分散在西起新疆、东至台湾的漫长战线上，已无法在战略上组成有效防御。

主力兵团丧失殆尽使蒋介石如丧考妣，一支又一支国军部队在战场上起义，更使他心惊肉跳。1948年12月16日，蒋介石为安抚人心，邀在宁国军飞行员看电影《忠魂》。电影开映不久，天上猝然掉下一颗炸弹在室外爆炸，礼堂门窗玻璃全被震碎。蒋介石魂飞魄散，仓皇离场。这次针对蒋介石的轰炸，为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中尉飞行员俞渤驾机所为。但俞渤不知的是，另有义士为阻敌轰炸解放区破坏了飞机投弹系统，致使投弹未能命中目标。蒋介石虽侥幸逃过一劫，但从此噩梦缠身。

显而易见，毛泽东新年献词豪情万丈，蒋介石新年文告气若游丝，形成鲜明对比。政治、经济、军事大溃败，耗尽了蒋介石最后的底气。世无布雷，方知布雷可贵。总统府御用文人何其多，但比肩陈布雷者迄未发现。蒋介石常在捉刀代笔的秀才面前赞扬毛泽东的文章，借此指斥用洋房、汽车和白米精面供养的刀笔吏之无能。他为陈布雷亲笔题写“当代完人”挽幛，并命蒋经国扶柩送布雷至生前所购养老地杭州九溪安葬，对鞍前马后二十多年朝夕笔耕精神伴侣的缅怀与痛惜溢于言表，而对“文胆”谢世的悲怆、愤懑与无奈，亦尽在不言中。

文告甫一宣读完毕，会场忽闻哭声。

《张治中回忆录》，第564页，华文出版社2014年4月第2版。

“国不可一日无君，当此危难之际，委座怎能下野呢！”涕泗横流者是CC派骨干、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孤臣孽子”[注]当众恸哭，一刷二十年前在国民党三大上充任汪精卫反蒋急先锋的形象，自此天高地阔。从1952年国民党七大起，谷正纲居台任中常委三十六年。

蒋介石转身询问李宗仁对文告有何意见。

“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李宗仁十分淡定地说。

程思远：《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66辑，第79—81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蒋介石复又征询前宣传部长张道藩意见。张表示反对发表这个文告。陕西省党部主任顾正鼎亦予以附和。蒋介石转问行政院原政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世杰，王表态亦然。只有国民党中央执委、常委萧同兹、范予遂唱反调。在场CC分子展开争论时，蒋介石抑制不住满腔愤懑说：“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某一派系！”锋芒直指咄咄“逼宫”的李宗仁和白崇禧。[注]

七天前，12月24日，白崇禧发来“亥敬”电：“当兹存亡危急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人心、士气、物力均已不能再战，请停战以言和！30日，白崇禧再发

“亥全”电：“应迅速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持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对个人进退问题作一明快决定，免误和平谈判”。白崇禧与程潜、张轸等一齐发难，要求蒋“毅然引退，表示政治家作风”。

形同通牒的“逼宫电”，引发全国风靡一时的“去蒋潮”。湖南、湖北、河南、广西等省相继发出“吁和”通电，“恳请”蒋总统下野。湖北省参议会电直击要害：“如战祸蔓延，不立谋改弦更张之道，则国将不国，民将不民。”河南省参议会议长刘积学致蒋电更是痛快淋漓：“敬请即日引退，以谢国人，国事听候国人自决。”

李宗仁亦及时跟进发表和平主张：（一）蒋总统下野；（二）释放政治犯；（三）言论集会自由；（四）两军各自撤退三十里；（五）划上海为自由市，政府撤退驻军；并任命各党派人士组成上海市联合政府；政府与共产党代表在上海举行和谈。

桂系不是第一次趁人之危对蒋“逼宫”了。

1927年8月宁汉之争，白崇禧自任军委会常委，与李宗仁一道，要蒋“不宜以个人地位牺牲党国大计”，迫其8月13日通电下野，桂系把持了中央大权。1931年12月，白崇禧联合阎锡山逼迫蒋介石二次下野。民国日渐式微，1948年春召开的“国大”上，时任国防部长白崇禧作军事报告，振振有词地说，抗战胜利后，国军有五百万，兵力上以十比一优势压倒共军，有三十八个师是美械装备，还有八个空军大队。以这样的优越条件，只打了两年，共军便转守为攻，把战争打到国管区来了。试问这是什么原因？会场有代表振臂高呼：“请杀陈诚以谢国人！”人们当然懂得，白崇禧这番话并非对陈诚而说，而是将矛头直指蒋某人。

1948年6月1日，蒋介石召见白崇禧，宣布任命他为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白崇禧表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但个人以为，华中‘剿总’的成立，应着眼保卫南京政治中心，确立‘守江必守淮’的战略方针……”

白崇禧尚沉浸于中原大军一体指挥和“守江必守淮”战略畅想之中，他的话就被蒋介石打断了：“我打算在华中设两个战区：华中‘剿总’设汉口，徐州还另设一‘剿总’，由刘经扶（刘峙）负责。这样，两战区可以并肩作战，守望相助。”

白崇禧这才意识到自己外放，是蒋介石耍弄权术的新花招，其目的不言自明，就是想要“以刘制白”。中共正做集中统一文章，中原华东两战场已连成一片，国民党却分华中为两区，势难集中力量、统一指挥，谈何“守江必守淮”！他尤觉不平衡的是，当年北伐自己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刘峙不过一师长耳，从未打过胜仗，如今居然要与自己并驾齐驱！白崇禧咽不下这口气，说：“中原大军分割使用，将来必败无疑。此重大问题，容后考虑一下再说。”

白崇禧与李宗仁通气后，6日负气去了上海。此前，经程思远联系，敌伪产业管理局局长何浩若半卖半送，把虹口区一幢敌伪住宅售给白崇禧，使他有了从长考虑自己出路的栖身之地。

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前，蒋介石召开的某些重要会议和举行的宴会，黄绍竑也有份。但“行宪”之后便受到冷落。张群提议请黄绍竑赴沪劝说白崇禧，蒋介石遂于端午节邀黄绍竑到家吃午饭。席间，素来不喝酒的蒋介石竟举杯向黄绍竑等敬酒，祝节日快乐。餐后，蒋介石引黄绍竑至客厅，殷殷瞩望着他说：“想请季宽先生去上海劝劝健生兄，以党国大计为重，打消辞意，快去武汉就职。”“总统，在这之前派人去劝过他没有？”黄绍竑问。“礼卿（吴忠信字）刚劝过回来，他仍然坚辞不就。”蒋介石说，“‘戡乱’正在进行，武汉地方最为重要。任命他出任华中‘剿总’总司令，完全是党国需要，没有其他意思。你与他关系很深，请去劝劝他。”

黄绍竑年初在香港见过李济深，对整个政局早已另有打算，也想趁机晤白预作安排，便答应坐夜车去上海。蒋介石说：“经国下午去上海，你搭乘他的专机去好了。”

白崇禧抵沪十数日，市长吴国桢和杜月笙、顾嘉棠等遵蒋嘱，请白崇禧吃酒看戏，极尽逢迎之能事。白也乐得沉湎十里洋场。

黄绍竑当日下午抵沪，一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105号自家公馆，就打电话给白崇禧：“健生，我到上海了，想同你见个面。劳驾你到家中来吧！”“你是那个人派来的吧？”话筒另一端，白崇禧慵懒地说，“有什么好谈的呢？我知道你的意思。”“你只知道一半。另一半不当面谈，你怎会知道？”黄绍竑吊足了他的胃口。

白崇禧来到黄绍竑家，不等落座又回到刚才的话题：“你的来意我知道。你想想，陈小鬼（指陈诚）同我是死对头，他在中央当国防部长，我这个仗怎么打？这不明摆是整我们吗？”白崇禧引用了“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的古语。黄绍竑知道，此话出自南宋一无名秀才之口。当年，金兀术不敌岳飞统领的岳家军，准备撤兵时，秀才就用这句话劝他等一等。金兀术听了秀才的话，岳飞果然被十二道金牌召回，枉死风波亭。

黄绍竑早就想好，此次说白，只能说反话，便别有深意地说：“你还想把仗打好吗？”白崇禧惊异地望着黄绍竑，一时竟不解其话中深意。黄绍竑说：“我这次来，并不是用蒋介石的话劝你早去武汉，为他好好打仗。正是相反，我早就看到，蒋介石的仗是打不好的，所以才想劝你快去就职，掌握一些队伍，尤其要抓回广西那点军队，不要陪着人家把本钱一起输光了。”

黄绍竑见白崇禧似有所动，又说：“你和德公在南京高高在上做副总统和国防部长，不是等于关在笼中的鸟吗？现在蒋把笼门打开放你出去，还不快快远走高飞？难道你躲在上海，他就肯收回成命吗？我们要借此机会出去，再反过来整他。”黄绍竑见白崇禧听得入耳，又说：“武汉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地方。机会到来时，就可同共产党妥协言和。蒋到了无法应付的时候必定下野，德公就可出来收拾局面，倡导和谈，这样岂不是可以一举而数善吗？”

黄绍竑独到透辟一夕谈，令困顿萎靡中的白崇禧为之一振，似窥见外放武汉蕴含的转机和另一重天地。他兴奋地一拍沙发扶手，爽快地说：“对！我明天就回南京，接着就到武汉去就职！”

白崇禧回到南京，趁机向蒋介石要求扩大职权和区域，明确华中“剿总”直接向蒋负责，不受国防部和参谋总长节制。蒋介石素来喜欢直接指挥作战，白的要求正中下怀，小诸葛从而摆脱了陈诚、顾祝同束缚。黄绍竑说：“这是白崇禧跑到上海撒娇半个月的最大收获，是其他‘剿总’所没有的，也是历史上所没有的。”

6月28日，白崇禧飞汉口就任华中“剿总”总司令。

国家摇摇欲坠，深陷内讧泥潭的蒋、桂都希冀通过和谈缓兵止武，保住东南半壁，可谓殊途同归。然而，李宗仁逼蒋下台，是想让其退出江湖，彻底取蒋而代之；而蒋介石重演下野把戏，其内里乾坤还包藏着以退为进操纵局势、赢得喘息之机卷土重来的祸心。在和谈烟幕掩护下，国民党增兵一百一十五个师布置长江防御，国防部长何应钦还遵蒋命组建十四个编练司令部，加紧补充训练新兵，企图重新扩军与中共抗衡。国民党被歼嫡系部队各师编制也已恢复，并任命了蒋信得过的师长。

圣诞晚宴上的哭声，给金陵夕照留下了过于凄楚的记忆，太多的巧合放大了末日效应。人们注意到，蒋介石黯然发布新年文告“乞和”这天，恰是他与陈布雷天人两隔“满七”。

1949年1月4日，蒋介石亲赴南京傅厚岗，叩响了李宗仁官邸大门。总统纡尊降贵登门拜访，李宗仁颇感诧异。蒋介石说：“你看现在这局面怎么办？”李宗仁说：“我以前就向总统建议过，武汉和徐州‘剿总’应统一指挥，今日挫败，最大的毛病是指挥不统一。”“过去的事不必再提了，”蒋介石岔开话题，“徐蚌失败，共军即刻就到江北，你看怎么办？”李宗仁说：“我们现在样样都占下风，只有和共产党周旋，走一步算一步。”蒋介石叹曰：“这样下去不是事！我看我退休，由你顶起这局面，同共产党讲和！”“你尚且不能讲和，我怎能行？”李宗仁婉拒。蒋介石说：“我看你还是出来，你这姿态一出，共军攻势可能缓和一下。”

蒋介石几天后又找李宗仁，搬出“按宪法程序继任”说辞。李宗仁有心接棒，又怕落入圈套，故坚辞不允。

蒋家王朝覆灭前的任何异动，美国人无一例外都会最先察觉到。新年第五天，司徒雷登着其私人顾问傅泾波通知李宗仁：巴大维将军获悉蒋介石有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的计划，拟请司徒雷登向蒋介石提出抗议。李宗仁赞同巴大维意见，认为国民党尚有半数可战之兵，且西北地区和长江以南省份依然完整，此时即作放弃大陆准备似嫌太早，应以半壁河山与中共分庭抗礼。

1月17日，李宗仁见蒋介石下野仍未付诸实施，便派特使飞武汉与白崇禧协调发声吁和，形成迫蒋下台的舆论氛围，于是遂有宁、汉、湘、鄂、豫、桂等地多声部去蒋唱和。

19日，蒋介石在总统府召开“御前会议”计议下野事。孙科、张治中、张群、吴忠信、邵力子、吴铁城、陈立夫等在座。蒋介石说：“毛泽东提出的和谈八项条件太苛刻了，我是决定下野了。现在有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个是请李德邻出来谈判，谈妥了再下野；另一个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来主持。”

蒋介石扫视全场，希望听到他渴望听到的挽留的话。但众人皆不作声。他索性一一询问，问及新任行政院长吴铁城，吴说：“此事关系重大，是否要召开中常委会讨论一下？”蒋介石光火起来，愤愤不平说：“不必！什么中常会？我如今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而是被国民党打倒的！我再也不会进中央党部的大门了！”

1月21日上午十时，在宁大员齐集总统府，参加蒋介石宣告下野紧急会议。从新年文告暗示下野，到立马长衢顾影徘徊，再到情势所迫毅然引去，蒋介石第三次去职伤别金陵历时三周。

卸任前，蒋介石开足马力布局“后蒋时代”：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台湾警备总司令，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薛岳为广东省主席，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方天为江西省主席，王陵基为四川省主席，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抢运国库五亿美元的黄金、白银、外汇至台湾，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在美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蒋介石还多次派员赴平津游说，拟将蒋系各军海运南下以裨决战和拱卫京沪，后遭傅作义拒绝未遂。

蒋介石在告别演说中云：“在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皆陷入绝境、人民所受痛苦亦已达顶点之时，我有意息兵言和，无奈中共一意孤行到底。在目前情况下我个人非引退不可，让德邻兄弟依法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我于五年内绝不干预政治，但愿从旁协助，希望各同志同心合力支持德邻，挽救党国危机。”演说语多悲情，会场泪光闪烁，谷正纲、张道藩等竟哭出了声。

“行宪”就任总统仅九个月的蒋介石作完最后演讲，从口袋里掏出一沓拟好的文稿对李宗仁说：“我今天就离开南京，你立刻就职视事，这是我替你拟好的文稿，你来签个字吧！”

李宗仁疑心蒋介石代拟稿有诈，但又无暇细酌，匆匆浏览便签了字。现场悲情氤氲，人心离散。李宗仁问蒋介石何时动身，蒋介石说，有要事需处理，起飞时间未定，你们不必送行。

“总统！”银髯飘拂的于右任挤出人群，怆然道，“为方便和谈，可否请你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

“你找德邻办去！”蒋介石瞥一眼于右任，撩起长袍快步离场。

蒋介石拂袖而去，李宗仁辄觉千钧重担压在肩上。和谈成功的可能渺若游丝，又不可能投降，只有凭险拒中共于江北一策。然中共锐气方盛，一江之隔，又安能阻其南犯？必先具可战之力，才有与中共言和之望。纵使守住长江，没有美国助我安定金融、稳定人心，亦属徒然。李宗仁瞻前顾后，深感眼前残局无法收拾。但既已肩此重任，只有死马当作活马医，做一步算一步了。

当天下午，张群打电话请李宗仁看总裁所留文告。文告写道：“中正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一致拥护。乃时逾兼旬，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为冀感格共党，解救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

李宗仁细看文告，提出作两处修改。第一，文告中并无“引退”“辞职”等字样，故应在“于本月21日起”一句之前，加“决身先引退”五字。第二，蒋先生离职前一再要自己“继任”，绝未提到“代行”二字。根据宪法第四十九条上半段“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据此，应将这句话改为“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继任执行总统职权”。他后来说：“在这危急存亡之秋，我绝不是还斤斤于名位，祇是我深知蒋先生的个性，他在文告中预留伏笔，好把我作为他的挡箭牌，而他在幕后事事操纵，必要时又东山再起。与其顶一块空招牌，倒不如蒋先生自己干的好。”

这样左思右想，李宗仁又把吴忠信、张治中和王宠惠找来。王是司法院长，法学泰斗。他看过文告后说:“蒋总统此一下野文告应该有‘身先引退’等字样，否则与宪法程序不合。”李宗仁得此权威解释，遂明确，总统退职文告如不经修正，不可以发表。

张群只好请示暂居筧桥航校的总裁。蒋介石满口承诺，将文告依李代总统意见修正后发表。孰知次日各报所登李宗仁文告，竟还是修改前的稿子，蒋介石的文告说得更露骨:“总统蒋公轸念国家之艰危，顾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决然引退。宗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

李宗仁感到气愤的是，在国家生死存亡关头，蒋介石仍不忘权诈，把自己当木偶耍。文告见报前夜，吴忠信竟以国民政府秘书长名义，将两项盖有总统大印的文告通令全国各级军、政和民意机关知照。而自己身为总统竟一无所知！李宗仁叫来吴忠信质问，吴忠信说:“这是蒋先生的意思，要我发出后再通知你。”

李宗仁说:“蒋先生已下野，还要指挥你发通令不让我知道？”

吴忠信说:“你是知道的，蒋先生要我这样办，我怎能不办？”

李宗仁说:“你这样做未免太不够朋友了！”显然，蒋介石前晚又另打电话给张群和吴忠信，自食前言，从新安排，木已成舟后迫其接受。鉴于蒋欺人太甚，李宗仁声称名不正，便不就职。

吴忠信威胁说:“德公，我愿以老朋友的身份劝劝你。你素知蒋先生为人，也应知自己处境。南京现在特务横行，你的卫士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争什么？这种局面下，任何事情皆可能发生！”

李宗仁毫无惧色，仍坚持不就职，下午又把吴忠信、张治中和国民政府秘书长邱昌渭找来。张、邱也认为蒋介石太过分了，张治中以“美中不足”请吴忠信设法稍为更正一下，邱昌渭亦附和。吴把他们臭骂一顿，说国事至此，你们还幸灾乐祸！张也不甘示弱，闹得不可开交。李宗仁最后只得做和事佬息事宁人。

>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执笔：《李宗仁回忆录》下卷，第234—238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1月第1版。

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纷纷为李宗仁打抱不平，要他“速正大位”。白崇禧借当年刘邦对韩信讲的话告诫李宗仁:“要做就做真皇帝，切不要做假皇帝！”民营各报都为李宗仁鸣不平。张群、吴忠信不得已再电蒋介石，蒋依旧满口应承“修改”“更正”。李宗仁却先自泄了气。国家都没了，还闹什么“代”不“代”呢？他安慰自己说，如能聊补时艰，私愿足矣。众人只好叹息而退。注

1月24日，李宗仁在例行的总理纪念周上就任代总统。

（三）江阴要塞风云突变

正当唐秉琳等人积极备战起义，各项工作风生水起时，江阴要塞却风云突变——要塞司令官孔庆桂因贪腐翻船！

1948年上半年，南京国防部拟从台湾调一批火炮加强江阴要塞火力。修炮台需大量水泥、钢筋和汽油，孔庆桂拟制了一个可观的施工计划，派唐秉琳到国防部做工作，计划很快批复。工程完工剩了十桶汽油，孔庆桂让油料科主任卖给了无锡“锡澄汽车公司”。分赃时油料科主任嫌利薄，写信给南京状告孔庆桂倒卖汽油。孔庆桂从国防部获此信息寝食难安，为避罪慌忙退回黄金并运回汽油，给蒋介石打报告辞职。孔庆桂年龄偏大，蒋介石正想以年富力强者代之，接到辞职报告即批准其任国防部中将高参。

江阴要塞司令骤然出缺，给党的渗透策反工作带来变数。要塞易主会给起义带来何种不确定因素？唐秉琳等分析几个可能的竞争人选，最后聚焦国防部陆军总部第六署少将军械处长戴戎光。

戴戎光是江苏阜宁人，早年就读清华大学，后入国民党中央军校学习，曾赴日留学，任过炮兵团、营、连长。戴戎光哥哥戴克光，与顾祝同堂兄弟、江苏省民政厅厅长同为CC系故交。抗战末期，戴戎光利用这层关系，攀上同为苏北老乡的涟水籍高官顾祝同，成为其心腹。顾祝同为培植亲信，保荐戴戎光任江阴要塞司令。恰好戴戎光哥哥同唐秉琳大哥唐君鄂是大学同学，戴戎光又与唐秉琳二哥唐君照是中学同学，身为共产党员的戴戎光弟弟戴曙光与唐秉琳是初中同学。比较而言，戴戎光出任江阴要塞司令于我有利，而这一要缺须经蒋介石审批定夺，排名第一者希望最大。决定名单顺序的关键人物，是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俞济时。

唐秉琳从江阴农民银行守备总队经费中提取一笔钱，换了三十两黄金送给戴戎光，告诉他要塞官兵欢迎他去当司令，如需要钱，他们可随时提供。戴戎光走了侍从室主任俞济时的门路，吴广文也找侍从室上校参谋朱永堃做工作，让其开列建议名单时，让戴戎光排名第一。为帮戴戎光过好蒋介石的面试关，唐秉琳根据其取人标准，给戴戎光进行了形象设计和包装，提醒他换掉蒋介石不喜欢的金牙，将蓄了多年的分头改剃光头，还给戴戎光拟了答问提纲，让他熟记上任后准备实施的江防对策和治军思路。

1948年4月16日，蒋介石召见江阴要塞司令候选人戴戎光，问：“现在江防很重要，孔庆桂年纪大了，叫你去，你去了怎么办？如何整顿江防？”戴戎光依据唐秉琳起草的“腹案”侃侃而谈，蒋介石边听边点头，颇为满意，戴戎光顺利通过了面试。蒋介石当天日记载：“下午召见六人，考察将官四人。”戴戎光是其一。

1948年6月中旬，戴戎光就任江阴要塞司令兼江防指挥官，上任即抓队伍，准备进行扩编，想把他在陆军总部军械处那套班子拉过来，写信给几个老部下，让王德容来要塞当参谋长，吴广文当参谋处长，但均遭婉拒。两人不愿来要塞任职，主要是因戴戎光心胸狭窄，担心与其共事坏了大计。吴广文心里还有个小九九，他有望去

徐州国民党精锐部队伞兵团当团长，或可更有作为。这时，唐坚华再赴江阴，给唐秉琳带去了党组织的最新指示。

唐秉琳受命后找到戴戎光，自告奋勇去南京做王、吴二人工作，戴满口答应。唐秉琳抵宁后向吴广文传达了党组织的指示，吴广文又说服同出黄埔八期的老同学王德容，两人于1948年6月联袂赴江阴要塞，吴广文任守备总队队长，王德容任参谋处处长。“三剑客”胜利会师江阴要塞，在攸关京畿安危的江防要害部位预留了可暗度陈仓的后门。至此，中共苏北区党委和华中工委打入敌江防命脉的“接力工程”开枝散叶，取得实质性突破。

新成军的要塞游动炮团，一、二营从台湾基隆和高雄要塞调来，三营多是强征的壮丁。经唐秉琳做戴戎光工作，王德容由参谋处处长改任游动炮团团长，进一步掌握了实权。1948年秋设立的要塞工兵营，是个并无实兵的空架子。唐秉琳利用戴戎光急于招兵买马的心理，撺掇他收编黄桥自卫队将其编实，由在国防部三厅管工兵和要塞业务的唐秉煜任营长。戴戎光也乐得挂空头营长的唐秉煜在国防部对口疏通要塞业务，实际负责该营训练管理的是要塞地下党争取过来的副营长龙潜。至此，要塞地下党基本控制了炮兵总台、守备总队、游动炮团、工兵营四支主要部队。

要塞中土匪还乡团分子的领军人物，是守备总队第三大队副曹炳三。总队长吴广文父亲在苏北时，与曹炳三是青帮师徒关系。吴父根据安排来要塞，嘱咐曹前程都靠吴广文，吴要你怎样，你就怎样，这样才有出路。此后，曹炳三始终唯吴广文马首是瞻。

要塞政工室特务活动频繁，是策反一大隐患。地下党选择女上尉何漪为突破口，利用其父与唐仲衡是同学并托唐为女儿谋得好位置之机，调何漪给吴广文当秘书，经教育参加革命活动后，仍令何兼职政工室工作，秘密侦察监视敌特活动，以防范在先。

刀尖上行走，风险无处不在。1947年10月，交通员唐坚华回苏北带去了弟弟唐明，唐明只身回江阴，在兴化沙沟镇被一地主婆告发，落到城防司令部手中。拷问唐明时，他说叔叔是江阴要塞守备总队总队长。孔庆桂拿着兴化城防司令部核查唐明身份的公函询问唐秉琳，唐秉琳估计唐明了解哥哥与自己的关系，赶紧派副官赶到兴化，以孔庆桂的名义请客送礼，把唐明保了出来。

历史安排唐秉琳饰演潜伏者，原本就是一个看起来并不完美的设计。唐家五少与其优渥家境大相径庭的人生选择，到底还是给唐秉琳带来了麻烦。戴戎光到任后拜访江苏省主席丁治磐，顺访省警保处处长。这位倨傲的处长问戴戎光：“你手下有个姓唐的炮兵总台台长吗？”“有啊！”戴戎光话音未落，警保处长又问：“此人怎样？有人说他哥哥是共产党，可靠吗？”戴戎光正色道：“我了解这位台长，他是黄埔的小老弟，对校长忠诚，外面传言不可信。”言讫话锋一转：“我也有个胞弟

是共产党，难道我也是共产党？”警保处长一愣，随即哈哈大笑起来。回到要塞，戴戎光把他与警保处长的对话当谈资，一笑了之。后来弄清，此事系一个熟悉唐家情况且在汪伪军混事者写信密告引发。恰好戴戎光的社会关系有与唐秉琳相同之处，无意中当了一回保护伞。

戴戎光贪财好色，要塞地下党便纵贪取信，使其毫无顾忌地吃空额、做生意，封江之际寻隙向江北放船攫取钱财，地下党也顺便把我军急需的作战物资运到江北。戴戎光捞钱后常去京沪快活，哪有心思经营江防？地下党便乘机在布雷、构工等问题上做文章。

1948年7月，交通员送回紧急情报，泰州中统县室扣押了一对盐阜口音的夫妻嫌犯，连同他们的一船棉花和少量黄金一并转解镇江。经镇江中统省室审讯，嫌犯坚称是逃亡地主，土改后跑出来做生意。据打入该室的中共党员徐冠苏判断，这对夫妇很可能是我方重要情报人员。唐秉琳一听情报中讲述的情况，即知出事者是唐坚华及其妻仇英。他没想到，维系要塞潜伏人员安全底线的链条，竟在最令人放心的环节出了问题！经了解，唐坚华这次是奉华中工委社会部之命，偕妻子从射阳装一船棉花为掩护，前往江阴传达华中工委指示，途经泰州时意外出险。唐坚华是唐氏兄弟和吴广文的入党介绍人，万一夫妻俩经不住考验，潜伏人员被一网打尽，华中工委深耕要塞数年的成果将毁于一旦……

唐秉琳向华中工委公安处处长宋学武汇报后，决定采取两条应变之计：一是另派交通员去江阴，积极营救唐坚华夫妇出虎口；二是由地下党员徐冠苏向唐坚华夫妇转达党组织对他们的关怀，要求坚决顶住敌人严刑拷打，告其组织正千方百计设法营救。

唐坚华被羁数月，党组织尚不知他是否暴露并危及要塞潜伏者。而解放战争正轰轰烈烈向南推进，加快要塞策反工作步伐急如星火。1948年深秋，华中工委决定派曾搞过情报工作的吴铭，担任工委联系要塞地下党组织的政治交通员。正在华中党校参加整党学习的吴铭受命后即意识到，唐坚华被捕后情况不明，去原定联络点接头要冒很大风险。吴铭去管文蔚处受领指示，管文蔚明确，此去江阴是为继续推进策反工作，做好迎接大军渡江准备，接上关系了解情况回来汇报后，再制订下一步工作计划。

公安处科长江华安排吴铭去盐城华中行政学院找唐君照，了解唐氏兄弟和吴广文等人情况。巧合的是，吴铭当年在华中党校学习，与戴戎光胞弟、中共党员戴曙光之妻顾迺香同在三队九组，曾听顾迺香讲过戴戎光家不少情况，对他开展工作很有帮助。

吴铭过江先到南京，找到在国民党考试院院长办的哥哥吴志清。还在苏中九地委联络部工作时，他就把哥哥发展为联络对象，让其为我军提供了不少情报。弟弟突然

莅宁，吴志清又惊又喜，以考试院工作人员的身份，给他开具了经无锡、苏州、常熟去江阴的公函，要求沿途军警提供便利和保护。吴铭在江阴城走进用于考试的一座有着三幢房子的大院，在中间一幢房子找到联络点，冒险敲门对上了暗号，见到了联络点负责人唐仲衡，带来了江北的指示，使中断数月的联络渠道又重新恢复起来。此后，唐秉琳让副官杨蔚然租用江阴城内高巷11号后院给唐仲衡安家，以此作为江北交通员过往的联络站，由李容有接送来人并暗中保护。

再说身陷囹圄的唐坚华夫妇，听到徐冠苏传达党组织指示，情绪极为振奋，写血书表示决心牺牲自己，保守党的秘密，如遇不幸，组织开个追悼会足矣。仇英入狱时已怀孕，为防意外拒绝保外分娩，因流血过多，几乎死在狱中。夫妇俩被羁押六个月，敌人始终未能找到其“通敌”证据，经党组织多方营救终于获释。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60—136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时间来到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后，国共双方力量对比急骤生变。1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时与势的重要变化，要求把渡江作战准备及早提上议事日程。华中工委书记陈丕显和工委常委、华东军区苏北指挥部兼苏北军区司令员管文蔚，加快了策动江阴要塞起义的步伐。

1948年底，淮海战役已近尾声，国民党江防部署的新变化亟待报送江北，而吴铭一月一赴江南，唐仲衡正生病。要塞地下党决定，趁国防部南迁广州之机，为唐秉煜请病假过江汇报。陈丕显、管文蔚接见了唐秉煜，管文蔚和苏北军区副司令员刘先胜听他汇报了敌京沪沿线军事部署、要塞兵力配备等情况。唐秉煜提出了王德容入党的问题。管文蔚问：“这个人有把握吗？”唐秉煜说：“此人一向对国民党心怀不满，来要塞后经深入考察政治可靠，可以信赖。”管文蔚理解栖身虎穴者强烈的归属感，说：“非常时期不能履行正式入党手续，我代表华中工委批准他入党。”

管文蔚指示说：“眼下你们要努力做好迎接大军渡江准备工作，只准成功，不准失败。要以地下党为核心，团结上层军官，联络中下层军官，架空戴戎光，夺取实际指挥权，到时候率领全体官兵起义，保证大军顺利渡江。”唐秉煜说阵中起义容不得闪失，请派人到要塞加强领导。管文蔚沉吟说：“派人打进要塞比较困难，打入者也未必能适应那里的环境，搞不好容易暴露。不过……”这位军地两栖的领导人

转念又想，单靠要塞内部地下党员组织起义困难和风险都很大，从部队派少量骨干打入要塞加强起义组织领导确有必要，于是对唐秉煜说：“必要时可考虑派个别有地下工作经验、精明强干的同志打进去，但主要还是靠你们自己。此事关系重大，只能单线领导，不准发生横向联系，切切不可大意。”

管文蔚派人护送唐秉煜回江南前又嘱咐他说：“你把工委的意见传达给要塞党组织。要利用国民党下级绝对服从上级这一条，千方百计抓住上层，以便直接下命令。要塞策反工作已到最后阶段，保障渡江部队安全登陆，是你们最重要的任务，望加倍努力！”

唐秉煜冒险过江送情报，国防部三厅来电话找人，又派一科长前来催其回京搞计划，唐秉琳只好说他去苏州探亲撞车，因肋骨受伤入院。科长问住哪个医院，唐秉琳告诉他一个医院的名字，科长回南京竟打电话找院长询问，结果露馅引起怀疑。唐秉琳再接科长电话，只得道歉说记错了院名，更正为苏州博习医院，并速派人前往完善手续，为唐秉煜续假半个月。唐秉煜返回后，戴戎光亲临问候并欲察看负伤处，又致一场虚惊。危机过后，大家对江北部队骨干打入要塞充满期待，却不知新的危险又已逼近。

（四）南京发起“和平攻势”

民国最后一个春天，古城金陵残梅凌乱，乍暖乍寒。

李宗仁上任，自觉迫在眉睫事有三：一是为结束内战，不得不同中共谈判，以求和解；二是不得不阻止中共渡过长江，以求得体面和平；三是必得寻求美援，以制止通货膨胀、物价狂涨。三项任务九九归一，就是与中共“划江而治”，保住东南半壁。

1月23日，李宗仁代总统第二天，即采取了一个大动作，发表文告称“中共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并宣布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五人为和平谈判代表。

上台第三天，李宗仁又派人去找司徒雷登，要求美国发表支持他的声明，以增强其政治地位。美国人虽然乐见南京激流换马，但不愿以身试险。“后蒋时代”的南京政府，对中国时局变化能起多大作用，他们认为还有待观察。深谙世情的李宗仁虽知自己手中并无实权，但他懂得，连年兵燹的国家人心望和。只有高举和谈的旗帜，才能争取时间、组织力量，得到舆论广泛支持，具备更多同蒋叫板的资本，巩固自己的地位进而实现政治抱负。

24日，李宗仁下令行政院办理七件事：一、各地“剿总”改为军政长官公署；二、取消全国戒严令（接近前线者，俟双方下令停止军事行动后再行取消）；三、裁撤“戡乱”建国总队；四、释放政治犯；五、启封一切在“戡乱”期间因抵制“戡乱”法令而被封闭的报馆杂志；六、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废止刑事条例；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非依法不得逮捕。

李宗仁着眼倒蒋和“划江而治”的“和平新政”，既与抗战胜利后美国扶植中国“第三种势力”进而阻止中国革命的倒行逆施一脉相承，又与蒋介石真反共、假和平的鼓噪同声相应。

> 中共宣城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渡江战役史》，第2—4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第1版。

美国扶植“第三势力”由来已久。1946年“双十节”，司徒雷登发表讲演，号召“自由主义者”起来在“蒋委员长领导下”进行一场“革命”。一众文人随即发表“十人书”予以响应，《大公报》副刊《时代青年》就此展开讨论。马歇尔来华“调处”期间，频频拉拢对美抱有幻想的中间党派和知识分子，要他们组织一个“有力量的自由主义集团”，在“政治的局势里发生影响”，加紧支持中国“第三种政治势力”的行动。艾奇逊编撰的《白皮书致杜鲁门的信》供认，马歇尔调停失败后仍留在中国，原因之一就是“将鼓励中国非共产区域的自由分子，较过去更有力地发扬他们的力量”，“走向和平与团结之路”。魏德迈来华后，放宽对“自由主义”分子选择尺度，由过去对美蒋抱有幻想的中间党派及成员，扩充为一切所谓爱国的知识分子，并亲赴北平寻找“自由主义”的教授名流谈话。1947年春，胡适、张伯苓等先是组织“华美协进会”，入秋又在北平、天津组织“民治促进会”，借此纠集一批教授、文人和名流士绅供美国驱使，与革命力量抗衡。1948年初，蒋介石政权危机加深，美国加紧导演自由主义运动丑剧。1月，《大公报》连续发表题为《自由主义者的信念》《国际第三方面势力的抬头》等社论，进一步宣扬“自由主义”的“中间路线”。由美国洛克菲勒提供津贴、宋子文资助成立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打着只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幌子，鼓吹“采取和平方法较之诉诸武力革命实胜一筹”，“不诉诸武力的革命也照样能实现社会主义”，粉饰国民党“走上行宪的大路”，“已不是一个独裁的政权”，企图为蒋介石集团续命。[注]

> 姚夫等编：《解放战争纪事1945—1950》，第294—295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

1948年7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击破敌人假和平运动的阴谋》的指示：国民党中不少派别及个人，已在美帝国主义当权派的策动和鼓励下，进行一种假和平运动，企图利用国民党区域一部分人民尚存的和平幻想，表面上牺牲蒋介石，宣布停战议

和，实际上是为整个国民党反动统治取得喘息时间，以卷土重来。许多地方系军阀政客，以李宗仁为首，企图取蒋介石而代之。[注]

南京政府“和平”鼓噪干云蔽日之际，一些“第三方人士”也不甘寂寞，纷纷发声。

1948年10月23日，中共早期领导人、1925年在中共四大上因争执负气退党的张申府，在《观察》杂志发表《呼吁和平》称：“假使战事还不设法结束，和平还不速谋恢复，必致全国人，至少东北人与华北人，或至少在东北华北大城市住的人，都不得活；国家更将丧尽了元气，丢尽了脸。”这位曾介绍周恩来、朱德入党的大侠以教师爷口吻说：“今日呼吁和平，更是有百是而无一非。”

1949年2月12日，梁漱溟在上海《大公报》著文《敬告中国共产党人》：“任何问题要用政治方式解决，不要用武力。”“郑重要求中国共产党，你们必须容许一些异己者之存在。”“今日国内腐恶势力仍然遍地都是，终须加以铲除。但武力却用到今天这样恰好，不可再用。”“我对于中共之滥用武力，却一直是不赞成。”

毛泽东密切注视着“第三方人士”的动向，1949年开年，三个月时间在新华社连发五评，揭露南京政府和美国假和谈、真备战的实质，澄清一些民主人士思想。1月4日发表第一篇评论《评战犯求和》直击“喧嚷着的所谓‘和平’”，“必须有助于已被击破但尚未消灭的中国反动派的休养生息”，以便“卷土重来，扑灭革命要害”。2月15日发表第二篇评论《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辛辣指出：“国民党反动派从今年1月1日开始搬起一块名叫‘和平攻势’的石头”，“现在是打在他们自己的脚上了”；16日发表第三篇评论《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批驳国民党宣传部《特别宣传指示》，戳穿了国民党呼吁和平的假象，还原其呼吁战争的真面目；18日发表第四篇评论《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剖析蒋介石、李宗仁、孙科的“戡乱”言行，将所谓“中共应负破坏和平之责任”的谬论驳得体无完肤；4月4日发表第五篇评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尖锐指出：“南京的李宗仁何应钦政府”，“仍然是蒋介石和美国政府的工具”。五篇檄文酣畅淋漓，一针见血，使“和平运动”包藏的祸心大白于天下。

《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46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2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复林彪等人电，明确指出：“李宗仁在上任后的和平吹嘘和1月20日以前蒋介石及CC系的和平攻势并无区别，故我们必须揭露和回击。”[注]

李宗仁的“和平攻势”虽与蒋介石“乞和”相仿，但两派终究是貌合神离。2月6日、7日，孙科接连发表谈话唱反调，声称“共党所提出之惩治战犯一节，即系绝

对不能接受者”。听命于蒋介石的行政院，表面上遵命落实李宗仁和平新政举措，但对取消戒严令公然掣肘。行政院发言人对外宣称：“开释政治犯与戒严法系属二事，触犯戒严令不能称为政治犯。”2月11日，汤恩伯无视代总统令发表谈话称：南京、上海等地区接近前线，在全面和平未实现前，仍继续执行戒严令；本人业已手令京沪各地，如有暴动情事发生，为首暴徒由地方军法机关处理，就地枪决；奉令停刊之报纸杂志，在未正式接到复刊许可时，不得复刊。

孙科和汤恩伯敢于抗命，皆因背后有人撑腰。蒋介石离宁返乡第五天，就亲函京沪国民党高官，必须作战到底。1月29日，蒋介石又指示参谋总长顾祝同，对蒋军各级部队长发出密令：“吾人为求捍卫国家民族及党与军之生存，应下最大决心，与之（指中共）誓不两立，坚决从事长期自救、自卫与救民之战争。”

孤掌难鸣的李宗仁，在积极寻求恰当人选北上拜见毛泽东摸底通融时，还广启人脉，多管齐下，决计于国共两党之外，广泛发动京沪有影响力的业界名流和社会贤达，协力推动停战促谈。为此，他一面致电宋庆龄、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等对自己“不怀恶感”的友人，希冀“造成第三种力量”向中共施压；一面在京沪公众组织和教育界联络知名人士，组成人民和平代表团前往北平，试探中共领导人对其和平呼吁的反应，营造多层次、宽领域、成波次的和平请愿潮，以江南和平攻势消解江北军事攻势。

李宗仁一番斟酌，派其私人代表甘介侯博士赴沪，代为游说颜惠庆、章士钊、雷震、江庸等社会名宿参加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赴北平转达“真正的民意”。1月31日，李宗仁偕邵力子前往上海亲访，特意邀请著名银行家陈光甫加入此团。

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商学院的镇江籍商界巨子陈光甫，堪称李宗仁跨界知己和风雨故人，1915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为沪上金融界领袖，1928年任央行理事、中国银行常务董事，声誉日隆。翌年，蒋介石有意让其出任行政院部长，陈光甫因不满蒋介石反共政策，婉言谢绝。李宗仁劝他接受，他笑道：“将来，老兄当了一国之元首时，无论你叫我干什么，我一定接受。”

抗战时期，陈光甫作为中美英平准基金会主席，受蒋介石派遣专程赴美，搞定两千五百万美元的中美“桐油借款”，1939年和1940年又促成两笔总额为四千五百万美元的贷款以裨抗战。李宗仁代总统后，自然想起这位身兼国民政府委员和立法委员的商界知己。无奈南京政府气息奄奄，李宗仁旧话重提，试图唤起陈光甫的参政热情，他却惨然一笑：“大势已去，只好取消前言了。”

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由中国人民和平策进会、中国各大学教授国策研究会联合组织发起，首发阵容以江南高校教授为主体。新华社2月11日援引代表团发言人谈话称：本团此次来平，与叶剑英将军等会谈二次，叶剑英将军表示愿将吾人意见转达

中共中央，并告以中共对于和平向具诚意，如南京政府确有和平诚意的事实表现，准备与他们谈判，以期获得有利于人民的真正和平。

上海人民代表团由北平返沪后，中共地下党员、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议刘仲华报告李宗仁，中共权威人士表示，只要李代总统断绝同美国人联系并协同消灭蒋介石派残余势力，就愿意进行合作。李宗仁认为，“这是共产党要使蒋先生和我不和的诡计”，随即手书五条建议：一、政府同意通过政治方法解决一切国家问题。二、各方指派一正式代表团，立即恢复和谈。三、和谈时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四、今后国家重建工作按下列原则进行，即组成民主政府，平均分配财富，军队国有化。全体人民自由生活。五、今后与外国的事务，按照民族平等、互相有利的原则进行。

2月14日，曾任国务总理并摄行总统职权的颜惠庆携李宗仁五条建议，率第二批人民代表团抵达北平。中共派林彪、董必武、叶剑英与代表团会谈，罗荣桓、聂荣臻参加会见。叶剑英与代表团恳谈后，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和傅作义、邓宝珊前往西柏坡，毛泽东、周恩来与他们亲切会面，并举行非正式谈判，双方达成八点秘密协定。毛泽东特地嘱咐上海代表团成员说，这个协定只交给李宗仁。协定全文如下：

一、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二、谈判方式取绝对秘密及速议速决。三、谈判以中共1月14日声明及所提八条为基础，一经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其中有些部分须待联合政府办理者，在联合政府成立后执行之。四、谈判协议发表后，南京政府团结力量与中共共同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五、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六、南京政府参加新政协及参加联合政府之人选，由中共（包括民主人士）与南京政府商定之。七、南方工商业按照原来环境，依据中共城市政策，充分保障实施。八、有步骤地解决土地问题，一般先进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

> 师哲口述，李海文著：《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302页，九州出版社2015年2月第1版。

第二批上海人民代表团携重磅协定归来，宁沪地区气氛趋缓。然而，祥和中陡生意外。大年三十，在蒋介石支持下再度出任行政院院长的孙科，奉蒋命率内阁要员赴沪议决，行政院2月4日迁广州。于是，在代总统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行政院突然从南京消失了。孙科内阁南迁时，照会各国使馆随政府迁往广州。出人意料的是，国民政府一再催促司徒雷登撤离南京，他却一面敷衍应付，一面上书美国政府称：“南迁广州，是我最强烈反对的，逗留南京，静观其变才是我所喜欢的。”司徒雷登滞留南京意欲何为？后来，他在回忆文章中言及此事说：“国民政府自然希望外交使团迁往广州，这样有助于它的威望。按理讲，我们都是委派给国民政府的，应

跟着它迁到‘临时首都’去。我的公使衔顾问刘易斯·克拉克受命带着一批人前往广州。在那几个令人迷惘的礼拜中，北大西洋集团的各国大使一直在非正式地举行聚会进行商讨。最后的一致意见是暂留南京，且各自都受到了自己政府的支持。”各国“对美国的决定都抱着尊重的态度，这使我不由得想到了美国在世界上所处的新地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大使是唯一迁往广州的使团团长。他向我们之中的一个人解释说，他的政府之所以命令他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他们留在南京遭人流言蜚语”。1949年8月，斯大林对来访的刘少奇解释苏联大使罗申迁穗时说：“我们是想看看国民党的动态。”[注]

行政院举院南迁，立法院CC系分子也紧步孙科后尘迁往广州。素来门庭若市的京城官府，立时空了一半。

行政院不告而别，李宗仁悲愤交织。政府依然由引退了的蒋介石操控，徒有其名的“代总统”不仅令不出门，而且闭目塞听！

2月22日，李宗仁飞华南视察，当晚强抑心中愤懑与孙科长谈，坚决要求他把行政院迁回南京。孙科一脸无辜，一副代人受过的模样：“在敌人炮火轰鸣下，我们怎能处理政务呢？”李宗仁针锋相对说：“哲生兄啊，八年抗战中，有哪一天不是在敌炮火轰鸣下过去的？”经李宗仁规劝，孙科才同意行政院回迁南京。

>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1945.1—1949.2，第460页，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第1版。

李宗仁旋晤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告知蒋介石离任后，政府一致要求尽快与中共缔结和平协定。孙科同意代总统的政策，不日将返宁。他还透露，近期邵力子可能与毛泽东接触，并驳斥了蒋介石可能重返政治舞台的传闻。28日，孙科回宁，行政院工作人员也接踵返回，唯有CC系控制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仍留广州。[注]

启动与中共谈判已是大势所趋。2月25日，李宗仁从广州回到南京，即开会议定谈判基本指导原则：一、和谈必须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我们绝对不能让共产党以胜利者自居，强迫我们接受不体面的条件。二、鉴于铁幕后面的附属国形势混乱，我们不能同意建立以共产党为统治党的联合政府。我们应该建议立即停火。在两党控制区之间划一条临时分界线。三、我们不能全部接受所谓八条。而只同意在两政府共存的条件下讨论八条。李宗仁当然清楚，这三条已背离他同意以中共八条为和谈基础的声明。

孙科在国家危难之际南迁行政院，触怒了他曾供职的立法院。立法委员开始动议对他投不信任票。孙科闻讯心虚，即给李宗仁递交辞呈。李宗仁略加斟酌，又私下交还与他，要求其同心协力，共克时艰。但鉴于多数立法委员都认为孙科难以履行担负的责任，3月7日，孙科再向李宗仁递交辞呈，李宗仁只好同意。

李宗仁打算让刚卸任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的何应钦继任行政院院长。白崇禧和吴忠信持李宗仁亲笔信飞赴上海面晤何应钦，遭到断然拒绝。3月9日，李宗仁亲往上海做工作，谈起1927年8月，他和白崇禧、何应钦等实力派人物逼蒋介石第一次通电下野，三人同在南京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党务委员的往事，动情劝谕："敬之老弟，历史正在重演，蒋先生又辞职了，南京再度垂危。当你以前的同事孤独的时候，你能无动于衷吗？"

念及旧谊，何应钦表示愿意帮忙，但又申明："没有蒋先生的赞许，我不敢做任何事情。"李宗仁让随行的吴忠信打电话向蒋介石报告何应钦任职事。蒋介石说："我是退休的人，让德邻弟自己安排一切。"何应钦闻听此言，居然不寒而栗，请求允许他远离政界。李宗仁只好派吴忠信前往溪口当面请求蒋介石做何应钦工作。蒋介石在电话中对何应钦冷冷地说："既然德邻想让你担任那个职务，你就接受下来吧。"何应钦"领旨"后方敢接受李宗仁任命。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行政院长刚刚走马换将，总统侍从室秘书长吴忠信又递辞呈。按下葫芦起来瓢，未免令李宗仁应接不暇，有心让翁文灏补缺。翁文灏是1948年6月蒋介石行宪后首任行政院院长，为"学者从政派"官位最高者。因金融改革失败，当年11月翁内阁总辞职。李宗仁顾忌中国官场旧习，担心曾任过行政院院长的翁文灏由高就低恐脸上难堪，但又心有不甘进行试探。翁文灏宦海沉浮，竟不失赤子之心，欣然接受李宗仁邀约，说："我能为国为民做什么事情，就一定毫不犹豫地去做。国家濒临灭亡，我怎么可以把这个职位看作是对我个人的侮辱呢？"

然而，翁文灏一接受任命，蒋介石即派员训斥他说，别忘了自己是怎样靠委员长"发家"的，责问他怎么会无耻到主人一退休，就向"桂系"投降呢？1949年5月，翁文灏愤然辞去总统府侍从室秘书长，远渡重洋赴法国寓居。1951年，经毛泽东、周恩来邀请，翁文灏取道香港回到北京。

1949年3月12日，立法院以二百零九票赞成、三十票反对，通过新政府名单：行政院院长何应钦，行政院副院长贾景德，政务委员张群、莫德惠、张治中、朱家骅，秘书长黄少谷，内务部长李汉魂，外交部长傅秉常（叶公超代理），财政部长刘攻芸，国防部长何应钦（兼），参谋总长顾祝同，经济部长孙越崎，交通部长端木杰，教育部长杭立武，司法行政部长张知本，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白云梯，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戴愧生，主计处主计长庞松舟。

新政府组成后，李宗仁授权行政院长何应钦组织一个正式代表团，依据2月25日议定的谈判三原则与中共谈判。蒋介石以总裁身份指示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议；共军何日渡江，则和谈何日停止，其破坏责任应由共方负之。"国民党中常委还遵蒋旨意成立"和谈指导委员会"，负责谈判指导与决策。何应钦电洽蒋介石，指定张治中、黄绍竑、邵力子、章士钊和李蒸组成政府代表团，张治中

为团长。李宗仁在名单加上刘斐将军的名字。张治中赴溪口将名单呈蒋介石阅后，始发往北平。

3月26日，中共指定周恩来、林祖涵、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组成和平谈判代表团，建议4月1日在北平开始谈判。

>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1945.1—1949.2，第423页，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第1版。

1月14日，斯大林曾就国共和谈致电毛泽东：“谈判应当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进行，而不是与挑起内战并因此而失去民心的南京政府进行谈判。”毛泽东深思熟虑后于2月4日表示，中国共产党不同国民党谈判，而是同国民党政府谈判。这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新现象。我们应当同政府达成协议，而不是同国民党达成协议，因为同国民党谈判会提高其在舆论界的威望。假如我们承认它是谈判方，它必然会觊觎未来联合政府中的地位。

南京代表团启程前夕，李宗仁召集居正、阎锡山、白崇禧、张治中等人开会，决定组织一个指导委员会，监督即将开始的国共谈判。指导委员会由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张群、吴铁城、孙科、吴忠信、朱家骅、徐永昌、董显光等十一人组成。4月6日，何应钦飞往广州，将监督委员会名单交国民党中常委正式批准，以期政府与执政党在谈判问题上更好地合作。

与此同时，李宗仁加紧了外交努力。首先被召见的是在广州的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罗申记忆犹新，抗战末期，蒋介石就与苏联人接触过。1945年底，蒋经国到莫斯科，斯大林告诉他，在帮助中国政府之前，中苏之间必须签订一项中立协定，在中国组织一个有中国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蒋介石拒绝了这项建议。

1946年，蒋介石告诉苏联驻华大使，准备考虑斯大林的建议，表示希望访问苏联。斯大林即派专机飞乌鲁木齐供蒋介石访苏之用，并指示驻华大使罗申做好蒋介石去莫斯科的安排。罗申求见蒋介石，结果被拒绝。他设法与过去有过接触的蒋经国联系，可蒋经国也避而不见，去了上海。罗申跟踪追击赶到上海，却无法找到蒋经国。苏联专机在乌鲁木齐久等无果，只好空机折返。

斯大林对蒋介石失信非常恼火，命苏联在华外交官均采取与中国政府不合作政策。中共军队夺占东北后，蒋介石重又向苏联驻华大使要求访苏，埋怨蒋经国上次没安排好。罗申电告莫斯科，斯大林答复，蒋介石是个不诚实的人，可以不理睬蒋的请求。

李宗仁召见罗申，罗申说：“现在已太晚了，我亲爱的总统先生，中国永远也不会断绝同美国的联系，苏联能为它做些什么呢？”此后，李宗仁授意代理过武汉国民

政府外交部长的留美博士甘介侯，作为其私人代表与苏联大使进行商谈。然而，苏联开出的价码太高了——斯大林坚持要中国和俄国建立真正合作的关系，甚至建议，中国为了表示诚意，应尽量驱逐在华美国人。

在无法同苏联和解之后，李宗仁加紧与老朋友司徒雷登接触。不过，谈及美援，司徒雷登总是批评中国政府腐败。李宗仁提请大使注意蒋氏引退后中国政局已完全改变，请求司徒雷登敦促美国政府借给中国十亿至少五亿美元，以帮助制止通货膨胀，并保证今后将有效使用。如美国现在拒绝帮助中国阻止共产主义扩展，今后它要在远东做同样的事，就要多花一百亿美元，而且不会有什么效果，还要使美国青年不得不流血。美国大使似乎很固执，拒绝了李宗仁的请求，说由于蒋先生仍在幕后控制着政府，中国的局面没有改变，美国的远东外交政策已定，现在决不能改变。

李宗仁不死心，希望美国至少给予道义上的支持，2月23日派代表会见司徒雷登，要求美国发表支持国民党政府的书面声明。4月中旬，李宗仁与司徒雷登长谈，建议其以大使名义为他举行茶会，邀英、法驻华大使参加。李宗仁在茶会上强调，二战后俄国布尔什维克控制了整个东欧，开始对西欧冷战。当西方正在建造堤坝阻止“赤祸”西泛时，让它在东方泛滥难道是明智的吗？如中国现政府倒台，我相信整个远东会随之崩溃。他呼吁各位将他的意思转达给他们尊敬的本国政府，并敦促在座使节发表联合声明，关注国共谈判，并请三国政府希望谈判达成和平解决。

李宗仁期待着司徒雷登回应。大使却避开他的目光，请英国大使代表讲话。这位外交官出言谨慎，像是没听到李宗仁的要求。

“和平攻势”沸沸扬扬时，桂系实力人物白崇禧也与李宗仁相向而行。白崇禧在武汉提出：“现在与南京党中央闹翻了，我们政治上拿什么东西来号召呢？就是与共产党合作吧，也要有一个政治组织支持才好办。”他主张，请李济深回武汉主持政治，造成一种政治力量，既可与蒋对抗，亦可与中共商谈。李宗仁、黄绍竑均表赞同。1949年1月7日，黄绍竑持李、白亲笔信赴港，请李济深回武汉“主持大计”，打算联李与中共“划江而治”。

新桂系发轫即与李济深有旧，黄绍竑一直感念这位江湖大哥的侠义。蒋介石与桂系生死缠斗几十年，李济深屡次顶撞蒋介石而三次被开除党籍。这些恩恩怨怨，成为广西军界故旧守望相助的天然黏合剂。但黄绍竑抵港时，李济深已与三十多名民主人士乘挪威籍货轮“阿尔丹”号先期北上，1948年12月26日到达东北解放区，使他扑了个空。再回香江，黄绍竑忽觉仁兄李济深已成乘风而去的人杰，有些可望而不可即了。

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等五十五名抵解放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联合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彻底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和谈八项条件，

“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李济深白绸言志，上书“革命进展至此，似不应再有所徘徊观望”等语，请黄启汉转交白崇禧。

这一时期，白崇禧向中共方面派出的联络人来电，建议他派人去郑州找刘伯承会商。白崇禧想到以李济深作大旗号召“划江而治”已落空，将来有一天恐怕还得依靠蒋介石，于是在南京又表示还是要立足于打争取“划江而治”，2月4日奉旨将蒋介石下野后发出的“坚决作战到底”的密令转部将执行。同一天，他还向部队转发了参谋总长顾祝同的密令：“吾人为求捍卫国家民族及党与军之生存，与之（指中共）势不两立，坚决从事长期自救、自卫与救民之战争。”嗣后，两条密令均为解放军所缴获。

1949年春，“和平”像一只翻飞不定的风筝，游弋京沪汉上空。久历江湖者看得真切，和平，和平，多少罪恶假汝以行。

《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477—47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政声嘈杂喧闹时，毛泽东却看到了自由资产阶级接管城市的作用，4月7日致电邓小平、饶漱石、陈毅：“上海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黄炎培、章乃器、盛丕华、包达三、张 绸伯、施复亮等已到北平，表示向我们靠拢。”“接收及管理上海如果没有自由资产阶级的帮助，可能发生很大的困难，很难对付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及国民党的强大的联合势力，很难使这些敌对势力处于孤立。”“请你们考虑，是否有必要在没有占领上海以前，即吸收他们参加某些工作。而在占领上海以后，则吸引更多的这类人物参加工作。”“整个京、沪、杭区域都应注意此点。”

（五）毛泽东拒绝苏美英法调停

国民党当局发出“乞和文告”后，中国共产党认为，这是国民党企图利用和谈赢得喘息之机，借以保存实力重整军备卷土重来的阴谋，故未接受其要求。1949年1月8日，南京政府向美、苏、英、法四国发出希望调停国共内战的备忘录。

1月10日，斯大林收到南京政府备忘录，11日致电毛泽东，征询“中共方面是否愿意接受苏联充当调停人”。斯大林为中共提出的建议口径是：“中国共产党赞成在中国实现和平”，“主张直接同国民党谈判，而不要任何外国调停人”，尤其“那个派遣军队和舰只直接参与内战、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外部大国不能充当调停人”，因为其“不可能采取中立和客观的态度来结束中国内战”。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1945.1—1949.2，第346、348页，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第1版。

翌日，斯大林向中共中央转交了南京政府的备忘录。[注]

斯大林的电报表明，苏联赞成就国共停止内战进行和谈，但反对美国在和谈中担任调停角色，而希望由苏联出面调停。

毛泽东读出了斯大林来电的袖里乾坤。窗外飘起了雪花。长征以降，毛泽东对北国冰雪情有独钟。他披衣出门沿滹沱河漫步，纷繁的往事像漫天飞雪飘洒而来……

对于苏共，毛泽东敬重中又不无苦涩。“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无疑是十月革命最虔诚的学生。但历史喜欢不按常规出牌。斯大林从列宁手中接过苏共领导权后，在中国革命的重大关头，支持的基本是毛泽东的反对派。

早在大革命末期，1927年3月15日，苏联《真理报》就发表《蒋介石宣言》并配发社论，不顾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已连续报道蒋介石暗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捣毁安徽省总工会和省农协等骇人听闻的反革命行径，吹捧蒋介石“忠于革命原则，服从党的领导”。当蒋介石磨刀霍霍准备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时，共产国际却指示中共“埋藏所有的武器”，避免同蒋介石发生军事冲突。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斯大林依然把蒋介石叛变归结为中国工人运动规模过大致使资产阶级恐惧，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毛泽东不同意斯大林的看法，但在中共五大上被排斥在大会领导之外，剥夺了表决权。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斯大林过分信任王明。1931年1月7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身份操纵会议，极尽威胁利诱之手段选举王明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使之掌握党中央实权，推行比“立三路线”更完备的“左”倾教条主义。九一八事变后，斯大林要各国共产党“忠实地捍卫苏联”，王明不认为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严重步骤，而是“进攻苏联战争的序幕”，排斥毛泽东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领导，使白区革命力量几乎损失百分之百，苏区革命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 赵勇：《毛泽东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劭琯编：《毛泽东两次访苏》，第53—54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6月第1版。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斯大林相信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怀疑中共和毛泽东，认为毛和中共的立场是狭隘的农民立场，毛泽东害怕工人，忽视工人阶级而孤立地建立红军，怀疑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主张依靠国民党和蒋介石拖住日本。抗战胜利后，斯大林仍把中国未来寄托在蒋介石身上，对美国代表霍普金斯说，中国，包括共产党在内，目前还没有一个能统治全国的领导人；苏联不愿意与一个分裂的中国谈判，准备支持蒋介石及其政府。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对罗斯福保证：斯大林全

力促进由蒋介石领导的中国统一；战争结束后，中国应由蒋介石继续领导。蒋介石发动内战，毛泽东率中共军队自卫抵抗，斯大林电告中共不要抗争，告诫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注]

苏共乃至共产国际虽然对总在“山沟里”转悠的毛泽东不甚理解，但1930年初获悉他“因肺病逝于福建前线”后，即发布千字讣告，称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历史的谐谑之处在于，1931年初，毛泽东被从苏联镀金归来的王明排斥了对红军的领导权后，1934年1月，中共“总负责”博古（秦邦宪）向共产国际报请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不包括毛泽东，而共产国际力主增补毛泽东为政治局委员，从而为中国革命在遵义翻盘埋下了伏笔。

> 孙大勋编著：《毛泽东与国际友人》，第68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3月第1版。

1935年1月，遵义会议重新确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斯大林尊重中国共产党这一选择。王明从苏联回国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以“钦差大臣”自居，扬言搞什么新方针。斯大林明确表态肯定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地位，由王稼祥回国传达他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对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纠正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起了很大作用。从此，苏联每次在莫斯科红场阅兵，都要悬挂斯诺在延安给毛泽东拍摄的头戴红军帽的大幅照片。[注]

历史上沙皇俄国对中国领土的鲸吞、苏共看好并支持国民党且欲罢不能的过往、雅尔塔协定对中国主权的侵害、苏共对中国内战形势的误判及“中立”政策，都不能不使中共对“老大哥”怀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情感。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中，毛泽东与苏共交往实则已形成三条清晰底线：革命不能依靠输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不能简单照搬照抄；中共尊重苏共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先行示范作用和影响力，中苏两党应当是亦师亦友那样一种关系，而不应成为“父子党”；中国的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

在毛泽东看来，中共与苏共渐生嫌隙，始于共产国际对中共脱离中国国情的某些指导，但真正产生芥蒂，还在抗战胜利之后。当时，国民党主力远在大后方，而八路军、新四军则穿插沦陷区。毛泽东想乘势而上，在苏联红军支持下拿下东北，苏联出兵东北当天即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8月12日，蒋介石令八路军停止前进、不许擅自行动，并电请毛泽东去重庆面商国是。斯大林来电说，蒋介石已经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家大计，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外就无法理解，如果打起内战，责任由谁承担？在中共最需要苏共支持的时候，斯大林的态度无疑给毛泽东泼了一瓢冷水。他气愤地称斯大林此举是“不许革命”。虽然此后中共采纳斯大林

的意见，毛泽东以弥天大勇赴重庆谈判赢得人心，但斯大林在关键时刻的立场，还是令中国共产党人耿耿难忘。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忆录》，第16—1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10月第1版。

1947年3月，中共撤离延安前，毛泽东希望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把解放战争的真实情况介绍给各国共产党。斯特朗在苏联发现，苏联人都认为中国革命已失败了。斯特朗一有机会就向苏联人宣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但很少有人相信她的话。一个外交官学校的青年来找她丈夫前妻的女儿，这个青年说，中共“已经失败”，“他们没有工业，没有无产阶级，不会战胜的”。[注]毛泽东几次希望赴苏，向斯大林当面介绍中国革命的情况以期得到苏联支持，但因故始终未能成行。

中共宣城市委党史研究室：《渡江战役史》，第5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第1版。

斯大林感到棘手的是，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友好同盟条约时，已答应蒋介石不再支持中共。假如自食其言，不仅将背负说谎和失信的恶名，承受西方世界“制造共产主义阴谋”攻讦，有损苏联国际声誉，而且还会导致美英两国不受雅尔塔协定约束，收回他们对苏联兼并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默契，以及苏联在蒙古和中国东北权益的承诺。故苏联宣布对中国内战持中立态度。[注]

中共宣城市委党史研究室：《渡江战役史》，第5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第1版。

1947年夏，解放军由内线转入外线作战捷报频传，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战略格局，也改变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9月19日，毛泽东在葭县朱官寨致电中央后委杨尚昆，要求师哲将9月1日自己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译成俄文通过苏方在华人员转交斯大林。当年12月起，苏联媒体关于中国革命的报道逐渐增多，积极声援中共和人民解放军及解放区成为舆论主调。莫斯科电台12月1日评论说：“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得到了成千上万人民的拥护。”“一切真正的爱国分子都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团结起来了。”[注]

世界社会主义大本营发出的鲜明信号，对共产国际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积极影响。1948年8月21日，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为题，摘登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9月13日，该刊报道了8月在哈尔滨召开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盛况。

雪落太行静无声，毛泽东踏雪凝思，对斯大林的来电心生狐疑。

三大战役奠定胜局后，要不要渡江南进、何时渡江南进、怎样渡江南进，是能否乘势而上夺取国民党政治、经济中心，彻底埋葬蒋家王朝的关键所在，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夜面临的最后大考，也是把一个和平统一的中国交给人民，还是把一个分裂战乱的中国留给历史的关键抉择。置身中国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毛泽东面临的内外压力之大，远超指挥三大战役时期。

>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1945.1—1949.2，第349—350页，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第1版。

1月12日，毛泽东复电斯大林：“我们认为，对南京政府建议由苏联出面调停以结束中国内战的照会，苏联政府似应作如下答复：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直希望看到一个和平、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但是，如何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和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苏联政府本着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认为参加中国内战双方之间的调停是不可接受的。”强调“现在我们有理由拒绝接受国民党和谈，因为现在的情况是：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国际形势也不利于南京政府，人民解放军今年夏天就可以渡江进攻南京。我们似乎不再需要采取迂回的政治手法”。[注]

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吴铁城，1月8日曾商请美英法三国大使斡旋和平。三国起初同意出面调停，但获悉苏联和中共的态度后，转而放弃调停。13日，司徒雷登受命答复南京政府：“在目前形势下，试图扮演调解人角色，不会取得任何有意义的成果。”

1月14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建议“国共双方应在没有外国调停人参与的情况下进行谈判”。“一旦国民党不接受这些条件”，“继续打内战的罪魁祸首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和平的旗帜就落在了共产党手里。”谈到中央联合政府，建议将“五分之三的（政治）协商会议席位、三分之二的政府部长职位留给共产党”，“把总理、总司令并尽可能地把总统的职位”留给共产党，“将余下的议员席位和部长职位分配给其他民主党派和国民党”。“对南京方面调停建议的答复，我们将根据你们的意愿来起草。”

>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1945.1—1949.2，第353—354页，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第1版。

斯大林在电报中郑重提出：“我们依然坚持认为，您最好暂缓您的莫斯科之行，因为目前您留在中国是非常必要的。如您愿意，我们可以马上派一位政治局负责成员到你们那里去，在哈尔滨或其他什么地方就你们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商谈。”[注]

斯大林站在中共立场上的中肯分析，显然打动了毛泽东。中共中央经过认真研究，决定采纳苏联的建议，同意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但坚决反对蒋介石提出的谈判

条件。

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

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当日，毛泽东复电斯大林：在“利用与国民党和平谈判，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基本方针上”，“我们与您是完全一致的”。

翌日，苏联政府答复南京政府：接受“调停是不适宜的”。

《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44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19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指示，加写了一段话：“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

（六）米高扬来到西柏坡

新春佳节贵客登门，而且是斯大林派来的代表，这给西柏坡平添了节日的喜庆。1949年1月31日午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贸部部长米高扬应约而至。

此前1月9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我准备到您那里去。”

>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1945.1—1949.2，第346页，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第1版。

斯大林10日致电毛泽东：十分抱歉，鉴于您的莫斯科之行会被敌人利用来败坏中国共产党的声誉，攻击中共是依附于莫斯科的附庸力量，我们以为，您还得将启程日期再推迟一些时日。

14日，斯大林再电毛泽东：“我们依然坚持认为，您最好暂缓您的莫斯科之行，因为目前您留在中国是非常必要的。如您愿意，我们可以马上派一位政治局负责成员到你们那里去。”

> 《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440—44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毛泽东17日复电，同意暂不去莫斯科，欢迎苏联派一位政治局委员来华与中央书记处同志交谈，地点似在石家庄为适宜。

“在乡间土道上颠簸了六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指定地点。”当日，米高扬给斯大林发电汇报行程时这样说。与米高扬同行的，还有在华指导东北铁路修复的苏联铁道部副部长柯瓦廖夫等人。

“欢迎！欢迎！”毛泽东在院门口与米高扬、柯瓦廖夫等来宾握手。米高扬向毛泽东转交了斯大林赠送的一块毛料。

进屋落座后，米高扬向毛泽东等转达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问候，动情说：“斯大林同志讲，毛泽东同志和其他的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艰难的岁月里，在残酷的战争中，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在短短的两三年内，打了这么多的大胜仗，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真是为你们的胜利高兴，向你们祝贺，向你们致敬！”

“谢谢斯大林同志，谢谢斯大林同志派你们来和我们一起研究商讨。”毛泽东高兴地说，“当面谈是很好的，非常欢迎你们来！”

米高扬向毛泽东解释他访苏未能成行的原因：“中国革命形势发展迅猛异常，在这关键时刻，您不能离开指挥岗位；中国境内交通不便，还要通过敌方封锁线，也要考虑安全问题；赴苏往返时间太长，怕影响您的身体健康。斯大林同志十分关心中国革命形势发展，派我代表他来中国听取你们意见。”

“很好！”毛泽东说，“我们很想同苏联同志谈谈，以便你们了解我们的情况，我们也能听到你们的意见，这样一定会有好处。”

双方谈了一个下午，但以海阔天空的闲聊居多。

当晚，中办安排宴会给苏联客人接风洗尘，西柏坡自养的猪和鸡、从滹沱河里捕来的鱼和虾，成为主要食材；从石家庄买来的汾酒、葡萄酒，满满当当摆了一大桌。贵客临门，又逢春节，战争中难得一聚的中共领袖与苏联贵宾把酒言欢，其乐融融。米高扬一口就喝掉了半杯汾酒，不善酒的毛泽东则以辣椒代酒。

“来，尝尝滹沱河里的鱼！”毛泽东请苏联客人吃红烧鱼和熘鱼片。米高扬听完翻译口译，看一眼鱼，对他说了句什么。翻译指着鱼问：“这是活鱼吗？”得到肯定回答后，米高扬才动筷。

这无疑是内战开始以来，毛泽东吃得最丰盛的一顿年饭。而中共领导人与斯大林特使间的觥筹交错，其意义又远在餐桌之外。

2月1日至3日，双方举行正式会谈。会谈主要是毛泽东讲话，周恩来、任弼时偶尔就某些问题作些解释。毛泽东说：

中国革命发展迅速，比过去预计的时间要短些。估计渡过长江就可以攻克南京、上海等大城市。我们军队的斗志是昂扬的，只要指挥得当，在战略战术上不犯重大错误，取胜是有把握的。

我们的口号、政策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全国工农群众和先进知识分子是站在我们一边的。美军不会直接卷入中国内战，只是间接干预，把军火军用物资大量供应给蒋军。这也是有利于我们把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后，直至取得胜利的条件之一。

胜利后建立新政权提上日程来了，这个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整个政治纲领就在于此。新政权必须是联合政

府，中国共产党是核心、是骨干，需要建立和健全各项制度，不断加强和扩展统战工作。

国家一解放，接踵而来的任务是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我们正在研究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和二战后两次经济恢复工作的经验。今后对我们最严峻、最重大的考验是群众工作。青年几乎占全国近半数人口，除了青年团，恐怕还得建立发展其他类型的组织。

米高扬插话问："成立几个不同的青年组织，是否会分散甚至分裂青年层的力量？可否只要一个共青团组织？"

毛泽东说："中国青年人口众多，怎能用一个组织圈起来？青年工作应该是灵活的，要保证他们能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米高扬急忙说："我只是带耳朵来的，没有权利发表意见。"

毛泽东说，目前我们的军事力量发展较快，青年们踊跃参军，军队的若干成分是起义部队，需要逐步改编、改造和现代化。

关于中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屋子，等屋内打扫干净，再请客人进来。中国应当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中，坚持亲苏的方针。我们没有中间道路。

随着战争推进和解放，紧跟着要进行土改，这是一项经济工作，又是一项严肃的政治工作。民族资产阶级虽属于剥削阶层，但也受外国资本的压迫和剥削，要采取联合、利用、改造的方针。

> 《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45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师哲口述，李海文著：《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272—279页，九州出版社2015年2月第1版；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1945.1—1949.2，第429—447页，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第1版。

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有几十个民族。民族压迫必须取缔，提倡各民族互相团结、互相友爱、互相合作，共同建国。目前主要是防止和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注]

毛泽东的谈话言近旨远，反映了他在中国革命迫近全国胜利形势下，对一系列全局性重大问题的深刻思考。谈话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大外交方针。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1945.1—1949.2，第421页，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第1版。

2月4日，正是中国农历立春。会谈时，毛泽东问米高扬，苏联怎么看待内外蒙古合并？米高扬说，我们不支持这样的建议。毛泽东问：为什么？米高扬说，这会导致中国失去大片领土。毛泽东说，我认为，外蒙和内蒙可以合并，并加入中国。比如说，两三年后，当中国的共产党政权更加巩固，一切都会向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外蒙古宣布，它脱离中国是由于国民党统治中国，外蒙古愿意加入中国，同内蒙古合并。米高扬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外蒙古早已独立。对日胜利之后，中国同苏联一样，也承认了外蒙古独立。外蒙古有自己的军队和文化，在文化和经济繁荣的道路上迅速发展，早已尝到独立的甜头。如果有朝一日它与内蒙古合并，它将成为独立的蒙古。任弼时插话说，内蒙古有三百万人口，而外蒙古只有一百万人口。毛泽东闻声大笑起来。[注]

《列宁全集》第54卷，第777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第2版。

哲布尊丹巴，全称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漠北蒙古藏传佛教最大的活佛世系，属格鲁派，于十七世纪初形成，与内蒙古的章嘉呼图克图并称蒙古族地区两大活佛。

外蒙古独立始于清末民初。1905年，沙皇俄国在日俄战争失败后调整远东政策，策划外蒙古地区独立并与日本达成妥协，推行“用朝鲜‘交换’蒙古”的计划。[注]1911年12月，哲布尊丹巴[注]乘辛亥革命爆发之机，在沙俄政府支持下宣布“独立”。1915年6月7日，北洋政府及外蒙古自治当局与沙俄签订不平等的《中俄蒙协约》，外蒙古在沙俄卵翼下开始“自治”。1921年3月13日，外蒙古宣布与中国脱离关系，当年11月25日宣布从中国独立。北洋政府虽未予承认，但此前外蒙古事实上已沦为沙俄势力范围。

1945年2月，美苏英三国元首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齐聚苏联黑海北岸克里米亚半岛小城雅尔塔，就战后欧洲重组和世界秩序重建进行磋商。当时，美军正在南太平洋逐岛与日军血战，惨重的伤亡令罗斯福头痛不已，亟须苏联早日加入对日作战。而斯大林对中国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进而建立中苏战略缓冲区思谋已久，并渴望拿回1904年日俄战争俄国在东北亚损失的权益。2月11日，《苏美英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在雅尔塔签署。

戴隆斌著：《斯大林传》，第473页，天地出版社2018年1月第1版。

雅尔塔协定规定，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二至三个月内，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对日作战。三国元首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开出的政治条件为：一、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二、恢复1904年日本背信弃义的进攻所破坏的原属

俄国的各项权利，包括将库页岛南部及其全部毗连岛屿归还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惠权益，恢复租借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对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进行共管，并保证苏联的优惠权益；千岛群岛交给苏联。[注]

中国共产党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之时，外蒙古实际上脱离中国并独立运行已时逾四分之一世纪。但毛泽东对中国的版图由“桑叶”变“金鸡”总是心有不甘，故在与米高扬会谈时旧话重提。

2月6日，米高扬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说，我们认为，苏中关于旅顺地区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苏联政府决定废除这个条约，一旦对日和约签署，马上就从旅顺撤军，苏联愿意这样做。关于中国东北铁路条约，我们不认为是不平等条约，因为这条铁路主要是靠俄国的资金建成的。可能条约没有完全体现平等的原则，我们愿意讨论这个问题，同中国同志般地解决这个问题。

>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1945.1—1949.2，第442页，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第1版。

外蒙古独立寸步不让，港口铁路问题可以商酌，米高扬的态度，非正式透露了苏联在雅尔塔条约涉华问题上的立场。[注]

> 师哲口述，李海文著：《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279、281页，九州出版社2015年2月第1版。

米高扬在西柏坡逗留一周，同中共五大书记进行过三次正式会谈，并同周恩来单独谈过一次，就战后经济建设、成立新政府的规划与设想、对外关系和贸易开展等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米高扬对师哲说：“你们成立中央政府时不愁没有领导人，周恩来是当总理最合适的人选。从哪儿找得到周恩来这样好的总理？！你们有这样一位好总理真幸运！”[注]他与任弼时交谈后又说，任弼时是一个成熟的共产主义者，一位很有涵养、有丰富工作经验的领导人。中共党内人才济济，这是取得胜利的第一个保证。

2月6日，米高扬离开西柏坡前夕，毛泽东再次来到米高扬住处与他亲切话别。之后二人在院子里拍照留念。

> 师哲口述，李海文著：《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279、281页，九州出版社2015年2月第1版。

东方欲晓，米高扬的西柏坡之行收获甚丰。2月7日晚，他给斯大林发电：“与我交谈的政治局委员们，在一般政治、党务、农民及整体经济问题上完全是行家，并且都很有自信。”他称赞毛泽东“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注]

在全面了解解放战争局势和中共战略意图后，2月8日凌晨，米高扬在朱德、任弼时陪同下抵达石家庄，登机返回苏联。

师哲口述，李海文著：《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255页，九州出版社2015年2月第1版。

渡江南进犹箭在弦，米高扬是否带来斯大林不同意过江的意见？全程在场的翻译师哲回忆：“当时，米高扬来中国没有讲这个问题。”但他清楚地记得，1945年8月20日，苏联红军驻延安情报组给毛泽东转来俄共（布）中央一封密电，内容是，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危险的灭亡。[注]

《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合订本），第39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9月第1版。

同年，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说明这种民族灭亡的危险：人民解放军千万不可过长江，若过了，就会引起美国的军事干涉。[注]

李颖：《文献中的百年党史》，第188页，学林出版社2020年11月第1版。

1946年3月，美苏拉开“冷战”序幕后，“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声浪一时甚嚣尘上。苏联领导人对形势作了悲观的估计，认为中国如打内战，美苏可能卷入，中国将成为世界大战的战场，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注]

《司徒雷登日记》，第44页，黄山书社2009年7月第1版。
弗拉基米尔·吉杰耶尔：《铁托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1版。

1949年1月4日，司徒雷登日记披露：“傅泾波见到张治中，张氏说中共决心继续打下去，可并不是由于苏联的关系，盖苏联只劝告他们沿着长江停止进军。”[注]司徒雷登不知道的是，斯大林已开始反思。1948年2月，他会见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说：“战后，我们请中国同志到莫斯科来讨论中国的局势。我们直率地对他们讲，我们认为中国没有发展起义的前景，中国同志应当寻求同蒋介石暂时妥协。他们应当参加蒋介石政府，解散他们的军队……根据中国现在的情况，我们承认是我们错了。”[注]

1949年1月平津战役告捷，长江以北解放区连成一片。鉴于中国革命胜局已定，苏联进一步调整对华政策。米高扬的西柏坡之行，是苏联对华政策由“中立”倾向支持中共的一个明确信号。

然而，苏共在中国革命关键时刻的态度，令毛泽东难以释怀。

1957年，毛泽东重话渡江：“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他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我们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

从解密的苏联绝密档案可见，米高扬的到访，显然有裨于苏共加强对中共和中国革命的了解，释疑增信。访问也通过他把一个成熟、自信、睿智的中共领袖集团展示在苏共面前。毛泽东阐述的“一边倒”外交方针，也赢得了苏共对渡江南进更多支持。

（七）国防部紧急江防会惊爆粗口

1949年2月5日、9日，中原和华东野战军相继整编为第二、第三野战军，即将挥戈南下；东北野战军头年11月13日令将所属十二个纵队依次改称第三十八至第四十九军，本级拟改称第四野战军并派出先遣兵团与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勠力南征。三大战略集团百万雄师直逼长江，主力丧失殆尽的国民党军长江防线岌岌可危。

淮海战役前，国民党高层就长江江防是否沿袭“守江必守淮”的作战原则，产生严重分歧。蒋介石下野后，这种分歧于2月间国防部在南京召开的紧急江防会上全面爆发。李宗仁忆及此事，颇有不堪回首之感：蒋先生最不可恕的干预，便是他破坏了政府的江防计划。蒋先生原非将材，东北及徐蚌二役可说是他亲自指挥垮了的。此次守江，虽已属下策，但是我们究有强大的空军和数十艘军舰为共军所无，若善加利用，共军亦未必可以飞渡长江。无奈蒋先生无意守江，却要守上海一所死城。执行他这错误战略的，便是他最宠信而实际最脓包的汤恩伯。

李宗仁素知汤恩伯人品官德极差，其暴戾恣睢令人发指。抗战时，汤恩伯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皖豫边区总司令，某次自河南叶县乘汽车前往界首视察，因遇雨难行，自洛阳改乘小轮船东行。途中，轮船擦碰河道趸船引起震动，汤恩伯大发雷霆，痛骂该船公司经理系奸商，怒而拔枪将其打死。李宗仁当时驻节老河口，闻听此事将信将疑。后在北平行辕任上，听目击此事的汤恩伯总参议沈克复述方予证实。沈克说，司令如此草菅人命，所部自然军纪废弛。河南民谚云：

“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汤军为害之烈，以致在豫地跻身水、旱、蝗、汤四大公害。

李宗仁鄙夷汤恩伯，还因其鲜廉寡耻，卖师求荣。汤恩伯原名汤克勤，早年曾任闽浙军少尉排长，战败后回乡当巡警。后在日本结识浙江第一师师长陈仪侄女王锦白，为攀附陈仪，休掉发妻与王锦白结了婚。1924年，陈仪保送汤恩伯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八期步兵科深造。陈仪膝下无子，视汤恩伯为干儿子，汤为感恩叔伯，遂改名“恩伯”，称陈仪为“义父”“恩师”。

1949年初，时任浙江省主席陈仪见国民党大势已去，有心起义，却苦于无兵。他自认为与汤恩伯既有师生之谊，又有父子之亲，可谓恩重如山，于是动了说服汤恩伯倒戈的念头。陈仪先派外甥丁明楠持函赴沪策动，后又亲赴上海当面陈情。可他万万没想到，汤恩伯竟向蒋介石举报了自己。中共地下党获此情报，冒险通知陈仪转移。陈仪不肯相信，竟再次赴沪相劝，2月27日被国民党保密局逮捕。此事传出，连国民党政要亦为之不齿。

国防部召开紧急江防会议，本为研究江防御敌之策，调整完善长江作战部署。会议由参谋总长顾祝同主持，汤恩伯等人出席会议，代总统李宗仁和行政院院长何应钦列席会议。为便于开会时讨论，会前，国防部作战厅厅长蔡文治中将拟就了守江计划。

蔡文治在会上陈述的江防计划重点是，国军江防军主力应自南京向上下游延伸。因为这一段长江江面较狭，北岸支流甚多，共军所征集预备渡江的民船，多藏于这些河湾之内。至于江阴以下之长江江面极阔，江北又无支河，共军不易偷渡，可以不必用重兵防守。何应钦、顾祝同虽然知道蒋介石以上海为重点的守江意图，但和李宗仁一样，都认为蔡文治提出的方案十分妥洽。

然而，国防部作战厅的江防方案，却遭到汤恩伯的坚决反对，声言这一方案违背了总裁意旨，因而在会上另提一套方案，即把江防军主力集中于江阴以下，以上海为据点，集中防守。至于南京上下游，只留少数部队以为应付。汤案简而言之，便是守上海不守长江。这样无厘头的江防布局，怎不令李宗仁等大跌眼镜？

1949年1月18日，蒋介石下令将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汤恩伯为总司令。蒋介石“归隐山林”仅四天，1月25日，便在溪口召集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人，就长江布防面授机宜，确定以湖口为界，将整个长江防线划为两大战区。湖口以东归汤恩伯指挥，湖口以西归白崇禧指挥。具体部署是：以刘汝明的第八兵团指挥第五十五、六十八、九十六军防守湖口至铜陵段；以张世希的第七绥靖区指挥第二十、六十六、八十八军防守铜陵至马鞍山段；以侯镜如的第十七兵团一〇六军在徽州地区为预备队；以李延年的第六兵团及张耀明的首

都卫戍司令部指挥第二十八、四十五、九十九军防守南京、浦口地区；以丁治磐的第一绥靖区指挥第四、二十一、五十一、一二三军防守镇江至江阴段，第五十四军在丹阳为预备队；以陈大庆的淞沪警备司令部指挥第三十七、五十二、七十五军防守苏州至上海段。还有二十几个师，分布于浙赣铁路沿线和浙东地区为二线部队。海军林遵的第二舰队分驻镇江、上海、安庆等港口，沿江巡弋；空军三百余架飞机分置于南京、上海、武汉机场，支援陆军作战。

蒋介石确立的京沪杭战区作战方针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京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淞沪为核心，持久防御，以台湾优势海空军支援淞沪，并与之相呼应坚守淞沪，待机反攻。

白崇禧所辖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四十个师，既有桂系部队，也有蒋系部队。蒋介石溪口召见后，派人将湖口以西守江布防的决定送白崇禧执行，但对湖口以东作战计划则讳莫如深，只字不提。对白属下蒋介石嫡系宋希濂等人，又另行交底，专门作有指示。

蒋介石定下调子，汤恩伯便提出了长江防御指导要则及五个防卫要点：第一，敌如由镇江南京段正面渡江时，应以机动部队突击歼灭之；如不奏效，第一绥靖区部队由镇江沿江公路及铁路逐次抵抗，退至上海。以海空军全力协助地面部队，确保淞沪。第二，敌如由皖南渡江时，第七绥靖区、第八兵团部队应独立作战，以机动部队反击之；如不奏效，应适时退出皖南，确保浙赣线。首都以东部队，应确保长江、钱塘江三角地带，不得已时退守淞沪。第三，敌如只从正面渡江时，各部队应根据上述两项布置指导作战。第四，淞沪地带，以狮子林、杨林、大场、真如、浦淞、梅憧、华泾、黩山公司为第二防线；张华泾车站、西越家浜、庙行、江湾、国嘉路、相家桥、虬江口为核心防线。第五，加强三江营、瓜州、十二墟、裕溪口、枞阳等地之阻塞。

李宗仁从国防部江防会上始知，汤恩伯的长江防御部署兵力分三个板块：第一，汤恩伯所属二十五个军七十五个师约四十五万人，在上海至湖口段沿江及浙赣线以北地区布防，成两道防线。沿江第一道防线部署十八个军，其中淞沪警备司令部所辖三个军担任金山卫、吴淞口至白茆口段防御；第一绥靖区所辖四个军担任白茆口至镇江段防御，第五十四军位于丹阳、武进地区为战略预备队；第六兵团和首都卫戍总部所辖三个军担任镇江以西之桥头镇至马鞍山段防御，置重点于南京及浦口、浦镇地区；第七绥靖区所辖三个军担任马鞍山至铜陵段防御，另以十七兵团第一〇六军位于泾县、宁国地区为预备队；第八兵团所辖三个军担任铜陵至湖口段防御。第二道防线布设于浙赣线及浙东地区，沿该线及其以南地区共部署七个军，担任纵深防御。第二，白崇禧部十五个军四十个师约二十五万人，在湖口至宜昌段沿江地区布防。其中十个军直接担任江防，五个军担任长沙、南昌、九江、安庆等地防御。第三，位长江下游的海军第二舰队八十九艘舰艇，位

长江中游的江防舰队四十四艘舰艇，空军四个大队配置在上海、南京、汉口等地的三百余架作战飞机，支援陆军扼守长江防线。

李宗仁回忆录载，蔡文治听完汤恩伯大违江防实际和战略常识的方案后认为，这一方案是彻头彻尾自杀政策的产物，在战略战术上均属下策。但凡稍有头脑的将领，都会视其为笑话。

汤恩伯却蛮横地坚持说:“这是总裁的方案，我必须执行！”

蔡文治质问:“就战略、战术来看，我想中外任何一位军事家，都不会认为弃长江而守上海是正确的。现在代总统、何院长、顾参谋总长，都同意我们作战厅的方案，为什么你独持异议？”

汤恩伯说:“我不管别人，总裁要我怎么做，我便怎么做！”

蔡文治据理力争:“总裁已经下野，你还拿大帽子压人，违抗参谋总长的作战计划。如果敌人过江，你能守得住上海吗？”

汤恩伯在军校任过蔡文治学员队队长，会上为小字辈所饯血脉偾张，一拍桌子吼道:“你蔡文治是什么东西？！什么守江不守江，我先枪毙你再说……”说着把文件一推，冲出会场，扬长而去。

蔡文治涨红着脸嚷道:“这还能干下去？我辞职了！我不干了！”

一直被蒙在鼓里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压根儿就不知道蒋介石和汤恩伯秘密操弄的长江防卫作战方针。汤恩伯制定的长江“立体防线”作战部署，李宗仁作为代总统也并不知情。目睹眼中只有蒋介石，全然不把自己当回事的汤恩伯的骄狂，李宗仁早窝了一肚子火。看来，要阻止共军渡江，首先要撤掉把党国命运置于长江危局的汤恩伯！但汤独宠于蒋，何应钦、顾祝同又不敢吭一声，自己当然也无计可施，只好眼睁睁看着他胡来。李宗仁无可奈何望着何应钦、顾祝同说:“这局面如何收拾？”

何应钦、顾祝同相视苦笑，皆做摇头叹息状。半晌，何应钦说：“总裁不答应，那又有什么办法？只有让他拖垮呵！”

李宗仁等在前台支撑局面的人，虽自觉身系家国，为拱卫长江愿竭尽绵薄，但终究拧不过幕后操纵的蒋介石，无不窝火憋气。9月中旬，身在广东的李宗仁想来在大陆去日无多，正好蒋介石也在广东，便电话约见，两人遂有今生最后一晤。李宗仁单刀赴会至蒋介石下榻处，一见面就板起脸申明，今天是以国家元首的地位来同你谈话，接着便历数蒋种种过失：出了问题总是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从不

反躬自问；主政二十年，贪污腐败比北洋军阀时代还要黑暗；自己明明已经隐退，口口声声说五年之内不再过问政治，却在溪口架设七部电台遥控指挥嫡系部队，口是心非，毫无信誉；用人全凭个人喜好，汤恩伯在河南烧杀抢掠，与日本鬼子无异，老百姓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论才能，汤当个师长都已经很过分了，却成为一个方面军的统帅，皆因你宠着他。出乎意料的是，蒋介石被骂得狗血淋头，听得面红耳赤，竟诺诺不能言，无一句反驳。蒋介石待李宗仁发泄完满腔怒火后，强装笑脸说：“德邻老弟，过去的事，都是我的错，请原谅！”然而，李宗仁在广州当面斥责蒋介石后，蒋依然故我，不曾改变分毫。

1950年4月，在大陆羁押两个月的陈仪被押往台湾。庭审时，汤恩伯竟出庭做证，当着“义父”和法官的面说：“我对犯人陈仪，一生受恩深重，难以言喻，正图报不暇，何肯检举他？只因我忠党爱国情深，不得不忍痛检举，不能顾及陈仪对我的深恩大德。”

6月19日，陈仪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被处决。陈仪死后舆论大哗，世人皆骂汤恩伯忘恩负义。陈仪外甥女王锦白不顾汤恩伯反对，在家设灵堂祭拜伯父后，携子女赴美国定居。

（八）邓小平亲拟《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阔别太行深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驻防的河北涉县十年，邓小平为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重返太行山。

《邓小平年谱》第二卷，第158—15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1月第1版。

1949年2月26日，邓小平和陈毅等在徐州会合，一同前往西柏坡。邓小平等人28日到达建平县后，住在东柏坡，准备出席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3月7日，邓小平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发言说，中共七大以来，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高度集中，又高度民主。这使得下面很放手，无顾忌。集中使我们少犯错误，民主使我们发挥积极性。中央领导的正确，增加了我们的信心，可以保证今后一连串的胜利”。 七届二中全会决定，我军应争取解放长江以南华中、华南各省，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毛泽东与邓小平等人商量，初定4月10日渡江。

《邓小平年谱》第二卷，第158—15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1月第1版。

3月8日，邓小平和陈毅在西柏坡致电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粟裕、张震、唐亮，告知中共中央军委已确定渡江作战必须于4月10日左右发起，提出三野、二野各部务于4月8日进至江边，10日夜开始渡江作战。电报指出，为保障渡江作战，

我各部的军事准备和部署，力求精细周密，不断告诫干部防止骄傲疏忽。在部队开进期中，集中力量进行有关渡江作战的战术和技术的训练。其他政策教育等项可在渡江后进行，以免减弱部队对作战的注意。但同时必须要求部队加强纪律教育，保障在接收、管理城市交通时不出乱子。[注]

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毛泽东来西柏坡已逾半年，夜以继日起草了一百九十七封电报，指挥了二十四场战役。三大战役期间，毛泽东常将吃饭当负担，连续两三天不上床休息是常态。为保证主席有充沛精力指挥战争、处理要务，中央行政处想改善一下他的伙食。毛泽东对李银桥说：“不要乱忙，你弄了，我也顾不上吃。你只要隔三天给我吃一次红烧肉，我肯定能够打败蒋介石！”

3月14日，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党中央召开座谈会研究各大区规划和人事安排。邓小平受党中央委托，在会上提出了经过酝酿的华东党政军人事安排。中共中央华东局：以邓小平、刘伯承、饶漱石、陈毅、康生、张鼎丞、曾山、张云逸、谭震林、粟裕、张际春、宋任穷、陈赓、刘晓、刘长胜、曾镜冰、舒同等十七人为委员。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由饶漱石、陈毅、刘晓、刘长胜、曾山、刘少文、陈赓、潘汉年、宋时轮、郭化若、李士英等十一人为委员，饶漱石为书记。上海市政府：市长陈毅，副市长曾山、潘汉年及一位非党人士（后为盛丕华）。华东军区：司令员刘伯承、陈毅、粟裕，政治委员邓小平、饶漱石、谭震林。

毛泽东完全赞同邓小平提出的华东人事安排意见。

同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兼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3月15日，毛泽东与爱将再次面洽南渡大计，握着邓小平的手说：“交给你指挥了！”一语千钧的嘱托，蕴含多少信任与重托。

> 见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第一部分展陈国家一级文物——邓小平1927年8月7日在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的记录稿原件。

1927年，三十四岁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毛泽东，与二十三岁的中共中央秘书邓小平，相识于汉口中共八七紧急会议。邓小平的会议记录留下了毛泽东“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注]会后，毛泽东返湘组织秋收暴动，邓小平随中央机关迁沪，不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9年初，朱毛红军经三次反“围剿”胜利，形成了有二十一个县、二百五十万人口的中央苏区。1931年秋，毛泽东来瑞金筹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见到了一别四年的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后来，邓小平调任会昌县委书记，又任中共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因善于兴利除弊、打开局面，工作作风坚定果

敢，深得毛泽东赏识。然而，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相抵牾，毛泽东几次挨整被撤职。

> 1933年，时任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罗明，认为党在闽西上杭、永定等边缘地区的工作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被“左”倾领导者夸大为“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并开展了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341—34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3月第2版。

疾风知劲草。针对“左”倾领导人讥笑毛泽东“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论调，邓小平等提出“大城市里产生了立三‘左’倾盲动主义，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反对“左”倾路线的“城市中心论”，主张在山区和敌力量薄弱的农村建立政权。1932年春，江西苏区继福建反“罗明路线”[注]后，开始反“江西罗明路线”，批判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抵制王明“左”倾错误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翌年给其扣上“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反党派别和小组织领袖”[注]帽子，撤销邓小平省委宣传部长职务，并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

邓小平作为“毛派头子”，在其革命生涯中第一次被打倒。春秋三异，这次人生跌宕和特殊洗礼，使邓小平进一步加深了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认识，坚定了以实事求是之心投身革命的信念。

淮海战役胜利进程证明，总前委是一个团结统一、指挥有方、深孚众望、可以信赖的班子。渡江南进、收京入沪，仍需总前委继续指挥。气势雄浑的决胜交响乐，邓小平显系第一小提琴手。

3月22日，从西柏坡返回江淮的邓小平，随总前委从徐州登车，抵达蚌埠南十一公里处的孙家圩子。26日，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在孙家圩子主持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听取三野各兵团军政主官关于渡江准备工作情况汇报，进一步研究渡江作战问题。

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实施渡江的战略任务开始提上日程。中共中央已先后当面听取了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人的意见。

据张震回忆，孙家圩子会议上，邓小平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指示，全面分析了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利用长江防线拒我于江北，以便等待时机、卷土重来的战略图谋和主要部署。据悉，蒋介石已拟制计划，如长江江防被我军突破，反击不奏效，南京东西地段之兵力即撤守上海，皖南地区之兵力即撤守浙赣线，以组织

新的防御。邓小平指出，我军渡江作战要达到如下战略目的：第一是不让沿岸敌人收缩到上海；第二是不让皖南敌人收缩到浙赣线。他要求，三野部队要集中研究怎样就地歼敌、不让敌人收缩到上海和今后如何歼灭上海之敌的问题。为便于组织协同，邓小平特意向与会第三野战军指挥员介绍了第二野战军部队的编成和渡江计划。

邓小平说，渡江作战的核心是能不能登上对岸。只要一上岸，一切好办。他强调，敌人有可能在京沪杭地区与我纠缠，我们要考虑于渡江后站稳脚跟，巩固滩头阵地，打退敌人反扑，而后乘胜向纵深扩展战果。他拿出一本小册子对大家说：“1948年6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南下，强渡黄河前，伯承司令员对渡河战斗进行过一番研究，给部队下发过一份材料，反映很好。近来，他又研究了渡江作战的战术问题。近几天，他在组织部队向江北开进，没来开会。不过，他写的《渡江作战之研究》在这里，我念给大家听听。”邓小平逐句宣读刘伯承雪中送炭的心血之作，引起了战役指挥员极大兴趣，成为各部队战前准备的重要指导和遵循。

粟裕虽然还在济南养病，但1948年初即派出三批小部队和地方干部南下侦察，对长江的渡口、水文及与之相连的河湖港汊作过详细调查，绘制了地图。会上，张震汇报了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的方案、部署和基本打法，得到邓小平赞成。鉴于敌长江布防东重西轻，敌集结兵力于京沪杭有可能暂时与我形成对峙或决战态势，会议决定，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情况发生何种变化，中线第三野战军七、九兵团除留必需兵力协同西线第二野战军歼灭当面之敌外，主力应与东线第三野战军八、十兵团东西对进，迅速会合。此着成功，既可使东线兵团不致孤立，东线主力作战有必胜把握，又可做到打乱敌作战体系，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目的，故此为全战役之关键。

这时，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北平的电报送入会场。中国革命大本营胜利北移，令诸将领喜笑颜开，会场气氛愈加热烈。

会议期间，邓小平找第三野战军七、八、九兵团主要领导同志谈话，了解作战准备情况，交代注意事项。第三野战军十兵团驻在距离较远的江苏泰州地区，邓小平未能去成。会后，他要陈毅将会议讨论情况整理一下，报中央军委。陈毅将这一任务交给张震来完成。

>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从书编审委员会：《渡江战役》，第5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

2月3日，中共中央致电各中央局及刘陈邓粟谭等人：“国民党有在京沪线组织抵抗及放弃该线将主力撤至浙赣路一带之两种可能”，如其“将主力撤至浙赣线布

防，则我们应作提早一个月行动的准备。华野、中野应休整至2月底为止，准备3月即行渡江”。[注]

2月9日，邓小平在商丘闫集乡张菜园第二野战军指挥部，召集中原局和第二野战军首长讨论渡江作战部署。在刘伯承、陈毅、粟裕研究论证的基础上，这已是第三次集体讨论渡江作战问题。会议认为，关于渡江时间，以在3月半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最好。关于战役部署，以第三野战军四个兵团和第二野战军一个兵团为第一梯队，第三野战军四个兵团分别在江阴、扬州段，南京东西段，芜湖东西段，铜陵、贵池段展开。第二野战军一个兵团在安庆东西段展开，另两个兵团除以一个军进至黄梅、宿松、望江段佯动外，其余五个军作总预备队。渡江作战“预定的突破重点位置，拟在芜湖、安庆地段”。张黄港至三江营段，是作为重点突破地段，还是辅助突破地段，请熟悉该段情况的粟裕作进一步考虑。粟裕反复测算，认为应把张黄港至三江营作为重点，并设计了东、中集团渡江后东西对进围歼逃敌及调整兵力部署的方案，各有关领导均表赞同。

> 原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当时已改编为第三野战军二十六军，隶属第八兵团。
>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渡江战役》，第6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

2月9日，刘陈邓粟谭联名向中央军委报告商丘会议情况，并就渡江时间等问题提出建议：（一）原定的十三日正是阴历十六日，月光通宵，我第一梯队的突击队无法隐蔽，不能求得战术上的突然性。建议推迟两天，即十五日（删）黄昏发起渡江。此时正值阴历十八日，下午九时以前昏夜，甚为有利。（二）江北桥头堡，凡对我准备工作及渡江无大妨碍者，则不攻击；凡对我准备无妨碍，但对渡江有碍又易拔除者，则在渡江先一日或数日拔除之；凡对我准备及渡江妨害甚大者，则视情况于二（冬）日或二（冬）日以后拔除之。（三）确定不攻浦口、江浦，将八纵[注]东移加强东集团兵力，留卅四、卅五两军，与渡江同时积极佯动两浦。[注]

>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渡江战役》，第7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

中央军委2月11日致电刘陈邓粟谭等人，并告林彪、聂荣臻：“同意你们3月半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的计划，望你们按此时间准备一切。”电报确定增补“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四同志参加华东局为委员”，并正式明确“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注]

3月27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同意总前委渡江部署及建议。29日，中央军委电询总前委渡江作战具体部署。陈毅、邓小平、谭震林决定，以总前委名义，把渡江作战的具体部署、准备工作向中央军委作一正式报告。邓小平请陈毅草拟报告，陈毅遂告张震起草一份包括第二、第三野战军行动的作战命令。

张震接到任务，倍感责任重大。早在红军时期，他就对邓小平仰慕已久。1933年6月，张震在整编后的红三军团四师十团工作，进军福建时，常与邓小平等创建的红七军改编而来的五师并肩作战。正是那个时候，张震常听五师战友讲起邓小平的传奇人生，进而产生了由衷钦佩。淮海战役中，邓小平卓越的军事领导艺术和慎思决断，给张震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多年司令部工作历练，使张震养成了起草缜密细致作战命令的思维模式。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张震写了第二、三野战军渡江作战的计划、方案，包括各兵团、各军突击方向、战法等内容。

3月30日，邓小平审阅张震起草的命令说：“这个文件组织部队作战是可以的，但上报军委就显得太具体了。总前委应该站得更高一些，更原则一些。对大兵团指挥不能太具体，向中央军委上报渡江作战纲要，主要说明战役企图、可能预案等项即可。”

张震表示：“我马上按照首长意图重新修改。”

邓小平说：“时间很紧，来不及了。”他决意亲自起草纲要。

历史安排巨匠出彩的时机，通常是转折中的倏忽一瞬。

刘明钢：《“举重若轻”邓小平》，《作家文摘》2021年12月31日第1版。

中组部原部长陈野苹回忆，解放战争中，刘邓两位首长常常集思广益，反复比较作战方案。一旦决定下来，邓小平只是“示以任务而不示以手段”。他的领导艺术之一是，在重大问题和关键问题上，抓得很紧；在具体工作和日常事务上，又放得开手。[注]

从蔡洼村初筹渡江大计，到战役实施纲要呼之欲出，不觉四个半月过去了。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用心领会毛泽东渡江作战战略构想，对敌情我情进行深入了解和缜密研判，经无数次上下互动和循环往复，对渡江作战的关键和要害问题已了然于胸。他打破工作流程，亲自操刀起草《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于3月31日晨完成了初稿。

31日上午，邓小平组织讨论修改《纲要》初稿。张震提出意见后，邓小平在《纲要》中加上了“突破江防之后，务求巩固滩头阵地，站稳脚跟，打退敌人反扑，而后向敌纵深扩张战果”一段话。邓小平在戊条一款“渡江成功后，除留部队歼

灭沿江当面之敌外，应以主力迅速向京沪线上挺进，控制铁路一段”后，加写了“力求首先立稳脚跟，调整态势，巩固阵地，巩固后方联络线，然后扩张战果，对敌人作有后方的、有秩序的进攻”等内容。

当日，《纲要》修改完毕，即以总前委名义，通过华东局电台上报中央军委。此电提纲挈领，总揽全局，战役精要尽收文中。

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1949年3月31日）

甲、蒋军集结于上海至安庆段之兵力，计有二十四个军七十二个师，共约四十四万人左右。其中直接担任江防者，计十八个军四十九个师；控制于浙赣线上杭、金、衢、徽地区者计有六个军二十三个师。可作机动使用者，大约有四个到五个军。

乙、我第二、第三两野战军全部，以歼灭上述全部或大部蒋军，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为目的，决于四月十五日十八时，以全线渡江作战，开始进行本战役。

丙、判断于我渡江成功之后，可能产生的敌军变化是：

（一）收缩兵力于京、沪、杭三角地区和南京、芜湖地区，控制南京、上海、杭州、芜湖、镇江、无锡诸要点，并图于我东西两军相距尚远之际，集结兵力与我突进至京沪线上之东线兵团实行决战，而以芜湖

以西各部退至浙赣线上，以保障其退路。

（二）向后撤收，一线在无锡、南京、芜湖及其以南地带布置防线，利用浙赣铁路迅速转运兵力控制浙赣沿线，确保南京、芜湖两要点，并求得隔断我东西两军之联系，然后再视情况，或在京、沪、杭三角地区与我决战，或退在浙赣线上与我决战，或沿浙赣线作战略之撤退。

（三）主动放弃武进、镇江、南京、芜湖地段，沿江各敌全线向南退集浙赣线上和无锡、上海、杭州沿海地带，以便利用铁道和海口作顽强之抵抗，或作有秩序之撤退。

（四）在情况不利于撤退的时候，分别固守京、沪、杭诸点，以图顽抗。

（五）只要我军渡江成功，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战局的发展均将发生于我有利之变化，并有可能演成敌人全部混乱的局面。

丁、我军的作战纲领：

（一）战役第一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并依据下一阶段之要求，实行战役的展开；第二阶段，达成割裂和包围敌人之任务，并确实控制浙赣线一段，断敌退路；第三阶段，分别歼灭包围之敌，完成全战役。

（二）战役的准备，应以能够应付丙项第一、第二两种情况为出发点，要计算到我东线兵团渡江成功之后，可能遇到严重的战斗，故西线兵团应给以及时有力之支援。

（三）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情况发生何种变化，西线之三野第七、第九两个兵团，除留必需兵力协同二野歼灭当面之敌外，主力应与东线三野之第八、第十两兵团实行东西对进，力求迅速会合。此着成功，即可使东线兵团不致孤立，使东线主力作战有必胜之把握，又可做到打乱敌人作战体系，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目的。故此着实为全战役之关键。

（四）如敌实行第一方案，则应集结三野四个兵团的主力甚至全力于京沪线上的决战方面，而以二野之一个兵团进至衢州及其以北以西地区，截断浙赣线，二野主力应沿江东下担任攻占芜湖及准备攻取南京之任务；如敌实行第二方案，则可改以二野主力出浙赣线，余同第一方案。

（五）如敌实行第三方案，则以二野一部接替南京警备，主力解决浙赣线上之敌，三野全力负责解决沪、杭、无锡地带之敌。

（六）如敌实行第四方案，则以二野解决南京，三野解决沪、杭。在步骤上，宜将上海放在最后解决较为有利。

（七）如敌完全混乱，则依实际情况临机处置。

戊、战役第一阶段——渡江作战的部署：

（一）由粟裕、张震两同志率三野统率机构，直接指挥三野第八、第十两兵团之主力，共六个军及三个独立旅，由张黄港至龙稍港段及由口岸、三江营、京口段实行渡江，另以第八兵团之三十四、三十五两个军，于战役发起同时，以积极佯攻的手段，吸引和钳制两浦之敌。渡江成功后，除留部队歼灭沿江当面之敌外，应以主力迅速向京沪线上挺进，控制铁路一段，力求首先立稳脚跟，调整态势，巩固阵地，巩固后方联络线，然后扩张战果，对敌人作有后方的、有秩序的进攻。如条件许可，则应派队向西发展，截断京杭公路，如敌进攻，则求得在野战中逐步地予以歼灭，如力量不足，则继续巩固阵地，以待第七、第九兵团赶到时协同歼灭之。

（二）由谭震林同志指挥三野第七、第九两兵团，由裕溪口至姚沟段及由姚沟至枞阳镇（不含）段实行渡江。渡江成功后，除留足够兵力歼灭沿江当面之敌，并监视芜湖之敌外，主力应迅速东进，与第八、第十两兵团会合，截断京杭公路，完成对京沪杭地区敌人之割裂，并协同第八、第十两兵团各个歼灭之。

以上两路（四个兵团），归粟、张统一指挥。两路之具体作战部署，第七、第九两兵团之东进路线，均由三野首长另以详细命令规定之。

（三）二野由枞阳镇（含）至望江段实行渡江。渡江后除歼灭当面之敌外，应以一个兵团以最快速度迅速挺进至浙赣线衢州及其以西以北地区，确实控制浙赣铁路一段及屯溪南北公路，断敌退路。二野主力则应迅速东进，接替三野留置部队的任务，担任歼灭芜湖地区之敌，并准备攻取南京。二野各兵团之具体作战部署，由二野首长另以详细命令规定之。

（四）各部队于渡江成功后，应派队接引左右友邻兵团渡江，各部队应与友邻部队切取联络，互通情报，密切配合，并积极主动地支援友邻作战。

己、总前委使用华东局电台，与两个野战军及三野四个兵团联络。三野各兵团，凡有关作战事宜的电报，除发给粟、张外，应同时发给总前委。

庚、有关作战的战术、技术、通信联络、后勤工作诸事宜，由两野战军自行命令规定之。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30—13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

辛、这是战役的基本纲要，所有规定执行事宜，及随着战役发展之各项处置，随时由总前委以单个命令规定之。注

《纲要》上报同时，下发第二、三野战军兵团以上单位。

浩大繁复渡江之战，邓小平仅用两千零五十一个字便扼要阐明，既可使中央军委总体把握了解，又便于一线部队遵循执行。

刘明钢：《“举重若轻”邓小平》，《作家文摘》2021年12月31日第1版。

邓小平行文以简驭繁、抓纲带目的鲜明风格，源于其二十多年中央、地方、军队任职磨砺和治党、务政、带兵实践感悟积淀。据薄一波回忆，1950年6月，周恩来问他：“你在晋冀鲁豫与伯承、小平共事多年，你对他们二位的工作怎么看？”薄一波说：“总理，你看呢？”周恩来说：“据我多年观察，小平是举重若轻，伯承则是举轻若重。他们配合得那么好，这是一个重要因素。从愿望上说，我更

欣赏小平的举重若轻，但我常常举轻若重。这和我长期负责具体的执行工作有关。”薄一波表示完全赞同。[注]

《纲要》上报中央军委后，邓小平感到了一丝轻松。

> 中共肥东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渡江战役期间总前委在瑶岗》，第130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

原总前委机要处赵训经1988年回忆，一次，他找秘书组陈麒章拿材料，听到邓小平大声喊：“老陈，不能回！”不知陈毅是怎样回答的，又听小平喊：“老陈赖皮！”说完两人哈哈大笑起来。赵训经问陈麒章：“首长们在干什么？”陈麒章说：“在下围棋！”[注]

1949年4月3日，移住香山双清别墅九日的毛泽东给总前委回电：“卯东（4月1日）电悉。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愈是深思熟虑的，便愈是简明；愈是精准运筹的，便愈是从容。擘画“樯橹断流”“旌旗蔽日”的百万雄师南渡，总前委制定的《纲要》仅两千余字，而统帅的复电仅一行字！

4月4日，陈毅、邓小平率总前委机关，在蚌埠登上一节“闷罐”车厢，开往长江前线。4月5日一早，陈毅、邓小平从车厢里的行军床上起身，两人相视先是一愣，继而开怀大笑——一夜酣睡，车厢里无处不在的煤屑，已把他们染成了“黑人”！

陈毅、邓小平抵合肥后稍事休息，即奔赴肥东县瑶岗村。

总前委移驻瑶岗是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的建议，理由有三：社情清楚，群众基础好，渡江先遣纵队侦察兵曾驻过；交通便利，靠近七、九兵团驻地，便于联络指挥；离开合肥，利于防空。

> 舒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暨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社会部部长、国军工作部部长等职。

新入驻的总前委指挥部，为一三进四厢两座四合院，原是清末五品顶戴中书科中书衔太学生王景贤宅第。一进正屋东房为陈毅卧室，西边为舒同[注]卧室，最西边是刘伯承的卧室，邓小平的卧室在二进东间。总前委机关驻西侧另一四合院，设有参谋、机要、通信、秘书、管理五处，从机关部队抽调参谋和警卫人员百余人。

4月5日，陈毅在瑶岗给妻子张茜写信说：“我现在由蚌埠转至合肥附近，一片金黄菜花一片稻田，麦绿如油，南方景色十分喜人，多年久居北方，不禁有新鲜感觉。”

中共肥东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渡江战役期间总前委在瑶岗》，第95—96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

据舒同回忆，1949年4月某日，他随陈毅、邓小平散步，但见禾苗青翠，菜花金黄，触景生情的邓小平油然吟诵起孟浩然的《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这是紧扼中国咽喉的战略博弈中，在长江北岸总前委所在的乡野指挥部驻地，被历史记取的一曲饶有兴味的田园牧歌。

1997年2月19日晚，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在北京301医院南楼与弥留之际的邓小平诀别，返回家中哀痛不已。忆及当年小平同志起草《纲要》的情景，他在悼文中写道，小平同志这种简单明快的工作作风，高屋建瓴的领导艺术，使我深受教益。按照小平制定的《纲要》，渡江作战采取宽正面同时强渡和有重点多路突击的战法，将迅速突破江防，占领南京；接着又采取中、东集团对进，分割包围的战略战术，取得了渡江战役第二阶段的胜利。

张震：《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作战与治军》，《回忆邓小平》（上），第5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

1954年，张震任南京军事学院副院长时向院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请教，能否把挺进大别山作为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刘伯承点头同意后问：“你看小平同志没上过军校，为什么打仗决心那么正确？”张震想起小平同志平时不苟言笑，但惯于深谋远虑、慎思笃行，一旦定下决心就不轻易改变的历历往事，便对刘伯承说：“可能是小平同志了解上级意图、当面敌情和自己的部队吧！”刘伯承颔首说道：“关键在于小平同志在实践中掌握了军事辩证法，因此善于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决断，这是最重要的啊！”

张生华：《邓政委在淮海战役中》，《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第15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
刘建华、刘丽主编：《邓小平纪事》（上），第27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1月第2版。

1948年11月24日，总前委移住宿县小李家村，指挥围歼黄维兵团。邓小平对刘伯承、陈毅说，我比你们小几岁，身体也比你们好些，具体工作让我多做些，夜间我多值一些班。[注]他要求作战科一般事情多找他报告，重大事情同时报刘、陈首长。[注]

显然，邓小平当年留学苏联师从名将学习军事理论，喜读名将传记和回忆录，是他深厚战略素养的思想和理论渊源；而勇于参与重大军事指挥实践，则是他决策指挥艺术日臻完善的阶梯。

邓小平回首平生曾说：“我是一个军人，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从革命战争年代到改革开放新时期，老战友都亲切称他“邓政委”。

1987年春节，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去邓小平家中拜年。邓小平兴致勃勃地说，在整个淮海战役期间，毛主席对我们总前委的所有建议都没有批驳过。那时，毛主席对我们淮海前线是赞扬的、信任的。渡江战役计划是我们前线制订的，发了一个电报，毛主席就同意了。所有这些都是毛主席的决策，而且是非常正确的决策。当然了，那个时候我们干得也不错。

> 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中的人与事》，第9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 《毛泽东年谱》第四卷，第39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毛泽东曾说过：“小平，文可以与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与林彪、彭德怀相比。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一个邓小平。小平举重若轻，善于决断。”[注]毛泽东还对梁漱溟说过，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注]

万事皆备，只欠东风。1949年4月初，总前委的关注点，又开始转到渡江时间的敲定上来。

（九）金陵客夜访双清别墅

1949年3月25日清晨，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乘火车到达北平清华园火车站，开启了进京“赶考”的北平篇。

3月23日，新华社播发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新闻公报，中共五大书记乘车率队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这一天，距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东渡黄河进入晋察冀，刚好一年。毛泽东此次重返古都，距他第一次来北平，也已时逾三十年。

韩毓海：《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第62—63页，人民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年12月第1版。

1918年6月，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恩师杨昌济应北京大学之聘，举家迁居北京。8月15日，毛泽东、蔡和森等二十多名“杨门弟子”追随导师来到北京。当时，民国教育部规定，师范生毕业即须工作，不能继续升学。杨昌济告诉弟子，虽不能进大学深造，但可去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遂参与起草赴法勤工俭学计划书，为湖南青年筹办留法预备班。为解决生计，经杨昌济推荐、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安排，毛泽东在北大新校舍红楼一楼管理第二阅览室（今报纸阅览室），每月八块大洋。这一年，是马克思诞辰一百周年。毛泽东幸运地在北大结识了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先行者李大钊。1919年11月27日，北大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举办庆祝协约国战胜大会，毛泽东在这里聆听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讲。[注]北大，成为毛泽东皈依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圣地。许多年后，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大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

弹指一挥间，中国革命和毛泽东都走过了不寻常的三十年。从当年北大图书馆第二阅览室管理员，到即将在全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领袖和人民解放军统帅，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夜，重返三十年前得道圣地古都北平，毛泽东怎不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47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3月30日，毛泽东抵达北平第五天，致电刘邓并告陈饶粟谭等人：“白崇禧的代表（刘仲容）今日到北平。”[注]

刘仲容是湖南益阳人，生于1903年。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此公游刃有余游走国共两大阵容二十年。

2月22日，上海和平代表团从北平返沪前，前往西柏坡面见毛泽东。毛泽东托他们给李宗仁带话：“南京要真正和谈，我希望派一个比较恰当的人来，这个人姓刘，叫刘仲容。他不是共产党员，是我们的朋友，又是你们的亲信，他来比较合适。”

毛泽东称为“桂系的亲信，中共的朋友”的刘仲容，确属堪当此任的不二人选。苦撑危局的李宗仁与白崇禧反复计议，决定投石问路，派刘仲容北上拜会毛泽东，当面试探中共态度。

刘仲容传奇人生首页，写于1925年。那年冬天，他作为黄埔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执行委员，被保送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蒋介石逮捕了一批苏联顾问和领事官员。苏联政府以牙还牙，逮捕一批中国派遣留学生以为交换人质，刘仲容身陷缧绁，1929年被押解出境。1933年，刘仲容在上海与中共中央军委刘仲华接触，并与谢甫生、刘秉琳等共产党人交往，两年后在广西谒见李宗仁，建言不要单纯反蒋，而要联合抗日，受赏识成为谋臣使者。此后，刘仲容在天津邂逅中共党员南汉宸、王世英，次年春天返桂向李宗仁汇报，中共支持广西抗日主张，东北军、西北军均不愿打内战，愿与李宗仁保持联系。李宗仁决定，6月1日以抗日反蒋名义出兵，派刘仲容赴西北协调张学良、杨虎城行动。

1936年11月，李宗仁、白崇禧接张学良密电，要求速派代表去西安商谈要事，刘仲容受命前往。12月12日清晨，受共产国际委派在杨虎城处工作的中共党员王炳南，向刘仲容通报西安事变情况，安排他与张学良、杨虎城相见。张学良告诉刘仲容，此次行动是要求蒋介石抗日救国，要他从速禀报李、白给予支持。

12月16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抵西安，向刘仲容介绍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主张。李、白联电周恩来同意中共主张，将广西省会从南宁迁桂林并相继赴宁任职，桂系军队开赴抗日前线。因何应钦陈兵潼关交通阻断，刘仲容一时难回广西，周恩来邀他到延安小住。毛泽东亲切接见刘仲容，请他在延安多看看，多听听。此间，刘仲容多次听毛泽东讲课，并参加了一些会议。

1937年4月，刘仲容返桂前夕，毛泽东与他亲切话别并修书一封，要他途经武汉时面交周恩来。毛泽东派人送刘仲容过黄河，张云逸在山西吉县热情款待他。刘仲容返桂不久，张云逸作为毛泽东代表，前来广西会晤李宗仁。刘仲容也持毛泽东信赴武汉拜见周恩来，从此接受周恩来直接领导，董必武、叶剑英也给刘仲容下达任务。刘仲容武汉之行，成为中共与桂系关系的新开端。

刘仲容向李宗仁汇报毛泽东与他谈话内容，向桂系高级将领介绍中共对时局的看法，李宗仁邀数省代表来桂共商促蒋抗日对策。全面抗战开始后，李宗仁再派刘仲容赴延安，作为广西常驻代表居留半年余。刘仲容离开延安后，仍为桂系联系中共桥梁纽带，在重庆常去曾家岩50号，与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保持密切接触。

1945年8月，毛泽东在重庆红岩村召见刘仲容，要他谈谈对时局的看法。刘仲容说，蒋介石谈判是假的，他绝不会停止内战，他们都准备好了，等不到您回去就会发动进攻的。毛泽东从容不迫地说，这个我们不怕。现在虽然抗战胜利了，但是中国民主力量发展不快，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阻止反动派内战的阴谋。毛泽东鼓励刘仲容说，你们“小民革”干得很好，在目前的情况下，更应该钻进臭壳子（指国民党），不要怕人家说你们是国民党，不要怕臭，并殷切希望他为人民民主革命做出更多贡献。

在中共高层有如此丰富的交集和深厚人脉，又深得李宗仁、白崇禧信任，所以在南京政府迫不及待发起“和平攻势”之际，刘仲容自然是作为“代总统”特使赴北平探风的最佳人选。

1949年2月底，刘仲容秘密北上前，白崇禧给他交代，此行主要任务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服毛泽东不要过江。刘仲容问:“要是毛泽东不答应呢？”白崇禧自信地说：“国军主力虽已被歼，但还有强大空军和上百艘军舰，足以凭江构筑不可逾越的立体防线。中共军队只有木船，如果硬要渡江，他们是会吃亏的。”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47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3月第2版。
毛泽东：《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8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抗战初期，白崇禧不偏不倚于国共之间，桂军一度被称为中共“友军”。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影响巨大。11月25日至28日，蒋介石召集南岳军事会议，白崇禧在会上将《论持久战》介绍给蒋介石，并说要全国人民都看。[注] 此后，他将这部战略巨著的基本精神浓缩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两句话，由军事委员会令发全军，作为对日作战指导方针。李宗仁第五战区设有动员委员会，白崇禧恂周恩来之请，推荐中共方面钱俊瑞、范长江任该会负责人。台儿庄大战爆发后，白崇禧奉命去徐州赞勷李宗仁指挥作战，认真吸纳周恩来战术上采用阵地战、游击战、运动战紧密结合的方针，收到好效果。其后，白崇禧从中间立场转向反共，参与策划皖南事变，但中共仍视其为致力于争取的国民党三个军政要员之一。1941年5月8日，毛泽东总结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时指出：“上次居于中间立场的桂系，这一次虽然转到了反共方面，却和蒋系仍然有矛盾，不可视同一律。”[注]1945年9月16日，毛泽东在重庆桂园接见了白崇禧。

白崇禧将致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交给刘仲容。刘把信缝在棉衣里，便去上海找中共地下组织接头，路过南京见了李宗仁，李表示全力支持。刘仲容抵沪通过“小民革”找到上海地下党组织吴克坚，请他将李、白派其北上事报告中共中央。两天后，吴克坚通知刘仲容：中共中央欢迎你去。刘仲容赴信阳由张轸亲信送到遂平，与解放军盘查人员对上暗号抵达郑州，折往济南北上。周恩来派齐燕铭去前门车站接站，并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了他。

毛泽东得知老朋友刘仲容来访，十分高兴，立刻做出安排。

《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470—47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3月21日，毛泽东致电中原局：“李宗仁、白崇禧的代表刘仲容16日到汉口，与白崇禧大约需有几天商量，约定20、21、22日到驻马店，请你们迅即命令卢声涛科长速往驻马店迎候。刘仲容到时，立即派妥人陪同乘车经徐州、济南、天津至北平市政府叶剑英市长处，愈快愈好，不要去石家庄。”

30日，刘仲容抵达北平当晚，毛泽东即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

双清别墅是民国第四任总理熊希龄在清代皇家园林静宜园“松坞山庄”旧址上建的私宅。古都春晓，香山万木葱茏，鸟语花香。刘仲容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拾级而上，步入有着水池凉亭的小院。温煦的灯光下，身材伟岸的毛泽东已经在门前等候了。

数年未见，戎马岁月并未给毛泽东脸上平添新的沧桑，他还是那样器宇轩昂、英气逼人，就连衣服上的补丁也依旧如昨。

刘仲容心头一热，喊一声“毛主席”，快步趋前。

毛泽东伸出宽厚的大手说：“咱们是老朋友喽！欢迎你啊！”

毛泽东把客人让进屋，两人落座后，刘仲容道明了来意，呈上了白崇禧的亲笔信。毛泽东展笺细阅，望着衔命而来的金陵客，笑容慢慢收敛起来。他知道，白崇禧素有鸿鹄之志。1928年6月二次北伐，三十五岁的白崇禧统领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直取北京，成为历史上华南领兵入京第一人。6月14日，《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发表社评说：“广西军队之打到北京，乃中国历史上破天荒之事。”

然而，当此历史转折关头，自负却令白崇禧当局者迷。

毛泽东对刘仲容说:“白先生要我们不过江，这是办不到的。”

刘仲容掂着毛泽东话中的分量，谨慎说道:“白总司令估计，你们能用于渡江的部队，不过六十万。长江自古号称天险，加上国军的陆、海、空军立体防御，你们的木船能过得去吗？”

毛泽东当即纠正说:“不是六十万，而是一百万。另外还有一百万民兵，我们的民兵可不像国民党的民兵，是有战斗力的。”毛泽东又说:“等我们过了江，江南的广大人民是拥护我们的，到那时候，共产党的力量就更加强大，这是白先生未估计到的吧！”

毛泽东的态度，完全在刘仲容预料之中。作为比其他国民党高层人士更了解中共的军师，刘仲容深知，在南京政府甚至已无资格向中共提出任何非分之想时，

“划江而治”确属异想天开。

接见从晚上八时，一直持续到凌晨三时许，时逾七个小时。

在以硬实力确保渡江南进务期必成时，中共着眼人民利益最大化，于北平开辟第二战场，不放弃任何机会努力降低南进成本。

4月2日晚，毛泽东再次接见刘仲容，请他回南京规劝李、白，在历史转折关头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并请他转告：“桂系的部队，只要不出击，我们也不动它，等到将来再具体商谈;至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不出击，不阻碍我们渡江，由李先生作主，可以暂时保留他们的番号，听候协商处理。”毛泽东承诺:“白崇禧是很喜欢带军队的，他的广西部队只有十来万人，数字不大。将来和谈成功，一旦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国防军时，我们请他继续带兵，请他指挥三十万军队，人尽其才，这对国家也有好处嘛。至于他要我们的军队不过江，这办不到。我们过江以后他如果感到孤立，可以退到长沙，还可以退到广西，我们来一个君子协定，只要他不出击，我们三年内不进广西。”

在座的周恩来也说:“人民革命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解放军即将向长江以南推进。告诉李、白两位，国共双方谈判已经开始，不论他们签订不签订协定，我们是一定要渡江的。他们同意我们过江，什么都好谈，要抵抗，那是不行的，要对他们讲清楚。不要以为我们过了江就无依无靠，广大人民站在我们这一边。”

> 《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470—47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毛泽东断然拒绝白崇禧不要过江的奢望，但仍尽最大努力争取桂系，4月2日驰电刘邓饶陈等人：南京代表团“要求我军勿攻安庆”，“让安庆守军向武汉撤退，如何？速告”。

当日，刘邓饶陈等人复电毛泽东：“我们确定不攻安庆，最好让该城守军提早撤退，更利于渡江作战。”

南京方面，只要不过江，什么都好谈；北平方面，只要过了江，什么都好谈。国共双方的让步都足够大，但过不过江都是双方不可触动的底线。在1949年春之中国，人民解放军过不过江，于国共两党而言，都是生死攸关决定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同时又是个根本谈不拢的问题。

刘仲容回味毛泽东两次接见的开蒙之言，悟透人民解放军过江，是中国最广大人民不可移易的诉求，而不让解放军过江，只是官僚资本家和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凭空臆想。国父孙中山先生早有名言：“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

者亡。”面对人民革命的浩荡洪流，螳臂如何能够当车？刘仲容谢过毛泽东、周恩来两位中共领袖和朋友，慨然告辞。

刘仲容在北平成为毛泽东、周恩来座上宾时，另一位金陵客也神秘现身北平。他就是国民党立法委员，李宗仁、白崇禧私人代表，4月1日陪同中共人士赴机场迎接南京和谈代表的黄启汉。

4月2日晚，周恩来在六国饭店接见黄启汉，先请他谈谈对南京代表团来北平和谈的看法。黄启汉说，他们既然同意在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基础上来谈，照理说谈起来不该有很大困难，困难还是在将来实行时，可能会遇到很大阻力。

周恩来说：“现在就是他们没有接受八项原则为基础。从这两天双方交换意见的情况看，除邵力子外，其余都异口同声说‘惩治战犯’这一条不能接受。这是什么话呢？李宗仁不是公开宣布以八项原则为谈判基础吗？怎么代表团来了又变卦呢？他们来北平前，张治中还到溪口向蒋介石请示。这就产生了另一个问题，你们是代表南京，还是代表溪口？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和谈怎么进行呢？”周恩来同意黄启汉回南京，向李宗仁问清这两个问题。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836—83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3月第2版。

4月3日上午，周恩来又在六国饭店单独接见黄启汉，严正指出，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给人民带来重大损失和痛苦。经过三大战役的较量，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已被歼灭殆尽，可以说，内战基本结束，剩下的不过是打扫战场而已。为了早日和平解放，在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基础上进行和谈，我们还是欢迎的。南京代表团想对八项原则讨价还价，这是不能容许的。人民解放军有足够力量在全国范围扫除和平的一切障碍。李、白不应该再存任何幻想，应该坚决向人民靠拢，这是他们唯一的光明的出路。周恩来要黄转告李、白：（1）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不渡江，但和谈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2）白崇禧在武汉的军队，应先撤退到花园以南一线；（3）希望白在安徽让出安庆；（4）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考虑到安全，他可以调桂系部队一个师进驻南京保护，万一受到国民党军队攻击，只要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到来支援了。

当日下午，李济深和邵力子来看黄启汉，要他转告李宗仁当机立断同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决裂，只要见诸行动，将来组织联合政府，毛主席和民主党派都愿支持他担任联合政府副主席。至于白健生，无非想带兵，联合政府成立了，还怕没有兵带吗？

这样，原定4月5日开始的第一次国共正式会谈推迟了。

黄启汉3日下午六时回宁，即把周恩来和李济深、邵力子的话，汇报给李宗仁。7日晚，李宗仁向毛泽东发出“卯阳”电。

4月5日，黄启汉至武汉向白崇禧作了汇报。白崇禧同意桂系军队防线退到汉口以北之花园，但对让出安庆颇多疑虑，担心会给共军渡江开方便之门。黄启汉说，长江那么长，共军要渡江，哪里不可以渡？白崇禧说：“安庆驻防的是广西的第四十六军一七四师，我要参谋处告诉刘汝明部接防，避免广西部队直接与共军冲突。共产党最好不要过江，只要划江而治，事情就好办了。”

黄启汉在汉口逗留期间问白崇禧：“工事修得怎样？能抵挡得住共军进攻吗？”白崇禧眉头紧蹙摇了摇头。黄启汉乘机建言：“把桂系部队集中到武汉按兵不动，避免与共军冲突，然后全部撤回广西，静观发展，再作打算。”白崇禧说：“现在还没到如此地步。过些时候长江水涨，共军渡江就不那么容易了。”

4月9日，黄启汉随白崇禧飞南京。当晚，李宗仁、白崇禧关门密谋。翌晨，黄启汉问李宗仁：“昨晚商量得怎样？”“没怎么样。”“还调桂军一个师来南京吗？”“调来还不是瓮中之鳖！”

不过，刘仲容、黄启汉的北平之行，并非空手而归。

> 《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475—47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4月4日，毛泽东致电萧劲光并刘邓饶陈等：“我们已和白崇禧代表刘仲容商定，黄冈……黄陵矶之线及其以南地区，我军暂不进占，使武汉不感震动，大商巨绅不致逃跑，将来我军进占该线及武汉地区时用和平接收办法，免遭破坏。”“其余宜昌至武穴线上长江北岸要地，凡我军已占者照旧，凡我军未占者一律暂不进占，以利和平接收。”“李宗仁代表黄启汉昨（江）日由北平返南京”，“传达我方允许安庆方面桂军向南京或向武汉撤退。请刘、张、李即作准其撤退之部署，并令前线派人与守军试行联络”。

4月5日，毛泽东函告周恩来：“请再告刘仲容不要忘记到南京后，叫李宗仁速即告白崇禧，将上述各地及安庆守军火速撤退，愈快愈好，至迟不得超过4月10日，否则守军将被歼灭。”

> 《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475—47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同日，毛泽东以总参作战部部长李涛名义复电白崇禧：支电所述立场系就贵方利益而言，但就人民利益而言，在贵方全部接受八项和平条件并经双方协力在全国范围内完全实现这些条件的时间内，要求人民解放军停止前进是不合理的，因此是不可能的。白先生历次公开言论，我们均不能同意。但是为着和李、白二先生建立合作关系之目的，敝方愿意立即实行下列各项处置：（甲）安庆及其以西直至黄冈（不含）之贵方部队，请迅即撤退，并限4月10日以前撤退完毕。（乙）黄冈……黄陵矶一线及其以南地区，包括汉口在内，暂由贵部驻防，维持秩序。该线以北以东各地之贵部，望即向该线撤退。该线以西各地，暂维现状。（丙）整个华中问题的处置，听候双方代表团谈判解决。（丁）请通知安庆及花园等处贵部负责人员，如遇敝方前线将领派员出来联络，请予接洽，勿生误会。（戊）以上各点敝方业已通知各该地军事首长遵办，希望白先生亦通知贵部照办，并盼见复。

刘仲容返回南京后即向李宗仁、白崇禧报告。李宗仁未置可否，说且待商量。白崇禧听说毛泽东拒绝“划江而治”，表情阴郁：“他们一定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下去不可了，还谈什么？”

刘仲容转告了毛泽东请他带兵的话，白崇禧说:“对我个人的去留，现在不是我考虑的时候。目前要紧的是，共产党如果有和平的诚意，就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不要过江。过江问题为一切问题的前提。中共如在目前战斗过江，和谈决裂就不可避免。”

往事可鉴。1934年10月，蒋介石急电白崇禧，要求其配合中央军，在湘桂边境堵截长征红军，歼灭“赤匪”于灌阳、全县之间，“所需饷弹”“不敢吝与”。白崇禧看穿了蒋利用桂系消灭红军，回头再收拾桂系的阴谋，下令对红军“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红军得以通过广西。有人不解，白崇禧说：“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更甚，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有发展机会。”

桂系之于中共及其军队，与蒋介石的区别仅此而已。

李宗仁在会上说，我们在上海守六个月到一年没有问题。白崇禧说，桂系是打游击出身的，大不了再上山一次跟中共打游击。

在双清别墅送走金陵客，毛泽东想起刘仲容瞟向自己衣服补丁的目光，让李银桥找件好些的衣服好会客。李银桥心中一阵酸楚。日前，毛泽东会见张澜前对他说：“张澜先生为人民解放事业作了不少贡献，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李银桥翻着毛泽东的衣服，没有一件是不打补丁的。他心里很不是滋味，说：“主席，咱们是穷秀才进京赶考，连件好衣服都没有。”毛泽东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

们会考出好成绩的。”想到这里，李银桥拭去眼泪说：“主席，你确实该置办两身会客和参加活动的行头了。”

10月1日开国大典，毛泽东外穿绿军服登上天安门。机要秘书高智回忆，这一天，毛泽东穿的军服里面，是破了膝盖的毛裤，羊毛衫肘子的破洞，是李银桥媳妇韩桂馨用旧袜子头织补的。

（十）江南暗战的刀光剑影

重出江湖的老敌工孙克骥携助手杨进，肩负中央军委使命赴镇江协调策反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起义，谁知出师不利，两人在迎江路踏破铁鞋，也未找到预定接头的秘密联络点。

早春二月，山水伴人文共生的镇江美景令人流连，孙克骥眼中的金山寺和瓜州古渡却黯然失色。他反复回忆出发前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言之凿凿的交代：“上海地下党同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商定，你们到镇江以李治平的名义写一封信，到迎江路82号找林遵，便可接上关系。”可迎江路偏偏没有82号！

孙克骥阅历颇广，曾深潜国统区从事秘密工作，任过华中军区政治部宣教部部长、华东野战军旅政治委员，机关基层和白区工作经验均属丰富。渡江战役迫在眉睫，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和第十兵团政治委员韦国清、第七兵团副政治委员姬鹏飞，一起找他和政治部联络部部长杨进谈话。

钟期光说：“经上海地下党积极工作，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表示适当时机率部起义。中央军委决定由三野派人前去协助。三野前委研究，由你作为陈毅司令员代表完成这一光荣任务。”

孙克骥提出，自己离开白区时间已久，恐难担此重任……

钟期光雍容一笑，“你和林遵是福建同乡，军级机关和基层主官都干过，可在政治、军事上协助林遵组织起义。考虑到京沪一带你不太熟悉，特派在江浙社会关系多的杨进同志做你的助手”。

军令如山，孙克骥和杨进均表示坚决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钟期光给二人交代接头地点和联系方式后又说，最理想的起义时机，是渡江战役发起时，第二舰队直接配合我军渡江。

孙克骥和杨进在淮安估衣铺买了几件苏北人常穿的衣服，径赴扬州。地委书记陈光让江都县委安排他们过江，不料上岸扑了个空。两人来到饭馆，孙克骥浏览当天报纸，目光被头条大字标题新闻吸引：“丁治磐主席与林遵司令联袂赴前线巡视沿江防务。”

原来林遵不在镇江！两人匆匆吃完饭，在街上边溜达边商量。联络地点不对，可设法到军舰上去找他，但人不在镇江，不宜在此等候。孙克骥和杨进转到上海，两人每天从镇江报纸上追寻林遵行踪，得知他已回到舰队，便连夜赶往镇江。孙克骥打算第二天上舰拜访林遵，让杨进在旅馆等他，约定如果自己午饭前还回不来，就是发生了意外，要他立即赶回苏北报告。

孙克骥来到江雾缭绕的镇江海军码头，隐约可见百米外停着几艘军舰。不远处，几个操福建口音的水兵正在闲聊。孙克骥上前搭讪，说自己生活困难，想找林司令谋个差事。一位热心的小老乡对他说，一会儿交通艇过来，要他上艇到惠安舰找林司令。

惠安舰是一艘排水量一千二百吨的轻型驱逐舰，为第二舰队旗舰。孙克骥乘艇登舰后，把写给李治平的信交给少校参谋、林遵心腹戴熙瑜转林遵。戴参谋让他稍候，进舱向林司令报告。

林遵1905年生于福州一个海军世家，是林则徐侄孙，1929年起在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朴茨茅斯专科学校和德国潜艇学校学习，历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馆海军副武官、国民党海军驻西沙、南沙群岛舰队指挥官，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

戴参谋出舱对孙克骥说：“对不起，林司令说不认识李治平。”

登舰求见吃闭门羹虽属意外，但孙克骥觉得对方态度尚友善。两人返回江北扬州，将详情发电报告兵团并转第三野战军。根据兵团指示，两人到淮安向姬鹏飞汇报，赴上海在地下党领导下开展工作。

此时，长江已被国民党军封锁。华东局社会部杨帆指定扬州情报站把他们送到扬州十二圩，住在青帮头子杨大炎家。杨是中共地下党关系，跟镇上国民党军一位营长很熟，营里每周安排一班军用运输船过江。两人在那里等了几天，花钱乘船过了江。

孙克骥和杨进抵沪后，由杨帆安排住下，按规定程序和暗号，与上海地下党吴克坚派来的林亨元接上了头。林亨元给他们介绍了林遵的情况，研究了策反方针与步骤，约定了联系时间和地点。几天后，吴克坚约见孙克骥和杨进，告诉他们，孙克骥在镇江登舰被拒后，吴克坚曾派林亨元去镇江找过林遵。林遵说，当时舰

上人多嘴杂，恐生不测，又不便解释，只好礼送下舰，并表示了歉意。吴克坚与孙克骥、杨进商定，由林亨元和他们两人组成策反林遵小组，并介绍了林遵思想演变和前期对其策反的情况。

> “马尾系”是抗战前国民党海军四大派系最大的派系，因最初海军学校设在马尾，成员多是福建人，故名。
> “十三太保”系指蒋介石成立中华民族复兴社的十三位骨干成员，有刘健群、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酆悌、郑介民、曾扩情、梁干乔、肖赞育、滕杰、戴笠、胡宗南。

抗战后期，国民党海军接受了美国“峨嵋”舰等八艘军舰。1946年初，林遵调任这支被目为“中华民国驻美舰队”指挥官，率舰队横跨太平洋回国，创造了中国海军的历史。当年10月，林遵率“太平”等四艘军舰前往南沙群岛宣示主权并立起象征中国主权石碑。圆满完成两项任务使林遵在国民党海军声誉鹊起。然而，蒋介石把属“马尾系”[注]的国民党海军元老陈绍宽搞下台后，任命不懂海军的“十三太保”[注]之一桂永清为司令。被划入“马尾系”的林遵，任有职无权的海军点验委员会副主任闲职。1948年2月，桂永清突然宣布林遵任海防第二舰队代司令，许愿不久晋升海军少将，舰队奉命配合陆军担负江阴至湖口长江防务任务。林遵清楚，第二舰队只有“惠安”“吉安”“营口”三艘护航驱逐舰和“安东”“永绥”“江犀”三艘炮舰，还有两个炮艇队。桂永清为保存退守台湾的海军实力，让规模小、装备差的第二舰队小马拉大车，不过是在长江一线当炮灰罢了。早就对国民党心灰气冷的林遵与轮机长阙晓钟计议：“得找关系联系一下中共中央。”

阙晓钟三弟阙巍观在南京读书时有个同学吴平是中共党员。吴平从阙巍观处获悉第二舰队有意起义，便和妻子曹一飞北上，在济南考取华东军大，通过校领导将这一信息报告了华东局。1949年2月，华东局派吴平夫妇回镇江参与策反第二舰队起义。

周恩来指示上海地下党，派吴克坚找当年跟随自己在上海搞武装起义的郭寿生，通过他与林遵联系。吴克坚即派属下林亨元，去找周恩来熟悉的国民党《海军月刊》社社长郭寿生。

郭寿生是福建人，烟台海校科班出身，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脱党。林亨元请郭寿生夫妇吃饭，通过交往，感到郭虽置身敌营，但革命热情未泯。吴克坚听取汇报后，同意林亨元直接找郭谈话。林亨元单刀直入对他说：“我是中共地下党员，奉组织指示同你谈话，周恩来同志请你归队！”

听到周恩来在召唤自己，郭寿生喜出望外，说：“北伐时我就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组织上海武装起义，他让我归队我就归队！”

“归队就有为党工作的义务。”林亨元代表组织给郭寿生下达任务，“希望你能提供国民党海军情报。”不久，郭寿生给上海地下党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经过考验，组织认为郭寿生是可以信任的，决定派他去镇江找一下林遵，进一步加深接触。

郭寿生到镇江拜访林遵，两人同游金山寺。林遵对郭寿生讲了桂永清排除异己，自己进退维谷的处境。郭寿生说：“现在你我同在金山寺，不妨借用一句佛家的箴言——回头是岸。”说着，他遥望烟波浩渺的长江说，“在国民党这口大染缸里，你想洁身自好，只不过是一种幻想。崩溃在即，还是速登彼岸为好！”

“彼岸纵是王道乐土，可慈航普度的观世音在哪里？”

“就在眼前！”郭寿生目光炯炯注视着林遵说，“司令，此次拜访，就是奉命来指点迷津。现在，观音菩萨已经降临，周恩来副主席已通知我归队，指示我同你联系，希望你归顺人民。”

林遵十分惊喜，表示遵从周恩来指令，适当时机率舰队起义。两人商定，第二舰队轮机长阙晓钟作为林遵私人代表，直接与林亨元联系；阙晓钟在上海的家，就是林遵与郭寿生的联络点。

孙克骥和林亨元约阙晓钟商谈，阙一再表明林遵起义决心，但起义时机是模糊的，始终说“适当时机”。孙克骥提出，起义最佳时机是我军发起渡江，掉转炮口以火力支援解放军渡江。阙晓钟转达林遵意见，江南人烟稠密，掉转炮口向南岸开火易误伤百姓，只能按兵不动，这就是协助解放军渡江。此后安庆告急，林遵要求派舰增援，桂永清给第二舰队增派三艘“永”字号军舰。

1948年底的一天，林遵、阙晓钟与林亨元在镇江郊区一家小吃部见面。林亨元向林遵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意图：“党中央已经同意你们选择在大军渡江时举行起义，希望你们能协助配合解放军渡江，以后还要以你们舰队为基础建立华东海军。”

林遵感谢中共中央对他的信任，同时也开诚布公说道：“公开配合解放军渡江，会遭国民党飞机轰炸，给渡江部队和舰艇造成严重损失。配合渡江可做到不向北岸和渡江船只开炮。”

林亨元理解林遵的处境，表示尊重林遵的意见。

林遵谈了自己的设想：“我准备把舰队所有舰艇，集中到镇江、南京、芜湖、安庆等大港口，以便于解放军渡江。”

“好！欢迎你们站到人民和革命一边。”林亨元说，“至于渡江时能否掉转炮口打国民党军队，请根据具体情况自己决定吧！”

林遵站起来握住林亨元的手说：“就这样拍板决定了！”

不料，国共和谈将启，孙克骥、林亨元提出面见林遵，林以目前处境困难为由婉拒。两人意识到，林遵是对“划江而治”仍心存幻想，故持观望态度。必须积极主动做工作，促其丢掉幻想。

孙克骥、林亨元在上海虹口公园约见阙晓钟说，毛主席已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令，不管南京政府是否在和平协定上签字，解放军都要过江并解放全中国，“划江而治”只是国民党的幻想。第二舰队在大军渡江时毅然起义，官兵才有前途，犹豫不决只能坐失良机。孙克骥通过阙晓钟了解到，自己的姑表兄邵仑任第二舰队永绥舰舰长，是林遵策划起义的核心人物，遂与邵仑在南京见面，接着住到永绥舰上，几番长谈坚定了他起义的决心，并通过他与林遵商定，起义时机选择在我军渡江之时，还约定了联络讯号。为确保安全，解放军军事代表待起义时再上舰协助指挥。

4月18日，孙克骥再赴南京，在永绥舰上住了两晚。孙克骥打算，如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渡江战役发起后，他便通过永绥舰邵仑登上惠安舰，协助林遵指挥起义。然而，20日一早，尖嘴猴腮的副舰长陈水章，乘邵仑离舰开会之机，居心叵测地对孙克骥说：“这几天形势紧张，你住在舰上恐怕不安全。”舰长不在，副舰长下了逐客令，孙克骥见此人鬼头鬼脑，为免生意外，决定暂且下舰，便顺水推舟说：“我也正准备今天离开南京。”说完，孙克骥给邵仑留下一张字条，便匆匆离舰而去。

风雨如磐的黎明，江南暗战隐含几多不可预知的凶险？

中共地下党员、南京《大刚报》记者李益之（陆平），如约来到城佐营6号前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专员邓昊明家，恰逢邓昊明侄子、国民党“御林军”第四十五军九十七师少将师长王晏清在座。两人看似萍水相逢，实则暗含机缘。

邓昊明早年参加五四运动和湘南起义，其妻李君素是王晏清舅妈。王晏清到南京供职住东门街17号，成了舅妈家常客。

王晏清黄埔六期毕业，长期在蒋嫡系部队第十八军任职，曾任国民党青年军第二〇八师副师长。1948年8月，在国防部连呈数个第九十七师师长人选均未获批后，

经蒋介石钦点，第八十七军副军长王晏清脱颖而出，成为首都警卫师掌门人。王晏清经常收听新华广播电台广播，到任后既对蒋介石的器重感恩戴德，又对国民党的腐败深恶痛绝，向往中共并盼人脉颇广的舅舅予以引见。

李益之与王晏清几番长谈，王如醍醐灌顶，决意弃官前往解放区。李益之说：“你弃暗投明当然好，但人民要你发挥更大作用。”

王晏清当然懂得李益之的意思，但顾虑自己是蒋介石学生，担纲首都警卫又是校长点的将，个人与蒋政见不合离他而去正大光明，率部起义则难免背负忘恩负义骂名，恐为天下笑。

李益之说，国家民族大义和人民利益远超个人情感。邓昊明夫妇也帮其打碎“道义”枷锁，王晏清同意率部起义。李益之叮嘱他摸清下面人底细，先试探可靠军官，不可急躁和走漏消息。

1948年11月中旬，第九十七师奉命开赴江边布防。师司令部位于江宁，三个团部分别位于板桥、江宁、铜井。王晏清与驻江宁的第二八九团团长杨镇洲、副团长邓建中接触时，发现他们很有正义感，便在游中山陵时进行试探。两人均对国民党不满，尤其对蒋介石挑起内战义愤填膺。王晏清趁机透露起义想法，两人一拍即合，建议歃血为盟，同生共死，三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南京地下党负责策反工作的沙文威（史永）再约王晏清时，转达党中央对第九十七师起义的重视与关切。王晏清深受鼓舞。

1949年2月7日，国民党军第一〇六军二八二师师长张奇，率部在繁昌县横山桥起义。还在1948年，国民党暂编第四十五旅副旅长张奇，即和旅长乜庭宾与中共华中工委联络起义，因事泄仅部分官兵进入解放区。同年9月，张奇部调皖南后，即联络中共地下党，组织原第四十五、四十六旅骨干，在团、营、连建立起义领导小组，派一个连以“清剿”为名到江北侦察，与驻无为东乡的解放军部队取得联系，并规划好渡江行船路线，还组织了执法队。2月7日，张奇令警卫营逮捕南京派来的副师长、参谋长、政工处长等人，切断电话线，断绝一切对外联系，在油坊咀、黑沙洲、永州圩、荻港等七个渡口征调民船渡江。五千余官兵当日冲破国民党军飞机、舰艇阻挠，到达江北与解放军会师，还缴获国民党军炮艇、汽船各一艘。起义部队迅即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第二八二师成功起义，极大鼓舞了王晏清走向光明的信心。

1949年3月的一天，王晏清接通知到舅妈家吃饭，一进门就被李益之拉进后屋，关上门后对他郑重说道：“从现在起，你的行动就直接归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陈毅司令员指挥！”

王晏清为之一振，忙问：“老李，以后我们怎么联系？”

“陈司令员会通过电台指挥你行动，你现在将师部电台呼号告诉我，随后我将密码告诉你。你最熟悉哪首唐诗？”

“葡萄美酒夜光杯。”王晏清不假思索地说。

“好，就用王翰《凉州词二首》这首诗做密码，回头我们即电告三野司令部。”李益之讲述了用这首诗做密码的方法，代表中共中央对第九十七师起义提出四条要求：第一，解放军渡江时，第九十七师开放江防正面三十公里，迎接解放军渡江；第二，以一个团占领下关，阻止驻浦口的第二十八军向江南撤退，以便在江北歼灭该军；第三，以一个团占领飞机场，截断国民党空运，相机捕捉一些战犯；第四，师直属部队和另一个团开进南京城维持治安，保护重要仓库和军需物资，防止被焚毁。

王晏清回到师部，忽然想起不知如何联系，情急之下拨通李益之电话问：“你们电台的呼号是什么？”李益之一惊，啪地挂断电话。丰富的经验告诉他，这个军转市电话一定有人监听。他速向市委书记陈修良和沙文威作汇报。陈修良判断，这个电话恐将危及南京地下党，遂将邓昊明、李君素、李益之撤往香港。

3月23日，形势急转直下。上午，首都卫戍司令张耀明召集第四十五军营长以上军官开会，突然宣布撤销该军军长赵霞职务，由首都卫戍副司令陈沛兼任第四十五军军长。去年11月以来，蒋介石已连续更换三任首都卫戍司令，宣布东至上海，西至安庆，南至杭州，北至蚌埠地区实行戒严。会上，由胡宗南手下整编第三十八师师长升任现职的张耀明说：“大敌当前，卫戍部队有人斗志萎靡，散布消极言论动摇军心，灭我威风、长敌志气。我在这里打开天窗说亮话，谁不愿为党国效忠，立即给我滚蛋！”

王晏清一震，感受到张耀明话中的锋芒所向。果然，散会后，张耀明虎着脸对王晏清说：“晚上到我家去一趟，我有话问你！”

中午就餐，与王晏清同坐一桌的赵霞哭诉自己忠心耿耿却被无辜撤职，王晏清一力安慰。赵霞提醒王晏清说：“王师长，你的参谋长赵昌然可不是盏省油的灯，你得管住他那张嘴！”

王晏清意识到，1月在全师连长以上军官会议上，自己说“抗战刚结束又打内战，老百姓苦不堪言。失去民心，纵使有长江天险也守不住”惹了麻烦。但转念一想，司令约自己到他家谈话，看来事情尚未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不料，当天下午，卫戍司令部又通知他，明天上午八时，司令在卫戍司令部找他谈话。王晏清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了。他脑子像飞快旋转的陀螺，迅速思考着应对之策和需要

紧急处理的事情。他想过与中共地下组织联系，也想到转移家人避险，但又想到特务监视，未敢贸然行事。

24日早上，王晏清准时来到位于长江路的首都卫戍司令部大楼，张耀明一见到他，就劈头盖脸把他骂了一通：“王晏清，过去我把你当自家兄弟看，现在看，你压根儿就不是人！”

王晏清暗忖，尽管张耀明气势汹汹，但从目前仅限于谈话斥责看，起义之事尚未暴露。他稳住神，佯装不解问：“司令，我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事，请明示！”

张耀明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条递给王晏清，“你自己看吧！”

王晏清接过纸条一看，上面赫然写道：“王晏清被共军重金收买，在部队散布流言，惑乱军心，密谋由参谋长赵昌然组织宪兵队参加叛乱，占领机场，捕获我高级将领……”

“司令，如果共军真用重金收买了我，请拿出证据来。我请求您立即派人到我家搜查，如果搜出重金，我甘愿受军法制裁！”王晏清急中生智，以家中并无“重金”坚决反击。

张耀明冷冷发问：“我问你，今年1月，你在连以上军官会议上说，打内战失民心，有长江天险也守不住，有没有这回事？”

王晏清以退为守：“有这回事。那天我跟老婆吵了架，情绪不好，发了几句牢骚，说了不该说的话，事后非常后悔。司令，我也是忧国忧民啊！如果真想谋反，能公开说这些话吗？”

张耀明让王晏清打电话找赵昌然，又安排人到办公室盯守，自己抽身处理急事。王晏清知道张耀明是让赵昌然来跟自己当面对质，正苦于无法脱身，恰好卫戍副司令覃异之进屋来了。覃异之曾任国民党青年军第二十四师师长，与王晏清同在一个军共事。王晏清说：“副司令，您是了解我的，我在第十八军工作多年，又是黄埔学生，历史清白，忠诚党国，请您为我主持公道！”

覃异之微微一笑，似有同情之意。这时，赵昌然走进办公室。王晏清目视覃异之，表明自己身处窘境。覃异之带赵昌然到隔壁问话，回来对王晏清说：“你先回去吧，有事随传随到，快走吧！”

王晏清绝处逢生，决心抓住来之不易的机会提前起义。张耀明责怪覃异之不该放虎归山并下令扣住赵昌然时，王晏清已驱车急返师部与骨干紧急磋商应变计划

了。眼下，只有孤注一掷，拼个鱼死网破！众人对果断起义均表赞成，但对行动方案意见不一。

警卫营长叶宏昌认为仓促举事不宜过江，盲目前往解放区困难大，不如到太湖打游击。参谋主任黄克栗说，封江后大船均集中在下关，小船难以抵挡第二舰队炮火。军需官王道一主张，等明天官兵领到薪饷，部队调拨了粮食再行渡江。政治部主任肖汉杰言辞闪烁，说要慎重考虑，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

王晏清环视众人，出言诚恳："我是第十八军的老人，就是去了台湾，后路也有保障。可是弟兄们呢？共军突破长江势不可当，再让大家去当炮灰于心何忍？为了全师官兵都有光明的前途，必须果断起义渡江，一分钟也不能耽误，越延误越危险！"

与会者初步统一思想后，王晏清分工第二八九团团长杨镇洲回团掌握部队，副团长邓建中负责搜集江边船只，自己则抓紧定下决心。根据掌握的江防部署情况，国民党军短时间内不可能抽调一个师以上兵力对付起义部队，即使纠集一些力量，最快也要明天拂晓后才能进抵第九十七师防区。只要今晚渡江，形势是有利的。

第二八九团起义已不成问题，王晏清想到第二九〇团一个营驻在江北七坝，离起义部队准备渡江处很近，遂决定部队过江后，令该营随师部行动，于是亲自给第二九〇团团长黄子安打电话，以"扫荡"为名，令其率部渡江到七坝与主力会合，迫其就范。第二九一团驻地距师部较远，团长王义鸾缺乏弃暗投明政治基础，强拉其参加行动反而容易坏事，于是决定过江后视情对该团进行处置。

3月24日晚八时三十分，王晏清正紧张筹划拉部队，首都卫戍副司令陈沛打电话说，张耀明司令明天早上请你到卫戍司令部吃早饭。王晏清谢过司令盛情后说，明天一定早去！显然，首都卫戍司令大清早的鸿门宴表明，今晚是部队起义的最后时间窗口。

受此电话倒逼，王晏清即刻率师部和师直属队向江边机动，于九时三十分抵达江宁镇河口。先行赶到江边的邓建中，已找到二十多条船。江面上刮起了东南风，部队迅疾登船，船队扬帆向北岸疾驶。巡弋江面的海军第二舰队军舰的探照灯，发现了编队夜航的起义部队。但不知为什么，军舰既未拦截，也未开炮。

3月25日凌晨二时，王晏清率第九十七师（第二九一团）抵达江北，在江浦桥林镇集结后，即派副官主任李南先及四个联络组往新店庙方向寻找解放军。王晏清在名片背面写道："解放军同志，我是国民党第九十七师师长王晏清，我师于今天渡江起义，见此名片请即派人到桥林镇联系，并通知前方部队万勿发生误会。"

凌晨四时许，第九十七师稍事休整继续北进，第二八九团为先导，师部和直属队居中，第二九〇团殿后。行不多远，突然，几架飞机临空散发传单，上面印着：九十七师官兵们，现已查明王晏清勾结共匪背叛党国，实属十恶不赦。首都警卫师为党国御林，干城精英，切望深明大义，携械归来，决予重赏。有击毙王匪者赏银三万元；击毙次要匪首者赏银一万元。凡有功者皆连升三级……

传单给起义部队致命一击。骚乱首先出现在第二九〇团。团长黄子安原本无心起义，官兵为传单惑乱时，他乘机鼓动士兵叛逃，全团顿时大乱，不少人跟他折回江边，也有人弃枪四散逃匿。

王晏清从望远镜中望着溃散的第二九〇团，便商几个骨干义无反顾向解放区开进。但大家认为，与解放军联系者无一人回返，贸然挺进极易发生误会造成重大伤亡。情况紧急，王晏清决定，第二八九团团长杨镇洲掌握该团，警卫营长叶宏昌掌握师直属队，自己和邓建中带部分参谋、警卫及第二八九团一个排，以上百人小部队直奔新店庙，参谋主任黄克栗打前站同解放军取得联系。

第四十五军获悉第九十七师起义，还是第二九一团团长王义鸾告的密。张耀明即刻禀报蒋介石和汤恩伯，蒋介石令他连夜赶印传单，悬赏通缉王晏清，派飞机跟踪部队散发传单。

王晏清刚离开桥林镇，原地待命的部队就被谣言所惑：“师长不管大伙儿了，南京派兵来追我们了……”官兵由三五成群离队，到洪水决堤般溃散。团长杨镇洲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控制被谣言和恐惧裹挟的乱军，甚至一度被疯狂的士兵绑架。及至他强行挣脱赶往新店庙时，负责管控师直属队的叶宏昌已不知去向。

3月25日中午，负责打前站的黄克栗，终于在新店庙与第三野战军二十五军取得联系，解放军代表会见了王晏清、杨镇洲、邓建中、黄克栗和军需官王道一、副官王辑之，师部警卫人员及第二八九团一部，共一百余人。副官主任李南先等人上午七时许已与解放军一线部队取得联系，因层层请示，未能及时赶回起义部队。

《张震回忆录》上册，第359页，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临危被迫仓促起义的第九十七师，以两团之众进抵江北，因外压内乱交织溃散，但御林军首都起义的爆炸效应震撼南京朝野。3月26日，王晏清到达蚌埠孙家圩子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正参加总前委会议的张震参谋长即予接待。24日，王晏清已向第八兵团陈士榘司令员递交了南京城防图。张震通过王晏清进一步了解南京周围地区国民党军部署情况及市区最新动态，完善了渡江作战部署。

（十一）以敌之兵克敌制胜

陈赓率第二野战军四兵团进入梁祝之乡河南省汝南县，是1949年3月11日。早春的艳阳中，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乘美吉普在淮北平原向南疾驶，很快追上了第十三军的行军队列。见到军长周希汉，陈赓关切地问：“老周，部队情况怎么样？”周希汉摸摸后脑勺说：“首长，部队总的情况好，就是解放战士和新兵逃亡多！”

吉普车继续前行，问及第十四军军长李成芳，得到相近回答。陈赓眉峰一耸，一双浓黑的卧蚕一激灵，差点儿从额上蹦下来。

第十三、十四军组建刚满月，3月9日、10日，便分头从漯河出发，经遂平至汝南，沿罗山、光山、麻城、浠水一线，向宿松、黄梅开进。上千公里行程，部队每天强行军六七十公里，官兵确实吃不消！当晚，陈赓在马灯下写日记：“路遇（周）希汉、（李）成芳等同志，详询部队情形，知两日来逃亡严重，当分别给予指示。部队成分复杂，新兵及解放战士占最大部分，求得不逃一个，是不可能的事，估计再经过一番工作，即可稳定。”

战俘，战场上命运最悲催的群体。自从战争登上人类历史舞台，战俘的生杀予夺便悉听胜者。漫漫封建时代，多少帝王将帅以坑杀降卒的白骨祭旗？

公元前260年，秦将白起率军在山西长平与赵国军队展开决战，赵王中秦国离间计弃用廉颇，以纸上谈兵的赵括掌军，白起利用其弱点诱敌脱离阵地进而分割围歼，坑杀赵军四十万降兵。

公元200年，曹操与袁绍对峙于河南官渡，曹操亲率步骑五千夜袭乌巢烧毁袁军粮草，致敌将张郃、高览倒戈，袁军分裂后崩溃。袁绍带八百骑退回河北，曹军歼灭和坑杀袁军七八万人。

公元208年，项羽率部破釜沉舟与章邯所部秦军决战河北巨鹿，大败秦军八个月后，又迫使章邯部另二十万秦军投降。降军不堪苦役，腹诽日甚。项羽闻讯将降军全部击杀并埋于新安城南。

公元661年，郑仁泰、薛仁贵率军与回纥将领九姓铁勒所率十万大军决战天山，薛仁贵连发三箭射死三人，余数十骑皆下马请降，唐军大获全胜。薛仁贵三箭定天山后，坑杀降卒十余万人。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诞生，改写了战场千百年来的血腥规则，创造了善待来自另一营垒战俘并点石成金奇迹。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6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毛泽东关于俘虏政策的研究探索，始于井冈山。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谈及红军六个来源：“（一）潮汕叶贺旧部；（二）前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三）平浏的农民；（四）湘南的农民和水口山的工人；（五）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吴尚、熊式辉等部的俘虏兵；（六）边界各县的农民。”经一年多战斗，结构比例有变：“前四项虽然至今还是红军第四军的骨干，但已远不如后二项多。后二项中又以敌军俘虏为多”。[注]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毛泽东笃信，“谁能够组织农民，谁就能够组织中国”，尤以武装农民为组织农民之关键。在开创性提出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论断后，毛泽东又形成了以敌军俘虏为红军重要后备力量的思想。“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白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融化了。”一个令人折服的事例是，从1931年第一次反“围剿”后吸收的敌十八师解放战士中，走出了开国中将王诤、刘金轩和开国少将李治三位将军。

1945年9月，深怀抗日救亡情结的国民党新八军军长高树勋，派人晋见刘伯承、邓小平谋求和平。此前一年，高树勋活埋了准备率部降日的上司——冀察战区副司令兼察哈尔省主席石友三。

10月，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指挥高树勋等部三个军沿平汉路北上，在邯郸、磁县一带被我围阻。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火线穿行面晤高树勋，中共徐州工委将高树勋夫人刘秀珍从国民党郝鹏举部送往解放区。10月30日，高树勋率新八军及河北民军万余人，在邯郸马头镇宣布起义并通电全国。这是继1931年宁都大起义后，西北军余脉第二起大规模投共事件。

刘伯承乘势将主力调至漳河以北敌退路两侧，歼灭孙连仲部两个军计两万三千余人，生俘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副军长刘世荣等高级将领，平汉战役胜利结束。11月2日，毛泽东、朱德电贺高树勋：“闻兄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伦，莫不同声拥护。特电驰贺，即颂戎绥。”11月10日，高树勋部改称民主建国军，中共中央任命他为总司令。当月13日，经邓小平、薄一波介绍，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高树勋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1946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倡导开展“高树勋运动”，决定对国民党军开展宣传运动，号召国民党官兵学习高树勋部队的榜样，杜绝进攻解放区，在内战战场上实行怠工，和人民解放军联欢，举行起义，站到人民方面来。

时过一年，1946年12月10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被国民党抓丁入伍的王克勤，1945年邯郸战役中被俘参加我军后，看到一杆老式步枪，笑道：“这杆破枪，听响都不赶趟！”营长李明告诉他，这支枪，是抗战中战士用生命从敌人手中夺来的，王克勤深受震动，当即向李明道歉。经诉苦教育，王克勤懂得了为人民而战的道理，主动把自己的战斗经验和技巧分享给战友，巨野战役中带全班一天打退敌十几次进攻，毙伤一百二十三人，全班无一伤亡。战后，他被提拔为排长，所在班被命名为“王克勤班”。1947年7月10日，王克勤在定陶战役牺牲。此役歼敌一个旅，刘伯承说蒋军一个旅也换不来一个王克勤，亲撰《悼念王克勤同志》。王克勤参加解放军仅一年九个月，毙伤敌二百三十二人，九立战功，被评为一级杀敌英雄。他创造的官兵思想、技术、生活“三大互助”带兵法，被《人民日报》报道并推广全军。延安隆重集会悼念王克勤，他生前所在排被命名为“王克勤排”，殉难地定陶北城门被命名为“克勤门”。

以起义将领和解放战士冠名开展的两场运动，辉映军史。

内战爆发后，华东地区始终是国共双方用兵最著、交战最频、博弈最烈的主战场。我军共俘敌一百四十六万四千八百七十九人。1947年底，华东军区组建解放军官训练总团，在胶东、渤海、鲁中、鲁南、滨海五个军区各设一个分团，后扩至十个分团。

融俘绝非只是换个标签，开始也曾临深履险。1947年夏，训练团获悉有俘虏密谋暴动，想乘押送后方之机夺枪冲出根据地！而暴动组织者只是第七十四师一名班长。该师近两万俘虏，其中不乏“刺儿”者：“你们解放军赢得不光彩！来去偷偷摸摸，算什么好汉？”“要不是跟着师长上山，英雄无用武之地，我们能当俘虏？”“优待俘虏应该天天吃大米、白面和肉，曹操优待关公，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还有美女伺候呢！”据此，华野首长指示，对第七十四师战俘“提高一级待遇”，被俘班长按尉级军官管理。

整编第八十三师官兵，一向看不惯眼睛长在脑袋上的第七十四师的做派。为避免与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俘虏“顶牛”，影响转化工作，俘管干部安排第八十三师号称“天下第一团”的军官，与第七十四师军官辩论，双方围绕谁是战斗力强者唇剑舌枪展开交锋。通过“以毒攻毒”，着实杀了一下第七十四师骄横之辈的傲气。

华野政治部联络部部长吴宪认为，融俘必须下功夫攻心转化。

他带大家与第七十四师被俘军官交流，肯定了该师小兵团战术（以班组为单位可独立作战）、夜间战斗、迂回战术三大特点，使被俘军官感受到尊重，缓和了对

立情绪。他们平心静气观察，解放军官兵一致，政治和生活待遇平等，打仗干部带头冲锋，而蒋军军官喝兵血、打士兵，打仗用枪逼着士兵“给我上”；解放军军民一致，视人民如父母，被群众当亲人，而蒋军欺压百姓，人民深恶痛绝。两相比较结论自明：解放军虽然武器装备差，但指挥艺术高超且深得民心，部队战斗士气高。自古得人心者得天下，中国今后必是共产党的天下！

华野俘管干部蒋惠泉发现，有个被俘军官自报准尉司书，举止却令人生疑。别人都抢先打饭，他总是最后取餐，蹲在墙角埋头扒饭，别人与他碰面也让着他。他想起，苏中战役俘虏的第四十九军军长王铁汉，沙土集战役俘虏的第五十七师师长段霖茂，都是经审查才弄清身份的。“准尉司书”会不会是一条漏网之鱼？

蒋惠泉问与“准尉司书”同一个部门的一名尉官，认不认识此人？尉官直摇头。蒋惠泉当场将了他一军：“恁俩自报在一个部门，怎么会不认识？反正恁俩有个说假话的，不是你，就是他。”尉官只好说：“他是我们旅长陈传军。”此说为别人证实后，蒋惠泉称陈传军“陈先生”。他一愣，掩饰说：“我不姓陈，姓张。”蒋惠泉接连三次称他“陈先生”，陈传军自知装不下去了，只好承认：“是的，我是陈传军，整编第七十四师五十一旅少将旅长。”

为搞清俘虏真实身份，训练团摸索出三种办法：一是正面教育，动员坦白；二是填表登记，个别谈话；三是自报互认。军事指挥官和新闻室（特务机关）人员，填表大都写副官、文书、军需等职，致几类人员严重“超编”。训练团审俘通过集体“认职就位”，让谎报者找不到位置，只好从实说出自己身份。

为防止遗漏和差错，各训练团还交叉互认进行鉴别。两队俘虏相视而立，双方距离在既能看清对方模样，又听不见对方说话远近，每人均需逐一讲出另一队俘虏的姓名、职务。有的俘虏冒名顶替阵亡基层军官或漏网人员，结果在互认中原形毕露。

整编第七十四师参谋长魏振钺、所属第五十七旅旅长陈嘘云、师副参谋长兼第五十八旅副旅长李运良等七名高级别俘虏，开始闭口不谈任何情况。俘管干部先找李运良谈话，利用交谈掌握的线索顺藤摸瓜，有的放矢拓展询问，整理出几十万字的《蒋军七十四师调查研究》。书未印好，朱德总司令即来电话催要。

南线融俘补俘的多样化实践，丰富了党的理论创新和指导。1947年9月1日，毛泽东在《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中指出：“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兵员（十分之八九的士兵和少数下级官佐）补充自己。主要向敌军和国民党区域求补充，只有一部分向老解放区求补充，特别是南线各军应当如此。”10月10日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虐待俘虏”仍被奉为圭臬。

12月25日，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开创性阐明十大军事原则，其中第九条为“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显然，视农民为决定战争胜负最大变量的毛泽东，已把农民出身的俘虏，看作博弈中压垮敌人最后那枚分量不菲的砝码。

> 钟期光：《我军政治工作的一个创举——忆解放战争初期的“立功运动”》，《解放战争战略防御回忆史料》，第166—16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3月第1版。

“蛙声十里出山泉”，热望上进且富含创造力的年轻解放战士，甚至成为我军政治工作创新之开先河者。钟期光回忆，1946年夏，华中野战军第一师二团政治处副主任赖少其调研发现，七连一个在苏中战役李堡战斗中解放过来的战士经教育仅一个月后，即在战斗中缴获两支枪。他向指导员提出：“请把我缴到的枪的功劳记下来。”另一位解放战士也对团长说：“我缴到一支枪，请记下来。”胼手胝足解放战士的荣誉心，令部队领导和基层干部感慨。随后，九连设立《功劳簿》，随时记录大家的立功表现。有的解放战士参军来不及换装就参加战斗，担心受伤送到后方被误解，于是要求最好给每个人都发个功劳证。还有的单位提出，战士立了功，把功劳状寄回家，对鼓舞士气和增强家人光荣感都有好处。解放战士引发的创新，契合了部队对完善激励机制的呼唤。9 、10月间，两淮失守，部队情绪低落。赖少其想，如果把基层创造功劳簿、功劳证、功劳状的做法加以规范形成制度，不是可以顺应官兵崇尚荣誉渴望极大焕发部队战斗力吗？他向团党总支提出了开展“功劳运动”的建议。1946年10月8日，第二团党总支委员会作出《关于开展功劳运动的决定》，确定全团建立“三证”：个人有功劳证，连队有功劳簿，功臣家乡有功劳状，功劳运动在全团蓬勃兴起。11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报道第二团这一做法时，号召全解放区普遍开展这一运动，作为争取全面抵抗胜利的有力武器。源于解放战士朴素诉求的立功运动，如春潮澎湃遍及全军。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三卷，第281—28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

1948年1月7日至28日，中工委在西柏坡召开有各大战略区政治部主任、“国军”工作部部长参加的全军第一次敌军工作会议。26日，中工委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目前形势及处理俘虏问题的报告》，强调开展敌军工作是打倒蒋介石的全部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敌军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瓦解敌人：一是释放和派遣俘虏，二是派干部打入或前往谈判，三是开展政治攻势。这三种方法是相互配合、相互帮助的。朱德在会上讲话指出：敌军工

作是带有战略性的一面，是战胜敌人不可缺少的一面。会议经讨论并报中共中央同意，决定把“国军”工作部改称敌军工作部（有的称社会部），只在对外需要时才可酌用“联络部”名称，统一负责党政军各方敌军工作。

大规模补俘融俘始于解放战争战略相持阶段，于战略决战中达到顶峰。这一最经济的军事人力资源置换方式，成为人民解放军数量逆势攀升的密码。华东解放军官训练团干部李士铮回忆，1947年俘虏的蒋军官兵，一般要经过半年或更长时间审查训练。到1949年，接收人数是过去的几倍甚至十几倍，俘虏对立情绪已明显缓和，审查训练时间缩至两三个月或个把月。进过训练团的被俘下级军官，95%报名参加解放军。华东军政大学培训的六千多名被俘国民党中下级军官，95%以上自愿参加解放军。

国民党军俘虏源源不断补入我军，等于假敌之手为我训练能战之兵，促进了部队战斗技能提高和先进武器普及，保证了激烈对抗中的持续作战能力，还可及时提供敌军人员装备部署及工事构筑等信息，充当冲锋陷阵的向导。部队官兵说，蒋介石既是输送武器装备的“运输大队长”，又是输送能战之兵的“训练部长”。

融俘蕴含的多重转机，在“武器的批判”中终于引发“即俘即用”战场革命。1947年1月9日，鲁南战役第二阶段作战总攻峄县（今枣庄市峄城区），山东野战军第八师成建制缴获敌快速纵队四门榴弹炮，对炮手突击教育训练即组建炮兵连，由懂炮兵的干部指挥，成功压制敌炮兵阵地并打击敌指挥所和屯兵区，开创了华东我军步炮配合攻城历史。主要使用缴获美、日装备的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就是1947年3月由解放战士作为教官和骨干组建而成的。

自然，大批解放战士涌入，给保持部队纯洁带来新课题。抗战后仅有九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西北野战军从解放区补兵，犹如滴泉汲水难解大渴，作战中多捉俘虏成为通行做法，原地换帽子即补入部队。西野九个月即由成军之初的二万六千人，迅速扩至七万四千人，加上地方部队共十万八千人，新增的八万多人，九成以上是解放战士。部队成分变化，导致从蒋军中带来的不良习气开始蔓延，一些士兵因怕死而不愿打仗。这种情况在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野战军前身）成立之初也很突出。因部队解放战士占比甚高，部队开展诉苦教育后，经历驳杂但都是一根藤上的苦瓜的战士，个个哭成了泪人儿，有的诉苦时实在憋不住了，便嚷道：“干脆坦白了吧，我是个特务啊！”1947年9月28日，毛泽东批转了东北民主联军辽东第三纵队诉苦教育经验报告。

在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习仲勋不惜放慢对敌进攻节奏，积极尝试大规模集中开展以解放战士为重点、以诉苦自查为主要形式的教育。曾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的原济南军区副参谋长刘长明回忆：“有一次在诉苦大会上，诉苦的战士在台上边说边哭，毛主席陪同战士们在台下边听边流泪。”1948年1月，西野杨家沟前委扩

大会议期间，毛泽东抽出两个晚上时间，听取了一纵第三五八旅政治委员余秋里关于该旅七一四团二营开展诉苦教育的情况汇报。

3月7日，毛泽东撰写的《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把诉旧社会和反动派之苦与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诉苦三查”，概括为新式整军运动，并作为我军补俘融俘和开展政治工作的规定动作，打开了部队战斗力极大涌流的闸门。

毛泽东充分肯定彭德怀、习仲勋所率西北野战军做法，9月13日致电陈毅、粟裕：“对俘虏应采取即俘即补方针。俘获后有数天训练，开一个翻身会（吐苦水），即可补入部队。彭习野战军全靠俘虏补充，即用此种方法，而战斗力很好。用此种方法，只要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均有俘获，即能保持兵员的经常状态。”此间，周恩来也赞扬彭习野战军“创造了政治工作的新方式”。

王耀武被俘后，舒同送给他《新民主主义论》等书籍。再见舒同，王耀武便提问，为什么国民党军官兵被解放军俘虏后，马上就能反戈一击？“王耀武之问”，切中我军补俘融俘之奥妙。

大批国民党俘虏掉转枪口加入我军，改变了部队人员构成，却未改变人民军队性质。当年为绥德军区独立二旅战士的人民解放军原总参谋长傅全有回忆，班里有个五大三粗的解放战士，整天凶着个黑脸，大家都怕他。可打清涧时，他参加我军后第一次上战场就立了大功，后来被提升为连长。豫东战役被俘的解放战士熊金发，经诉苦教育，成为冲锋在前的勇士。济南战役中，他第一个冲上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部驻地邮电大楼楼顶，一把从旗杆上扯下青天白日旗，转身问排长：“我像不像粟司令的兵？”来自苏中老根据地的排长平时说话喜欢讲“我们是粟司令的战士”，批评人常说：“你自己看看，哪一点像粟司令的兵？”此刻，排长高声喊道：“你是粟司令指挥下的英雄战士！”熊金发问：“我可不可以入党？”排长响亮地回答：“我就是你的入党介绍人！”

7月1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人和各中央局电：“乡村人口大为减少”，“各区扩兵（包括东北在内）均已至饱和点”。“今后前线兵源全部依靠俘虏及某些地方部队之升格”，“我军战胜蒋介石的人力资源，主要依靠俘虏”。

9月11日，毛泽东致电陈毅、粟裕并告刘伯承、邓小平：“在目前几个月里，你们人员补充主要靠俘虏，应采即俘即补方针。”

11月7日，毛泽东致电华野、中野：“你们应仿照济南战役之办法，对我各作战部队随战随补”，“应将后方补训兵团移到接近战场的位置，以便将已经训练好的

新兵及俘虏能够迅速补充部队，同时将此次战役中所获俘虏迅速接收训练及补充部队”。

12月22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杨得志、罗瑞卿等并告林彪、罗荣桓等电：望你们仿照刘邓陈粟在徐蚌作战中即俘即查、即补即战方针，立即将最大部分俘虏补入部队，并迅速加以融化。

华野在杨家沟的传经使者陈毅，1948年1月向西野指挥员介绍，华野补充兵员十分之三是农民，十分之七是解放战士，一年来补充二十万名解放战士，做到了以战养战。这些战士昨天还是与人民为敌的蒋军，如今拿起枪来为人民打仗，在战场上表现不错。后来，他在《记淮海前线见闻》一诗中欣喜写道：“新同志，解放最开怀。诉苦从头难尽说，壮丁远处被抓来。共打蒋总裁。”

有一组数字令粟裕感慨：“淮海战役开始，华野为三十六万九千人，战役过程中伤亡十万五千人，战役结束时达到五十五万一千人，这中间除整补了几个地方团外，补进的主要是解放战士。”

《解放战争时期的华东敌军工作》，第301页。

同样，中野淮海战役前有十五万人，战后增至二十四万人。两个野战军共伤亡十三万人，占参战兵力21%，80%损失在战役第一、二阶段，如不及时补充兵员，后续作战难乎为继。各部队即俘、即补、即教、即战，有的国民党兵上午被俘，下午即下连参战。淮海战役后期，华野、中野部队解放战士比例高达80%。[注]

陈毅粟裕难以忘怀，有个解放战士英雄，在华野部队广为人知。第九纵队二十五师七十五团肃清碾庄南外围，几次攻击曹门楼第二十五军守敌遇挫。济南战役解放战士赵万树请战说：“指导员，你给我入党，我有办法！”指导员惊喜地问：“真的？”“真的！”“行，给你入党！”“算数？”“算数！”赵万树换上国民党军装，抱着炸药包向前爬去。守敌以为赵万树是自己的伤兵，没理他。赵万树爬到大碉堡前安放好炸药包，引燃了导火索。敌人发现上当，急忙向他开火，但已经来不及了。一声巨响，碉堡和赵万树一起消失了。

1948年12月6日，第四纵队集中第十、十一、十二三个旅，第三次猛攻双堆集，砸开了黄维防御体系前大门李围子。主攻团团长吴效闵指挥第十旅二十九团率先突破后，守敌第十四军十师师长张用斌，凭借重炮、机枪、火焰喷射器和毒气弹组织反击，第二十九团六连在顽强抗击中伤亡殆尽。连长牺牲后，负伤昏迷的指导员刘拴牛在地堡中醒来，眼前只剩下刚俘虏的第十四军十二名国民党兵！在阵地眼看不保的危急关头，党的组织细胞赋予六连神奇转化之功。毛泽东说，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就是因为起义部队党支部不建在连队，而放在团。六连党支部书

记刘拴牛火线融俘，十二名穷苦出身的俘虏兵加盟我军，及时补充新鲜血液的六连顽强坚守李围子十小时，成为一道敌人不可逾越的铁门槛！

部队集中教育带有明显阶段性，陆续补入的解放战士易挂空挡。淮海战役刚结束部队即整军南进，要以主体为解放战士的战略军团去终结国民党反动统治，深化融俘教育势在必行。开展诉苦教育，依旧是深化融俘教育的第一把钥匙，也是最有效的融俘方法。

《陈赓军事文选》，第496页，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

1949年2月28日，陈赓等兵团首长签发的《渡江作战的政治动员》简报载，有些“新解放战士”认为，八项和平条件“第一条（即‘惩办战争罪犯’）太苛刻”“不管怎么样，和了就好”，“以长江为界各不侵犯也行”。“对于这些思想，有些单位是从回忆自己的痛苦算国民党匪帮的罪恶，回忆自己的光荣历史及身上的伤，算血账、算辛苦账。九纵（简报发出时已改为第十二军）提出了是不是已经翻身翻透了的问题组织讨论。有的甚至组织了小型诉苦，有的单位则讲了过去的历史经验和现在敌人正在准备等生动的各种事实，这样从启发阶级仇恨认识敌人本质来解决。”

《陈锡联回忆录》，第254页，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8月第2版。

陈锡联回忆，1949年3月初，兵团主力进逼长江后，各级领导深入部队进行渡江作战政治动员，“营以下分队根据解放战士较多的特点，普遍开展了诉苦教育运动。通过挖苦根、算血账、复仇祭灵等活动，提高了阶级觉悟”。

好风凭借力，各突击集团把寄托着亿万农民“耕者有其田”梦想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作为融俘教育的思想武器和重要抓手，组织官兵痛陈地主压榨百姓之苦，请群众声讨蒋军劫掠人民罪行，让解放战士控诉蒋军军官欺压士兵劣迹，引导官兵把依令渡江南进，与为保卫土改胜利果实而战结合起来，极大激发了官兵的战斗热情。

由华野俘管处文工队改编而来的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三队，给部队演出大型歌剧《白毛女》《血泪仇》《新生之路》等剧目，对解放战士触动尤深。为使他们尽快改掉在蒋军沾染的兵痞习气，一些部队还让对两种军队优劣感知最深者，在新旧对比中现身说法，引导解放战士把个人的苦难和仇恨，转化为鲜明的阶级意识，弃旧图新融入人民军队。靖江县高何剧团在部队驻地演出《复仇》等剧目，犹如一石激起千重浪，在东突击集团部队和支前民工中引起强烈反响。某部七连战士李天根说：“地主就是这样揪我家的，一定不忘掉，今后好好干，坚决将革命进行到底！”

第三野战军八兵团三十四军，由淮海战场起义的国民党何基沣部与江淮军区第三十四旅和独立旅合编而成。该军第一〇〇师原为冯玉祥西北军第一三二师，北伐参加了著名的“五原誓师”并给北洋军阀致命打击，卢沟桥事变在第二十九军编成内奋起反击，打响抗日第一枪。渡江前，第一〇〇师集中十天进行教育，回顾国共合作历史，认清国民党反动本质；组织忆苦诉苦，激发对蒋介石集团的仇恨；学习新区和城市政策，帮助官兵克服旧军队恶习。率部起义的军长何基沣登台授课，以亲身经历告诉官兵，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吃掉西北军余部之心不死，把部队投入内战苦海。如不起义，迟早会被蒋介石毁掉。军党委突出抓好来自两个营垒干部的团结，大胆使用起义干部，大力破除本位主义、山头主义，带领部队胜利完成了攻歼十二圩瓜州之敌和钳制南京正面之敌任务。

渡江部队深化融俘教育有声有色时，在靖江第三十一军九十二师起渡点，第二七五团三营八连连长王忠仁以情为炬，给同自己有着相似人生经历的战友点燃心灯，把他们的世界照亮。王忠仁原是国民党第七十三军士兵，1947年1月莱芜战役被俘，经教育下连第一晚，与连长同宿一间农舍。那夜风雪交加，连长给他端来一盆烧好的洗脚水，还给他把袜子洗净烤干。王忠仁的心被融化了。回想国军的连长，哪个不对士兵横眉竖眼？冬天里的春天，就这样降临在王忠仁心头。此后他发现，连队行军打仗，连长处处当标杆。哦，解放军带兵是靠以身作则的人格力量！王忠仁军事技术好，思想转变快，到华东军政大学学习八个月，回来当了排长。转年秋天打济南，王忠仁在连长指挥下，带领全排英勇突击，荣立战功。连长牺牲后，他接任了这一光荣岗位。渡江前夕，面对那些心猿意马的解放战士，王忠仁油然想起老连长。人心都是肉长的，世上哪有焐不热的石头？王忠仁像老连长那样端起洗脚盆，见缝插针与解放战士拉家常，要求连队干部骨干包干做他们工作，把“一个人的融俘”变成“一群人的融俘”。全连一百五十号人，上百名解放战士个个像小老虎。王忠仁笑了。收京取沪，加钢淬火的八连，将会创造怎样令人刮目相看的战绩？

大规模取敌之兵，全时空克敌制胜，这一创举成为我军由弱到强百战不殆的法宝，也在世界军事史上，提供了战略赋能取兵于敌愈战愈强的中国例证。1949年4月，周恩来在北平为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作报告，言及我军补俘融俘出言鲜活生动：

> 《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周恩来选集》，第315—316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

我们的战士有很大部分是俘虏过来的，称为解放战士，有的部队，解放战士竟占80%，少的也占50%至60%，平均约占65%至70%。对于俘虏，我们实行即俘、即查、即补、即训、即打的办法，就是说士兵一俘虏过来就补充到部队，经过诉苦教育，就参加作战。在打黄百韬时，情形竟发展到上午的俘虏下午就参加作战。当

时的解放战士现在有许多已经做了排长、连长。这种情形是世界战史上所少有的。[注]

（十二）张治中北上前两赴溪口谒蒋

1949年3月29日晨，张治中携秘书用工楷抄写的政府和谈腹案和国防部意见，与屈武同赴溪口向蒋介石汇报。

这是张治中月内二赴溪口面蒋，禀报军国大事并听取指示了。

交战场上生死博弈，谈判桌前唇枪舌剑。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战争与和谈构成了国共两党关系的一条奇特贯穿线。而游走其间的一位国民党高官，正是见证并参与铸造“和谈年代”的张治中。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关系降至冰点。从1942年重开国共两党会谈，张治中与周恩来、林彪谈判，到1944年张治中、王世杰与林伯渠谈判；从抗战胜利后重庆谈判、整军谈判、政协谈判、东北谈判，到北平谈判，除政协谈判张治中因与新疆伊宁激进势力代表对话缺席，其他谈判可谓无役不与，而且除重庆谈判外，其均为国民党首席代表。在长江战云密布的1949年春，蒋介石百味杂陈的“共产党的朋友”，毛泽东激赏有加的“三到延安的好朋友”张治中，又责无旁贷领衔国民党一方参加北平和谈。

作为跻身黄埔系核心层高级将领的“八大金刚”之一、系甘青宁新四省军政大权于一身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国民党中央执委常委，张治中比谁都更清楚，当此“和平已死”之时与中共谈判，已是木已成舟、覆水难收，的确太晚了。披阅古今中外历史，你见过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能从谈判桌上拿到的先例吗？

张治中曾充任蒋介石的近侍，有“文胆”陈布雷所不及的放言极谏，而绝不阿顺取容。1948年5月，这位“四省总督”退居兰州兴隆山静思默想有日，慨然草成一份“和平万言书”，差人遥呈南京最高当局，历数时弊后，直击要害：“职认为本党对共党问题一向之态度，主要之错误，在于无定见、无远见……”是年6月下旬，蒋介石赴西安召开军事会议，居留一周每天均召张治中密谈，27日竟长谈三小时之久。张治中痛切陈词：“应该主动放弃‘戡乱’主张，停止战争！”蒋介石惶恐说，停战“内部马上要分裂，士气马上要瓦解！”11月5日，东北全境已解放，华北亦解放在即，国民党尚余半壁江山。张治中向蒋介石作“最后的进言”：“现在的局势已经比我们6月在西安时差得太多，这个仗绝对不能再打下去了！如果现在不讲和，将来我们一定失败！”那天，他听到了蒋介石发自心底的战栗：“现在不能讲和，要和我就得下野。但眼下不是下野的时候！”蒋介石警

告他：“以后不要再提和平的话！”几天后，蒋介石在总理纪念周上公开斥责主和派丧失国民立场，响应“共匪”谣言，主张向“共匪”投降……

眼看局势颓势难挽，从上海滩传来了特务头子毛森充满血腥的恫吓：“准备用手枪”“对付主和的秦桧”！上海市副市长吴绍澍，甚至给张治中送来了防弹背心。空有良谋而无从施展的张治中，不能不感受到性命之虞而想“退保西北”。然而，在蒋介石眼中，张治中的真正价值是南京仅有的一张“和平牌”。这就决定了蒋无论在朝在野，都不会放一身系和平大计的张治中偏安西北。

淮海战役后期，国民党人心浮动，一片颓丧，和谈呼声日高。12月24日，坐困愁城的张治中忽接白崇禧“亥敬”电。白崇禧电蒋而不直接呈蒋，却要张治中和张群转呈。25日，蒋介石看到白电当天，恰好中共权威人士宣布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十三名首批战犯名单。阴差阳错，更添里应外合之嫌。30日，白崇禧再发“亥陷”电，必欲给立于危墙之下的蒋介石狠狠一击。北伐和抗战时期，白崇禧两度出任副参谋总长并代参谋总长。1937年8月上旬，蒋介石在南京对黄埔学生宣示：抗战期间，最高统帅如有三长两短，应由白崇禧作接棒人。吊诡的是，二十年间，白崇禧却三次参与逼蒋下野。历史的万花筒又一次令人目眩神迷。那些天，张治中捧着白电这个烫手山芋，频频出入蒋办公室，“每天有谈一次或二、三次的”。迫于形势，也为以退谋进，蒋介石终于同意下野。

久处权力中枢，张治中对城头变幻大王旗早已司空见惯。蒋总统虽已下野，蒋总裁仍在台上。李宗仁履新两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即发“特别紧急宣传通报”：蒋介石仍以“总裁地位”指导国民党“致力革命”，国民党人更须接受总裁之指示。这预示着从兹以后，国民党威命所寄与权力所系，不于总统而于总裁。蒋李换马，不过是政府换了件马甲，把权力中心从南京搬到溪口而已，大权还牢牢攥在蒋大人手里。大佬高擎的和谈大旗虽都写着“划江而治”，却又同床异梦，各怀鬼胎。张治中慨叹，从来的国共谈判，国民党都是占优势一方，而北平和谈，国民党已乞求共产党开恩了。他不敢设想，民国落幕时最后的剧情将会何等悲怆……

张治中料定和谈将旷日持久，请假返西北处理要公。李宗仁不知就里，允准后嘱其快去快回。1月28日，张治中飞回兰州，下决心辞去和谈代表。“和平将军”急流勇退，岂不坏了和谈大计！靠“主和”开局的代总统一力动员，邵力子、程思远等一齐上阵，函电频仍催张返京，吁张“毁誉得失，在所不计”，大有张不出山，如苍生何之概。2月22日，张治中半是无奈半是悲壮，乘李宗仁派来的专机，重新投入刚刚跳出的政治旋涡。

张治中与李宗仁及同僚商量，为利于和谈，须劝蒋介石出国。他显然未意识到此举无异于与虎谋皮，主动提出赴溪口面蒋。行前，李宗仁嘱他代为请示行政院长

孙科辞职后继任人选问题。

“你们的来意是劝我出国，昨天的报纸已登出来了！”3月4日，在溪口雪窦寺妙高台蒋母墓庐，蒋介石一见到张治中和屈武，便气不打一处来。“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在我的家乡！”蒋介石抢先关门上锁，张治中苦酌的劝蒋出国的说辞，竟一句也道不得，只得就如何应对中共八项条件，恭请面授机宜。

>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1945.1—1949.2，第80页，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第1版。

“八项条件第一项，我们是不能接受的。”鉴于“惩办战争罪犯”对领衔一众战犯的蒋介石刺激最大，张治中作为首席谈判代表，不能不亮明一己态度。第二条，关于改编军队问题，蒋介石念念不忘“军队国家化”，主张双方军队保持一定比例，缩减到国防需要为度，三年之内完成。第三条，关于政治体制问题，蒋介石回避了“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要害，只表示同意实现民主化和多党民主政治。第四条，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蒋介石对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协、接收南京反动政府一切权力的关键避而不谈，表示同意三三制或六六制，双方在政府中保持同等发言权。1945年9月7日，蒋经国曾对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谈及，中共要求，黄河以北各省省长、黄河以南各省副职，应由共产党人担任。然造化弄人，不过三年多光景，张治中转告南京方面的意见，竟是“希望能够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东北、华北各地由中共领导，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汉口、南京、上海四省三市则由国共联合管理”。时移势迁之速，能不令人感喟！蒋介石深知，中共举百万雄兵乘胜南下之际，败中求和谈何容易，遂喟叹曰：“不必由我们提出，共产党恐怕还不是这样看法。我们虽想保有若干完整地区，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可是共产党是不愿这样做的，我们也不容易做到。”

关于和谈代表人选，李宗仁原提名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章士钊、彭昭贤、钟天心六人。1月25日，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指出：“彭昭贤是主战最力的国民党CC派的主要干部之一，人们认为是一个战争罪犯，中共方面不能接待这样的代表。”因中共方面反对彭、钟二人作为和谈代表，蒋介石表示，可于北方籍立监委中遴选一人，于是，一向从事教育工作、政治色彩不太浓厚的李蒸入选。3月28日，李宗仁又提名刘斐为代表。

关于继任行政院长人选，蒋介石坚决反对何应钦接盘，说何必一定要挑选与我关系深的人继任。此前，李宗仁曾再三请求，此番张治中、吴忠信又极力劝说，蒋介石最终表示同意，但又定调说：“现在是备战求和，仍然以整饬军事为主，不宜分心！”应张治中请求，蒋介石给何应钦写了要他接手行政院长的亲笔信。

张、屈同蒋谈了五天，下山又在溪口稍事逗留，张治中向秘书口述了谈话内容。此行虽然没有空手而归，但劝蒋出国首要任务一见面即遭钳口，张治中总是于心不甘。此前，他曾试图让司徒雷登出面劝蒋出国，以裨和谈顺利进行。司徒雷登却以此事外人不宜插手为由婉拒，要他以个人关系劝蒋。谁知此事竟被蒋探知，一度认为张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好在张治中夙兴诤言，惯于直道进谏，此举最终被蒋介石视为求和心切罢了。

然而，二行溪口，张治中已经无法淡定。军政大员络绎不绝于宁波溪口道上，谷正纲、郑彦棻等住在溪口招待所,蒋的幕僚和俞济时等一众侍从官已原封不动搬来，蒋通过七部电台依旧呼风唤雨号令全国……党国命悬一线，大佬却逆势而行，张治中深及骨髓的士大夫情结终于被点燃。他展笺挥毫，恳请蒋再酌出国事，言明留在国内，于公于私均有害无益。于公且不论，于私，你出国后，如和谈成功，人民对你犹可引起原谅，如和谈不成，国人也不会责备你。反之，如你不出国，则势必成为和谈的一种障碍，和谈幸成，功归李宗仁，和谈不成，国人将对你无从谅解了！信中“障碍”一词，对蒋介石刺激尤深。1927年8月，汪精卫策动三路大军东征讨蒋，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共同认为，只有与汉口言和，方能解南京之危，而蒋介石无疑是和议之主要障碍。经桂系等将领施压，8月12日，蒋介石辞去总司令之职。

张治中不惧蒋公愠色，敢就敏感问题坦诚进言，除了曾履大内身为近臣，气质个性天生善沟通协调和揣摩蒋心理并拿捏得当外，关键在于蒋介石深知，张治中不但是个真正忠于国民党的好党员，也是真正关心自己的大忠臣。他时时上书抨击时弊，痛下针砭，不过是用振聩发聋的事实引起疗救的注意，传达对怒其不争的国民党最深挚的关切罢了。他对外主战、对内主和，抗战中身先士卒冲杀在第一线，誓以血肉之躯捍卫国土而赢得“抗战将军”美名，而在二十余年的国共冲突中，他决不亲手向中共方面开一枪、射一弹，成为国军高官中独树一帜的人物；他任国民党三青团书记长时捧“太子”上台、赶“太保”出海，为蒋氏父子交替铺路奠基，为蒋家王朝立下不世之功；他在桂系出山抗战势力坐大时，建议撤销行营厉行“削藩”，强化蒋氏统治效能；他在政府问题如山、蒋氏“忧劳过甚”时，恪尽职守替领袖“擦屁股”，这些分忧分劳的为臣之道，蒋介石都历历在目、谨记在心。但噬权如命的蒋介石容忍毕竟有限，包括对敢于犯颜忠谏的张治中。

张治中再度上书说蒋，引爆了一只当量极高的火药桶。

“我是一定不会出国的！一定不会亡命的！我可以不做总统，但做个老百姓总可以自由！”“想利用报纸对我施压，办不到！我可以住到国内的任何地方，即使到国外也可以，但绝对不能逼迫！”

面对冥顽不化的蒋公，张治中只有吁天呼地，浩叹不已。

屈武去机场与蒋经国同车。途中，蒋经国说：“文白先生太天真了！现在还讲和平，将来是没有好结果的。我看他会死无葬身之地！”屈武听后顿觉心惊肉跳。这哪里是太子发狠？分明可闻乃父之霍霍磨刀声！他回南京原话转告张治中。张治中生气地责怪他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是要当面质问和教训他的！”

3月11日，张治中回宁第二天就持蒋介石亲笔信，与顾祝同、白崇禧联袂赴杭做何应钦工作。12日，何应钦就任行政院院长。

何应钦上任首次开会，便研究和谈腹案。张治中介绍了溪口谒蒋情况，陈述了对中共八条的意见，并作了轮廓性分析估计，指出，中共把惩办战犯作为八条之首，先后三次公布战犯名单，2月6日又以中共发言人名义发表声明，言明是“和平谈判必备条件”，估计和谈中会成为双方交锋焦点，须详加讨论，预为之计。

3月23日，鉴于朝野要求和谈呼声日甚一日，国统区已是穷途末路，时与势的移易与流变都不容许再拖延，何应钦宣布内阁改组名单，24日召开第一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南京政府和平谈判商谈代表团”名单：首席代表张治中，代表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28日补刘斐），秘书长卢郁文，顾问：屈武、李俊龙、金山（已在北平）、刘仲容（同时为李宗仁联络员）。会议还议定，请中共早日决定和谈时间、地点，以便开始商谈。

> 蒋经国：《危急存亡之秋》，《蒋经国自述》，第180页，团结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蒋经国3月30日日记写道：“李宗仁更与共党疏通，增派刘斐参加和谈。刘曾担任三个年头的剿共作战参谋，而李必欲其充当代表，简直不惜以我方的全部军事秘密计划与内容，贡献共党，以表示其投诚之真意。这种举措，是再荒谬不过的！”

中共中央同意南京政府提出的和谈名单。3月26日，新华广播电台公布了中共和谈代表名单：首席代表周恩来，代表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后加聂荣臻），秘书长齐燕铭。中共特别声明，谈判以毛泽东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要求国民党代表携为八项条件所需的必要材料，于4月1日到北平和谈。

中共公布和谈名单，南京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众声喧哗中，国民党立监委和各派系纷纷分析时局、研讨对策，报纸刊物也都各展其长，对国共双方走势进行推测和展望。

首行溪口，视党国命运胜于身家性命的张治中，已把自己置于悬崖之上。3月29日，他不惮风险二赴溪口，同蒋介石单独交谈，下午陪蒋从蒋母墓庐一直走到溪口。蒋介石信誓旦旦说，一定竭尽全力支持李宗仁，他负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他的成败，就是我的成败，表示：“终生不愿再执政，盼望实现和平！愿意终老是乡！”张治中眼前一亮，急忙问：“总裁这话对和谈很有帮助，也可消除党内的分裂。不知愿意在报端发表否？”蒋介石说：“你斟酌吧！”次日，蒋介石看罢张治中带来的和谈腹案，假惺惺地说：“我没有什么意见，你这次负担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

张治中二赴溪口回到南京，太阳正落下被岁月剥蚀得老态龙钟的明城墙。行期将近，他的内心正经历着一场近乎撕裂的痛苦。世事如棋，作为熟知楚河汉界对手攻略，且在国共两党均取重不菲的军政要员，张治中心明如镜：由于自身的原因，一盘死棋的国民党已经无路可走。知时务者理当顺势明断，但就此撒手而去，于情于理似都说不过去。作为一个自视良心未泯的正直军人，干城之将的职责、民族大义的操守，都使他在山河破碎年月始终秉持抗日御侮和不打内战的立场；但作为饱受传统文化浸润、心底还祭着一炷忠君烟火的当朝重臣，他又无法忘却蒋介石对自己的知遇之恩。眼下，只有在所不辞，硬着头皮朝前走了！

当日，张治中就溪口之行对余湛邦口授一篇新闻稿，蒋介石溪口路上颇为动情的“两愿”感言，成为文中的看点。

张治中北上前，上海《新闻报》主笔俞树立来见。“您看，现在才谈和，是否迟了些？”俞树立单刀直入问。“太迟了！”张治中说，“抗战胜利后，我就无数次口头和书面向总统进言，极力主张和谈，未蒙采纳。去年6月在西安，11月在南京，我两次向总统痛切陈词，还是未能说服他。”俞树立问：“您对中共的估计怎样？”张治中默默答道：“形势太险恶了！我们很少有回旋的余地。中共态度从八项条件可窥见一斑。只能知其不可而为之了！”

3月31日，张治中给立法院作和谈问题报告后，往见李宗仁听取指示。李宗仁说：“只要是你们同意的谈判结果，我就签字。”

当晚，何应钦为政府和谈代表饯行。他举杯对张治中说：“你持总裁信到杭州劝我上任时，我就说过，你须负起和谈责任我才能到任。明天你就要出发，祝你马到成功，不负众望！”

张治中疲惫的脸上挤出一丝笑意，强打精神说：“大家知道，我对国共和谈、国共合作，向来存有一种痴心梦想。形势如此，我怎能置身局外，袖手旁观？不过，前途如何，是很难逆料的！”

众宾客闻听此言均神情黯然。大家频频举杯，又心不在焉。在这个五味杂陈的夜宴上，张治中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于他而言，此去北平，南京将是再也回不去的他乡。

卷三 民心为舟 士气作帆

（一）起渡点选择的“根据地考量”

“‘王老虎’近来缺点精气神！”1949年2月，粟裕正优化东、中两大集团兵力配置，忽听这一议论，心中不由“咯噔”一下。

第二十四军军长王必成，是新四军有名的“王老虎”，所率第一支队二团是威震江南的“老虎团”。苏中七战七捷，车桥、莱芜、孟良崮战役，王必成部均建功显赫。“老虎”打盹，这可不是小事！经了解，王必成对第二十四军从东线调到中线过江心里梗着个结。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粟裕同虎将一直出生入死、心心相印。他直截了当给王必成发电：“你们二十四军是我们华野的老部队了，部队中多数人是江南子弟，我之所以安排你们二十四军从芜湖渡江，就是考虑到战士们对江南地形的熟悉，有利于作战。”

虎将悟透戎机，第二十四军听令而动，虎啸皖江。

三野第七、八、九、十兵团，共十五个军、一个特种兵纵队，以第八、十和第七、九兵团，分别组成东、中突击集团。2月12日，粟裕提出调整部分部队指挥关系，“将熟悉苏南情况的第二十三军和第二十军，由中集团第七、第九兵团，分别调归东集团第十、第八兵团，将熟悉苏浙边区和皖南情况的第二十四军和第二十五军，由东集团第八兵团分别调归中集团第七、第九兵团指挥”。

跨建制调整部队并确定起渡点，既考虑到东线敌情严重，故将第七兵团熟悉苏中地形民情的第二十三军（原华野四纵），配置在东线靖江夹港、七圩港起渡，暂归十兵团指挥；同时又着眼中路突破万无一失，将第八兵团熟悉苏浙皖（南）情况的第二十四军（原华野六纵），配置在安徽枞阳至裕溪口段过江，暂归第七兵团指挥。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配置在中集团，所属第二十军主力熟悉苏南苏中情况，故将该军调整到东集团，隶属第八兵团指挥。三个军均为该方向渡江第一梯队，通过跨建制调整，实现了人地最佳配置。

> 《华野战字第17号命令》，〔1949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藏件。

1月15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治委员粟裕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参谋长陈士榘、副参谋长张震发出战字第17号命令，令第六、七、八、十三纵队和渡江先遣纵队（五个支队）、江淮军区（二个旅），共十三个师、四十一个团，乘胜日夜兼程渡淮向南追击，使津浦、淮南铁路等重要交通线以及蚌埠、合肥等重要城市免受重大破坏，开辟渡江南进基地。[注]陈士榘指挥先遣南下十几万大军连克蚌埠、合肥等重镇，为席卷江北、饮马长江作战略预置。

作为中国强渡江河战役历史之最，部队起渡点选择至关重要。

按照宽正面、有重点同时渡江总体战略设计，总前委选择起渡点，坚持地理水文相宜与革命老区加持统一，有意识安排部队回师与人民患难与共的根据地，以地利人和促使战斗力倍增。

1942年，中共中央决定实行党政军领导一元化，粟裕兼任苏中区党委书记，翌年领导军民胜利开展了反“清乡”斗争。1946年苏中七战七捷，根据地人民功不可没。东集团三十五万人在江阴段三江营至张黄港一线实施渡江，部队重返苏中根据地如鱼得水。

十兵团渡江地靖江，抗战时属苏中三分区。当年，叶飞在陈毅领导下，在此参与指挥黄桥和车桥战役，还曾接替粟裕兼任苏中区党委书记。叶飞1942年6月就指出，靖江是“大江南北之跳板”“苏中的门户”。次年4月，他召集靖江、如皋、泰

兴、泰县独立团负责人，部署在靖新公路伏击伪十九师陈正才部。1949年2月，叶飞再披战袍任十兵团司令员，从济南星夜赴任泰州姜堰。

第二十三军前身是苏浙军区第三纵队。抗战之初，陶勇带领这支诞生于江南的游击武装，以五百挑子规模推车挑担过江，跨江奏响东进序曲。1944年12月，第二十三军前身部队以师级规模从江北打回江南。日本投降后，苏浙军区第三纵队从驻地宜兴北撤，乡亲们含泪叮咛，一定要打败蒋匪军，早日打回江南来！如今，由不足六千人的第三纵队整编而来的第二十三军三万多将士，即将由靖江第四次过江重返江南，兑现了“一定要打回来”的誓言。战士们吃着香喷喷的大米饭，睡上用金黄的稻草打的“金丝被”地铺，为故乡和第二故乡父老乡亲骑鲸踏浪飞跃天堑的豪情油然而生。

陶勇原名张道庸，自幼丧父给人放牛，参加红军后骁勇善战，曾任红九军教导师师长。1937年3月西路军受挫后，张道庸身陷囹圄，经组织营救出狱后，入延安抗大学习，后南下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四团团长。陈毅素知“道庸不庸”，取战将名字谐音为其改名陶勇。陶勇先后任苏浙军区第三纵队、华中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等职，素以“拼命三郎”著称。

> 1941年（民国三十年），新四军在江阴并跨县建立澄西、江阴、沙洲、澄东四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

2月20日，陶勇一到新丰市，即派一个班骑马到上四圩港，把长江工作委员会书记俞迺章接到军部。1948年9月，为迎接我军渡江，华中一地委组建如皋、靖江、泰兴三县长江工委，俞迺章任书记。当年，陶勇任苏浙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驰骋江南，与澄西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俞迺章相熟。1942年夏，日伪在澄西“清乡”，俞迺章带短枪队转至江北靖江西沙，新四军北撤时曾配合陶勇部渡江。久别重逢，两位老战友紧紧相拥，陶勇喊道：“我的县太爷，新四军北撤咱就在一起，大军南下又在一起了！”俞迺章噙着泪花说：“听说你陶军长要在这里过江，我开心得不得了，天天盼你来！”

陶勇把军领导同志介绍给俞迺章，又让通信营马上给他和俞迺章住处架设直通电话，笑道：“有了电话，找你县太爷就方便了！”

两人落座后，俞迺章说：“你们军渡江这一段，地形和敌情最为复杂。从七圩港到天星桥，江面最宽处近二十里，江中十个沙岛既有土顽，又有国民党江防卫队。”

“你们长江工委前期都做了哪些工作？”陶勇急切地问。

俞迺章说，工委组成七个工作组，对敌开展策反工作，其中在中心沙岛争取了李明扬手下的参议、当过旅长后弃官回岛的张松山，在利港镇守军争取了副排长毛勇。

驻守中心沙岛的国民党军加强榴弹炮营编有四个连，工委分工联系张松山和他手下营长的俞叔度，还要负责整个十兵团渡江地段的情报工作，开展工作势单力薄。他建议，请军长派个可靠且精明的营、团级干部，去中心沙岛直接掌控局面，确保这个江心岛成为我军过江跳板。

陶勇笑得合不拢嘴，“好！好！我的太爷，你们可真不简单呀！”他和几位军领导一商量，决定派营长潘其荣上岛。陶勇当面给潘其荣交代任务，让机关给他准备了几十两黄金做活动经费。

第二天，俞迺章把工委在各港口和夹江到上四圩五个工作组负责人，工委情报站长和渔民骨干请到军部与师团领导座谈。陶勇明确师团与属地工委工作组挂钩关系后说：“工委的同志有事就找驻军师、团长，他们办不了，就找我陶勇！部队有事就找工委工作组组长，他们解决不了就找俞迺章同志。总之，咱们军政一致，军民一心，密切合作，坚决完成渡江作战任务，打个漂亮仗！”

军部出台规定，凡支援军里渡江的船工、渔民，每人每天两斤米、两斤菜，油盐各五钱，一星期吃一次肉，会喝酒的每人每天半斤泡子酒，缺衣少被者一律补齐，生病的团卫生队负责诊断治疗。消息传出，工委干部十分高兴，船工、渔民踊跃报名支前。

陶勇要部队请工委介绍地方支援渡江情况，讲民情、敌情和长江航渡常识。俞迺章在发动各级为部队找船的同时，还发挥自身优势筹船。1942年，俞迺章从江阴转来靖江，针对当地渔民多是外来户，习惯于参加帮会组织维护自身利益的特点，便打着“新四军六师”的旗号，以新成立的灰色帮会组织“新生社”为掩护，自己出面充任“老头子”广收徒弟，很快吸收了大批贫苦渔民。工委发动“新生社”社员滚动发展、迅猛扩张，很快吸收了几千名新社员，俞迺章提出找船后,运河和里下河两岸，洪泽湖、高宝湖、邵伯湖、崇明岛等湖区水乡，新老社员顺藤摸瓜、以人找船，不到两个月筹船一千七百八十三条，还从所属沿江三县征集上千名向导。

陶勇到江边转了转，发现征集的船只大部分都很破旧，便和俞迺章商量，自己出面跟地委联系解决修船原料和工匠，军地一起督促检查把征集的船修好。渡江指挥部和地委从苏北筹集了木材、竹子、桐油、石灰、麻丝、钉子等修船材料，集中能工巧匠日夜突击，3月底把征集的船只全部整修完。工匠们还和指战员一起，用芦柴、竹管扎成三角形救生圈，用木材扎成四米宽、十米长的木排，装上汽车引擎，垒起棉花胎，制成三十多艘土“炮艇”。

俞迺章：《并肩战斗》，《雄师百战》第346—35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

3月中旬，俞迺章又找陶勇说，中心沙岛光有潘其荣还不够，最好再派个团长或副团长过去。陶勇又派陈副团长上岛做炮营起义工作。俞迺章让人在七圩港买了四十多头猪，让陈副团长带人将猪赶到中心沙岛张松山在江北的家中，跟他接上了关系。

西集团三十五万人，部署在刘邓经略过的皖江西部。刘邓大军由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发展而来，第一二九师的底子是从大别山起家的红四方面军，战将陈再道、王近山等都是大别山人。将士中不乏大别山子弟，十分利于部队立脚生根。二野为主组成西集团，第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老部队重返大别山根据地，并将望江以西作为南渡的进攻出发阵地，可谓占尽地利人和优势，进退裕如。

地处皖中的无为县（今无为市），是中集团主要起渡点之一。无为古风悠长，当年取“思天下安于无事，无为而治”而名之。无为的母亲河是濡须河，其渡口濡须口即今之裕溪口，古来向为北岸南渡之要津。民风淳厚的无为又是革命老根据地，新四军四支队、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和新四军第七师，都发祥于这片热土。

暮霭四合，一灯如豆。一位农妇将两片风干的熟鹅肉，放到寄养女童何生的碗中。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在无为均建有保育院，接收干部子女和烈士遗孤，保育儿童寄养在保育员家中。何生的父亲是中共皖中区党委书记、新四军第七师政治部主任何伟，母亲是中共无为县委书记孙以瑾。1943年3月，为应对日伪日益严酷的“清乡”“扫荡”，何伟夫妇把尚未满月的女儿何生送往保育院寄养。1944年何伟、孙以瑾去延安后，孩子留在无为。

1945年10月，新四军北撤，寄养群众家的新四军后代已难以生存。时任新四军第七师政治部副主任、后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李丰平之妻文芸，将何生转至丈夫任无巢地委书记时熟悉的房东——巢湖银屏小李村邹广发家，匿居山乡的何生得以幸存。

1948年秋，何伟任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率部支援主力部队作战并在铁路沿线剿灭“座山雕”等土匪，传奇经历使他成为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中何政委原型。直到1950年3月，何伟才把何生接到天津。1963年，何伟从外交部调任河南省委第二书记。他以源于皖江根据地的炽热情怀，发现并扶持赈灾为民的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1965年11月，已出任国家教育部部长的何伟偕妻到无为调研，听说当年保育员为养育何生，亲生儿子病饿而死，当场落泪。何伟夫妇赶到保育员家，两对睽违二十多年的夫妇抱头痛哭。从此，何伟、孙以瑾北京家中，多了一户来自皖江根据地的亲戚。1973年，何伟病逝。遵其生前遗愿，何伟骨灰一半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半安放在他和妻子曾经战斗过、孩子得到人民养育的无为。

渡江战役中，第三野战军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七军二十万人马，均从无为临江坝、姚王庙、神塘河、泥汊突击过江。由此起渡除便于过江和与东集团东西对进钳击南京外，还因为无为是子弟兵不能忘却的娘家。中路渡江部队一马当先突破长江天堑，大军云集的无为最有为，无为涌现的支前功臣模范亦属最多。

南米北面，南船北车。北方陆地猛虎抵江，不约而同患了“恐江症”：“江无底，海无边，秤砣落底掉三天”；“长江蚊子半尺长，叮一口就冒血浆”；“长江无风三尺浪，有风大浪蹿天上”……

> 谭一青、袁德金编著：《军事家邓小平》（下卷），第43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第1版。

1949年1月11日，邓小平致电毛泽东：“一般说来，打过长江虽都知道一定要去，而且很快要去，也知道惟有打过长江才是正确的。但北方人到南方，确实具有恐惧心理。过去每次向南行动，总要逃亡几百人，所以过江动员仍是一个艰巨工作。”[注]

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决战，要求政治工作拒绝一切花拳绣腿；封喉之役的思想教育，首先要保证官兵“思想渡江”。邓小平历来重视部队教育管理。1938年1月第一二九师挺进太行，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一位屡立战功的老战士酒后奸污驻地一名抗属。邓小平不顾部队和群众求情，将其处以极刑，并亲自讲话警示教育官兵；开辟大别山根据地之初，警卫连副连长赵桂良未经店主同意，拿了店里一匹花布和一捆粉条。为严肃军纪，邓小平不顾督办此事的副政治委员张际春求情，召开公判大会，按“约法三章”枪毙了赵桂良。1949年1月初，邓小平亲自组织宣传部编写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做遵守纪律执行政策的模范》两部政治教材。2月8日，中央军委发出《把军队变成工作队》指示，邓小平要求部队普遍进行城市政策、新区政策教育。现在，邓小平又紧盯过江动员中官兵恐惧心理问题的解决。

三野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和政治委员郭化若认为，一些官兵恐江畏水，很大程度是缘于无知。他们要求各级组织部队到江边“看水”，到群众中“访水”，请船工“讲水”，扯下传言和心理因素给长江蒙上的神秘面纱。针对官兵对国民党军舰的顾虑，请懂行者介绍舰艇作战特点和性能，广泛宣传我军一些小分队先行渡江的成功战例和经验，指导部队把开展江情教育同渡江训练结合起来，通过提高渡江作战训练针对性，增强官兵敢打必胜信心。

临战水上训练是消除“恐江症”最好的解药。为把陆地猛虎变成水上蛟龙，3月初，部队请渔民和船工指导官兵在冰冷的桃花水中学游泳、学救护、学堵漏，自制

救生器材。水上作战动作演练，重点练习射击、打敌舰、登陆、滩头阵地防御。技术训练完成后，接着训练渡江队形、指挥联络，以及步炮战术协同。

官兵在浪里纵横翻飞时，想起那些恐江传言，不禁哑然失笑。

渡江催生的热词“就粮”，成为决策部队行止和驻屯的重要着眼点。淮海战役结束后，华野先赴徐海地区整训，就是为了避免长时间集结江边，致当地粮食供应紧张，或北粮南调靡费甚巨。参战部队和民工五个月需粮四亿五千万斤，而华东支前委员会仅有一亿三千万斤，中央拨给九千万斤，苏北支援一亿斤，其余一亿三千万斤由江淮和皖西征借补足。东集团渡江部队两淮休整期间，粮食由淮阴、盐城两专区为主就地征粮供应；3月部队南下后，由扬州、泰州两专区为主供应，盐城、南通两专区支援。

> 范敏主编：《伟大的渡江在靖江》，第67页，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1月第1版。

1948年12月，苏皖边区一行署给靖江下达预借五百五十万斤公粮任务，限次年1月15日前完成。由于靖江尚未完全解放，虽经广泛动员，实际借粮四百零一万斤。1949年1月上旬，一行署再电靖江县委催征粮食。2月，华中一分区又要求靖江县征集三百五十万斤大米。3月，华中一地委和支前司令部再给靖江追加三百万斤公粮。靖江县委书记汪青辰回忆：“当我表态接受任务时，我说话的声音是颤抖的，手也感到颤抖。”这个土生土长的县委书记知道，为了支援向江南进军，靖江人民已经倾其所有了，不断增加的征粮任务，带给他们的是怎样的不能承受之重？在县委扩大会议上，汪青辰传达上级追加公粮的指示，“到会同志的面孔表情都是严肃而坚定的。他们都在日日夜夜地紧张工作，满面风尘，是相当疲乏的”，但“没有一个同志讨价还价。我们大家都知道完成这项任务的伟大意义”。

靖江人口不足三十七万，驻有第三野战军四个军近二十万渡江部队。根据作战部署，东起张黄港，西至七圩港，第二十九、二十八、二十三军从东到西依次并肩南渡，二梯队第三十一军在后跟进。汪青辰回忆，当时，第二十三、二十九军各有三万三千多人，第二十八军有五万四千七百二十五人，另配属一个炮兵团。春荒时节，百姓宁可吃野菜树皮和“观音粉”（用孤山嫩石磨成），也把家中粮食甚至过年才舍得吃的米糕、米粉拿出来。仅靖江就调度给各军四千二百万斤大米，一百一十万斤杂粮，四百万斤军草。

> 泰州市党史方志办公室、泰州市档案馆：《一切为了胜利——渡江战役泰州支前文献汇编》，第13页。

据苏皖一专署1949年2月借粮总结载，所属七县靖江征粮任务最重，且“为1947年恢复区”，“农民受地富复辟及蒋匪榨取为深”，“太和、孤山、长安、蒋华等区

敌人扫荡抢掠，蒋灾较重”，蒋华区通太乡“去年全乡被敌抢掠九百石粮”，“连以前农民底财都抢光了，类似乡的全县有十余个”。“农民到去年夏熟（粮食）才到手”，“去年一年收入交了前年秋征、去年夏征、秋征和借粮四次任务，群众反映‘今年缴了四次公粮’”。[注]

汪青辰受领任务时那声音颤抖的承诺，令江畔弄潮的子弟兵眼圈红了。鲜活的教材进入随机教育，部队练兵动力如潮奔涌。

“好草喂战马，好米做军粮。”那个青黄不接的春天，多少纯朴善良的人民将他们的腰带勒了又勒，捧出了贵比生命的粮食？

泰县溪北乡小学教师周古平，在借粮动员会上说：“我本来准备今年娶老婆，现在决定今年不娶，把以前欠的粮交足，按照田亩标准借粮，再超过一百斤，等把蒋匪军消灭掉再结婚！”

> 泰州市党史方志办公室、泰州市档案馆：《一切为了胜利——渡江战役泰州支前档案见证》，第101、108页。

泰州商会记录，“自觉献粮者计四十家，总共献米二百二十八石，现已缴库二百二十九石，内有元大桐油店还加献了壹石”。[注]

最大规模的外线出击，最大限度地内线发力，据统计，苏北、皖北两区共为渡江筹粮三亿四千多万斤，支前民工则以千万计。除十六个随军长期民工团二十余万人外，鲁苏皖还动员三百二十万临时民工支前，其中山东胶高县（今青岛市黄岛区）支前民工大队，在我父亲带领下转战至东集团主要起渡地靖江。2008年，我到医院看望病重的父亲，他指着正播放一部军事题材电视连续剧的荧屏说：“陈毅！陈毅！”这一天我始知，在孟良崮、淮海、渡江战役中荣立一、二、三等功的父亲，当年是陈毅亲手将一枚一等军功章别在他的胸前。时逾七十年，两代人为渡江南进跨时空交集于长江，战争与文学的双重交响令人唏嘘。

（二）李宗仁惊悉江阴要塞“通共”1949

年3、4月间，在江北渡江部队缜密研究遴选领导骨干打入江阴要塞时，李宗仁于南京忽接密报：“江阴要塞司令官戴戎光已秘密与共军接洽，预备于共军渡江时叛变响应。”

> 顾祝同字墨三。

李宗仁闻讯大惊，急召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紧急磋商。顾祝同应召到总统府，李宗仁将密息据实以告，说：“墨三[注]兄，值此党国危亡之秋，涉谍案又出在京沪门

户江阴要塞，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宜及早采取断然措施，彻底根除隐患！”

“此类流言不可轻信。”顾祝同不以为然道，“戴戎光系黄埔学生，为蒋先生所倚重，故畀以江阴要塞司令要职。”

顾祝同是江苏涟水人，曾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兼江苏省主席，陆军一级上将，被目为蒋介石“五虎上将”之一，系皖南事变主凶。

顾祝同言讫，忽又笑道：“戴戎光是我的亲戚，应信其无他。”

参谋总长的话显系取弱势，但代总统已听出其示强的弦外之音。国民党将官保荐历来盘根错节，除了老蒋赏识直接钦点外，那些平步青云者，哪个不是攀云追月，淮王鸡狗？李宗仁知道，戴戎光与顾祝同是苏北老乡。但两人是亲戚，他还是头一回听说。

李宗仁提醒顾祝同:“这年头父子尚且不能相顾，亲戚能靠得住吗？墨三兄，我看为谨慎计，还是把戴戎光调开为好。”

顾祝同的脸沉了下来。他呷口茶，慢慢抬眼看着李宗仁，似笑非笑说:“代总统，国军换将的规矩您是知道的。调整江阴要塞司令非同小可，卑职何能做主？须要请示总裁才能定夺。”

顾祝同果然把最后一道金牌搬出来了。李宗仁何尝不知，撤换将官戴戎光须经蒋介石同意。但力保江南半壁不失的雄心，使他决不肯坐视已察觉的蚁穴酿成溃堤之患。但他显然未预料到，一厢情愿的礼贤下士磋商，开场即成僵局。李宗仁已窥知两位苏北老乡背后的水有多深了。

江南的春天花明柳媚，李宗仁此时却感到一丝莫名的寒意。一生戎马，半世沉浮，有着丰富带兵和从政经验的李宗仁深知，秘息江阴要塞“通共”，绝非空穴来风。在国民党朝不保夕的情势下，任何侥幸、迟疑和淡漠，都可能铸成无可挽回的大错！

无奈嗟叹中，当政以来的种种切切又走马灯似的在李宗仁眼前闪过：上任伊始即签署的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的命令，成了一纸空文；国计民生尤其是军队需用钱者多矣，可他身为主政者竟然分文不能支配；行政院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迁穗，他竟然事先毫不知晓；现在，京沪命脉江阴要塞发现了这么大的隐患，自己竟然无权干预……那一刻，他的“心境实有说不出的辛酸”。李宗仁自知江阴要塞换将请示势必石沉大海，只得就此打住。

两人又说些无关宏旨的闲话，顾祝同遂起身告辞。

戴戎光：《长江江防总崩溃中的江阴要塞》，《江阴渡江战役史资料选编》（上），第325页，江阴市档案史志馆编。

要塞涉谍非同小可，顾祝同虽坚主不调整戴戎光，但心里对要塞是否“通共”并不托底。嗣后，汤恩伯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身份召集江防诸将到南京训话，顾祝同亦逐一与之谈话，当面警告戴戎光：“江阴要塞有共产党活动，要密切注意！”第二天，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第二处（特务组织）找到戴戎光，再提要塞涉谍案。戴戎光百口难辩，遂请二处派员监督自己。戴戎光从南京返回江阴，二处果然派一名少校参谋与其同行。汤恩伯仍不放心，又令上海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周力行约戴戎光赴沪一谈。戴戎光到上海，见到了汤恩伯和炮兵司令邵百昌。为加强内部控制，几人商定江阴要塞增设一副司令，由周力行内弟杨安国担任。

渡江战役风樯弹雨隐去十度春秋，从1958年起，李宗仁旅美期间历时四年写成《李宗仁回忆录》，其中写道：“孰知4月21日共军渡江时，戴戎光果然叛变，利用要塞巨炮反击我江防舰队，舰队或沉或逃，共军木船乃蔽江而过。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大好江南，顿时便赤焰熏天，无法挽回了。戴戎光可能不纯然是为着五百根金条而叛变的。他叛变的最大原因，第一固然是觉得大势已去，应该向共党‘立功投效’;第二可能是由于蒋先生授意‘保存实力’，让共军渡江。共军既渡，戴无处可退，就索性投降了。”

李宗仁回忆录未谈及江阴要塞起义时，已重新出任陆军总司令的顾祝同作何感想，亦未言及国民党高层是否对任用戴戎光事进行过追责。尽管历史已经证明，江阴要塞“通共”情报所云戴戎光“为着五百根金条而叛变”成为“立功投效”者纯属臆测，李宗仁分析“戴戎光叛变”成因也几近笑柄，但从其渡江前意欲从速换马的决心，以及汤恩伯、顾祝同采取的一系列动作看，江阴要塞刀锋行走者确曾命悬一线。起义幸未流产，或许仅仅因为顾祝同是戴戎光上位的保荐人，为自保而矢口否认情报的真实性。

唐秉琳后来回忆，江阴要塞疑案惊动国民党高层，源于江防要地的矛盾和利益纠葛。戴戎光上任时拜访第一绥靖区司令兼江苏省政府主席丁治磐，因受到慢待而引起不满。后汤恩伯将直属国防部的江阴要塞划归第一绥靖区指挥，丁、戴围绕争夺属地港口和地方武装领导权矛盾激化。戴戎光想控制江阴、无锡、常熟等县的自卫队，手握地方官吏任免大权的丁治磐便派一少将衔亲信当江阴县长与戴戎光抗衡。江阴黄田港属要塞管辖范围，因地处南北通道人称“黄金港”，戴戎光在此设立稽查处，派小老婆的妹夫任副处长。江阴县长亦派公安局去黄田港控制，戴不相让，双方围绕管辖和指挥权龃龉不断，相互攻讦愈演愈烈。

江阴市档案史志馆编：《江阴渡江战役史资料选编》（下），第893页。

吴铭回忆，1948年底的一天，唐仲衡拿着刊有“江阴要塞有人通共”消息的《正气日报》给他看，问，我们是不是暴露了？吴铭问该报是什么背景？唐仲衡说是县党部机关报。吴铭冷静分析说，此系江阴县当局敲山震虎之举。如果他们知悉要塞有地下党，为何不一网打尽，反而登报打草惊蛇？这说明敌人并未掌握我们的真凭实据。他对唐仲衡说，保持镇静，注意观察。

江南，李宗仁虎视眈眈关注江阴要塞哗变隐患；江北，中共领导要塞起义工作正“民转军”，由华中工委移交给第三野战军。

（三）人民自有千舟万楫

渡江作战，有兵无船等于无兵。渡江战役是中国历史上继晋灭吴、隋灭陈、宋灭南唐之后，第四次大规模渡江作战，用船之多史无前例。国民党军撤往江南时，把江北沿岸的船抢掠损毁一空。劫后幸存的船，有的藏在港汊苇丛，有的装沙沉入湖底……

找船，成了人民解放军能否如期渡江南进的头等大事。

> 江苏省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编：《渡江战役》，第161—162页，档案出版社1989年4月第1版。
> 江苏省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编：《渡江战役》，第151—153页，档案出版社1989年4月第1版。

革命过江的神圣需求，唤醒了沉睡的战争潜力。1949年2月28日，华中二地委支前司令部决定，第一批动员两千条船，每条载重量五千斤以上，每条船有三四个青壮水手，配齐布篷、桅杆、双桨、双篙、铁锚；第二批动员船只一千八百五十条，要求同前；雇用商船七百五十条。2月底，苏北渡江支前委摸底统计明确，属地堪用船只约二万五千条，一分区交六百条载重五千斤大船运载部队，另交三百条大船运六万石粮食；二分区交载重万斤以上大船五百条，载重五千斤大船一千条；五分区交载重万斤以上大船六百条；长江工委准备熟悉江南情况的船工若干为向导。调出之船一律按规定发给一个月供给，服务时间四个月。

1949年1至5月，苏皖地方政府颁布了《华东支前委员会支援前线奖惩办法》《苏北支前人员奖惩条例》《苏北支前人员优待抚恤暂行办法》《船工家属生活困难补助办法》《船工阵亡优抚条例》《船只损坏赔偿规定》等条例。各级调用民船除给船工伙食费外，还按前后方换工标准付酬，当地政府组织为船工代耕农田；征调商船采用工资制，给予船主家属生活补助；雇用商船按市价八、九折付款；支前牺牲船工评定烈士，残废者按荣誉军人待遇。

刘伯承、张际春致电部队：对于特殊努力及有功绩的船工可给予精神上和特殊的奖励，如以军为单位发给协助解放军渡江光荣证等。“船工负伤应积极组织救护，并送医院加以医治。对渡江中牺牲的船工，除应组织埋葬外，应批发一定粮食（三百斤左右），给予不同程度的临时抚恤，并登记其姓名、邦（帮）口、住址，以便将来通知船工会或当地人民政府作较固定性的抚恤。”

应运而生的政策犹如神奇杠杆，调动千军万马共赴渡江伟业。

2月8日，毛泽东提出，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江北寻船，成了践行工作队使命的第一仗。

第二野战军十一、十二军，4月初抵达桐庐县（今枞阳县），便同当地船舶管委会联袂深入渔村宣传。部队会同桐庐渡江办事处和桐庐船舶工会，从白兔湖、菜子湖、嬉子湖筹船一千零五十二条，动员支前船工二千九百八十一人。第十一军三十三师师长童国贵、政治委员高治国，率部队在玉板洲顺藤摸瓜，从夹江打捞三十多条沉船。第二野战军十六、十七、十八军，在安庆至望江段方圆百里，会同地方干部筹集渔民藏在小湖、河汊的船只三百三十一条。第三野战军二十一、二十四军，在枞阳至刘家渡段和巢湖调查后，与地方组建桐城、庐江、无为船管会，两个月收集一千四百余条船，制造改制了一批专渡汽车、火炮、牲口的船只，一次可运载一万八千余人过江。3月，第二十七军一到江北，便深入驻地附近三个县调查巡检，从小河汊找到和从水底打捞出五百一十五条船。

早春二月，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率军抵达望江华阳镇，即命部队出动五个团，小股多路在百里湖荡搜船，以小部兵力攻打内湖沙洲土顽迫其交船。出乎意料的是，有的旧保甲长和船主帮头也利用其人熟地熟优势，主动帮部队筹船。

船是水乡人民的衣食之源和养家糊口的命根子。一些船主起初对出船支前忧心忡忡，进庙求问凶吉后，一个个喜上眉梢。原来，部队救灾济贫时，有个老和尚得到救助，遂慨叹：“大军仁民爱物，不可不助。”他把签筒里的灵签大部换为吉签，入庙渔民总得上上签或上吉签，以为上苍佑己，情愿把船交部队使用。

到4月5日，第十五军筹船四百四十三条，可载一个师渡江。

陈锡联回忆，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利用旧保甲长和船主动员征集，十天就在铁板洲、大拐附近夹江内征集、修补船只三百三十七条。

>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渡江战役》，第1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

渡江战役发起前，各部队共筹集各型船只九千四百余条，每个第一梯队军，平均拥有大小船只五百余条，一次可运送一万余人，[注]此外，各地还动员一万九千多名船工参战。

就在军地协力就地找船之际，无为县船工却把目光投向了江南。2月，田桥村成立渡江支前中队，当年曾为新四军传递情报的王德金，积极报名参加。他联络本村二十多名渔民，打算夜渡长江，夺回被国民党军掠到南岸的船只。皖西第四军分区通过第二十七军先遣渡江大队，查明了船只藏匿地点。4月上旬某夜，王德金一众船工乘木船、竹筏隐蔽过江，找到村里被抢船只，砍断缆绳驶向江北。时值黎明，江雾迷漫。航渡中，突遇国民党巡防船拦截，有的木船被击毁。渔民抱着破碎的船板漂回北岸。王德金等人共拖回十六条船，受到县渡江支前指挥部通令嘉奖。

华东支前委员会总结统计，苏北筹集渡江船只二千六百条，随军运粮船一千二百条，随军运送弹药船一千一百条，部队渡江前河运船二千三百条，准备机动船八百条，共计约八千条。淮河组织船只二千六百九十八条，临淮关船管所动员组织四百三十三条，共计三千一百三十一条。皖北筹集渡江、河运船只共计一千零三十九条。三处共筹集各型船只二万余条。

各地筹集的三万多条船只，以每条船平均二十五米长计，首尾衔接从西集团部队所在的安庆，到东集团部队所在的靖江，差不多可排一个来回，堪称世界上最壮观的水上方阵！

征集的船都是一张帆、两支橹的“风船”，进退快慢全看老天爷脸色。第十一军党委发动官兵积极开发新动能。铁路工人出身的战士樊端来，在船舷固定轴十字架上安装四块水叶子，船内轴端装一木柄，人坐舱中可摇轮为船加速。经木匠师傅制作，轮式木桨几经改进，船每小时可行十四华里，渡江不到二十分钟。试验成功后，江堤后、内湖旁，斧锯翻飞，人头攒动，经突击改船，小船可安装一对轮式木桨，大船安装两对，过江速度成倍提高。

船工都是“跑码头”的，大都在“帮”，讲究辈分。刘伯承、张际春电示部队，以军为单位，对训练、渡江中做出贡献的船工，“进行适当的物质慰劳（如买肉会餐）”。浪里行舟，酒不离口。秦基伟提出，为调动船工积极性，师团领导可以出面请“大辈分”船工喝酒，请他们“参与军机”，帮助部队出点子训练“水师”。教导员、指导员都要上船和船老大聊家常、交朋友。对船工家属一律给予优待，有贡献的，颁发记功令，挂光荣旗，领导宴请、记者照相。这些暖人心怀的举措，感动了以酒为友、衣襟大敞的江湖汉子，船工猛增至八百人。那些起初嚷着“湖里船上不了江”的船工，也拍着胸脯保证：“不送大军过江，枉在今世为人！”智勇双全的江湖汉子把酒临风，迸发出巨大战斗力。

《陈毅军事文选》，第49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

湖上练兵的船只，怎样驶抵长江起渡点？上海档案馆资料记载，陈毅在丹阳集训时说，为使船从内河驶入长江，有的开了八十里、六十里的运河，十里八里的隧道，把船运到江边，隐蔽在挖好的船坞里，总共花费了一千五百万到二千万个工。[注]

1949年3月12日，无为十五万民工会同第二十七军，日夜轮番作业疏河堵坝。春雨绵绵，柴草精湿，好不容易生着了火做饭，敌机突然临空，只好赶紧灭火散烟。夜间施工不能照明，军民便摸黑挖掘挑土，一次次摔倒，浑身滚得像泥猴。苦干二十多个昼夜，共挖河疏渠二百多华里，开坝、堵坝十九处，抢修公路一百多华里，建好临江坝、神塘河、泥汊等处渡船出江口。

第三野战军二十五军集结在无为姚王庙地区，该军第二二一团疏通杨浦到贾家桥河道时，前挖后塌，进展甚慢。官兵经过摸索，先筑坝排水，再打木桩，将淤泥翻到桩外，效率倍增。木船翻坝，起初搞人海战术前拉后推，一个连一夜仅能翻六条船。后来开“诸葛亮会”想辙，摸索出在坝上开一条丈把宽的口子，地上铺竹片作“轨道”减轻阻力，推船时前面抬高船头，后面用力推船尾，两边平均用力，省力又快捷。翻坝时先过小船，将坝口翻滑，再过大船就容易得多。战役发起前，一个连一夜可翻上百条船。

第二野战军十一军三十一师，起渡点在安庆城东鸭儿沟，可船却在十几里外的石塘湖，通江出口皖河河道早已淤塞。渡船怎样出湖抵江？有人建议，将船由陆地运至江边翻堤入江。据说日俄战争期间，俄军用过这个办法。可要把数百条几百斤重的船抬运十几里，谈何容易！师党委把难题交给部队破解。经优选各种建议，劈开江堤修引河的建议为党委所采纳。4月7日晚，五千多名官兵突击抢修皖河口引河工程。工地上壮士疾走、筐箩齐飞，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中，官兵用铁锹挥落头顶繁星，用汗水擦洗满天朝霞。施工第三天挖出了水，黑乎乎的烂泥足有齐腰深。当地百姓说，这是古长江江底。天下起了麻秆子雨，春冷如刀刮。“同志哥，干脆洗个冷水澡！”战士们脱光衣服，跳进冰凉的泥水中大干。新开掘的引河河壁不断坍塌，官兵将河道剖面挖成上宽下窄的倒梯形，降低河壁压力，上铺自扎的竹篾和草席，以五百七十个木桩固定，泥沙不再滑塌。部队连续奋战十三昼夜，修成一条长五十米，深七点八米，上宽十四米、下宽三点七米的引河。

19日下午，长江水缓缓流入皖河口引河。20日黄昏，官兵从引河两岸拉着纤绳，轻声喊着号子，将一只只木船牵进引河，又逐一滑入毗邻江口的掩蔽部。当天，渡江各部队分别进入枞阳镇至铁板洲、桂家坝至长沙洲、汤家沟至王家套起渡点。

望江县漳湖是第二野战军十六军主要水上训练场，为使渡船由湖入江，官兵昼夜苦干开挖河渠。官兵把稻草和树枝掺在土中堆堤，并用木板支护防止内渠坍塌，四天

挖通两条宽六米、深一点五米、总长二千五百多米的河渠。不同地段渠底有高差，“战士诸葛亮”献计，在渠内筑起十道两米高的挡水坝，分区蓄水保持行船水深，以数十部水车昼夜抽水灌渠，使之与长江入口处保持畅通。为防止敌机轰炸，官兵奋战七个夜晚，挖了三十多个隐蔽船坞，把三百多条船一一翻过堤坝，存于其中。此间，敌机敌舰不断抵近侦察和袭扰，由于巧妙伪装，河渠中的船只安然无恙。

《邓小平年谱》第二卷，第16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1月第1版。

疏河开坝引发水患之忧。4月13日，邓小平为总前委起草致第三野战军七、九兵团党委首长告二野、三野并报中央军委电，要求对疏河、开坝情况进行研究。电报说：“据四分区反映，由于我之翻坝、堵口、开河，已引起群众极大忧虑，一为我已疏通入江河口（如临江坝神塘河等），担心江泛水淹，尤其担心将来堵塞不及，江水决堤，则沿江七县均将被淹没；一为我堵坝口翻坝之处（如凤凰县），因水田日益干涸，我们开坝引江水入田，但又有妨我军行动。其次春耕农忙开始，民工急需复员。为此请你们切实了解，协同地方党委和群众仔细研究下列问题：（一）现我疏河开坝及筑堤填坝之处共有多少？如果要恢复原状，需要多少人工及多少材料？届时地方民力是否够用？还要派多少部队协助？材料有无准备？应如何准备？（二）凡是有危险的地方，要在什么时候以前恢复原状才不致出危险，如果渡江时间延长至4月底，其影响如何，你们拟采取什么补救办法？（三）凡是现在对军事准备已无妨碍或无大妨碍的地方，应以部队力量为主迅速恢复。（四）民工尽可能减少，使之进行生产。这个问题关系数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务请你们专门讨论，指定负责同志专门指导这个工作，并随时报告我们及野战军前委，至要。”

杨刚，著名女报人，抗战时与彭子冈、浦熙修、戈扬并称后方新闻界四大名旦。

上海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上海师院分院马列主义教研室：《陈毅资料选》第116—216页，1979年9月。

1949年6月5日，《大公报》刊载记者杨刚撰写的《就是这样我们过了江——记陈毅将军讲渡江准备》：“有名的翻坝故事就是几万船只由湖港翻入长江的史迹。由湖到江有许多小水流，有时水流不够或流向不便，解放军自己就动手挖小运河。这些水流和长江的水位高低不同，因此必须筑坝以控制水位使之平衡，这样船只才能按计划整队出进。若遇两股水高低太悬殊，解放军水手就得把船背起来，从陆地翻过了坝送到长江去。有时候，他们还要找诸葛亮。军长师长亲自去拜访有经验的水手及水工程师，请他们到军队里来教导在江堤下面打洞，打开几层洞，使船能从洞里入江，而江堤上则过炮兵。所有这些挖运河，筑坝，翻坝，打洞的事都在夜里做，由军长师长和指战员大家动手拿锄头，掏泥土……到了4月10号，这套工作全部完成，渡江有了把握。晚上拿船放到长江去，在长江又每晚演习。等到下令渡江

的时候，长江已经是和北方的公路一样，战士们对它丝毫也不生疏，不觉恐怖了。”[注]

> 泰州市党史方志办公室、泰州市档案馆编：《一切为了胜利——渡江战役泰州支前文献汇编》，第102页。

旋转乾坤的不寻常春天，“陆地行舟”成为江北沿江最抢眼的风景。泰兴县支前总结载：“本县奉命负责疏浚蒋垛以北至黄桥段姜黄河，长约三十余华里。由于该河土质差，是流沙土，过去亦曾开挖过数次，始终未能及时畅通。这次我们亦开通两次，第一次开好了，很快就被淤塞。第二次重新组织力量，很多群众表现特别英勇，冒着大雪，赤膊跳到河心里去挖捞，晚上仍不顾疲劳，打着几百把火把，继续挖河。很多妇女也参加了挑泥组，单梯青区妇女就达到两千几百个工。”[注]台北县（今盐城市大丰区）仅配合第三野战军九兵团疏通河道和开渠，并将船拉过江堤，就动用了四十二万九千民工。苏中沿江如皋、靖江、泰兴、江都和仪征等地，出动五万多青壮劳力疏通内河港口和河汊，为渡江船只打通航道。

历史巨变到来时的春天是喧闹的。成千上万操舟摇橹的船工，还有数不清推车挑担的民工，正以身家性命进行道路选择。前程依然硝烟弥漫，但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人们，已经看见了光明。

（四）“隔江钳白”之一石二鸟1948

年12月12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电：

>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渡江战役》，第35—3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

在全歼黄、邱、李诸敌后，华野、中野两军休整两个月（分为四期，每半月为一期），并大致准备好渡江作战所需诸件（雨衣、货币、炮弹、治疗药品、汽船等）及初步完成政治动员……东北我军协同华北主力于明年一、二两月完成夺取平、津、张、唐任务，三、四两月休整，五月沿平汉南下，六、七两月执行江汉战役，并完成渡江准备工作，八月渡江。[注]

百年半封建、半殖民地历史背景下，蒋介石挟洋自重、倚美翻盘的卖国政策，使中国革命始终笼罩着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阴影。战略擘画即将化为千帆竞发宏图之际，毛泽东殷忧愈深。

这种殷忧自抗战胜利后，即成为中共最大战略关切。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1945.1—1949.2，第85—86页，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第1版。

1945年10月10日，毛泽东从重庆返回延安前，苏联大使馆为他饯行。席间，武官罗申少将对美军空投平津的部队掩护蒋军沿津浦和平汉线北上一事表示担心。毛泽东说，这将是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公开干涉，也是中共担心的一件事。美国人会不会公开与共产党军队作战？苏方说，现在很难说美国人会不会公开干涉中国事务。从国际方面考虑，这样做对他们不利，这样做只会失败。毛泽东又问，如果美国开始出兵共产党占领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苏方建议，妥善调解避免与美发生武装冲突，通过报刊进行反对美国公开干涉中国事务的宣传。毛泽东认为，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扮演了蒋介石推翻中共的常务顾问的角色。[注]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1945.1—1949.2，第122页，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第1版。

1946年初，毛岸英从苏联回国，转达了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良好祝愿。1月7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我们尤其应当对美国亲自插手国共两党间实际问题后所导致的后果有充分的预见。”[注]

二战后期千方百计说服苏联入局中国战场的美国，战后又深恐苏联在东亚势力坐大。为从战略上平衡苏联在旅顺驻军，同时配合蒋介石以遏制中共，美国打着协助国民政府遣返日俘（侨）、训练中国海军和调停国共矛盾的幌子，于1945年9月16日派第七舰队军舰开进国民党控制的青岛。10月1日，美国海军陆战队一千余人在秦皇岛登陆，与前往联络的八路军部队交火并发生激战，随后又以一部开入唐山，与当地国民党政府官员一起，收编伪保安队、“讨伐队”，准其继续守备唐山。10月7日拂晓，美国第七舰队十三艘军舰逼近烟台港，当日下午，美海军中将巴贝尔、少将赛特尔、陆军少将罗克等到烟台市人民政府要求谈判，威胁要强行登陆和划区驻防，被坚决拒绝。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出抗议通电，烟台人民举行抗议集会和示威游行，9日，美国军舰被迫驶离烟台海面。10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六师又在青岛登陆，与此同时，美国海军航空队三个大队进驻北平、青岛。30日，美国增调第三十六特种混合舰队进入青岛，从而使美驻青海军舰船增至三艘航空母舰、四艘巡洋舰、十三艘驱逐舰，美在华海军陆战队增至四千八百五十人。11月12日，美海军陆战队六师两个团七个直属营及宪兵连共二万七千人，由关岛运抵青岛。青岛遂成战后初期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海军基地，也是美国打入东亚的一枚战略楔子。

1946年中国内战爆发，国内反美情绪高涨。1947年初，美国被迫将驻上海、天津的海军陆战队陆续撤出，但青岛却成为例外。华野攻克济南后，一直对是否撤军青岛歧见明显的美国高层，被迫开始统一思想，做出了准备从青岛撤军的艰难决定。

但青岛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战略价值，始终使美国欲罢不能。蒋介石也不惜以困守济南拖住美国海军。1948年11月4日，美国西太平洋海军舰队司令白吉尔中将从青岛到上海，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并无放弃青岛基地之意，即将以军舰运送海军陆战队到上海。这一消息次日经《中央日报》披露，成为强化美国在中国存在和为国民党打气的烟幕弹。同月11日，美国副参谋总长魏德迈，在华盛顿与南京政府代表蒋匀田研究中国战局时说：“现在美国海军尚固守青岛基地，目的即在支持平、津三角地带傅作义的守军，使能牵制中共军队，不能即刻大批南进，盼拖长时间，以便布置防守东南半壁的战略基地。”

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

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

>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8—1949）第14册，第48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5月出版。

但是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注]

2月3日，经毛泽东审修的中共中央电文明确指示：“华野、中野休整至3月底为止，准备4月渡江，5、6两月夺取宁、镇、锡、苏、杭、芜诸城。”“林、罗所部主力应争取于3月中旬完成休整部队、改编傅作义部的任务，出动时间另行酌定。”

统帅部酝酿东野南下战略动向，触发中原“钳白”动议。

>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渡江战役》，第6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

2月4日，邓小平、陈毅致电中共中央：“我们考虑为求渡江作战更加稳妥，且不妨害林、罗休整及改编伪军，建议先抽派林、罗部五个军、六个纵队，计四十万人，目前即开至安阳、新乡休整，提前南下，担任于华野、中野渡江时即行包围汉口，钳制白崇禧使其不敢他调，似更有助于我们渡江和夺取京、沪。”[注]

中野首倡“钳白”，基于对“小诸葛”韬略、计谋、品性的深刻认知，也反映了直出大别山挺进之险、立足之难、取胜之艰。

2月9日，总前委商丘会议认为，应该充分利用蒋介石集团与桂系的矛盾，以二野、三野及其他部队百万大军的优势兵力，突击汤集团，钳制白集团，以强大的震撼力量，使敌军闻风丧胆；并注意应付意外情况的出现，如美国可能的挑衅或武装干涉，这是最稳健的作战方针。会后，总前委五领导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再次建议：“为保障华野、中野行动，建议东北野战军即以三个军约廿万人迅速南下，于3月底运至武汉附近，牵制白崇禧。”

这一建言，是决胜江南之际启动新的合纵连横的先声。

2月11日，毛泽东致电总前委五领导并林彪、聂荣臻等人：“以林、罗一部先行南下一事已告罗荣桓同志并另电通知。”

至此，“隔江钳白”正式进入中央军委决策。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第50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2月12日，毛泽东致电林罗聂，并告刘陈邓：“林、罗先出两个军约十二万人左右，于3月20日以前到达郾城、信阳间地区，于3月底夺信阳、武胜关，4月15日以前夺取花园、孝感地区，迫近汉口，休整待命，钳制白崇禧部不敢向南京增援。”注

解方，时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参谋长。
白，指白崇禧。
《邓小平年谱》第二卷，第161—16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1月第1版。

3月19日，邓小平从西柏坡返回经过徐州时，与刘伯承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并告萧劲光、解方注、中原局，建议四野第十二兵团改变南进兵力部署。电报说：“鉴于敌情变化，我们建议十二兵团应改以主力或一个军出平汉路东（并争取4月7日赶到宣化店、河口之线），以一部或一个军出西侧，如能运用郑州以南铁路输送一部兵力则较快，另以王宏坤指挥之桐柏、江汉部队（现向安陆至天门线扩展中）先期以四野面目出现，以迷惑吸引白注匪为有利。此刻并不怕暴露东野，也不怕信阳之敌先期逃掉。”注

此电中的“东野”“中野”“华野”，当时已分别改编为第四野战军、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

3月20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第四、二野战军电：“东野注先头两个军的任务是协同桐柏、江汉、鄂豫三军区力量钳制白崇禧部，使白部不能向东增援，妨碍

我中野、华野之渡江。”两军“要直迫信阳，沿铁路分两路并行南下，直接威胁并打击白部，并力求迅速行进”，两军“受刘、邓指挥，一切依刘、邓意旨行动”。

《邓小平年谱》第二卷，第161—16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1月第1版。

萧劲光、陈伯钧报告两军行进方向及作战目标，刘伯承、邓小平3月21日致电萧、陈并报中央军委：“同意萧陈解潘关于十二兵团改经平汉路东侧开进作战的方案。请李雪峰即拨配南运郾城两个师的二十列火车，并告豫皖立即准备粮食，修补公路。”[注]

安庆夏威军，指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八绥靖区司令官夏威所指挥的第四十六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渡江战役》，第32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

为实施“隔江钳白”，总前委和二野走了三步棋：一是2月初，王宏坤率桐柏、江汉军区部队至武汉、沙市、宜昌之间，吸引白崇禧集团西顾，减轻第二野战军主力正面压力。二是陈赓第四兵团向南开进，有意绕道麻城，打跑白崇禧第七军部队，攻占麻城并停留一周，派小部队实施佯动，放风准备打九江。刘伯承致电西柏坡：“四兵团在麻城的战斗，使白崇禧误认为我将出团风渡江抄袭武汉（随后又有我十二兵团直迫信阳南下），而将安庆夏威军[注]之主力西调于九江、武穴，便利了我们渡江战斗。”[注]三是电请中央军委批准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迅速南下，对白崇禧形成强大压力；待第二野战军右翼安全确有保障后，陈赓四兵团再按计划开往指定地点。

胜兵先胜而后求战。“隔江钳白”致白崇禧部误动减轻西线正面压力，加剧蒋桂猜忌，使白在我渡江时不能东顾；三大战略军团强强联手，使防美武装干预战略更为稳妥，一石二鸟布局提升了战略的边际效应，从而将渡江南进置于更为坚实宽广的战略基点之上。

1949年春，长江北岸成了战术家奇韬良谋竞相绽放的百花园。遍地开花的战术创新，赋予古老的木船风帆新的智慧。有近水楼台之利的西集团部队，先行学习消化刘伯承渡江战术六条指示，第六条所列十个要点切实之准，令一线指挥员击节赞叹：

《刘伯承军事文选》，第442—44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因长江及其两岸地形经常变迁，故不能专靠地图，必须实地侦察，进行判断，而善于利用之。（一）江幅狭窄部容易漕渡，且便于我岸的火力掩护，但一般流速大。（二）江幅过宽，则与上项相反。如江中有浅底，特别是有错综罗列的江洲，则敌

人舰队受到一定航路的限制，易遭我炮击，故只能以小艇游击。这些江洲我应分别夺取之，而以火力互相掩护，逐步跃渡长江，或仅据江洲作为掩护渡江的阵地。（三）江身弯曲部向我岸鼓出者，可以组织交叉火力，掩护渡江。（四）南岸常有淤泥，特别在敌短兵火力下不易登岸，这要我们善于组织战斗，并铺上芦苇或木板通过之。（五）南岸湖沼限制我登陆机动，我只能用之作为掩护阵地。我在登陆后，必须向无障碍地带机动。（六）如登陆处急峻，则先头部队须带绳子、梯子攀登之，尔后即修筑码头与通路。（七）当我占领南岸掩护阵地时，我炮兵应先以一部转移到南岸阵地，支援部队向前进展，压制坦克活动，拦阻敌人逆袭；或炮击敌舰，掩护渡江。此时两岸的对空射击，应能确实掩护渡江。（八）各路渡江军队应以宽正面而有重点地（对敌弱点）同时渡江。一达南岸，即控制要点，首先以足够兵力横扫敌人，扩大突破地段，接应友邻登陆，其主力接着（即主要地）放胆向指定地点透入挺进，贯穿敌人纵深，截敌退路而兜歼之。不可为途中残敌（或掩护队）所抑留。这些残敌，只能由后梯队派一部兵力肃清或封锁之。各部队在挺进攻击中，应有伴随炮兵并大量发扬飞雷与爆炸的威力。（九）我军一达南岸，应向主要方向派出先遣支队，察明敌人纵深部署与我军前进道路之状况，最好以工兵带器材附于该支队，扫除地雷与修复道路。（十）在渡江作战向江南进军中，对敌人的政治攻势必须与战斗密切配合实施。[注]

西集团部队捷足先登研读刘伯承编译的《论苏军对筑城地带的突破》一书，不啻是喜获一场及时雨。深谙用兵之道的刘伯承，对蒋军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的分析透辟而精到：

《刘伯承军事文选》，第446—44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蒋介石长江防御的前进配备，大而言之，即其在黄河、长江之间的防御；小而言之，即其经常叫嚣的“守江必固淮”。这些都因淮海战役基干兵力的丧失而无法实施。其后退配备，也因兵力少，江面宽，与南岸交通困难而不能作。如此，他就不能不着重于“直接配备”，但还是因兵力少而不容易作了……在长江向北岸鼓出的突出部，如汉口、浦口等要点，也各只有两个基干军的机动兵力，遂使这样漫长的江防，成为一条不能动弹的“死蛇阵”，任人横斩。如其一处被斩断，则全线震撼。江防舰队在北岸没有掩护、航线极受限制的条件之下，到处易遭短兵炮火的袭击，也不易起撞沉木船的作用。[注]

《刘伯承军事文选》，第446—44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刘伯承紧紧抓住“死蛇阵”提出破敌之策：“必须善于搜集船只；善于组织部队作战斗渡江的演习；善于侦察南岸敌人的防御配备，进行精细的研究，力求在宽大正面同时渡江的情况之下，针对敌人的弱点作出重点突击的部署；善于组织集中的炮火以支援渡江的步兵，使其不遭到敌人舰队、炮兵和坦克的阻碍。”[注]

毛泽东说，刘伯承是我军的军事理论家。

蒋介石说，论战术之奇，刘伯承属中国军界一绝。

美国人杰米·卡洛奇认为：“二十世纪全世界出现了六个伟大的军事家，中国的刘伯承是其中最神奇的一个。”

日本人阿布秀山说：“谁拥有刘伯承这样卓越的将领，谁就必定是战场上的胜利者。”

战争是敌对双方在一定客观物质基础上，指挥员主观能动指导能力的竞赛。战前筹兵，粟裕和张震的关注点，在指挥东集团第八、十兵团渡江后，怎样与中集团第七、九兵团东西对进、迅速会合，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使命，实现收京入沪战略目标上。

抗日战争以来，粟裕曾率部在日伪和国民党军眼皮底下三渡长江。1940年7月8日，粟裕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机关及第二团、新六团近两千人，从扬中乘木船漂流偷渡过江，与新四军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会合；1944年9月27日，为配合盟军反攻，粟裕指挥苏浙军区部队兵分两路渡江，亲率西路第七团和干部团在仪征、东沟间过江；1945年10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撤出江南八个解放区决定，粟裕率苏浙军区部队及地方干部六万五千人分批渡江北上。时近九年，长江见证了中国革命惊人的发展。前三次渡江，粟裕所率兵力分别为不足两千、两万、七万。而此次渡江，粟裕直接指挥东集团三十五万大军，中集团三十万大军过江后也归他和张震指挥，这使粟裕深感肩头责任的分量。

在投鞭江汉、运筹南渡之际，粟裕被作战地图上那个漂亮的蛾眉月吸引住了，这是长江芜湖至江阴段向北弯曲的以南京为顶端的大弧形。万里长江奔腾入海前最后的潇洒与飘逸，也是战术家巧为运筹的天赐平台和历史机遇。这个正三角形的两个斜边，既为东、中两大突击集团东西对进提供了绝佳“弓弦”，又可与预置“蛾眉月”中江阴要塞的情报人员里应外合。

长江东线战场是敌重兵据守之地。第三野战军前委研究作战部署，聚焦如何根据长江芜湖到江阴向北突出的“弓”形地段，组织对敌实施钳形突击摆兵布阵。粟裕决以第二十、二十六、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军，分别在扬州、仪征、六合、江浦、和县地段，公开以宽大正面进行佯动攻势，迷惑和钳制镇江、南京、芜湖地区守敌，将敌吸到“弓背”上来，促敌主力西移芜湖一线，利于东、西两线后续渡江突破。中集团主力则秘密准备突袭繁昌至铜陵地段，第十兵团准备隐蔽强攻江阴地段，力求在渡江当夜分别南渡三至四个军大部，楔入敌之纵深，迅速在“弓弦”两端形成两大对进集团，达成割裂包围芜湖、南京、镇江地区守敌态势。陈毅粟裕再三强调，在战役准备上，既要力争实现渡江后敌即全线崩溃的有利局面，更要从最

困难处着手，特别要准备在京沪线上打一场恶仗，指示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须随第一梯队渡江，以便直接掌握战场情况，实施靠前指挥，及时处置战事。

东集团第一梯队三个军进抵江边，叶飞即要求第二十三军组织渡江先锋部队，渡江时以最快速度抵岸，以利后续部队登陆。陶勇径赴靖江第六十九师二〇七团驻地，宣布该团为军渡江先锋团。

怎样才能快速冲破敌轰炸区率先抵岸？团长杨绍良和政治委员佘景行组织官兵献计献策，确定官兵人手一篙帮助撑船以加快行船速度。船工老王运来一大捆晒衣竿，分给几个连队实验，效果明显。老王说，起渡时，时间都耽误在解缆、起锚、掉转船头和升帆上。如果出击前所有船只不系缆、不抛锚，把帆拉到一半，命令一下就满帆放船，可节省一大半时间。团里第二天晚上便依计组织部队出港演练，获得成功。“半帆待渡”战术诞生了！这一创新，成为第二十三军渡江快速突击上陆的重要战术基础，也是第二〇七团成为当之无愧“渡江先锋突击团”的关键一招。

前所未有的战略决战，呼唤着前所未有的战术创新。

第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研讨中明确了登陆点“六选原则”：一是选敌岸弯向我方突出部，使我突击部队不受敌两侧火力杀伤；二是选便于靠岸、登陆地点，可以展开兵力，防止延误战机；三是选敌布防弱点，利于迅速楔入，向纵深发展；四是选敌两支部队接合部，使敌人难以协调；五是选敌守备重点之侧翼，以利于迂回包围，错乱其指挥；六是选可作依托之点，变我军背水攻击为有依托攻击，变敌为有依托守备为无依托溃逃。经比较，渡江队形取一字队形，这种宽正面、多箭头的进攻队形，既能分散敌之兵力、火力，又能使我军形成雄厚的突击力量，登陆后能迅速控制较大范围前沿阵地，掩护后续部队不间断地投入战斗。

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提出，要偷渡、强渡两手准备，巧妙结合；船舶渡江队形要“一”字形展开，并注意保持适当航速；登陆位置应选择在敌人防御薄弱或易于我出奇制胜的地方；第一梯队在进行登陆作战时，应注意把智、勇、快很好地结合起来……

第二野战军攻占铁板洲后确定，渡江以五只船为一小组，四小组为一排，四排为一连，四连为一营，两营为一团，减少营团单位，干部重点配在连以下。编组照顾到原有单位，配备熟悉部队的干部，以利指挥。巢湖船只编制以五六只船为一小队，三小队为一分队，以分队为单位成立中队，按船大小配足三至八名水手。

第十二军为保证部队航渡中建制完整并便于指挥，以轻便小船配给突击连排，以较大船只装载火炮、机枪组成火力船。船队出夹江后，各级相继展开，连排成前、后三角，营成梯次，团成后三角队形，各级火力船位于翼侧。这样布阵既能发扬火力，又便于指挥；既能保持强大突击力量，又能避免队形密集增大伤亡。

吴东峰：《秦基伟勤思善学》，《作家文摘》2022年11月1日第3版，摘自《同舟共进》2022年第10期。

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打从淮海战场双堆集缴获国民党军的一本《孙子兵法》后，便常于躲避敌机轰炸时蹲在战壕边的坑里读上几页。当时，师长向守志到纵队开会，看到司令员在敌机轰炸中聚精会神读《孙子兵法》，不禁肃然起敬。备战渡江间隙，秦军长又孜孜不倦读《孙子兵法》，并借助书中关于敌我、进退、攻守、利危、治乱、勇怯、虚实、奇正等矛盾关系的辩证阐述，加深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解，并把学习心得写进日记。1949年1月1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孙子的‘正奇’法，即是阵地战及袭击、包围、迂回、侧击、阻击等各种不同情况下的适合用当时敌我力量条件所采取的作战方法和手段”，“确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注]经综合分析，秦基伟认为，大船载人多，可构工事，有篷可借风力，靠岸后突击力量大，但较笨重，无风划动吃力；小船被弹面小，比较灵活，便于靠岸和多路突击，少数船只战损无碍大局，但水上控制难。为避免大小船混编带来的船速不一、队形易混乱等问题，执行同类任务的部队应尽量用一种船。经试验决定，一梯队营多用小船，二梯队营多用大船。各船直奔登陆目标，所有船只都向前出者看齐，自然形成三角或梯次队形。在此基础上，秦基伟还总结归纳了六条战术原则：（一）应充分估计江水流速、风向、风速对编队的影响，正确选择进攻出发地位，指定明显目标，精确计算时间，以达出敌意外、趋利避害之目的；（二）偷袭强攻相结合，船只应增橹加桨，轻装疾进，争取偷渡过中流，越靠近敌岸越要加快速度；（三）树立以船为战斗单位、船自为战思想，有进无退，勇猛登陆，登陆后不作任何集结停留，向心突击；（四）战斗中船只遇难由救生船处理，余船应置于不顾，超越前进，不同建制分队上路后自动听从友邻上级指挥，主动协同，逐步靠拢；（五）分队不设指挥船，干部分乘战斗船只，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每船应配曲射、自动火器和爆破器材，至少十五人以上，以保证能成为独立的战斗群；（六）炮兵贯彻集中使用原则，以三分之二力量摧毁我预定登陆地段敌之主要支撑点，三分之一行全面压制，以隐蔽我之主要突击方向，保障突击队水上运动。

“隔江钳白”犹如神奇的定身术，使素称足智多谋的“小诸葛”白崇禧动弹不得，西集团直击南岸可无后顾之忧。而指挥员对地形地物、航渡器材、人员编成、火器配伍的科学统筹和战术创新，则使原始的千舟万楫焕发出远胜自身承载力的巨大能量。

（五）皖南来了“过江虎”

入夜，狂风裹着暴雨兜头袭来，滚滚长江混沌一片。长江北岸，无为县泥汊镇保安行政村上坝自然村，第二十七军第七十九师侦察英雄齐进虎率一支七人侦察小分队，驾起一叶轻舟，撕开茫茫雨幕，悄无声息向江心岛黑沙洲驶去。

2月底，在无为临江坝举行的第二十七军党委会上，副军长兼参谋长贺敏学建议，组织部队先期渡江实施侦察。但党委一班人认为，此举太过冒险。虽经贺敏学坚持，此议亦未获通过。

贺敏学是毛泽东前妻贺子珍的大哥，与胞妹贺子珍、贺怡并称“永新三贺”。他想越级向上直至中央军委直陈己见，但为军党委团结计未付诸实施。那几天，他时常望着江中的黑沙洲出神。

黑沙洲横亘荻港以东、芜湖以西江面，像一只蹲在水上的蒙面巨兽，扼控第二十七军渡江突破地段要冲，是必争必夺之地。成建制南渡侦察风险大，派精干力量潜入只有一半水路的黑沙洲，不是胜算更大吗？贺敏学将任务赋予正在巢湖水上练兵的第七十九师。师长肖镜海当即点了师侦察队副队长齐进虎的将。

齐进虎是赫赫有名的侦察英雄，孟良崮战役前率三名侦察兵捕获整编第七十四师第五十一旅一作战股长，缴获该师兵力部署图和作战计划，帮助首长定下正确战役决心，荣立一等功。济南战役中，齐进虎率部九次出击设伏，捕获六名敌俘取得重要情报，全班荣立集体一等功，被命名为“齐进虎班”，齐进虎荣立二等功。

齐进虎率六名侦察兵登上黑沙洲，打算捉个“舌头”即返回。可登岛连个人影也没见着。他派两人看船、两人放哨，带着宋协义和王林芳向敌阵地摸去。三人前行约二百米，发现一个地堡正要钻入，身后却“叭叭”响起枪声。齐进虎情知有变，带两名侦察员扭头就向江边跑，不料“扑通”一声，黑暗中撞倒了一个人。

“老宋，快起来！”齐进虎以为撞倒了宋协义，压低嗓门喊道。

“浑蛋！连你们连长都不认识了？共军已过江，赶快支援！”

“是！”齐进虎急中生智答道，“连长有令，快去江边！”

三人赶到江边，小船却不见了！循着曳光弹划出的弹道，隐约可见四名战友已至夹江中线。尚未实施侦察就断了退路，齐进虎冷静分析，敌人见船驶回江北，肯定认为偷渡者已无功而返，反倒给自己留岛侦察创造了条件。他发现，东北方有微弱灯光，判断守敌不敢分散居住，那里应是一处孤立民居。三人抵近观察，试探着敲开房门，迎接他们的是一双惊魂未定的老夫妇。

“大伯，大妈！我们是解放军，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啊！”齐进虎见老人面露喜色，告知为消灭国民党，急需藏身以侦察敌情。

老夫妇同意侦察兵藏身家中，还给他们烧水做饭。三人昼伏夜出，看遍岛上防御工事并摸清敌兵力部署，还沿电话线找到指挥所，天天晚上去听敌人打电话获取情报。不料敌人为防江北渗透，把岛上群众悉数赶往南岸。失去隐身的“青纱帐”，

三名侦察兵白天藏身麦地，靠吃油菜苔充饥，夜间出动补充侦察。眼看任务已完成，可敌人对船控制很紧，到哪里去找北返航渡器材？

也是机缘巧合，夜暗时分，齐进虎等人走进茅屋，摸到一只木盆。水乡百姓不是常坐木盆下湖采菱角吗？受此启发，特别党小组会做出一个非常决定，乘坐采菱角的木盆冒险渡江！三人连夜抬着木盆到池塘练习，不料一进木盆，就底朝天被扣在水中。练了三个晚上，掌握了木盆平衡和划行技术，还备齐了划水木板。

不觉登岛已八天。是夜，长江刮起东南风。齐进虎三人携木盆急赴江边，忽听身后响起凌乱枪声，一队国民党兵飞奔江边而来。蛰伏苇丛的齐进虎判断，敌漫无目标射击，既为壮胆，也为震慑和驱赶可能的潜入者。果然，敌在江边咋呼了一阵子折回。

江风渐炽。三人挤进木盆舒臂轻划，小盆推开幽暗江水驶进夹江。这怕是木盆问世后承载过的最光荣的使命了。波涌浪翻，木盆犹如浩浩大江中的一片树叶。处险不惊的侦察兵却心生自豪。激流飞叶满载的希望，将给战马嘶吻的江北带来几多惊喜？

也许是黑沙洲之行太令人难忘，齐进虎离岛时，顺手从地里薅了一把韭菜，拔了两棵青菜。北返翌日，军长聂凤智来师检查渡江准备。吃中午饭时，看见桌上那盘黄绿分明的韭菜炒鸡蛋，还有江北没见过的时鲜青菜，忙问：“这菜是哪儿来的？”“是侦察兵从黑沙洲上带回来的！”聂凤智急忙把齐金虎等人喊来，详细询问他们登岛侦察情况，惊叹之余赞不绝口，继而陷入沉思。

不几天，临江坝人发现，一个与他们装束无异、年约三十五六岁的精壮汉子，牵一头弯角犀利、肚子滚圆的大水牛在江滩放牛。眼尖者早已看出，这个娴熟的牛把式不是别人，正是第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聂凤智是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五岁即开始放牛，使唤牲口像操枪一样利索。他以水牛作掩护抵近江边，眼睛不时向南岸敌阵地张望，脑子里却思谋着渡江侦察大计。

自从吃了黑沙洲上的新鲜菜蔬，聂凤智转而支持贺敏学组织侦察兵小群多路南渡侦察。虽然偶有马失前蹄、翻船落水者，但十次渡江侦察八次成功，其中军侦察营二连班长张云鹏带人渡江捕俘，捉回一名敌军官。实地侦察基本搞清了对面江防之敌兵力分布、工事构筑、地形特点和涨落潮规律等情况，对确定登陆点和有效实施炮火准备很有价值。恰好上级相继下达指示，主力渡江之前，派一支部队先遣渡江。军党委决定，利用前期小群多路侦察经验，调集精兵强将先遣渡江。经九兵团、三野、总前委、中央军委批准，军组成先遣渡江大队，直抵南岸实施战役侦察。

先遣渡江大队由军侦察营一、二连和各师抽调的三个侦察班组成，第八十一师第二四二团参谋长章尘任大队长、临时党委书记，军侦察科科长慕思荣任副大队长、临

时党委副书记。

先遣渡江准备，敌前侦察和捕俘是关键一招。二连三班勇士，雨夜南渡抓回两个为敌军守夜的更夫。3月13日，二连三、六、八班三箭齐发，趁雨雾分别驾船登上南岸和黑沙洲。三班长张云鹏带全班登上南岸后，搭人梯爬上悬崖，毙敌一人，俘敌一名排长。六班再次出击黑沙洲，捕回敌班长以下六人。八班从南岸抓回一名上士班长。三个班同时捕俘成功，先遣侦察大队军心大振。军首长特予嘉奖，张云鹏荣记特等功，其他人也分别立功。

战、技术训练重点是游泳，练习划船操舟，熟悉组织航渡、登陆突破，精练射击、游泳、救护等技术。对渡江战斗可能遇到的难题，以及船只伪装、航行队形、通信联络等问题，先遣渡江大队发扬军事民主，逐一研讨演练，统一战术思想。官兵三分之二穿国民党士兵服装，三分之一着便衣。军为大队抽调三十多条小船，还有一批素质较高的水手，选派了船工并落实优抚政策，准备了向导、银圆、干粮，还配备了一部电台和两名机要干部。

4月6日晚八时，军首长下达实施先遣渡江战斗命令。章尘、车仁顺率大队机关及二连一百八十多人，从叶家墩东南鲤鱼套分四组同时起渡；慕思荣、刘浩生率一连和各师侦察分队一百四十多人，从无为江心洲北江村南洲头起渡。

章尘、车仁顺一路隐蔽航行，近南岸时惊动守敌，引来密集火力。章尘下令：“全速前进，强行登陆！”坐在船舷的战士抄起木桨和铁锹全力划水，坐在船尾的战士自动为船老大砌起人墙，告诉他“只管划，我们给你挡子弹！”船队冲破浪涌，加速驶向南岸，于晚八时五十分在繁昌十里场登陆。侦察兵迅速抢占江堤，激战二十分钟打垮守敌。三班抢滩时，船为江边木桩所阻，班长张云鹏下令弃船泅水，带头跳入水中，不幸中弹牺牲。当晚，章尘率队连续行军三十多公里，清晨抵达狮子山进驻山顶清凉寺。

慕思荣、刘浩生所率船队在江心被敌发现，遂变偷渡为强渡。五班船只被击沉，九名战士牺牲，其余船只冲破弹雨抵达陡峭如壁的南岸。晚十时二十五分，侦察兵搭人梯攀上悬崖，在北埂王东侧北埂崖至金家渡登陆。敌人从地堡中蜂拥而出，侦察兵抄起轻机枪猛烈扫射并密集抛投手榴弹，逆袭之敌被消灭殆尽，小分队抢占南岸头道堤坝。经查验，部分人员落水或被冲散。指挥员决心不变，率队一路南行，几经周折到达叶山脚下的迪龙冲胡家村。十三名失散和四名泅水登陆官兵，也相继找到部队。

古柏参天的狮子山清凉寺，和尚们正打坐念经。章尘率队抵达寺庙外，征得主持同意在此歇脚，即向军部发电报告登陆情况和所在位置，部署警戒封锁消息，对上山打柴挖笋群众放进不放出，安排专人对其做好解释工作，同时组织连排干部勘察地形。

根据掌握的情报，在距狮子山四公里的黄泞镇，驻有国民党军一个团，周围还有个保安团，各村建有谍报网。从敌台广播中，已听到“昨夜挫败共军登陆企图，取得重大胜利”的报道。显然，登陆部队已暴露在敌人鼻子底下。要站稳脚跟，尽快展开对敌侦察，必须突出重围，与皖南沿江支队和铜、繁游击队取得联系。

“报告！”带哨班长领来一位农民。章尘接过农民手中名片，只见正面印着繁昌县保安团少校营长职衔，反面写有：“贵部是何部？往何处去？请奉告。”这时，哨兵又报告：“东、西、北三面山头均发现敌人！”事不宜迟，紧急党委会随即召开。会议研究确定，在敌人还不摸实情之前，避免与其发生正面冲突，以假乱真拖延时间，让战士们吃饱睡好，天一黑，就是我们的天下。

章尘安排写得一手好行书的测绘员，给繁昌县保安团营长写回信，声称“我们是八十八军一四九师师部搜索队，前往某山区执行特别任务，不便奉告”。在“搜索队队长某某某”的落款下面，盖有二连副指导员徐万里酷似官印的大字篆体名章。

信使携信下山后，部署在山腰山门外的排哨，身穿国军军服，故意横着枪晃来晃去。周边山头上的敌人疑信参半，但又不敢轻易冒犯这支有来头的“正规军”，不时喊话试探，哨兵则以难懂的四川方言应对。部队乘机抓紧休息。磨蹭到下午两点多钟，战士们起床吃饭后，章尘与车仁顺决定留下二排与敌纠缠，其他人从南隘口暗度陈仓，并安排狮子山对面村子群众烧水做饭，以炊烟造成部队在此宿营假象。天黑后，部队直插第二个会合点。

4月7日晚十时许，章尘率部抵达南陵县牧家亭东南三华里塌里牧村，慕思荣也率一连赶到该县金塘岭和新塘冲村。三村毗连，两支队伍很快在塌里牧村会师。大队临时党委决定，继续隐蔽意图，保存有生力量，迎接大军过江，按预定方案与皖南沿江支队和铜、繁游击队取得联系，在新四军战斗过的南陵、铜陵、繁昌三县交界地区实施侦察。会后分头组织实施，把向导分为联络、宣传、借粮三个组展开工作，给军部发电汇报部队状况、所处环境和下步计划，对主力渡江需注意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4月8日晚，先遣渡江大队转移至铜陵、南陵之间的张家山。10日一早，章尘派向导何道纯给刘参谋和三名侦察员带路，当日在戴公山找到女地下党员罗玉英和南繁芜游击总队的叶显金，见到了繁昌县委代理书记王佐和游击总队总队长杨鹏。当晚，先遣渡江大队领导与他们见了面。双方商定，即派南繁芜游击总队参谋、繁昌江边游击小组负责人毛和贵赶回荻港、旧县，迅速搞清那一带的河流、水深和敌布防情况，向县委汇报后，通过大队电台报告江北；派南陵工山区负责人叶明山带叶显金等人，随向导何道纯和刘参谋及一名侦察员冒雨出发，连夜赶往老庙。

连日征战，部队已很疲乏，章尘本打算夜宿张家山，不料发现有人偷偷出村。他判断，这很可能是敌谍报员，遂率队冒雨急行军，11日凌晨赶到老庙。位于戴公山麓

的这处和尚庙，进出只有一条路，利于部队隐蔽。向导何道纯赶来后，大队与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取得联系，先遣渡江大队在江南站稳了脚跟。

布置好警戒后，战士抱来柴草正要休息，哨兵忽报发现敌人。地下党通报，今天拂晓，繁昌、南陵两县保安团各一个营及桂镇等四乡地方武装，包围张家山扑空后，搜山至老庙附近发现部队行踪。南陵县保安团已占领老庙西北山头，控制了进出道路。

章尘、慕思荣急令连长高锦堂带二连三排隐蔽接敌，乘其立足未稳夺回高地。三排沿山沟快速接敌，冲至山顶下距敌百米远时，被猛烈火力所阻。高连长采纳战士张桂芝建议，原地不动避敌锋芒，迂回引开敌火力，正面突袭夺取高地。八、九两班受命侧翼佯攻吸引敌火力，七班悄悄逼近敌人，在四五十米处突然一齐开火，八、九班乘机发起猛攻，一举占领山头，与东、西、北三面之敌形成对峙。先遣渡江大队决心坚持到天黑突围，向军部发电报告被敌包围发生激战情况及夜间突围计划。军部回电指示，由于国共正举行和谈，主力部队渡江时间推迟，大队向南转移，待命行动。入夜，敌人不敢久留，悄悄撤走。先遣渡江大队冒雨急行军一夜，于12日凌晨到达南陵与泾县交界的紫元汤。

从侦获情报看，紫元汤周围敌情严重：驻章家渡保安第十三旅正在陈塘冲一带抢粮，马村驻有敌第一九二师一个团。部队隐蔽于紫峰山密林，派出便衣监视敌人。工山区负责人叶明山派可靠群众找到南陵县委委员王克祥，由他介绍当地情况，动员群众给部队做饭，还派出基本群众监视敌人动向。下午三时许，先遣渡江大队接报，保安第十三旅午后开始撤回章家渡。部队分头下山进入紫元汤一带集结，黄昏时到达陈塘冲里庄村，见到了南陵县委书记陈作霖和沿江支队支队长陈洪和。随后，沿江工委书记、沿江支队政治委员孙宗溶和副支队长李友白，率支队主力前来接应。

子弟兵重返皖南，消息不胫而走。当年的新四军回来了！陈塘冲一带群众纷纷腾房让屋、送粮送饭，妇女们两三天赶做了上百双军鞋。先遣渡江大队给养充足，在沿江支队配合下抓紧展开敌后侦察活动，情报源源不断传往江北。侦察连唯一一名大学生测绘员于建民，带侦察兵实地测绘出敌军江南布防图。侦察连派水性好的通信员马玉森，保护“华东三级人民英雄”肖玉林渡江送图。令人痛惜的是，肖玉林尚未渡江，即被敌发现，中弹牺牲。

4月18日，军部电示，大军定于20日渡江，赋予先遣渡江大队攻占龙门山、马鞍山，破坏敌通信联络，打乱敌指挥，策应主力部队渡江任务，并赋予沿江地下党和游击队三项任务：一、20日晚十时三十分前，做好迎接大军渡江各项准备；二、20日晚八时切断敌电话线；三、在敌占领点放火给炮兵指示射击目标。

先遣渡江侦察大队接命即与沿江支队负责人商定，沿江支队主力在泾县、南陵一线接应大军渡江堵击逃敌，先遣渡江大队开往江边策应渡江。当日黄昏，先遣渡江大队急行军九十里，19日拂晓到达张家山；当晚又疾进八十余里，于20日凌晨移至黄连山板石岭，与南繁芜游击总队会合。双方确定，二连附一连一个排，主攻龙门山或马鞍山一个点，得手后以一部火力扼守，大部向石板冲发展，策应我第八十师方向渡江部队；一连（欠一个排）对铁矿山、寨山、荻港方向实行积极钳制佯动，策应我第八十师方向渡江部队；原第七十九师侦察连一个班插入横山桥、旧县间，负责破坏敌三一三师通向各团的电话线，进行袭扰，并突至江边迎接第七十九师；原第八十一师侦察连一个班插到繁昌四周活动，负责破坏敌八十八军军部通向各师之电话线，实行袭扰，并监视南、繁间纵深情况之变化；游击总队负责破坏一切交通要道之干线。

曾在黑沙洲大显神威的齐进虎，未参加先遣渡江大队侦察行动。1950年10月，他随部队入朝参战，光荣牺牲，所遗《黑沙洲上八昼夜》一文，成为研究渡江战役弥足珍贵的史料。那只功勋卓著的木盆入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成为国家一级文物。

先遣渡江侦察大队驰骋江南大显神威之际，第二十军在军参谋长廖振国指挥下，组织了一支八百余人的渡江侦察支队，在苏北第二军分区和该区江南工委配合下，查明扬中以东沙头嘴至龙稍港段四十公里敌情、工事、兵力部署，获取了大量重要情报。

（六）血战西梁山

万里长江滚滚东流，在芜湖陡然转呈南北走向。城北东、西梁山跨江对峙，人称天门山。天门山亦属长江中下游江面最窄处，宽仅二华里余。两山夹一江，天造地设的芜湖要塞素为南京重要屏障。江中依次分布三个沙洲，成为跨越长江天堑的天然跳板。江东西梁山海拔八十八米，为长江北岸最后之制高点。《史记》所载吴伐楚“长岸之战”即在此山；洪秀全太平军亦在此鏖战湘军。

西梁山锁钥长江的特殊位置，决定了攻取此山即可切断南京的水上大动脉；丢失此山就意味着过往舰船必受对方火炮瞰制。正因为西梁山为江北十七处桥头堡龙头老大，渡江战役前夕，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在守军第六十六军军长罗贤达陪同下，再度登山视察，部署加强陆海空军立体火力配备及综合防务。

1949年3月17日，陈毅、粟裕、谭震林、张震联署发出《攻占浦口炮击南京和肃清江北桥头堡的作战部署》，明确“九兵团负责攻歼金河口、驻马河口、西梁山、裕溪口、刘家渡之敌”。

30日，三野发电明确，各兵团“4月2日后自行选择（清除）江北岸我必须拔除之敌桥头堡（妨碍我之翻坝开河渡口据点或主渡入江渡口据点），其具体时间由各兵团依情决定之”。

4月初，九兵团将攻打西梁山任务赋予第三十军。军党委决定，由第九十师担任拔除西梁山据点任务，副军长饶守坤靠前指挥。

饶守坤是上饶德兴人，1932年参加红军，曾任闽东北军分区司令员、新四军团长、苏中军区独立旅旅长、华野六纵十八师师长等职。4月3日，饶守坤带第九十师指挥组抵天门山一带侦察，查明国民党第六十六军第十三师第三十七团防守东梁山，第三十九团防守陈桥江心洲，第三十八团一个加强营防守西梁山，指挥所设在临江悬崖中部洞窟，系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吴伐楚于“长岸”（西梁山）修建与主峰相通古栈道时所留。

现地侦察发现，西梁山东、南、北三面都是壁立江面的垂直悬崖，人员无法攀登，与陆地联通的西面山坡是上下山唯一通道，山顶到山腰环山筑四道防御工事并形成四层火力网。从主峰伸向山脚的小陀山、大陀山是敌重点防御阵地，上下通道遍筑明碉暗堡，山间密布地雷、鹿砦，山底深沟陡壁插满毒竹扦。山脚前青石街警戒阵地配置一个加强排。两山一洲三地均配属炮兵群，既可独立防守，又可相互支援，形成稳固的三角防御阵地。桂永清还命雄鹰、美援、安东、营口号

等军舰配合守军作战，战时可派飞机支援。西梁山易守难攻，是江北诸桥头堡中最难拔除者。

饶守坤与师长朱国华、政治委员郑友生商定，在清除青石街警戒阵地同时，兵分两路，以第二六九团为主攻，从西梁山西面右侧实施主要突击，三营、一营攻占大、小陀山后，直取西梁山主峰；第二六八团为助攻，从西梁山北首和东北发起攻击，配合主攻团夺取大陀山，并监视东梁山守敌。第二七〇团为师预备队。

4月7日黄昏，部队进入预定进攻出发阵地。第二六九团组织连排干部看地形突遭敌炮击，团长于东海身负重伤。第九十师被迫临阵换将，由第二六九团作战科科长朱士超代理该团团长。

8日拂晓，攻击开始。第二六九团一营二连直取青石街警戒阵地，被敌重机枪阻于河沟。副连长林家帮涉河炸地堡英勇牺牲。经激战，二连一度夺占青石街。敌在瞰制火力支援下进行反扑，二连连长祝士元身负重伤，仍指挥打退敌三次进攻。

第二六九团三营、一营左右分进开辟通路。三营七连班长沈沉排除二十多颗地雷并做好路标。部队迅即发起猛攻，三营歼敌一个连，俘敌三十余人，夺取大陀山敌部分阵地，并向小陀山攻击前进。盘踞主峰之敌自上而下驰援小陀山，敌我在夜暗中展开白刃格斗，三营血战四十分钟，打退增援之敌。此时，一营经苦战从左侧攻上大陀山，两营巩固阵地后并肩向小陀山突击。

天亮后，敌东梁山、陈桥江心洲炮兵和江中舰炮，一齐突击大小陀山，四架敌机轮番俯冲轰炸。上山道路窄如刀背，又被敌立体交叉火力阻断，副团长邱明月和三营长王全鼎负伤，牺牲官兵纷纷坠入长江。三营和一营被迫撤至大陀山阵地与敌对峙。

攻山部队与敌激战竟日，连环防御之敌火力全开，而配属的军山炮营火力弱无法压制。主攻方向第二六九团三营营长牺牲，部队因减员大进攻受阻。担任佯攻的第二六八团三、二营，在狭小正面沿陡峭山脊四次猛攻山东北角和北腰，均未奏效。由于未能按计划攻占西梁山北首阵地，无法策应第二六九团战斗。

南征北战近二十年，饶守坤打过不少恶仗、险仗。复杂艰难的战场态势，倒逼他调动作战经验积累从速破敌。1947年2月莱芜战役中，饶守坤所率华野六纵第十八师第五十三、五十四团接合部小洼村防线被敌第七十三军冲开，他令第五十二团政治委员彭冲带部队猛扑，自己到最前沿指挥封闭缺口，保证了华野全歼数万敌军。同年5月孟良崮战役，饶守坤率第十八师攻击540高地伤亡大，向路过的第十七师“借兵”一举占领285、520高地，迫使第七十四师退守主峰归于覆灭。眼

下，战场容量小，攻击通道单一，部队难以展开；我炮兵火力弱，无法压制敌立体交叉火力。特殊地形和连环防御对手，使部队像野牛掉进枯井里有劲使不出。

再攻，显然于我不利；后撤，部队只能徒增伤亡。只有与敌胶着、交错据守，方能减轻敌炮火对我威胁。9日上午，饶守坤令第二六九团抢修工事，坚守大陀山至天黑再攻；第二六八团停止佯攻，注意隐蔽防敌炮击；暂停攻击被敌重新占领的青石街。

饶守坤刚部署完毕，山上炮声大作。他一跃蹿出掩体，只见东梁山、陈桥江心洲和敌舰火炮，一齐轰击大陀山阵地，俄顷，西梁山主峰之敌借助陆海空军火力优势，狂涛直泻冲向大陀山。第二六九团官兵奋起反击，一营长范光和高喊：“人在阵地在！”话音刚落，一发炮弹在身旁爆炸，范光和被掀出老远，壮烈牺牲。

“为营长报仇！”战士们高声呐喊着，复仇的怒火燃遍阵地。一连副连长李少华全身六处中弹，仍斜倚着岩石指挥战斗；有的战士腿打断了，躺在地上向敌射击；有的战士眼炸瞎了，摸索着向敌投弹。在打退敌人六次进攻后，大陀山阵地失而复得。

入夜，雨越下越大，第二六九团仅剩两个连，二营正副营长均负伤。饶守坤走出指挥所，一营长范光和的遗体抬了过来。饶守坤掏出手帕轻轻擦去烈士脸上的血污，脱下上衣盖在英雄身上，随后电话命令，预备队第二七〇团一个营上去加强第二六九团；第二六八团留少量兵力佯攻牵制敌人，主力调上来加强正面进攻力量；军山炮营归第二六九团指挥；部队连夜巩固阵地防敌偷袭。

晚十时，风雨稍歇，第二六九团得到有生力量增援，组织连规模突击队，以偷袭与强攻结合战术，突入小陀山老牛洞，歼敌一个连并俘获一名副连长，缴获数挺轻重机枪和一批弹药，迅速回撤。东、西梁山守敌和江中敌舰迅速组织火力配合部队反击，主峰守敌前锋部队刚冲上小陀山阵地，就被己方炮火覆盖。

4月10日凌晨，西梁山主峰出现异动，敌调第三十九团替换伤亡惨重的第三十八团。天一亮，敌人由飞机大炮掩护，向大陀山连续发起四次进攻，均被第二六九团击退，双方攻防难分难解，陷入胶着状态。为扭转迟滞的战局，饶守坤与师主官商定，调第二七〇团另外两个营进入第二六九团阵地，准备会攻西梁山主峰。

4月11日，第九十师令各团晚九时总攻主峰守敌，务于二十四小时内拿下主阵地。下午四时，第二七〇团团长朱慕萍再次向饶守坤请求到前沿察看地形，获准进入阵地后，不幸被敌炮击中，当场牺牲。这是渡江南进中，我军第一位殉难战场的团长。

噩耗传来，饶守坤猛一拳砸在地图上，严令各团守住阵地，蓄积力量，晚间一举拿下西梁山！攻击部队准备就绪，师忽接九兵团“停止进攻，撤回原地待命”电令。4月10日，中央军委致电总前委：“目前数日（11日至16日）请令各部不要发生任何战斗（尤其是芜湖及镇江对岸），以便稳定南京诸人并使李宗仁、于右任、居正、童冠贤等四人于协定签订之日能来北平观礼。”

翌日，第九十师将士怀未竟之志撤出战场。将近四十年后，已卸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饶守坤回忆：“部队接到停止进攻的命令后，悄悄地撤出阵地，向原驻地进发。我骑在马上，回首望去，残阳如血，大江如练，西梁山主峰在暮霭中渐渐地消失……”

卯号，4月20日。

4月15日，总前委致电中央军委：“有些据点（长生洲、黑沙洲、鲫鱼洲等）可于卯号[注]一夜夺取；另有些据点，则尚无完全把握于卯号一夜夺取，如西梁山、裕溪口等则需二至三天时间。”

16日，毛泽东致电粟裕、刘伯承等人明确：“对敌北岸及江心据点，凡能于一夜夺取又利于夺取后第二夜即南渡者，则于渡江前一夜夺取之；凡不能于一夜夺取又于夺取后需要较多时间做准备工作方利于南渡者，则应提前夺取之，望按实情处理。”

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签和平协议，第九十师准备决一死战拿下西梁山，却再度接到停止攻击命令，连夜进驻芜湖、繁昌、荻港段江堤布防，牵制敌舰，掩护大军渡江。全师星夜赶赴江边修筑工事，与江面驶来的敌舰展开激战，掩护中集团渡江。当晚，第九十师随第三十军渡江。我军渡江后，军部驻芜湖大桥镇的国民党第六十六军，南逃至安徽广德为三野部队追上，一举聚歼。

2021年7月1日，笔者冒酷暑登上西梁山。天门肃穆，大江声咽。八百里皖江适渡点何其多，渡江前血战西梁山所为何求？

1949年4月17日，邓小平、陈毅以总前委名义致电中央军委并二野、三野：“宋（时轮）、郭（化若）兵团以卅军于二十（哿）日黄昏开始攻击裕溪口、西梁山两地，西梁山可于二日或三日内夺取，裕溪口不拟迅速夺取，仅迫近包围与钳制；……以上均对芜湖、当涂之敌廿军、六十六军起吸引钳制作用。”

2021年7月3日，笔者在南京查阅《第九兵团渡江战役总结》，其中写道：“三十军九十师两个团，于7日对西梁山外围发起攻击，9日上午攻占老牛洞阵地，因干部有部分伤亡，部队混乱，被敌反扑退回。下午再行强攻占领，10日敌以炮舰二艘炮击该地，配合步兵猛攻我已得之阵地，相持激战终日，我阵地屹立未动。经

四昼夜之激战，虽进展较微，但起到调动了敌人（西梁山之敌由一个营增至一个团）与迷惑敌人对我主渡点之估计，基本上完成了任务。因我伤亡较大，为不至于渡江前过于消耗，乃于11日十八时三十分令该军暂缓攻击，部队于12日后撤。”

第九十师浴血奋战西梁山，意在肃清江北桥头堡，拔除扼控渡江南进通道的钉子，客观上诱使江南守敌将第六十六军第十三师悉数调至东、西梁山地区，并调第六十六军主力加强西梁山附近四褐山防御，引敌旁顾并打乱其江防部署，有裨于中、东集团突破。

1925年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侯镜如，1931年与中共失联后曾任国民党军第十七兵团司令官，1983年3月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谈及渡江战役，他从战役前后东线诸战的相互联系上看西梁山之战：“渡江战役显出解放军指挥的高明，先在芜湖地区猛打，吸引蒋军的注意在南京以西方面，21日晚以奇袭手段夺取江阴要塞，迫使蒋军全线撤退，从而在追击中消灭之。”

渡江部队在扫除江北二十多处要点、桥头堡后，北岸敌军尚存八圩港、瓜州、浦镇、浦口、西梁山、裕溪口六个据点，对渡江已无大碍。为夺取渡江作战主要前进阵地，4月8日，第十二军第三十五师第一〇四团攻打夹江与长江之间的铁板洲。下午六时发起攻击，部队在炮火支援下迅速渡过五百米宽夹江，全歼守敌第八十三团三营三百余人，三十五分钟结束战斗。军组织团以上指挥员现场观战，汲取经验，增强信心，提升备战工作质量。

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乘“长江”舰从武汉到南京。陈毅、罗瑞卿、张爱萍、陶勇、饶守坤等陪同视察。军舰顺流而下过西梁山，陈毅把望远镜递给毛泽东说：“主席，西梁山是渡江战役中一个重要牵制点，在这里牺牲了一千五百多名官兵……”

那一刻，手持望远镜的毛泽东久久凝望横断大江的西梁山，神情肃穆地说：“渡江战役中，西梁山战斗是一场重要牵制战。”后来，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在《清史稿》卷四七五写道：“太平军盘踞金陵，用全力扼守东、西梁山……据守在那里五年，任凭官军与它血战也不撤走。”

长风无语，大江静默。那个春寒料峭的晴日，四年前在一线指挥血战西梁山至今未能释怀的海军淞沪基地司令员饶守坤，伫立舰艏聆听统帅深情评说西梁山之战，辄觉当年官兵所有的牺牲与付出，都在这一庄严回放中得以诠释与安放。

（七）叶飞操盘江阴要塞起义1949

年3月中旬，吴铭从江阴返回江北，正拟向管文蔚汇报，华中工委公安处科长江华告诉他，江阴要塞策反工作已转交三野十兵团，要他直接向十兵团司令员叶飞和政委韦国清汇报。

4月6日，粟裕在泰州白马庙对叶飞和韦国清说：“你们兵团从靖江两侧渡江，对岸江阴要塞是敌防御重点。据陈丕显和管文蔚说，经过几年艰苦工作，江阴要塞已被我地下党控制，要塞司令戴戎光已被架空。华中工委已命令要塞地下党，做好接应我军渡江准备。你们回去后好好研究一下。对这件事要绝对保密。”

叶飞和韦国清清楚，从江阴以东渡江，因江面太宽航渡时间长，拂晓前难以登陆突破；江阴以西渡江部队过于拥挤，由此上岸势将拖长我切断京沪线和围歼逃敌时间。而从靖江张黄港至七圩港一线直取江阴，便于向东向南发展，与从上游三江营、永安州渡江的八兵团迅速挺进沪宁铁路，依托该路一段向宜兴方面扩张战果，切断宁杭公路，会同中集团聚歼南京、镇江地区之敌。

江阴要塞预置内应令叶飞和韦国清兴奋，而山水苍茫、阅尽兴亡的江阴之于多年驰骋江南的叶飞，又有着难以泯灭的记忆。

1939年5月，陈毅根据毛泽东指示，冲破阻力派叶飞率“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苏南，征战数月开辟了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西部）和苏（苏州）、常（常熟除虞以外部分）、太（太仓）抗日根据地，部队由出发时的七百多人迅速发展到五千多人。

9月21日，“江抗”在江阴突遭“忠义救国军”偷袭，四天连折两员大将，副司令员吴焜壮烈殉国，政治部主任刘飞胸部中弹身负重伤。叶飞决意同前来驰援的王必成所率新四军二团联手反击，陈毅相忍为国电令准备反击的部队停止行动，亲赴国民党江南行署谈判实现前线弭兵。“江抗”经西石桥整编与管文蔚部合编为挺进纵队，北渡长江改称江北人民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1940年7月改称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一纵队，叶飞任司令员。转瞬十年过去，叶飞再度回师江南饮马长江，中国革命已胜利在望。

吴铭按江华要求来到十兵团司令部驻地泰州姜堰，受到叶飞、韦国清热情接待，安排他住在司令部楼上一个单间，并亲自听取汇报，详细询问要塞兵力、周围敌军部署、要塞地下党人头、策反工作策略和方法，以及敌特组织与活动等情况。叶飞和韦国清指示，我大军渡江已经迫近，要塞内外参与策反的同志要抓紧工作，做好各种准备，切实配合我军胜利渡江。两位首长嘱咐吴铭，策反江阴要塞起义工作转由他们亲自领导，不得向他人谈及。

叶飞接盘江阴要塞起义，一个有利条件是富有敌军工作经验的老部下王征明在案前奔走。王征明是叶飞率“江抗”东进苏南时的作战参谋，后任新四军六师侦察科长。1949年3月，华东局社会部分管情报工作的副部长杨帆从华中工委密电王征明，要其从华东局驻地山东益都县（今青州市）火速南下，参与策反江阴要塞特殊任务。经华东局批准，王征明带社会部电台台长葛尚丰等十几人和电台，从济南经徐州抵淮阴，由杨帆引领见到了华中工委书记陈丕显和苏中军区司令员管文蔚。两位领导给王征明介绍开辟江阴要塞前后经过，交代了下步任务。随后，王征明一行到苏北行署公安处与宋学武处长接头，在江华带领下赶赴靖江，与华中工委联系江阴要塞的政治交通员吴铭见面，对策反江阴要塞的使命任务有了更翔实的了解。3月底，陈丕显、管文蔚通知王征明，为配合渡江作战，策反江阴要塞任务移交三野十兵团。

王征明到泰州姜堰十兵团司令部报到，叶飞司令员亲切接见了他，与他深入交谈策反江阴要塞工作的情况，留他一起用餐。叶飞说，济南战役你策反吴化文的工作做得好，这次策反江阴要塞，是粟裕首长点了你的将。必要时你可亲自前去要塞掌握。

王征明向叶飞建议说，为确保起义成功，江阴要塞地下党曾要求华中工委从部队派些骨干打进去，把关键部门直接掌握起来。管文蔚司令员说华中工委同意这一想法，但未来得及实施。

叶飞对这一建议很重视，他和韦国清政委经过慎重考虑，又征求了预定从江阴登陆的第二十九军胡炳云军长的意见，确定该军第八十七师第二五八团团长李干、第八十六师第二五七团三营教导员徐以逊、第八十五师第二五三团二营副教导员王刚、第二五五团三营副教导员陆德荣四名有斗争经验的干部，潜入江阴要塞加强起义力量。

王征明抓紧组织李干等四名干部学习培训，认清潜入要塞的使命任务及重大意义，熟悉要塞兵力编成和戴戎光等人的情况，重点研究打入后如何保证不出纰漏，以及各种情况下如何应对。

几天后，叶飞派吉普车把王征明接到兵团司令部，和韦国清政委一起，与他具体研究如何做深做细做实要塞起义工作。王征明汇报了组织准备潜入人员学习培训和建立秘密交通线及要塞地下党策应我军登陆几方面准备工作的情况，报告了戴戎光拉南京国民党保密局关系及要塞特务活动明显加强等最新敌情，提出了与要塞地下党共同研究的建议，即渡江时以一部兵力在要塞西侧佯动以利起义实施，渡江同时攻击江北八圩港，注意防范打击敌海军江防舰队，江南游击队会同要塞地下党破坏电话线路。

叶飞给王征明明确了渡江作战时要塞地下党的主要任务：保持六十里防区，控制三到四个港口，不开枪，不打炮，迎接我军登陆。根据要塞特殊环境和策反任务，叶飞要求，工作方法上，要注意掌握几个连排长，利用他们之间的封建关系掌握士兵，切忌麻痹大意、自我暴露。领导关系上，要塞地下党和起义工作，由王征明统一管理，并对兵团党委负责。要进一步完善同要塞地下党联系办法，遇有紧急情况能找得到，必要时可亲自去。

韦国清政委随后作指示重点强调了保密问题，要求停止部队与要塞地下党直接联系，一切机关包括江南工委均要停止。要塞地下党停止内部发展工作，已发展的不要多批评人家。江北渡江部署暂不告诉他们，最后敲定后再提前通知。王征明去江阴要塞后，一面对上负责，一面对下负责，遇有问题可以电报与兵团联系。鉴于江南工委书记张志强是叶飞的“江抗”部属，韦国清明确，往返南北的交通由江南工委保障，并规定了王征明和潜入要塞人员过江后与吴广文、吴铭联系的地点、办法及暗语。

王征明领受任务后，叶飞仍以吉普车将他送回。王征明和执行潜伏任务的四名干部动身去江阴前，李干带大家来到新港，在他妻子的姐姐家吃了一顿美味的河豚。李干化名张国政，由王征明在靖江为其办好身份证，以贩猪商人的身份作掩护。吴铭、唐秉煜过江来接李干那天，不巧江阴要塞守军查问唐秉煜去向，唐秉煜只得匆匆返回。当晚九时，李干由吴铭带船送过江。

李干上岸后来到一个小亭子里，与交通员接上暗号，次日由吴铭带领到仲衡家。唐秉琳、吴广文等人见到江北来的解放军团长，大家都很高兴。唐秉琳想让李干到炮台当副总台长。李干想到目标太大容易暴露，说服大家还是做唐秉琳卫士。几天后，三名正副教导员也分头潜来要塞。徐以逊、陆德荣到游动炮团，给团长王德容当副官，王刚化名王贵生，到特务连卫士排当兵。

李干和王刚头一回露面，便在众目睽睽之下演了一场戏。李干自称是唐秉琳在长沙当营长时的勤务兵张国政，台儿庄战役时从徐州撤退被打散，跑回家结了婚，被老婆拖后腿未归队。后来在家乡做生意赔了本，混不下去才跑来投奔老长官讨口饭吃。满脸委屈的王刚，则称自己是个被扫地出门的地主儿子，在家乡站不住脚，逃到这里找长官避难。两人痛说自己的不堪家史后，唐秉琳煞有介事给大家训了一通话，叫来特务连长和文书，作古正经地问：“特务连有什么缺？”文书说：“缺两个下士。”唐秉琳喝令：“张国政随我当卫士，王贵生到特务连卫士排当下士！”

江北四名团营干部打入要塞后，李干即着手充实地下党组织，并任党小组长，内部力量分工也重新作了调整：李干和唐秉琳负责掌握全面情况，并直接控制要塞总炮台所在地黄山；徐以逊、陆德荣帮助王德容、吴广文、唐秉煜等人，负责萧

山、长山和沙洲等地的敌军工作；王刚负责掌握通信。这样安排，既能控制要塞全局，又可重点控制几个主要高地和东西几十里的江面。

团长李干变脸国军勤务兵，未及转换角色适应环境，却发现要塞守军中有一批从江北逃亡来的还乡团和地主子弟。原来，戴戎光为壮大实力，从苏北盐阜和上海收编了一批土匪、还乡团和地痞流氓，总数占要塞兵员一半以上。李干曾随部队在苏北转战九年，对这些亡命之徒中的不少人，都有似曾相识之感。于是，他尽量少出头露面，避免引人注意。不料冤家路窄，一天，李干与炮台陈副总台长的卫士不期而遇。李干一愣，继而想起，此人是1947年苏北李堡战斗中，从敌二十一军抓的一个俘虏。时任团参谋长的李干曾审问过他，知道他是营部书记。万幸这小子眼拙，竟没有认出曾审过他的李干！从此，李干特别注意避开他。

危机四伏的潜伏，暗中冷箭般的窥测常常令你防不胜防。有段时间，李干与江北失去了联系，便经常躲在屋里看报纸，从中获取信息。这一不经意间的举动，引起了同住一屋的总台文书怀疑。李干察觉后，便利用与他同乡的关系套近乎，成功稳住了他。要塞起义成功后，这位文书直言不讳对李干说：“我早就看出你不是一般的兵，不是国民党派来的，就是共产党派来的。”

唐秉琳的副官是个地主子弟，为人刁钻阴险。李干与他抬头不见低头见，觉得此人是个现实危险因素，便通过唐秉琳安排他到上海招兵，从此一去不返，再也没有回来。

李干需要掌握全盘又不便出面，便脚不沾地打水、扫地、盛饭，在服侍唐秉琳间隙，由他见机行事介绍要塞情况。要塞地下党组织在守军中基础薄弱，李干便有针对性地研究采取了四条措施：一是利用官兵中普遍存在的悲观失望情绪，不露痕迹地宣传进一步动摇军心，引导大家赶紧为自己找出路，无心江防；二是利用黄埔军校同学等关系，帮助军官家属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争取中立状态军官的人心；三是利用到上海招兵之机，招收了十多名产业工人，编成一个特务排，作为一支可靠的小分队掌握；四是拿钱购买一些鞋子、毛巾、牙刷等物品发给士兵，用以联络感情、密切关系，增强要塞地下党在基层的凝聚力。

戴戎光任职要塞后，既以感恩之心想做出一番成绩给蒋介石看看；又利欲熏心，借招兵买马之机吃空饷，挪用公款做生意，私放船只过江从中渔利。要塞地下党按照十兵团首长指示，盯着戴的弱点，纵其贪腐并心照不宣，抓住把柄增强对其挟持力；挑起和利用戴与他人矛盾，阻止破坏国民党强固要塞和江防的计划。

4月上旬的一天晚上，汤恩伯在第一二三军军长顾锡久陪同下，再次到江阴要塞视察，离去前专门指示戴戎光，迅速征用大木船，装满石块，凿沉后堵塞北岸大小港口，越快越好。

李干、唐秉琳等从汤恩伯再顾要塞急于沉船塞港等迹象判断，渡江作战已经临近。经商量，由唐秉琳给戴戎光出主意，尽快向港口司令部请领款项，征得木材后悄悄变卖，领款时宣传一番沉船，但一砖一石也不要向水里抛投，戴戎光也乐得同意。

刚刚化解沉船塞港，又陡生意外。4月17日，美军顾问视察江阴要塞炮台，决定缩短防线。国民党第一绥靖区秉承美军顾问旨意，下令将要塞所辖长山防区划归第二十一军管辖。该军主要担负黄田港至张家港以东一线约三十公里的守备，并以重炮火力支援驻守江北八圩港桥头堡敌一四五师。李干闻讯吃了一惊。他听王征明说，回江北汇报时，叶飞对张家港以西的长山问得特别细。王征明给叶飞介绍，长山有十里路长，整个山都不高，山上没有防御设施。叶飞对王征明交代："我就要这个地方！"王征明点点头说："我明白了，请首长放心！"李干打入要塞后了解到，长山防区控制了十多公里江面，是我军极为理想的登陆地点。如将长山划归第二十一军管辖，势必重新布防，给渡江作战造成极大困难。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千方百计阻止移交长山防区。

戴戎光并不情愿拱手让出长山防区，但顶不住汤恩伯和第一绥靖区司令丁治磐的压力，开始动摇。唐秉琳、王德容、唐秉煜等人，轮番出面对戴戎光进行思想渗透，从个人威信、利益以及要塞名声等角度晓以利害，告诉他江阴要塞如将长山拱手让给第二十一军，惹人耻笑不说，司令和要塞都将名誉扫地，永无抬头之日。戴戎光为众人的劝说所动，暂未将长山防区交出。

长山防区归属未定，要塞地下党再陷危机。戴戎光为捞钱，夜间向江北私发船只，被第一绥靖区司令丁治磐发现，派军法处长前来追查。此前，吴广文为联络江北多次私放船只，已引起戴戎光怀疑，便借机嫁祸于吴，将其软禁起来。唐秉琳、唐秉煜、王德容分头找戴通融，协调有进步倾向的参谋长梅含章出面，利用戴、丁之间的矛盾软硬兼施，将吴转移到无锡，躲过了丁的追查。经做工作，由倾向于我党的李云葵接任吴广文离去后空缺的守备总队队长，使这一举足轻重的力量仍能掌握在地下党手中。

国民党第二十一军部署在要塞外翼侧，江北八圩港驻有所属第一四五师两个团。为防止要塞起义后该军反扑，唐秉琳等打着奉国防部令加强要塞防御的幌子，修筑了许多用于阻击第二十一军的工事。唐秉琳、李云葵佯称遵戴司令之命，摸清了要塞江岸水深、潮水涨落、暗礁分布等情况，绘制成图，由吴铭送往江北。

1949年4月15日，东集团部队渡江前六天，叶飞在十兵团兵团部驻地靖江季家市收到王征明来信。信中汇报了李干等四人在要塞的安排和工作情况，请示下步如何行动。时渡江正挽弓搭箭，引而待发，叶飞当即拔出钢笔，给王征明写了回信：

征明同志：

来信收到，我军行动已推迟到本月20日以后，可告吴铭。因此，你暂不必南去，再等三四天以后去更好。同意吴铭同志来信所规定的联络信号，信号是要在行动的时候采用，以免暴露。请告吴铭他们，不要心急，不要松懈，按我们前天所谈的告诉他去做。保持交通关系最要紧，但在这几天内，如无特殊情况，交通不要太频繁，可适当减少一些。叶飞

在伏兵千里、风樯欲动之际，叶飞这封举足轻重的信，使王征明、吴铭及南岸栖身虎穴者吃了定心丸，也使险不可测的江阴要塞起义瞬间鱼沉雁静、井然有序。或许是因为这封于起义前夕关键时刻发出、堪比预先号令的来信太重要了，王征明等参与起义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把它保存了下来，成为十兵团首长指挥起义的重要见证和不可多得的战地书简。新中国成立后，叶飞一看到这封渡江前夕草成的信，热泪便不由自主涌了出来。

叶飞给王征明回信后，靖江县委书记汪青辰受命将第二十九军4月21日渡江作战方案和行动时间，转报江阴要塞地下党。汪青辰与县长薛先洛商量，江阴驻有多支国民党部队，便为假扮猪贩的联络员陈寿康准备了一百口猪和两条大船，苏中区党委联络部部长和第二十九军敌工部部长及一个侦察班，化装后随船同行。4月19日，两条贩猪船抵达南岸黄田港码头，陈寿康与挤到江边争购大猪的国民党军采购人员纠缠，联络部长、敌工部长乘机率侦察兵上岸，将渡江作战最后方案迅速送至要塞地下党组织。

（八）北平和谈的折冲樽俎

距3月31日何应钦为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饯行不过一晚，张治中却觉得像是挨过了一年。4月1日上午，和谈代表来到明故宫机场，李宗仁和军政大员悉数赶到。立法院放假半天，以便立法委员送行。机场休息室里，邵力子与人捉对弈棋，李宗仁、张治中静观不语。一众高官依旧谈笑风生，却没了往昔的自信……

3月31日晚，饯行宴会一结束，李宗仁即连夜开会部署，责成汤恩伯和白崇禧加强长江防务，严防共军南渡，并就海军沿江巡逻、空军分区侦察等事项作了明确规定。会议还督促顾祝同加紧组编二线兵团，以资江防后续梯队之用。

4月1日下午二时，南京政府代表团乘坐的“空中行宫”号专机，抵达北平南苑机场。停机坪上迎者寥寥无几。张治中走下飞机，发现中共正式和谈代表无一露面，前来迎接的有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中共和谈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北平市副市长徐冰、北平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等人。

张治中脸上掠过一丝狐疑。无论是按照国共双方此前惯例，还是从与周恩来四十多年的兄弟情谊讲，于公于私，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都应来接机。老朋友一反常态，问题出在哪儿呢？

张治中与周恩来1924年相识于风雷激荡的广州。那时，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张治中先任黄埔军校总队长，后任教育长。正值国共合作时期，两人彼此惺惺相惜，常在一起探讨革命前景。张治中甚至向周恩来提出加入中共。后来，周恩来悄悄找到他，不无遗憾地说：“文白兄，我非常欢迎你加入中共组织，但此前我们有过约定，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加入。我看不如等到合适的机会再说吧！我向你保证，我们一定会暗中支持你的！”

张治中虽未如愿加入中共，但未影响与周恩来的友情。

1925年8月8日，张治中在广州太平馆西餐厅摆酒席为周恩来和邓颖超举办婚礼，何应钦、钱大钧、邓演达、恽代英、陈赓等前来祝贺，刚抵穗的周恩来留法同学李富春、蔡畅夫妇也赶来道喜。嘉宾起哄要新娘子邓颖超讲与周恩来的恋爱经过，她落落大方站在小板凳上讲与周恩来的罗曼史，博得一片掌声。张治中夸奖说：“周夫人果然名不虚传，与恩来是一对出色的演说家！”邓颖超说：“文白兄，什么周夫人啊，我可是有名字的——邓颖超！”席间，周恩来十分体贴地替下了人们敬给邓颖超的一杯杯喜酒。三十多年后，她在家接待张治中小儿子张一纯时说：“当年，你父亲为我和你周叔叔办婚宴，别看你父亲比你周叔叔大八岁，可当时数你父亲能闹腾了，带着大伙儿硬是把你周叔叔灌醉了！”

“文白是不是加入了共产党？”蒋介石见张治中与周恩来过从甚密，心生疑窦，私下里问亲信王懋功。王懋功素与张治中交好，忙说：“谣言不可信，文白对校长是忠诚的！”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避免与老朋友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张治中选择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训练部主任和教育长，抗战爆发后才主动请缨奔赴一线统兵杀敌。此间他与周恩来时有书信往来。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还上书蒋介石继续与中共合作，共御外侮。

1945年5月，张治中受周恩来委托，到新疆解救被盛世才监禁的上百名共产党员及家人回延安。因其是内战中唯一未同中共军队打过仗的国军将领，故有“和平将军”美誉。

张治中的亲共态度，以及他在重要关头一再建言与中共联合的主张，曾为蒋介石所忌惮。但鉴于其与中共领导人特别是周恩来交情匪浅，又每每让他在国共谈判中担纲。1945年重庆谈判，张治中亲往延安接送毛泽东。为确保安全，张治中把

自家在桂园的小楼腾出来给毛泽东住，全家人挤住在另一处平房，还把多为自己家乡子弟的手枪排调给毛泽东当内卫。10月11日，张治中送毛泽东飞返延安。当晚，周恩来在桂园设宴答谢警卫和工作人员，周恩来在张治中儿子张一纯的本子上写下热情洋溢的话语：“光明在望，前程万里，新中国是属于你们青年一代的！”张一纯看到落款“一纯世兄、周恩来”，问起“一纯世兄”四个字的含义，周恩来亲热地对他说：“这表示我是你父亲的弟弟啊！”

忆及这些往事，张治中对抵平首日遇冷很是不快。代表团走进下榻的六国饭店，迎面一幅“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的大字标语分外扎眼。张治中一怔：莫非中共在怀疑南京政府的和谈诚意？他的疑问很快得到证实。在当晚的欢迎宴会上，周恩来见到张治中劈头就问：“你为什么离开南京前到溪口去见蒋介石？”

张治中恍然大悟，原来问题出在报载蒋公“两愿”新闻上！

周恩来的声音渐趋激烈：“你这种做法，完全是为了加强蒋介石地位，起了混淆视听、破坏和谈的作用；同时也充分证明，蒋介石的所谓下野是假的，他还在幕后操纵控制！”

张治中解释说：“恩来，我之所以要去溪口，一则想到我们虽然接受毛主席所提八条作为和谈基础，但掌握实力的蒋究竟同意到何种程度，我们不能不摸个底，才好进行商量。二则蒋还是国民党总裁，我们六个代表中除章行老（章士钊字行严）外，其余都是国民党员，也有义务去看望他。我是首席代表，只好我去啰。三则近来京沪间一些人发言给和谈制造障碍。蒋既然表示‘两愿’，一切交由李宗仁主持，发表这篇新闻可对他们起到威慑作用。”

张治中一再解释，并未使周恩来感到满意。他说：“不管你怎样说，只能说蒋介石还在发号施令，说明你们不是真要和平，这种由蒋介石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张治中见反复解释无效，也就动了一点感情，双方引起争执。此后，周恩来又对此事进行责难。中共对溪口面蒋无法容忍，实非张治中始料所及。但他内心对周恩来的公私分明是钦佩的。

4月2日至12日个别交换意见。毛泽东分别约见南京代表。周恩来与张治中、叶剑英与黄绍竑、林伯渠与章士钊、李维汉与邵力子、聂荣臻与李蒸、林彪与刘斐个别对话。南京代表众口一词，要求中共不要过江；中共代表则异口同声，解放军必须渡江。

4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警告南京政府：“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无论

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前进的。”

6日，新华社揭露国民党政府利用和谈加紧扩军的阴谋：南京国防部已设置十四个编练司令部，妄想使只剩一百多万的国民党正规军扩为三百五十万到五百万人。第一至第十四编练司令部司令王敬久、胡琏、沈发藻、欧震、黄杰、何绍周、罗广文、陈铁、张雪中、孙元良、钟记、胡宗南、李弥、宋希濂等悉数上榜。

是日晚，国共双方代表团全体会议在地中南海勤政殿举行。这里曾是清帝居住西苑时处理政务之地，历经二百多年历史风雨，王朝殿堂的每个角落无不写满岁月沧桑，但骨子里仍显出雍容华贵。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由东向进入会场，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团则由西向进入会场。历史相似的一幕再度重演，当亲手撕毁1945年《双十协定》与中共反目的国民党，主动乞和走到谈判桌前时，恩恩怨怨的国共两党第三次谈判又走上前台。

卯佳，4月9日。

9日，专赴广州列席国民党中常委三次会议的何应钦，根据会议决议给南京和谈代表团发来指导和谈的卯佳 [注]电：（一）为表示谋和诚意，昭信国人，在和谈开始时，双方应即下令停战，部队各守原防。共军在和谈期间渡江，即表示其无谋和诚意，政府应即召回代表，并宣告和谈破裂之责任属于对方。（二）为保守国家独立自主之精神，以践履联合国宪章所赋予之责任，对于向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为目的之外交政策，应予维护。（三）为切实维护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应停止所有施行暴力之政策，对人民之自由权利及其生命财产，应依法予以保障。（四）双方军队应在平等条件下，各就防区自行整编，其整编方案，必须有双方互相尊重同时实行之保证。（五）政府之组织形式及其构成分子，以确能保证上列（二）（三）（四）项原则之实施为条件。

何应钦发电翌日，李宗仁再电毛泽东，重弹和谈“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为基础”老调，虚伪地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企图以挺身担责的姿态消解八条第一条“惩办战争罪犯”的严正要求，侈谈“如彼此同守此义，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张治中回忆录》，第576页，华文出版社2014年4月第2版。

毛泽东安排新华社播发此电并亲撰按语：“李宗仁此电尚有许多阿Q语调，对于自己吹擂，颇饶兴趣。所谓‘国共合作’，毫无界限，尤使人们感到心头有些作逆。但是在根本上说来，李宗仁在全国人民的督促之下，似乎已增长了某些希望和平成功的诚意。是否如此，且看将来。”4月8日，毛泽东给李宗仁复电：“贵

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注]

鉴于南京代表再三请求，为争取谈判成功，毛泽东4月8日起扩大接触面，逐个会见南京代表，8日上午同周恩来在香山与张治中进行长谈。大革命时，张治中与毛泽东同在广州，却缘悭一面。他回忆：“1945年以前，我对毛主席没有什么印象。相反的，由于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使我对他有过怀疑，怀疑他究竟具备了什么条件能够做共产党的领袖。但是从1945年8月我第一次到延安与他会面之后，他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以后多接触一次，印象就更加深一层。”1945年10月11日，张治中从重庆送毛泽东返回延安，毛泽东对他说：“我在重庆，知道你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张治中问：“怎见得？”毛泽东说：“有事实为证。第一，你把《扫荡报》改名《和平日报》。《扫荡报》是在江西‘围剿’我们时办的，你要改名，一定有些人很不赞成的。第二，你把康泽办的一个集中营撤销了，是做了一件好事。”

1946年3月，周恩来、马歇尔、张治中一起到延安。作为一个清醒的政治家，张治中当然懂得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道理，当晚在欢迎晚会上意味深长地说：“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写上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话音刚落，台下已是掌声雷动。道虽不同，但在很多方面仍可“相与谋”。毛、周、张超越政党和政见的友谊，成为战火中国共两党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风景。

> 余湛邦：《我所亲历的三次国共谈判》，第13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一别近四年，毛泽东再见张治中，高兴地说：“1945年到重庆时，承你热情接待，感激得很呢！”“你在重庆时用上好的酒席招待我，可是你到延安时，我只能以小米招待你，抱歉得很呢！”[注]

> 《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47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毛泽东对南京代表团的处境表示谅解，说，为减少南京代表团困难，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战犯名字。和谈方案先由中共方面草拟，拿出方案后正式谈判就容易了。将来签字，如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等都来参加则更好。毛泽东邀张治中共进午餐。张治中得知主席昨夜通宵未眠，辞谢而归。[注]

毛泽东还分别约见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卢郁文谈话。谈话中，毛泽东就战犯名单、军队整编、解放军渡江、联合政府组建等，凡中共所能做出的让步都交了底，其中第四点是:人民解放军必须过江，其时机可以在签字后实行，或经过若干时日后再过江。张治中等表示可以接受，于是向南京请示。

毛泽东和朱德在香山旧慈幼院接见黄绍竑和刘斐，并共进午餐。这是1945年重庆谈判以来，黄绍竑第二次近距离接触毛泽东。不过，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当年自己率军追击过的南昌起义重要组织者朱德。蒋介石倾其一生精力必欲剿灭朱毛红军，如今，沿着井冈山道路走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显系主导中国之最强大力量。

当天，齐燕铭在颐和园设宴招待南京和谈代表团并组织游春。

此间，张治中再劝蒋介石出国。此信写得缱绻万千，曲尽其妙。关于出国之利：（一）不做反对者之攻击对象；（二）表示赞成和平，转移人民观感，以恢复人民之怀念与信仰；（三）避免和谈失败之责任；（四）避免再负战争之责任；（五）对党政军干部之麻木情绪、腐化生活及依赖心理，予以刺激，唤起觉悟，并恢复其对领袖之信仰；（六）在个人方面，增强将来革命事业种种有利因素，如广益见闻，结交国际朋友等。关于出国之害：（一）在国外安全问题不无顾虑，但可设法防范；（二）军事力量顿失维系中心，但只需托付有人，似无可虑；（三）党的领导，一时远离，不免更形涣散，但如能组成干部会议，亦可维持现状，何况本党早已解体，尚须彻底改造，始可复兴，然此非待大局明朗时莫办。

《张治中回忆录》，第577—579页，华文出版社2014年4月第2版。

张治中最后恳切说，钧座倘能毅然出国，将有百利而无一害，甚愿钧座再作一切实周详之考虑而及时采取行动，且愈早愈好愈有利。此次到平以来，所受刺激之大，非可言喻。倘使三年以前，甚至去年六月在西安时钧座采纳职之建议，则绝不致有今日如是之惨败，职亦可免今日在北平写此一篇忍辱受气一言难尽之痛史也。职素以吾人应拥护领袖成功不应拥护领袖失败为言为志，倘今此建议仍不蒙钧座采纳，而仍听信拥护领袖失败者之言，留居国内，再起再战，则非至本党彻底消灭钧座亦彻底失败不止。

《蒋经国自述》，第180页，团结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蒋经国日记，已对张治中苦谏预作回应：“张治中的准备投降，我们是老早预料到的。”“张之此种建议，好像是为共党借箸代筹，不但是毛泽东所乐意的，同时也是李宗仁及其左右所乐意的。”

为给李宗仁考虑的余地，4月11日上午，中央军委指示总前委:原定15日渡江，推迟至22日。假使政治上有必要，还准备再推迟7天，即23日至29日。

4月12日，李宗仁召集“和谈指导委员会”做出五项决议，供南京代表团遵照执行，核心之点是“渡江问题应严加拒绝”。

当日，刘仲容受命再赴北平周旋。李宗仁交代，一定要竭尽所能，使毛泽东放弃渡江的条件。刘仲容下机后径赴双清别墅，直言告知毛泽东，李宗仁、白崇禧还是坚持“划江而治”。

毛泽东说，这是李、白的一厢情愿，解放军已决定近日渡江，要他转告李宗仁，先生在解放军渡江后不要离开南京，如果认为南京不安全，可以飞到北平来，共产党会对他以贵宾款待，那时和谈仍可继续进行。刘仲容将毛泽东忠告报告李宗仁，李未表态。

> 三代表指国民党政府谈判代表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四个顾问指代表团顾问屈武、刘仲华、李俊龙、金山。
> 《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480—48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毛泽东得悉李宗仁、白崇禧的态度后，决定摊牌。4月13日清晨，他致信周恩来写道：“今日下午双方代表团应举行一次正式会议。在此会议上，宣布从今（13）日起，结束非正式谈判阶段，进入正式谈判阶段，其时间为13日至17日，共五天。在此会议上，大略解释协定草案的要点，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另向张治中表示，4月17日必须决定问题。18日以后，不论谈判成败，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他们派回南京的人，14日上午去，15日下午必须回来。南京四要员（李、于、居、童，不要张群）如愿来平，15日至迟16日必须到达，17日必须举行签字式。”“应争取南京代表团六人都同意签字。如果李、何、白不愿签字，只要他们自己愿签，亦可签字。签字后他们不能回去，叫他们全体留平。如他们因南京不同意签字而不敢签，并有些人要回去，则必须争取张、邵、章三代表及四个顾问[注]留在北平。今天晚上应举行各党派代表人物（十人）的会议一次。”[注]

4月13日清晨，周恩来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言明晚上召开双方代表团会议讨论决定。当天，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新闻稿，向中外披露国共和谈进展情况：“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就八项基础的和平条件举行的谈判，已达十二天。在此十二天中，双方就各项问题非正式地交换意见。从本日起，进入正式谈判阶段。”

张治中回到六国饭店，即召集全体和谈代表、顾问和秘书研究协定草案。大家看完草案，第一个感觉就是全篇充满了劝降和罪状的语气，众口一词叹曰：完了，和是不可能了！虽然，大家事先也明知这次和谈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但拿到文本，还是期望“奇迹”能出现，盼着能找到南京政府渴求的“划江而治”等内容。但一读再读，每个人都深深地失望了。和谈代表和顾问抓紧时间逐条逐款研究，悉心寻找可能融入南京政府意志的空间，反复斟酌哪些语言更易于为政府所接受，以便提出修改意见。

4月13日晚九时，国共双方和谈代表再次聚首中南海勤政殿。

周恩来作《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的说明，阐明草案所持原则，追述了南京政府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内战的历史责任，严正提出，战争的全部责任应该由南京国民政府担负。他依据毛泽东所提八项主张，就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款项的具体内容，一一作了说明。

张治中逐一提出了对条款不可能接受的各点的具体意见，强调对于国民党的错误，有诚意承认；对于国民党的失败，也有勇气接受。不过前文里有若干过于刺激的字句，希望能够酌加删节。战争责任问题，希望不要作成一个条文，更不宜在条文上规定南京政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所辖的一个机构等。他最后颇为动情地说：“今后国家的责任，是落到了你们的肩上。国民党的政权当然是完了，今后的国民党或者再经过一番改造后，做中共一个友党。目前则我们以至诚至敬之心，希望中共能从此领导国家，达到独立、自由和民主的目标，并建设国家，臻于富强康乐之境。”他表示，愿意就中共所提草案再加研究，并将提出修正案。

会议临近午夜十二时结束，双方同意协商后择日再次开会。

南京政府代表回到饭店，张治中召集代表研究和平条款修正案，顾问和秘书亦列席，极力搜寻可以拓展的空间。14日晚，张治中把南京政府代表团提出的修正案交给周恩来，两人谈了很久。

与在平政府和谈代表一样辗转难寐的，还有在宁的李宗仁。

《司徒雷登日记》，第109—110页，黄山书社2009年7月第1版。

4月13日，周恩来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正式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团后，李宗仁获悉“划江而治”和谈腹案破产，急忙求救于司徒雷登。司徒雷登14日日记载：“李宗仁派甘介侯告诉我中共要求在江阴渡江，并要由安庆横过一带占据九个县份（应为八个），李氏请求我回答以下几点：一、美国能做出些什么？二、

我将会劝告他做什么？他预备让我加以深思熟虑。甘氏明天一早就来领取回音。及后我告诉甘介侯说我不能作出官方答复，也不能给他意见。不过只有鼓励他采取坚定立场，拒绝承诺，观察事态演变结果，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是不会受损害的。”

4月15日清晨，南京政府代表分别与中共代表交谈，想最后努力找到解决问题的一线希望，“但是进展殊少”。南京代表团经两次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四十多条，以书面形式交与中共代表。

毛泽东得知这些意见后指示，坚持应该坚持的，忍让可以忍让的。结果，南京政府代表团的意见半数以上被采纳，形成了八条二十四款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当晚七时，周恩来把《国内和平协定》定稿交给张治中，说：“这是最后的一个文件。”张治中问：“所谓最后的文件，是不是解释为最后的通牒，只许我们说一个对或不对？”周恩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最后提出来的一个定案。”“也好，干脆！”张治中见文件封面已无“草案”二字，意识到双方商谈已经画上了句号。

周恩来提醒张治中：“中共方面已决定，解放军4月20日过江。”张治中一愣，问：“你过去说和平协定签字后三两天就渡江，我是没有同意的。现在协定还没签字，你怎么说决定4月20日渡江呢？”周恩来说：“你们派人把文件送到南京请示，如果可以签字，渡江日期和办法可以商量。”张治中又问：“如果请示后不能签字，中共4月20日就渡江？”“是的。”周恩来回答说。一切再说都显得多余。两人商定，当晚九时在勤政殿举行第二次会议。

在当晚举行的会议上，周恩来对协定稿修正之点作了说明，申明这是不可变动的定稿，并正式通告，本月20日以前，如果南京政府同意和平协定就签字，否则解放军就马上过江。

张治中发表意见说，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以说是告一个结束了。谁胜谁败，谁得谁失，谁是谁非，当然有事实作证明，将来也自有历史做评判。不过要打个比方来说，我想国共两党之争，好比是兄弟之争。在旧中国伦理里，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做哥哥的友爱弟弟，做弟弟的才能恭敬哥哥。我觉得，我们国民党在这二十多年来，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对待共产党实在太狭隘了一点。老实说，是有很多对不起人家的地方。我们国民党虽然失败了，但是今后它还有新生和改造的机会；我们还是愿意重新团结合作，来共同担负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这次我对毛泽东先生说，今后是你们执政了，你们怎样做？他马上说：“不是的，我们大家来做，大家合作做的！”我们没有别的，只有祝望两

党过去的一切芥蒂、误会、恩怨，永远结束；过去的让它过去，今后我们应有一个新的意愿。在我们方面，当然首先作一个自我反省，同时希望中共方面也保持着这种远大的目光、开阔的胸襟、明朗的态度，来领导未来的、历史性的、新的政权。

周恩来微微一笑，对张治中的“兄弟”比喻作了一个驳正：“假使文白先生说双方的关系等于兄弟一样，是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那么我们都是为和平而努力的，我们很愿意接受。但是如果拿过去国民党二十多年来尤其最近两年又九个半月的蒋介石朝廷来说，这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表示它的严肃性。说是兄弟之争，如果把蒋介石朝廷和一切死硬派也包括进去，就失掉了它的严肃性。”

会议十时二十分结束，南京政府代表回到饭店经过郑重研究，认为协定定稿已接受代表团所提四十余处修正意见的一半以上，特别是关于战争罪犯一项删去了“首要次要”字样，把南京政府和所属部队置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之下的表述也改写了，尽管协定写明的条件过高些，如果能了然于“败战求和”“天下为公”道理，不囿于一派一系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就只有毅然接受；以诚心承认错误，以勇气接受失败，则对国家、对人民、对国民党保全者实多，总比顽固到底、失败到底的好，只有接受这个协定为是。大家推举黄绍竑和屈武16日携文件乘专机飞南京请示。黄绍竑清楚，自己被推举携条款回南京，是因为是桂系中人。且不说李、白抱定“划江而治”幻想难以说动，即使有变，又何能做主，岂不是仍要溪口最后拍板吗？

周恩来得知黄绍竑被推举回南京请示，在饭店等到凌晨二时，勉励他努力完成这项任务。黄绍竑感念周恩来的一片真情，但对受命回南京请示持谨慎乐观态度，说：“照我看，至多是五十对五十的希望，或者还要少一些，我总努力去进行就是了。”

黄绍竑素患心律不齐，应其请求，北京医院赵医生与他同车赴机场回南京。周恩来率中共全体和谈代表来机场送行。黄绍竑感到意外的是，一同登机的还有莱芜战役被俘的桂系师长海竟强。黄绍竑当然知道，周恩来下令释放白崇禧亲戚海竟强用意何在。

4月16日下午二时许，黄绍竑和屈武乘专机返宁，前来迎接的政府大员阵容，不输出发时欢送盛况，足见众人企盼之殷。

> 黄启汉：《1949年“和谈”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67期，第36页，中华书局1980年1月第1版。

四时许，黄绍竑在傅厚岗向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黄旭初等报告和谈情况，提出我们军事上不能保持均势，政治上不能取得平等地位，形格势禁，无路可走，只有和局方可自保。李宗仁等听了介绍，开始翻看协定文本。何应钦说，这个重大文件，要拿回行政院开会研究讨论才好答复，好在距离答复最后期限20号还有几天。李宗仁没有马上表态，但黄绍竑发现，何应钦、白崇禧神色都不对。他提醒大家，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既不同于1925年，也不同于1937年，大势如此，谁能改变？白崇禧看完协定，怒气冲冲对黄绍竑说：“亏难你，这样的文件也带得回来！”说罢起身走了。李宗仁看了协定后犹豫不决，因何应钦、白崇禧等持反对态度，他更不敢拿主意了，令人马上将协定送溪口征询蒋介石意见，同时要求中共暂缓签字日期。当晚，黄绍竑打电话给张治中说，和平协定还要行政院开会研究讨论后才能答复。

黄绍竑心脏病复发入院，总统府参军长刘士毅通知，17日上午，请他到行政院在国防部会议厅召开的秘密会议上作报告。黄绍竑准时到场，得知会议由何应钦主持，吴铁城、阎锡山、黄少谷、顾祝同出席，李宗仁列席会议。黄绍竑报告和谈经过讲了约一小时，最后说：“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全体代表认为，中共这个和平条款，与1月14日提出的和平谈判八项条件没有什么出入，李代总统以前也曾发表声明，承认中共提出的和平谈判八项条件，所以，全体代表认为，中共提出的和平条款是可以接受的。”

黄绍竑作完报告，何应钦请到会者发表意见。吴铁城首先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发言。他说，中常委是党的最高决策机关，中常会并未承认中共和谈八项条件。李代总统的声明只是说可以商谈，并不是完全承认。他指责和谈代表团应随时请示中央，何能遽然认为可以完全承认？尤其废除宪法和法统两项最要不得。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法统是实行宪法的表征，如果都废除了，中国将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呢？黄少谷代表行政院发言，对中共和平谈判条款逐条进行批驳，认为万不能接受。顾祝同介绍了前方解放军调动情况，判断解放军正部署渡江攻击，中共和谈决无诚意。何应钦最后问阎锡山有什么意见。这位前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喉中似有浓痰涌动，低声嘟囔说，这个条款实质上是难以完全接受的，即使接受了，以后也很难解决问题。黄绍竑回忆说：“他短短几句话，好似楔子一样深深地打入反共人们的心里。”

李宗仁在会场如坐针毡，最为尴尬。如随声附和反对和平协定，等于自打耳光，因他已声明承认以中共和谈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如赞成和谈代表团意见，势必与蒋系及军方产生冲突，难免被轰下台甚至被拘。黄绍竑猜测，李宗仁内心深处是觉得和平条款与他代总统的既得利益是有矛盾的，故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主持会议的何应钦宣布，和平协定不能接受，由行政院答复。

秘密会议散会后，黄绍竑回到李宗仁公馆就给张治中打电话。张治中问：“情形怎么样？”黄绍竑表示不便在电话里谈，说行政院今晚或明日就有书面声明答复。但他给了张治中一个再明确不过的信号：“我今日下午就飞香港。”张治中听罢连声“呵，呵，呵”。他猜测，托屈武带回南京的信，想必吴忠信已转呈蒋介石了。总裁阅信后有何反应？现在，他似乎已得到明确的答复。

4月17日中午，黄绍竑对李宗仁说：“我在这里没什么事了，你快放我回香港。”李宗仁问参军长刘士毅有何便机，刘说有飞上海的客机和飞广州的专机。黄绍竑想到上海特务太多，便直奔明故宫机场飞返香港。行前刘士毅送来代总统给的一百五十万金圆券旅费。黄绍竑暗忖，这数量不菲的金圆券，还值几块钱呢？

黄绍竑在机场意外遇到一起从北平回来的屈武。他急忙问黄绍竑，事情怎么样了？黄绍竑不便明说，告诉他自己回香港，希望他也早些回西北，久住南京无益。屈武即刻领悟，连声说好。

黄绍竑登机后，见吴铁城坐在公务舱，便颔首示意，溜到后面坐下，又担心飞机先飞溪口，吴铁城向蒋介石禀报，那不等于自投罗网？万幸飞机南飞两小时直抵广州。下飞机后，黄绍竑应邀住广州市长欧阳驹家，进门就一头倒在床上，连接风宴也无力出席，只催快请医生给自己看心脏病。广西驻粤代表登门看望，黄绍竑托他将李宗仁送的金圆券换成港币。代表面有难色说，下午金圆券已没有行市。显然，国共和谈破裂令市面一片肃杀。

讵料晚上十时左右，国民党中央党部来电话，要黄绍竑到中常会作和谈情况报告，中央党部副秘书长郑彦棻带车来接，说在粤各位中委（包括执监委）都希望季宽先生到会作报告，就是有病少讲几句也好。黄绍竑只好硬着头皮前往。迁粤中央党部在四层楼上，没有电梯。黄绍竑走到三楼实在上不去了，便坐在楼梯上休息。曾任孙中山侍卫长的马湘扶他走进四楼会议室，孙科等已等候在那里。黄绍竑强打精神说，我实在有病不能作报告，好在吴秘书长上午在南京参加了会议，一切情形他都知道，就请他作报告。说完就告辞离席回到欧阳家，翌日逃难似的直飞香港。

17日，蒋介石怒斥:“文白无能，丧权辱国！”其日记称和平协定“是无条件的投降处分之条件”，主张“速提对案交共党，一面拒绝其条件，同时全文宣布，以明是非与战争责任之所在”。

同日，李宗仁独自致电章士钊一诉衷肠：昨日立法院开秘密会议，何应钦宣读协定全文后，即使彻底主张和平之立委，亦噤若寒蝉，不敢有所主张。他自己即使同意也无济于事。

4月18日,在穗国民党中常委遵照蒋介石指令发表声明，拒绝《国内和平协定》，通知代总统李宗仁和行政院院长何应钦照办。

（九）江南归来的回民支队

对于望江县回民村的村民来说，1949年4月20日是不寻常的一天。此前村中清真寺大殿的礼拜，或许是一些人此生最后一次参加盛典和洗礼。

一大早，七十二名头戴白帽、身穿礼服的村民，相约走进清真寺礼拜大殿共商大事：明天就要送大军渡江了，大炮一响，扬帆起航，江上的子弹怕是比飞蝗还要密。假使哪个兄弟光荣了，谁养活他们的老婆孩子？谁给他们爹娘送终？

其实他们最关心的这个问题，解放军首长在动员支前时，就已把地方政府政策讲清楚了。可这些善良的回民，都是头一回为共产党和解放军做事，面对生死大考，心里总觉不踏实。他们商定，利用起渡前最后一次礼拜，议出一个人人认可的生死契约，并当众起誓，大家都放下心事参战，让死者安心、生者尽责。

念过私塾识字解文的马普清，是契约起草人。前辈后生发言开门见山，形成的契约一目了然：全村九十多条船，不管谁牺牲了，每条船和每个生还者，都有赡养扶助逝者家人的义务。契约写好后，在场村民都在自己名字上庄严地摁下鲜红的手印。

接下来，渡江部队第十六军第四十六师回族干部周指导员讲话：乡亲们，我们马上就要渡江了，有你们的支持，有你们丰富的经验和熟练的驾船技术，我们对胜利充满信心。真主在天上看着我们，他一定会保佑我们顺利渡江，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让大家都过上当家作主的好日子！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明天即操舟南渡者神色肃穆，准备迎接那个生死未卜但注定要被历史铭记的日子。打小就在江上使船的汉子，看风簸浪淘已稀松平常，可近一个多月江上来去，确曾像是重新活过了一回。

小村位于望江武昌湖与长江间，偎江傍湖，渔耕两利。村里回民的祖上，是清朝在运河上的漕运兵。1855年8月，黄河最后一次改道不再夺淮而从山东入海，古来漕运江南稻谷、丝绸、茶叶和各种工艺品进京的京杭大运河航道淤塞。断了生计的漕运兵从此流落长江，其中马、董、方、刘、丁五户回民辗转来到望江一带捕鱼、漕渡为生，在守望相助中聚居江北，繁衍生息，逐渐形成了回民村。世代在波峰浪谷讨生活虽说清贫，倒也苦中有乐。

然而，打从日本人挑着膏药旗来到这里，他们的世外桃源就成了一个遥远的梦。小鬼子在江边驻扎下来，就像灾星在村里落了户。1944年，一个姓马的没出阁的黄花闺女，让他们在村东头高岭上给剥光了，轮番凌辱不说，还让狗腿子通知全村老少爷们去看。那闺女没脸见人，一绳子吊死了。后来美国人来了，开着飞机在江上轰炸扫射日本军舰。小鬼子也真够邪行的，竟然把美国飞机打下来，一头栽到江里。村民们把飞机发动机捞上来，村里在外读书的秀才认得上面的洋码子，说是北美航空公司造的。好容易把日本人熬走了，可撵着脚跟来的国民党军，像小鬼子托生的，进村不是拿大鱼，就是找俊妞，还在江边枪杀了俩青年……

更大的厄运在一个月前那个湿漉漉的傍晚降临，从江南过来的一拨国民党兵，用手中的大枪还有最恶毒的秽语，把正在家吃晚饭的七十二个男子汉，连同村里的三十二条渔船，一股脑儿掠到南岸，船拖进吉阳汀湖派兵看起来，人押到山上给匪军挖工事。

山上驻有刘汝明八兵团第六十八军一个团，守东流至吉阳段长江。惯于鱼肉百姓的匪兵满肚子损招，以定量管理克扣民工粮食，规定每人每天挖两米长、一米半宽、一米深战壕，达标发给半斤米。壮年民工苦干一整天，半斤米怕是连打底儿都不够呢。

落难江南，村民们却心齐得像一块铁。米不够，菜来凑。众人商定，每天派三人上山挖芦苇根、马齿菜掺米熬粥，以“瓜菜代”充饥果腹，三人余下的活大家分摊。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天，青壮年们的眉头锁得越发紧了。多数人都拖家带口，一大家子全靠男人浪里行舟糊口。偏偏1948年夏皖江破圩、望江大水，沿江百姓困苦不堪。春荒时节，打鱼人和船一走，等于断了全家吃食。

春季水枯，皖江瘦得只有里把路宽。就在最悲苦时，江北传来铁皮喇叭放大的声音。1933年出生的董玉发，此时尚不满十六岁，他至今记得江北传来的那带着点苞米 糙子味的北方话：“国军弟兄们！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让受苦受难的百姓都过好日子。我百万渡江大军很快要突破长江，抵抗只有死路一条。咱们都是自家弟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快到江北来吧，解放军优待起义、投诚人员，在那边当什么官，过来还当什么官……”

喇叭筒里又响起了婆娘们黏得像米粥一样的呼唤：“孩儿他爹！解放军是救命恩人啊！老少爷们说，几辈人都没见过这么好的队伍！你们走后，家家户户都揭不开锅。解放军挨家送上十几天救急粮，每人一天一斤。村里的锅灶又开始冒烟了，大人小孩都有了笑模样。恁快想法把船拖回来吧，解放军渡江正等着用船呢！”

隔江喊话把南岸守军的心搅成一团麻，也使江北来的回民们心里七上八下。守军中有个姓曹的班长是望江后山人，与马普清是同学。第二十一天早上，两人意外碰了头。一见面，同学班长逮住他就猛戗：“马上要打仗啦，你过来找死啊？”马普清听着这话扎耳朵，便回敬说：“不是我找死，是你们抓我来找死！”

大家心正悬着，转天马普清却给大家咬起了耳朵。原来，曹班长打从听了解放军喊话，心就飞到了江北，趁便悄悄找到马普清，塞给他一张纸条，转身离去。马普清找个没人的地方一瞅，纸条上写着：“明晚我当班，我支开哨兵，你们夜里十点把小船推出湖口，上船就往江北划。记住，动静要小，听见枪声别慌！”

那晚没有月亮，大约十点钟，回民们解开泊在汀湖的二十二条小船缆绳，三五人一伙围在船边，一手抓船，一手划水，悄没声地驶向江北。船队离岸约有一百米，身后突然枪声大作，红色弹道在天上织成了一张火网。慌乱中有的船打起了转转。

“别慌！枪是朝天打的，人船都跑了，不开枪对上峰交代不了。”马普清镇定地说。众人再看天上的火网，果然离水几丈高。有人猜出了几分，问：“班长为啥放我们？”马普清回望山影模糊的南岸，眼中闪过一丝狡黠，“告诉你们，他也想回家！”

马普清的话，令众人如堕五里雾中。大家簇拥在小船两侧加紧划水，北岸黑黢黢的轮廓已经在望。到啦，终于到啦！可离岸五十米远近时，他们蓦地发现，有七八十号人持枪站在江边！

一瞬间，一群“江碰子”在家门口陷入进退两难境地，有人甚至想掉转船头折回江南。“回去就是死路一条！”马普清的声音带着几分威严，“反正是个死，不如死在家门口！”说着，他手扶的小船带头向岸边驶去。其他小船也慢慢跟着靠向岸边。

就在北归的船队驶近岸边十几米远时，岸上的人高挽裤管，争相下水朝小船奔过来了！这下“江碰子”们全都傻了眼，僵卧水中不知所措。很快，马普清被扶起来了，其他人也都陆续被从水中拉起，蹒跚着上了岸。这时他们才看清，扶助他们上岸的小伙儿个个龙睛虎眼，斜背着大枪挺立江边，活像一排黑铁塔。

一个姓周的连指导员，指着和士兵穿一样黄布军装的大高个儿介绍说：“这是我们首长。”大个子首长抬手打个招呼说：“乡亲们，你们都是回民村的吧？我们是解放军，前几天安排你们家人给大家喊过话。”说着，吩咐身边人脱下军装，给冻得筛糠似的回民们换上，又对大家说：“饭已经做好了，请大家吃点饭暖暖身子！”

后来方知，众人被抓江南后，解放军来了，久旱逢甘霖的村子苏醒了。进村入户的有回族周指导员，还有李科长、宋联络员等八名官兵。周指导员耐心地与阿訇王太安沟通，讲清子弟兵渡江是为解放穷苦大众，全国解放回民才有出路的道理，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不知不觉走进了回民村村民们的心中。解放军官兵还送粮上门，使揭不开锅的乡亲们有了活路。

此刻，部队伙房桌上已摆好几盆香喷喷的大米饭。渡江过来的众人眼睛一亮，便拥了上去。这怕是他们这辈子最难忘的一顿饭了。2021年6月28日，笔者到回民村采访当年送大军过江的穆斯林中唯一存世的董玉发，忍不住问：“那晚你吃了几碗米饭？”

“几碗？”董玉发诧异地望着我说，“哪还顾得上用碗啊！大家饿得全都用手抓，两手不停地抓着米饭往嘴里塞。”董玉发有些神往地忆起当时的情景，说：“大个子首长见大家都打起了饱嗝，便说：‘请乡亲们今晚把衣服烘干，明早送回来给战士们穿。’”

第二天一早，村民们来送衣服，大个子首长请大家吃过早饭，又领进清真寺，掏心窝子说：“乡亲们，渡江战役很快就要打响了。解放军过了江，全国人民都解放，到那时候没有受压迫的，没有穷人，没有不识字的，大家都过好日子。过江需要船和水手，你们打小就操舟使船，我们非常需要你们帮助，欢迎大家积极报名支前当船工。当然，这完全是自愿的事情，不愿意不强迫。”大个子首长说到这里，环视在场村民又说：“打仗没有不死人的。假如你们参战，这么多人，我不敢保证一个不死。怎么办呢？政府有政策，咱们也可签协议。船工支援渡江牺牲，和部队阵亡官兵一样评革命烈士，家人享受烈士待遇，国家负责把孩子养到十八岁，送校读书培养成才，父母共产党给养老送终。有的老乡可能会问，协议不兑现怎么办？我说，如果当地不兑现协议上的条款，村里人就拿着协议到北平去找毛主席，看哪个敢不落实！”

大个子首长的话像一团火，呼啦一下把大家的心烧热了。阿訇王太安又开腔说：“咱们都是穷苦人。过去为啥穷？都是反动政府造成的！支援解放军渡江是惩恶扬善，帮助解放军过江打反动派，就是为了拔穷根，让下一代过好日子。政府规定了支前船工待遇，船工牺牲和部队官兵一样追认烈士，流芳千古。这也是真主的造化，后世我们会进天堂享受幸福的。”

阿訇的话，又在众人心头添了一把火。大家七嘴八舌议论，自古以来，哪有不祸害百姓的军队？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军强奸杀人，无恶不作，解放军为全中国穷苦人打天下，还给老百姓送吃的，这样的队伍打着灯笼也难找啊！大伙儿越说心贴得越近，一合计，只要老婆孩子能过上好日子，死了也值！于是，七十二人全部报名参战支前。经周指导员等人做工作，邻村马家店在回族青年马兆美带动下，

也有五十多名回族村民报名参加渡江突击队。两个村的青壮年，组成了一支一百二十七人的回民渡江突击队。

望江县积极筹船上千只，回民村东，军民日夜掘土开渠，向北挖了两条宽约六米、深约一米半、长约五里的引河，筑了十道拦水坝，修了二百四十个船坞。部队还在船坞附近挖了供隐蔽登船的交通壕，用一百部水车，从两侧沟塘抽水上万方注入引河，将内湖的船只翻坝入河泊于船坞。为适应突击队登陆要求，尽量缩小航渡目标，周指导员召集老船工马承志、木匠胡孝明等人琢磨，怎么不用帆也能快速行船。胡师傅和船工创造出叶轮鼓水新技术，在船两侧加装可脚踏手摇转动的叶轮，为依赖风力行驶的木船平添便捷可靠的新动力，过江船队如虎添翼。

人装齐备，回民渡江突击队在进行诉苦教育、激发阶级觉悟的同时，加紧展开临战训练。回民村的马承志、马普清、丁宪友，马家店的马兆美、丁宪良、马兆国等人，都当上了水军教头。一天夜晚，周指导员、李科长带领大家悄悄把船队开到怀宁县苍蒲闸一带夹江和官洲、江心洲训练。根据渡江部队安排，两个村的村民还分头驾驶船只，来到十几里外的双湖，配合部队进行训练演习。演习完全是在实战条件下进行的，部队首长一声令下，群船齐发，湖岸霎时枪声大作，机关枪、迫击炮一齐开火，湖上弹雨横飞，浪柱四起。起初，船工们还有些紧张，但同船解放军告诉大家说，老乡，不要怕！今天动用实弹进行演习，主要是让你们适应一下战场环境和氛围，不然渡江时你们一紧张，说不定真操不了船了！村民们想起从江南偷渡之夜头顶上红彤彤的火网，忽觉双湖爆豆一样密集的枪炮声，竟像过年时燃放的鞭炮，隆隆的炮声响过后，穷苦人朝思暮想的好日子就要到来了。

实弹演习结束准备返航时，国民党飞机来了。一阵轰炸扫射，一名解放军战士和官洲一名船工牺牲。过好日子免不了流血牺牲！大军起渡前的特殊一课，恰好为望江回民渡江突击队加钢淬火。

（十）“紫石英”号乞降三江营1949

年4月20日上午，华野特纵炮三团团长李安邦和政治委员康矛召去扬州开会，忽听从三江营方向传来一阵急促的炮声。

三江营旧称三江口，位于扬州东南二十公里处，因扬子江、淮河入江口处小夹江和扬中太平江三江汇流得名。南北江岸呈乳状伸入长江，江面狭窄，港湾众多，南岸沙洲易于登陆，古来强渡长江多选此地。4月18日，炮三团团部率一连（配备三门日式105榴弹炮）和七连（配备三门日式75野炮）进驻三江营阵地。

开战前几小时，三江营的炮声，紧揪着两位团主官的心。他们很快接到电话报告：“一艘英国军舰不顾我军鸣炮警告，强行溯江驶过我三江营左翼炮位，我向英舰开火，英舰还击，英舰中弹三十余发，悬出白旗驶向南岸，停靠在我阵地西南约七千米处。”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英国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军舰一直享有在中国沿海和内河航行权利。1943年，中英签订《中英平等新约》及“换文”，本已废除英国在华特权。但英国当局实则并未如约全部撤废在华特权，英国军舰继续耀武扬威航行长江。

1948年冬，英国政府借口稳定长江沿岸侨民和便于撤侨，经国民政府同意，英皇家海军远东舰队派一艘军舰驻守南京，每两三周换一次班。从1949年3月22日起，“伴侣”号护卫舰驻留南京，原定4月12日由“浅港”号接班。4月7日，英国驻华大使史蒂文森鉴于长江一带形势紧张，决定延至16日接班。考虑到“浅港”号30日须赴日执行任务，皇家海军远东舰队副总司令梅登中将决定，派“紫石英”号4月20日到南京接替“伴侣”号。

“紫石英”号是一艘改进型黑天鹅级护卫舰，排水量一千三百五十吨，装备双联装四英寸MKXVL主炮三座，十二门二十毫米防空炮。该舰1945年击沉过德国潜艇，二战后编入英国远东舰队。

渡江战役发起前，新华社已受权发布外国军舰从速撤离长江交战地域通告，明确此后在解放军预定渡江江段航行，警告后仍不离开的外国军舰，渡江部队将开火射击。接此通告，美国、法国军舰均在规定的最后时限前驶离长江，但英国军舰却置若罔闻。

后来公布的材料证明，英国驻华大使史蒂文森曾致电梅登，不要在国共两军将于长江一决雌雄的危险时刻派舰来南京换班。但出身海军世家的梅登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近来这类情报收到多次，准确程度不高。英国海军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蓝水海军之一，其卓越功勋曾在敦刻尔克大撤退、英国远征军撤离、诺曼底登陆等重大军事行动中蜚声世界。在他看来，武器装备落后的解放军对英国军舰不构成威胁，即便形成对峙也不敢向英舰开炮。在他的潜意识中，中国任何水域都不存在英国海军的禁区。梅登还考虑到，“准时并非中国人的习惯”。到4月20日，“伴侣”号驻守南京已达三十天，前往换班的“紫石英”号也行程过半，于19日晚泊于江阴。于是他决定，“紫石英”号继续按计划向南京开进。

梅登显然对1949中国长江之春缺乏清醒认知。彼时，长江两岸已陈兵近二百万，任何一点火星，都足以引爆交战区域的紧张空气。国民政府倒台在即，已稳操胜

券的人民解放军，会允许英舰妨碍作战在中国内河横冲直撞吗？然而，梅登的傲慢与无知，注定使“紫石英”号在一触即发的冲突中扮演下地狱的角色。

4月20日上午八时三十分，配属第二十军的炮三团七连观察所，首先从三江营江面发现飘着英国米字国旗的“紫石英”号。

此时，离中集团预定渡江时间仅九小时，离东集团预定渡江时间仅三十三小时，预定渡江突破水域，已进入高度警戒状态。

七连当即向团部报告，英舰“紫石英”号已进入我控制水面。团部即令各连做好战斗准备，明确指示，如英舰不向我射击，我亦不向其射击；如英舰向我挑衅，应即坚决还击。

战争之神的血性，最终被闯入交战区水面的英舰点燃了。面对来自西方大国海军的挑衅，炮三团七连连长运用战时独立战斗单位随机处置之权，下令开炮警告。但“紫石英”号舰长史基纳并未把解放军警告当回事，下令加速前进，全力开炮还击！炮三团一连看到英舰向我开火，也迅速开炮回击，与七连协同作战。

“紫石英”号火力全开破浪前行，但无法压制北岸两个炮兵连愤怒的炮火。英舰被击中三十余处，炮塔被毁，指挥台中弹，左舷前部吃水线下被炸开一个大洞。因炮一连和七连均无穿甲弹和延发引信，故未能将“紫石英”号击沉。重伤殒命的史基纳舰长倒在舰桥上，鲜血染红了洁白的军服，副舰长威士敦也身负重伤。失去控制的英舰越出航道，搁浅于太平洲以北江中小岛蓬徒镇北岸。此时，“紫石英”号三座双联装四英寸MKXVL主炮已完全失效，舰艉主炮被击毁，舰艏主炮因军舰搁浅方向不对无法使用。水兵们一面发电呼救，一面用小口径武器继续还击。

搁浅的“紫石英”号由水上活动目标变为固定目标，使北岸炮兵的火力更加精准。英舰不堪群炮齐射，降下舰上的米字英国国旗，悬起一件白衬衣示意投降。炮三团官兵见英舰挂了“白旗”，遂停止射击。不料，“紫石英”号很快收起悬挂的白衬衣，复又升起英国国旗，于是又召来北岸炮兵更加猛烈的射击。“紫石英”号慌忙降下国旗，接连升起三件白衬衣，北岸炮兵方停止射击。舰上六十多名水手先后弃船跳入江中，泅水登上南岸。

历史每一次重演，都会唤起特定地域的文化记忆。

三江营曾是岳飞大败金兵之地。南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岳飞在常州一带四次大败金军，迫使其主帅金兀术退至江北六合。金军监军完颜昌攻陷楚州（今淮安）后，企图从通（南通）泰（泰州）南渡。岳飞就任通泰镇抚使兼知泰州后，在泰州西北设置“水八卦阵”，使完颜昌进入迷魂阵。岳家军隔岸轻舟奇

袭，打得金军落荒而逃。岳飞料定金军会改道南渡，而境内一马平川、无险可据，遂在柴墟以西江都郭家庄（今嘶马）、大桥一线布下疑兵阵。当地人喜养羊，大风起时黄沙漫天。岳飞点起一队人马驻守郭家庄，分兵把守沿江要点；同时派出两支人马，一支在郭家庄征集壮羊，用绳索将羊倒悬缚于树干，每只羊前放一面鼓；另一支二百骑兵进至沙洼，每匹马尾均系树枝。农历十一月二十三日，完颜昌果然率兵来犯，企图从大桥东乡南下，偷袭三江营过江。岳飞急令沙洼骑兵扬鞭策马，来回奔驰，马尾所系树枝风中扬沙，遮天蔽日，同时令郭家庄部队解开羊前蹄绳索，满村悬羊乱蹬鼓面，一时战鼓喧天，战马嘶鸣，漫天黄沙犹如千军万马呼啸而来，金兵无不大惊失色。岳飞乘势率军进击，完颜昌急忙鸣金收兵。

八百多年后，人民解放军炮兵在岳飞智退金兵的三江营，给来犯英舰以迎头痛击，使“还我河山”的民族血性再度扬威。

4月20日，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接炮三团报告，喃喃自语：“原来设想美国军舰可能阻挠渡江，怎么先出场的成了英国人？”

英国海军与北洋水师曾为师徒。北洋水师名将邓世昌就曾多次赴英接舰，研习英国皇家海军规章制度和练兵之法，为北洋水师成军和从英、德引进军舰形成战斗力，获取有益经验。渡江作战在即，“教师爷”跑到学生家砸场子，这事儿非同小可！

陈士榘即令电告总前委。发报前，他一脸迷惑地问刚刚赶到的炮三团团长和政委：“你们的观察员能准确识别美英国旗吗？”

团政治委员康矛召肯定地回答说：“首长，我们能准确识别！部队进抵长江前后，专项训练过识别美英法等国军舰和旗帜。”

4月20日下午一时，英舰“伴侣”号从南京驰援三江营。“伴侣”号配有八门一百四十毫米主炮，火力猛，射速快。炮三团七连发现又有一艘英舰闯入战区，果断开炮射击。“伴侣”号当即中弹五发，慌忙顺流东驶，行至“紫石英”号以东两海里处又掉头西进，企图接近“紫石英”号拖其出险。狡猾的“伴侣”号沿北岸向西折返时，利用七连阵地与江岸形成的死角和火力优于七连75野炮的优势，数炮齐射，当即击毁七连野炮两门。“伴侣”号继续上行时，遭炮三团一连榴炮拦击，舰长罗伯臣中校负伤。据战后英军自称，“伴侣”号与解放军作战两小时，发射炮弹三百余发，击毁中共军火炮多门，击死中共军约六十人。该舰自身亦受重创，测距室被击毁，轮机房亦中弹，驾驶盘受损，舵手中弹而亡，舰上还有二十五人受伤。眼看救援无望且自身难保，“伴侣”号掉头下驶，冲破炮火拦截仓皇撤往江阴。

彼时其总司令布朗特海军上将正在伦敦。

英国远东舰队获悉两艘英舰在长江三江营中弹受创，副总司令梅登海军中将登上舰队旗舰“伦敦”号，率护卫舰“黑天鹅”号由上海急赴长江出事地点。

“伦敦”号属重型巡洋舰，排水量一万三千三百八十吨，配有三座双联装二百零三毫米/五十倍径BLMarkVIII主炮，四门单装加二座双联一百零二毫米/四十五倍径QFHAMarkXVI高炮，二座四联装加四门单管四十毫米/四十倍径维克斯Mark112磅砰砰炮。

4月20日晚八时，“伦敦”号和“黑天鹅”号在江阴与“伴侣”号会合。梅登决定将受创严重的“伴侣”号调回上海抢修。21日清晨，梅登率“伦敦”号和“黑天鹅”号溯水西进，联手再救“紫石英”号。两舰驶近三江营江面，即遭来自北岸炮三团的猛烈炮击。英舰迅即以大口径火炮还击，水陆炮战异常激烈，英舰相继中弹。梅登意识到，面对北岸炮兵密集的火力，单靠“伦敦”号和“黑天鹅”号施救“紫石英”号，已不切合实际，其结果只能使所有英舰都遭受重大损伤，于是下令两舰返航。

梅登率两舰返航途经江阴，进入第二十三军渡江地段八圩港江面，放慢航速做游弋和窥探状。由于担心受到解放军炮火轰击，英舰开启广播，声明“无意与解放军为敌”。

驻守靖江八圩港的是配属第二十三军的炮六团一营三连，四门美式105榴弹炮，面对停在江心的“伦敦”号和“黑天鹅”号。

4月20日傍晚，炮六团团长马大卫赶到三连所在的一营，向营长教导员传达军司令部作战命令，告知南京政府已拒签和平协定，毛主席、朱总司令明天将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令该营一、二连明晚支援步兵渡江；三连白天担任阻击国民党军舰任务，晚上支援步兵渡江。马团长命营教导员杨刚连夜到三连作动员。

第二天，三连没等来国民党军舰，反而遭遇了英舰。看见“伦敦”号“黑天鹅”号在阵地前二千米处游弋，杨刚即向上级报告。

4月21日下午四时许，第二十三军军长陶勇在泰兴指挥所接炮六团报告，迅疾打电话向第十兵团叶飞司令员请示：“我军渡江地段江面两公里处，有两艘外国军舰在游弋，是否将其驱离？”

叶飞想到上级通报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将率部起义，忙问：“这些军舰是不是挂着规定起义的联络信号旗？”

“舰上挂的是花花绿绿的旗子，应该是洋鬼子的。”

鉴于半小时后第十兵团就要起渡，叶飞当即指示陶勇，立即查清两艘外国军舰的国籍，迅速予以驱离。

须臾，电话再次响起，陶勇报告：“确认了，是英国军舰，它们停在长江正面不走，妨碍我渡江，是否打掉它？”

渡江在即，英舰却仍赖着不走。叶飞果断下令：“命令前沿观察所发出信号，警告英舰立刻离开！如果不听，就开炮赶走它！”

榴炮六团按照新华社发布的公告，发射三发黄色信号弹，同时打旗语并在岸上燃火生烟，警告英舰迅速离开。英舰看到信号，缓缓向前行驶，水兵跑到舰艉，将炮口转向北岸解放军阵地。

八圩港炮六团三连阵地，二排长梁学成见英舰快要驶出我火炮射界，于高度紧张中喊一声“放”！二炮手闻令拉动了炮栓，第一发炮弹呼啸出膛，落在英舰附近激起高高的水柱。三连其他三门美式105榴炮也相继向英舰射击。相邻阵地炮兵以为上级已下达开炮命令，也先后向英舰开火，形成群炮齐射的交叉火力，英舰很快被炮火硝烟所笼罩。“伦敦”号和“黑天鹅”号舰身中弹，仍依仗火力优势疯狂反击，双方炮战持续了二十余分钟。

激战中，英舰掉头朝西驶去。指挥员意识到英舰还会回来寻衅捣乱，抓紧进行组织整顿和思想动员，连排干部指挥炮手整修阵地，加固炮位，炮口西转指向有效射程。果不出所料，掉转方向再战的“伦敦”号和“黑天鹅”号，一前一后向八圩港炮阵地扑来，两舰大小炮一齐开火，炮弹疾风骤雨般袭向江北。

八圩港竹林茂密，英舰开始看不见北岸炮兵位置，以为设在江堤后，于是连续突击此处，致正在集结的第二十三军六十七师二〇一团、第六十八师二〇二团二百五十二名官兵伤亡。第二〇二团团长邓若波、团参谋长王保哲在指挥所中弹牺牲。邓若波是渡江战役中我军牺牲的第二位团长。三天后，他在江南的家乡丹阳解放。

陶勇惊闻一直追随他的爱将邓若波牺牲，头上像是挨了一闷棍，忍无可忍下令炮六团和军属炮兵坚决对英舰进行反击！

第三野战军司令部电话查询第十兵团：“你们怎么跟英国军舰打起来了？谁先开的炮？”叶飞说：“是英舰先开的炮。”挂断电话，叶飞要通陶勇说：“上面来查情况了。”陶勇气冲冲地说：“有什么好查的？我最好的团长都被他们打死了，文武双全的人才啊……”

叶飞接报，八圩港炮战，系炮六团一营三连二排长梁学成高度紧张下令开炮，误导友邻炮兵开火，于是引发北岸炮兵齐射。叶飞吼道：“好大的胆子！”要求严肃处理违反战场纪律的梁学成。陶勇心领神会，下令关了梁学成禁闭。五天后，梁学成解除禁闭回到炮三连，受到英雄般的欢迎。“梁前委！”大家喊着，争相冲上前去与他紧紧拥抱。因为向敌舰开炮，是总前委的权限。

八圩港中英炮战中，一发美制105榴弹击中“伦敦”号指挥塔，弹片撕破了梅登海军中将雪白笔挺的海军将官制服，舰长卡札勒海军上校负伤。两艘英舰多处受损，“黑天鹅”号舰艉中弹，炮也哑了。英舰无心恋战，掉头快速逃往上海。

4月20日晚，英国驻华使馆海军副武官克仁斯少校，正在南京出席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举行的宴会。令人惊讶的是，国共和谈已经破裂，皖江防线正在被解放军突破，身负江防重任的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竟还有情致将晚宴主持得如此风生水起。

酒过三巡，一位侍者上前跟克仁斯少校悄悄说了什么。少校立刻从笔挺的海军军服上取下餐巾，起身同主办方工作人员低语几句，中途退出了宴会。克仁斯席间被紧急召回使馆，是奉命前往镇江寻找在长江炮战中遭受重创的“紫石英”号，了解事件真相并送去急救药品。少校不敢怠慢，星夜启程，但他的镇江之行并不顺利。驻镇江的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以“共军炮火猛烈，如有意外担待不起”为由，拒绝派船送其前往“紫石英”号。克仁斯只好折回南京，于桂永清南逃前找到了这位海军总司令，手持由他签署的公函再次前往镇江，这才乘国民党海军一艘小艇登上了“紫石英”号。出乎克仁斯意料的是，他一登上“紫石英”号，即获任该舰舰长，接过了这块烫手山芋。而一直带伤指挥的副舰长威尔顿，也始得离舰就医。此时，“紫石英”号尚有八十一名舰员，包括八名无军籍华裔雇员。当时，人舰俱伤的“紫石英”号面临的最紧迫任务，是处理前舰长斯金纳等十七名阵亡者臭气扑鼻的尸体。克仁斯组织举行简单仪式后将死者水葬，而后指挥军舰移至镇江以东谏壁镇东窑头村附近江面。

解放军在长江猛烈炮击英国军舰后，上海各大报均以醒目标题配英舰伤痕累累的照片，报道了这一特大新闻。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压迫凌辱的上海市民，闻讯无不欢欣鼓舞。4月22日，上海出版的英文《字林西报》，大黑体字标题的新闻夺人眼球：大不列颠帝国沉沦了——昨晨的炮战中，英方远东舰队的旗舰“伦敦”号的司令塔被击毁，舰长卡札勒上校身负重伤，梅登中将的军服被弹片撕破。报道援引了英国海军当局发布的英舰伤亡数字：“紫石英”号死亡十七人，重伤二十人，六十人泅水登岸后乘火车抵沪；“伴侣”号死亡十人，受伤十二人；“伦敦”号死亡十五人，受伤十三人；“黑天鹅”号七人负伤。后来，英国海军当局又宣称，在“长江事件”中，另有一百零三名官兵“失踪”。

西方媒体为解放军炮兵射击水上运动目标命中率之高感到惊讶。合众社记者高乐采访被击伤的英舰“伴侣”号，引用一位旁观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的评语：“这简直像是在进行示范表演。”

〔美〕杰克·贝尔登著，邱应觉等译：《中国震撼世界》，第570页，北京出版社1980年7月第1版。

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评论：“这个日子很有可能永垂史册，因为在这天，刚刚学会使用缴获的美式装备的中共炮手轻蔑地把英国皇家海军撂到了一边。这一天标志着已经破产的中国旧政权终于被迫承认自己的无能。而那些把全部希望寄托于这个政权的西方各国政府，不得不承认他们无法挽救这个政权，也不得不承认一支崭新的、性质完全不同的力量已经取得了统治亿万中国人民的权力。这无疑证明旧秩序已经完蛋。”

长江炮战以其典型而特殊的象征意义，被视为终结历史之战。鲜为人知的是，参与此战的梅登海军中将，其祖孙三代侵华或参战的记忆，竟然贯穿和浓缩了英国海军百年侵华的历史。

1840年6月，英国海军封锁珠江口外海口，鸦片战争爆发。梅登海军中将的祖父，作为英国海军军官，参加了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和中华民族命运的霸权之战，并且在战后目击了中英双方签订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见证了中国割地赔款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1900年5月，英、俄、日、法、意、美、德、奥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梅登海军中将的父亲，又跟随英国海军参战，在烧杀抢掠中把血腥涂抹在中国的京畿要地，亲睹了《辛丑条约》签订和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

一个英国海军世家祖孙三代接续侵华令人瞠目，而作为第三代传人的梅登海军中将则从亲历的长江炮战悟出，祖父和父亲参与开创的蓝水海军征服东方的历史，已在自己手中戛然而止。

（十一）倒戈将军浦口卧槽

历史喜欢以戏剧性解颐。1949年4月20日，受命攻打“三浦”（浦口、江浦、浦镇）的第三十五军军长吴化文从长江北岸遥望南京，忆及自己在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任上于此面聆蒋介石训示的情景，辄觉物是人非、山长水阔，一时竟恍如隔世。

吴化文头年秋天在济南举事时，为防止部队暗藏的特务捣鬼，不敢公开动员，只通知了少数师团军官。9月20日下午，第九十六军奉命向黄河北齐河开进，遭六架国民党飞机轰炸，官兵出现伤亡。当晚抵黄河南岸，特务乘机跳出来造谣：“共产党想把大家掀到河里淹死！”王耀武派来的一名副团长和营长趁机逃跑，官兵人心浮动。部队乘船过黄河，有人偷偷把机枪扔进河里。士兵纷纷开小差，吴化文十七个警卫跑了十六个。

《解放战争时期的华东敌军工作》，第96页。

10月22日，毛泽东给军长吴化文和三位旅长发来贺电，对第九十六军起义“极为欣慰”，热情嘉勉说：“贵军长等此次义举，符合人民的希望，深堪庆贺，尚望团结全军，力求进步。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为革命战争在全国的胜利而奋斗！”

一电稳定义军心。11月，第九十六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下辖第一〇三、一〇四、一〇五师。遵毛泽东一定要按人民解放军建军原则把这支部队整编好，整编中原军事干部一个不动，政治干部从军到连都要配齐配好指示，吴化文为军长，华野第一纵队副司令员何克希为政治委员，吴宪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何志斌为第一〇五师师长。三个师的政治干部，由华野第一、四纵队和驻鲁某部包干配齐配好。当月，整编后的第三十五军开往济阳。

何克希一上任，就吃了个下马威。他给营以上军官讲形势，有个师长突然跳起来大骂吴化文是“叛徒”，搅乱会场带上卫士扬长而去。当时，华野主力正在淮海作战，一旦变生肘腋、后院起火，后果不堪设想。风浪骤起时，曾为上海地下党并任过浙东游击总队司令的何克希处变不惊。他请地方政府派民兵封锁黄河渡口并开走船只，防止有人率旧部反水渡河逃走；下令身边人烧毁机密文件，夜间房顶布哨、子弹上膛，随时准备战斗；自己靠上去做吴化文工作，使他稳住了心神，给他压上稳定部队的担子。自嘲起义是“妓女从良”的吴化文，人心涌动时对孰轻孰重还拎得清。军长方寸不乱，领头搴刺的师长也不敢轻举妄动。

“国民党起义部队过来只是剥了层皮，还未抽筋换骨真正变成人民军队。”华野政治部主任唐亮说。新任军副政委吴宪发现，这支混迹日伪多年，把自己的历史涂成大花脸的杂牌军，反共成见明显深于其他西北军部队，整编后敌对行动依然猖獗。驻地时见辱骂中共领袖的标语，贴出的《大众日报》常被撕掉。一次召开千人干部大会，呼喊“打倒蒋介石，解放新中国”口号，第一次仅三十余人举手，第四次应者也不过七八十人。黄百韬兵团覆灭淮海战场，有的师团长竟怆然涕下：“这下可没依靠了！”

该军军官多是上级亲信或有裙带关系者。原一六〇旅旅长杨友柏是吴化文妹夫，抽大烟，娶小老婆。原一六一旅旅长赵广兴也抽大烟。部队建有“三番子”等封建行帮组织，盛行“拜把子”、收徒弟。军官贪腐成风，上级靠下级进贡发财，下级靠上级混事吃饭，有的旅半数以上主官吃空饷。有个团长问政委：“我过去吃四百个空饷，现在吃五十个行吗？”部队乍过黄河，像是飞来一群蝗虫，驻地的粮食和杂货店商品被一扫而空。有的官兵公然殴打区长和村干部，以致不得不枪毙了一名副连长和两名士兵。

关键时刻，“支部建在连上”光荣传统，为第三十五军浴火重生赋予了生生不已的军魂。全军迈开政治建军第一步，是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军师团营建立党委，连指导员参加营党委；连队党支部秘密发展党员，时机成熟公开一半，党员全部公开后，党支部履行议事决策领导核心职能。团以上建立军政委员会，营连建立军政联席会，以民主集中制下的集体领导，取代封建行帮关系的统治。干部任用归政治机关管理，党委按职权研究决定。军官不得打骂士兵，废除肉刑，建立规范、透明的供给制度，经费报销军政主官共同签字，连队民主管理伙食，定期公布账目，杜绝吃空饷和贪污浪费。稳妥肃清部队内部，很快查出几十名特务及隐藏的伪专员、伪县长。某连诉苦中坦白出二十一名特务分子。

第三十五军起义官兵真正割断与蒋介石的脐带并开始化铁为钢，是参加淮海战役第三阶段作战。1948年12月8日，第三十五军开赴徐州，第一〇五师师长何志斌和政治部主任奉命赶到军部领受任务。全师连夜急行军，翌日拂晓赶至华野第七兵团司令部。王建安司令员命第一〇五师转赴孙庄，堵截杜聿明集团突围之敌。1949年1月4日，第一〇五师在蒋新楼胜利完成堵击任务。

淮海战役后，第三十五军奉命与鲁中南纵队合编。抗战时，吴化文部与沂蒙军民结怨极深，而鲁中南纵队不乏沂蒙子弟。为使两支部队合编、合心，军党委组织营以上干部扎实集训一个月，认真学习党对起义部队团结改造方针，从原九十六军参加敌伪“和平运动”历史切入，严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促使干部坦白反省。吴化文带头反省了自己过去带部队残杀共产党人，在山东临朐制造“无人区”的罪行，痛心疾首说：“我现在越想越感到自己不是人！”军长坦白反省刀刀见血，令原鲁中南纵队干部为之震动。军首长因势利导做工作，告诉大家打济南前，华野做了阵亡逾万人的准备，购置一千口棺材以安葬牺牲的干部，购置数万丈裹尸布以安葬牺牲的战士。由于第九十六军战役前期战场起义，大大减少了部队伤亡。此役华野总计伤亡二万六千人，牺牲三千七百六十四人。这样一算账，来自鲁中南纵队的干部能平心静气看待军长了。第一〇五师团长王义琛，对当过伪军的一位团长说：“过去吴军长领着你们下泥坑子，这次是领着咱们进澡堂子！”

部队趁热打铁开展诉苦教育，果断处理违法乱纪干部，逮捕了第一〇四师一名印假票据的团长，狠刹贪腐之风；组织观看话剧《白毛女》，发动官兵控诉封建剥削压迫罪恶，提高阶级觉悟，孤立反动分子。经过教育，部队反共活动停止了，暗藏的特务清除了，政治干部威信大增。

合编后，第三十五军仍辖第一〇三、一〇四、一〇五师，每个战斗单元有两个团解放军老部队、一个起义团，部队原九十六军占比40%，鲁中南纵队占比60%。全军脱胎换骨，面貌一新。

1949年3月1日，粟裕、张震致电总前委和中央军委，决以第二十六、三十四、三十五军，配属榴野炮两个团，执行攻击浦口、炮击南京任务。第三十五军随之进至安徽滁县（今滁州市）。

《第三野战军征战日志》，第26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

17日，中央军委电示：“攻占浦口、浦镇的准确时间，必须由中央临机决定。”[注]19日，毛泽东致电陈饶邓粟谭等人：“两浦是否攻占须看谈判情形及军事上是否必要才能决定。”

26日，陈毅、邓小平、谭震林判定“浦口攻占与否，对整个渡江作战无重大关系”，确定不攻两浦，第二十六军东移加强东集团，第三十四、三十五军配合渡江佯动两浦，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江苏省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渡江战役》，第76页，档案出版社1989年4月第1版。

4月8日，三野经总前委和中央军委批准，调整八、十兵团渡江作战部署，以第三十四军攻占十二圩并适时渡江；“以三十五军保持与两浦之敌作战，在我发起渡江作战时，同时攻占江浦，而后各个逐次歼灭浦口外围之敌，从正面钳制南京警卫”。[注]第三十五军遂成长江北岸唯一钳制南京、攻取“三浦”的战役军团。

“三浦”系江北拱卫南京的三个互为掎角的据点，丘陵起伏，碉堡林立，各地堡群可凭借交通沟相互支援作战。守军为未曾被歼灭过的国民党第二十八军第五十二、八十、一九五师。第三十五军受命即展开筹划，八兵团参谋长何以祥抱病下沉该军靠前指挥。欲占浦口，必先攻江浦、浦镇。经研究确定，第一〇三师攻打江浦，第一〇四师攻打浦镇，第一〇五师为预备队攻点打援。

“三浦”战役4月20日下午打响。第一〇三、一〇四师连下江浦、浦镇两城，第一〇三师22日晨夺占浦口。守敌第二十八军仓皇撤往南京，第一〇五师第三一五团

追至江边，用机枪将行至半渡的一只敌船击沉。“三浦”战役告捷，南京北大门完全敞开。

攻取南京标志着渡江战役取得第一阶段的胜利，也是国民党反动统治覆灭的象征。《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规定，陈赓四兵团接管南京。荣誉进驻南京，是对陈赓兵团的高度信任，也是对南昌首义名将的褒奖。当然，此举所蕴含的深意还不止于此。

陈赓十三岁到湘军当兵，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一期毕业后留校任职。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连长陈赓因作战勇敢，调总指挥蒋介石身边任警卫。攻取惠州时，蒋介石亲赴华阳督战身陷重围，绝望之际欲拔剑自刎。陈赓夺剑厉声说：“总指挥的生死影响整个战局，这里没有黄埔军，赶快走！”陈赓护卫蒋介石疾行百里，背着他跑了好几公里，扭伤了脚还咬牙拼命前行，过河冲破封锁线终于脱险。

这段传奇经历令陈赓声名鹊起，成为蒋介石侍从参谋。1926年3月2日，国民党右派制造“中山舰事件”。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要求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并亲自找陈赓谈话。陈赓说，宁愿辞职，绝不退党！蒋介石斥责他说：“你走！你辜负了我的一片苦心，只能去当连长！”1927年春，陈赓获悉蒋介石准备公开反共，主动辞职。蒋介石念及陈赓救命之恩，网开一面允许他离开了黄埔军校。

蒋介石没想到，时过三年，他眼中“只能去当连长”的陈赓当了红军师长。1933年3月，陈赓在上海治疗腿伤期间，在街头被叛徒认出落入敌手，当年4月押解南昌。蒋介石亲自出面劝降，陈赓断然拒绝。蒋介石怕背忘恩负义骂名，暂未加害。也是陈赓命不该绝，因其在黄埔军校出类拔萃颇受孙中山青睐，此次上海落难，宋庆龄直接向蒋介石施压。陈赓后经我党营救出狱。他对宋庆龄立下铿锵誓言：“日后必带二十万大军来拜见师母！”

解放战争中，蒋介石目睹陈赓率军把国军打得丢盔弃甲，节节败退，痛心疾呼：“五个胡宗南也顶不上一个陈赓啊！”败退台湾后，蒋介石静夜反思，为当年放了陈赓而追悔莫及。1955年，陈赓获授大将军衔，蒋介石一度心理失衡……

以陈赓兵团收京，代表人民为蒋家王朝作结，此举对蒋介石的反讽及蕴含的特殊象征意义，均为其他部队所不及。然而，渡江战事发展之快，以致不得不收回《纲要》赋予陈兵团的使命。

陈赓未能率军直入南京未免令人遗憾，但作为历史的一种补偿，统兵直捣黄龙的国民党起义将领吴化文，又上演了中国革命史上更具戏剧性的一幕。1936年11月6

日，蒋介石电令驻闽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第十师中将师长李默庵，率军10日内攻取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李默庵与陈赓同乡且同出黄埔一期，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忙于恋爱无暇参加党的活动受到批评，遂与党离心离德。“中山舰事件”后，李默庵宣布退出共产党，背弃人民堕为蒋介石帮凶，并因攻陷红都瑞金受到褒奖。饶有兴味的是，进军江南实现中国共产党人收京入沪梦想第一步目标的，竟然是脱胎于国民党部队的第三十五军，且由过去与李默庵同为国民党军悍将的吴化文指挥！两员“叛将”出人意表的反转人生，成为一段令人嗟叹的历史小品。

（十二）张轸将计就计偃师马鞍山

在弃暗投明的诸多国民党将领中，第十九兵团司令官张轸率部起义，堪称成败最后一刻方见分晓的超级惊险马拉松。

1949年2月13日，张轸以河南省政府主席身份在武汉对记者发表谈话，称蒋总统宣告引退，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对谋求实现和平的努力达于顶点，然共产党反应不良，未予接受，这充分证实除共产党外，其他党企求生存绝不可能。谈话见诸汉口《大刚报》，张轸女婿张伊人找到他说：“正在联系共产党起义，你却公开指责共产党，太不像话了！”张轸说：“年轻人，晓得什么？我这样一来，给他们施放点烟幕，不正好掩护起义吗？”

张轸是河南罗山县人，曾任黄埔军校战术总教官、师长、军长、华中“剿总”副司令官兼第五战区司令官等职。1947年底，中共开封工委书记郭有义、宣传部长方敬之分析认为，张轸早年参加反袁斗争和大革命，属国民党左派，对所在第六军被蒋介石打压解体，自己遭通缉避走沪杭的不堪经历铭肌镂骨。北伐时，张轸任第六军第十八师师长，与该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伯渠关系密切；任豫北师管区司令时，曾聘请八路军驻战区代表朱瑞、唐天际指导游击战术训练，讲解群众工作；张轸还与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有过接触，与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联系频繁，还为新四军提供过枪支和经费。眼下，在中原战场屡战屡败的张轸正寻找出路。只要方法得当、工作到位，争取其起义是可能的。方敬之受命策动张轸起义后化名张子庸，通过河南大学校长姚从吾秘书田雨三，结识了张轸女婿张伊人，还通过开封《中国时报》社社长、中共党员郭海长，结识了张轸敬重的河南省参议会议长刘积学，以及参议员王友梅、《前锋报》社社长李静之等人。经积极慎重工作，刘积学给张轸写信劝其起义。张轸第三夫人徐开敏，向往革命欲投奔解放区，经开导也留下来作促张起义内应。

1948年9月，蒋介石委任张轸为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也想借此收编地方团队，扩充实力。赴开封上任时，他将省政府迁至信阳，托人通过华东局转告毛泽东主

席，请求对自己今后的行动有所指示。开始，张轸动过他指挥过的第八十五军起义的心思，但该军不久就被蒋介石调往淮海战场。他又试图动员非蒋嫡系的第五十八军军长鲁道源起义，密谈三次未遂，决心另起炉灶，利用省政府和绥靖区名义收编地方团队，编练绥靖旅补充正规军以裨兵源不足，得到蒋介石批准。他委任侄子张继烈、外甥张玉龙和从胡宗南监狱中保释的鲍汝澧等人为旅长，并分别兼任豫南等地的专员或县长，收编各县保安团队、游杂武装和散兵游勇。绥靖区副司令官赵子立，也回豫东家乡收编了两个保安团。到1949年1月，张轸已拥有十个绥保旅，4月经白崇禧报请任命组建了有四万多人的第十九兵团，张轸任司令官。省参议会议长刘积学敦促张轸及早起义。但他顾忌周围蒋介石嫡系甚多，身边还有国防部派来的处长李建业监视，一直未下决心迈出决定性的一步。

1948年11月，蒋介石从张轸驻地调黄维兵团吴绍周、胡琏、罗广文三个军赴淮海参战，在双堆集地区悉数被歼，张轸思想斗争愈加激烈。华东局派员透露，中共中央已将其关系转至中原局，起义事可与中原局联系。宋任穷、王树声给张轸捎信，周恩来也通过民主党派人士催促他及早起义。12月，白崇禧在汉口召开“五省联盟”会议。刘积学提出，如张轸不愿马上起义，即以省参议会名义发通电“逼蒋下野”，张轸未持异议。王友梅草拟电文后分呈张轸和方敬之。方敬之认为电文正当其时，张轸也表示同意，并转白崇禧阅。白崇禧认为，刘积学在汉口和他的司令部发这样的通电，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张轸便要刘积学回信阳后发电。

12月31日，在张轸主导下，河南省参议会给蒋介石发出了“敬请即日引退，以谢国人”的著名“亥世电”。

“亥世电”仅向蒋介石和国民党各院部发出六份，即被兵团副司令官朱其平制止。国民党特务酝酿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刘积学。政务处长范绍尧电告张轸速返。由于张轸干预，加之蒋介石回电称“所陈各节均系实情，希少安毋躁”，信阳的气氛才有所缓和。

四野先遣兵团直逼信阳，方敬之、李静之密会张轸。张轸说，他早已决心起义，但驻信阳的第五十八军不是亲信，不能随他起义。希望解放军不要南下，再给他一点时间。方敬之建议张轸派代表去中原局商谈，张轸遂派张伊人前往。中原局副书记邓子恢在开封接见并宴请张伊人，对他说，你来得正好，党中央已把张轸将军的愿望通知我们了。中原局准备派陈协一同志去信阳，与张将军商谈起义的具体问题。解放战争形势发展比预期要快得多，今后还会更快，张将军最好在武汉起义。张伊人还拜访了岳父故友、曾留学德国和奥地利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大同中学校长王毅斋。王毅斋是后来任新华社社长的穆青姐夫，新中国成立后出任河南省副省长。他给张轸修书劝其审时度势，尽快起义。

李宗仁主张“和谈”后，白崇禧催促张轸与解放军联系，要求解放军不攻信阳、武汉；同时将武汉物资运往广西“坚壁清野”，准备“打到底”。这时，CC派分子牛传钦，打着李济深代表旗号抵信阳，伪称李已同意给张轸“第六集团军”番号。徘徊于十字路口的张轸遂生“走第三条道路”幻想，委托河南省训团教育长张了且、中原局社会部代表赵国华和牛传钦，北上石家庄面见李济深，表明拥戴诚意并接受其给予的番号，以避免共产党进攻。三人1月28日北上，在漯河被陈谢大军政治部秘书长刘芳圃劝回。

牛传钦回信阳对张轸造谣说，陈谢部队不让见李济深，张了且也不坚持，自己孤掌难鸣，并挑拨说：“陈谢部队说你是战犯。”恶语中伤使张轸十分光火，幸亏张了且及时予以澄清才稳住了阵脚。张了且还把从漯河带回的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送给张轸阅读，对其思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月底，信阳解放。张轸率部撤出豫南，白崇禧下令撤销第五绥靖区，将张轸所部编为一个军，引起张轸不满。李宗仁将华中“剿总”改为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后，任命白崇禧、张轸为正副长官，命张轸部主力在武汉以北阻击解放军南下，其余部队开至江南整训。张轸借机将部队大部开到江南。白崇禧要张轸将随军家属送往广西、云南，张轸将第二夫人送往上海，留第一、第三夫人在身边应付局面，安排部将家属前往上海，或留武汉租房匿居。3月，张轸率部全部开往江南，担负武昌至嘉鱼之间江防。张轸向白崇禧要求成立一个兵团。白为稳住张轸，同意给他兵团番号，但不解决粮饷，部队“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张轸瞻前顾后，更觉前途黯淡。他想起邓子恢对他在武汉起义的期待，背着白崇禧先后三次潜去长沙，与老长官程潜密商。程潜支持他弃暗投明，约定张轸先在武昌起义，程潜随后在长沙跟进。

4月初成立的张轸第十九兵团，辖两个军七个师，兵团部设贺胜桥车站。鲍汝澧见起义时机成熟，催促张轸赶快行动。但张犹觉实力不够，委任中原局派来与自己联系的旧部扈少康为第十九兵团少将参议，安排其秘赴宜昌，策动宋希濂所部两团长起义，并再劝军长鲁道源共举义帜。鲁道源向白崇禧告密，扈少康被杀。

白崇禧察觉张轸意欲起义，并通过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官赵子立坐实，急令正在南撤的主力第七军驻止贺胜桥以北，“点验”第十九兵团一二八军，迫其继续南下。张轸和第一二八军军长辛少亭将计就计，借机将三个师调到马鞍山口以内，以便起义时向金口集中。关键时刻，国防部派老牌军统特务岳烛远到张轸兵团任军事督导官。白崇禧规定军官家属不能随军，张轸便任命第一夫人张世佛为卫生队队长，第三夫人徐开敏为司令部政工处宣传队队长。张轸出资动员拒绝起义的赵子立亲信师长刘子仁、郭馨波去职，未能遂愿；兵团副司令官朱其平见势难挽回弃官去了湖南。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第80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第2版。

渡江南进吹响了部分蒋军走向光明的集结号，江南起义潮汹涌澎湃，尤以1949年2月25日“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影响为大。4月7日，国民党预干训练团团长兼第一总队总队长贾亦斌，率部在嘉兴起义。蒋介石“视之为手足，待之如兄弟”的“太子军”起义，使原指望依托该团筹组三十支新军的蒋氏父子如雷轰顶。该团起义前，适逢一批美械装备运抵上海。蒋经国交预干训练团一副团长拟装备该团。该副团长为中共党员，第二野战军向浙赣路疾进，他将这批美械原封不动转给第二野战军部队。1949年2月到1950年5月，共有一百二十六万国民党官兵投诚、起义和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注]“传檄而定”成一时风景。张轸感到不能再等了。

张轸能否战胜“小诸葛”起义？历史将谜底延至5月揭晓。

卷四 收京入沪在春夏之间

（一）“毛主席今晚不睡觉了！”

1949年4月16日上午，毛泽东驰电总前委：“立脚点应放在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问：“我军渡江是否可能再推迟三天？”

陈毅、邓小平收阅毛泽东电报时，恰好总前委女兵小梁收录了一条新闻：国民党新设京沪杭政务委员会，汤恩伯兼主任。

总前委有台部队缴获的“克劳特”牌收音机，两位女兵用以收听南京广播的时政新闻呈首长参阅。两人有时也弄不清播报内容有无价值，便一股脑儿记录整理。邓小平却从中看出不少名堂。

4月16日，刚刚开完会的邓小平正与陈毅对弈，看完女兵小梁呈阅的速记新闻又递给陈毅，把眼前的棋盘一推，起身望着窗外阴沉沉的天空说：“看来，他们不想在

和平协定上签字了。”

陈毅快速浏览速记新闻，也愤愤站起身说：“这就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只有打得他们无法招架，和平才有希望。”

邓小平返回桌前，举棋说道：“我的当头炮可就当仁不让喽！”

>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渡江战役》，第17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

邓小平连夜为总前委起草致中央军委并第二、三野战军电：“我们一致认为，以确定养（廿二）夜开始，不再推迟为好。”“敌可能采取拖延政策”，“今天南京广播，在汤恩伯总部之下组织京沪杭政务委员会，汤兼主任”，“即其具体步骤之一”。“务请不再推迟至有（廿五）日。”“我们审慎研究渡江有把握。现芜湖、安庆段九、七、三等三个兵团准备均属充分，至少有一处必能首先成功，只要一处成功且能立稳脚步，其他各处即可随之成功。”[注]

总前委临战前的重磅建议，成为最后敲定渡江时间的依据。

> 中共繁昌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南繁芜游击根据地军民迎接大军渡江》，1983年9月24日。

4月17日，第二十七军先遣渡江大队急电江北，汤恩伯视察芜湖至枞阳段江防后决定，18日起将主力第二十军，调到九兵团渡江正面铜陵至繁昌段，与第八十八军换防。[注]恰好粟裕来中集团检查渡江准备，阅报后与在瑶岗的谭震林不约而同提出，中路应趁敌换防立足未稳提前发起渡江，打敌一个措手不及！

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到一梯队检查，指挥员建议，为达成战役突然性，最好攻打黑沙洲、鲫鱼洲等江心据点时，大部队同时战斗过江。宋时轮即请兵团政委郭化若将此意见转报总前委。

>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渡江战役》，第17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

陈毅、邓小平、谭震林16、17日与王建安、宋时轮商定，中路提前一天渡江，夺取江心洲与渡江同时进行，并上报中央军委：“廿日后开始渡江作战”，“一气打到底”，因“我军届时已处于半渡状态，全军均已投入战斗，如加停顿必陷于非常不利”。[注]

中央军委18日回电同意此部署，要求“二野、三野各兵团于廿日（卯哿）开始攻击，廿二日（卯养）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

19日，李宗仁召开和谈指导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电告张治中，请中共延长签字期限，就若干基本问题继续进行商谈。毛泽东要张治中转告李宗仁，中共拒绝延期签字要求。20日，李宗仁、何应钦致电张治中，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当晚，南京广播电台广播说，对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似未便同意，尤以渡江要求，实非即可同意。至此，为期二十天的国共和谈宣告破裂。

4月20日，中央军委副主席、代总参谋长周恩来，从北平晓谕前线将士：“毛主席今晚不睡觉了！”21日，毛泽东、朱德在香山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长江三路突击，震惊中外的渡江战役全线展开。

20日晚，毛泽东从入夜即开始等待中集团渡江成功的消息。周恩来则陪坐在毛泽东桌前，实时处理源源不断的前线来电。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二），第82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3月第2版。

依然是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但已无转战陕北的逼仄。一个月前，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总结讲话时说，“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需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渡江之夜，双清别墅生动再现亮辅良弼情景。

毛泽东与周恩来，堪称历史赋予中国革命的绝配。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博古作报告强调反“围剿”失败客观原因，周恩来的副报告则批评博古、李德，指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完全同意毛泽东、洛甫、王稼祥的意见。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会后对贺子珍说，如果没有周恩来支持，“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党中央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新“三人团”负责军事，周恩来为团长。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上被解除军权的毛泽东，重又进入红军指挥中枢。

1935年2月5日，在有“鸡鸣三省”之称的云南威信，中共中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会后，周恩来开导博古说：“在中国历史上，能成就大事的人，都是最懂得底层人民的人。你和我都是留洋出身，对中国真实的现状了解得还很不够。我们有一个最了解中国的人，就是毛泽东。红军历次兴衰也都证明，只要毛泽东来领导，红军一定兴旺。”博古还想争辩，周恩来换个话题又问：“你觉得蒋介石这个人怎么样？”博古说：“这个人很有能力。”周恩来说：“我跟他共事过多年，很了解他的为人。从北伐时期，就不断有人想搞垮他，但都被他占得先机。赶走许崇智，软

禁胡汉民，孤立唐生智，枪毙邓演达，刺杀汪精卫，用大炮压垮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用官爵和金钱买通石友三、韩复榘、余汉谋……这样的人，你觉得自己对付得了吗？”博古听罢默不作声。周恩来说：“现在我们的最高原则是作战胜利。全中国只有一个人能对付得了蒋介石，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 韩毓海：《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第194页，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版。

博古或许不知，1925年10月，汪精卫力荐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也是出于他能够对付蒋介石的考虑。

周恩来诚恳地说：“为了打败蒋介石，我们要摒弃前嫌，同心同德，共同辅佐毛泽东，这样，才能最终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后来挫败张国焘分裂党的阴谋，博古毅然站在毛泽东一边。

“周公确有吐哺之劳。”毛泽东后来致柳亚子信如是说。

1949年4月20日晚，对于国共双方都是刻骨铭心的一夜。

七时三十分，中集团三野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下令向南岸敌阵地实施压制射击。八时整，谭震林在七兵团指挥所大声下达命令：“进攻开始！”于是，三野七兵团第二十一、二十四军，三野九兵团第二十五、二十七军，二十多个一梯队团劈波斩浪，扬帆疾进，向南岸实施宽大正面渡江突击。

幽暗的江面响起唰唰的击楫奋进声，一排排系白毛巾的手臂富有韵律地摆动着。第二十四军军长王必成、政委廖海光，指挥所属第七十、七十一师冲破敌炮火拦截，晚九时分别登陆闻新洲、紫沙洲，全歼守敌千余人，强渡夹江突破敌第八十八军防线。

右翼七兵团第二十一军军长滕海清、政委康志强于晚七时指挥六十三师偷袭长生洲、汆水洲，歼灭敌第五十五军二十九师一加强营，六十三师和第二十二军六十六师及军山炮团进入江心洲集结。次日黄昏，两个师与右翼二野三兵团齐头并进，直逼南岸。

第六十三师第一八七、一八九团船队疾驶中，忽见右侧一个庞然大物吐着火舌飞快扑来。“是敌人的兵舰！”有人喊道。“别怕！”指挥员下令，“靠上去，用炸药包解决它！”官兵驾着两只载炸药的木船，边扔手榴弹边向敌舰侧翼冲去。处于射击死角的敌舰见满载炸药的小船抵近，胡乱开了几炮，掉头向芜湖方向逃去。

“军长，六十三师汇报战况！”第二十一军军长滕海清，从作战参谋手中接过报话机听筒，却听对方喊道：“军，军长，我，我是六十三师，师长，炮，炮打歪了！打歪了！”滕海清眉头一皱，六十三师师长吴华夺怎么变成结巴啦？一定是敌人窃得报话机频率，假冒吴华夺误导我偏射规避打击！他大吼一声：“就是打歪了，老子也要接着打！”说罢，怒冲冲挂了听筒。政委康志强问：“老滕，前面怎么回事？”滕海清扑哧一笑说：“龟孙子，还敢冒充吴华夺，引导我们偏射！”他把自己的判断一说，指挥所的人都笑岔了气。康志强拍着滕海清的肩膀说：“老滕啊，这个假李逵算是碰上真宋公啦！”笑声未歇，南岸传来捷报：继第六十三师两个团抢滩成功后，第六十一师部队也奋勇登陆。两个师一梯队突破上、下口江敌阵，横扫沿江之敌，攻占馒头山、六合煤场等要点，与左翼第二十四军在大通会合。二十二日，部队攻占贵池、青阳。

中路渡江一梯队速度最快的是九兵团勇士。该兵团第二十七军第八十一师居中正对黑沙洲在无为神塘河起渡，右翼第八十师在泥汊起渡，左翼第七十九师在临江坝起渡。20日晚八时十五分，第七十九师“济南第一团”第二三五团团长王景昆，见大部船只从白茆洲沟渠拖过江埂，下令各部整理好船只，听令开船。一营三连通信员由于紧张，将“听令开船”传为“开船”，三连二排五班班长刘德翠得令，猛地一挥手，全班十二名战士一齐奋力划水，小船箭一般向南岸射去。邻近三营见一营开船，也纷纷起航。师长萧镜海（刘静海）接报，下令全师提前十五分钟起渡并报告上级。

五班小船进至离南岸约一百米，子弹飞蝗般扑来。小船在还击中撕破弹雨抵岸，晚九时在繁昌县保定乡夏家湖（今芜湖市三山区夏湖）登陆。江岸崩塌，断崖陡峭，四名战士迅速架梯攀登，但梯子被敌炮弹炸断。战士李士松以肩扛起残梯，高喊：“同志们快上！”五班战士踩着他的肩膀，借助残梯登上南岸峭壁，架起机枪掩护战友向敌冲锋。五班占领第一道壕沟后，按事先约定打出三发红色信号弹。随船行至江心的二三五团团长王景昆和参谋长单文忠，即用报话机向师部报告：“饭做熟了，饭做熟了！”

第二三五团三连二排五班虽然首先登陆突破，却因为“抢码”功“过”相抵，未获任何荣誉。渡江战役胜利四十周年时，在五班登陆点夏家湖竖起“渡江第一船”雕塑，遂使勇士实至名归。

4月20日晚，第二十七军第八十一师第二四三团突袭黑沙洲成功，歼敌一个团；第七十九师第二三七团从黑沙洲左翼抢渡登岛；第八十师第二三八团突击队，在南岸大磕山西与繁昌江边游击队胜利会师。

声势浩大的渡江突击，基于原始航渡器材的千帆疾驰中，间或可见世界最先进制式运载工具两栖运输车的威猛身影。苏联记者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战地照片证明，在

诺曼底和太平洋岛屿登陆作战大显神威的美制DUKW-353两栖运输车，成为进击江南独领风骚的王者。该车长9.3米、宽2.4米、高3米，水中时速可达十二公里，陆地时速可达四十五公里。二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军援将其转交国民党军，为我军缴获。经改装车前配置两挺重机枪，成为威慑敌胆的突击利器。粟裕受命跃进江南时，到东北订购的六十部引擎也派上了用场，成为新改制机帆船的强劲动力。

21日凌晨，聂凤智乘船过江，成为南渡军长第一人。骁勇的战役指挥员想起一千多年前，曹操率八十三万大军被阻于长江北岸，船焚兵折、落荒而逃，而今将士遵命突破天堑创造了历史，满怀激情致电党中央、毛主席：“我们已胜利踏上江南的土地！”

这是渡江最前线战役指挥员，从江南发给统帅部的最早也是最短的电报。一句话电文，饱含渡江将士多少喜悦与豪情！

大军横渡之际，国民党海军太平、安东、楚同、美亨等舰，分别从铜陵、芜湖港窜出，东西游弋，冲撞渡船，并以舰炮拦击。渡江前专项训练过打敌舰的官兵，驾船勇敢驶近敌舰，瞄着军舰司令台等要害部位掷手榴弹，乘敌舰转弯与渡船平行之机用机枪扫射，敌舰“致均负伤，弹痕累累”，“乃被迫驶向芜湖下游”。

国民党军4月20日记载：“当夜晚21：00时倾”，共军“即以黑沙洲及太阳洲为跳板，强行南渡，装有马达并设有沙包工事之船筏，或裹包棉絮，乘坐木盆等各种简易渡具之‘匪兵’遍江而来，适江面风向由东南转向西北”，“船波不绝”，陆续登岸。

到4月21日中午，中集团一梯队十个师、二十八个团过江，构建了东西一百二十公里、纵深二十公里的滩头阵地，当日攻占铜陵、顺安、繁昌。翌日，中集团突入敌防御纵深地带五十公里。23日，中路第二梯队第二十二、三十、三十三军全部南渡。

21日晚七时三十分，东集团在三江营至张黄港段起渡。第八兵团渡江一梯队第二十军，奉命自三江营至龙稍港段渡江登陆扬中，而后渡夹江向镇江、丹阳地区进攻，截断宁沪铁路。风大涌急，该军第五十九师一梯队第一七七团二营与三营并肩突击，搏风斗浪四十多分钟闯过江心生死线，却发现与师、团失去联系。两营孤军奋战，船离岸约千米时被敌警戒部队发现，遭敌火力猛烈阻击。二营五连为第一七七团突击连，指导员周文江与连长陈康商定弃船泅水，官兵凭借浮游器材分散泅渡抵滩进入芦苇荡，集结后一举抢占滩头阵地，与敌展开白刃格斗，一班长朱道生刺死三个敌人壮烈牺牲。五连激战一小时打垮反扑之敌，向得胜港发展进攻。

得胜港有一营守敌，陈康带九班从右侧迂回，周文江带一班从左侧包抄，因敌工事坚固，几次攻击未能奏效。淮海战役爆破英雄、一排长李文彦一马当先炸地堡，不

幸中弹牺牲。周文江怒火中烧，夹起炸药包冲向敌堡，陈康组织火力掩护。周文江左滚右翻，避开敌火力将炸药包送到地堡前，使劲一拉，竟把雷管拉了出来，炸药包未爆，弹雨却刮风般倾泻过来。灵巧赛猴子的周文江，早已取回炸药包转至地堡侧后，装好点火装置，重新放好炸药包并拉响导火索。一声巨响，攻取得胜港的障碍被清除。

通道虽已打开，但守敌一个营，五连仅有两个班，且只剩二十人，如何以少胜多？周文江迅速与陈康议定，像淮海战役首战窑湾那样，虚张声势，智慑敌胆，遂令司号员吹号：“调一营、二营！”号声一响，敌人便慌了神，以为解放军大部队来了，四散奔逃。午夜十二时，五连攻占得胜港，但部分逃敌还龟缩于附近村庄。周文江和陈康决定，不顾疲劳，一鼓作气消灭残敌。文化教员雷开国、通信员陈士才潜入村庄，向龟缩村内之敌扔手榴弹和炸药包，其他人从外向里猛攻。惊魂未定之敌被接二连三的爆炸声搞得晕头转向，炸药包引燃了棉秸堆，冲天火光引导营长、教导员率后续部队及时赶到得胜港。22日，第五十九师登陆扬中，牢牢控制了大军南渡跳板。战后，五连被授予“渡江大功连”荣誉称号，荣立集体一等功，周文江和烈士李文彦荣立一等功。

第二十三军渡江当面是中心沙岛，军里派出的陈副团长、潘营长，连同张松山及为我策反的榴炮营营长张仲华已控制局面。北岸大军起渡后，炮营四个连一炮未放。有个连长突然变卦，下令连队开炮，营长张仲华果断拔枪将其击毙。该军第六十九师二〇七团三营，首先在南岸王圩港两侧登陆。接着，第六十七师二〇〇团在梅嘉生副军长指挥下，从乌泥港突击上陆，打垮敌多次反扑，巩固了滩头阵地，向下三圩港、桃花港之敌展开猛烈攻击。

第六十七师二〇一团受命夺占利港镇，镇上驻有汤恩伯第二十一军一四六师六九〇团，利港港口左右两个碉堡，由该团副排长毛勇带兵驻守。长江工委柳明江带太和策反工作组，利用当地一个石匠与毛勇搭上了关系。21日晚，第二〇一团两条木帆船直奔紧靠利港镇的东龙港。下派督战的连长裴富周发现有船驶来，催促班长梁金玉开炮，梁不从命被裴拔枪射杀，炮排士兵无不义愤填膺。毛勇与梁金玉是莫逆之交，趁机发动起义，打死裴富周，接应我先头部队上岸，东龙港遂成第二十三军登陆江南的第二个突破口。敌一〇〇师师长许午言，见第一道防线被突破，扔下部队逃命，全师顿时作鸟兽散，魏村一带第二道防线全面崩溃。

第十兵团过江时，陈毅、粟裕考虑到该兵团突击过江地段处于南京上海之间，易遭敌东西夹击，特嘱兵团司令员叶飞随一梯队过江，靠前实时指挥。叶飞在长江工委书记俞迺章陪同下登船后发现，身边只有一个警卫排，电台留在兵团部。船到第二十八军预定登陆点，人称“小广东”的参谋黄云进村联系，遇一国民党哨兵。黄云急中生智说“师长到”，带着哨兵来到江边。叶飞猝见国民党兵暗自吃惊，一审

问，第二十八军尚未到达，国民党军一个团驻村，急忙带人转移，与第二十八军先头登陆部队会合。

4月21日零时，东集团第三十四军一〇二师从仪征土桥一线向南岸镇江进发，第三〇六团团长陈大海率船队向南行驶约二百米，遇国民党巡逻艇发生交火，南岸守军亦开炮射击，陈大海所乘船只中弹，与警卫员落水牺牲。陈大海是渡江战役中牺牲的第三位团长。此前，三野已任命他为本师副师长，渡江后即上任。

西线无悬念。四野“隔江钳白”，刘伯承示假隐真致敌拉开防御空隙，优势叠加使破敌稳操胜券。唯是否先取安庆颇费斟酌。

安庆是拱卫南京屏障，古来大军南渡必先下此城。安庆守军为桂系第八绥靖区司令夏威所部，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向中共方面提出，勿攻安庆，“以利和谈，免生枝节”；白崇禧亦致电中共，请中共“暂留该地勿攻，敝方亦不出击，以待和谈解决”。

3月下旬，第十八军进军皖中迫近安庆。军长张国华带参谋长陈明义侦察发现，安庆城郊多是丘陵和沼泽，城外日军留下的碉堡和工事非常坚固，强取必致重大伤亡，遂建议调整作战部署，以一部兵力“看住”安庆守敌，部队从城东西两侧过江。

4月3日，第二野战军前指到达舒城，刘伯承、李达踏勘安庆城周边及东西两段长江，发现安庆果然城池坚固，工事完备，城外丘陵沼泽广布，又可得江中一舰五艇火力支援，实属易守难攻之地。4月4日，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致电中央军委和陈毅、邓小平、饶漱石，建议“暂不攻安庆，留在渡江后再打，或和谈占领之”，以仅编两个师、总员额不足两万人的第十军，对安庆守敌围而不打，大军从城东西两侧旁渡，换下第十一军参加渡江突击。

卯删，4月15日。

4月8日，二野上报中央军委并下发渡江作战基本部署，明确杨（勇）、苏（振华）、郭（天民）指挥五兵团与十五军，由望江至安庆城西地段渡江，突击南岸之敌；陈（锡联）、谢（富治）指挥三兵团两个军，由安庆以东至枞阳镇、石矶头地段渡江，突击南岸之敌；陈（赓）、刘（志坚）指挥四兵团两个军于卯删 注 前赶至望江、宿松地区接续渡江与十五军会合，随即沿江东进，协同三兵团攻击芜湖、南京之敌，如敌主力向浙赣路撤退时，则协同三、五两兵团进击之；杜（义德）、王（维刚）指挥第十军及皖西部队监视封锁安庆之敌，保障主力作战中不受该敌妨害。

西集团暨第二野战军前指设在桐城中学图书室。“天下文章在桐城”，而今中军帐墙上挂着标满红蓝图标的作战地图，桌上排满黑色电话单机，与主盟清代文坛二百多年的桐城派发祥地相映成趣。

西集团渡江地段当面为汤、白集团接合部，第二野战军老对手刘汝明兵团七个师，守备铜陵（不含）至九江（不含）段江防。该部原是西北军，此番守江处于东西两集团双重监视之下。我军宣传，蒋介石这是借刀杀人；刘汝明也认为，此安排纯属别有用心。

刘汝明十七岁投军，曾跻身冯玉祥“十三太保”。1933年3月长城抗战，师长刘汝明率手枪大刀队重创日伪军，获青天白日勋章，台儿庄和武汉会战再立战功。国民党有云，将官欲平步青云，一要身披黄袍（黄埔军校毕业），二要头戴绿帽（经陆军大学深造）。缺“袍”少“帽”、非黄非绿的刘汝明和孙连仲，是国军仅有的两个“忝列”兵团和战区司令长官之中的西北军背景高官。

>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第27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如同北伐和中原大战刘峙曾为蒋介石五虎将，抗战成为“逃跑将军”、解放战争成为“猪将军”一样，刘汝明投入内战屡战屡败，1946年冬至1947年夏，被刘邓大军歼灭四万人。淮海战役中，毛泽东要求“加紧对刘汝明的工作，迫其反正，是为至要”。[注]中共特别党员、国军少将周镐，策动孙良诚部五千余人投诚后，与孙一起策反刘汝明。不料孙良诚反水，周镐被害，参与策反的中共秘密党员、孙良诚部副军长谢庆云和师长王清瀚同时罹难。

混迹国军多年，刘汝明早成了钻进蒋介石肚子里的蛔虫，对其有兵就有编的逻辑摸得烂熟，惯于打滑头仗保存实力。八兵团战前缺额达八个团之多。深谙有兵才有官的刘汝明，为保住其兵团部等级和番号，从合肥南逃时就开始抓丁，在巢县至裕溪口拼命扩军补缺，换取了汤、白夹缝中守江一席之地。中原战场早有共识：“五刘（刘峙、刘茂恩、刘广信、刘汝明、刘汝珍）不如一刘（伯承）。”刘兵团所属第五十五、六十八军缺乏训练和实战经验的新兵甚多，守江不顶大事儿，明摆着是江防软肋。

> 《刘伯承军事文选》，第44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刘伯承此时更关注的是，如何在消灭敌人的同时，“尽量造成火力的优势”以最大限度保存自己。[注]4月21日下午四时，刘伯承在桐城中学指挥所下达炮击南岸命令，参谋人员即用电话传令第三、四、五兵团。作战处长姚继鸣点燃了煤气灯，参谋人员做好标图和记《阵中日记》准备。刘伯承和张际春在指挥所电话旁静候前线消息。五时，安庆东西两侧三百多门大炮，向南岸陈家坟、乌沙夹一线猛烈轰击。

李达接听的第一个电话，由第十一军参谋长杨国宇打来，满口麻辣味的川音将话筒震得嗡嗡响：“我们的大炮打过去了！激起的水柱子有几丈高哇！”炮击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

5月31日，刘伯承致电毛泽东、中央军委、总前委：“我第一航成功之步兵六个团（三、五两兵团），伤亡不到十人。”

第三、五兵团一梯队首发六个团足有两万人。月黑风高，江宽流急，两个步兵师规模兵力战斗渡江伤亡为个位数，堪称奇迹。

西线传奇绝非偶然。到4月22日拂晓，第五兵团十六军四万余人，向吉阳至阜康圩南端实施主要突击，向黄石矶、清节洲实施辅助突击，全军过江未翻一船，登陆后伤亡不到四十人。

第四兵团野炮营本已应秦基伟请求加强给第十五军，可刘伯承一声令下又调到安庆。第十五军连同第十四军配属的山炮营，总共有三十门山炮，还有化学炮和82迫击炮各九门。秦基伟拿出十九门山炮、九门化学炮组成主要火力队，摧毁南岸登陆场灯塔左右敌一线工事，支援一梯队登陆并延伸火力，保证部队向香山冲击。

中线渡江开始实施之际，亦是刘汝明下令部队全线撤退之时。汤恩伯电令刘汝明坚守阵地，刘部却如惊弓之鸟跑得更快了。汤恩伯惊闻芜湖以西已经破防，慌乱中舍近求远调宣城第九十九军驰援。该军刚出城便知刘部阵地已失，遂掉头向杭州逃去。

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十一军从安庆以东鸭儿沟、前江口突击过江，在贵池上陆进抵殷家汇。午夜又接情报，安庆守军第一七四师已弃城渡江，逃至殷家汇附近，先头部队被我第九十三团三营阻于松岭一线。宿敌相撞，分外眼红，军即令两个师两翼钳击围歼逃敌，在吴田铺全歼桂系这一王牌部队，报了大别山一箭之仇，可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25日，该军与皖南游击队胜利会师大洪岭。

至21日晚九时，第二野战军十六个团控制了西起湖口、东至贵池西北石矶头宽二百余华里、纵深十至二十华里的登陆场，两天后占领青阳、高坦、至德一线和马垱要塞，胜利突破敌长江防线。

中线第十兵团过江后，申港口以东百姓不敢开门。俞迺章去敲老关系户的门，人们听出是他的声音，很快便出来了。俞迺章要他们赶紧把大军过江的消息通知各家各户，一传十，十传百，江畔群众纷纷为部队做早饭、烧开水，帮助照料伤员和抬担架。23日中午，陶勇派人来找俞迺章，要他抓紧组织到夏溪镇接收缴械投降的国民党军朱力子团的装备。俞迺章即派俞叔度等前往收缴。陶勇率军打到溧阳时，派员持他的亲笔信，带两台吉普车，到戚墅堰来找俞迺章。陶勇信中说：“下一步你们

的工作一定很繁重，你身体又不好，这两台吉普车就送给你用吧。”俞迺章阅信心头打起一个热浪，他把一台车送到地委，另一台车送到专员公署。

叶飞也记着精明能干的俞迺章。1978年秋，他任交通部长到镇江考察港口建设，点名要见俞迺章。市革命委员会领导说：“俞迺章是右派呀！”叶飞说：“渡江战役时，他跟我一条船过的江，怎么不能见？”叶飞派人把俞迺章接到镇江老港1号码头，一上船，叶飞老远就喊：“俞书记！”快步趋前与他紧紧相拥。两人忆起同船从江阴过渡的往事，共叙阔别后的人生百味，畅谈近两小时。

1949年4月20日夜，张治中在北平接李宗仁、何应钦“限一小时到”卯号电:“综观中共所提之协定全文，其基本精神所在，不啻为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之处置。以解除兄弟阋墙之争端者，竟甚于敌国受降之形式；且复限期答复，形同最后通牒，则又视和谈之开端，为战争之前夕；政府方面纵令甘心屈辱予以签署，窃恐畏于此种狭隘与威压作用，刺激士气民心，同深悲愤；不特各项条款，非政府之能力所能保证执行，而由此引起之恶劣影响与后果，亦决非政府能力所能挽救。”“原文前言，全属对政府及中国国民党诋毁谴责之词，等于对罪犯之判决，何能称为和平协定？”“兹为培育祥和空气，极盼能即日成立临时停战协定，借以表示双方谋取真正和平之决心与诚意，俾和谈得以顺利进行。特电布达，希即将上述各项意见转达中共方面并复为盼。”

卯马，4月21日。

午夜十二时，张治中等南京和谈代表，在六国饭店又接到李宗仁、何应钦卯马电：“张文白兄并转行严、力子、云亭、为章诸兄暨代表团全体同志：共方本日广播毛朱对共军之命令全文已悉，此间迎代表团之专机应于何日飞平，请洽妥电告。兄等此行劳苦，事虽未诸，俯仰无愧，谨先奉慰，诸容面馨。”

21日上午九时，张治中将李宗仁、何应钦4月20日卯号复电抄送中共中央，请求对南京政府要求再予考虑。此时，窗外报童售卖解放军渡江“号外”的喧嚷声，已不绝于耳。

春江水暖鸭先知。置身渡江南进洪流，陈毅周身荡漾着破敌收京入沪的激情。1949年1月，陈毅在西柏坡获悉，嫡亲堂兄、国民党沈阳兵工厂中将厂长陈修和率部起义，即修书一封予以嘉勉，并告：“弟任务是向东南经营苏浙皖，春间摒挡后即南渡……两年内军事底定，即可顺利进入建设时期，吾弟兄亦可长聚也……匆匆未尽之言，破敌收京取沪后当图一晤。”

蒋洪斌：《陈毅传》，第65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

3月23日，陈毅作与妻书：“茜：别后风雪交加，夜半抵蚌埠，道路泥陷不能行车，步行十余里渡河到市委，酣然一睡，起已十时半，证明年近五旬，尚可作步兵。一过淮河完全南方风气。居民云四十天内已下七次雨，路从来未干过，因念大军南进不无困难。曹孟德四越巢湖不成殆非偶然也。好在早有准备，我军挟各种优势，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收京破敌必在春夏之间。”

4月20日晚，中集团率先扬帆的那个春夜，瑶岗村总前委住处灯火通明，一片忙碌。“嘀、嘀、嘀”的电台发报声，急促、高亢的通话声，汇成一阕紧张热烈的战地进行曲。

首战即决战。“只要我军渡江成功，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战局的发展均将发生于我有利之变化，并有可能演成敌人全部混乱的局面。”《纲要》的预言，正为中央突破给全局带来的震撼及其引起的连锁反应所证明。这一点，就连驻地百姓也感觉到了。

4月20日午夜，王宅东院东隔壁王世兴忽听陈毅吼道：“冲上去，一定要拿下来！”“吧嗒”一声，听筒重重搁在话机上。

凌晨，总前委房前屋后百姓的家门，差不多都被敲开了。“过去了，大军昨夜打过长江去了！”警卫员急不可待向邻居通报说。

翌晨，总前委院子里一片欢声笑语。靠王宅东院最近的王世兴循声赶来，见陈毅正对围拢门前的邻居说：“老乡们！昨夜我军已经胜利过江，现正向南京开进，国民党反动统治就要灭亡了！”

“昨夜里我还听到你对炮台发怒呢！”王世兴回味说。

“大伯，那不是炮台，是电话！”一位警卫战士纠正说。

众乡亲都一齐笑了起来。接着，陈毅安排请老乡吃饭。大家立刻想到，总前委该向南京方向开进了，这顿饭是告别宴呢！

天刚擦黑，瑶岗村军属林大奶奶、烈属翟宇妈、教私塾的张先生，还有晚清秀才王哲保等三老四少，喜笑颜开进门来了。众乡亲虽说是头一回到陈司令员住处坐席吃酒，但早已熟悉这位和蔼可亲的大邻居。一次，陈司令员和邓政委遇到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太太，攀谈几句，得知老人是新华社记者王飞的母亲，便请她到住处吃了一餐饭，还派人给她送了些粮。瑶岗村民张成计有天犁田提犁转弯，将泥水甩到路过的陈毅身上。张成计见他身后跟着警卫员，知道是个大官，心跳得像打鼓。陈毅若无其事问他种多少田，收成怎样，像是跟邻家兄弟拉呱。

此刻，宾客已坐定，陈毅起身声若洪钟说：“我军已胜利渡江占领南京，蒋家王朝灭亡了今天请父老乡亲光临，略备便宴，以示答谢。”

“好啊，好啊！”陈司令员一席话，令席间父老喜出望外。

陈毅望着乐得合不拢嘴的乡亲说：“我们来瑶岗快一个月了，对乡亲们多有打扰。大家对我们支持帮助很大，借住期间有不到的地方，还请多包涵。”说着，陈毅逐一给几位乡贤和父老敬酒。

几轮觥筹交错，坐上席的林大奶奶便憋不住了。她早就瞅见陈司令员来瑶岗未带家眷，心中越发好奇。那么大的官儿，得称几房太太？老人家借酒问道：“不晓得司令员娶了几房太太？”

陈毅正喝得尽兴，猛听林大奶奶一问，不由一愣，随即开怀大笑：“娶几房太太？哈……那不真成了共产共妻了？”

烈属翟宇妈捅了林大奶奶一把，掩口笑道：“人家陈司令员是共产党的大干部，一心带兵打仗救穷苦人，不兴娶几房太太……”

正眯着眼美滋滋品酒的王秀才，闻声便笑歪了嘴。这位曾因抽鸦片而妻离子散的背运秀才，是陈毅的棋友。一次，陈毅看到王秀才自题的对联“借一升吃一升升升不断，拉新债还旧债债债不清”，赞扬对得好，随即吟道：“月缺不改光，剑折不改刚……男儿自有守，可杀不可苟。”又问，“这首诗你还记得吗？”王秀才尴尬地笑道：“这是宋代梅尧臣的诗……”“戒鸦片也要有‘可杀不可苟’的决心。”陈毅趁势规劝说，“全国马上就解放了，人民政府需要你们这些肚里有墨水的人才啊！”王秀才慨然点头。此刻，他抹把胡须岔开话题：“陈司令员不光上马能杀敌，是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而且下马会写诗，是出口成章的儒将……”

4月25日晚，总前委机关离开瑶岗前往南京。陈毅走出住了二十四天的王宅东院，想起警卫员挑水折过房东家扁担，问：“扁担钱赔了没有？”警卫员说：“他不收。”陈毅掏出四千块钱（旧币）对他说：“快送去，再完不成任务，我打你屁股！”陈毅走后，人们在他卧室东墙看到一首毛笔写的诗，王秀才认得是一首律诗：

旌旗南指大江边，不尽洪流涌上天。

直下金陵澄六合，万方争颂换人间。

（二）江阴要塞阵前起义

1949年4月19日凌晨，吴铭冒着大雾从江北赶到江阴，即约唐秉煜到联络站看第十兵团给要塞地下党的密写命令：渡江日期确定为4月21日；起渡前四小时在长山相对的江北燃三堆火作为信号；识别符号为左上臂缠一白布条；当日口令“上海部队”。

唐秉煜向唐秉琳、李干汇报后，即将命令传达到要塞全体党员。当日上午，王征明抵达小渔村新联络点，午饭后即与唐秉琳等人见面。王征明传达了渡江中要塞地下党让开登陆正面，接应部队安全登陆的主要任务，要求4月20日二十二时前做好一切准备。王征明与唐秉琳、李干研究确定，唐秉琳、李干负责控制炮台；派车送唐秉煜去无锡接回吴广文，协助李云葵控制守备总队；王刚、李容有负责控制内外通信联络；唐秉煜、吴铭作为机动力量，负责内部联络；王征明作为王德容卫士同他一起掌握部队；将从长山撤出的守备总队第三大队，部署在黄山南既设阵地抗敌反扑。研究部署完毕，王征明和吴铭分别换上了国民党军装。

20日下午，汤恩伯打电话给戴戎光，要他到黄山坐镇指挥。唐秉琳打算，将戴戎光引导到山下会议室，以便于控制。

当日深夜，第一绥靖区命令，要塞守备总队长山以东防线，交由第二十一军接替，限二十日上午交接完毕。长山是第二十九军预定登陆点，王征明叫醒王德容、陆德荣共商对策。王德容提议，派人花钱随八圩港守军到江阴买菜的船过江送情报，陆德荣自告奋勇前往。王征明很受感动，问：“你有什么要求？”陆德荣说：“我一定完成任务！如生意外，请组织照顾我在上海的老母！”

陆德荣在江阴城北黄田港上船，忽见岸上吴铭给他使眼色，遂急忙下船。原来，吴铭和王征明商量，长山无工事，临时换防来不及构筑，只要及时引导，渡江部队可寻隙上陆。陆德荣、徐以逊受命潜伏江边，引导渡江部队利用布防空隙登陆上岸。渡江实战验证，这一招对于保证第二十九军安全顺利登陆至关重要。

20日午夜，唐秉琳接监视哨电话，戴戎光已乘车通过山口。

“根据绥靖区情报，共军今晚可能有行动！”戴戎光走进黄山指挥所，神色紧张地说。唐秉琳给他汇报作战值班情况，报话机长进来对唐秉琳报告说：“北岸一四五师参谋长要你接电话。”

北岸八圩港是江北尚驻有国民党部队的六个桥头堡之一。唐秉琳到隔壁拿起电话听筒，只听第一四五师参谋长焦急地说：“秉琳兄，我阵地遭遇大股共军袭击，请你赶快火力支援，赶快！”

“夜间射击很难打准，搞不好会误伤。”唐秉琳故作为难地说。

“情况紧急，师长说你们有支援我们作战的任务！”

“那好，请参谋长指示目标吧！但一定要报准确啊！”

第一四五师参谋长报了几个目标点代号。唐秉琳回到指挥所，戴戎光问：“出了什么事？”唐秉琳报告第一四五师请求后，戴戎光说：“既然请求支援，那就打吧！”唐秉琳走上炮台，计算射击诸元后下令：“全部火炮按三个编号标定点各减四百公尺，每炮十二发连射！”霎时，群炮齐鸣，一批批炮弹长了眼睛似的落在八圩港桥头堡，打得第一四五师守军一片鬼哭狼嚎。为掩饰炮击第一四五师意图，唐秉琳同时令炮兵向新港北小孤山渡江部队阵地以北射击。

炮击还在进行，唐秉琳又被喊去接第一四五师师长电话。

“别打啦！别打啦！把我们的人都打死啦！”听到是唐秉琳接的电话，师长破口大骂，“浑蛋！你们打的什么炮？老子毙了你！”

唐秉琳从对方激烈的反应中，获知炮击效果良好，平静地说：“师座，开始我就提醒贵师参谋长，夜间射击难以精准，参谋长坚持火力支援。你们指示目标有问题，造成误伤应由自己负责。”

师长暴跳如雷，嚷着要找江阴要塞算账，狠狠摔掉了电话。

第十兵团拔除江北桥头堡战斗打响后，叶飞从监听中听到敌师长与唐秉琳的吵骂声，高兴地一拍桌子：“行了，一梯队开始渡江！”

唐秉琳回到指挥所，戴戎光问：“又出什么事啦？”

唐秉琳轻描淡写说道：“弹着有些分布，他们要求暂停。”

凌晨二时，总台指挥所电话响了。戴戎光抓起电话说：“我是戴司令。”对方说：“我找唐总台长。”戴戎光又说：“我是戴司令！”对方说：“我找唐总台长！”他皱皱眉头，把话筒递给唐秉琳。

唐秉琳接过话筒，听出打电话者是王征明。凌晨一时许，游动炮团三营营长报告团长，抓到共军一个俘虏。王德容便和王征明赶到萧山三营前沿阵地碉堡，先后询问那个被俘的战士，可他始终一声不吭。王征明判断，我军前锋部队已登陆。根据约定，要塞起义时机是我军先头部队登陆上岸后。现在，配合大军渡江的最佳时机到了！碉堡里装有直通总台指挥所的电话，王征明提出给唐总台长打个电话。王德容让电话员接通后，王征明听到接电话的是戴戎光，坚持要唐秉琳接电话，随即下达命令：“我渡江部队已经全线渡江，现在，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部命令你们，立即掉转炮口，向敌军射击，配合我军渡江！”

王征明从前沿碉堡打电话，给唐秉琳带来一场虚惊，接电话时连声说“是”。放下电话，戴戎光就问：“谁来的电话？”唐秉琳说：“绥靖区来电话，要我们防止敌人声东击西。”说话间，李干在门口晃了一下。唐秉琳知道有急事相商，便对戴戎光说：“我到阵地上检查一下，有事就在大台上指挥。”戴戎光点头默许。

唐秉琳来到平台，李干悄声对他说：“北岸信号模糊不清！”

北岸炮火十分密集，李干、唐秉琳稍事观察，说：“开始了！”

夜空中有侦察机盘旋，唐秉琳命通信连连长李容有，指挥对空联络班打出“坚守阵地”布板信号迷惑飞机。这时，唐秉煜赶来说，吴广文在城里出不来了。唐秉琳、李干和唐秉煜分析认为，要塞左有敌第五十四军，右有敌第一百二十三军，敌二十一军就在眼前，目前还是稳控局势，不能马上与戴戎光摊牌，待我先头部队安全登陆后，再宣布起义。唐秉琳即令李容有、王刚，切断外线通信线路并截断总台指挥所电话；布置警卫分队封锁总台指挥所四周通道，隔离戴戎光卫士；命令沿江正面所有步、炮兵部队撤出，戴识别符号向黄山营房集中；李云葵速去守备第三大队指挥，防止第二十一军反扑炮台；李干留总台指挥所监视戴戎光。唐秉琳电话向王德容通报后，问他有何动静。王德容说，刚才阵地报告，远方江面有模糊黑影，游动炮团准备开炮，被他制止。唐秉琳判断，先头部队可能已开始渡江，即令所有部队撤出阵地。

21日凌晨三时，唐秉煜向唐秉琳报告，正面阵地部队已全部让开，正向营房集中，李云葵已到达三大队，李干已带警卫班封锁了总台指挥所外的通路，隔离了戴戎光警卫分队。

戴戎光似睡非睡躺在床上，凌晨三时许翻身起床，满怀狐疑走出指挥所，站在露天炮台向江面瞭望。忽然，他揉揉眼睛，指着江面歇斯底里吼叫起来：“船！船！炮台怎么还不开炮？”

手握加拿大手枪侍立一旁的唐秉煜急忙接话说：“司令，现在还看不清是船还是波浪的影子，等看准了以后再开炮。”

“唐秉琳在哪？马上给我找来！”戴戎光惶恐地喊着。

总台指挥所的电话急骤地响了起来，汤恩伯打来电话，质问戴戎光为什么不开炮？下令汤阴要塞全部火炮一齐射击！

唐秉琳在大台观察，指挥所班长跑来报告，司令让你回指挥所！唐秉琳问，什么事？班长说：江上有船，司令让你立即开炮！唐秉琳让他回去报告，自己正在指挥。班长走后又回来报告，司令说再不开炮，就砍你脑袋！唐秉琳让他回去复命，

自己正部署射击，抓起电话就命令第一大台第二中台台长丁培基：“即对七号目标射击！”丁培基是唐秉琳一手提拔起来的，他知道，根据预案，这是不装信管，以最大射程向东方江心实施佯动射击的行动代号。

这时，王德容从萧山打来电话：“长山第二十一军挤到我们指挥所来啦！”唐秉琳说：“坚决顶回去！”王德容说：“顶不住呀……”话未说完，电话就中断了。唐秉琳判断，第二十九军登陆后已对长山守军发起攻击，遂下令：除培基台执行监视八圩港和江中军舰防敌乘船撤逃外，其余火炮掉转方向，向第二十一军阵地轰击！

22日凌晨一时许，陆德容在长山中段江边接到渡江第一船，待集结约一个营兵力后，即带部队按事先选好的路线，避开守军视线从中段登顶，一枪未放将红旗插上长山之巅。随后，渡江部队兵分两路，一路直插沪宁线，一路随陆德容直奔黄山营房。途经一个小村庄，突然有人发问：“口令！”陆德容以为对方是要塞部队，遂答：“上海部队！”霎时，几只手电筒一齐照来，有人大叫：“毙了他！”渡江部队一团参谋长意识到遭遇第二十一军守敌，操起冲锋枪猛烈扫射，部队一齐开火，守敌不支向萧山逃去。

徐以逊从长山中段江边带领渡江部队营长丞民直奔黄山指挥所，与吴铭和唐秉煜不期而遇。唐秉煜带领登陆部队途经第一大台，吴铭看见唐秉琳喊道：“上来了！该动手了！”唐秉琳点点头，挥手指指总台指挥所，吴铭会意，和唐秉煜、丞民飞奔而去。

唐秉琳下达射击命令后赶到总台指挥所，唐秉煜对他说：“我们进去收拾他，你在外面指挥！”唐秉琳退到对面小山包警戒监视。

戴戎光在指挥所听到炮台响起惊天动地的炮声，焦灼不安的情绪顿时缓解。但这位炮兵科班出身的行家很快发现不对劲——只听炮弹出膛音，不闻落弹爆炸声，落点也明显偏离江防正面。

“他妈的，这打的是什么炮呀？是欢迎共军的礼炮啊！”戴戎光转身看时，猛然发现卫士都不知所踪。一种不祥的预感，像无形绳索把他紧紧箍住。他有些喘不过气来，却见唐秉煜和两个陌生人持枪向他逼了过来。“你们要干什么？”戴戎光绝望地说。

唐秉煜向戴戎光介绍吴铭和丞民：“这是解放军驻要塞代表。”

戴戎光说：“我跟贵军从未打过仗，对贵军一向友好……”

“我对你的安全负责，我要送你到安全的地方去。”吴铭说。

戴戎光说：“是否允许我召集连以上军官，以便整体投降？”

“不需要！”丞民说着，麻利地解下戴戎光腰间的左轮手枪。

唐秉琳在指挥所外小山包上等了几分钟，唐秉煜出来对他一扬手说：“江阴要塞起义了！”戴戎光已束手就擒！那一刻，唐秉琳觉得兵不血刃即和战友降伏敌酋的弟弟，潇洒得像个将军！

指挥所制服敌酋干净利落，基层部队起义却穿荆度棘。

游动炮团三营两连长，劫持起义营长杨明光，胁迫全营逃跑。徐以逊和陆德容分头骑自行车堵截，陆德容行至小桥，协调第二十九军特务连截住了溃兵。王刚前往工兵营，以戴戎光名义传令向黄山营房集结，却听有人喊道：“说谎，把他抓起来！”虽无人敢动手，但王刚知道，该营系黄桥自卫队和苏北还乡团收编而来，组织起义不易。虽经努力，除副营长龙潜、连长王醒中参加起义，其余者四散逃逸。

上午七时，唐秉琳在黄山射击场向官兵宣布江阴要塞成功举行战场起义，与第二十九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把解放军团长李干介绍给大家。唐秉煜和吴铭用吉普车将戴戎光押送到第二十九军军部，交给军长胡炳云。当日，唐秉琳、王德容、李云葵、吴广文联名致电毛主席、朱总司令，报告江阴要塞起义壮举。

4月22日凌晨，江阴要塞炮台猛轰江北八圩港。第二十一军原想接运驻该港第一四五师两个团撤退，遭要塞炮火打击只好放弃该部仓皇逃命。翌日，困守北岸桥头堡的两团敌军缴械投降。

以一持万的江阴要塞阵中起义后，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东部防线在最紧要处崩溃，南京直接暴露在渡江大军威胁之下。

22日上午，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奉命接管江阴要塞并军管江阴县城。王征明、唐秉琳向他汇报情况后，陪他视察了炮阵地。

当日，粟裕、张震给中央军委和总前委发电：“江阴要塞已于上午十一时为我占领”，“泊于江阴江面之逸仙等三只匪舰，经江阴炮台总台长（我党员）劝告，已先派代表接洽投降。”

24日，粟裕在江阴要塞黄山炮台接见了唐秉琳等人，高兴地说：“你们为党为人民立了大功，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粟裕特意指出，江阴要塞起义，打开了国民党长江下游防线的重大缺口，使渡江部队22日上午八时左右就切断了沪宁线。

新中国成立后，唐秉琳由华东海军司令部军训处陆训科科长转入院校，任海军学院岸防教研室副主任等职，1982年以副军职待遇离休。吴广文1950年10月赴朝参战，任中朝工兵团团长，在上甘岭战役中开凿利于隐蔽、便于出击的坑道建功，1959年任南京工程兵学院训练部部长。王德荣亦于1950年赴朝参战，壮烈牺牲在朝鲜战

场。唐秉煜由南京军区国防工程指挥部计划科长，转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工程技术教授会副主任、军委工程兵司令部学术战术研究室主任。王征明先后任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处长、上海市委保卫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等职，1954年因扬帆冤案被株连，两度入狱十三年七个月。王征明于2026年4月2日在上海逝世，享年一百零三岁，是江阴要塞起义群英中最长寿的英雄。

4月23日，南京下关北笆斗山江面，国民党第二舰队司令林遵，正在旗舰惠安舰上与舰艇长进行最后的磋商。起义不能事先发动，又因封江孙克骥无法上舰协助，林遵在事先无动员组织的情况下，开启了率领第二舰队阵前倒戈投向人民的惊险转变。

在光明与黑暗的抉择中，林遵不改其稳健行事之风。他决心在尊重个人意愿前提下，率舰队弃暗投明驶入安全的港湾。他描述了面见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副总司令张世希和海军司令桂永清的情形：“张世希痛苦绝望，大有凄然落泪之势，哀叹长江天堑都守不住了,无险可守的沪杭一线更是无可阻挡。桂永清命令我率舰队前往上海，说只要到上海，哪怕只剩一条船,也向总裁保荐我为海军中将副总司令,并授予青天白日勋章。”林遵透露，他请国民党海军参谋长周宪章、作战署署长王天池来舰队坐镇指挥，但被断然拒绝。

“目前，江阴炮台已经易手，三江营和仪征两地各有共军重炮扼守，桂永清也乘飞机跑了，我们怎么办？”林遵望着生死与共的部属说，“我们的舰艇性能有好有坏,情况各不相同。我请诸位来共商前程，何去何从请慎重考虑，我将倾听大家意见再作决定。”

会场一片寂静。随后，众人开始议论如何逃走，如何冲过共军控制的江阴炮台、三江营和仪征三道关口，有人说，过“三关”并不难，江阴炮台当年是防止敌舰上驶而设计的，炮口对准下游，舰队顺流而下威胁并不大,三江营、仪征炮阵地,舰队可用优势炮火边压制边通过；有人主张航速快慢军舰分队航行，提高航速并缩短序列长度。这时，一位舰长说:“如果开火,势必造成岸上百姓重大伤亡。为打日寇造成一定伤亡情有可原,打内战致百姓伤亡太不应该。”另一位舰长说:“海军应该退出党派之争,把军舰交出去，战场起义,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局部和平。”

与会者围绕走留发生激辩，三分之一要走，三分之一要留，三分之一犹豫。林遵静听大家发言，始终缄默不语。九时许接报:“来自安庆的‘江犀’‘吉安’‘永定’‘联光’四舰已到达锚地。”林遵即命请四位舰长来开会，在场舰艇长增加到十六人。

林遵重新给大家介绍情况，“惠安”舰舰长吴建安说:“我们应该退出党争,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协定条款，和平统一救中国。”

刚归队的“永定”舰舰长刘德凯腾地站起来说:“背离国民党，从良心上说不过去,可是国民党贪污腐化,确实令人痛心。我们舰从安庆下驶，挨了好几炮，一炮打在驾驶台上，好几个弟兄受了伤，没有医生抢救，也没有止痛药。”言讫放声大哭。

一同历险归来的“联光”舰舰长郭秉衡哭诉:“国民党那些高官真是岂有此理，把我们几条舰丢在安庆，不管弟兄们死活，要我们和当地驻军联系，自己带着姨太太逃跑了。我家在南京，老婆孩子还不知走没走。不管旁人走不走，我是决定不走了。”

又有几人发了言，但态度都不甚明朗，会议出现了冷场。

参谋戴熙愉反客为主提议:“我建议搞个民意测验,用无记名投票方式测验大家的意愿,以决定去留。大家看这样好不好？”

“好！”众人都赞同这个办法，林遵也笑望着身边的“高参”点了头。戴熙愉给与会舰、队长每人发了一张纸,讲明凡是同意留下来的,就在票上写“1”,凡是要走的，就在票上写“2”。

戴熙愉收票后,吴建安宣布休息计票。大家走出会议室在甲板上活动，林遵问“太原”舰舰长陈务笃:“你投的是什么票？”

陈务笃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我投的是空白票。”

“你在会上多次发言都说要留下，为什么又投空白票呢？”

陈务笃笑望着林遵说:“司令，刚才大家争论那样激烈，你却一直没表态。你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我还不清楚。再说，投票主要是测验那些未发表意见人的意愿，我投不投票有啥关系？”

林遵盯着陈务笃问:“那你是愿意留下来参加起义的了？”

陈务笃反问道:“司令是不是愿意领导大家起义呢？”

林遵望着陈务笃，低沉但却坚定地说:“当然。”

“那我肯定留下来参加起义。”陈务笃紧接着追问一句，“那么，司令，你的中将副总司令不要啦？青天白日勋章也不要了？”

林遵笑道:“那是桂永清笼络人心的说辞,你能相信？”

复会后宣布投票结果，8票“1”字,2票“2”字，6票空白。林遵说:“大家充分辩论发表意见，然后投票测验，事情可以定下来了。参加投票的十六位舰艇长,赞成起义八票,反对两票，弃权六票，说明多数人愿意留下来起义。刚才，我征询了个别人意见，弃权六人中，有的愿意留下来,有的则随多数人行动。两位投反对票者也表示，假如绝大多数人都留下来，他们也不会固执己见。”

林遵又说:“起义关系各位的前途，一定要自愿,绝不勉强。”

官兵命运由官兵自己决定，贯穿起义决策全过程的协商民主和满满的仪式感，甚至使人疑心这是不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叛逆。

林遵再次征求大家意见无异议后,部署办好三件事：第一，请吴建安、张家宝两舰长写信同解放军联系，吴建安和戴熙愉派人将信送到浦镇解放军处；第二，各舰电台暂不与总部断掉联系,但在未与解放军取得联系之前,不要让总部知道今天舰队会议内容；第三，各舰锚泊太密集了，今晚需调整疏散，以防不测。

4月23日，第二舰队于南京江面起义时，国民党海军第三机动舰队于镇江起义，南京下关江边狮子山国民党守军起义。华东军区海军亦在泰州白马庙成立。这一天，成为人民海军诞生日。

当日，戴熙愉、王熙华持信到浦口，第三十五军联络部部长张普生阅信后高兴地说:“我们已接到陈毅司令员指示，知道你们要起义，可到处找不到你们。现在好了，欢迎并祝贺你们！”

张普生登舰与林遵见面，代表军首长对起义官兵表示热烈欢迎和亲切慰问，并转交了吴军长、何政委4月24日给林遵的回信。

当晚,林遵按照第三十五军首长约定，带随员登岸，前往军部暂住地励志社面见吴军长、何政委，商谈接收具体环节。

4月27日清晨,起义军舰和炮艇纷纷升起红旗。除决定脱离舰队逃往上海的七艘军舰外，九艘军舰和十六艘炮艇驶向下关海军码头。八时整,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渠乘车来到码头，检阅并接收舰队。陈士渠与林遵及舰长艇长们一一握手，听取林遵简要情况介绍后,走进“安东”舰驾驶室,看到钟表、罗经、舵轮等仪器擦得锃亮,当即予以表扬，对林遵等人说:“当前，最重要的是保存舰艇和人，而且主要是人。敌机已侦察过了，接着就要轰炸。我看过就算接收了，细节以后再说。船上大部分人先下来集中学习,少部分人驾驶军舰驶离码头，按预定计划疏散隐蔽。”

4月28日,新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爱萍在江阴要塞宣布，华东军区海军领导机关正式成立，并公布了临时党委和机构领导人员名单。即日起，国民党飞

机连续轰炸起义舰艇,由于防空高炮射程低,舰队除“美盛”“联光”舰幸免外,其他各舰均被炸沉。第二舰队起义官兵成为华东军区海军的主要骨干力量。

4月30日,起义官兵给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去致敬电。

毛泽东、朱德5月18日复电嘉勉舰队起义壮举，指出：“在巡洋舰‘重庆’号于2月间起义并被国民党反动派于3月间炸毁以后，4月间又有你们的大规模起义，可见中国爱国人民建设自己的海军和海防的伟大意志，不是任何反动残余所能阻止的。”

江南暗战步步惊心，张轸率部起义最后竟然踩着钢丝险胜。

1949年5月14日凌晨三时许，林彪、罗荣桓指挥第四野战军萧劲光先遣兵团第四十三军，在武汉以东团风至武穴间一百余公里战线上强渡长江，进占鄂城、大冶、阳新等城，分路迂回武汉。另部第四十军即将解放武汉三镇。白崇禧闻讯急忙从广州飞返武昌。

14日上午，白崇禧打电话给张轸，要他到武昌红楼开会。第一二八军军长辛少亭说：“这个时候通知司令官开会，准没好事！”众将领也劝张轸不要去。张轸说：“白崇禧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张轸前往武昌路上，触目皆是匆匆南撤的第七军部队。第一二七军三〇九师师长涂建堂发现，第七军李祖霖师一律轻装步行，顿生狐疑，担心兵团部恐生不测。自信的张轸则不以为然。

张轸走进红楼，白崇禧递来一封电报。是顾祝同发的，上面写道：据密报，张轸勾结共匪图谋反叛，请即将其师长以上军官扣押送广州法办，所部就地解散。张轸直视白崇禧问：“与共产党联系不是你指示我去办的吗？怎么把屎盆子扣在我头上了？”

白崇禧说：“先不管它，河南省政府亟待恢复，你把师以上军官找来，看谁愿意回去，可以委他兼任省主席和豫皖地区指挥官。”

张轸知其欲一网打尽，说：“哪能都来，得留个看门的！”

白崇禧说：“你现在就给军师长打电话，今晚咱们作彻夜谈！”

张轸说：“我坚决听从命令！不过，兵团驻汉办事处知道我到了汉口，那里有要事等我处理，还可直接给军师长打电话。我去一趟，个把钟头就回来。我也想跟你好好谈谈。”

白崇禧略一犹豫，最后还是放张轸走了，嘱他“快去快回”。

张轸逃出司令部，和副官及卫士跳上吉普车，从阅马场经彭刘杨路向金口飞驰。车近武泰闸，为了躲过特务检查，张轸提前下车，嘱副官和卫士乘车先行，过闸后在三里外江边等候，自己只身乘船过江。张轸上岸步行三里，登车沿江堤直抵金口鲍汝澧师师部，一进门，抓起电话就通知辛少亭等将领速来金口共商大计。这时接报，贺胜桥兵团部及五个直属营，被第七军包围缴械，公私财物被洗劫一空，张轸积蓄的几千两黄金和上万银圆也被劫走。在第七军挟持下，赵子立率刘子仁、郭馨波两个师南逃。张轸怒不可遏，挂通电话即大骂白崇禧，随即令辛少亭率第一二八军军部向金口靠拢，令该军张玉龙、张继烈两师昼夜兼程向金口方向集中，在马鞍山等处占领有利地形，构筑工事，准备迎击第七军和第五十八军进攻。军师长赶到后听张轸诉说虎口逃生经过，无不义愤填膺，同声拥护弃暗投明。独立师师长张旭东因杀害共产党员太多，苦苦哀求另谋出路。张轸碍于面子允其离去。

5月15日拂晓，辛少亭在金口指挥部队阻击第七军一个师和湖北保安旅进攻，张玉龙、张继烈两个师同第七军两个团激战马鞍山。张伊人等从江汉军区赶回，张轸即向部队发出以“55555”为代号的起义通令，正式宣布起义。四野先遣兵团过江从金牛直插贺胜桥，江汉军区独立一旅逼近汉阳。唯恐南退后路被截断的白崇禧登机南逃。张轸起义一波三折、历尽坎坷，终率第十九兵团一二七军一个师、第一二八军三个师二万五千余人成功起义。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叶剑英，先后致电张轸表示祝贺。8月1日，中央军委决定张轸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一军，张轸任军长，杨春圃任政治委员。

1949年12月25日，慑于解放军入川部队声威，窜至四川内江的原十九兵团副司令赵子立，被迫率一万二千三百名官兵起义。

（三）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胜利

1949年4月20日晚八时，在无为泥汊起渡点，随着一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第一梯队突击船如离弦之箭驶向江中。战船离岸时，一个年未及笄的少女，跑动中将手中长篙朝地上轻轻一点，小燕子般腾身跃起，凌空落在哥哥驾驶的渔船上，引来一片惊叹声。这位飞身登船的渔家少女，就是后来名满中国的马毛姐。

生于1935年的马毛姐是无为马家坝贫苦渔家之女，从小给人家当童养媳，因受不了使唤丫头的窝囊气，一跺脚跑回了家。

1948年底，无为解放，马毛姐家翻了身。渡江部队进驻无为，马毛姐和哥哥瞒着父亲，跑到十多里外的凤凰颈船舶站报名支前，带领解放军和区乡干部入户动员，把沉在河底塘边的船打捞出来。临战训练，马毛姐要上自家的船，一个指挥官却问：

“小鬼，你来干什么？”“我来送你们过江！”“水上作战很危险，你会被枪炮声吓哭的！”“我不怕死，会掌舵，会划水，我哥扯帆，我掌舵，保证把你们送到南岸！”可指挥官和哥哥还是把她推上了岸。4月20日黄昏，部队登船前，马毛姐急中生智藏在江边芦苇中……

天上高悬照明弹，炮弹在江面激起冲天水柱，有两只船被炸沉。哥哥要妹妹推歪船舵减速救人，马毛姐说：“不能停，冲过去，不然我们也会被炸沉！”指挥员说，后面有收容船救人，渔船冒着炮火向前疾驶。船篷被打烂了，战士接连负伤，马毛姐右臂也负了伤，鲜血直流。她用腿夹住舵杆，舒展双臂奋力划水，战士们也用铁锹和钢盔划水。船抵南岸金家渡，登陆勇士在机枪掩护下猛虎般扑向敌人。马毛姐返回途中救起多名落水战士，回到北岸简单包扎伤口又驾船疾进，一夜六次穿梭大江，将上百名部队官兵运送南岸。战后评功，一开始没有马毛姐。原来，支前船工名单上没有她的名字。引人注目的小英雄，最终被评为一等功臣。

无为牛埠乡（今牛埠镇）青岗村船工胡业奎，是感动皖江的传奇式英雄。3月，胡业奎参加乡里动员支前大会后，当夜带领三十多名渔民乘小渔盆南渡，在小沙洲屯船处打死执勤哨兵，夺回村里被匪军掠往南岸的十八条渔船，胡业奎当上了渡江突击队队长。4月20日晚，胡业奎率青岗突击队运送第二十四军七十一师官兵渡江，冒着弹雨六次穿梭大江，把三千六百余名官兵送至南岸铜陵胥坝。第六次抵达南岸前，胡业奎驾驶的船遭敌炮火拦截，船舵被打坏。他跳进江中推船抵岸，不幸胸部中弹，鲜血染红了衣襟。“老胡，快上船！”官兵们伸手去拉胡业奎，他艰难地摇摇头，拼尽全身力气把船推至南岸，看着官兵上岸后，身子一歪沉入水中，江面留下一片殷红。官兵急忙把他捞上来，胡业奎因流血过多，光荣牺牲。战后，他被评为特等渡江英雄。

无为船工车德旺和儿子车胜科、车胜福，4月20日夜从临江坝起锚，运送第二十七军八十一师突击队员过江。弹雨如织，父亲、弟弟和一些突击队员相继中弹，车胜科的手也负了伤。船抵汪家套后，他飞快驾舟北返，把负伤的父亲和弟弟交给卫生队，赶紧找到一名船工帮忙。不料登船路上，船工被敌机炸死。车胜科跑回家，拉上三弟车胜亮和堂叔车德满，一齐登船继续送部队渡江。到26日，车胜科先后和四名亲人跨江穿行七昼夜，把上千名官兵运送到南岸。车胜科成为无为第二名特等渡江英雄。

名列长江二十四矶之首的板子矶，矶腰修有三座碉堡。为打掉部队南渡拦路虎，4月20日晚，无为陡沟镇田桥村王德金，驾船送第二十七军二十四名爆破手过江清除矶上碉堡。船过中流，板子矶守敌猛烈开火，王德金和几名爆破手均负了伤。碉堡居高临下，船头重机枪射角太低，王德金往船板上一跪，手扶重机枪架固定在肩头，机枪抬高射角有效压制敌火力，渡船快速抵岸。爆破手攀上悬崖炸掉三座碉堡，一梯队迅速突击上陆。这一夜，王德金驾船往返六次，运送二百多名官兵渡

江，自己却被重机枪震得双耳失聪，落下终身残疾。他是无为第三位特等渡江英雄。

4月21日天刚擦黑，望江县回民村七十二名突击队员就开始登船。排在前面的是从江南跑回来的十条小划子，运载第十六军一梯队突击队。每条小船载五名战斗员，一名船工。船头架一挺机枪，机枪手卧于船舱，两侧各坐两名战士，一人手摇叶轮鼓水，一人划桨为小船加力，船老大在船艉掌舵。惊天动地的炮火准备后，周指导员对回民支队突击队员说：“大家准备好，马上要过江了！”随着团长一声令下，十艘小船相继驶入江中，像十柄利刃劈开江水逆流而上，驶至江心又顺流而下，直抵预定登陆点石矶头。

少年董玉发正顶着飞溅的浪花全神贯注驾船前行，忽听身后沟口起渡处“咣”一声巨响，他一侧首，见一发炮弹落在正登船的后续部队中，官兵中出现了伤亡。他心头一沉，把稳舵杆，小船昂首驶近江心，董玉发顺流转舵掉头直取东南方向的石矶头。

突然，马吉荣和斯洪力驾驶的第一和第二艘小船，在风浪中先后驶过石矶头顺流而下，先后被敌人炮弹击沉，十名战士和两名船工壮烈牺牲。轮到董玉发的第三条船靠岸了，他眼里冒着怒火，把稳舵杆，瞅准风浪间隙瞄着石矶头一举贴了上去，船上五名战士一跃而起快速冲上南岸。这时，他觉得自己下巴像被钳子拧了一下，伸手一摸，血流了下来。他知道自己负伤了，返程中，一叶轻舟被他摇得像一支射穿风浪的飞梭。江面不断从上游漂下牺牲战士的遗体，他和回民支队的突击队员从江中捞起八十多具遗体，葬在村南江滩。事后董玉发得知，4月21日这一夜，单是望江沟口引河闸，第二野战军十五、十六军，就有三万多官兵由此输送南岸，成为西集团快刀斩长蛇的重要突击力量。渡江后，第二野战军五兵团给望江回民支队颁发绣着“伊斯兰的英雄”大字的锦旗。

4月23日傍晚，曾连续十六夜北渡新四军过江，并从沉船救起五十六名官兵的泰兴籍渔民丁广田，送大军渡江北返时与国民党海军一艘军舰相遇。丁广田临危不惧，扯着嗓子对敌舰喊：“国军弟兄们！你们没处逃了，快投降吧！解放军优待俘虏！”

敌舰本打算冒险闯过解放军火力网，但又怕中炮船毁人亡。遇见丁广田，就像一群快要沉底儿的赌徒忽然看见漂来一只救生圈，急忙对他高喊：“我们要投降！快摇船过来！”

丁广田准备靠向敌舰，可船主怕船被匪军扣留，死活不答应。为稳住敌人，丁广田告诉敌舰自己船有毛病，马上换船上舰。上岸后，他即向渡江部队商大队长报告情况，表示自己愿上舰联系，约定半小时回不来，说明敌人是假投降，即向敌舰开炮。商大队长考虑到部队上舰敌易狗急跳墙，同意丁广田登舰，并给他一支步枪，

部队做好战斗准备。丁广田驾另一条船上舰后，狡猾的敌舰长压根儿不提投降的事，却先向他探问：“北岸是什么地方？”

看来敌人不知道军舰所处的位置！丁广田知道，眼前的四圩港，是通往下游最后一道炮火封锁线，一旦为敌所知，必然会助长其侥幸闯关心理，于是对敌舰长谎称：“北岸是四墩子”。

“这儿离四圩港还有多远？”敌舰长紧盯着丁广田又问。

“有十二里远。”丁广田不露声色地说。

“弟兄们！等死不如拼死一闯，冲过去！”敌舰长挥枪喊道。

丁广田情急智生，忙说：“我天天从北岸江堤过，解放军的大炮摆得一眼望不到边。你们这么大个兵舰，能从天上飞过去？”

丁广田描绘的十里“炮阵”，令敌舰长胆怯起来。

“你们八成走不了啦！”丁广田运用学到的俘虏政策展开攻心，“解放军优待俘虏，愿当兵的参军，愿回家的发足路费……”

“叭！”敌舰长对空开了一枪，威胁说：“再鼓动就毙了你！”

“轰隆！”一声巨响，炮弹在军舰不远处爆炸。北岸商大队长见敌舰不挂白旗，下令向敌舰开炮警告。炮助人威，丁广田大声说：“你可以打死我一个，可你打不死成千上万的渡江大军！”

“打死个老百姓有啥用？谁要打仗谁打去。”舰上人心浮动。

“要投降就派人和我上岸，大炮可不等人！”丁广田趁机说。

敌舰长见逃跑无望，遂派梅副舰长跟丁广田上岸联系，舰上一百二十名官兵悉数投降。战后，丁广田被评为渡江支前特等功臣，1959年赴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亲切接见。

1949年4月21日凌晨二时，来自湖南洞庭湖赤山岛罗村的聂春台等四名船工，向荻港运送第二十七军八十一师官兵上岸后正要北返，随着一阵轰鸣，西面一个黑黢黢的影子翻着浪花顺水扑来。是敌舰！聂春台暗忖，渡江部队已向南追击逃敌，四名船工只有自己参过战，可啥家伙什也没有。他让三名船工到岸上交通壕隐蔽，自己在船后舱找到三枚手榴弹，上岸后卧在土丘后面，拧开手榴弹木柄盖，握住一枚抽出拉火环套在手指上。

两艘敌舰驶过，上标“巡字25号”字样的汽艇靠近聂春台的小船。一个军官走出舱，提起小船上的绳子就往汽艇尾钩上拴。

“狗东西，原来想拖走我们的船！”聂春台“嗖”的一声甩出手中的手榴弹，一声爆炸，艇艉的“大盖帽”应声掉落江中。

聂春台把第二颗手榴弹投到艇艏，汽艇动力损坏，在江中随波漂荡起来。聂春台趁势投出第三颗手榴弹，汽艇驾驶舱玻璃窗被炸得粉碎，浓浓的白烟从舱中冒了出来。四个敌人冲破烟雾从舱中跑出来，跪在艇艏边作揖边喊：“饶命啊，我们投降！”

赤手空拳的聂春台把右手稍稍放在身后，装作手持武器的样子，对着汽艇上的四名敌人大声喝道：“放下武器！谁敢乱动就打死他！解放军优待俘虏，都给我老老实实下船！”

敌人乖乖上岸后，聂春台和船工从艇上搜获两挺重机枪、三支步枪、两支匣子枪，连同四名俘虏一起交给渡江部队。

月华如银，江风轻拂，中共华中一地委工委组织部部长焦寿康与沙洲县（今张家港）土匪詹留金正在江边酒馆小酌。

詹留金因水性好，驾船技术高，人称“混江龙”。沙洲地下党了解到詹留金很讲江湖义气，且痛恨国民党，打算让他参加渡江，给他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可詹留金一直躲着不露面。

经过暗访，得知“混江龙”藏在靖江新港一条船上。沙洲县地下党员陆英、查小龙，不动声色赶到靖江，到詹留金藏身的船上把他“请”了下来。那是一个熏风轻拂的春夜，焦寿康与詹留金在江边小店把酒临风，漫话江湖。詹留金虽然“混”，却也是苦出身，懂得共产党人是为穷人出生入死，也完全赞同老焦讲的过江解放全中国，让老百姓安享太平的道理。共产党的组织部长跟他在一张小桌上喝酒，实打实跟他掏心窝子说话，他觉得老焦够朋友。当老焦提出渡江中让他挑副重担子、干点大活，承担输送部队指挥所过江的关键任务时，詹留金愣住了。送部队首长过江，这是多大的信任啊！他斟个满杯给老焦敬酒，拍着胸脯表示，押上自己的脑袋，也要坚决完成任务，将功折罪。4月21日夜，詹留金操舟运送第二十九军军长胡炳云、政治委员张藩过江。他临战不惊，以丰富的经验和娴熟的技术，驾船平稳安抵南岸江阴长山。

靖江上五圩港，是第二十八军最西的起渡点。21日黄昏，“拔锚开船”号令一下，桅林帆影间便传来一阵兴奋而隐忍的呼叫声。那声音是由远及近、此起彼伏的，又是渐行渐亮、响遏江涛的，像裹着滚烫灼人复仇怒火的飓风，飞快地从一字儿排开

的各色木船间掠过去，掠过去，转瞬就在哗啦哗啦的起锚声和吱扭吱扭的升篷声中，化为桨橹翻飞、江涛欢鸣的百舸争流交响乐。渡船兵分五路，直取南岸江阴要塞西侧东港。不知运送了几趟，午夜时分，九中队的船行至江心，上游突然传来“呜呜”的马达轰鸣声。

“国民党军舰来了！”耳朵尖的船工轻轻叫了起来。话音未落，一排炮弹从头顶上啸叫着，落在下游不远处的江中爆炸了，巨大的浪柱在江中砌起一道灰白色的水墙。

船队中响起船工的骚动声，战士们也下意识抓起武器，哗啦哗啦拉着枪栓。这时，响起了一个被岁月窖藏得苍老而醇厚的声音：“同志们！放心吧，江北来的民工也不用害怕！”

说话的是从宝应来的女艄公张大娘。她和丈夫吕金田、儿子吕洪蓝一家三口编在一个船队。张大娘稳稳把着舵，神闲气定地说：“四年前，新四军北撤，我在长江上渡咱们队伍，也是打着仗。这一回，咱们的队伍更强大了，还有我们这些使了一辈子船的老船工，一定能把大家安全渡过去！”说罢，她回头对儿子和船工说：“我掌稳舵啦，洪蓝！你们几个使劲划，让船早点儿靠岸！”

船加快行驶，可张大娘还嫌慢，索性用双腿夹住船舵把杆，操起双桨，摇动双臂，力道十足而又富有韵律地俯仰起合。船舷两侧的战士，也用钢盔和小锹奋力划水，木船劈开幽暗的江水，唰唰向南岸驶去。“敌人的军舰溜掉了！”众人扭头向下游望去，只见无心恋战的军舰，闭灯快速行驶，一溜烟消失在夜幕中。

1945年新四军北撤时，靖江县太和乡突击队长严声甫曾穿梭长江四十多天运送部队。一次载部队从江南驶向北岸八圩港，敌舰边追边用机枪扫射，严声甫拼死把船拖进港去，使官兵脱离了险境。1949年春节期间，严声甫儿子严伟敬配合太和区委在江上征税，被国民党军射杀。4月20日晚，严声甫怀着复仇怒火，带领九十五条船南北飞驰输送部队，自己驾船在七里宽的江上一夜折返八趟，创造了单船运兵最高纪录，被评为特等渡江功臣。

渡江老战士、原二十八集团军副政治委员李祝民终生难忘，靖江一位船老大因家中无人，带着儿子和三岁的孙女驾自家渔船支前，创造了祖孙三代同船出征的历史，也留下了年龄最小支前民工的记录。自然，不谙世事的小民工上船，尚不能真正履行一个支前民工的正常职责，但她带给渡江勇士的感动与震撼，又岂是哪个成年民工所能比拟的！孩子被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吓得哇哇大哭，战士们把她紧紧搂护在胸前，像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拱卫呵护着人民的希望与牵挂。孩子的哭声减弱了，但官兵们对携子将雏举家支前人民的由衷敬意，对跨越天堑解救黎民百姓的崇高责任感，却像熊熊烈火越烧越旺。李祝民清楚地记得，船头砌有两个土包掩体，其中一个用绸面被子包着，船帆也用褥单修补过。船老大一只胳膊被弹片击中，战士们

给他包扎后，他把胳膊吊在胸前，另一只手继续掌舵，指挥儿子和战士全力划桨前进。

4月22日清晨，东集团各起渡点均传令疏散隐蔽，可自顾不暇的敌机始终未来。一大早，群众便急切赶到江边打听消息。当得知三十万大军已胜利南渡，守敌狼狈逃窜时，江边鞭炮齐鸣，锣鼓喧天。船工们忙着烧香谢神，分享战斗过江的惊险故事，惊叹声欢笑声不绝于耳。当晚，后续部队继续过江，一艘艘从武汉、南京撤往上海的敌舰闭灯夜航，高速行驶，掀起的浪头几乎将渡江木船掀翻。战士们目睹敌舰争相逃命的丑态，一齐大笑起来。

> 1949年6月，无为、临江、无南、湖东四县合并为无为县。
> 中共芜湖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编：《重返烽火岁月 再现渡江精神》，第59页。

历史怎能忘记胜利的摇橹者！1949年5月15日，宋时轮和聂凤智在无为[注]庆功大会上为立功船工颁发立功证书。全县二千一百九十四名功臣模范，一等功臣二百九十六人，二等功臣四百二十九人，三等功臣九百七十三人，四等功臣四百九十九人。[注]渡江战役中，共有六千多名地方干部和十一万名船工参战，其中一万两千五百七十八人立功受奖，二百二十五人光荣牺牲和负伤。

4月22日傍晚，扬中县新坝镇新治村栏杆桥码头，新华社记者邹健东相机的镜头，聚焦南渡船上一个身材苗条奋力摇橹的“大辫子姑娘”。这幅江南少女与戎装勇士动静反差鲜明的照片，首次刊于《新华日报》，加有深情绵邈的说明词：我送亲人过大江。

一个感人至深又引人遐思的背影，嗣后随着定格画面频频出现，向历史也向现实呼唤：炮火中击楫奋进的“大辫子姑娘”，你在哪里？从战争到和平，邹健东一直在寻找。他委托《南京日报》同业寻访，还在《周末》《新闻广场》等媒体刊登图文回放摇橹少女的剪影。然而，半个世纪过去，“大辫子姑娘”依然杳无音信。

1998年6月，文献纪录片《风雨中山路》编导吴建宁采访邹健东，“大辫子姑娘”线索令他怦然心动。翌年4月27日晚，江苏卫视播出《风雨中山路》，常熟市唐市镇董小妹看到荧屏上的“大辫子姑娘”，一眼认出这正是年轻时的妈妈！1951年，二十一岁的颜红英随夫迁居吴江县菀坪乡，1973年为开垦太湖滩涂迁往菀坪乡农场村。董小妹急忙给妈妈打电话：“电视上正找你呢！”

这个惠风和畅的夜晚，五十年前记者定格的画面，终于与健在画中人重合。5月7日，颜红英由女儿董红英、董小妹陪同，与妹妹颜根兄一起来到南京电视台。颜红

英指着照片中“大辫子姑娘”说：“这就是我！”经询颜氏姐妹，所述情形与史实吻合。

1949年4月22日傍晚，宝应县广洋湖镇杨林沟村船工颜建发带女儿颜红英、颜根兄，驾驶自家木船载着二十四名解放军官兵，从江都中闸向南岸丹徒县伏园乡渡口疾驶。行至江心，炮弹接连在船周围爆炸。有战士问：“小姑娘，你怕不怕？”“不怕！”颜红英说着，忽觉脸颊像被火灼了一下，血淌了下来。“妹子，你负伤了！”“不碍事！”颜红英用手抹把脸，继续深俯高仰，奋力划船。鲜血洇成一朵怒放的红花，战火中的青春融入瑰丽的晚霞。

颜红英摇船驶出江都中闸港时，手持徕卡相机的邹健东正伫立江边。红日西沉，夹江如镜，奋力划船的姑娘，严阵以待的士兵，动与静、柔与刚，自然和谐统一于南进战船之中，恰与远处三三两两的乌篷船相映成趣……“咔嚓！”“我送亲人过大江”的感人瞬间储于相机，一个延续半个世纪的故事，也由此埋下伏笔。

“大辫子姑娘”找到了！辗转病床的邹健东邀“大辫子姑娘”到北京。1999年5月22日，渡江支前二等功臣颜红英、颜根兄来到北京。颜红英手捧邹健东赠送的“我送亲人过大江”照片，望着自己少女时代的背影，喃喃自语：“这是我的第一张照片……”

7月30日晚，建军七十二周年晚会舞台屏幕出现了“我送亲人过大江”投影。在歌曲《背影》旋律中，颜红英和邹健东走上舞台。画中人和摄影者相会中国剧院，渡江南进余韵激励人心。

1951年10月3日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陪赴京参加国庆典礼代表一起看戏，开演前，周恩来指着马毛姐介绍说：“主席，她就是您邀请来的渡江小英雄。”翌日，毛泽东在家中请代表吃饭，亲切地对马毛姐说：“你这么小就这么勇敢，不怕牺牲，很了不起，但不要骄傲，不要翘尾巴。”毛泽东在一个笔记本的扉页上写下了“毛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勉励话语，送给她作纪念。

《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495—49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此前两年许，1949年5月1日，毛泽东去颐和园益寿堂看望柳亚子，两人谈诗甚畅，一起荡舟昆明湖。交谈中，柳亚子说，没想到胜利会这么快，解放军很快渡江成功占领了南京。不知道毛主席用的什么妙计？毛泽东笑道，打仗没有什么妙计，如果说有妙计的话，那就是知己知彼，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决策。还有，就是先生说的，人民的支持是最大的妙计。我们有一百万军队渡江，如果没有人民的大力支持，是不能成功的。

2020年8月，习近平参观合肥渡江战役纪念馆。他仔细听取了工作人员讲解，用目光抚摸着一件件饱经沧桑的展陈文物，十分感慨地说：“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

（四）钟山风雨香山入诗

>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渡江战役》，第20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

1949年4月22日，“南京敌已极形混乱，正向南或向东撤退中”，而预定进占南京的陈赓兵团尚在江西湖口至安徽望江地区，向南京转进至少需半月时间，长江北岸的第三十五军是离南京最近的战役军团，有鉴于此，粟裕乃与张震联名向刘伯承、谭震林和八、十兵团并总前委、中央军委发电：“如南京之敌逃窜，则三五军应即渡江进占南京，维持秩序，保护敌人遗弃之一切公私财产。该军应特别注意遵守政策，严肃城市纪律。”[注]

刘伯承也建议总前委，二野主力免出南京与三野交叉运动，直出浙赣路进贤至义乌之线，割断蒋、桂两敌之联系。

>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渡江战役》，第48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粟裕军事文集》，第47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

总前委同意以上两电建议，改由三野八兵团进驻南京。[注]

> 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解放》，第9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22日深夜，第三十五军接兵团急电：南京守敌决于22日晚起撤离，应不失时机从南京正面强渡，进驻南京（其他部队赶不及），切实维持治安秩序。[注]战前该军未配备船只。翌晨，吴化文在浦口车站定下渡江进占南京决心，何克希战斗动员抓紧找船。

23日晨，南京政府仓皇辞庙，第四十五、二十八军残部亦弃城南逃。22日下午，汤恩伯决定放弃南京前，下令炸毁港口、火车站、机场。一工兵营长组织炸毁下关车站部分设施后，又直奔老江口火车轮渡栈桥意欲破坏。守望水上警察局岗楼的中共地下党员潘逸舟，边大声疾呼，边用机枪扫射，阻敌下手。下关水上警运会共产党员林大宗，带领起义警察前来援助，迫敌狼狈逃窜。

23日下午，第一〇四师在三河乡桥北村江滩芦苇丛中，找到一条载重一百二三十担的船。师副参谋长张绍安请船主童达兴帮助渡江，又在老江口寻得一位船工。暮色苍茫中，童达兴驾船载师侦察连指导员杨绍津和六名侦察兵，从南京石油公司浦口储蓄所（今南京造纸厂）出发，逆水而上行至南岸石油公司码头，被一国民党警察发现，战士举枪将其击毙，侦察兵在下关煤港顺利登岸。童达兴驾船连续六次往返南北两岸，渡送侦察连安全过江。

当日，扼控长江江面的下关狮子山江宁要塞第一炮台台长、中共地下党员胡念恭，令全台一炮不发，携装投向渡江部队。

第一〇三师侦察科长沈鸿毅率侦察连前出寻获一只小船，船主父子操舟，排长何鹏等五人乘船过江抵下关，经地下党与下关电厂副厂长接头，商定该厂运煤船“京电号”迅速运送部队过江。

“京电号”系钢质蒸汽机动力船，4月中旬，国民党军强行将该船拖入护城河。电厂工人即把发电用煤倒入长江，致半个南京城因无煤发电而停电，“京电号”得以重返江中拉煤发电。

“京电号”一马当先运载部队渡江，轮渡工人也启动“反搬迁”保存下来的火车轮渡“凌平号”“港平号”拖轮和可乘二三百人的趸船运载官兵。北岸栈桥修复后，“浦口号”也投入运送。

24日拂晓，林大宗率“水上挺进队”八艘巡逻艇拖民船前往浦口协渡。民生、福记轮船公司和招商局、铁路轮渡管理所及地下党收集的船只，不顾敌机轰炸加入航渡，加快了部队过江速度。

2月28日，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厅长兼首都卫戍副司令黄珍吾，根据蒋介石批准的《国民政府紧急应变计划》和汤恩伯传达的命令，释放了南京老虎桥等监狱和各区看守所三千三百一十八名在押刑事犯。江洋大盗出狱即偷了前外交部长王世杰的家，绑了南京市市长滕杰干女儿的票，国民党弃守的南京亟待维持治安。

第三十五军过江后从南京和平门入城。吴化文、何克希令第一〇四师从左侧迂回前进，直插紫金山、中山陵，从东侧控制南京；第一〇三师从右侧直插清凉山、五台山等制高点，从西侧控制下关江面；第一〇五师占领新街口、中山门一线，控制市中心和光华门外飞机场及中山、西康路以西地区，保护外国使馆安全。

何克希要求第一〇五师师长何志斌带一个营迅速占领总统府，何志斌听命率第三一五团二营跑步前进。何志斌带部队跑向春天的六朝古都，也在蜕变中跑向人生的春天。经淮海战役和攻打“三浦”锤炼，何志斌已完成了从旧军人到解放军高级指挥员的转变。

第一〇五师抵总统府，先期渡江的第一〇四师第三一二团三营营长管玉泉捷足先登，于23日午夜率部占领总统府。镂花铁门打开后，三营官兵鱼贯而入，登上总统府大门顶楼扯下青天白日旗，换上一面鲜艳的红旗。金陵春夜，中国最后一个反动统治集团的巢穴，换了人间。天亮后，战士们立于总统府门楼，补拍了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照片。挥师收京的吴化文，为自己终生自豪的壮举留下一句名言：“当了一辈子婊子，最终端了老鸨的窝。”

吴化文率部占领南京步入人生高光时刻之际，当年率军攻取红都瑞金的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十七绥靖区司令官李默庵也明察大势，积极参与湖南和平解放事业，协助程潜筹备长沙起义。是年夏天，李默庵弃官移居香港，拒绝了国民党要其去台湾的安排。8月4日，程潜、陈明仁起草起义通电，将李默庵列为领衔者之一。这个曾经的共产党人，又重拾青年时代的选择，回到人民的怀抱。1990年，李默庵回国定居，致力于祖国统一事业。

4月22日，张治中复电南京“请于23日派机来平”。24日，飞抵北平的专机给张治中带来何应钦的信函：“文白吾兄并转邵、章、李、刘诸兄钧鉴：此次和平谈判，经兄等尽最大之努力，仍未能克底于成，此属国运使然，凡我爱国之士，莫不同声悲叹。兹特派专机来平，敬祈与全团同人即日径飞上海为盼。”

令张治中意外的是，专机不仅带来了何应钦的亲笔信，还载来了他的夫人洪希厚和女儿。上海地下党根据周恩来指示努力工作，遂使张治中夫人和女儿随机抵平。洪希厚是张治中指腹为婚的妻子，十七岁时按当地洪张两姓联姻习俗，嫁给家境贫寒的张治中。婚后，洪希厚作为长媳，既要照顾体弱多病的公婆，又要照顾尚未成年的小叔子。公婆去世时，张治中因公未归，洪希厚只得带七岁的小叔子张文心回娘家苦度时光。淞沪抗战时，张治中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兼左翼军总司令。四弟张文心随他上战场前，洪希厚恳求丈夫：“打仗时，让文心留在你身边好吗？”张治中对发妻慨然说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仗一打起来，是不分前方后方的。这次去上海，我已做好了战死的准备。作为一名军人，文心也应当如此。”洪希厚不识字，张治中官拜将军后，不少有三妻四妾的国民党高官都同他开玩笑，劝他另娶名门闺秀和大家小姐。张治中说：“她是我孩子的母亲，也是我的家乡人。抛弃了她，我将来何以向子女交代，何以面见家乡父老？”

国共和谈破裂后，南京政府代表团全体代表面临走留抉择。代表们大都愿留北平，投向人民怀抱。只有张治中反复强调：“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来和谈的，和谈既然破裂，理应回去复命。同志们行动完全可以自由决定，但我是首席代表，不能不回去复命。”

中共代表知道张治中这一想法后，一起赶来劝阻。周恩来、林伯渠、李立三恳切挽留说：“《国内和平协定》为南京方面所拒绝，我们都感到十分遗憾。国民党内部

四分五裂，已全部崩溃，估计随着形势好转，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即使全面和平办不到，部分地区的和谈是可能的。这个协定还是有用的，请留下来吧！”

中共诚心挽留，南京和谈代表深为感动，但张治中坚持回去“复命”。周恩来苦劝仍不能使老朋友回心转意，遂动情说：“你们无论回南京，还是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特务都会不利于你们的。西安事变时，我们已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也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披肝沥胆一席话，令张治中震撼不已。

林伯渠和李立三也接着说：“过去在重庆、南京，谈判破裂后，我们的代表并未撤退，就是为了保持接触。挽留你们也是此意。”

张治中为周恩来的细心和周到所感动，再也不好意思提回去“复命”了。4月25日，张治中通过返沪专机给何应钦带去日前全体和谈代表签署的信：“敬之院长先生:22日晚间接奉德公电话,谓于翌日派机来平,当即转告各同人准备南行，并即函告共方查照。旋由周恩来、林祖涵、李立三诸位分别访问同人等,坚相挽留,并表示随着将来新的形势发展,尚可续为和平努力等语,曾于22、23两日两电并于23日晨以电话向南京请示数次,皆未得通。昨闻中央公司今日有机来平,复与共方洽商,申明必须南返理由,冀其同意,然周仍诚意挽留,未肯同意,似此只有暂留静待而已。”

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北平多次同正在经历平生未有深刻转变的张治中谈话，殷切希望他参加中国人民政协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职务。张治中对自己的过往终难释怀，不无愧怍地说：“过去这一阶段的政权是我们负责的，今已失败，成为过去了，我这个人也应成为过去了。”毛泽东笑望着从重庆谈判以来相知日深的老朋友，意味深长地说：“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了声明，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年初一做起！”

“从此，我又开始了新的历程。”张治中静夜走笔这样写道。

4月21日拂晓，第二十七军先遣渡江大队在寨山与龙门山之间高地，与登上南岸的第八十师二三八团二营胜利会师。昨夜疾进中，一连一个排与大队失联后，机动灵活插向大磕山，从侧后向正阻击我渡江部队的守敌猛冲，歼敌一个排并控制该山，策应第七十九师渡江。原第七十九师侦察连一个班切断横山桥、三山街与江边之敌电话线后，迅速与渡江部队会合。原第八十一师侦察连一个班，破坏敌第八十八军指挥所电话致其指挥中断。南繁芜游击总队进至红花山，有的冷枪袭扰敌人，使其草木皆兵；有的在白象山方向袭击横山镇敌师部；有的破坏盛桥长山头北至繁昌竹丝塔以南的电话线。油坊咀、焦湾、孙滩到三山一线守敌所在处，游击队都燃起了火堆，给江北炮兵之神安上了眼睛。

21日凌晨三时，第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政治委员刘浩天，在大磕山一个小村庄亲切接见章尘、慕思荣，称赞他们出色完成了先遣渡江任务，为夺取战役全胜立了大

功。大队官兵与南繁芜游击总队告别，加入了南下追歼逃敌的行列。1958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把第二十七军渡江侦察的传奇故事搬上银幕，拍摄出脍炙人口的战斗故事片《渡江侦察记》，成为新中国饶有特色的文化记忆。

4月28日清晨，陈毅和邓小平一早就起床漫步总统府西花园。

27日夜幕降临时分，两人率总前委机关抵达江北浦口码头，三野侦察参谋李伏仇接应首长过江。登上“京电号”火轮前，邓小平听船工汇报接送部队渡江情况，称赞说，了不得，了不得，头一个到达对岸，渡江第一船嘛！那么多部队坐这条船过江，我也要坐这条船。陈毅、邓小平过江后，穿过灯火阑珊的市区，按部队安排入住“总统府”西花园。二十二年横戈马上，二十二年浴血奋战，当国民党反动统治在气吞山河的大进军中轰然倒塌时，夜宿昔日蒋家王朝权力中心，两人都有说不尽的感慨。

坐落在南京东城国府路上的“总统府”，从明洪武初年以来，历代于遗址屡兴屡建，遂成此府殿式建筑群，曾为两江总督衙署、太平天国天王府、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冯国璋副总统府。1927年3月，蒋介石在此成立军事委员会；1928年4月，国民党南京政府在此诞生；1948年4月，蒋介石在此就任民国首任大总统。然而，“总统府”巨殿匾额仅挂了一年光景，即在风雨中陨落。

李宗仁后来说，抗战胜利“实开中华五千年历史上未有的奇局。孰意胜利不及四年，我国民政府竟被共产党逐出大陆，数百万军队一败涂地，实在也是亘古以来鲜有的怪事”。

28日一早，陈毅、邓小平于鸟语花香中并肩漫步，陈毅突发奇想：“既然到了总统府，不去看看蒋总统的办公室，岂不可惜！”

“要得！要得！”邓小平与陈毅一拍即合，一起来到子超楼。

这座1936年建成的办公楼，国民政府主席林森1943年8月于重庆车祸罹难后，便以他的字命名以为纪念，1948年5月改称“总统府”办公楼。蒋介石办公室位于二楼。两人拾级而上步入逊王朝“金銮殿”，邓小平进门不忘戏谑：“蒋委员长，我们来了，你缉拿我们多年，今天我们主动上门了，看你还吹什么牛皮！”

两人巡视三室套房的办公室，触目可及是一个溃败王朝狼藉不堪的背影——屋内遍地都是丢弃的文件，以往神气十足挂在门口的褐色“总统办公室”木牌，可怜兮兮躲在屋门后面。迎面窗左侧摆着一张阔大的写字台，桌前茕茕孑立的皮质转椅，仿佛还留恋着昨日的旧梦。惹眼的是，写字台上的日历翻到4月22日。

陈毅无心观看西侧墙嵌古玩架的接待室，以及东侧一水进口设备的休息室，一屁股坐上总统宝座左右转动起来，优哉游哉。

邓小平也蛮感兴趣坐了坐蒋介石办公的转椅，一时乐不可支。

晚年，邓小平女儿毛毛曾向父亲问起当年进驻南京时的情形。

> 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战争年代》，第615—61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月第1版。

毛毛问父亲：“你进总统府了吗？”父亲说：“进去了，是和陈伯伯（指陈毅）一起进去的。”再问：“你们在蒋介石的总统宝座上坐了坐吗？”父亲微笑了：“总要坐一坐嘛！”

陈毅和邓小平走进总统府东厢房，蒋介石巨幅绣像上的三个大窟窿格外刺眼。这件用金银线和彩色丝线精工制作的绣像，是浙江省主席送给蒋介石的生日贺礼。战士冲进总统府，一见蒋介石的尊容便怒不可遏，端起上刺刀的枪就向绣像连捅三下。陈毅望着绣像上三个龇牙咧嘴的窟窿，生气地说：“这真是做蠢事！”

“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这是破坏文物！”邓小平亦面有肃色。

两人来到东园，只见满地是水，连走廊里的红地毯也泡在水中。原来，住在这里的战士感到自来水龙头很好玩，扳来扳去给弄坏了，结果跑了一地水。陈毅两道剑眉拧成了疙瘩，即令部队把屋内外打扫干净，除站岗执勤人员外，全部撤出总统府。

随后，陈毅、邓小平来到位于黄埔路国防部大院蒋介石官邸“憩庐”，意外的是，一进门便听这座花园别墅人欢马叫——部队一个骡马团，莫名其妙入住了总统官邸！此情此景引起陈毅邓小平沉思。他们想起有的部队进驻南京，未经请示报告，擅自命令市内各澡堂、理发店、电影院免费招待解放军五天；想起解放常州后，有的部队干部竟“开仓济贫”，导致坏人乘机抢劫，二流子浑水摸鱼；想起解放无锡后，有的领导盲目下令给工人涨工资，吓得资本家赶紧携金银细软跑路；想起亲眼所见水榭里养的观赏鱼，被战士捞出改善连队生活……当胼手胝足的军旅猝然与胜利撞个满怀时，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并未准备好。陈毅、邓小平当即决定，部队立即撤出总统府！当天，两人迁往国民党行政院暂住，并发电报告中央军委：“我们刻已（4月27日）到达南京。”

4月29日，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刘伯承走进蒋介石办公室。“瞧，蒋先生的台历还是22日呢！”吸引他视线的，也是桌上的台历。

历史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河，当时间戛然凝结于历史某一刻，这个时代便结束了。总前委三常委共同注目的总统府末日日历，恰如新旧时代边界，旧中国于此土崩瓦解，新中国从兹如日喷薄。

历史分水岭之夜，4月22日子时，毛泽东笔走龙蛇，伏案疾书。他先是为中央军委起草贺第三野战军七、九兵团渡江胜利电，接着又为新华社撰写动态新闻《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

大江东去，最见革命本色。血染的1927年，毛泽东来武昌出席八七会议，登黄鹤楼瞩望长江，万千思绪齐集笔端：“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毛泽东迷茫不坠青云之志，会间壮怀激烈书写《菩萨蛮·黄鹤楼》，会后霹雳一声暴动领导秋收起义。从当年腥风血雨凭栏低吟，到今朝革故鼎新叠书华章，二十二度春秋迭易，毛泽东笔下的长江已是另一番景象：“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放，直取对岸，不到二十四小时，三十万人民解放军即已突破敌阵，占领南岸广大地区……”短短六句话一百七十余字，震惊世界的历史画卷尽收眼底。侵晨，意犹未尽的毛泽东又给新华社撰写《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新闻稿。

> 马青苑，国民党陆军中将，1947年被选为南京“国大”代表。吴贻芳，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校长。1949年4月20日，马、吴联合南京各界代表组织治安维持委员会，并于23日致电毛泽东，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宁“和平接稷”，毛泽东复电予以嘉奖。

24日晨二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电：“23日八时，南京留平代表团要李宗仁电话，南京电话局遍找李宗仁及其官员后，知李等已全部离开南京，不明去向。十时，张治中、卢郁文与其在京家属通话后，始知政府人员全部撤退，国防部、宪兵、警察亦已逃空，城内秩序甚乱，抢案四出，人心恐慌。”电报明确要求：“请你们迅即令知三十五军或其入宁接收部队，迅即入城维持秩序，并与马青苑、吴贻芳[注]等接洽，确保南京治安，并注意保护各外国使馆。小平、陈毅二同志应即率华东局机关入城主持一切，刘伯承同志率领之机关亦望早日去南京。”

当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写的《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新闻稿，宣布“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已于昨日宣告灭亡”。这是渡江战役开始以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第三篇新闻稿。

南京解放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各民主党派联名电贺，盛赞人民解放军“英勇救民，所向无前”，称颂“投鞭断流，何有天堑？未及三朝，伪都即破，征诸自古，无此丰功”。捷报传到巴黎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会场，来自七十二个国家的和平代表

团起立长时间欢呼。在布拉格和平大会上，各国代表团将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高高举起，欢呼长达二十分钟之久，会后举行庆祝游行。

京沪两重天。攻克南京引起的狂欢在国内外持续发酵之际，正在上海举行的国防部作战会议却主题旁逸，翻江搅海。主持会议的顾祝同开场白还未说完，国防部第三厅厅长蔡文治就突然站起来说：“我不知道这仗是怎么打的！上次我再三说，敌人一定会从获港渡江。把我军主力集中在京沪铁路沿线，不但南京被包围无法固守，而且浙赣大门开放，敌可长驱直入，连各机关逃走都无部队保护。几十万大军退集上海，前无出路，后有大海，到这里是预备跳海吗？我这个作战厅长真是愧对自己，对不起祖宗，对不起总理、总裁！”蔡文治痛不欲生吼着，双手猛地扯开军服上衣，五颗金灿灿的铜扣子四散崩飞，“我不干了，我不再当军人了！”

与会者无不愕然，大佬们一时竟无从置喙。

顾祝同安慰蔡文治说：“蔡厅长，你沉静一点，有话慢慢说。”

汤恩伯站起来呵斥蔡文治：“你这个小孩子懂得什么！”1928年，汤恩伯在南京陆军军官学校任学生大队长，蔡文治是其学生。

“你还有脸摆你的老师臭架子吗？”蔡文治怒斥汤恩伯，“军校学生没一个人认你这个饭桶老师，没一个人承认你是个军人！”

汤恩伯悻悻反问：“军人应怎样？不是要服从命令吗？”

“是呀！我一个小小的厅长算不得什么。”蔡文治反唇相讥，“可我把总长的命令传达给你，你为什么公然违抗，拒不服从？”

蔡文治再度策马杀出，力究长江防线崩溃之责，致使研究上海防卫的作战会议，成了此前不欢而散的国防部紧急江防会续篇。

“别吵了！”汤恩伯一声吼，拿出了一张毛笔文书。人们认得，那是蒋介石的手令。“我集结主力退守上海，是奉总裁命令行事的，总长也要服从这个命令！你们来看，这就是总裁的手令。”汤恩伯晃晃手中那张纸，开始宣读手令内容。大意是，上海存有约值三亿美元的黄金白银，命令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请假，由市政府秘书长陈良代理市长，汤、吴负责利用轮船将上海的全部金银抢运台湾。在未运完之前，汤恩伯应集中全部力量，死守上海。金银运完后，准汤率部向舟山群岛撤退，阻止“共匪”海上追击。如该项金银不能安全运抵台湾，则唯汤恩伯、陈良是问。

汤恩伯当众揭秘令众人目瞪口呆。他环视全场又说：“因金银数目太大，上海船舶又少，陈如初（陈良）怕我守不住，每条船装重了一点，致‘太平’号在舟山洋面

触礁覆沉。我们都不知怎样才能逃脱总裁责骂和惩办。你小孩子知道我的困难吗？如果主力分散到浙赣沿线，上海守不到必要时间，试问这责任由谁负？”

眼见一众高官噤若寒蝉，汤恩伯势焰愈盛：“总裁手令属最高机密，本不该泄露。”他瞅瞅蔡文治又说，“今天要不是这小子发狂，我还不给你们看的。算了吧！总裁无意久留上海牺牲实力，只要金银运完就了事。这责任由我来负。你们这些长官、同事就先请到广东吧，免得在此碍手碍脚，必要时还要保护你们。”

汤恩伯在会场上反败为胜，李宗仁、顾祝同诺诺无语。

长江失守后，蒋介石最关心的是，中央银行存金能否安全转运台湾。李宗仁知道，上海中央银行储备的黄金白银价值几亿银圆。事后他估计，汤恩伯运到台湾的金银，包括约三百九十万盎司黄金，价值七千万美元的白银，七千万美元的外汇，总价值约五亿美元。多年以后，国民党“党产”报告公开提到，迁台时，国民党奉蒋介石之命，将中央银行二百七十七万两黄金合计约十亿美元，以及故宫博物院众多国宝运抵台湾。

> 王致冰、庄培昌：《蒋介石集团从上海运走了多少黄金去台湾》，《人民日报》1990年1月8日刊印。

原中央银行稽核处长李立侠回忆，劫运黄金，前后分了三批。第一批系（1948年）12月1日午夜由上海装运，总数为二百万零四千余两，由海关缉私艇“海星号”装载，海军总部派“美盛号”护送，运至基隆登陆。第二批“海星号”运走五十七万二千两，“美明号”护送，在厦门登陆。第三批由汤恩伯直接亲令派人来银行抢走，这时离上海解放已不到十天了。这次抢走黄金十九万八千两。前后三批，总共运走黄金二百七十七万四千余两。[注]

“守一座守不住的城，打一场打不赢的仗。”英雄末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悄吟，恰为困守孤城者的内心独白。李宗仁、顾祝同参加这次败中诿责会的最大收获，就是摸到了蒋介石的底牌。

> 曹前发、王颖编著：《领袖影像背后的故事：毛泽东》，第133—141页，中国画报出版社2023年5月第1版。

1949年4月25日下午，毛泽东起床后走出双清别墅住房，秘书递过一张新来的《进步日报》说：“主席，南京解放的捷报出来了！”《进步日报》由天津《大公报》改名而来，是毛泽东喜欢看的一张报纸。摄影记者徐肖冰见毛泽东边走边看报纸，在凉亭中椅子上坐下来，左手拿报继续浏览，恰好露出一版“南京解放”的大字标题，于是迅疾按下快门，留下了这一永恒历史瞬间。[注]

当时在场的警卫排长阎长林回忆，毛泽东在院子里看完报纸，没有散步，也未与人交谈，就回到了办公室，接着把报纸又看了一遍，边看边在上面画一些杠杠和圈圈。毛泽东看完报纸兴之所至，挥毫草就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据此回忆和当日出版的《进步日报》推断，毛泽东这首诗，应写于1949年4月25日。

同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的新闻。这是渡江战役以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第四篇新闻。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是中国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的标志，也是毛泽东沿井冈山道路不懈探索，最终走上事业巅峰的证明。

4月25日，毛泽东写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诗后，或许觉得未能尽抒胸臆，将诗稿揉成一团扔进纸篓。细心的秘书田家英极为珍爱毛泽东墨宝，依例将纸篓里的诗稿捡出，悉心收存。

1963年11月，田家英帮毛泽东编辑《毛主席诗词》，找出他写于1949年4月的解放军占领南京诗稿，抄清附短札呈他审阅。毛泽东看罢哈哈一笑说：“我自己都忘了还有这么一首诗！”毛泽东推敲诗文三个字，加了《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标题：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吴正裕主编：《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楚霸王入诗，反映了毛泽东在历史转折中可贵的政治清醒。《霸王别姬》是毛泽东最喜欢的一部戏剧。在毛泽东看来，项羽是敢于挑战权威的典范，同时又感叹其有勇无谋，刚愎自用又优柔寡断，鸿门宴上放走自己最大的敌人刘邦，最终为刘邦所胜，落得乌江自刎的下场。毛泽东收藏的戏曲磁带，该剧利用率最高。工作人员特意在磁带包装盒上用红笔作了一个“0”标记，以方便取用。一次，毛泽东听完《霸王别姬》心潮激荡，对李银桥说：“不要学西楚霸王，我不要学，你不要学，大家都不要学。”

196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田家英抄件上批示：“此诗打清样两份，你一份，我一份。看看如何，再定。”12月5日，毛泽东再给田家英作批示：“钟山风雨一诗，似可加入诗词集，请你在会上谈一下，酌定。”作者的认可，成为佳作问世的依据。当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收入了这首七律诗。失而复得的律诗佳作及诗稿，因此有了“纸篓里捡回来的国宝”美誉。

（五）蒋介石从幕后走上前台

1949年4月21日，第三十五军攻击“三浦”的炮声不绝于耳。李宗仁在总统府召集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人紧急磋商。

与会者莫不慨叹，如果不是蒋介石暗中掣肘，“局势不会一糟至此”。“看守内阁”军政要员一致认为，江阴要塞起义后，南京无法再守。只有白崇禧对防守武汉及西南半壁河山尚坚具信心，主张放弃京、沪，把汤恩伯主力移至浙赣线和南浔线，与华中部队约四十万人互成掎角，以固守湘赣，阻止解放军向西南进军。

李宗仁十分赞成白崇禧危中求存的应变设想，何应钦、顾祝同也认为，这是当下和今后唯一可能挽救党国的出路。然而，汤恩伯唯蒋介石之命是从，如总裁不同意，一切都是空谈。大家决意22日赴杭州一行，看总裁的意思如何。行前，白崇禧对李宗仁说：“今后局势，如蒋先生不愿放手，则断无挽回余地。你应乘此机会向蒋先生明白提出，蒋、李二人只能择一负责领导政府，以期统一事权，而免拖泥带水！蒋先生既已引退下野，应将人事权、指挥权和财政权全部交出。”李宗仁说：“这正是我的意思！”

22日上午十一时，李宗仁飞抵杭州笕桥机场，蒋经国前往接机。何应钦、张群乘另一专机抵达，白崇禧则乘军机飞来。与此同时，逊总统也一反闲云野鹤模样，心急火燎乘专机从宁波赶来。

蒋介石惊闻解放军全线渡江，是在溪口雪窦峰妙高台。4月21日中午，蒋介石刚从午睡中醒来，俞济时便气喘吁吁闯进卧室向他报告：“总裁，刚接到急电，共军已冲破长江防线！”

虽然早有预料，但蒋介石对长江破防之速仍感震惊。江南七十万守军，除桂系十几万人和少数军战斗力尚可，其他部队战力均堪忧。虽说还有海军一百三十多艘舰艇，空军三百余架作战飞机，但势难逆转中共攻势。蒋介石原以为，经过几大战役，共军疲惫已极，元气大伤。中国历史上，哪次成功渡江，不需经少则一年、多则数年准备？仓促出兵南渡者，如东汉末年曹操的赤壁之战，南北朝时苻坚的淝水之战，都以失败告终。没想到，大战后仅数月，共军两个夜晚就令千里江防分崩离析！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1945.1—1949.2，第84页，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第1版。

1945年重庆谈判，蒋介石独晤毛泽东时煞有介事地说：“国家的命运操在你我手中，若我们之间不能达成协议，那我们就有罪于后人。”[注]如今，顾影自怜，当年的豪言竟成辛辣反讽……

令人沮丧的消息像风吹枯叶，漫天飞舞着扑面而来。蒋介石长吁短叹时，又接汤恩伯急电：“21日下午，共军趁着有利风势，从对岸万船齐发，只二十分钟就到达南岸。上岸后，江阴要塞的少校工兵营长唐秉煜立进行接应。唐的长兄、要塞炮台总台长唐秉琳，守备总队队长吴广文，游动炮团团长王德蓉〔容〕，要塞参谋长梅含章等人都投向共军，要塞司令戴戎光被俘。要塞炮台的几十门大炮，掉过头来向邻近的国军二十一军阵地猛轰。”

蒋介石的目光在电报纸上游走，那一行行令他惊诧不已的电文，像机枪喷射的子弹，颗颗洞心骇耳。江阴要塞是国都门闩，江阴不保，安全何在？国将何国？他感到一阵晕眩，眼前又浮现出戴戎光前来晋见时那身熨得笔挺的军服，还有亮得连苍蝇也站不住的皮鞋，以及他口若悬河讲述的“江防构想”……

“娘希匹，枪毙戴戎光！”深感被愚弄的蒋介石歇斯底里吼着。

江阴市档案史志馆编：《江阴渡江战役史资料选编》（下），第497页。
台湾《传记文学》，第56卷，第4期。

1950年，曾追随蒋经国赴上海“打虎”的贾亦斌，见到参与策动江阴要塞起义的王征明说，蒋介石败退台湾后，曾在一次会议上痛心疾首道，共军渡江的成功，是坏在江阴要塞的戴戎光投降了共产党。[注]国民党一众逃台高官痛定思痛，开始厘清，“江阴要塞毁于唐家班”，“国民党应汲取心脏中的历史匕首”。[注]可怜戴戎光直到做了解放军俘虏，还在替蒋介石和李宗仁背黑锅。

4月22日，民国最后的议事厅览桥航校会客室，朝野大佬心如坠石，面有铅云。危难也是不容小觑的凝聚力，它使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者不自觉地彼此靠拢。蒋介石、李宗仁两位台前幕后拳脚不断的老冤家，似乎都忘了同船过渡的角色定位，一个犹如至死都抓住舵把子不放的“逊帝”，一个好似可怜兮兮的影子政府掌门人。半晌，李宗仁始放悲声：“你当初要我出来，为的是和谈。现在和谈已经决裂，南京马上就要失守，你看怎么办？”

蒋介石显然尚未从江阴要塞哗变的重击中缓过劲来，定了定神，脸上又恢复了惯常的弓马娴熟，对李宗仁说：“你继续领导下去，我支持你到底，不必灰心！我当尽其所能支持你！”

李宗仁自诩“一向是个不为已甚”的厚道人，本来在南京登机前咬牙切齿攒了一肚子话，此时却经不住蒋介石瞒天过海、指山卖磨一番忽悠，竟先自被软化了几分。原本与白崇禧、何应钦商议的放弃京沪、移师浙赣、拱卫西南方略，也三缄其口胎死腹中。蒋介石素知李宗仁心中的丘壑经纬，抚着他的肩头，撇开众人，亲热地引他走进会客室里面套间，好言相劝，百般抚慰，一再申明全盘由你负责，鼓励他务必继续领导下去。

李宗仁说：“你如果要我继续领导下去，我是万死不辞的。但现在政出多门、一国三公，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

蒋介石一力安抚李宗仁：“不论你要怎样做，我总归支持你！”

亲政百日，形同傀儡的李宗仁尝尽徒有雄心但处处受制于人的滋味，心中每每汪着一泓苦水。“蒋先生说话的态度，真是诚挚万分。我如对他提出任何要求，他都会一口答应。此时南京已危在旦夕，国之将亡，我们当国者的心境实有说不出的辛酸。在这种情况下，蒋先生既然一再说明，全盘由我负责，我如逐条列举要他答应交出，反嫌小气。”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愤愤地说。“不过，当时我纵然破除情面，和他摊牌，他逐条答应了，还是无用。我和蒋先生相处数十年，深知其久染洋场恶习的个性。他说话照例是不算数的，嘴里说得再好听，做起来他还是不会放手的。”

江南著《蒋经国传》载，蒋介石问李宗仁：“对和谈还有什么打算？”李宗仁说：“我准备再派人到北平商谈一次。”“不用了，不必再谈了。”蒋介石说，“过去共产党因为军事上没有部署好，所以才同意谈，现在他们已经渡江，再没有谈判的余地了。”

民国政府行将谢幕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国民党历史上最紧迫、最低调、最寒酸的一次“峰会”，在笕桥机场会客室悄然举行。没有召开会议的任何安排，但出现在会客室里的军政首脑之全，不输以往重要会议，张群、王世杰、陶希圣、吴忠信等都来了；没有预告任何议题，但八方汇聚的政要皆心有灵犀，不约而同聚焦事关国家存亡的共同话题；没有党和政府议事决策必不可少的程序与仪式，但丝毫无碍事关国体政体重大决策的产生。

《申报》1949年4月23日。

晤面中，蒋介石提出，为加强党政联系，主张成立一个“非常委员会”，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决策机构，由他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今后党的重大决策，先提交“非常委员会”研究决定，然后交由政府执行。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份主持党政联系。这一提议立即得到在座者附和，似有事先约定和默契。午餐后，白崇禧以路远为由，先乘军机飞返武汉。蒋介石、李宗仁等人继续商谈，议论形成了四项决

定：（一）政府今后唯有对中共坚决作战。（二）在政治方面，联合全国民主自由人士共同奋斗。（三）在军事方面，由何应钦兼国防部长，统一陆海空指挥。（四）采取紧急有效步骤，以加强国民党内部团结和党政之间联系。[注]

朝野大佬杭州碰头，决定放弃南京迁“都”广州，在浙赣线和上海组织新的防御。汤恩伯秉承蒋介石旨意，于22日下午下令全线撤退：芜湖以西部队向浙赣线退却，芜湖以东、常州以西部队向杭州退却，常州以东部队向上海退却。南京国民党政府官员，22日晚至23日上午分头逃往上海、广州、桂林等地。

4月27日，蒋介石发表文告称：“我们今日只有在一个政府之下，以对共的态度，为忠奸试金石。凡是反共的政策，就要力谋贯彻，凡是‘剿共’的命令，便要绝对服从。”同日，何应钦在广州召开行政院会议，决定撤销国民党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

人亡政息之际，一直不曾隐去的蒋介石撕掉遮羞布，从幕后走上了前台。尽管十三年后，李宗仁在美国写的回忆录称，“我们在杭州的聚谈就这样结束了。当时外界不明真相，都把这一次非正式的谈话叫做‘杭州会议’。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开什么会议，大家坐在笕桥航校会客室的沙发上谈了一两个钟头便结束了，没有作任何具体的决定”，但历史已经证明，蒋、李等人笕桥机场晤面后，国民党“非常委员会”实际上取代了南京国民政府，李宗仁已被排挤出权力中心，“代总统”进一步沦为一个虚衔和空壳。

4月22日傍晚，李宗仁从杭州返抵南京时，城外交战正炽，首都一片凄凉。平日最繁华的通衢大道，商店全部关门歇业，街上行人绝迹。当晚汤恩伯奉召来谒。李宗仁问他战局现状如何。汤说敌军已迫近城郊，本晚或可无事，但务必请代总统至迟于明日清晨离京，以策万全。此时，南京政府和谈代表章士钊、邵力子等人，从北平联衔来电，劝李宗仁于解放军入城时不必离京，如嫌南京不安全，不妨径飞北平，中共当以上宾之礼，竭诚欢迎。李宗仁知道，他派出的和谈代表在城破国亡之时，决心向共党靠拢了。责他们临危变节亦属徒然，遂将电文掷去。

>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卷，第266—26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1月第1版。

入夜，郊外炮声隆隆，李宗仁解衣而卧，一夜辗转反侧，未能入寐。23日清晨，汤恩伯来电话催促起飞。李宗仁略进早餐，乘车前往明故宫机场，汤恩伯和首都卫戍司令张耀明已在机前迎候。李宗仁与他们简短交谈便进入座机。飞机升空在南京上空盘旋两周。驾驶员入机舱请示飞航目标。李宗仁说，先飞桂林。飞机随即转翼向西南飞去。虎踞龙盘之金陵，从此竟不堪回首！[注]

李宗仁枯坐专机，耳畔机声隆隆，长天则万籁俱寂。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三个多月来强撑危局，心力交瘁却一事无成，这段末帝不是末帝、后主不是后主的尴尬生活，足令他反刍余生。抵桂之后，对大局将何以自处？左右盘桓，自觉只有两途可循：一是决心引退下野，以谢国人；二是与蒋公开摊牌，要求他绝对不再干预政治、军事和人事，交出国库中的金银和外币，以挽狂澜于既倒。虽绝难实现，走投无路时只好先作此打算了。

专机抵桂林，桑梓政要悉数来迎。袍泽故旧顾不上寒暄，便直奔主题。目下蒋先生既不肯放手，德公断无力起死回生。蒋最后必凭借海空军退守台湾一隅建立小朝廷，我们在大陆溃败后，恐想进入台湾谋一枝之栖也不可能。既然在内战中失败，倒不如干脆承认失败，把军政大权让予中共，以免赓续内战，涂炭生灵。

此后数日，李宗仁在桂林文明路私邸，成为广西军政首领议政处。由省政府秘书长黄中厪主笔，白崇禧当年老师、国民党中委和立委李任仁修改并领衔的建议书，主要有四方面内容：“第一，就大局来说，国民党政权已至末日，积重难返，迟早必然崩溃，绝无挽回的可能。第二，广西省内尚和平安定，桂籍军队亦尚有二三十万人，据险而守，与中共作有条件的和谈，中共投鼠忌器，是可能接受的。第三，广西军政领袖们一向与中央不睦，但与民革主席李济深则友谊极深，现在亟宜运用李济深居间调解，与中共言和。第四，广西如想以实力与共军对抗，无异以卵击石，目前应不惜一切，委曲求全，与中共妥协。”除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外，文职和在桂林武职人员悉数签名。李任仁将建议书交李宗仁时说：“德公，蒋先生在大陆垮台，尚有一台湾可以负隅，你如在大陆失败，则一条退路都没有，又何苦坚持到底呢？”

李宗仁痛感国民党断无起死回生之望，但为绝不觍颜事敌传统道德所羁，虽色厉内荏，依然恪守自己立场而不为所动。

此间，曾在何应钦内阁出任陆军总司令的张发奎，特赴桂林敦劝李宗仁早日去穗主持大政。两粤四军、七军将领早就对蒋介石不满，张发奎尤甚。眼见白崇禧两翼为蒋所折，广东危若累卵，粤籍将领更是怒不可遏，主张保卫两粤，必先清除蒋在背后的掣肘。张发奎乘机向李宗仁建议：“把蒋介石请到广州，然后把他扣起来！”李宗仁长吁一口气，笑笑说：“向华（张发奎字），这是徒招恶名、无补实际的莽事。”“德公，你胆子太小，你胆子太小！”张发奎发狠说。“你不在其位，可以作此幻想，你如在我这位置，你也不会行此鲁莽之举。”李宗仁给他解释说，“宁人负我，毋我负人。在现今局面下，我们所需要的，第一是兵，第二是钱。蒋先生把兵调走，把钱存在台湾。我们纵然把他扣起来，既不能把兵调回，又不能把钱取出，则扣蒋又有何用？固然，蒋的昏庸和歹毒罪无可逭，把他扣起来宣其罪状于天下，可以泄一时之愤，但于风雨飘摇之党国何益？败亡前夕作无补于大局之事，岂

不为天下笑！”张发奎怪李宗仁姑息。李宗仁说：“我的姑息总还替我们这些失败的国民党人，维持了一点失败的荣光。”

李宗仁迟迟不去政府流寓地广州视事，急坏了岭南一干大佬。何应钦、阎锡山先后驰电敦促，5月2日，居正、阎锡山、李文范随白崇禧赴桂促驾。白崇禧声色俱厉痛斥投降论者，居正等附和。黄旭初更因教育厅长黄朴心意志颓丧，而将其撤职。

为促使李宗仁早日赴穗，5月3日，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和海南军政长官陈济棠，衔蒋之命联袂来桂相劝。两人以蒋最新表态说服李宗仁：蒋先生已决心全部交出军、政、财大权，决不再在幕后操纵。阎锡山自告奋勇赴上海，与正在吴淞口军舰上指挥上海防卫战的蒋介石面谈。行前，由来桂延请李宗仁的五人磋商拟一方案，阎锡山据此面请蒋介石做出明确保证，作为李宗仁赴穗重主中枢大政的先决条件。方案内容有六：一，关于指挥权者：力求扭转军事颓势，国防部应有完整之指挥权，蒋先生不得在幕后指挥；二，关于人事权者：全国官吏任免，由总统暨行政院长依据宪法执行之，蒋先生不得从幕后干预；三，关于财政金融者：中央金融、企业等机构，概由行政院主管部会监督，任何人不得从中操纵，中央银行运台存贮之银圆、金钞，须一律交出，支付军政费用；四，关于行政范围者：各级政府须依据宪法规定，向总统及行政院长分层负责，不得听受任何个人指导，在穗之政府机关，应率先奉行；五，关于党政者：国民党只能依普通政党规定，协助指导从政党员，不得干涉政务，控制政府；六，关于蒋先生今后出处：希望蒋先生暂时出国赴欧美访问，免碍军政改革。

上述六条以《李代总统同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三委员谈话记录》为题，作为公文确定下来，以此为李宗仁回穗主政先决条件和依据。李宗仁后来说，第六点原非我本意。我只要蒋先生真能放手，让我大刀阔斧来加以兴革，我绝无心逼他出国。不过当时与会诸人，为要急于劝我去穗，仍主张把这条加入。阎锡山亲携谈话记录赴沪面呈蒋介石；居正等则将此件电告在穗的何应钦。

5月4日，阎锡山专机抵沪，在太康号兵舰上与蒋介石先后进行三次长谈。蒋复函何应钦转李宗仁，申明自己并无复职之意，要李尽快赴穗视事，并对李宗仁提出的六项条件答复如下：

一、总统职权既由李氏行使，则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依据宪法有自由调整之权，任何人不能违反。二、前在职时，为使国家财富免于共党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一切出纳收支皆依常规进行，财政部及中央银行部册具在，尽可稽考。任何人亦不能无理干涉，妄支分文。三、美援美械之存储及分配，为国防部之职责。引退之后，无权过问，部册罗列，亦可查核。至于枪械由台运回，此乃政府之权限，应由政府自行处理。四、国家军队由国防部指挥调遣，凡违反命令应受国法之惩处，皆为当然之事。五、非常委员会之设

立，为4月22日杭州会谈所决定。当时李代总统曾经参与，且共同讨论其大纲，迄未表示反对之意，今李既欲打消原议，彼可自请中常会复议。唯民主政治为政党政治，党员对党负有遵守决议之责任；党对党员之政治主张有约束之权利，此乃政党政治之常规，与训政时期以党御政者，自不可混为一谈。

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第89—90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

蒋介石对敦请出国事复曰：若谓中正不复职即应出国，殊有重加商榷之必要。中正许身革命四十余年，一贯为中国之独立自由而奋斗。只要中国尚有一片自由之领土，保持独立之主权，不信中正竟无立足之地。在溪口时，曾对礼卿（吴忠信）兄言，前次他们要我下野，我自可下野，现在若复迫我出国亡命，我不能忍受此悲惨境遇。今日所怀，仍复如此。且在过去，彼等主和，乃指我妨碍和平，要求下野。今日和谈失败，又要假我以牵制政府之罪，强迫我出国，并赋我以对外求援之责。如果将来外援不至，中正又将负妨害外交，牵制政府之咎。国内既不许立足，国外亦无法容身。中正为一自由国民，不意国尚未亡，而置身无所，至于此极！中正自引退以来，政治责任已告解除，而对革命责任自觉其无可逃避；故德邻兄凡有垂询，无不竭诚以答。但绝不敢有任何逾越分际，干涉政治之行动。今日国难益急，而德邻兄对中正隔膜至此，诚非始料之所及。而过去之协助政府者，已被认为牵制政府，故中正唯有遁世远引，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问。[注]

5月5日，蒋介石复李宗仁函送达广州。6日，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临时会议，推举阎锡山和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海南军政长官陈济棠携带蒋函，赴桂迎接李宗仁来穗。7日，阎锡山等人抵桂转达蒋介石的意思。白崇禧也劝说李宗仁从速赴粤主持大局。

李宗仁以退为进暂寓桂林，是以蒋介石交出大权为赴穗前提的。现在蒋介石信誓旦旦表示“遁世远引，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问”，“军政人事，代总统依据宪法有自由调整之权”，蒋既有此诺言，所列六项条件大部亦得回应，受此倒逼，虽明知蒋介石惯于自食其言，也只有硬着头皮起驾南行。5月8日上午，李宗仁由阎锡山等人陪同飞广州，当日发表书面谈话称：“中共破坏和谈，一意孤行，政府只有作战到底。”5月13日，李宗仁在广州任命甘介侯为他的私人代表，令其于19日由香港赴美乞求援助，以图固守川、滇、黔、湘、桂、粤、闽七省。16日，国民党政治会议决定：请国民政府通令各级文武官员及全国人民，如再有倡议“和平”、中途妥协，或妄发求和言论者，应视为叛徒，予以党纪国法之处分。5月22日，李宗仁据此发表《告全国同胞书》。

南京失守八十天后，7月14日，蒋介石从台湾飞抵广州。16日，“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在广州成立，蒋介石任主席，李宗仁为副主席，孙科、居正、于右任、何

应钦、阎锡山、吴忠信、张群、吴铁城、朱家骅、陈立夫为委员。按程序确认4月23日蒋介石在筧桥机场设立中央非常委动议，明确其为国民党最高决策机关，蒋介石名正言顺从幕后重回决策指挥中心。与此同时，该委员会重庆、台湾分会也相继组建，分别由张群、陈诚负责。

（六）飞兵郎广长，截断浙赣线

还在筹划渡江作战期间，粟裕就想到，大军渡过江去问题不大，主要问题是渡江后能否抓住并大量歼灭敌有生力量。他判断，部队全面渡江后，势将造成敌全线溃乱，我军应迅速展开并插向敌之纵深，东、中两大突击集团实行东西对进，切断国民党军退路，使其无暇调整部署，造成我军分割包围、各个歼敌有利态势。

1949年4月21日午时，总前委指令第三野战军七、九两兵团于25日以前消灭沿江当面之敌，从26日开始第二步作战，要求“在战术上仍应稳扎稳打，有组织有准备进行战斗，防止轻敌乱碰”。

长于大兵团作战的粟裕深知，动作迟缓将失去歼敌良机。渡江战役发起前，他就反复测算东、中线渡江后东西对进合围敌军距离，东集团渡江后直指无锡、漕桥，仅四五十公里行程，如江阴要塞策反成功，一两天就可切断南京至上海通道；中集团渡江后，东进至广德、长兴地区约一百五十至二百公里，如敌逃往杭州，行程约需四至五天，加上定下逃跑决心和受我军阻击及山区迟滞，至少要晚于我军渡江一两天，我军先敌或与其同时到达广德、长兴地区是可能的。如东线战斗顺利，挺进宜兴、溧阳切断京杭公路，将先于西线部队。据此判断，粟裕建议把三江营至张黄港段作为东线重点突破地段，自己亲自指挥东集团作战。

战局发展果如战前所料。4月21日晚七时四十分，粟裕致电总前委并中央军委：“我全线渡江后，定将造成敌之紊乱”，“我应乘登陆胜利之威，迅速展开，插向敌之纵深，如此不仅使敌无暇调整部署，且将促成敌之更大混乱，达成分割包围”。他建议，中集团九兵团除以第三十军监视芜湖之敌待交二野四兵团外，主力应不为小敌所阻向东北挺进，截断南京之敌向杭州的退路，先头部队力求26日前进至郎溪及其东北地区；七兵团攻歼当面之敌后，尾九兵团之后，力求于27日前后进至广德地区待命；十兵团渡江成功即向宜兴、金坛、溧阳挺进，切断太湖南北走廊，会同九兵团部队围歼南逃之敌；八兵团待命攻占南京，主力参加太湖会战。

4月22日，粟裕从侦获情报得知，南京、镇江、芜湖之敌准备撤退逃跑，判断其主力将沿京杭公路撤往杭州，急令第九兵团率二十五、二十七军不为小敌所阻惑，向郎溪、溧阳之线迅速挺进；令第七兵团迅速转向宣城方向，在第九兵团右侧后呈梯队队形前进，此令于当日下午五时下达执行并上报中央军委、总前委。

是夜，国民党驻南京、镇江、芜湖等地七个军，沿京杭公路及两侧南逃。粟裕令东集团第二十八军抢占宜兴，第三十一军向太湖西岸挺进，第二十三军向金坛、

溧阳挺进，截断沿京杭公路南逃之敌通路；与此同时，令中集团第二十五、二十七军兼程向郎溪、溧阳挺进，与东集团部队打通联系，切断敌人南逃之路。

粟裕预计将在郎溪、广德、长兴地区围歼逃敌。从南京到长兴、广德约一百四十公里，敌遭我追击拦截，到该地区需用时四至五天。东集团从江边直插太湖，两三天便可占领宜兴，一两天即可到达长兴，切断南京到杭州的道路。23、24日，粟裕、张震连发数电，要求各军“迅速猛进，阻击、截击与尾追”逃敌。

又到烟花三月下扬州时，一望无垠的绿禾，衬着金灿灿的油菜花和溢满皖风苏韵的村落，宛如一幅气韵生动的水墨画。革命是人民盛大的节日。江南百姓欣喜地看到，一败涂地的国民党军像浊流南溃，勇追穷寇的人民解放军则如狂飙突进。渡江南进的铿锵与壮阔，就这样成为1949年江南之春最美的风景。

第二十五军24日凌晨抵芜湖附近湾沚，该军第七十四师渡河时发现敌第二十军一个师，即以两个团进行阻击。敌我拉锯战至下午，第二十五军后续部队赶到，敌军陷入溃乱，敌第二十军军长杨干才被击毙，副军长陈亲民、参谋长胡显荣以下万余人被俘。

第二十三军25日夜占领溧阳县城后，得知南京方面逃敌正沿宁杭公路涌来，遂连夜部署排兵布阵。翌日拂晓，以逸待劳的第二十三军部队，在城北激战南溃之师，当日俘敌九千多人。

第二十军25日夜抵溧阳南，26日晨在老河口突遇数万敌军。军长刘飞决定，先消灭敌人，再进击广德，遂令第五十八师向南渡、胡桥方向出击，第五十九师向施家桥方向出击。第五十八师一七四团疾行二十公里至胡桥，只见公路上车鸣马嘶，南逃之敌一眼望不到边。该团多路突击、腰斩敌军，激战两小时俘敌一万二千多人。战斗结束，部队来不及打扫战场即直插广德。

国民党第四、二十八、四十五、六十六军和第五十一军一部，从京杭公路转向郎广山区，恰好进入渡江部队预设战场。粟裕令宋时轮统一指挥第九、十兵团全歼被围之敌。第七兵团进军杭州，第二十三、三十五军归建七兵团，第二十四军接管南京。

26日，中集团先头部队进入郎溪、广德山区，东集团第二十八军占领长兴。27日，中集团第二十七军与东集团第二十八军在吴兴打通联系，为战场扎上了“口袋”。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十一、三十三军五个军，在广德城北山区开始分割围歼国民党五个军。敌建制混乱，首尾难顾，满山乱窜，稍加攻击即缴枪投降。4月28日开战不久，就有数以万计俘虏被押下。29日，各路大军从四面八

方楔入敌阵，敌一触即溃，纷纷投降，下午五时即结束战斗。不到两天，八万逃敌在郎溪、广德悉数被歼。

横扫千军的追击难免乱中出错。第二十三军归建七兵团途中，第六十八师二〇二团在广德流洞桥未经侦察设营，结果与敌同住一村，双方哨兵竟然都未察觉。翌晨第二〇二团炮兵连集合唱歌，被敌发现，先我占领高地。第二〇二团张团长指挥警卫连向高地冲锋，抢占要点。团政委见正面已有四个连打了上去，指挥二营向侧翼出击，形成有利态势。军政主官果断正确指挥变被动为主动，主力部队赶到后，歼灭敌第四军九十师等部，俘获五千人。

第二野战军过江后，刘伯承不失时机报请总前委，变主力东进攻占芜湖、南京，为直出浙赣线，全力迂回汤恩伯集团侧背堵其退路，扩大战役预定会战范围，切断汤、白两大集团战略联系。

陈袁指三野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政治委员袁仲贤。
宋任穷时任中共南京市委副书记、南京市军管会副主任。
《邓小平年谱》第二卷，第170—17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1月第1版。

4月23日，邓小平为总前委起草致中央军委并告第二、三野战军、谭震林电，提出接收南京和芜湖处置意见：（一）陈赓四兵团取消接管南京任务，改沿杨勇、苏振华五兵团之右侧出浙赣线上饶东西地区，协同三、五两兵团歼灭浙赣线上之敌，并视情况向东发展。（二）南京城防改由陈袁[注]八兵团以两个军担任之，陈袁任警备司令和政委。（三）芜湖城防暂由九兵团之三十军负责，尔后由二野派第十军（刻在安庆）主力接替。（四）宋任穷[注]率接管南京干部今夜可到全椒。（五）我们及二野刘张李和直属队，于部署大定后，准备移驻南京。（六）以上请军委追认。[注]同日，二野指示各兵团全力截断浙赣线、杭徽线，令三兵团进击徽州地区之敌，四兵团进击上饶地区之敌，五兵团进击衢州地区之敌，要求“各部队应尽量加强行军速度，增大里程”，三个兵团实行多路纵队跟踪追击、平行追击、超越追击，日夜兼程挺进浙赣线。

5月7日下午，二野三兵团第十二军第三十五师师长李德生，在金华接军长王近山电：“尽速占领义乌、东阳地区，截断南逃之敌。”李德生与副师长贺光华决定，乘火车快速进抵六十公里外的义乌，而后转战东阳。贺光华让金华车站通知义乌车站，根据上级通知，明天上午九时有一军列到你站，请做好接车准备。8日晨，李德生率部队登车后，师前卫第一〇三团将车厢门窗全部打开。客车车厢，轻机枪架在茶几上；闷罐车厢，迫击炮、重机枪架在敞开的大门两侧。射手编组，一有情况即可按顺序迅速下车占领阵地。首列进义乌站，月台上挤满了欢迎人群，前排举着“欢迎国军”的大字横幅。部队下车时，保安团高呼“向劳苦功高的国军致敬”，战士们冲上去缴枪，有的还说“不要误会”……原来，善于逢

迎的义乌县长接到火车站报告后，率党政要员及军警数百人前来迎接，结果自投罗网。第三十五师智取义乌后，第一〇三、一〇五团当日沿义东公路向东阳疾进，连克溃敌。第十二军在江南游击队配合下，千里追击解放十八座县城，歼敌三万五千余人。

5月21日，二野四兵团第十三军第三十七师第一一〇团团长吴效闽，率部包围南昌县政府驻地谢埠镇，俘获保警四百余。白崇禧不甘谢埠有失，令夏威部两个师反扑。吴效闽指挥部队抗击，第三十七师师长周学义、政治委员雷起云分率第一一一、一〇九团渡河参战，合力击退敌人。第十三军兵临南昌陈霞，夏威部第一七五、一八三师22日凌晨弃城西逃，下午三时，第三十七师在桥头追上正欲渡河的新建县保警大队，迫敌八百余人缴械投降。

南昌解放，守敌尽歼，标志着渡江战役在中南地区告一段落。淮海战役从双堆集率一〇〇师起义的廖运周，已是第十四军四十二师师长。他站在南昌城楼眺望街头欢迎的人群，流下了热泪。

6月6日，陈赓率二野四兵团抵南昌，当天留言纪事抒怀：

《陈赓军事文选》第523页，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

今日冒雨到南昌，这是我历史上第四次到此。第一次，1927年，蒋匪南昌叛变，我险遭不测，逃入武汉；同年8月，南昌起义，从起义至退出南昌止，我担任肃反工作，是为第二次；1932年冬，在作战中负重伤，返沪医治，被捕，押解南昌，蒋匪曾亲自见我劝降，我始终不屈，这是第三次。今日为第四次，则以胜利者姿态来此……过百花洲，入南昌图书馆，此处在1931年为科学仪器馆，蒋介石曾在此亲自指挥对我中央苏区之第四次“围剿”；我在沪被捕解南昌后，蒋匪曾在此对我亲自审讯，迫我投降，我曾以严词厉色拒之，几至使蒋匪无法下台。回忆昔年在此室中，我曾为阶下囚，受人审讯，今日则我已为此室主人矣！……回忆我前三次入南昌，或为亡命客，或为阶下囚，或者站不住，但均表现了我党之艰苦奋斗。无有前三次，则无今日人民之光荣也！

第二野战军五兵团兵分两路直入赣东北，第十六军解放了婺源县城，第四十六师一三八团在江山县城歼敌五千六百余人；第十七军解放了浮梁、景德镇、德兴、玉山，第四十九师在贺村车站和清湖镇堵截追歼七千逃敌，俘获国民党联勤总部三名将军。

至此，第二野战军各兵团控制了东乡至玉山的浙赣铁路，完全切断了汤、白两大集团联系，堵住了敌向浙江、上海逃窜之路。

第二、三野战军大举渡江之际，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与江汉、鄂豫军区部队横扫武汉外围，占领江北孝感、黄陂诸县城，使白崇禧不敢出兵东援。第四野战军七十余万大军三路南下进军中南，前锋已向湖北境内推进。白崇禧收缩武汉外围防务，由汉口退至江南。

5月9日，中央军委电令已归建第四野战军的萧劲光先遣兵团发起渡江作战，相机解放武汉。14日，第四十三军、第四十军一五三、一二〇师攻占西起团风、东至武穴长江沿岸各渡口，缴获并搜集大量渡江船只。15日，先遣兵团发起渡江作战，南岸守敌五个营起义，第四野战军乘势过江解放大冶、阳新等地。当日，白崇禧飞长沙，汉口第五十八军及汉阳之敌纷纷南逃。16至17日，第四十军一一八师、第四十五军一三五师、江汉军区独立一旅，相继解放汉口、武昌、汉阳，武汉三镇完整回到人民手中。

遵中央军委之命，四野第四十三、四十五军主力沿罗霄山东麓南下，7月中旬配合二野发起湘赣战役，白崇禧残部逃往湖南。

《叶飞回忆录》，第422—423页，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3月第2版。

收京南下深度触动美英等国在华利益，能否引发其武装干涉？叶飞回忆：“这一点，毛主席在决策前是慎重考虑过的。所以，在渡江的兵力使用上，第二野战军紧靠第三野战军，渡江后二野沿浙赣路进军，第四野战军迅速南下，都是考虑到对付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这种可能性的。”三个野战军呈并肩南下战略布势，“意图是，万一发生美国武装干涉，我军有足够力量对付它”。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第591—59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1949年5月23日，毛泽东致电总前委：“二野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需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但在上海、宁波、福州等处被我占领，并最好由三野以一部兵力协助山东攻占青岛（假如上海占领后，青岛敌军尚未撤退）以后，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就很少了，那时二野就可以西进了。”电报说：“如果上海、福州、青岛等地迅速顺利解决，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业已消失，则二野应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并打通长江水路。”

三大野战军勠力南征，纵向上形成东、中、西齐头并进横扫残敌的宽大正面；横向上东西可互为依托，形成预防西方大国从海上进行武装干涉的纵深配置和攻防一体战略格局。

《张治中回忆录》，第609—610页，华文出版社2014年4月第2版。

5月4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免去张治中西北军政长官职务。6月15日，中央社播发《张治中在平被扣详情》，20日、22日又连发电讯，称张治中在北平策动和平，受中共“唆使”离开北平，行踪不明。面对中央社蛊惑人心的报道，26日，张治中在北平发表《对时局的声明》，以自己长期观察和居留北平八十多天所见所闻，对中共二十多年来的奋斗经验做出自己的判断和概括：“深得服务人民建设国家的要领，并且具有严格的批评制度，学习精神，和切实、刻苦、稳健的作风。”声明说：“倘我们认识战败求和的必然情势，又能了然于政权更迭的历史常例，则革命大义，天下为公，我们自己既然无能，就应该让给有能的；自己既然无成，就应该让给有成的……今日我们就应该以诚意承认错误，以勇气承认失败，坦然放弃政权，表示一种革命事业成功固不必在我的态度，则人民观感将为我们这种坦白率真的态度而另眼相看，重新评价。”

7月26日，李宗仁由广州飞衡阳，与白崇禧晤谈后续飞福州。福建省主席朱绍良率文武官员和民众团体接机，在省府设晚宴为他洗尘，席间恭维备至，令李宗仁颇感意外。朱是蒋介石心腹，李宗仁深恐其热情款待自己会惹蒋不快，虽领盛情，心存担忧。

8月中旬，汤恩伯忽飞福州，打电话要朱绍良赶来机场一晤。两人见面后，汤恩伯取出蒋介石手令，朱绍良方知自己已被撤职，由汤恩伯补缺。朱绍良提出同回省府办理移交，汤恩伯说“不必”，催促他登机赴台，形同绑票，随后自行就任福建省主席发号施令。

不久，蒋介石要求行政院追认既成事实，任命汤恩伯为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向李宗仁报告，问如何处理。

李宗仁说，蒋先生今日在宪法之前只是一个平民，以一个平民随便撤换封疆大吏，成何体统？况且，蒋先生如要在幕后干预行政，尽可向行政院建议。今政府事前既毫无所知，事后却要追认既成事实，实在太不成话。政府不应自毁法统，承认汤作主席。

阎锡山苦笑说：“你和蒋先生共事多年，难道还不知道他做事向来不顾法统？否则也不致有今天了。汤已入主福建，我们反对亦徒劳。这件事我劝你还是忍耐算了。”行政院追认了相关任命手续。任命状送国民政府文管处盖印时，因李宗仁不痛快，滞留政府文秘部门一周。阎锡山又找李宗仁，任命状始盖印发出。李宗仁感叹：“朱绍良原是蒋的心腹，可能因7月26日招待我太殷勤，为睚眦必报的蒋先生所知，偶一不慎，转眼之间便由心腹股肱变仇雠了。”

王朝末路，蒋介石匆匆跑路中忽视了粤籍将领日益增长的不满，仍频频飞返穗、台之间。为广州改省辖市事，蒋介石在黄埔对余汉谋、薛岳、李汉魂等人大发雷霆：“你们以为你们可以反对我咯？谁反对我，我就叫谁死在我面前！”众将返回，莫不冷笑。

国民党中央召开非常会议，蒋介石与李宗仁见面，双方都觉无话可说。蒋介石最后一次来广州逗留数日，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建议李宗仁请蒋介石吃饭，以打破这一尴尬局面。蒋介石到广州城西的迎宾馆赴宴时，随身所带卫士竟将宾馆重重包围。李宗仁看到随员中有蒋经国，但入席时却阙如，便问：“经国为何不来吃饭？”蒋介石说：“不管他罢，我们吃我们的。”但直到终席也未见蒋经国前来，李宗仁颇感诧异。事后才听副官说，蒋经国率一大群随员始终守在厨房，厨师做任何菜和用任何配料，均需经他们检查。菜品出锅，还须由他们尝过，始可上桌。李宗仁恍然大悟：原来蒋介石是怕我下毒，亲命蒋经国屈尊做监厨了！

1949年11月3日，李宗仁飞昆明，与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每每谈至夜阑更深。言及自己违心对中央大员卑躬屈节的情形，卢汉痛心疾首：“为应付他们，我卢某简直在做婊子！蒋介石是要复职了，可否由我二人给他发电，建议国民党政府迁到昆明。他一落地，我便把他扣起来？”

李宗仁猛听此言顿觉一惊。战事尚远在湘、黔边境，卢汉就已“人在曹营心在汉”了。假如蒋介石果真来此，会不会将我俩一道捉了献给中共邀功？李宗仁佯作镇静，劝他“捉蒋”之事千万做不得。此事也深埋心底，连白崇禧亦不敢告知。白氏正统兵作战，倘知卢汉有异，恐也无心指挥作战了。

（七）毛泽东痛斥丘吉尔狂言

“紫石英”号事件发生后，英国驻北平总领事包士敦致信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要求“下达最紧急的命令致扬子江之贵军部队，以保证英国三艘军舰的安全”。

> 《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486—48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毛泽东4月22日看到朱德转呈的包士敦信，23日凌晨三时致电总前委及有关领导：英国人要求我军对于英舰两艘营救被击损之英舰（紫石英号）船员一事予以便利，我们意见在英舰不妨碍我军渡江作战的条件下，可予以营救之便利；对于英国人要求该二舰于营救事务完毕后，仍须开往南京护侨一事不能同意，应令该二

舰向下游开去。但如该二舰不听劝告，仍开南京，只要不向我军开炮及不妨碍我军渡江，你们也不要攻击他们。[注]

同一天，新华社发表毛泽东起草的社论《抗议英舰暴行》，驳斥英国外交部发言人宣称的“英国军舰有权进入长江”的谬论，正告英国当局：中国现在不是1926年英舰炮击万县的时候了，也不是1927年英美等国联合炮轰南京的时候了。

“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从一百零九年前英舰大炮在珠江口外敲开中国大门起，俾斯麦此言便一再被中国的痛史所证实。

1926年9月5日，三艘英国军舰在川江开炮轰击万县城闹市区近三小时，致五千余平民伤亡，上千家民房店铺被毁。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攻克南京日，美英军舰借口流氓抢劫使馆和侨民财产，悍然炮轰南京城致上百人伤亡。率军入京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非但不抗议英美暴行并要求严惩肇事者，反而卑躬屈膝宣称，“南京事件起因，完全出于流氓捣乱”。

1949年4月24日，中央军委敕令第三野战军查明“紫石英”号位置和现状，详报与英舰作战情况，并“医治其伤员，不侮辱其船员”。三野遂将英军负伤水兵送医院治疗，还数次为“紫石英”号运送邮件和生活必需品。炮三团随之南渡，准备协助处理善后。

26日，炮三团政治委员康矛召来到“紫石英”号搁浅处。康矛召武汉大学肄业，曾任新华社华野前线分社社长。长江炮战引人钩沉往事，他的思绪回到一百零七年前。1842年8月29日，趾高气扬的英国水兵在泊于南京江面的英舰“康华丽”号上，鄙夷地看着头戴顶戴花翎、脑垂“半瓢式”牛尾辫的清朝官员，登舰签署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此后五十六年间，英国通过《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三个强盗条约，攫取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在内的一千零九十二平方公里中国领土。现在，是英国人对中国表示惊诧的时候了！

康矛召打招呼后，英舰海军上尉傅立门带水兵乘舰上仅存的一条破漏舢板登陆。康矛召向傅立门宣布口头声明：第一，英舰擅自侵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区，炮击我阵地，造成我军伤亡二百五十二人，大量村舍被毁，英方应对此暴行负完全责任；第二，英舰应向我军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与中国人民敌对的行为；第三，我军保留向英国要求赔偿损失、严惩凶手的一切权利；第四，“紫石英”号军舰停在目前位置，不得移动。

傅立门海军上尉表示，已经身亡的舰长史基纳应对此事件负主要责任；“紫石英”号军舰现不移动，请勿炮击；舰上所有舢板小艇都毁于炮火，请求拨给一条舢板作联系之用；至于赔偿问题，“紫石英”号无权答复，须经由英国政府及其代表谈判解决。

当日，经第三野战军十兵团批准，克仁斯指挥“紫石英”号移至镇江东谏壁镇东窑头村水面锚泊，并开始与当地农民以货易货，交换粮食、蔬菜和水果。次日，康矛召再来江边接洽时，克仁斯借口军务繁忙，派军士费尔曼着中尉服装上岸晤面。

由于克仁斯一再回避谈判，5月18日，炮兵第三团政治处宣传股股长戴国良，奉命给“紫石英”号送达外交公函，明确告知已指派炮三团政治委员康矛召为谈判代表，要求英方也指派相应代表举行谈判。为便于其同英方会谈，康矛召被临时授予上校军衔。

英国海军远东舰队总司令布朗特上将此时已从英国返回香港，阅函即报请英国海军部，提出乘水上飞机前往“紫石英”号与解放军谈判，如谈判破裂则亲自指挥“紫石英”号突围，突围不成即凿舰自沉。如此荒谬绝伦的提议，自然被英国海军部否决。

长江之战震动西方世界。美国高层对英国海军炮战中伤亡之重感到惊讶。纽约各报都以最大字号标题抢发新闻。法国等国报纸均在头版作报道。英国政要则对英舰折戟长江感到难以接受。

4月26日，英国议会下院在威斯敏斯特宫举行听证会，英国首相艾德礼宣称：“这是不可接受的事件，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在长江行驶，执行和平使命，因为它们得到国民政府的许可。”他还无中生有说，解放军“准备让英舰‘紫石英’号开往南京，但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该舰要协助人民解放军渡江”。

艾德礼的狡辩和信口雌黄引发争论。国防大臣亚历山大一派认为，英舰留南京利于供应、无线电通信和保护侨民。而另一派则指责英国干涉中国内政，应从长江撤出英舰。

下院议员罗伯兹说，英国政府几个月前“曾经送给国民党好些军舰，这些军舰无疑要被用于内战”。“在解放军强渡长江大规模军事行动前几小时，政府批准两舰在长江上行下驶”，“显然容易激起正在待命渡江的解放军愤怒”。

盖来奇议员对英国媒体把“长江事件”归咎解放军表示异议，质问国会：“假如一艘亲希特勒的国家派出的军舰，在诺曼底登陆那天驶入英吉利海峡，难道不应向它开火吗？”

议会大厦辩论中，英国保守党首领丘吉尔咄咄逼人向政府提出，“派一两艘航空母舰到中国海上去……实行武力报复！”

丘吉尔的狂言，引起连锁反应。议员们纷纷把他作为攻讦对象，指责二战硝烟刚散去，英国政府绝不能用武力干预此事……

丘吉尔的叫嚣见诸报端后，4月30日，毛泽东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驳斥丘吉尔等为英舰侵略行为辩解的谬论，阐明中国人民不怕任何威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严正立场和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对外政策：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60—146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我们斥责战争贩子丘吉尔的狂妄声明。4月26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要求英国政府派两艘航空母舰去远东，“实行武力的报复”。丘吉尔先生，你“报复”什么？英国的军舰和国民党的军舰一道，闯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区，并向人民解放军开炮，致使人民解放军的忠勇战士伤亡二百五十二人之多。英国人跑进中国境内做出这样大的犯罪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理由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执行道歉和赔偿。难道你们今后应当做的不是这些，反而是开动军队到中国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报复”吗？艾德礼首相的话也是错误的。他说英国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江。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艾德礼说：人民解放军“准备让英舰紫石英号开往南京，但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该舰要协助人民解放军渡江”。艾德礼是在撒谎，人民解放军并没有允许紫石英号开往南京。人民解放军不希望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帮助渡江，或做任何别的什么事情。相反，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黄浦江和在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项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领空，不要帮助中国人民的敌人打内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不愿意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带威胁性的行动。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艾德礼埋怨中国共产党因为没有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而不愿意同外国政府的旧外交人员（国民党承认的领事）发生关系，这种埋怨是没有理由的。过去数年内，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政府是帮助国民党反对我们的，难道艾德礼先生也忘记了？被击沉不久的重庆号重巡洋舰是什么国家赠给国民党的，艾德礼先生难道也不知道吗？

毛泽东义正词严“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执行道歉和赔偿”，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第一次就主权和尊严向西方列强提出严正交涉，以正义和实力亮剑回击西方战争讹诈。

鉴于新中国尚未成立，我不便与英驻华使馆正式接触，第三野战军建议，此事以冲突双方就地解决为好，为中央军委所采纳。

5月5日，英国议会下院就“长江事件”展开激辩。

英国国会议员、海军中将泰勒说,你不能走到那些已经摆脱腐朽的帝国主义枷锁而正在奋勇前进的人面前说:“我们将派遣一个使者与你们建立联系，他将会通知你，我们要你们做什么。”

一些重量级议员，反驳了艾德礼“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开进长江”的声明，针对丘吉尔派航母报复的狂言指出，在解放军大举渡江之际，派出军舰进入两军对峙的长江，本身就是极端冒险的行为。还有的议员说，冲突虽是解放军先开的炮，但大战之前进入中国内河战区，自然于理有亏。鉴于英国在华有大量经济利益和香港问题，与即将取得全国政权的中共交恶，绝非理智之举。

英国议会反对党领袖麦克米伦指出，英国军舰在中国内河航行的权力，早已为1943年中英双方签订的终止治外法权的条约所废除。“现在看来，‘炮舰观念’似乎是太过时了。”

5月28日，中央军委发出预防帝国主义武装干涉部署电。

> 辰感，5月27日。
>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渡江战役》，第320—32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

29日，华东局和总前委复电中央军委：国民党军队消灭得愈彻底，帝国主义军事干涉的可能也愈小。如果在三五个月时间我们能够控制青岛、福州、泉州乃至厦门，四野能进入两广，则更能免除这种危险性。电报提出：（一）对帝国主义，拟在群众中不疲倦地进行宣传和教育，但严防提出不策略、不现实的反帝的具体行动口号，在报纸上多从国际问题和中国的历史（着重美国援蒋），求得暴露帝国主义，非必要时不轻易涉及现实问题。对外交问题，根据中央给南京市委辰感[注]电指示精神执行。（二）拟6月上旬以八兵团一个军附炮团开青岛，叶飞第十兵团三个军于7月初开动，以便迅速夺取福建全省，控制福州、泉州、厦门沿海。三野十一个军以四个军位浙江，五个军位上海地区，两个军位南京、镇江地区，同时加紧整理沿海防务，足可应付意外事件。（三）二野入川宜早（乘敌破碎早点解决西南问题实属必要），估计两月后三野部署已调整妥善，英美动态亦趋明显，故二野必须积极准备于8月初出动，否则临事仓促陷于被动。[注]

（八）擅入司徒雷登官邸风波

4月24日，吴化文、何克希挥师占领南京后，军部临时设在有“蒋介石第二官邸”之称的励志社。部队尚未安营扎寨，一场牵动国际视听的轩然大波便兜头扑来。

24日晚，南京忽降大雨。第一〇三师三一一团一营教导员王孔孝，为部队找房误入西康路18号（今33号）美国大使馆。

这座馆舍，为司徒雷登1946年7月出任驻华大使当年所建。新馆三幢楼房均为公寓式二层建筑，砖石结构，平面为“凹”字形，每幢楼房建筑面积九百三十六平方米，一楼正、侧面为起居通廊，中部为客厅和办公室，后部为厨房、餐厅，二楼是卧室。

大雨滂沱，为部队觅房的王教导员，带战士从第二幢楼起居通廊走上二楼，与司徒雷登迎头相撞。雨夜惊魂，大使大声呵斥：“这里是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我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王教导员从未听说过司徒雷登，但断定这些颐指气使的洋大人是国民党的后台，遂毫不示弱回敬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美国大使是援助国民党杀害中国人民的帮凶！这里是解放了的南京，今天我们只是先过来看看！”说完，转身向楼下走去。一营三连连长毛顺友，走到一楼又对使馆工作人员说：“你们听着，现在中国人民胜利了，从此以后，中国人民是不可欺负的！”

王教导员一行在反击中宣示完毕，排队齐步走出大使馆。

美国大使虽对不速之客大光其火，但当晚并未做出反应。

司徒雷登是美国传教士之子，1876年降生于杭州天水堂教士寓所（今杭州下城区耶稣堂弄）。街坊邻居记得，幼时的司徒雷登常到河坊街王润兴饭庄吃饭，走进门口挂有“肚肌饭碗小，鱼美酒肠宽；问客何所好，豆腐烧鱼头”对联的百年老店，总要用道地的杭州话吩咐饭庄伙计：“件儿要瘦，肥了倒胃；木郎豆腐多放胡椒，要烧得入味；响铃儿要熬稍！”童声未落，已是笑声满堂。

1887年，十一岁的司徒雷登回美国弗吉尼亚州读书，被讥笑为不会说英语的怪物。司徒雷登说自己“是中国人更多于是美国人”，的确并无矫情。1904年末，从弗吉尼亚协和神学院毕业的司徒雷登，被美南长老会聘为牧师，偕新婚妻子来到上海。

1919年春，美英四所基督教教会，拟在北平被义和团烧毁的汇文、华北女子协和、通州协和大学基础上，重建一所大学。熟稔中国文化，中英文运用自如且有教会背景的司徒雷登应聘任校长。当时，学校共有五间课室，九十四名学生，办学经费全靠教徒捐赠和自筹，所得仅够一半开销。司徒雷登决心另起炉灶再建新校，将学校命名为燕京大学，十五年十次返美募捐，募得二百五十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司徒雷登“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终于在清华大学堂对面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发现了原为清代一亲王赐园的一爿土地。1921年，司徒雷登以六万大洋低价，从山西督军陈树藩手中购入这片约四十公顷的苑林，又在附近买进一些地。经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设计，建成近代中国规模和环境均属上乘、中西合璧的燕京大学。1946年7月11日，司徒雷登应国务卿马歇尔之邀，经总统杜鲁门批准，出任在国内备受尊崇的美国驻华大使。

4月25日清晨，第三十五军一〇三师三〇七团一营营长谢宝云，带战士在城区寻找住处，再度误入美国大使馆，在司徒雷登卧室与其面对面。大使正在盥洗室洗漱。或许，昨晚的不快让他未休息好，消化那场低强度冲突带来的不适还需要时间。但仅仅过了十几小时，类似的一幕竟再度在官邸上演，只是入宅官兵换了模样。司徒雷登被彻底激怒了：“这里是美国大使馆，我是大使司徒雷登，你们现在的行为是入侵美国领土，马上给我出去！”

谢营长吃了一惊。老练的战场突击者意识到，自己遭遇了强劲对手。“你发什么火？我告诉你，我们没有承认什么美国大使馆，这里是中国的南京，凡是中国人的地方，解放军都要去解放！”谢营长说完，瞥一眼哑口无言的司徒雷登，从容离去。

当天，恼羞成怒的司徒雷登就解放军两次进入美国大使馆事，报告美国政府，通过美国媒体向全世界宣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南京强行搜查美国驻华大使馆！司徒雷登日记记载：

4月25日 星期一

在新秩序底下的第一天早上，刚六点四十五分钟，中共士兵们打开我房门，把我唤醒。我问他们要做什么，其中一个态度倨傲，只听见他喃喃自语。后来我跳下床，他们全部转回来，约有十二个人，他们的发言人说：“只是周围看看，寻开心，没有危险的。”还问我，明白吗？我说：“唔，明白了。”爱德华·安德堡要进来解救我的时候，受到了一次粗鲁对待的经验。傅泾波没有受到伤害。所易遭遇的危险似乎故意对正住我。

《司徒雷登日记》，第120—121页，黄山书社2009年7月第1版。

下午四点钟，北大西洋列国使节集团同仁对上述发生的事件都深感关切……大家都同意我们之间应该采取一致的步调。英国大使于是把消息寄发伦敦。其他列国大使也都照样把消息寄发各该国政府。本馆也把这项情报发出……[注]

司徒雷登再度走进中共领袖视野之际，毛泽东入住双清别墅已一个月。对司徒雷登，毛泽东并不陌生，尤感佩他筚路蓝缕创办燕大，以及九一八事变后带学生上街游行高呼抗日口号。1940年秋，司徒雷登在重庆不慎坠马受伤，毛泽东即发慰问电由周恩来面交。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美成敌性国家，日本宪兵逮捕司徒雷登等十八名燕大师生。近四年牢狱之灾，司徒雷登获得广泛同情。抗战胜利重获自由时，他迎来自己一生中声望的巅峰。

> 陆志韦，燕京大学校长，曾任燕大文学院心理学系教授兼主任，燕大教师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大学校长。

1945年9月4日，司徒雷登结识了赴重庆谈判的中共领袖毛泽东。《毛泽东年谱》载：“同日（9月19日），设午宴招待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宴会在张治中寓所桂园举行，周恩来作陪。毛泽东感谢司徒雷登对中国教育的重大贡献，这使他十分高兴。桂园餐叙，成为司徒雷登与中共领袖交往值得珍视的记忆。1948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彭真、叶剑英、林彪、罗荣桓电加写如下文字：“燕京是司徒办的学校，陆志韦[注]当然和司徒有联系，但燕京教职员中左倾者不少，陆志韦态度亦较民主，我们应采保护政策。”

1949年春，司徒雷登再度引起中共领袖关注，事情变得稍稍棘手起来。4月24日，渡江大军进入南京，一辆挂着星条旗的吉普车穿行于欢迎行列。端坐车中的正是竭力伸展触角感知即将主导中国新力量的司徒雷登。此前，他已要求美国政府，在共产党政权建立后，允许大使馆“长期留下，以观察共产党的意图”，并向中共提供一个“商讨与美国关系的机会”。司徒雷登未按国民政府要求南迁广州而留南京观望，意在试探外交承认之可能。

新华社关于入宅事件引发国际风波的报告，引起毛泽东深长思索。涉外问题，是人民解放军由乡入城遇到的新情况。南京解放前，中央军委即给总前委和华东局发出外交工作八条指示，渡江部队也普遍进行了外交政策纪律教育并制定相关规定。部队进城即发生外交风波，是教育不落实，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历史认可毛泽东对燕京大学及首任校长的评价。该校在中国虽然只存续了三十三年，司徒雷登任校长二十七年，注册学生仅九千九百八十八名，但亦是桃李满天下。二战期间，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90%以上毕业于燕大新闻系；二战结束时，参加日本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军舰受降仪式的三名中国记者，均出自该系。燕大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1922年，司徒雷登破

格录取在教会征文中拔得头筹的山东平度籍少年刘谦初为燕大学生。刘谦初在此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燕大学生运动领袖，后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五任书记。燕大还为新中国贡献了五十六名院士、一百多名学科带头人。有心人注意到，1979年邓小平率团访美，代表团二十一位成员，有七位毕业于燕大。

马歇尔来华调停时，司徒雷登得以与周恩来相识，二人十分投缘。1948年下半年以来，他给周恩来写了三封信。毛泽东关注美国大使鸿雁传书。1949年4月某夜，毛泽东与周恩来在香山商定，派一位外事干部去南京主持市军管会外事工作。随后，天津市军管会外事处主任黄华入选。黄华原名王汝梅，1936年6月，燕大新闻系兼职讲师埃德加·斯诺赴陕北采访，邀该校学生会主席和“一二·九”运动学生联合会总交际王汝梅做中文翻译。采访结束后，王汝梅留在延安，改名黄华。黄华赴南京任市政府外国侨民事务处处长，行前，周恩来当面对其作了交代和叮嘱。

在黄华的燕京记忆中，1929年6月，司徒雷登为燕京大学教授谢婉莹（冰心）与吴文藻博士证婚，是其感铭于心的一幕。谢婉莹曾撰文赞颂司徒雷登嘉行懿德：这团体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葬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笺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燕京记忆温馨如昨，黄华懂得怎样处理革命与感情的关系。

>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246—24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
> 《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49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4月26日，中央军委就“入宅事件”急电总前委并第二、三、四野战军：“不管此事是否确实，你们均应立即传令全军，凡对外国大使、公使、领事和一切外交机关人员及外国侨民施行室内检查，采取任何行动必须事先报告上级，至少须得到中央局及野战军前委一级的批准，方得实施”，明确“野战军以下，任何部队及其首长均无权未经中央或中央局、野战军前委批准擅自采取对待外国侨民超过中央规定的行动”。[注]27日凌晨四时，毛泽东致电总前委：三十五军到南京第二天（25日）擅自派兵侵入司徒雷登住宅一事，必须立即引起注意，否则可能引出大乱子。[注]

黄华出任南京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犹如在司徒雷登眼前飘来一朵祥云。黄华与司徒雷登助手傅泾波是同学，而师生和同学之谊，显然利于拟议中的外交计划实行。首次黄傅会，傅泾波根据司徒雷登授意说：“一年多来，司徒雷登逐渐了

解了自己过去对国民党认识的错误，美国现已停止援助蒋介石了。因此，我们是不能过分责备司徒雷登的。”对傅泾波这番说辞，黄华未表态。

傅泾波谈及，“司徒大使说，中美过去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可以修改”。该条约是蒋介石为获取美援于1946年签订的，规定美国人可以完全自由在中国居住、旅行、经商、购置土地及产业，美国商品与中国商品享有同等待遇，美国船舶、物资、人员可自由通过中国领土、领水等。延安《解放日报》社论指出，该条约是中国历史上最可耻的卖国条约之一，是中华民族的国耻。陕甘宁边区发布命令，将签约的11月4日定为国耻日。

傅泾波告诉黄华，国民党南撤，司徒雷登决定留下来，目的就是希望有机会同中共方面接触，建立联系，并获艾奇逊同意。他知道你来南京非常高兴，盼望与你见面。傅泾波向黄华转达了司徒雷登想继续当美国驻华大使，及与中共方面交涉的愿望，强调说，现在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时期，能在老校长手中完成，比换一个新人要好。他强调了司徒雷登的诚意：“为了促进中美外交关系，老校长按下贵军进入其私邸及其他的事，都不提了。”

黄华表态说：“美国援蒋政策造成中国人民损失重大，创痛极深。现在美国尚未放下屠刀，何能期望人民恢复好感？空言无补，需要美国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才能逐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至于司徒雷登，他是美国派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外交大使，人民政府不承认他的‘大使’身份。会见的事嘛，考虑以后再说。”

两人晤面情况，黄华以中共南京市委名义报告中共中央。

5月10日，毛泽东复电南京市委并告华东局，指示黄华可继续与司徒雷登联系，以私人身份与其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但在谈话中应表明以下观点：“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力量的联系，而不是笼统地要求美国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电报指示：“在与司徒雷登谈话时，如司徒雷登态度是友善的，黄华亦应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不要表示过分的热情，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

5月13日，黄华以私人身份与司徒雷登见面。相互寒暄后，黄华详询解放军战士误入使馆情况。司徒雷登平静回述事情经过，隐去了自己充满戾气呵斥解放军官兵的细节。黄华对司徒雷登说，军管期间，解放军有权进入一切可疑的中外居民住宅检查。在没有同新中国建交之前，原外国使节不再享有外交特权；但作为外国侨民，我们将保护其安全，请放心。得体适度一番话，显露出学生对校长的尊重，又适度为入宅官兵一辩，告其知行知止。

5月13日和6月6日，黄华两次与司徒雷登谈判，重申中共愿与美国及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外国政府特别是美国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司徒雷登不愿表示停止援蒋，但称中共应意识到各国大使馆继续留在南京是一种意味深长的举动。

这期间，司徒雷登接到情报，称中共高层在对苏对美方针上出现分歧。于是他通过傅泾波向黄华提出，亲自北上，同周恩来等高层领导会谈。司徒雷登还委婉地表示，自己长期担任燕京大学校长，每年6月都在北平过生日，今年还想去北平。

6月28日，毛泽东托燕大校长陆志韦函告司徒雷登，他可以个人身份到北平参加将于8月31日举行的燕大校庆。周恩来则通过黄华给司徒雷登传信，欢迎他回燕京大学一行，并表示可能一晤。此前，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在北平接见原国民党粤军元老陈铭枢，赞扬司徒雷登在日本占领时期所表现出来的顽强精神，以及他数十年来在中国从事教育工作的成就，同时对他寄予“最重要之希望”，“希望今后美国不再援助蒋介石在中国之反动政府；希望美国政府能按照罗斯福总统、史迪威将军和华莱士先生的方式制定其政策。如果美国将来能这样对待中国，中国自然会以同样友好回报。而这一切之实现就有赖于司徒先生回国的努力了”。

当日，黄华正式通知司徒雷登，毛泽东、周恩来真诚欢迎他前往北平，毛泽东称他会被作为“许多中共人士的老朋友而受到欢迎”，会晤中共领导人之事也有可能。司徒雷登对此“极为高兴”，报告了美国国务院。但美国高层意见不一，杜鲁门否定此计划，通知“根据最高层的考虑，指示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司徒雷登北平之行化为泡影，中美双方在南京的谈判也胎死腹中。

1949年4月27日清晨，陈毅、邓小平率总前委机关从瑶岗急赴南京，途中接毛泽东电。邓小平阅电后递给陈毅，默默说道：“主席生气了。”陈毅阅电亦感问题严重。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说：“进入上海，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过一大难关。”现在，两人开始看清横亘入城路上那道难关的模样。

> 《邓小平年谱》第二卷，第17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1月第1版。
> 《第八兵团渡江以来关于部队执行政策纪律的总结》，东部战区联合参谋部档案馆藏件。

入城部队违反外事纪律问题，误入美国大使官邸，或许只是冰山一角。4月29日，邓小平为总前委起草致中央军委电中谈道：“南京出了乱子的就是一个外交问题。四天内共发生我军队人员与外国人的争执事件有六起，而以到司徒雷登住宅一事为较严重。”[注]馆藏档案当年第八兵团的总结材料载：“兵直及三十五军入城一周即产生了六起外交案子（已有详细报告），最近半月又陆续发生了几件违反外交纪律的事件，如：三十四军二九九团某营炊事员至英侨职员宿舍的花园里

去大便，经教导员前往（始）纠正；兵政总务科卫生员拦法国人的汽车，要他送（自己）回政治部；三十四军二一一团七连仍设哨位于澳国大使馆门首，并在澳侨出入时索取加盖中文图章的字条；三野特纵高射机枪营一连二排付〔副〕陆文复，向澳国侨民借桌子并先付借条称‘今借到澳国同志大桌子一张，是否可以进出，放心’，下面署名‘第三野战军高射机枪营陆文复’……”[注]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渡江战役》，第236—23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

4月28日，毛泽东驰电总前委：“美国军舰及一营陆战队，已于26日由上海撤至吴淞口外，美国只留下一艘载有医疗设备的军舰（医舰）在上海。英国的军舰伦敦号及永恒号亦和美舰一起退往吴淞口外，只留下驱逐舰黑天鹅号在上海（该舰被打伤，有伤兵留沪就医）。”“英美采取此种态度于我有利。我方对英美侨民（及一切外国侨民）及各国大使、公使、领事等外交人员，首先是美英外交人员，应着重教育部队予以保护。现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侵入司徒雷登住宅一事，美国可能向我南京当局提出一个口头的或书面的抗议。但是只要我方不继续发生此类事件，美国是不会将此事扩大的。英军舰紫石英号事件，似乎是一个偶然事件，英国连抗议也没有提。因此我们除借此作宣传教育人民外，实际上我们亦不必扩大这件事”。[注]

29日，粟裕致电各兵团、各军并报中央军委、总前委调整作战部署，要求“以三十五军士兵闯入司徒雷登住宅引起极坏影响（甚至可能出大乱子）事件，抓紧教育部队，以为鉴戒”。

30日，中央军委复电粟裕、张震和总前委：“29日部署甚妥，如你们能于一星期内完成此项部署并完成对于攻占上海的政治准备工作与军事准备工作，则你们可立于主动地位。”“请迅速抓紧完成占领上海的准备工作，以便在一星期以后，假如汤恩伯从海上逃跑时，你们能够主动地有秩序地接收上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三辑，第三册。

历史反转常始于偶发事件。陈毅在南京检查，深感一星期接收上海，搞不好真可能“引出大乱子”。4月30日，总前委报告中央军委：“三十五军因非主力兵团，骄气较少，故该军在南京虽然出了不少乱子，但纪律还算比较好的。其他主力军如不训练，不会比三十五军的情况更好。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注]总前委电告三野九、十兵团：“根据南京经验，在我党我军未作适当准备，仓卒〔促〕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如不经过十天左右的整训，进城之后一定会发生许多问题。”要求入沪前集中一段时间进行整训，对官兵进行入城政策纪律再教育，为跨越中国革命的“难关”做好准备。

5月3日，毛泽东复电同意第三野战军推迟进占上海，“以便有十天时间作准备工作”。指出，你们在“准备渡江期间，没有抽出一个月时间令军队学习政策和接管城市事项，没有作很快占领诸城的精神准备和组织准备，吃了亏。现在只好在十天内补足此种缺点”。

《邓小平年谱》第二卷，第174—17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1月第1版。

同一天，邓小平为华东局、总前委起草致第二、三野战军并中央军委电，拟制了六条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规定 ：“（一）凡属有关外侨的问题，不得擅自处理。（二）除外侨事务处，外侨管理科和被指定与外侨接触的人员外，其他任何人不得与外侨来往，不得与外侨谈话。（三）任何部队机关和人员，不得借住外侨的机关和房屋，不得借住教堂、学校及其他文化教育机关，已借用者立即交还。任何人不得进入外侨机关或住宅检查或参观。（四）各城市应迅速成立外国侨民事务处及在公安局内设立外国侨民管理科，并根据中央军委历次指示，规定外侨应守章规，通告外侨遵行。（五）凡与外侨接触的人员，必须对外侨采取严肃的立场。（六）任何时候，我各警戒部队或警卫部队，对外侨无权使用武器，严禁开枪……各市委、各区党委应立即将当地的外侨情况和外交事项，向我们做一次报告，以后则应经常报告或请示有关外交工作的问题……5月7日，中央军委将上述外交注意事项转发给四野、一野、华北解放军、中原局、西北局、山东分局，指示请转发所属一体遵行为要。”

总前委认为，进入上海各项准备，最重要的是思想准备。当日部署第二、三野战军重新进行党的外交政策的教育，第三野战军参战部队和接管干部赴丹阳整训，要求解放上海一要打得好，显示出我军的威力和艺术；二要进得好，入城后部队政策纪律好、军容好。

丹阳，这个因丹凤朝阳而得名的小镇，素来是娴静的，像个隐于灵山秀水间的村姑，羞怯自矜，悄然侍立；又像是一束不那么起眼的米子兰，蛰伏长江三角洲走廊和南京都市圈一角，静悄悄散发着馥郁的芳香。1949年5月，小城丹阳忽然热闹起来。

从5月4日起，准备接管上海的干部齐集丹阳，认真学习毛泽东“共产党有无能力接管城市，尤其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这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在全世界的形象”的指示，学习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及入城各项规定守则，从思想上解决适应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到城市的问题。

“野战军不能再‘野’了！”5月10日，剃光头、穿一身洗得发白旧军装的陈毅，大步走进丹阳城南大王庙，语惊四座的开场白，引得参训干部开怀大笑。陈毅依亲眼所见，列举了部队违纪四件事。第一，5月8日下午，陈毅和饶漱石在光明大

戏院门口，看见几个没票的军人强闯戏院看歌剧《白毛女》，闹得持票的百姓反而进不去了，陈毅要求没票的军人全部退场；第二，当日清晨，陈毅到丹阳师范学校与校长老师交谈，得知前天有一位解放军摘去一个电灯泡，昨天又来送还灯泡；第三，满街都是队伍，干部战士自由上街，证明没有执行非请假不能外出制度；第四，南下路上，有人爬车、拦车、强行坐车，有时汽车根本无法开动。

陈毅说，上海是个最现代化的城市，是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窝巢，进入上海是中国革命最后一个难关，是一个伟大考验。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是和市民的见面礼。纪律搞得好，政策就可搞得好，否则会影响政策推行。上海人民对我们的希望很大，把我们看成“圣人”，如果一进去就搞乱了，他们就会大失所望。

陈毅讲话从问题切入，抉微钩沉，小中见大，一些在胜利中处于微醺状态的干部，受到触动后脸红出汗，开始清醒起来。

5月6日，华东局在丹阳召开部局以上干部会议，提出要保持人民军队艰苦朴素的传统和作风，既能睡洋房、点电灯，又能睡牛栏、点油灯，思想上千万不能腐化，保持我们的胜利。

丹阳集训直指问题，从抓作风纪律和政策教育整顿入手，把党心所盼与民心所愿，有机统一于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武装，使之荡涤思想尘埃，矫正冲锋姿态，胜利收京后即将全新入沪。

丹阳整训的重要成果，是制定《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

2月间，在徐州东北贾汪，陈毅找司令部城市政策组组长曹漫之，要他抓紧组织起草入城公约和守则，并查查史书，看有没有军队“不入民宅”之类的话。曹漫之组织查阅《二十四史》等古籍，未找到“不入民宅”的内容。陈毅说，古书上没有就不能写吗？军队进城没找到营房前一律睡马路，这一条一定要写上！

部队进城一律“不住民房”写入公约守则，征求意见时，一些深怀“老房东”情结的官兵炸了锅。“从红军时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规定‘上门板、捆铺草’，为啥进上海不能住民房？”“现在是雨季，天下大雨，战士也要躺在水里睡觉吗？”

陈毅听到这些话，当即明确：“这些困难都可以克服，军队不入民宅睡马路要坚决执行！就这么定了，天王老子也不能改！”

邓小平在戴家花园主持召开总前委会议，讨论《入城三大公约和十项守则》，明确规定：不住民房店铺，不准打扰戏院及一切娱乐场所。讨论中陈毅强调，上海市区作战不准使用重武器。

毛泽东充分肯定总前委于细微处察关节，从抓政策纪律入手引领官兵跨越中国革命“难关”的做法，回电连写四个“很好”。

入城部队住宿牵动社会敏感神经。民主人士盛丕华5月2日日记记载：下午三时周恩来派车接至中南海，讨论上海进去问题。大家认为与人民合住，实在不好。余主张最好与当地开明人士协商什么地方有空屋，可以借住，就与该业主商借，比较恰当。有人主张与各同乡会或公所等团体商酌办法，大家认为妥当。

5月6日，中央军委决定指出，城市解放初期，卫戍部队应适当分散在市内驻扎，但不得借住或租住民房，而应驻扎在中外兵营，公共机关，庙宇、祠堂、公所，及会馆等公共场所中。

16日，中共中央指示：“军人进入戏院、电影院、理发店、澡堂看戏、看电影、理发、洗澡及进公共娱乐场所游览，及乘坐电车、公共汽车者，均须照章买票，照章付钱，不得要求免票或半票付钱。”军队在城市驻扎时，不得借住和租住民房，而应驻扎在兵营、公共机关、庙宇、祠堂、公所、会馆等公共建筑。

这些金箴铁律，成为入城子弟兵带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

进入上海，对于这支稳操胜券的正义之师来说已无悬念。丹阳整训，则为仁义之师入沪展示良好形象蓄足了底气。

（九）钳击吴淞，喋血宝山

居留大陆时日屈指可数，蒋介石行踪飘忽不定，愈加诡秘。

1949年4月24日中午，蒋介石在溪口吩咐蒋经国说：“把船只准备好，明天我们要走了。”蒋经国小心询问：“父亲，我们这次去哪里？”蒋介石未作声。蒋经国备好太康舰，晚间，舰长黎玉玺问：“领袖明天到什么地方去？”蒋经国说：“我也不知道。不过，以这次取道水路看，不外乎两处：一是基隆，一是厦门。”黎玉玺也深以为然。25日下午登舰后，蒋介石说：“到上海去！”

26日，蒋介石在复兴岛轮番召见团以上军官，信誓旦旦表示，自己留在上海不走，“和官兵共艰苦，与上海共存亡”，并蛊惑说，不出三个月，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到时候美国就会恢复援助。只要守上三个月到半年，形势一定会朝有利的方向转化。

蒋介石在给驻沪将士打气时，私底下再次给汤恩伯交底：尽可能坚守一个时期，待资金物资转运台湾后，就可放弃上海。

蒋介石令汤恩伯为抢运国富背水一战，注定使沪战空前残酷。

民国以降，上海已成永久设防城市。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就聘请美国、德国顾问，全面修筑上海外围钢筋水泥工事。上海沦陷后，为防美军登陆，日军又加修了防御工事。1949年1月，汤恩伯启动上海城防整体升级改造工程，以阎锡山太原工事为蓝本，由上海最大的陆根记营造厂承包营造“碉堡五千、活动碉堡三千”，形成了三道防御工事：外围警戒阵地设于太仓、南翔、川沙之线，每个据点有一个团的阵地，以掩护主要防御地带；主阵地狮子林、月浦、刘行、虹桥、杨恩、高桥之线纵深约三公里，集团地堡群有四千多座碉堡、一万多所野战工事；市区核心阵地以国际饭店、四行仓库、海关大楼、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等高大建筑物为依托和平台，构筑强固中心据点和抵抗枢纽，并在市区设有半永久性抵抗工事，以便进行巷战。

阎锡山看罢上海工事认为，“至少可守一年”。蒋经国称其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可以与马其顿方阵相媲美”。汤恩伯吹嘘，上海城防比法国为防止德军入侵构筑的“马其诺防线”强固33%。

为加强“监军”督战，国防部在原有督战组、总统特派视察组基础上，又特派专门视察组进驻上海，汤恩伯还安排高参下沉各军、师，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也派出大批特务监视部队。

于劲：《上海：1949大崩溃》，第65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国民党军多有不经国防部任命私自提升的“黑官”，蒋介石对此心知肚明。在复兴岛，他向军官许愿：“你们谁也不是黑官，现在是什么阶级，打完这一仗都一律晋实，打得好有功的还要晋级，我负责指示国防部这样办，你们尽可安心工作。”[注]汤恩伯颁布“十杀令”，升级“官兵连坐法”，规定放弃阵地、撤离职守者等一律处决，在国际饭店设立“英雄馆”，供作战有功人员吃喝玩乐。还计划设立军妓营，供官兵发泄兽欲，因战事发展迅猛未及实行。

国民党在上海有三个作战指挥机构：汤恩伯统辖全盘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石觉指挥各军作战的淞沪防卫司令部，陈大庆指挥宪兵、警察、交警总队的淞沪警备司令部。汤恩伯以第二十一、五十一、五十二、五十四、七十五、一二三军二十个师，配属上百辆坦克、装甲车，防守黄浦江以西市区及太仓、昆山、嘉兴、金山等外围；以第十二、三十七军五个师防守黄浦江以东地区，主力置于高桥；协防舰艇和飞机确保市区及吴淞口海上通道。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1945.1—1949.2，第345页，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第1版。

对上海战役这场规模空前的城市攻坚战，毛泽东志在必得，年初即致电斯大林：“到秋冬季我们有九成的把握，可以占领九个省”，攻占南京、武汉、杭州等十四个城市，“至于上海，问题不在军事方面，我们深信，定能在今年冬季占领上海。问题在于燃料、粮食的供应和保障方面。是否采用强攻，我们还得考虑。”[注]

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夺取上海的基本方针是，既要歼灭敌人，又要完整接管上海，以利而后的经济建设。要求攻城部队通过集训加强城市政策纪律教育，战斗准备和接管准备尚未完成前，“不要过于迫近上海，以免吓跑敌人”；进攻上海时间视接管准备工作进展而定，愈快愈好；兵力部署应以有力一部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口及乍浦海口，断绝敌人逃路，使上海物资不致大批从海上运走；接管准备工作就绪再行总攻，或迫敌投降。

第三野战军“收京”后“取沪”，粟裕自然成为战上海的一线操盘手。5月初，粟裕、张震率三野机关自常州东移苏州，指挥上海战役。

按照中央军委和总前委指示，上海之战基本取天津方式，但又不完全相同，主要区别在于不能把上海打烂了，确保中国经济中心完整回到人民手中。这一战中完取的要求，决定了战上海不能径取闹市，必须剑走偏锋，断敌海上退路引敌出城，歼敌于市郊，并择机夺城。粟裕、张震决以第三野战军九、十两兵团，指挥八个军及特种兵纵队炮兵大部，担负攻占上海任务。首先采取钳形攻势，从浦东、浦西两翼迂回，分别攻占高桥和吴淞口，断敌海上退路，阻敌抢运上海物资或提前逃跑，歼敌主力于上海市郊主阵地内。俟接管准备工作就绪即行总攻，进占市区。具体部署是：东路军宋时轮、郭化若，指挥第九兵团二十、二十七、三十军和第十兵团三十一军附特纵炮兵一个团，先以一部攻占平湖、金山、奉贤、南汇、川沙，进逼高桥，断敌向南向东退路，威胁吴淞，而后协同第十兵团会攻上海市区；西路军叶飞、韦国清，指挥第十兵团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军附特纵炮兵两个团和一个工兵营，向昆山、太仓、嘉定地区实施攻击，直插吴淞、宝山，封锁黄埔江口，截断敌海上退路，然后协同第九兵团围歼市区之敌。

按照第三野战军作战命令，第十兵团三十三军留常熟任兵团预备队，第二十八、二十九军5月12日从常熟出发，14日拂晓前到达吴淞口。叶飞拿着尺子在作战地图上测算，心里嘀咕，从常熟到吴淞口一百二十公里，两天到达已属强行军，还要经嘉定、月浦、杨行、刘行等永久性要塞设防地域。这样安排，或许是因浙江省主席陈仪拟弃暗投明，正说服情同父子的汤恩伯共举义旗吧！

叶飞请示粟裕，既然没什么仗打，西路两个军不必我去指挥，指定第二十八军军长朱绍清统一指挥好了。粟裕听出叶飞的弦外之音，约他到苏州野指面谈。两人对自己部队都知根知底。粟裕当年评说华野十二个步兵纵队，认为论战斗力一、

九、十纵属一梯队，十一、十二、十三纵战斗经验相对较少。由十纵改编的第二十八军拥兵近六万，各团不下五六千人，武器装备在三野最好；而由十一纵改编的第二十九军，前身是华中野战军七纵兼苏中军区，论资历是三野“小弟弟”。因该军积极求战，考虑到今后打大仗机会不多了，为给它个摔打锻炼机会，遂命其主攻月浦。粟裕对叶飞说，此仗虽无大问题，但上海是个国际性城市，要防备美国介入发生意外，因此，还是你去指挥为好。当时，炮击英舰余波未了，司徒雷登赴上海与“海上闻人”杜月笙、上海市参议会议长潘公展晤面，希望上海社会“名流”发起“自救救国运动”。杜、潘在中汇大楼宴请英美巨商和各界领袖征集意见，成立“上海各界自救救国联合会”，试图成立十万人的“上海地方自卫队”。美国在沪喉舌《大美晚报》以“国际化的上海”为题，试探上海民众意向。叶飞广知沪战背景，遂责无旁贷挂帅出征。

叶飞战前思想波动的小插曲，折射出部队一种倾向。渡江突击势如破竹，过江追歼风卷残云，会攻上海前，第三野战军普遍存有轻敌思想。一些官兵调侃，“过江过江，没放一枪；追击追击，不堪一击”。但这种值得关注的倾向，战前多少有些被忽视了。进军吴淞时间紧迫，叶飞召集军师干部作部署后，两个军分头出发。

钳击吴淞，第十兵团扮演了左勾拳角色。翌日拂晓，第二十九军顺利渡过浏河，攻下嘉定。叶飞忽觉不安：历次淞沪会战，欲占月浦，必先渡浏河，此河是上海第一道防线，现在居然无防！如守敌准备起义，应有人在此接应，可上级为何没通知呢？叶飞不知，陈仪给汤恩伯的策反信，汤恩伯转手就交毛人凤呈蒋介石，陈仪被捕。浏河无兵，是集中部署在月浦一线，以确保要塞不失。

月浦镇扼月宝公路要冲，是西进宝山、吴淞唯一门户，北与狮子林炮台相接，南与杨行据点毗邻，要塞化阵地密布地堡群。

叶飞将攻取月浦重任赋予第二十九军八十七师二六〇团。该团受命后士气高昂，5月12日晚冒雨快速穿插月浦北，与敌遭遇俘一排长，得知守敌并非地方保安团编成的“豆腐渣”部队第一二三军，而是辽沈战役漏网的“国军第六大主力”第五十二军！该军虽在营口被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揪住尾巴折损过半，但二十五师等残部得以登船南逃，经休整补充成为汤恩伯固守上海第一张王牌。

第八十七师师长张强生获第二六〇团当面敌情报告，即转报第二十九军。军首长指示连夜挖掘交通壕并修筑掩体，把战线推至敌阵地前沿，力求速战速决。13日晨，第二六〇团不少交通壕已延至距月浦街七八十米处。当发现街前十分空旷，蒋军扫清射界无任何遮蔽物可依托，遂建议增兵以确保后续攻击不殆。军长胡炳云急禀第十兵团，第八十五师二五三团受命从苏州急赴前线助攻月浦。

第八十七师二六一团12日晚奔袭月浦，途中抓到一名俘虏，从其口中获悉，第五十二军在月浦没有多少工事，便乘夜色大胆向前穿插。蒙蒙细雨中，月浦街旁可见一片密集“坟包”，部队遂在此待命，团指挥所设在“坟包”中央。13日天刚放亮，第二六一团一战士发现，“坟包”里钻出一个国民党军官，遂箭步上前将其揪住。军官大骂：“哪个没长眼的敢跟我开玩笑，老子是第五十二军张团长！”战士喝令：“老子是解放军，快投降！”正是万籁俱寂的黎明，一声“解放军”如晴空霹雳，把“坟包”里的敌人全惊醒了。霎时，隐藏在草丛、树林、土堆中坟包样的碉堡火力全开，弹雨瓢泼似的劈头盖脸浇在旷野伏兵身上。第八十七师师长张强生见“坟包”全是暗堡，急令部队撤离，但通道已被封锁。天亮后，从江湾起飞的敌机临空轰炸扫射，泊于吴淞口的敌舰也开始炮击。

月浦街外的第二六〇团，亦遭敌机轰炸和敌舰炮击，工事大半被毁。部队向月浦街冲击，战士们在交叉火力扫射下，像割韭菜一样成片倒下。团政委萧卡下令停止攻击，但命令被炮声淹没……

13日上午，第二六〇团两攻月浦未能奏效，官兵在敌炮火下伤亡近七百人。师长张强生和政治委员王义勋抵阵地前沿侦察，警卫员为掩护师长当场牺牲。此时，驻苏州第八十五师二五三团抵月浦西，沿公路两侧向月浦街发起两次攻击，均未得手，伤亡近三百人。第三次攻击改进了火力组织，连克三座碉堡，歼敌一百余人。

激战竟日，军长胡炳云打电话给第二六〇团副团长梅永熙，得知全团已同月浦街蒋军短兵相接，展开混战。胡军长问：“部队伤亡如何？”梅永熙说：“全团能打的兵尚有一百二十人。”军长又问：“你们团还能继续主攻月浦吗？”梅永熙说：“我们还能拼，现在我团距敌人最近，换上别的部队，只会增加伤亡。”

第二六〇团担架连指导员张德惠《进军日记》载，全团两千多名战士，牺牲四百多人，负伤八百多人，一线士兵仅剩一百二十多人。军师首长决定，刚刚攻占叶大村的二五九团，转攻月浦并担任主攻。第二十九军接连打退敌五次反扑，第二六〇、二五三团和二五九团两个营始终坚守月浦阵地，击毙敌第八八七团团长。

14日，第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二四四团和第八十三师二四七团东西夹攻刘行，也为蛰伏“坟包”的第五十二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所算，伤亡惨重。据时任第二十八军警卫营三连指导员的原济南军区政治委员宋清渭上将回忆，部队挺进刘行，上覆泥土貌似“坟包”的钢筋水泥碉堡突然开火，官兵成片倒下。敌以子母堡群为核心构筑多道阵地，第八十三师二四七团伤亡上百人仅夺取一堡，第二四八团由左翼强攻国际无线电台，激战一夜未果。第二四四团应变较快，改以小群多路实施攻击，连夺十几个地堡。5月15日，第二四四团全部占领刘行，歼敌一个营。

刘行被突破后，杨行也行将不保。敌九十九师从江湾火速驰援。15日，第二十八军八十四师二五二团攻击杨行第五十二军阵地进展艰难，转攻杨行以西朱家宅得手，切断了杨行与大场、江湾联系。该团突入敌纵深立足未稳遭敌反扑，被迫退至朱家宅一线。在太仓补入的国民党俘虏兵混乱中倒戈，全团损失六百多人。当日下午，敌向第二十八军八十三师二四八团阵地发起两次反击，均被击退。月浦、杨行、刘行一线，敌我双方进入相持阶段。

15日，汤恩伯调第二十一军及九十九师增援月浦、杨行、刘行，第二十八、二十九军伤亡达八千余人。黄昏，月浦阵地第二十九军八十七师二五九团指挥所被舰炮击中，团长胡文杰壮烈牺牲。胡文杰原为教书先生，1938年从丹阳投笔从戎。战前，他对在新四军结缘的妻子说：“万一我在上海战役中牺牲，你还年轻，带好孩子，最多为我守寡三年就够了，要是碰到好同志，就嫁了吧！”一语成谶。胡文杰是渡江战役中第四位殉难战场的团长。他牺牲十二天后，上海解放；二十二天后，他的小儿子胡继军出生。

上海国民党宣传机器大肆鼓吹“月浦大捷”，汤恩伯在“祝捷”大会上聒噪：“月浦大捷证明，国军在上海修筑的阵地是铜墙铁壁，坚守阵地的是国军最精锐的部队。第五十二军前方大捷说明，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就有信心确保上海安全！”上海当局组织“有功之臣”乘花车游行。国民党借“月浦大捷”发起舆论战，虽对三野部队无大影响，但却导致上海地下党安插在敌内部的“眼线”因动摇而叛变，使正在酝酿发动上海武装起义的地下党领导人张权、李锡伯、泰然轩等被捕，致使起义流产。

叶飞在部队强攻受挫后开始猛醒：必须摒弃敌人可能投降和速胜幻想，实行近迫作业攻坚，逐段、逐点克服敌人。5月15日，总前委指示攻沪作战不要性急，前沿各攻击部队暂停进攻，迅速构筑工事，动员部队牢固确立打攻坚为本次战役主要战术手段的思想。粟裕等给第九、十兵团下达战术指示：一、肃清敌外围之后，对主阵地攻击应绵密侦察，选择敌突出部或接合部与较弱之敌攻击，楔入敌之纵深。而后，由敌侧背或由内向外打，撕破敌之防御体系。二、集中兵力（应是小群动作，群群攻击），尤应集中火力（实行制压射击与破坏射击）与发射筒轰击一点，以炸药来软化敌钢骨水泥工事，轮番不停地攻击，这样使敌不易重新组织防御，更可避免敌已测量好的火力封锁。三、交通壕作业，迫近敌人。可采用淮海战役歼灭杜聿明时钳形作业交叉攻击，力求歼敌于阵地内。四、发扬孤胆攻击与守备精神，发挥爆破威力，以炸药开辟冲锋道路与歼灭敌之反击部队，进行打战车、装甲车之教育，纠正集团攻击与守备方式。五、指定对空射击部队。

第十兵团重新调整战术，以第二十八军主攻杨行，以第二十九军主攻月浦，调预备队第三十三军参战。第二十九军变急袭猛扑运动战法，为逐堡夺取攻坚战法，力求夺取一点、巩固一点，逐步推进、相机出击。部队冒雨开挖纵横交错的交通

壕缩短进攻轴线，榴弹炮、山炮、步兵平射炮掩护步兵突击，小分队借助壕沟爬上地堡往枪眼里撂手榴弹，战士用长竹竿挑着集束手榴弹在地堡射孔引爆，通过“地平线下的战斗”，逐点逐段攻击，积小成为大成。19日，第二十八军攻克国际无线电台，俘敌一千五百人。

东路第三十军协同第三十一军会攻高桥，汤恩伯调市区第五十一军到川沙白龙港堵截。15日下午五时，第三十军提前一天进抵川沙以南，第八十八师两个团当晚拿下顾家路镇，切断了第五十一军与高桥第十二军联系；第八十九师包围白龙港敌第五十一军军部，第二六六团俘敌五百多人；第二六五团攻占川沙县城，歼敌七百余人。第五十一军军长王秉钺令部队向第二六六团反击，因第三十军炮团急行军掉队，第二六六团一度被敌炮火压着打，三营受敌迂回包围伤亡大。第八十九师令该团调整战术，转守为攻顶住敌反扑。王秉钺冒雨将部队撤往高桥，在顾家宅东北公路上为第三十军第八十八师第二六三团截击。敌三个团由白龙港沿海堤出击，企图突破第二六三团防线，该团苦战一天堵住敌人。晚七时，第三十军炮团克服泥泞河川障碍赶到，掩护第八十九师三个团一鼓作气攻占白龙港，第二六七团直捣敌军部，生擒军长王秉钺。17日拂晓，第三十军全歼第五十一军及暂编第八师，俘敌近八千人，截断敌从白龙港逃跑之路。16日拂晓，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第二七一团、二七三团联手攻取敌第二〇四师盘踞的中山电气公司大楼，两团协力再战，俘敌海防支队司令耿子仁、参谋长谢元良以下二千二百余人。

第二十军发扬“跑得、饿得、打得”的硬朗作风，5月12日连克浦东平湖、李家桥诸要点，俘敌一千二百余人，13日晨进占金山卫、南桥镇。4月28日，汤恩伯在复兴岛面奏蒋介石，拟用海水封锁浦东川沙到金山一段，省下兵力用于浦西。蒋介石嘱此事不要声张，须小心行事。5月7日，汤恩伯密令爆破总队队长杜长城与第三十七军参谋长李友杰去浦东勘察，决定在奉贤柘林段海堤安放炸药，5月17日涨大潮时起爆，并运去一车炸药。因第二十军进展神速，汤恩伯“水漫金山”罪恶计划遂成泡影。

18日拂晓，第三十一军占领高桥外围尹家桥、顾家宅一线，切断了敌第十二军与浦东第三十七军联系。19日，第三十军进攻受阻后，预备队第三十一军九十二师冒雨进至高桥南。淞沪防卫司令石觉速调第七十五军九十五师驰援高桥，并实施反冲锋。

高桥地处长江、东海与黄浦江交汇处，三面环水地势利于敌发扬地炮、舰炮和飞机火力优势。第九十二师二七五团五连坚守蔡司庙阵地，连绵淫雨和一夜一涨的潮水，早已使阵地沟满壕平。五连泡在水中，在立体环绕炮火中迎战驰援之敌，两天下来，一百九十号人仅余十一人。21日晚，本团莱芜战役解放入伍被老连长一盆洗脚水暖了心的连长王忠仁，带八连冲破封锁线来接防，可五连长王廷法却

不肯走。他的连队已是第四次几乎被打光。莱芜、孟良崮、淮海战役那三次，连队整补后又重上火线。可这次在蔡司庙几乎打光，王廷法像丢了魂。他踉跄着扑到一排阵地，像寻找丢失的孩子一样呼唤他的“小鬼班”。一排三班十一个小鬼都不满十八岁。平时行军，“小鬼班”又唱又跳，是连队的加油站；广德追歼战，“小鬼班”一马当先，是连队开路先锋。可现在，小鬼们在哪儿呢？王廷法在被炮弹夷平的战壕里挖呀，挖呀，用血肉模糊的双手把小鬼们的遗体一具一具挖了出来……

“为‘小鬼班’报仇！”“人在阵地在！”钢铁誓言伴着炮声在阵地回响。5月22日上午，敌坦克炮直瞄轰击八连据守的碉堡，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几乎把人的五脏六腑震碎。战士们被冲击波震晕，醒来摸起枪就朝敌开火。突然，一个铁疙瘩砸在王忠仁头上，伸手一摸，原来是从碉堡顶上震落的一颗60迫击炮臭弹。这天，八连阵地落弹八百余发，阵地前的残肢和工事内的烈士遗体触目皆是，硝烟伴着浓重的血腥和阵阵腐臭令人窒息。王忠仁带领三十九名可战之兵，依据尚存工事机动灵活阻击敌人，弹丸之地蔡司庙，成了楔在高桥的一座炸不烂、锤不扁的钢铁堡垒。

为加强月浦高桥一线攻击力量，第三野战军调第二十三、二十五军参战，特纵全部配属第九、十兵团；第十兵团调三十三军九十九师归第二十九军指挥。23日总攻月浦，第九十九师二九六团一连夺取高地后子弹打光，副连长戈振东刺死四个敌人英勇牺牲；战士赵福来引爆炸药包，与冲入阵地的敌坦克同归于尽。当日，特纵远程火炮击中高桥东北海面七艘国民党军舰艇，余舰逃走。

25日午夜，第二十九军八十五师一路会同第八十六、八十七师和第三十三军九十九师各一部直插宝山，战至拂晓俘敌七千多人，缴获敌舰一艘。第八十五师二五三团和第八十六师一部攻占吴淞，俘敌二千多人。第三十、三十一军全歼高桥之敌，毙伤二千六百多人，生俘一万六千多人，断敌海上退路，实现了钳击淞沪目标。

5月的江南绿肥红瘦，战士的鲜血却改变了上海郊野时令的底色。上海战役我军共伤亡三万三千六百八十五人，牺牲七千六百一十三人，其中宝山月浦、刘行一线牺牲五千五百九十三人。宝山县为上海战役战斗最激烈、第三野战军官兵牺牲最多处。

>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第362—36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指出，宝山攻坚伤亡大，“主要是由于渡江作战节节胜利，有的领导滋生了轻敌思想，对敌人败逃后的战斗力消耗和混乱情

况估计过重，对敌人的负隅顽抗和防御能力估计不足，事先缺乏攻坚的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对作战任务提出了过高过急要求；再加上在作战实施中，攻击部队面对敌人坚固设防，采用了不适当的猛打猛冲作战”。[注]

《叶飞回忆录》，第567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

华东野战军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后来在回忆录中说：“过江后胜利的形势发展太快，真可谓‘横扫千军如卷席’，再加上还有接管城市的大量工作，在这种形势下，头脑发热，就容易犯错误。上海战役虽然没有出问题，但战前军事上过于乐观，疏忽大意，吃了苦头后才改正过来，这是应当吸取的教训。”[注]

南京军区司令部战史编辑室：《采访意见选录》，1962年4月。

第十兵团政治部主任刘培善说：“本质的问题是突破长江后战役指导思想上重视不够，有轻敌思想。有人说：上海不是打的问题，而是接收的问题。”“我当时不知道上海是否有工事。”[注]

5月16日，上海外围阵地破防，汤恩伯下令炸毁黄浦江和苏州河所有码头桥梁。23日，汤恩伯上船撤往吴淞口，却迟迟听不到期待的爆炸声。他哪里知道，受命督办此事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王之师，遵华东局命将爆破一拖再拖，直至“拖黄”。

（十）“瓷器店里捉老鼠”

上海战役十天外围战，我军两面钳击吴淞、高桥，汤恩伯拆了东墙补西墙，调市区三个军增援外围致城内兵力空虚，恰好契合了我军市郊与敌决战、保全上海市区的作战意图。

5月17日，总前委电示粟裕、张震：“在敌固守上海的情况下，在部署上似应由南向北实行攻击，因苏州河南为敌防御守备较弱部分。且多面攻击，才能分敌之势，使我易于奏效。”

18日，粟裕、张震报告总前委：“如对沪攻击不受时间、地区限制，我们意见如四面八方向市区发起攻击，北线力求楔入吴淞，而以九兵团先解决苏州河南与南市之敌，而后会攻苏州河北。”

当日，总前委复电粟裕、张震：“进入上海的政治准备业已初步完成，你们攻占上海的时间不受限制。”

5月20日，毛泽东电示总前委：“接受上海的准备工作业已大体就绪，似此只要军事条件许可，你们即可总攻上海。”“攻击步骤以先解决上海，后解决吴淞为适宜。如吴淞阵地不利攻击，亦可采取攻其可歼之部分，放弃一部分不攻，让其从海上逃去。”

先攻市区和灵活解决吴淞之敌，纾解了钳击吴淞进展缓慢之困。21日，第三野战军下达命令，23日总攻上海，以第二十五、二十九军攻占吴淞、宝山；以第二十六、二十九、三十三军楔入江湾、大场、真如地区，并向纵深发展；以第二十、二十三、二十七军进攻苏州河以南市区；以第三十、三十一军牵制高桥之敌。

按照毛泽东打上海要文打，不要武打，要在军事进城的同时，做到政治进城，使上海的破坏减至最小的指示，总前委明确规定，市区作战，力争不使用炮火和炸药。

21日，第二十三军六十八师在松江莘庄镇（今属闵行）歼灭猝然遭遇的国民党青年军和交警第二总队一千四百余溃敌。一个意外惊喜是，该军截获敌准备船运台湾的两卡车黄金。

战役由乡入城之际，一首生死恋歌感动了挥戈入沪的勇士。

22日上午，第二十军五十九师一七七团攻击塘桥以北张家楼、邓家楼。该团三营八连连长周瑜荣决定亲率突击排拔点破障，副连长拦住他说：“连长，你要指挥全连战斗，突击排我来带！”正争执间，指导员白怀一挥手，带着突击排箭一样冲了出去。

白怀原名姜佩桂，江苏泰兴白家庄人，1944年入新四军苏中公学，后任文化教员。渡江前一个傍晚，白怀与同乡、团侦通连指导员吴精国在江边相逢，说了些“私房话”。夕照给波光潋滟的长江镀上一层金，白怀望着如霞似火的江水告诉吴精国，未婚妻跟母亲来部队看他了，还送给他一块手表。吴精国很羡慕白怀有人爱恋，忍不住问：“那为啥不早点结婚？”白怀怔怔地看着吴精国说：“马上要过江了，等打过长江去，解放了全中国，那时再结婚吧！”白怀见吴精国为他惋惜，又解释说，“未婚妻说了，她在家乡一心一意等着我打胜仗回来！”白怀还告诉他，自己的姐妹都出嫁了，未婚妻已转到村子附近白马湾小学教书，下课后就到家中洗衣做饭，照应父母。他说着，双眸生辉，沉醉在幸福中。

白怀指挥八连突击排一鼓作气攻下了二十一个地堡。战斗中，他不时靠近地堡喊话瓦解敌人，二十多名国民党士兵携枪投诚。八连占领了张家楼、邓家楼两个村落，荣立集体二等功。但打扫战场时，白怀却不见了。最后，战友们在子母堡附

近一条战壕中，找到了白怀的遗体。他被厚厚的泥土掩埋，只露出半只脚。连长周瑜荣失声痛哭：“真不该让指导员替我带突击排去冲锋啊！”

战后，第一七七团为白怀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白怀未婚妻和他六个姐妹都来了。未婚妻双眼早已哭肿，上台后抽泣半晌才说：“谢谢首长和同志们这样敬重白怀，也谢谢他给我留下一封信。”她转身向白怀遗像深深鞠了一躬，又说：“请首长和同志们放心，我们全家七姐妹，会照料好白怀双亲的！”说罢，又哭了起来。

5月23日，第三野战军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同时向市区发起总攻。第二十军进攻浦东地区；第二十三军进攻龙华地区；第二十六军进攻沈家桥地区；第二十七军进攻苏州河以北地区。从解放战争我军在华东战场上第一个城市攻坚战潍县战役起，该军即是城市攻坚战第一梯队，此次担负最繁华市区攻坚任务，系陈毅钦点。

这时，粟裕获悉，汤恩伯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等三个司令部已在淞沪上船，除青年军第三十七军外，位高桥、吴淞第五十二、五十四、十二军和第九十九军九十九师及各特种兵团均已接令登船，准备撤往台湾和舟山，遂下令部队当晚发起总攻。

当日下午，第二十七军从虹口挺进上海市区，正面防御的五个交警总队溃不成军，交警第十一总队集体缴械投降。交警第十二总队总队长姜建中，在军营偶遇逃跑中的沪西南守备司令郭履洲，郭佯装视察部队，发给姜一亿金圆券即乘车离开。姜亦化装逃往吴淞。交警第十八总队总队长马柏生因病离队，副总队长茅禹系从四明山新四军打入该部，经与上海地下党联系，24日突然离队。第十八总队因无人指挥，自行由虹口路撤向城区。

第二十七军七十九师二三五团三营进至静安寺，遇敌一辆坦克，营长王玉芝令放过坦克打步兵。敌坦克见状不妙，掉头就跑，尾随步兵也作鸟兽散。三营七连在大世界遇上百逃敌，连长牟起家部署隐蔽，待敌走近时，一声哨响，战士们从附近弄堂冲出来，生俘第三十七军一个连。

第二十七军24日占领龙华飞机场、梵皇渡东站及以南铁路沿线。当日，第二十三军六十七师两面夹击攻占北岸造币厂，俘交警总队一千余人。该师第一九九团七连指导员沈明章，率一排战至东大名路转弯处，歼敌第一交通仓库一个警戒班。得知守敌有六个连队，沈明章命一排用火力封锁门窗，对敌喊话攻心致敌动摇，要求解放军派一名团长进楼谈判。沈明章大声说 ：“我就是团长！ ”随即带文化教员、卫生员进楼，向守敌讲明形势和政策，迫使五百多名敌人缴械投降。

25日凌晨，第二十军渡黄浦江进入浦西占领真如车站，解放苏州河以南上海市区。第二十七军七十九师二三七团在跑马厅截获一辆美吉普，缴获陈大庆刚签署的“戒严令”。

攻城战士过去没见过电灯，毫无电的概念。巷战中电线打落在地，一个战士触电倒下，战友上前施救，又接连倒下好几个。地下党员见此情景，即请电工师傅紧急处理，避免了更大牺牲。

败军亦言勇。国民党青年军第三十七军逃跑未遂，撤回后孤注一掷死守造纸厂以西外白渡桥、四川路桥、西藏路桥一线要点。军长罗泽闿下令，全体将士与阵地共存亡，后退者格杀勿论！

25日，上海攻防战压缩在苏州河南北沿线。据守河北岸东段的是国民党青年军第三十七军罗泽闿部；中段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刘昌义部；西段是上海交警总队七支交警部队。第三野战军二十七军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师，一字儿在苏州河南岸摆开。

苏州河宽约三十米，自西向东横贯上海市区，河上架有十几座桥梁。河东端是寸土寸金的上海外滩，理查饭店、百老汇大厦、英国领事馆、邮政局大楼、圣约翰书院矗立两岸。鳞次栉比的广厦密布轻重机枪，在冒险家乐园构筑了反差极为鲜明的死亡地带。

“济南第一团”第七十九师二三五团团长王景昆下令：一营沿南京路向东，直插外滩外白渡桥；三营沿西藏路向北，直插西藏路桥。一营营长董万华率部抵近外滩，忽见河对岸一群敌人正举着白旗走来。指导员姜呼万担心有诈，令各排利用江堤作掩护，又命在路口架起马克沁重机枪。七班长李严锡带全班冲上外白渡桥过河受降，弹雨袭来，十四人全部被机枪撂倒在桥上！

路口的马克沁重机枪怒吼起来，麇集北岸之敌瞬间倒下一片。

这是战争史上极为罕见的非均衡搏击，居高临下的守敌凭高楼利器无死角瞰制战场每一个角落；而不能使用火炮和炸药的勇士，只能以血肉之躯迎着稠密弹雨向对岸冲击。一个班倒下去，另一个班接上来。一营与敌对峙两小时，始终未能冲破守敌立体交叉的火力网。团长王景昆下令一营移师西进，转攻四川路桥。

四川路桥是连接黄浦区与静安区的过河通道。桥北邮政总局大楼为国民党青年军和交警总队核心防御据点，可瞰制桥面并封锁河道，过河可直抵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和淞沪警备司令部。

一营易桥再攻，重演了外白渡桥上的惨烈场景。一营长董万华一咬牙，将三连五班“渡江第一船”十二勇士调到桥头。组织好掩护火力，勇士们如离弦之箭向桥上冲去，结果全部枕藉桥头。

董万华看着躺在新中国门槛上的英雄遗体，被邮政大楼上的机枪打得“噗噗”直跳，眼中喷着骇人的火。他不顾战场铁令，命迫击炮向邮政大楼连发两弹，结果只留下两个微不足道的白点。

聂凤智得知进击苏州河北岸受挫，急赴第二三五团指挥所，看着横陈桥上的烈士遗体，心头像压上了一摞砖。他用步话机与董万华通话，听到的是沙哑嗓子里冒着火星的声音：“军长，再这样打下去，我的兵就拼光了！是资产阶级大楼重要，还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生命重要？请批准我们向大楼火力点打几炮吧！”

血火中的两难选择，像钢牙铁齿咬噬着聂凤智的心。他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军指挥所，提议召开军党委会统一思想。聂凤智对党委一班人说：“这些楼房现在还在敌人手里，把它夺回来，就是人民的财产。无论有多大伤亡，上级的命令必须坚决执行！”他决心改变战术，以部分部队在苏州河正面佯攻牵制敌人，主力转至翼侧，天黑之后涉水过河，从北岸由西向东抄袭敌人后路。

中共地下党员田云樵赶到第二十七军八十一师师部，建议师里从做刘昌义工作入手巧取。刘昌义系西北军出身，1948年秘密参加民革，战前任第一绥靖区副司令闲职，汤恩伯登舰遥控指挥前，将其提升为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兼第五十一军军长，指挥北兵团第五十一、二十一、一二三军和四个交警总队。刘昌义知道汤恩伯给自己封的是个替死的官，正设法与解放军联系。

25日，田云樵动员南京国防部少将部员王仲民，到苏州河北岸面见刘昌义。第八十一师护送王仲民到造币厂桥（今江宁路桥），王仲民见路边有个烟纸店，便敲开门买了一张大白纸，借店里笔墨写了“和平使者”四个大字，双手将纸举过头顶过了桥，在第五十一军军部见到了西北军老同事刘昌义。刘昌义虽有心起义，但坚持与解放军代表直接通话。田云樵要通第八十一师电话，刘昌义与师政治委员罗维道通话确定面商。当天下午，刘昌义在王仲民陪同下，过桥到第八十一师师部同罗政委谈判，双方达成国民党军停止抵抗，按人民解放军原则改编部队协议。共进午餐时，刘昌义见桌上摆着青菜、萝卜、豆腐、小虾米和清汤，惊讶地问：“你平时也吃这样的菜吗？”罗政委说：“这是招待用的客菜，平时没这么好。”刘昌义慨然点头，提出面见陈毅司令员。罗政委说，陈司令员一时不好找，但可马上见到聂凤智军长。刘昌义到虹桥镇第二十七军军部与聂军长会谈后，写了十多封信给守军将领，要他们放下武器，停止战斗，配合我军打击继续顽抗的国民党守军。

27日清晨，第二十三军六十七师攻占淞沪警备司令部，俘敌七千余人。当日，第二十七军集中消灭第三十七、二十一军残敌。

第二三五团三营进攻的西藏路桥，为青年军第三十七军据守。三营伤亡惨重仍久攻不下，七连指导员迟浩田急得百爪挠心。迟浩田济南战役中代理七连指导员，渡江前夕正式上任。此刻，他在位于桥南一所民房的连部来回踱步，忽觉脚被硌了一下，低头一看是个圆形铁盖。“这是什么东西？”房东说：“这是窨井盖，下面是排污水的‘央沟洞’。”迟浩田忙问：“‘央沟洞’通苏州河吗？”“应该通。”迟浩田抓着他的手问：“能不能从洞里钻到苏州河去？”房东说：“我也不知道，就算能钻过去，也臭得受不了。”“能钻过去就行！”迟浩田对通信员张瑞林说：“你去告诉连长，我下去探探路。”说着，一把掀开窨井盖，一股恶臭顶得他直打趔趄。“指导员，我个头小，先下去看看！”张瑞林抢先跳了下去。

二十三岁的张瑞林淮海战役解放入伍，到七连已立过一次二等功、三次三等功。渡江登陆后，他跟迟浩田冲在最前面，夜暗中尾随一个把迟浩田当成自己长官的国民党兵，进村俘虏了三十多个国民党兵。张瑞林一身污秽从洞里爬上来，喘着粗气报告说：“指导员，‘央沟洞’到头就是苏州河，但臭气熏得人睁不开眼！”

迟浩田一脸惊喜，说：“管不了那么多了，能过去就行！”说完紧随张瑞林跳下洞去。“济南英雄”、排长王其鹏也跳了进去。

“央沟洞”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恶臭更是令人窒息。三人依次摸黑爬行，好在很快看见了光亮。出洞口后，迟浩田机警地观察对岸，见无人注意，三人便泅水上岸，猫腰伏在坡上。

“是不是先端掉桥头地堡？”王其鹏问。迟浩田摇头说：“既然过了河，那就擒贼先擒王，直接端掉敌人指挥部！”“可不知指挥部在哪儿啊！”“老办法，抓个‘舌头’就知道了！”

大桥左侧有一座高大楼房。后来得知，这是抗战中八百壮士浴血奋战的四行仓库。三人摸到楼房附近，乘哨兵转身走去时，一个漂亮的三打一，捂嘴下枪抽腿，一举将其擒获。哨兵见三个浑身乌黑的持枪人，早已吓得魂不附体。“我们是解放军，想活命就乖乖听我指挥！”迟浩田问清指挥部设在楼内，便塞住俘虏的嘴，押着他蹑手蹑脚进了楼，乘电梯来到四楼。一出电梯，又缴了一个国民党兵的枪。三人押着两个俘虏，右拐来到自诩“党国中坚”的国民党青年军第二〇四师指挥部。屋内乌烟瘴气，几个军官模样的“瘾君子”正吞云吐雾。迟浩田手持驳壳枪纵身跃入屋内，高声喊道：“不许动！我们是解放军，谁动打死谁！”

“奶奶个熊，吵什么吵？”众人正三个魂丢了两个，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军官，敞怀腆肚从里屋走了出来。张瑞林用枪对着他喊道：“举起手来！”军官吓得酒醒了一半，颤巍巍举起了双手。迟浩田看清这是个上校军官，立刻缴了他的枪，用驳壳枪抵住他的太阳穴命令道：“快叫你的手下放下武器，不然我先毙了你！”

几个军官纷纷把枪放在地上，迟浩田弄清上校军官是第二〇四师副师长，迫使他打电话命令部队放下武器，从桥上撤下来。王其鹏用枪狠狠戳着他的脑袋说：“不打电话，就要你的狗命！”

《迟浩田传》，第64—69页，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

上校副师长无可奈何地抓起了电话听筒。

再说迟浩田三人下“央沟洞”后，七连长肖锡谦找不到指导员，却发现西藏路桥北头工事里的敌人正陆续撤出，几个观察哨也撤走了。正纳闷时，房东告诉肖锡谦，有三个人钻“央沟洞”去了对岸。肖锡谦想到不知去向的迟浩田，心头一亮，当机立断指挥七连飞快从西藏路桥冲向北岸，指挥两个排控制桥头和据点，自己率一个排冲进四行仓库，将集结在一楼的守敌俘虏押了出来。

第二三五团三营七连未发一枪迫敌师部及三个营千余人缴械投降后，一营乘机冲过外白渡桥，将盘踞百老汇大楼的第三十七军两个营包围。守敌仍然拒绝投降。一营战士用喇叭喊话：“再不投降，就切断大厦水电！”崩溃的守敌从窗口挂出白旗投降。

据守四川路桥北邮政总局大楼的第三十七军另一个师，凭借火力优势继续顽抗。聂凤智派已起义的国民党上海市代市长赵祖康前往邮政总局，动员局长王裕光与守军谈判，促其放弃抵抗，出楼投降。一个多小时后，苏州河北岸残余守军全部被肃清。

上海解放后，聂凤智把十九岁的迟浩田叫到军指挥所，笑吟吟地问：“你是怎么想到从‘央沟洞’里偷渡这个点子的？”迟浩田说：“窨井盖在房东家，一问通苏州河，就下去了。”在庆功大会上，聂凤智把一枚华东三级人民英雄奖章戴在迟浩田胸前。

5月25日，汤恩伯见大势已去，下达了总撤退令。第五十二、五十四、六十九军各五千人，从吴淞口登船逃到台湾；第二十一、七十五、一二三军从上海撤往舟山。总计从海上逃跑五万多人。

上海战役临近胜利之际，政治攻势益发显示出强大威力。

第二十七军七十九师二三五团进至国际饭店附近，内线报告，楼内交警第三大队有投降之意。该团迅速包围饭店和周围高层建筑，团首长派人送信给守军令其放下武器。敌大队副前来联系，说自己看守大楼有功，不愿放下武器当俘虏，企图讨价还价。经再三交代政策，饭店内一千五百五十二名敌人无条件投降。

第二十六军七十八师二三二团二营副营长张希春，带一个班对江湾一座大楼守敌喊话攻心，致敌一个团缴枪投降。张希春留下半个班看管俘虏，带半个班前行四百米又发现楼里守敌一部，遂喊话：“你们师长团长都投降了，就剩你们啦！”楼里有人嚷道：“等吃完饭再说！”张希春高喊：“通信员，通知后面山炮射击！”一营守敌慌忙出楼投降。该师第二三四团三连连长李长法，领兵截住前往吴淞的第五十四军五辆卡车，俘敌一副军长，劝其立功赎罪。敌副军长随李长法乘车一路喊话收容七千多溃敌。战后，张希春和李长法均被评为一级人民英雄。

5月27日上午，据守杨树浦发电厂和自来水厂的第二十一军二三〇师八千人仍负隅顽抗，恰好陈毅来到第二十七军指挥所，听说第二三〇师师长跑到香港，副师长许照在指挥，一拍大腿说：“好办了！许照是陆军大学蒋子英的得意门生，蒋住在上海，快查清他的电话！”聂凤智安排查清电话后，亲自给老先生通话，转达了陈毅司令员对他的问候，给老人家介绍形势、讲解政策，请他出面做许照工作。许照为恩师说服，随即率部投降。

当日，苟延于中纺十二厂的青年军第三十七军另一个师四千余人，硬扛着不投降。攻城部队火力封锁和政治攻心双管齐下，上海地下党不失时机派人进厂做工作，该师残敌全部投降。

粟裕接报，有外国军舰从黄浦江载国民党军逃出吴淞口，或炮击解放军阵地，遂两次将此情况转报中央军委。中央军委指示：“黄浦江是中国的内河，任何外国军舰不准进入，有敢进入并自由行动者，均得攻击之；有向我发炮者，必须还击直至击沉击伤或驱逐出境为止。”外国军舰再度向解放军炮击时，第三野战军炮兵奉命还击，游弋于吴淞口外的西方大国军舰，不得不向公海驶去。

5月30日晚，第三野战军二十五军北渡长江，向拟开往舟山的国民党暂一军发起进攻。暂一军第十一师副师长刘贺田了解我军政策，与第三十二团团长吴鸿斌等人商量，派人到苏北军区第九军分区联系，于5月31日率一千九百八十七名官兵在崇明岛起义。

6月2日，历时四十三天的渡江战役全部结束。作为人民解放军实施战略追击的第一个战役和向全国进军的新起点，这一最后的战略性决战，既有江河突击战、陆地追歼战，又有城市攻坚战、野外阵地战，参战人员之多、交战地域之广、战役样式之复杂，均为中外历史所罕见。此役共歼灭国民党十一个军、四十六个师约

四十三万人，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等一百二十座城市，以及苏南、皖南和浙江大陆广大地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集团“划江而治”以图卷土重来的阴谋，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邓小平5月26日随华东局抵达有“东方哈佛”之称的圣约翰大学（今华东政法大学校园），处理要公后终于有可能了却一桩牵挂多年的心事——他在夫人卓琳陪同下，前往江湾寻觅英年早逝的前妻张锡瑗墓。张锡瑗是邓小平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们重逢于危机四伏的武汉并一起供职于中共中央秘书处。在从事世界上最崇高也最危险的事业中，两人萌生了纯真的爱情，1928年春在上海成婚。

1930年1月，邓小平作为中央代表赴广西领导百色起义，返沪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工作时，张锡瑗正在白克路宝隆医院（现为长征医院）分娩。残酷的命运总是将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击碎给人看，妻子难产且患产褥热生命垂危！临终前，张锡瑗拉着邓小平的手喃喃絮语：“保重，永别”，所诞女儿也随之夭折。时值广西军情十万火急，不允许邓小平留沪料理妻子后事。他挥泪离沪返桂，绕道香港通过地下交通员找到正在筹建秘密电台的中央特科交通通讯科科长李强。李强原名曾培洪，是常熟望族曾朴宗亲。这位出身豪门被目为“匕首之刃”的红色特工，还是研发我党第一台收发两用无线电台的专家型职业革命家，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电信总局局长等职，被誉为“院士部长”。邓小平与李强协调电台呼号、波长及联络时间后，面托他帮助安葬张锡瑗，取道越南海防转赴广西。李强返沪后遵中央军委之命，与邓颖超等人将张锡瑗以“张周氏”假名葬于江湾公墓。

> 姜浩峰：《邓小平与张锡瑗的上海往事》，《作家文摘报》2024年9月6日第1版，原载《新民周刊》2024年第32期；张进：《历史天空的红色电波》上册，第57页，长城出版社2013年第1版。

邓小平和卓琳来到江湾，发现因日军修建机场和多年战乱，张锡瑗墓已不知所踪。在当年安葬经手人李强帮助下，邓小平和卓琳历尽周折，终于在一方水塘中寻得张锡瑗遗骨。总前委书记胜利之日在江湾与前妻天上人间的凄美聚首，令草木亦为之动容。邓小平重置棺木收殓前妻遗骨，择日安置于瑞金花园，1964年迁葬龙华烈士陵园。

上海战役后，邓小平因操劳过度头痛得厉害，病倒了。邓小平女儿毛毛回忆，从1938年走上抗日战场以来，栉风沐雨，艰辛备历，邓小平从未病倒过。为保持强健体魄，他一直坚持洗冷水浴，寒冬腊月也未间断过。但指挥规模空前的渡江战役是一个例外。党中央批准邓小平休假一个月。他携夫人和三个孩子来到北京，一边治病调养，一边向党中央报告工作并研究解放大西南的作战。闲暇时，他还带孩子去颐和园，在波光粼粼的昆明湖上泛舟。四十五岁的邓小平第一次到北

京，就参加了与新中国成立有关的两大盛事：一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8月4日下午，邓小平在北平六国饭店向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的代表作报告。他说：

我们为什么能突破长江，迅速完成京沪杭作战任务,并把我们预计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原因是，除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毛泽东主席领导正确外,第一，我们军事准备充分，指战员英勇。举一个例子说。我们渡江需要船,原有的船被国民党全部拉到江南去了，我们的船停靠在长江以北的内湖和内河里，但是内河的出口当时被敌人封锁了，因此船不能从内河入江。渡江的时候，敌人不明白我们的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其实，我们的船不是从水路出去的，而是从旱路出去的。我们的办法叫做（作）掘渠。我们是把船拖出去的。有时为疏通一条渠道使船出去,要掘几十里（最长的有六十里)的小河沟。为了掘渠翻坝，曾使用了两千一百万个人工。这样巨大的工程是在一个半月的准备时间中完成的，是我们几十万士兵、指挥员包括师长、团长亲自参加这个劳作，以及几十万民工劳作才完成的。再就是我们的人是北方人,北方人怕水。曹操吃亏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在巢湖北部做了多方面的准备，白天夜晚进行演习。在水中习惯了,有把握了，又考虑到船在江心中弹怎么办？许多战士想出了用草圈作救生圈的办法。橡皮圈一打就破了，草圈不怕打。最后我们在内河演习。在渡江准备的过程里，我们集结主要兵力在芜湖至安庆这个地方,所需粮食一亿五千万斤,其中百分之八十是沿江的人民拿出来的。为解决烧柴困难，人民甚至无怨言地拆房子给我们当柴烧。船工一半来自民间，一半是临时训练的战士。江南地下党、游击队配合了渡江作战。我们曾开过江去一支部队，埋伏了十天，敌人还不知道。

《人民日报》2014年8月28日第24版。

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日本客人问邓小平，这一生什么时候感到最幸福？邓小平回答说，是在克服兵力和装备都不如对方的双重障碍，取得解放战争胜利的那三年，尤其是横渡长江的壮举。注

三十五年过去，渡江南进仍是邓小平人生回眸最美的风景。

（十一）“蒋介石再也回不来了！”

1949年5月27日清晨，解放上海的枪声逐渐平息。霏霏细雨中，上海市民开门推窗向外眺望，不由惊呆了——马路两边湿漉漉的水泥地上，身穿黄军装的解放军战士抱枪和衣而卧！

在大上海新生的那个榴花似火的清晨，荣毅仁父亲荣德生开门看到马路旁抵足而眠的解放军战士，震撼之余慨叹：从古到今，何曾见过这样守纪如铁的军队？对比横行上海的外国侵略军和鱼肉百姓的国军，他迅速得出一个判断：“蒋介石再也回不来了！”

荣氏家族可谓中国民族资本家翘楚。1914年到1922年，荣家面粉厂产量占全国面粉总产量的29%，抗战前荣家面粉厂飙升至十四家，还衍生出九家纺织厂。毛泽东评价荣氏家族说：“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1948年，币值改革致上海经济渐趋瘫痪，产业巨子纷纷迁资海外。荣氏父子经慎重考虑，决定留在大陆。

与世俗商人不同，荣氏家族有善与政府打交道的传统，目睹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五子登科”丑行，对蒋家王朝腐败内幕知之最真、感受最切。上海解放前夜，听说解放军要进城，因为怕吃流弹，晚上，荣毅仁让家人睡在楼下，自己在客厅静观待变。

第二天清晨六时，公司一位厂长开车来到荣毅仁家。荣毅仁吃惊地问：“你是怎么过来的？”厂长告诉他说：“解放军都睡在马路上，走路没事。”荣毅仁忙问：“这是真的？”厂长点点头说：“是真的！”他疑信参半站起身，穿好外衣，开车出了门。

一路上，只见解放军官兵井然有序露宿街头，成为新生大上海一道亮丽风景。世道真是变了！荣毅仁思索着街头所见赋予这座城市的意义，既新奇，又感动。汽车行至成都路浦东大厦附近，执勤解放军战士拦车告诉荣毅仁说，前面敌人还未完全清除，不安全，劝他不要再向前走了。荣毅仁向战士摆手致意，由衷赞叹：“解放军的军纪真好，同国民党军队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蒋介石再也回不来了”，遂成父子两人的共同心声。

时任第三野战军供应总站副总站长范征夫回忆：“荣毅仁当（上海市）副市长时，当面告诉过我，他就是看到解放军不住民房睡马路这动人的一幕，才下决心要他的工厂赶快复工。”胜利之师睡马路，成了荣氏家族传人在历史巨变中进行人生和道路选择的路标。

5月25日上海《大公报》载：“此次解放军夜间进入我市，使数百万人民免受惊恐。”次日，该报又以《解放军纪律太好了》为题报道：“解放军的纪律和作风，已成为全市市民最主要的话题，马路上群众议论纷纷，到处都听见赞扬和感激之声。”

第三野战军九兵团上海战役总结记述：“初入市区的部队，两三夜均在马路边露宿。时值雨季，连夜下雨，由于从军部起干部均能以身作则，战士亦都有觉悟，毫无怨言。市民再三邀请部队进屋休息，均被婉言谢绝。市民送的慰劳品以至开水，均谢绝不受。部队三天无开水喝，吃由三十里外送来的冷饭。有一工厂工人送慰劳品给部队，双方推让十次之多。工人感动地说：‘这真是我们的队伍。’”“闸北水电公司的哨兵发现水管坏了，当即找人修理，并向公司交代清楚。据该公司工人说，该厂英国人从来不说中国一点好处，这次英国人反映：‘这个部队好，非常负责，纪律好。’”

第九兵团进攻浦东时，美、英、葡等外商仓库和煤油公司等被国民党军盘踞，外商托人要求解放军暂不炮击，答应帮助劝降。部队接受其要求，和平收缴了守军枪械。事后几国领事均向部队道谢。外电一致报道，这是“他们所见过的最好的军队”。

《竺可桢日记》，第1255—125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第1版。

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1949年5月日记为入城部队存史：25日：“八点即出外视察。自岳阳路至永嘉路即见青年穿草绿色制服，上写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在左胸上，在永嘉路与衡山路席地而坐者数百人。”26日：“解放军在路站岗，秩序极佳，绝不见欺侮老百姓之事。在研究院门前亦有岗位，院中同人予以食物均不受。守门之站岗者倦则卧地，亦绝不扰人，纪律之佳诚难得也。”27日：“乘22路公共汽车赴大世界……人山人海如上元、元旦假日状态……时有学生带锣鼓游行，且见女学生插鲜花于解放军之衣襟上……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

民国初年以“南沈北于”驰名的书法家和诗人沈尹默，亲睹解放军的严明纪律，激动之余挥毫写道：“秋毫无犯取名城，大炮昂然未许鸣；晓起居民使惊动，红军街宿到天明。”

入城解放军睡马路，这一新闻风靡大上海，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许多群众为了一睹现场，专门跑到南京路等到深夜。

原昆明军区司令员张铨秀，时任露宿上海街头的第二十七军八十师师长，拂晓巡查部队遇一须发斑白的老人。老人问他：“你是负责南京路区域防务的军官吧？”张铨秀点点头说：“老人家，您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做的？”老人笑道：“今晨我专程从徐家汇赶到南京路，看你们官兵露宿马路的实情，甚为感动！”张铨秀说：“老人家这般关心部队，我们很感谢！”老人慨然道：“你们进入上海忘我为民之举，远远超过干戈相戟而胜的影响，全市民众极为铭感。”张铨秀说：“毛主席、朱总司令教导我们，解放上海是为了建设上海，部队官兵都牢记

在心。”老人听后颇为动容，脱口而出：“仁义之师必胜，得人心者必胜！古往今来，莫不如此！”

远东第一大都市新生之晨，胜利之师睡马路征服了上海人民。

曾在南京路附近睡过马路的上海兵、第二十军五十九师一七五团二营副教导员万中原回忆，一些市民喜欢盯着哨兵没完没了地看，从帽徽、胸章、手中的武器，瞧到腿上的绑腿和脚上的布鞋，看得我们年轻的战士脸绯红。我的一些亲友同学说，上海这个地方可以说什么兵都到过，英、美、法、日、意等国家都曾派军到上海租界驻防，日本还两次在沪发动侵华战争。公共租界的万国商团，招募的兵大多是沙皇俄国的白俄。西方军舰差不多都停泊过黄浦江。中国军队从清朝骑兵开始，什么太平军、新军、北伐军、中央军、和平军都在上海出现过。上海百姓议论解放军“从没有见过介好的军队”，这是凭自己的见识比较出来的。

“不入民宅”这条设身处地为六百万上海市民着想的军规，把亘古未有的仁义之师形象，矗立在中国最醒目的窗口。“睏马路交关好！”江山易主时，上海人民在马路上认识了自己的子弟兵。

十万大军睡马路，东西方有识之士通过这张无形名片，认识了即将在全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率部朝乾夕惕进京“赶考”之际，人民子弟兵在舍生忘死奋力交出“瓷器店里捉老鼠”合格答卷的同时，又给上海市民带来感天动地的“见面礼”。

人在做，天在看。入城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感人举动，终于使上苍动容并赋予历史一个闪光的定格。5月27日拂晓，梅雨初霁，晨雾缭绕，闸北方向交战的枪声时密时疏，歼灭国民党青年军的战斗已近尾声。在南京路大新、新新、永安、先施四大公司门前，露宿马路两个晚上的第二十军五十九师副师长戴克林，清晨穿戴整齐正要检查部队，忽听有人喊：“老戴，我跟你一起去！”

戴克林扭头看去，挎照相机的年轻军人，正是第三野战军新华社前线分社摄影组组长陆仁生。1940年春，戴克林作为战斗骨干，随新四军第三支队副支队长谭震林从茅山到常熟新“江抗”任支队长。两个月后，陆仁生走出常熟白雪照相馆，在徐市参加新“江抗”，成为戴克林所在一支队的一员，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与那些一投身革命就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骁将迥然不同，陆仁生投身革命是一个从边缘到中心，由开始在基层从事实际工作到走上领导岗位，复又回归专业摄影的过程。这一人生曲线，赋予他的光影生涯丰富的政治底蕴。1940年到1943年，陆仁生先后任过江阴祝塘区区长、宝应汜水区区长、江都丁埝区区长、

沙洲县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前程看好。不过，这个少年时就对摄影如痴如醉，入职后在上海滩受过海派美术摄影艺术熏陶的年轻人的心，是不安分的。他的脑海始终萦绕着那个妙不可言的光影世界。战争摧毁了人世间的美，又在逼近人类生死底线的搏杀中，让正义、良知和人性最纯真的美在炮火硝烟中顽强绽放。时时与为国家存亡和民族大义殒身不恤的志士为伍，那么多新奇瑰丽的场景和撼人心灵的瞬间，令陆仁生热血沸腾、惊叹不已。看到部队缴获的照相机，他的手又开始痒痒了，渴望记录烽火年月的时代影像，留给历史，传诸后人。1946年1月，陆仁生如愿以偿调华中野战军，任新华社前线分社摄影组组长。

人生阅历是一种零存整取的修为，复合经历必然产生复合素质。作为在战火中捕捉特定瞬间的历史定格者，陆仁生基于综合素质的新闻敏感，很快在他的镜头和作品中显露出来。1948年4月，陆仁生抓拍了朱德视察华野的《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研究作战计划》，为从井冈山走来的两位元勋传神写照;孟良崮战役，陆仁生小中见大，于部队穿插奔袭途中，拍下了战士们在路边互挑脚疱的镜头;淮海战役中，陆仁生拍摄了战地写真《出征归来》，展现战略决战中战士的风采；1948年12月17日，陆仁生在蔡洼村拍摄了《淮海前线总前委》……革命要求每个人都做一颗服从党安排的螺丝钉，但螺丝钉安放在哪里作用又大不相同。陆仁生不当部长当记者，苏南从此少了一位干练的领导者，但中国有了一位用陆氏语言诠释革命历史的战地摄影家。看到他独具只眼撷取的堪称历史血肉的经典瞬间，你会由衷赞叹：人生变轨值得！

晨光熹微，天色大亮。戴克林与战地巧遇的老战友陆仁生相偕走到南京路和西藏路路口，一个震撼人心的画面扑入眼帘：一排排征衣未解的部队官兵，幕天席地搂枪睡在高楼耸峙的马路上！

虽说三野战前就规定部队入城后一律不住民房，但在上海最繁华的大街上，目睹胜利大军睡马路这一从未见过的场景，联想为保护国际大都市上海，官兵作战不使用火炮和炸药，用生命和鲜血开辟胜利道路，陆仁生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击。为胜利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爱人民严守纪律秋毫无犯，这样的军队古今中外都是填补历史空白的。陆仁生的心激荡了起来：眼前的画面，不正是仁民爱物的子弟兵，用血火大义谱写的爱民史诗吗？

1949年1月31日，第四野战军四十一军政治委员莫文骅，率部冒雪夜入北平城不惊动市民，而是和衣躺在路旁屋檐下和过道里。毛泽东来到北平听叶剑英汇报闻听此事，甚为动情，特意委托朱老总去看望第四十一军部队，对模范守纪的官兵表示嘉勉，感谢他们为党和军队赢得荣誉。莫文骅感到遗憾和追悔的是，入城部队雪夜露宿北京街头，没有谁想到为可爱的官兵留下一张照片！

多少震撼人心的场景如白驹过隙，而敏锐和情感则是留住历史的生花妙笔。陆仁生端起张爱萍从大连购置的德国徕卡照相机，娴熟调整好光圈速度，用半蹲的姿势，从略俯的角度抓取两排战士当街和衣而眠的景象，以管中窥豹的手法，着意突出近景几位战士的睡姿，有的紧抄双手沉入梦乡，有的酣睡中还紧握钢枪……随着相机清脆的“咔嚓”声，在1936年诞生的海派商业文化建筑上海第一百货商业中心门口以西，极具象征意义的入城解放军战士露宿上海街头的场景，被他定格并写入历史。陆仁生将洗好的照片交戴克林，经第二十军政治部审查，同意送报纸发表。

5月30日，这幅题为《夜宿街头》的照片在创刊第三天的《解放日报》画刊刊出后，新华社播发通稿，海外通讯社纷纷转载，一些有影响的报刊在显要位置刊登，在读者中引起很大轰动。

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看到《夜宿街头》，感慨地说：“我这才明白，这支军队为什么能够打败美国武装起来的蒋介石数百万大军。”美国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谈及这幅照片出言精彩：“这是红色中国第一张‘上海公报’！”曾大肆炒作解放军误入美国驻华使馆的美国之音，也五味杂陈报道了解放军在上海睡马路的新闻。

革命战争年代，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形象代言人。陆仁生基于多岗位磨砺的政治敏感，凭借在光影世界锲而不舍探索形成的艺术直觉和精湛摄影技艺，出色完成了这次形象代言，把胜利者的第一印象，储于人民和历史的记忆。至此，京沪杭战役最后一战上海战役，以我军军政全胜而告结束。

上海战役胜利多年后，一位法国资深记者采访陈毅时问：“在你一生中，什么时刻最使你感到愉快？”陈毅微微一笑说：“最愉快的时刻吗？那就是进上海。这是半殖民地中国历史转折的一个标志。这在我们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历史中，是从未有过的事情。”陈毅怎能忘记，1921年，他和蔡和森等上百名留法学生进驻里昂大学失败，被法国当局武装押送回国，在外滩公园，他看到了那块刺痛眼睛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二十八年后，陈毅出任新中国首任上海市市长。1993年5月，陈毅铜像矗立外滩南京东路路口。这是历史对造就兼资文武元帅的中国共产党的认可。

从窑洞灵光到太行论衡，从豫东破局到淮海鏖兵，渡江南进由精兵跃进到雄师漫卷的升华，生动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顺应历史趋势旋转乾坤的远见、智慧与魄力，彰显了一个在光明与黑暗大搏斗中，为人民福祉不懈奋斗英勇牺牲政党的光荣与梦想。

与解放军抢滩上海精彩亮相赢得人民喝彩相反，1946年6月从重庆还都南京的国民政府，因被人民唾弃，驻宁仅两年半又匆匆跑路，四徙其都：1949年1月由南京而广州，而重庆，而成都，而台北，蒋介石尝尽了“冬天饮寒水，雪夜渡断桥”的滋味。

> 蒋经国：《危急存亡之秋》，《蒋经国自述》，第189页，团结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4月24日，南京失守同时太原被陷，蒋经国内心之沉痛莫可言状，“乃决计将妻儿送往台湾暂住，以免后顾之忧”。当天，蒋经国处理溪口事务以备永别。行前离情别绪，从其25日日记可见一斑：“上午，随父亲辞别先祖母墓，再走上飞凤山顶，极目四望，溪山无语，虽未流泪，但悲痛之情，难以言宣。本想再到丰镐房探视一次，而心又有所不忍，又想向乡间父老辞行，心更有所不忍，盖看了他们，又无法携其同走，徒增依依之恋耳。终于不告而别。天气阴沉，益增伤痛。大好河山，几至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谁为为之，孰令致之？一息尚存，誓必重回故土！”[注]

5月29日，国民党政府何应钦内阁总辞职。李宗仁任命居正为行政院院长。6月1日，国民党政府立法院否决李宗仁提名的居正组阁，6月3日通过阎锡山继任行政院院长案。

1949年10月11日，民国大佬纷纷做树倒猢狲散状：蒋介石当日潜赴广州，随即仓皇回台；阎锡山径直逃往台湾；陈立夫、朱家骅、徐永昌、叶公超等则分别逃往重庆、台湾、香港等地；李宗仁仍返桂林，11月20日由南宁飞抵香港，之后托病不理政务。12月5日，李宗仁以“就医”为名飞往美国。离开大陆前，李宗仁接受学者杨兆龙的建议，释放了在押的共产党。

1949年4月17日上午，在大江南北奔波半月有余的黄绍竑，带着一生征战沙场与政坛的疲惫和风尘，从广州飞抵香港，远离政治旋涡和尘世喧嚣当起了寓公。不久，与黄绍竑一起赴北平参加和谈的刘斐代表，也身心俱疲回到香港，并以幕僚之身再去广州，面见李宗仁和白崇禧作最后的忠谏，但无功而返。

不过，面对中国几千年未有之大变革，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黄绍竑和刘斐，无法割舍他们对这片故土的挚爱与情结。他们纠合在港国民党中央委员、立法委员和其他人士，联合发表通电与蒋介石断绝关系。恩恩怨怨几十年，黄绍竑这个新桂系的“军师与灵魂”，终于下决心割断了自己与蒋介石的政治脐带。

上海解放后，中共新任驻港负责人乔冠华请黄绍竑和刘斐到《华商日报》总经理家吃饭，转告周恩来电邀他们赴北平参加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那一刻，黄绍竑感到“历年向往中国共产党的心愿竟然实现了”，喜不自禁。几天后，乔冠华又通知有船北上，黄绍竑急忙回家收拾行李。夫人蔡凤珍问：“又去什么地方？”他说：“坐船去北平。”蔡凤珍说：“你奔走了大半年，还不够累的？和谈已经破裂，还有什么可奔走的呀！”黄绍竑脸上泛起平素少见的光泽，“这回去北平，是应邀参加共产党召集的政协会议！”

黄绍竑赶到集合地点，在一小酒家用餐后，乘汽艇驶入专泊装载危险物品船只的“禁海”，登上一艘挂着葡萄牙国旗的轮船，驶经澳门办过手续，向北驶往汉城。月光皎洁，海天一色。黄绍竑伫立甲板，遥想半生坎坷、一世离殇，再回首已是恍如梦中。

1927年8月，国民党军驻粤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分别调钱大钧、黄绍竑部各九千人，堵击周恩来、贺龙、叶挺所率南昌起义部队主力，钱部在会昌被歼六千余人，黄部9月在洛口被击溃。1939年2月，周恩来赴皖南视察新四军军部，在浙西行署会晤国民党浙江省主席兼第五战区司令官黄绍竑，鼓励其不受蒋介石排挤影响坚定抗日。而今，随着轮船从香港起航，黄绍竑与蒋介石和新桂系的关系已彻底终结。当晚，他在《木兰花》词最后一联写道：“海天明月最关情，深夜照人明里去”，以景寄情，抒发对中共和毛泽东、周恩来的无限感激与景仰。轮船经汉城从黄海水域驶入青岛港，黄绍竑一行由此乘火车至济南，转车顺抵北平。

8月13日，黄绍竑等四十四名在港国民党立委、中委，联名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宣布脱离蒋介石政权，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号召国民党内的爱国分子向人民靠拢，为建设新中国而共同努力。27日，邓召荫等九十一人发表声明参与行动，随后王普涵等十三人又宣布参加这一义举。

9月21日，特邀代表黄绍竑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当晚又同张治中、傅作义等国民党起义将领出席毛泽东、朱德举行的宴会。10月1日上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黄绍竑为政务院政务委员，参加中央人民政府有关部门领导工作。

当失败潮水般向蒋介石涌来时，退路和出处成为最现实、最紧迫的选择。西南是蒋介石的首选。此前已迁成都的黄埔军校，自然是最可靠的反攻基地。12月下旬，蒋介石抵成都即入住该校。应蒋经国振奋师生精神提议，蒋介石身披黑斗篷，出席在大陆最后一次阅兵式，神情凝重地讲了七分钟话。然而，正当阅兵总指挥向他报告时，诡异的一幕出现了，阅兵场中央的旗杆突然断裂，悬挂杆顶的青天白日旗坠落在地。阅兵场鸦雀无声，一片死寂。蒋介石面如土灰，阅兵式草草结束。此时，军校三位与中共取得联系的少将正酝酿实施“捉蒋”计划。起义

虽因一位少将变卦而流产，但更惊人的事情发生了。12月15日，成都黄埔军校三千余人在郫县宣布起义。黄埔学生易帜，给了素以该校为骄傲的校长致命一击。蒋介石大骂“黄埔败类”，匆忙逃离成都。

当月，国民党宣布，“政府”由成都迁设台北。

西南失守后，退路只剩海南和台湾可供选择。余生栖身何处？蒋介石一时六神无主。“国大代表”、历史和地理学家张其昀建议去台湾。蒋介石无奈点头。12月10日，蒋介石至死不能忘却的悲摧的日子。阴霾笼罩着物华天宝的成都平原，隆隆炮声预示着人民解放军进军天府之国的脚步已经迫近。蒋介石挥泪写下“艰难革命成孤愤，挥剑长空泪纵横”两句诗，黯然赴成都机场，与蒋经国乘机向东南飞去台湾，离开了他驰驱半生的中国大陆。

梦断长江而无法分治南北，12月3日，白崇禧逃至海南，翌日亲率十几艘舰船至钦州、北海海面，接应残部从钦州撤至海南。苦等四天四夜，不见一兵一卒。李、白曾依靠这支部队统一广西，打出半壁江山并称雄半世，如今成了光杆司令。9日，白崇禧终于绝望而归。山河飘萍，李、白关系出现裂痕，李宗仁未选白崇禧当国防部长。白崇禧骂他“抓不起，放不下”，是“糊不起的烂泥巴”。蒋介石为以白制李，向白伸来橄榄枝，先派上海市原市长陈良抵琼为白补发可观军费，又派陆军副总司令罗奇持其亲笔信邀白去台“共商善后”，三派说客刘文岛、杨动炯登岛递话，说蒋想让白当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看透蒋介石把戏的李宗仁，宁可身老异国他乡也不与蒋合作。白崇禧却动了心。1949年12月30日，在蒋介石催促下，白崇禧拟从海口飞台湾。至交立法委员何遂提醒说：“回台必难免一死，应乘机起义，响应共军。”白崇禧沉默良久说：“我自追随蒋公北伐以来，殆逾二十载，既处遇顺境，亦处遇逆境。一生一世，历史第一，我必对历史有所交代，生死利害，在所不计，君勿为此喋喋也。”这只从南京挣脱出来的笼中鸟，几经翻飞，终又投入蒋介石布下的罗网。李宗仁赴美，黄绍竑北上，白崇禧转台，义结金兰的“桂系三杰”，从此天各一方。

1950年新正，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循例到白宫贺年，美国新闻界揶揄说：“这可能是最后的一次。”

当一切希望幻灭之际，1950年1月13日，滞留美国经年的宋美龄黯然回到台湾。离美前，英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成为首个抛弃蒋介石政权的西方大国。宋美龄撕下矜持优雅的面纱，面向媒体对英国政府作了近乎恶毒的攻击。二次访美归来，大陆已无立锥之地，宋美龄只能寄居台湾隔海眺望，温梦故园。

1965年7月，流亡美国十六年的李宗仁历尽艰险回归祖国。1949年4月，周恩来托黄启汉转告，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南京政府和谈代表也劝

他解放军入城时不必离京，或径飞北平享中共上宾之礼。而耽于“划江而治”幻想的代总统，却将电文掷于一旁。几经蹉跎，李宗仁还是从大洋彼岸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到来了。青春戎马、晚节黄花，李宗仁最终在新中国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而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白崇禧为蒋介石所惑落入圈套，赴台后处处受制。李宗仁回归后，白崇禧失去了牵制李宗仁的最后价值，在花莲打猎险遭军统暗杀，转年莫名暴亡家中。

（十二）“紫石英”号夜遁长江

三江营举世瞩目的炮战，不觉过去了三周。从战场上的真刀实枪，到谈判中的唇枪舌剑，在扬子江另一个特殊战场上，军事外交斗争中的解放军指挥员，在与蓝水海军过招中经受着新的磨砺。

1949年5月13日，“紫石英”号舰长克仁斯，到镇江向袁仲贤将军递交布朗特海军上将的电函，称“紫石英舰偶然事件”的讨论已由英国大使在南京开始，此属高级外交范围之事，我无权与解放军之间作关于这一不幸事件责任问题的任何讨论。对“紫石英”舰的扣留当然会产生最严重的国际后果，云云。

袁仲贤指出，英舰侵犯中国内河及闯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阵地的行为，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原谅的。所谓在南京已开始的谈判完全不确。在英舰未履行其应负责任之前，我不准备讨论其安全驶离的问题。关于英舰应履行的责任，可与我的代表康矛召商谈。

5月18日，康矛召受命以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炮三团政治委员的身份，致函“紫石英”号舰长克仁斯少校：中国人民解放军镇江前线司令部决定，对于英国海军军舰4月20日侵犯中国人民解放军阵地之暴行及其所应负的责任，通过谈判解决。我前线司令部已指派康矛召上校为谈判代表，英方应指派相应代表前来谈判。

康矛召向克仁斯递交的备忘录，要求英舰代表履行下述责任：一、承认英国军舰上述行为是错误的，并向我军道歉；二、赔偿我军及当地人民损失；三、我方准备在英方履行上述责任之后，即与英方讨论肇事英舰及其人员撤离长江办法；四、本备忘录所列各项请即转报英国远东舰队总司令。

5月22日，袁仲贤向克仁斯表明，如已同意前述方案，即可在正式换文后放行“紫石英”舰。换文内容包括：英方承认基本错误；我方允许“紫石英”舰驶离；其他问题留待以后谈判解决。

24日，布朗特海军上将表示欢迎我方建议，希望由此达成双方同意互表遗憾和迅速放行“紫石英”号协议之基础。

康矛召上校表示，中方没有什么要向英方表示遗憾的。

25日，布朗特致袁仲贤电请求，正式照准“紫石英”号安全下驶，并承认“紫石英”号未获同意进入解放军之前线地带，深信阁下对造成双方伤亡将分感本人之深切遗憾。

5月27日、31日，克仁斯又接连转来布朗特致袁仲贤电函，诡称“紫石英”号系执行“和平使命”而被炮火击伤，其他英舰系前往救援，因而“英国诸舰对此事件没有责任”。

5月31日，康矛召在东窑头村约见克仁斯，针对英方电函所谓此事会“产生最严重的国际后果”等威胁性语言正告英方，中国人民经过多年艰苦战斗赢得了胜利，不会为任何威胁所屈服。克仁斯否认英方有威胁之意，表示布朗特对此“实深感遗憾”。康矛召表示，布朗特没有提到英舰的侵犯行为和应负责任，仅仅表示遗憾是很不够的。布朗特至今未指派他的代表，从何表示英方诚意呢？克仁斯称，英国驻华使馆海军武官董纳逊就是英国海军代表。康矛召要求布朗特予以确认，克仁斯却含糊其词。

鉴于我军正全力追歼逃敌，总前委认为，“不宜在这种主要表现为军事性的谈判中长期僵持”。经报中央军委批准，我方决定做出一定让步，但坚持英方必须首先认错。6月20日，袁仲贤将军约见克仁斯，郑重表示，如布朗特派出的代表确能尊重事实，承认英舰未获许可闯入我内河和我军前线地带的基本错误，则我方也可考虑将放行“紫石英”号与要求道歉和赔偿问题分开解决。

7月5日，克仁斯在征询我方对布朗特电函意见时，提出可否接受如下说法：“我承认皇家海军‘紫石英’号及其他三艘肇事英舰未得中国人民解放军许可，进入中国内河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前线地带，是英方在长江事件上的基本错误。”康矛召提出，将英方表述的第二句改为：“擅自侵入中国内河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区。”克仁斯提出，可否将他所说的“进入”改为“侵及”呢？康矛召说，用词问题可下次晤面时商定。但英方很快又出尔反尔。

7月11日，布朗特再电袁仲贤，全然不提此前说过的英舰进入我军前线地带和英方的“基本错误”，只称“以致引起误会”，称这是“坚定不移的最后文件”，遭康矛召驳斥。

有关领导分析认为，克仁斯既是英国驻华使馆海军副武官，又是“紫石英”号舰长，接受使馆和远东舰队双重领导，其出尔反尔，可能是外交和军事系统意见分

歧所致，对英方缺乏诚意提高了警惕。

7月13日，袁仲贤将军致电布朗特海军上将，敦促其正式授权英方代表举行谈判并速来商谈。布朗特翌日回电诡称，他指示海军武官董纳逊代他签发授权书，如不能基于此电达成协议，他愿乘驱逐舰溯江前来，请允许他派机将授权书送往南京。

7月29日，康矛召动身前往南京，30日夜却获悉，此前经我方允许已补充六十吨油料的“紫石英”号，于当晚九时拔锚下逃。

7月30日夜，台风经过沪宁杭地区，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有不俗表现的英国海军再演危中撤退绝技。晚九时，“江陵解放”号客轮驶过，舰长克仁斯未及请示，即令水兵砍断锚链尾随潜逃。执行监视任务的哨兵即通知我驻镇江大港第二十五军山炮团，九时五十分，大港炮兵向“紫石英”号发炮警告，该舰也开炮还击，长江再起炮战。夜暗中，“紫石英”号追上“江陵解放”号客轮，强行傍靠其左侧闭灯行驶，大港炮兵误中客轮，致其起火下沉。

“紫石英”号酿成“江陵解放”号数百名乘客伤亡惨剧后继续东逃，遭我沿江步兵战防炮拦击轮机受损，在天生港修理后继续下行。第二十五军山炮团通知下游江阴要塞，副司令员李安邦赴黄山炮台指挥，特纵步兵沿江巡逻。“紫石英”号临近江阴要塞时关闭轮机，闭灯顺流而下，紧贴南岸石壁通过黄山炮台。处于观察死角的炮台发现东侧有黑影游弋，火速移动炮架调整射击角度，“紫石英”号已在夜暗中逃遁。江阴要塞速派部队携两门战防炮和四挺机枪乘汽艇追赶，并按估计该舰抵吴淞口时间通知驻防的炮十八团做好战斗准备。但该团始终未见“紫石英”号踪影。

后查明，7月31日黎明前，“紫石英”号趁长江水涨，避开吴淞口航道，撞沉一艘木船，从崇明岛北口驶入东海，逃出生天。

1949年7月31日，毛泽东得知“紫石英”号逃脱，指示新华社社长胡乔木就此事撰写新闻，8月3日在《人民日报》一版刊出，谴责“紫石英”无耻逃逸致我江轮沉没淹毙数百乘客罪行。

炮击英舰，是终结中国半殖民地时代的标志性事件。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1840年鸦片战争中由英国开其端，1949年解放战争中又由英国收其终。“紫石英”号扮演了历史终结者的角色。

1952年，骁将陶勇奉召从朝鲜回国。毛泽东说：“那么喜欢打军舰，就去海军吧！”陶勇由陆入海，先后出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

当年处理长江炮战的两国军人，不乏殊途同归奉身外交者。

营救“紫石英”号时，英国驻华使馆三等秘书尤德毛遂自荐出面调处，“促使解放军放松守备”，帮助“紫石英”号逃脱，荣获英国政府MBE勋衔。1953年，尤德任英国驻北京代办处二等秘书；1974年至1978年任英国驻华大使；1982年出任第二十六任香港总督；1986年12月率香港高层经贸代表团抵京主持两项开幕典礼，5日因心脏病突发睡梦中病逝于使馆，享年六十二岁。

1950年，袁仲贤任中国驻印度首任大使，1956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康矛召先后任中国驻柬埔寨、毛里塔尼亚大使，中国驻比利时大使兼驻欧共体使团团长。他用炮镜代替望远镜头拍摄的被我击伤的“紫石英”号英舰照片，成为权威而珍贵的历史见证。

1949年8月11日，“紫石英”号修复后驶回香港。1957年，该舰本色出演电影《“紫石英”号的故事》，因模拟解放军炮火的炸药用量过大，炮伤“复发”难以修复，只得拆毁憾别皇家海军。

卷尾

进军正未有穷期1949

年5月23日，上海战役正值白热化，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向全国进军的部署》，调整各野战军进军计划：

第二野战军向西南进军，经营川、黔、康诸省（7月16日增加滇），并争取年底或年底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

第三野战军向福建进军，并经营苏、皖、浙、闽四省；

第四野战军除经营湘、鄂、赣三省外，还要向两广进军。

照此部署，本年度第二、三、四野战军在原定解放九省大部或全部基础上，又增加了解放粤、桂、川、黔、滇等五省任务。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二卷1949.3—1950.7，第58—59页，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第1版。

26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我们建议不要再推迟中国民主政府成立的日期。现在中国已无政府。中共中央不能称作政府。国民党政府实质上已经不能作为政府。中国没有政府，从对内政策观点来看是很危险的，从中国的国际地位来看也是很危险的。”斯大林指出：“英国、法国、美国不会不懂，人民解放军接近印度支那、缅甸、印度边境，在这些国家，甚至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会造成一种革命形势。”“因此帝国主义者会想尽一切办法，进行封锁或与人民解放军发生武装冲突，以便将南中国控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不仅如此，英国或美国可能会在向南挺进的人民解放军主力后方——青岛派部队登陆。”“英国和美国还会利用其他港口，例如天津的塘沽港，在人民解放军的后方登陆。”他建议：“（1）不必急于认真准备人民解放军向南进军到印度支那、缅甸、印度边境；（2）从向南进军的人民解放军主力中挑选两支优秀部队，调往天津和青岛，增加这些地区的兵力，预防敌人部队登陆；（3）暂时不要缩减人民解放军部队的人数。”

斯大林充满战略警觉的建议，引起中共中央重视。为防止美国海军协同国民党军袭扰人民解放军后方，中央军委确定，太原战役后，直属中央军委的第二十兵团调赴秦皇岛、天津地区布防；以第四野战军四十二军在河南担任平时剿匪，有事增援华北任务；宁夏战役后，直属中央军委的第十九兵团准备随时增援华北；第三野战军除以一个军加强山东军区兵力解放青岛、长山列岛，以第十兵团三个军进军福建外，主力十一个军全部位于沪宁杭及附近地区。

至此，南攻北防、稳中南进的战略格局已然形成。

远东战略格局的变化，使徘徊不去的雅尔塔幽灵再度东顾。

1945年9月，为应对苏联驻军旅顺、维持东亚战略均势，美国派第七舰队进驻青岛。1949年5月，随着第三野战军会攻上海和第三十二军及华东军区警备四旅合围青岛，视上海战局进展最终决定进退的美国驻青海军司令巴杰，无奈移师舰上。25日，上海解放在即。盘踞青岛近四年的美国海军，于下午四时黯然撤离青岛。

马上得天下的中国共产党人，渡江之后并未停止南进步伐。

在判定美国出兵干涉可能性已很小后，中共中央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9月上旬令第二野战军分路集结湘西，兵锋直指大西南；第四野战军解放鄂北、湘北和赣西北地区，准备进军两广、解放中南；第三野战军8月进军苏、浙、闽，解放宁波、福州，逼近厦门、漳州。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新生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庄严先声响彻神州。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尊重最广大人民意愿，摒弃了先由北洋军阀后由国民党主张的实行地主买办阶级专政，使中国继续匍匐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张，杜绝了中间派试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进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领导人民开始了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经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创新与实践。

30日下午6时，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同政协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毛泽东宣读了由他起草、经全会通过的碑文，率先为这座开国标志性建筑执锹铲土。率军渡江南进的刘伯承、粟裕，出现在奠基者中。

1952年8月1日，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式开工。

1955年6月9日，毛泽东题写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七个大字。兼任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主任的彭真，主张请“写得一手极好的颜体楷书”的周恩来手书碑文，得到毛泽东赞同。周恩来反复练习，每天起床后都抄写一遍碑文，先后写了四十多遍，最后挑选写得最满意的一幅碑文，送到纪念碑设计处，谦虚地问工作人员：“我躲到北戴河练了一星期的字，你们看行不行？”

1958年5月1日，首都五十万市民聚集天安门广场，共同见证承载着无数英雄魂魄和中华民族精神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隆重揭幕。须弥座上雕刻的一百七十二个人物，每一个都栩栩如生。碑身正面“胜利渡长江”浮雕，是八幅浮雕中尺寸最大的一幅。

从精兵南渡到千里扬帆，从牵敌回师到犁庭扫穴，仅仅一年十个月，渡江南进构想即化为改天换地、再造乾坤的辉煌现实，中国革命史上最为激励人心的壮歌，成为永久的天地绝唱。

前无古人的伟大进军，必定创造惊艳后世的奇迹。

2021年6月29日，中国共产党百岁华诞前夕，在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的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出现了一位坐轮椅的女英雄，她就是誉满中华的马毛姐。参加敬献花篮的，还有交响乐《红旗颂》作者、无为籍音乐家吕其明。一个县级市出了两个七一勋章获得者，纵贯一甲子的“根据地考量”令人感喟无穷。

开国成了南进加油站。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今日成立了！”此时，第二野战军集结湘西弯弓待发，三野正遂行漳（州）厦（门）战役并解放舟山，第四野战军激战衡（阳）宝（庆）拟取广东。

那个滞留南京亲睹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壮举，并亲身感受了中国震撼世界之变的司徒雷登，最终还是怏怏返美当起了寓公。

1949年7月，司徒雷登试图留华未果不得不奉召返美，蒋介石忌恨他扶持李宗仁，公开表示不欢迎其派往台湾。国民党集团希望他先到广州，再回美国，以示精神支持。司徒雷登未予应允。8月2日，司徒雷登在解放了的南京“坐着不动”一百多天，终于离开了这个“令人烦恼而死心”的地方，黯然回国。他在经冲绳岛美军基地中转时发表声明，赞成承认中共并与之维持商务关系。但美国政府不准此声明在国内发表，命他不得再擅自发声。

8月5日，美国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为开脱“失去”中国的责任，公开了司徒雷登给政府的许多不宜公开的进言，使其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替罪羊，并开罪了国共两党。8、9月，毛泽东亲撰五篇评论批驳美国白皮书，8月18日写的《别了，司徒雷登》，直指美国政府及白皮书炮制人艾奇逊。司徒雷登作为内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且同蒋介石过从甚密，理应受到批评。但毛泽东清楚，他最终未能北上，并非本人意愿。

当年12月，司徒雷登因麦卡锡主义者骚扰，回美仅三个月即罹患脑血栓，中风失语，偏瘫十三年，1952年被迫辞去大使职务。因其从未在美国本土为政府和公众服务，司徒雷登不能享受政府养老金，每月仅从慈善机构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理事会领取六百多美元退休金，余生主要靠返美时中共允许带走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养活和照料。在他的回忆录中，燕园岁月最美好，而任大使两年的时光则不堪回首。不擅政治运作却被卷入政治旋涡的司徒雷登，最后像一块嚼烂的口香糖，被美国政府无情唾弃，1962年9月19日在华盛顿一家教会医院悄然去世，终年八十六岁。这一天，恰好是毛泽东1945年在重庆宴请他十七周年的日子。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其中四十八年从事高等教育。是后来杜鲁门的一纸任命，改变了他的命运，也使他晚年的人生投影变得斑驳和复杂起来。使华两年，奠定了他悲剧人生的基调。

周恩来在评价司徒雷登的历史功过时说：“对于司徒雷登个人的问题，我们必须既评估个人品德，亦衡量权力影响。当然，他是帝国主义的代表——执行其政策的政府人员。但是他在被日本人拘禁时期所表现的个人品德是值得钦佩的。”

历史早已翻篇。今天人们蓦然回首，追寻司徒雷登在华长长的屐痕，民国灯火阑珊的历史深处，仍可瞥见他清癯修长的身影。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拆分，北京大学从红楼迁入燕园，遂有今日湖光塔影和“燕园”别称。1926年6月5日，司徒雷登夫人艾琳·司徒雷登（路爱玲）病逝于燕园。此后，司徒雷登每天清晨都去妻子墓前静坐祷告，一生未再续

娶。1955年8月1日，司徒雷登留下遗嘱：“我指令将我的遗体火化，如有可能我的骨灰应葬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与吾妻遗体为邻”，1962年9月19日辞世又重申遗嘱。1973年和1984年，傅泾波两次到北京，均向有关方面提出司徒雷登骨灰归葬燕园之事。

1986年，傅泾波请中国驻美大使转呈邓小平一封信。当年6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北大负责人致信美方，同意司徒雷登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葬于校园临湖轩。不料有人上书反对。1987年4月，中国驻美大使馆通知傅泾波，此事因故暂缓办理。

1988年，傅泾波在美抱憾逝世，其后人开始考虑司徒雷登骨灰改葬杭州。国民政府1946年授予司徒雷登杭州荣誉市民称号并赠金钥匙，杭州耶稣堂弄有其故居，他的父母和两个弟弟均葬于西湖九里松墓地。不能归葬燕园，杭州当是首选。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骨灰安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美国驻华使馆和杭州市有关方面及部分燕大校友出席仪式。归去来兮，孤栖华盛顿傅泾波寓所四十六年的司徒雷登灵骨，终回第二故乡。

2019年7月19日，笔者在杭州半山安贤园文星苑10排007号，寻得司徒雷登墓。黑色大理石墓碑上刻着墓主儒雅的肖像；中英文名字和生卒年月下面，是醒目的“燕京大学首任校长”职衔。由此北去十数米，是2001年4月中美南海撞机牺牲的“海空卫士”王伟墓，墓东南有1984年中国女排在洛杉矶战胜美国队首夺奥运冠军的核心队员、原总政联络部副军职干部陈招娣少将墓。咫尺天涯，一文一武与美国有某种关系的华夏骄子，同当年生于杭州的彼岸使华者邂逅天堂，无常历史竟有如此巧合，似有神助。

同一天，笔者在杭州九溪拜谒了陈布雷墓。墓园为陈布雷生前托友人所购退休养老之地，不想却成为他饮恨九泉的冥府。1941年，周恩来让陈布雷外甥翁泽永给他捎话：“对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为一个人服务，要为全中国四万万人服务。”而笃信“一臣不事二主”的陈布雷表示，要报答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只能从一而终。历史并未淡忘他的贡献。2007年，陈布雷获授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章，由其后人代领。陈布雷墓也修葺一新，成为今天再读民国的一道风景。

天翻地覆的1949年秋，排山倒海的解放浪潮席卷南中国。大陆尚未完全解放，由陆向海的渡海登岛作战使擅长陆战的人民解放军面临新的课题。战争与和平的交响，正在揭开新的篇章。

2019年7月至2023年11月采写于上海、杭州、合肥、安庆、铜陵、芜湖、马鞍山、南京、扬州、泰州、苏州、徐州、宿州、淮北、无锡、石家庄、榆林、济南、西安、昆明、海南、北京

后记

璀璨而新奇的历史之光

我开始知道渡江战役，是因父亲当年随军支前荣获的一枚军功章；当我为书写此役踏勘长江北岸时，时光已走过一个甲子。

关于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的文学书写，新中国成立以来已有不少鸿篇巨著问世。在战争硝烟飘散七十多年的今天，还有可能从新的维度和视角再现这一渐行渐远的历史吗？命运对我似有眷顾。毕生从戎的经历，使我在回眸畴昔时发现了新的书写契机。

这一发现，在于我看到了璀璨而新奇的历史之光。

渡江南进这一改变了世界东方力量对比的最后的战略性决战，是中国二十八年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最为高光的时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要解决寻路和在斗争中选择自己领路人的问题。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和党的领袖集团业已成熟，培养造就了大批干部，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敌御侮中堪称中流砥柱，但毕竟力量规模有限，军民只能以敌后游击战争开展持久战。抗战胜利后，当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韪挑起内战，革命武装被迫奋起进行自卫战争以避免中国坠入黑暗，党在二十多年血火砥砺中煅铸和积累的优势便喷薄而出，人民军队迅速由劣势转为优势，蒋介石集团及其军队很快遭到反噬。

这一神奇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其间经历了怎样的峰回路转？实现战略转圜的枢纽在哪里？穿行这段云谲波诡、扣人心弦的历史，我看见一个精灵，一个战略精灵，引导人民解放军逆势反攻，创造了世界正义战争史上力量规模并不占优但绝地反击一举扭转局势的奇迹。2023年12月27日，我登上晋陕大峡谷西岸佳县东方红阁，俯瞰紧偎吕梁山奔腾南去的黄河，油然忆起1947年7月29日深夜，毛泽东电告刘邓“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要求直出大别山以免“陕北不能支持”并增加中原困难的情形。8月，毛泽东在佳县朱官寨先后三次与县委书记张俊贤会商军粮问题。张俊贤扳着指头细数所剩无几的存粮后说：“全县还有万把只羊。”“羊吃完了咋办？”“还有两千多头毛驴和牛。”毛泽东闻之面有戚色：“卸磨杀驴，百姓如何种地？”遂下令不杀一牛、不宰一驴。统帅与将士心手相通，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呈品字形布势经略中原、两翼牵制，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和陕北的“黄河战略”立刻相形见绌。战略上的胜利，使出击外线的人民解放军牢牢把握了战场主动权，适时从内线转向外线作战这把神奇的钥匙，打开了胜利之门。仅仅过了半年，1948年初，毛泽东就在杨家沟对陈毅说：我们肯定要在

全国胜利了！深远经略蕴含的拔山超海之力，推动战争局势迅速反转，此中奥妙至今仍引人思索和探究。

历史不能忘却并写下重重一笔的是，党中央、毛主席经熟筹采纳粟裕暂不分兵南进，集中华野、中野主力在黄淮聚歼国民党重兵集团，廓清江北再渡江南进三次建言的佳话。经中共中央五大书记城南庄会议当面听取粟裕汇报，决定由原拟刘邓大军和粟兵团两翼齐飞南下，到粟兵团迟出江南，集优聚力与国民党军决胜江北。南线战略一经调整，豫东、济南、淮海战役便相继奏凯，解放战争胜利进程明显加快。以南线战略调整为贯穿线，观照渡江南进在战争迷雾中演进的奇迹，一部恢宏战争史诗跃然眼前。

渡江南进是埋葬旧世界、建立新中国的定鼎之战，它始终是党的政略战略协同实施相得益彰的结果。此役有别于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深度触及美英等西方大国在华利益，向江南实施战略追击将革命进行到底，不仅要准备应付美英等国的战略威慑和武装干预，而且要化解社会主义大本营担心引发新的世界大战一度对南进持消极态度等不良因素。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并行交织的全方位战略博弈，为作品展开丰赡而深邃的书写，提供了广阔历史时空和充裕素材。作品以确凿而生动的史实，宽领域、大纵深展现两个中国、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殊死搏战，令人信服地揭橥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一定会胜利、蒋家王朝为什么必然走向灭亡的人间正道和历史沧桑。

创作准备从2019年夏天就开始了。我从上海淮海路出发，徒步经威海路至南京路，辨识当年十万大军睡马路的指挥所和经典照片诞生地，拜谒宝山烈士陵园，踏勘当年争烈斗激的月浦战场。杭州耶稣堂弄司徒雷登故居，九溪陈布雷归宿地，浙江省图书馆民国图书专柜前，都留有我寻访的足迹。为努力逼近历史真实，翔实掌握第一手材料并触摸历史脉搏，2020年5月，我奔赴刘邓率军摆脱国民党军追击胜利渡淮的河南息县小王湾村，参观刘邓大军渡淮纪念馆；翌年6、7月间又采用田野调查方式，从安徽安庆、铜陵、芜湖、马鞍山市，到江苏南京、扬州、泰州市，自西向东把渡江战役绵延上千公里的主要起渡点和屯兵地都走了一遍，与渡江老战士、史学专家，史志部门专业工作者座谈切磋，进村入户与参战船工和目睹过开掘“战地运河”奇观的村民促膝交谈，还查阅了苏皖两省和上海市有关馆藏档案，以及东部战区联合参谋部档案馆有关原始材料。2022年10月，我访问了毛主席战斗生活过的河北省阜平县西下关村、城南庄、花山村、平山县西柏坡；次年底，我踏着冰雪，寻觅毛主席转战陕北在佳县神泉堡和前东元村、靖边小河村、米脂杨家沟等地驻留的历史遗珍。在此前后，我专程赴邳州市碾庄、濉溪县双堆集、永城县陈官庄战地，谛听淮海大战的回声；瞻仰总前委在濉溪县文昌宫、韩村镇小李家的驻地和华野萧县蔡洼村指挥所，领略战略决战中将帅叱咤风云的丰采；攀上济南解放阁，通过老战士口述录像还原当年城头激战情

景；登临江阴要塞炮台俯瞰长江天险，缅想深潜勇士虎穴暗战的惊心动魄。甲辰夏秋，我徜徉南京西康路美国驻华大使馆，感知那场影响了战役进程的入宅风波；漫步宁、桂李宗仁官邸和白崇禧故居，追寻历史流变中桂系兴衰的轨迹。走进历史深处，重拾战地记忆，渡江南进威武雄壮的活剧，带着硝烟扑面而来。

再现渡江南进历史伟业，是单凭一己之力难以完成的巨量工程。作品付梓之际，我由衷感谢在现地踏勘、史料查阅、专题研讨、定点采访、书稿校改中给予我宝贵支持和真诚帮助的领导、专家及有关部门的同志。他们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作家协会、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东部战区参谋部、中部战区陆军参谋部、原八一电影制片厂、原沈阳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有关领导和专家；安徽、江苏、陕西、山东省军区和所属安庆、铜陵、芜湖、马鞍山、扬州、泰州、宿州、淮北、榆林军分区及有关县市区人武部，上述各省有关省直部门、有关市、县、区领导和专家；广西桂林市委和军分区、辽宁省军区政工局和河北省阜平县人武部有关领导；山东省作家协会、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有关领导和专家；陆军指挥学院石家庄校区、32138部队、93125部队、32128部队领导；山东省军区济南第一退休干部休养所有关领导和同志。

人民文学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对书稿修改和编辑倾注了心血，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注释

卷首

[1]《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二卷），第365—36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

[2]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第44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3]胡石言、吴克斌、罗英才、胡松植、何晓鲁、铁竹伟等著：《陈毅传》，第183—18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第203—20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第283—28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5]《粟裕军事文集》，第245—246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

[6]《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11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7]《从延安到北京——解放战争重大战役军事文献和研究文章专题选集》，第110—11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

[8]《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第39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9]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1945.1—1949.2，第38页，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第1版。

[10]《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13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1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第52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12]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第48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13]胡石言、吴克斌、罗英才、胡松植、何晓鲁、铁竹伟等著：《陈毅传》，第38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卷一 何日饮马长江

（一）窑洞灵光——马背上的神来之笔

[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3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第283—284、29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3]《毛泽东年集》第三卷，第15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第134—13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5]石仲泉：《石仲泉讲党史》，东方出版社2021年11月第1版。

[6]《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第147—14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7]《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第15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8]《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21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9]姚夫、李维民、伊增埙、孙志渊、孙璞方等编：《解放战争纪事》，第19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

[10]刘亚莲：《毛主席在佳县》，第26页，新华出版社2022年2月第2版。

[1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第17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12]《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213—21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1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第22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14][15]胡石言、吴克斌、罗英才、胡松植、何晓鲁、铁竹伟等著：《陈毅传》，第400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16]《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21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17]刘亚莲：《毛主席在佳县》，第98页，新华出版社2022年2月第2版。

[18]《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22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19]陈晋著：《毛泽东的诗性人生》，第163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23年9月第1版。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二），第77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3月第2版；刘亚莲：《毛主席在佳县》，第211—213页，新华出版社2022年2月第2版。

[21]刘亚莲:《毛主席在佳县》，第242页，新华出版社2022年2月第2版。

[2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第307—30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23]胡石言、吴克斌、罗英才、胡松植、何晓鲁、铁竹伟等著：《陈毅传》，第40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24]榆林地区《毛主席转战陕北》编写组：《毛主席转战陕北》，第41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第1版。

[25]《陈毅军事文选》，第46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

[26]《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96—9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

[27][28]胡石言、吴克斌、罗英才、胡松植、何晓鲁、铁竹伟等著：《陈毅传》，第425—42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三）跃进江南的诗与远方

[1]粟裕：《粟裕回忆录》，第389页，人民出版社2022年7月第1版。

[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第33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3]《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274—27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4]《粟裕军事文集》，第344—346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

[5]《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271—27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四）粟裕“斗胆直陈”暂不过江

[1]《粟裕回忆录》，第418—422页，人民出版社2022年7月第1版。

[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第7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3]《粟裕军事文集》，第350—35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

[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第38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5]《粟裕军事文集》，第35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

[6]《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27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7]《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第39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8]《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28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9]《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第39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10]《粟裕军事文集》，第353—356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

[11]《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17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12]《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17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13]《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30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14][15]胡石言、吴克斌、罗英才、胡松植、何晓鲁、铁竹伟等著：《陈毅传》，第415、41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五）“行宪”惊魂：总统选战暗藏杀机

[1]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执笔：《李宗仁回忆录》下卷，第21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1月第1版。

[2]杨波：《横渡长江》，第30—32页，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3月第1版。

（六）历史在城南庄拐弯

[1]中共阜平县委宣传部编著：《老区阜平红故事》，第14—1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高明乡主编：《阜平县志》，第47—48页，方志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

[2]《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307—30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第459—46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4]胡石言、吴克斌、罗英才、胡松植、何晓鲁、铁竹伟等著：《陈毅传》，第41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5]《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第46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6]《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31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7]朱楹、温镜湖、熊铮彦、杜魁元著：《粟裕传》，第67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8]师哲口述，李海文著：《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265页，九州出版社2015年2月第1版。

（七）华东陈毅走马中原

[1][2][3][4]胡石言、吴克斌、罗英才、胡松植、何晓鲁、铁竹伟等著：《陈毅传》，第415—41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5]《新四军·文献（5）》，第37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

[6][7]胡石言、吴克斌、罗英才、胡松植、何晓鲁、铁竹伟等著：《陈毅传》，第418—42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八）山姆大叔动议“倒蒋”

[1]贾可宽、贾永：《1949，牛年春节》，《解放军报》2022年1月28日第12版。

[2]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31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12月版。

[3]姚夫等编：《解放战争纪事1945—1950》，第257—291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

[4]《司徒雷登日记》，第43页，黄山书社2009年7月第1版。

（九）柏林危机的中国机会窗口

[1]《铁幕笼罩——丘吉尔在威斯敏斯特大学的演讲》，《丘吉尔语言的力量》，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6月第1版。

[2]《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311—31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3]《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31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4]朱楹、温镜湖、熊铮彦、杜魁元著：《粟裕传》，第689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5]河南博物馆编：《开封战役资料选编》，第18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

[6][7]《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第489、49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8]朱楹、温镜湖、熊铮彦、杜魁元著：《粟裕传》，第69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9][10]侗枫：《虎啸血野——华东野战军征战录》，第795、75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11][12]《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322—32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13]《粟裕军事文集》，第371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

[14]《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32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15]《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第54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16]《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第29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17][18]《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第567、57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19]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济南战役》，第114页，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

[20]《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第579—58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21]《粟裕军事文集》，第382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

[22]刘统：《决战华东》，第235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

[2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第6—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24]《九纵济南战役政治工作总结》，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藏件。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86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十）蝶变：“小淮海”成为“大淮海”

[1]《粟裕军事文集》，第376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

[2]《粟裕军事文集》，第393—394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

[3]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第1版。

[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第1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51—135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6]《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第76—7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7]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淮海战役亲历记》，第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2月第1版。

[8]粟裕：《粟裕军事文集》，第416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

[9]《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第16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10]《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淮海战役》第一册，第111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1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第17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1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第18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1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第230—23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14]《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淮海战役》第一册，第175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15][16]《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第182、28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十一）淮北演绎“吃”“挟”“看”

[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第24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2]《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淮海战役》第一册，第175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

[3]《粟裕军事文集》，第421—42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

[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第25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5]《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淮海战役》第一册，第189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6]《粟裕军事文集》，第425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

[7]《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第264—26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8]《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三卷，第29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

[9]《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第28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10]《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第29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1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第30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12]《张震回忆录》（上），第344页，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

[13]刘统：《决战华东》，第292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

[14]冯牧:《十四军的覆灭》（外一篇)，见《刘邓大军风云录》（下），杨国宇等编，第79—80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9月第1版。

[15]梁岱：《第十四军被歼纪实》，见《淮海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第46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2月第1版。

[16]谭笑林：《打掉黄维最后一张“王牌”》，杨国宇等编：《刘邓大军风云录》（下），第96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9月第1版。

[17]江深、陈道阔著：《淮海之战》，第309—31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

[18]陈茂辉：《决战的尾声》，见《星火燎原》精选本（中），第424页，解放军出版社2019年第1版。

[19]薛庆超：《浴血奋斗: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第539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24年版。

[20]朱楹、温镜湖、熊铮彦、杜魁元著：《粟裕传》，第779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21]张雄文：《无冕元帅——一个真实的粟裕》，第171页,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版。

[22]军事科学院编：《粟裕纪念文集》，序言第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23][24]张雄文：《无冕元帅——一个真实的粟裕》，第170页，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版。

[25]史全伟：《风范 共和国开国将帅的故事》，第331页，现代出版社2022年7月第1版。

[26]朱军华、傅志雄主编：《大浪淘沙——红报里的中国共产党党史》，第338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24年版。

（十二）总前委初筹渡江大计

[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第382—38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2][3]张震：《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作战与治军》，《回忆邓小平》（上），第5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

[4]《张震回忆录》（上），第345页，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

卷二 南进博弈岂止在天堑

（一）第一夫人的美丽与哀愁

[1]《徐铸成回忆录》，第15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1月第1版。

（二）开元1949之北国江南

[1]《张治中回忆录》，第564页，华文出版社2014年4月第2版。

[2]程思远：《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66辑，第79—81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3]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执笔：《李宗仁回忆录》下卷，第234—238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1月第1版。

（三）江阴要塞风云突变

[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60—136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四）南京发起“和平攻势”

[1]中共宣城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渡江战役史》，第2—4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第1版。

[2]姚夫等编：《解放战争纪事1945—1950》，第294—295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

[3]《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46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4]师哲口述，李海文著：《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302页，九州出版社2015年2月第1版。

[5]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1945.1—1949.2，第460页，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第1版。

[6]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1945.1—1949.2，第423页，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第1版。

[7]《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477—47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五）毛泽东拒绝苏美英法调停

[1]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1945.1—1949.2，第346、348页，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第1版。

[2]赵勇：《毛泽东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劭琯编：《毛泽东两次访苏》，第53—54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6月第1版。

[3]孙大勋编著：《毛泽东与国际友人》，第68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3月第1版。

[4]《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忆录》，第16—1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10月第1版。

[5][6]中共宣城市委党史研究室：《渡江战役史》，第5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第1版。

[7]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1945.1—1949.2，第349—350页，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第1版。

[8]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1945.1—1949.2，第353—354页，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第1版。

[9]《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44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六）米高扬来到西柏坡

[1]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1945.1—1949.2，第346页，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第1版。

[2]《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440—44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3]《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45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师哲口述，李海文著：《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272—279页，九州出版社2015年2月第1版；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1945.1—1949.2，第429—447页，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第1版。

[4]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1945.1—1949.2，第421页，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第1版。

[5]《列宁全集》第54卷，第777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第2版。

[6]戴隆斌著：《斯大林传》，第473页，天地出版社2018年1月第1版。

[7]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1945.1—1949.2，第442页，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第1版。

[8][9]师哲口述，李海文著：《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279、281页，九州出版社2015年2月第1版。

[10]师哲口述，李海文著：《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255页，九州出版社2015年2月第1版。

[11]《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合订本），第39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9月第1版。

[12]李颖：《文献中的百年党史》，第188页，学林出版社2020年11月第1版。

[13]《司徒雷登日记》，第44页，黄山书社2009年7月第1版。

[14]弗拉基米尔·吉杰耶尔：《铁托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1版。

（八）邓小平亲拟《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1][2]《邓小平年谱》第二卷，第158—15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1月第1版。

[3]见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第一部分展陈国家一级文物——邓小平1927年8月7日在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的记录稿原件。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341—34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3月第2版。

[5]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从书编审委员会：《渡江战役》，第5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

[6]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渡江战役》，第6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

[7]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渡江战役》，第7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

[8]刘明钢：《“举重若轻”邓小平》，《作家文摘》2021年12月31日第1版。

[9]《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30—13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

[10]刘明钢：《“举重若轻”邓小平》，《作家文摘》2021年12月31日第1版。

[11] 中共肥东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渡江战役期间总前委在瑶岗》，第130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

[12]中共肥东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渡江战役期间总前委在瑶岗》，第95—96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

[13]张震：《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作战与治军》，《回忆邓小平》（上），第5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

[14]张生华：《邓政委在淮海战役中》，《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第15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

[15]刘建华、刘丽主编：《邓小平纪事》（上），第27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1月第2版。

[16]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中的人与事》，第9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17]《毛泽东年谱》第四卷，第39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九）金陵客夜访双清别墅

[1]韩毓海：《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第62—63页，人民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年12月第1版。

[2]《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47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47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3月第2版。

[4]毛泽东：《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8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5][6]《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470—47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836—83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3月第2版。

[8][9]《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475—47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十）江南暗战的刀光剑影

[1]《张震回忆录》上册，第359页，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十一）以敌之兵克敌制胜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6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2]钟期光：《我军政治工作的一个创举——忆解放战争初期的“立功运动”》，《解放战争战略防御回忆史料》，第166—16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3月第1版。

[3]《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三卷，第281—28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

[4]《解放战争时期的华东敌军工作》，第301页。

[5]《陈赓军事文选》，第496页，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

[6]《陈锡联回忆录》，第254页，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8月第2版。

[7]《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周恩来选集》，第315—316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

（十二）张治中北上前两赴溪口谒蒋

[1]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1945.1—1949.2，第80页，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第1版。

[2]蒋经国：《危急存亡之秋》，《蒋经国自述》，第180页，团结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卷三 民心为舟 士气作帆

（一）起渡点选择的“根据地考量”

[1]《华野战字第17号命令》，〔1949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藏件。

[2]俞迺章：《并肩战斗》，《雄师百战》第346—35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

[3]谭一青、袁德金编著：《军事家邓小平》（下卷），第43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第1版。

[4]范敏主编：《伟大的渡江在靖江》，第67页，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1月第1版。

[5]泰州市党史方志办公室、泰州市档案馆：《一切为了胜利——渡江战役泰州支前文献汇编》，第13页。

[6]泰州市党史方志办公室、泰州市档案馆：《一切为了胜利——渡江战役泰州支前档案见证》，第101、108页。

（二）李宗仁惊悉江阴要塞“通共”

[1]戴戎光：《长江江防总崩溃中的江阴要塞》，《江阴渡江战役史资料选编》（上），第325页，江阴市档案史志馆编。

[2]江阴市档案史志馆编：《江阴渡江战役史资料选编》（下），第893页。

（三）人民自有千舟万楫

[1]江苏省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编：《渡江战役》，第161—162页，档案出版社1989年4月第1版。

[2]江苏省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编：《渡江战役》，第151—153页，档案出版社1989年4月第1版。

[3]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渡江战役》，第1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

[4]《陈毅军事文选》，第49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

[5]《邓小平年谱》第二卷，第16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1月第1版。

[6]上海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上海师院分院马列主义教研室：《陈毅资料选》第116—216页，1979年9月。

[7]泰州市党史方志办公室、泰州市档案馆编：《一切为了胜利——渡江战役泰州支前文献汇编》，第102页。

（四）“隔江钳白”之一石二鸟

[1]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渡江战役》，第35—3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

[2]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1945.1—1949.2，第85—86页，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第1版。

[3]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1945.1—1949.2，第122页，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第1版。

[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8—1949）第14册，第48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5月出版。

[5]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渡江战役》，第6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

[6]《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第50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7][8]《邓小平年谱》第二卷，第161—16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1月第1版。

[9]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渡江战役》，第32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

[10]《刘伯承军事文选》，第442—44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11][12]《刘伯承军事文选》，第446—44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13]吴东峰：《秦基伟勤思善学》，《作家文摘》2022年11月1日第3版，摘自《同舟共进》2022年第10期。

（八）北平和谈的折冲樽俎

[1]《张治中回忆录》，第576页，华文出版社2014年4月第2版。

[2]余湛邦：《我所亲历的三次国共谈判》，第13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3]《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47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4]《张治中回忆录》，第577—579页，华文出版社2014年4月第2版。

[5]《蒋经国自述》，第180页，团结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6]《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480—48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7]《司徒雷登日记》，第109—110页，黄山书社2009年7月第1版。

[8]黄启汉：《1949年“和谈”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67期，第36页，中华书局1980年1月第1版。

（十）“紫石英”号乞降三江营

[1]〔美〕杰克·贝尔登著，邱应觉等译：《中国震撼世界》，第570页，北京出版社1980年7月第1版。

（十一）倒戈将军浦口卧槽

[1]《解放战争时期的华东敌军工作》，第96页。

[2]《第三野战军征战日志》，第26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

[3]江苏省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渡江战役》，第76页，档案出版社1989年4月第1版。

（十二）张轸将计就计偃师马鞍山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第80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第2版。

卷四 收京入沪在春夏之间

（一）“毛主席今晚不睡觉了！”

[1]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渡江战役》，第17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

[2]中共繁昌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南繁芜游击根据地军民迎接大军渡江》，1983年9月24日。

[3]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渡江战役》，第17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二），第82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3月第2版。

[5]韩毓海：《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第194页，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版。

[6]《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第27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7]《刘伯承军事文选》，第44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8]蒋洪斌：《陈毅传》，第65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

（三）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胜利

[1]中共芜湖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编：《重返烽火岁月 再现渡江精神》，第59页。

[2]《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495—49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四）钟山风雨香山入诗

[1]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渡江战役》，第20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

[2]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渡江战役》，第48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粟裕军事文集》，第47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

[3]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解放》，第9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4]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战争年代》，第615—61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月第1版。

[5]王致冰、庄培昌：《蒋介石集团从上海运走了多少黄金去台湾》，《人民日报》1990年1月8日刊印。

[6]曹前发、王颖编著：《领袖影像背后的故事：毛泽东》，第133—141页，中国画报出版社2023年5月第1版。

[7]吴正裕主编：《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五）蒋介石从幕后走上前台

[1]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1945.1—1949.2，第84页，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第1版。

[2]江阴市档案史志馆编：《江阴渡江战役史资料选编》（下），第497页。

[3]台湾《传记文学》，第56卷，第4期。

[4]《申报》1949年4月23日。

[5]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卷，第266—26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1月第1版。

[6]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第89—90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

（六）飞兵郎广长，截断浙赣线

[1]《邓小平年谱》第二卷，第170—17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1月第1版。

[2]《陈赓军事文选》第523页，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

[3]《叶飞回忆录》，第422—423页，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3月第2版。

[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第591—59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5]《张治中回忆录》，第609—610页，华文出版社2014年4月第2版。

（七）毛泽东痛斥丘吉尔狂言

[1]《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486—48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60—146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3]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渡江战役》，第320—32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

（八）擅入司徒雷登官邸风波

[1]《司徒雷登日记》，第120—121页，黄山书社2009年7月第1版。

[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246—24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

[3]《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49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4]《邓小平年谱》第二卷，第17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1月第1版。

[5]《第八兵团渡江以来关于部队执行政策纪律的总结》，东部战区联合参谋部档案馆藏件。

[6]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渡江战役》，第236—23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

[7]《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三辑，第三册。

[8]《邓小平年谱》第二卷，第174—17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1月第1版。

（九）钳击吴淞，喋血宝山

[1]于劲：《上海：1949大崩溃》，第65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2]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1945.1—1949.2，第345页，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第1版。

[3]《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第362—36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4]《叶飞回忆录》，第567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

[5]南京军区司令部战史编辑室：《采访意见选录》，1962年4月。

（十）“瓷器店里捉老鼠”

[1]《迟浩田传》，第64—69页，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

[2]姜浩峰：《邓小平与张锡瑗的上海往事》，《作家文摘报》2024年9月6日第1版，原载《新民周刊》2024年第32期；张进：《历史天空的红色电波》上册，第57页，长城出版社2013年第1版。

[3]《人民日报》2014年8月28日第24版。

（十一）“蒋介石再也回不来了！”

[1]《竺可桢日记》，第1255—125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第1版。

[2]蒋经国：《危急存亡之秋》，《蒋经国自述》，第189页，团结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卷尾 进军正未有穷期

[1]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二卷1949.3—1950.7，第58—59页，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第1版。

主要参考文献和书目

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

毛泽东军事文集.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1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毛泽东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12.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3.

李颖.文献中的百年党史.北京：学林出版社，2020.11.

华国富，温瑞茂，姜铁军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8.

李德平，魏蒲，李光文，陈广相等.渡江战役.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3.

中共宣城市委党史研究室.渡江战役史.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2.

刘伯承军事文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12.

陈毅军事文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3.

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

胡石言,吴克斌,罗英才，胡松植，何晓鲁，铁竹伟.陈毅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8.

蒋洪斌.陈毅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9.

粟裕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7.

粟裕军事文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7.

朱楹，温镜湖，熊铮彦，杜奎元.粟裕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8.

熊铮彦.粟裕大将.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5.

关河五十州.战神粟裕.北京：现代出版社，2014.6.

张雄文.无冕元帅——一个真实的粟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7.

陈赓日记.北京：战士出版社，1982.8.

李德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8.

陈锡联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8.

叶飞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3.

郭汝瑰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5.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3卷.北京：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5.1.

师哲口述，李海文著.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2.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1.

蒋经国自述.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1.

张治中回忆录.北京：华文出版社，2014.4.

顾维钧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1987.2.

余湛邦，余永燕.我所亲历的三次国共谈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9.

刘统.决战华东.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1.

刘统.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1.

江阴市档案史志馆编.江阴渡江战役史资料选编.

泰州市党史方志办公室、泰州市档案馆编.一切为了胜利——渡江战役泰州支前文献汇编.2019.9.

中共肥东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总前委在瑶岗.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10.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局.渡江战役史事新探.1989.9.